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一期 目 录

元旦献词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四年元旦社论（5）

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

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池 恒（9）

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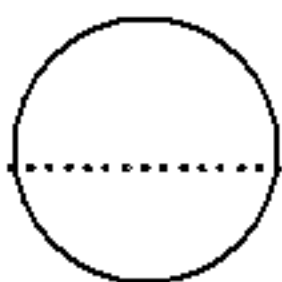
——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洪广思（14）

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青 岩（21）

共产党员要加强纪律性洪 原（28）

把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永远传下去

.....“南京路上好八连”党支部（33）



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 山 凯 (37)

孔子是怎样利用编纂历史维护奴隶制度的?
..... 牛致功 (45)

巩固和发展大学教育革命的成果
.....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53)

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
——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 初 澜 (59)

无产阶级必须牢固占领文化阵地 季如春 (65)

充分依靠人民群众 加快社会主义建设

伟大的创造力蕴藏在群众之中
——安徽淮南大通煤矿的调查报告 (69)

依靠群众，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 赵彦章 (75)

把山区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李顺达 (80)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魏秉奎 (85)

靠什么调动积极性? 上海港务局第二装卸区 孟增林 (89)

杂文：孔夫子在莫斯科 康 立 (91)

☆ 一 月 一 日 出 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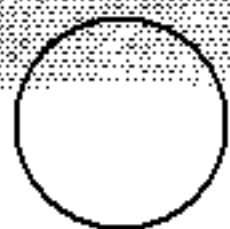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语录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主席语录

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元 旦 献 词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

一九七四年元旦社论

战斗的一九七三年过去了。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地跨进了一九七四年。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战斗的一年。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祖国大地欣欣向荣。

我们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的热潮。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政治上、理论上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教育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群众性的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发展壮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茁壮成长。我们党更加朝气蓬勃，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们的军队更加坚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我国人民意气风发，为革命大干苦干，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二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农业连续十二年丰收。粮、棉、麻、糖、烟的产量达到了新的水平。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钢、钢材、有色金属、原油、电力、木材、机械等重工业产品，棉纱、棉布、化学纤维



等轻工业产品，化肥、农药、农机等支农产品，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基本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交通运输日益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对外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信誉越来越高。科学技术获得了新的成果。

国际上同样是一片大好形势。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局势的发展，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对国际形势所作的一系列科学论断的正确性。过去的一年，苏修美帝争夺世界霸权愈演愈烈，整个世界很不安宁。欧洲是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和争夺中东石油，搞得剑拔弩张，促使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更加激化，加深了世界大动荡的局面。苏修散布的所谓国际局势“和缓”的谎言，已为无情的事实所粉碎。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世界人民日益觉醒，阔步前进。越南和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战争赢得了重大胜利。柬埔寨爱国军民战果辉煌。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事业取得新的成就。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抗击以色列侵略者的战争，冲破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在中东制造的“不战不和”的局面，对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三世界更加壮大，更加团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衰败没落，危机重重。美帝国主义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声东击西，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它到处伸手，到处碰壁，面目更加暴露。它在世界上已经是声名狼藉，处境越来越孤立。

过去的一年，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新的胜利。我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日益加强。我国已同九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锻炼了群众，教育了干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说明这场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贯彻十大精神，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原则，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更大的胜利。

首先，要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林彪路线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个反党集团的斗争，都是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在批林整风中，要认真看书学习。要坚持学好中央规定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继续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是我们应当反复学习的。还要努力读一点历史和小说。马列主义弄通了，路线才能搞对头，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坚持反潮流这个马列主义的原则，识别和抵制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

要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任务。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我们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指导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搞好斗、批、改，把教育卫生革命、文艺革命等进行到底。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继续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



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今年是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关键性的一年。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下去。这样，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我国工农业增产的潜力很大，只要我们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就一定能够使国民经济有更大的发展。我们要以各项工作的优异成绩来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要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大事要多讨论，讨论才能引起大家注意。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我们要深刻领会十大文件强调抓大事的重要意义，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各级领导机构都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认真注意培养革命接班人。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坚持真理，纠正错误。要加强调查研究，分析各阶级的状况，抓好典型。共产党员要执行党的纪律和党章的各项规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认真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要把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真正落实到各个基层。

毛主席缔造和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人民解放军要继续学习和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加强建设，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不断提高战斗力。要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要加强民兵建设，特别是城市和边疆民兵的建设，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和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义务。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让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完成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四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

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

池 恒

一九五七年，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毛主席分析了思想战线的状况后指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毛主席提出，必须批判修正主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并号召我们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它同样也是一次社会的大变动，而且比起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来，更为广泛，更为深刻。对于这场大革命，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人们的思想上，必然会引起不同的反映。这种不同的反映，归根到底体现了两种对立的世界观。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热烈拥护的，他们一致认为好得很。



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亿万革命人民充分发动起来，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妄想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深入地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进一步得到巩固。

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深刻变革。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思想文化各条战线呈现一派兴旺景象。

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广大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老干部重新焕发了革命青春，增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批新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为各级领导班子增添了新鲜血液，带来了蓬勃的朝气。

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经济领域里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一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

这就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问题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刘少奇、林彪这些地、富、反、坏、右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一开始就对这场大革命极其害怕，极其仇恨。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推行了一条“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残酷镇压。林彪则歪曲、篡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妄图把这一革命引入歧途。在反革命的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他更是用最恶毒的语言，无耻攻击、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成就，污蔑在这一运动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对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进行革命和建设。这并不奇怪。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对这场旨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矛头对准着他们的政治大革命，怎么能不害怕、不仇恨呢！反革命的本能，决定他们一定要跳出来进行疯狂的反对和破坏。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阶级敌人这样起劲地反对文化



大革命，正好说明我们党领导的这一场大革命完全必要，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罪行，不只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问题的性质，也早已远远超出一般的世界观的范围。刘少奇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内奸、工贼。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经营了几十年，最后投奔苏修，自取灭亡，叛党叛国，成了可耻的叛徒、卖国贼。他们在政治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党的正确路线，以至完全堕入反革命泥坑，除了有它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以外，从思想根源上说，又是同他们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分不开的。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不改造世界观，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极力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政治上会堕落到什么地步。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自己斗争的精神武器，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哲学基础，因而能够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毛主席指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只有坚持继续革命，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坚信，二十多年来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正确。他们坚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必将战胜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事物。正因为如此，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然感到欢欣鼓舞，积极爱护和支持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壮大。他们能够看到这场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深远意义，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这场大革命中某些不可避免的曲折，提高对阶级斗争规律性的认识，吸取经验，而更加满怀信心地看到大好形势和光明的前途。

相反，如果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是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观察问题，由于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头，客观事物就会被歪曲，甚至颠倒过来。抱有这种



观点的人，经常会低估以至看不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也看不惯，那也不舒服，甚至阻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当然，有这种观点的同志，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也还不相同。但是，这些看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列宁曾经指出：“**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涌现的新生事物持有错误观点的同志，应该以列宁的这段话对照自己，迅速把立足点转变过来，决不能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道路上去。

在一场社会大变动中反映出来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经常表现为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斗争总是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一切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当它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必然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仇恨从事复辟活动，妄想恢复它失去的“天堂”。他们竭力反对前进，主张倒退，企图开历史的倒车。这种现象，历史上多次发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也总是想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利用一切机会，包括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企图使社会主义社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在我国，就是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倒退，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毛主席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党的十大文件指出：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种危险，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需要经常注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个反党集团的斗争，都是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乃是我们经常的战斗任务。我们要把批林整风运动继续深入下去，充分



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使我们的思想能不断适应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批孔斗争，是更加深入地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的斗争，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两个阶级，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对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孔子，是反动的、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表，他的政治理想是恢复日益崩溃的奴隶制度，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中国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借宣扬孔学来反对革命。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也都是用孔学来为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正象孔子妄图复辟奴隶制一样，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目的，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其共同特点，都是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林彪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这个革命把社会历史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而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因此，把批孔与批林结合起来，就能够更好地从世界观的高度认清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理解在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联系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入批判孔子的反动观点，批判一切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尊孔崇孔的罪恶目的，同时克服学术研究中对孔子评价的一些错误观点，在批判中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使无产阶级的思想进一步占领上层建筑的各个阵地。

社会主义革命在不断深入。要使我们的思想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新情况，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做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促进派，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认真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改造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它要求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斗争实践中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才能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乘风破浪，永远向前！



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学习《新民主主义论》

洪 广 思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我们要认真学习、实践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按照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切实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任务。

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同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建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被推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是，旧思想旧文化也如同其他反动势力一样，你不打，它就不倒，它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手中没有政权，他们的经济基础又已被摧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总是把极大的注意力倾注于意识形态这个“世袭领地”，妄图用旧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来腐蚀群众，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指出：“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情况正是这



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人们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很长的时间”仍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尚且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那么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就会时间更长，更复杂。不可能设想，对于这些旧思想旧文化，无产阶级只用十几年、二十几年时间就能彻底扫除它们；也不可能设想，经过几次大的较量，受到几次大的打击之后，它们就会销声匿迹。不会的。它们只要还有一点力量，还有一点市场，就总是要出来破坏和捣乱。它们会根据阶级力量对比、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施展各式花招，利用种种渠道，继续腐蚀毒害人民。

建国以来阶级斗争的事实，一再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依仗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庇护，曾经向无产阶级发起了一次又一次进攻。大家熟知的《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等等，都是旧思想旧文化的顽强表演。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再次抛出的黑《修养》，则集封、资、修反动思想的大成，是旧思想旧文化的反动性和顽固性的集中表现。这些旧思想旧文化居然一再窜出来，是毫不奇怪的，它们是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妄图复辟的舆论准备，是阶级敌人用以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我们同它们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尖锐斗争，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条战线的严重斗争，看不到这场斗争的阶级实质和政治性质，那就会犯错误。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教给了我们向旧思想旧文化作斗争的思想武器：“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批判斗争，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建立不起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思想文化领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决不能搞统一战线，也决不能休战。我们必须拿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武器，同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判孔学的斗争，是我们党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革命斗争。毒害我国劳动人民二千多年的孔学，本来是没落奴隶主的思想体系，后来被封建地主阶级加以改造和发挥，变成封建地主阶级思



想文化的“国粹”。大资产阶级历来就是封建文化的维护者和鼓吹者，象蒋介石之流就拚命地提倡尊孔读经。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就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也同封建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要求变革、要求进步的时候，虽然批判过孔子和儒家思想，但他们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世界观出发的，因而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保留，不能彻底批判孔夫子这个“庞然大物”。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思想家章太炎曾经反对过孔学，后来却“身衣学术的华袞，粹然成为儒宗”。五四运动时期，资产阶级学者吴虞曾经高喊过打倒“孔家店”，而曾几何时，就消沉颓唐，**无声无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刘少奇、林彪之类，都是顽固的尊孔派，有的如陈独秀开始也批过孔，当他走上修正主义、投降主义道路后，又抬出尊孔的招牌来了。这些叛徒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都是“同明相照，同类相求”的。

真正彻底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是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家、思想家。毛主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用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地批判了孔学。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当时正是蒋介石反动派高唱尊孔读经的时候，也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竭力吹捧孔学的时候，毛主席这个分析，从思想上划清了敌我界限，揭露了尊孔读经的反动本质。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给孔学作出这样科学的严肃的分析和结论，才能这样抓住根本，击中要害。这同一切尊孔尊儒的剥削阶级，同那些用折中主义评孔评儒的人们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解放以来，毛主席领导全党不断地开展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特别是这次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对封、资、修的思想文化阵地进行了最有力的扫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广大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批判修正主义，荡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先后摧毁了以刘少奇和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了被资产阶级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这是一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大革命。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深刻剖析了从“五四”开始的文化革命的发展阶段，揭示了革命文化在反复曲折斗争中前进的发展规律。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封建文化的运动。“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对此，代表腐朽没落的旧思想旧文化的反动势力并不甘心，时刻妄图扼杀新文化。到一九二七年，大资产阶级一经爬上了政权，就对在这次运动中冲杀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新军，展开了残酷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作为当时运动右翼的大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掉转枪口，加入了反革命营垒。文化战线上，以鲁迅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和“四条汉子”从内部进行的阴谋破坏，展开了剧烈的斗争，终于使敌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败涂地。到抗日战争时期，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有了新的发展。然而大资产阶级为了反共和降口的需要，又重操文化“围剿”的旧业，再次挥舞屠刀，摇动笔杆枪，向无产阶级文化新军扑杀过来。王明路线抛出的所谓“国防文学”的口号，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实是卖国投降的文学。革命文化又在同外部和内部敌人的新的斗争中得到锻炼，继续前进。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新文化和旧文化之间这种反复斗争，使“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二十年中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验出来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情况当然有了很大的不同。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斗争已经结束，并不意味着新文化的发展从此一帆风顺，不会再遇到逆流，不会再出现曲折。封、资、修的旧思想、旧文化，在革命风暴猛烈冲击的时



候，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常常暂时地退却。革命高潮一过去，一遇到适当的气候，它们就会从阴暗的角落里窜出来，或者乔装改扮，企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或者赤膊上阵，公然对革命反攻倒算，企图卷土重来。这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要时常警惕和注意的。当这种邪风刚刚冒头的时候，或者成为一股逆流向我们涌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扬无产阶级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敢于顶住，敢于批判，打败阶级敌人的进攻，坚守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阵地。

地、富、反、坏、右及其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相呼应，把他们的反革命矛头集中指向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异口同声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毁灭文化”。这是一种陈年老调，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五四运动时期，那些封建遗老遗少们骂革命的新文化运动是“洪水猛兽”，“尽废古书”；几十年间，国民党反动派一直骂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建国之初，帝国主义者也拚命骂我们腰斩了“中国悠久的文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林彪反党集团再次捡起这个破烂武器，只能说明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却无损于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根毫毛。

自从人类社会分化为对立的阶级以后，就没有什么统一的文化，而只有阶级的文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指出过：“**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主张批判地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决不允许兼收并蓄。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批判地继承历史上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而资产阶级则歪曲它、诬蔑它、糟踏它。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对于《红楼梦》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使我们能正确地认识这部伟大小说的政治历史内容，扫除了那些唯心主义的迷雾。而一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新旧“红学家”则用各种方法歪曲和贬低《红楼梦》，把人们引入歧途。他们说的“尊重传统”也好，搞“新创造”也好，其内容都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难道事实不是这样的吗？

毛主席指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是革命的辩证法。社会主义的新文



化不正是在批判旧文化的过程中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吗？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树碑立传的旧文艺被赶下了台，为历史的创造者——工农兵谱写英雄赞歌的新文艺大发展、大普及了。为剥削阶级培养精神贵族的旧学府，被工农兵占领下来，开始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阵地了。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进一步的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只有那些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才会对这些文化史上的深刻变革发出疯狂的咒骂。

其实，反对一种文化，维护另一种文化，这是每一个阶级在实际上都做着的，不过反动阶级口头上不这样说，故意把真象掩盖起来罢了。苏修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天天在那里拚命毁灭社会主义新文化。他们用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来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篡改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把列宁亲手培植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践踏于地，却把腐朽没落的沙皇俄国的地主资产阶级文化和“西方文化”捧上了天。这完全是复辟、倒退的反革命勾当。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林彪一伙极力诋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企图煽起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社会思潮，以利于他们反攻倒算，可谓煞费苦心。然而，革命人民却拿来作了反面教材。这不但使我们认清，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何等样人，而且使我们懂得，应当如何正确对待新事物、新文化，使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更好地掌握规律性，提高自觉性。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只能是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低级到高级地逐步发展。拿革命样板戏来说，哪一个不是经过多少年反复锤炼出来的？不能设想，新事物一出现，就会十全十美，遍地开花。如果拿这种标准来要求新文化，那就无异于扼杀新文化，保护旧文化。鲁迅曾经给那种自命为“革命家”的保守派一幅画像：“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鲁迅质问这种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个与那个》）这种人实际上是站到旧文化的维护者的立场上去了。

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已经迈开雄伟的步伐，蓬



蓬勃地向前发展了。当然，这还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批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了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还需要我们继续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新事物、新文化，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抓大事。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全党的大事。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指出：“**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党的领导，把这件大事切实抓紧抓好。不然的话，整天只是沉湎于日常小事，丢掉了大事，就会滑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

要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取得领导权，主动权，就要有一股热烈的革命精神，就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开头，就教导我们：“**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毛主席正是深入考察了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总结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经验，从而对文化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作出了科学的结论，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去进行胜利的斗争。我们要深刻地理解和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必须深入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去，对政治和文化的动向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和吸取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要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正确地引导群众前进。只要我们坚决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去办，就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不断取得新胜利。

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斗争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无限光明，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人类世界，将按照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来改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青 岩

一九四五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深刻地总结了抗日战争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科学地阐明了党的任务、路线和政策，并且向全党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这些政策和完成这些任务呢？”毛主席接着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要看到光明的前途，同时还要看到存在的困难；要看到工作中巨大的成绩，同时还要看到工作中的缺点；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这是执行党的路线、完成党的任务的根本保证。

毛主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它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党的三大作风，就是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党内两条路线的复杂斗争中，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倡导和培育，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三大作风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它体现了党的性质，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要求。只有我们这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才能有这样的作风。一切资产阶级的党，修正主义的党，由于他们的世界观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追求的是一群一党的私利，处于同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决不可能有这样的作风。我们党内历次



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他们为了推行机会主义路线，莫不竭力反对和破坏党的三大作风，因此，是坚持、发扬党的三大作风，还是反对、破坏党的三大作风，就成了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党的作风是由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党的性质决定的，它反过来又对党的发展和进步，对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完成党的任务，起着重大的保证作用。毛主席在总结我们党的实践经验时曾经指出，要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必须建立“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实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党的三大作风，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壮大自己战胜敌人的重要武器。党的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发扬党的三大作风，革命事业就发展，就胜利；违反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背离党的三大作风，革命事业就受损失，受挫折。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必须牢牢记住这个历史的经验。

党的十大，把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写进了党章总纲，要求全党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光荣传统，继续发扬党的三大作风。这对于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党的事业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胜利前进，有着深远的意义。

毛主席说：“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是正确规定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基础。我们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一贯提倡并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



则，战胜了违背这个原则的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为我们党制定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和政策，指引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今天，我们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就必须继续同违背这个原则的错误路线、错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修正主义脱离社会实践，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妄图把历史车轮向后拉，开倒车，把革命引向失败。我们必须学会识别和抵制修正主义，自觉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就要求我们把“**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地长期坚持下去。修正主义是个政治路线问题，也是个思想理论问题，而其思想理论又是其政治路线的基础。要识别修正主义，透过他们散布的谣言、诡辩和制造的各种假象，认识他们是怎样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揭露他们怎样背叛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实质，最重要的，就是要联系革命斗争实际，刻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通过学习，力求了解马克思主义同新老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识别修正主义，是为了抵制修正主义。要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在任何情况下，敢于坚持正确路线，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敢于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反对错误路线。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是经过不断地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潮流，才不断向前发展的。我们必须永远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党中央为我们制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具体体现。要使党的路线政策深入群众，贯彻落实，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斗争中客观和主观的情况，作深入的科学的实际调查。



通过实际调查,得出正确的阶级估量,提出贯彻党的路线,完成党的任务的具体措施,并付诸实现,才能取得工作的胜利。反之,离开了实际调查,离开了对斗争的主客观情况的科学分析,就会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就不能做到主观和客观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就不能使党的路线深入群众,甚至会流于形式。正确了解情况,必须靠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对实际情况作实际调查,这是其他人代替不了的。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重温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我们感到极为亲切深刻。

只有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才能做到抓大事、抓路线。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缺少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想抓大事也是抓不到、抓不准、抓不起来。埋头于小事而不看大局的做法之所以危险,之所以会导向修正主义,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党的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十大文件尖锐地提醒我们各级党委要抓大事,必须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点。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意志、愿望和要求。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实行群众路线,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最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毛主席指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这是两种对立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工作才能够做出成绩;脱离群众,违背了群众的利



益，不适合群众的要求，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要密切和群众相结合，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具体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这里，必须实行两条原则：“群众的自愿原则”和“领导群众前进进一步的原则”。社会主义革命是极其艰巨而光荣的事业，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觉悟和自觉自愿的参加，才能成功。任何工作，任何运动，有了群众的自觉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才能持久，才能取得成效。我们要善于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进行工作，同时，又要在斗争过程中，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通过群众自己斗争实践的切身经验，提高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不断引导群众前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建国二十几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广大群众的觉悟一步一步提高，革命干劲越来越大。正是这种不断提高的对于革命前途的远见卓识和对于完成确定任务的实事求是的努力，推动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能不能密切联系群众，根本的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我们的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摆对了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彻底解决了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在群众面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甘共苦，和群众打成一片，处处为群众的利益着想，有事和群众商量，随时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就能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没有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高踞于群众之上，搞特殊化，脱离劳动群众，就有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的危险。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工作做出成绩，即使是很大的成绩，这是我们的本分，决不能自满自足起来，而是应该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继续前进。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自



已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的体现，是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在国际国内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一些同志在思想上和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这就要求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的历次整风运动，都是在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指导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进行的。毛主席说：“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在严肃、认真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可以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纠正不正确的思想，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只要我们认真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及时地清除我们思想上的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我们党的组织就会更加坚强，党的战斗力就会更加提高，我们就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在各项工作中做出更大的成绩。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也要自觉地这样办。

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反映在两种作风的斗争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一伙，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搞修正主义，不搞马克思主义；搞分裂，不搞团结；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与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相适应，在作风上，他们搞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那套腐朽的东西，完全与党的三大作风背道而驰。他们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割裂主客观的关系，言论和行动不一致，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违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害怕真理，害怕群众，破坏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违反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在国内，为地、富、反、坏、右服务，在国际，为帝、修、反效劳。他们拉山头，搞宗派，结党营私，一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他们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他们妄图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用地主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以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批林整风运动，摧毁了林彪反党集团，粉碎了林彪一伙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



主义路线。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得到发扬，党的三大作风进一步发扬光大。

但是，应该看到，两种作风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复杂的斗争。被推翻的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总是千方百计用腐朽的思想作风向我们进攻，企图腐蚀我们党的健康的肌体。旧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我们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某些不正之风，正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旧的传统观念的反映。对这些不正之风，如果不坚决抵制和克服，就会使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脱离群众，影响党群关系，削弱党的战斗力，就会干扰和阻碍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损害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抵制、纠正不正之风，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腐蚀反腐蚀、复辟反复辟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关系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大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要象党的十大要求的那样，老同志要继续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年轻的同志要学习、继承和发扬三大作风。我们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党的几十年光荣的革命传统，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监督，党的三大作风一定能够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阐明了改进党的作风对于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对于取得革命事业胜利的重大意义。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教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就会更加坚强，我们的队伍就会更加兴旺发达，就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不断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共产党员要加强纪律性

洪 原

加强纪律性，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促进党的团结的重要问题。在继续深入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共产党员要遵照毛主席关于“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的教导，自觉地执行党的纪律和党章的各项规定，努力完成党的十大提出的任务，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加强党的纪律性，在我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总是根据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需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党面前。红军创建初期，毛主席就亲自为这支人民军队制定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光辉著作中，严厉批判了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害极大的种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思想。一九三八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又一次阐明了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严肃指出，谁破坏了党的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为了适应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主席告诫全党全军：“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建国以来，毛主席又一再教导全党，必须在正确路线指导之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几十年来，我们党正是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不断加强党的团结，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激烈斗争中，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复斗争中，朝气蓬勃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我们党领导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一条非常宝贵的历史经验。

党的纪律是执行正确路线的保证，是使全党紧密团结、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率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任务进行胜利斗争的重要条件。是执行党的纪



律还是破坏党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进行了长期斗争。这种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党的纪律是一切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进行反党活动的障碍，他们在妄图分裂党、破坏革命团结的时候，总是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破坏党的纪律，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这两个反党集团都是破坏党的纪律的。他们破坏党的纪律、结党营私、搞阴谋集团的目的，就是妄图改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篡夺党的领导权。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都必须提高对于反革命两面派的识别能力，同一切破坏党的纪律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总结我们党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特别是同叛徒张国焘的斗争经验时指出：“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鉴于张国焘严重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毛主席向全党重申了党的重要的纪律，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再次明确地把这四条规定下来，这是全党同志必须遵守的。

个人服从组织，就是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自觉地把自已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党的组织之中。列宁说：“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进一步，退两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依靠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才能完成。离开了党的组织，一个人力量再大，也不可能革命斗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果个人不服从组织，我行我素，那就会破坏党的组织，削弱党的战斗力。因此，一个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都要牢固树立党的观念，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党的利益为言论和行动的准则，不应该也不允许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少数必须服从多数。毛主席说：“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有了少数服从多数，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才能有一致的行动。少数服从多数并不



意味着忽视少数人的意见，特别是那些正确意见。党组织在作出决议之前，要经过充分的讨论；有争论的问题，要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即使在决议通过之后，党员有不同意见也允许保留，并且根据党章规定，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和毛主席报告。少数人的意见，经过斗争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最终会被多数人所接受。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在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的身上是一致的。

下级服从上级，是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一条重要原则。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既是中央和上级党委联系党员、群众的纽带，又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领导中枢，它根据党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上级党委的指示，综合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正确意见，对本地区、本部门各方面的工作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下级服从上级，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通过党的各级组织贯彻到群众中去，广大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也才能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反映到党中央。“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如果上级党委的指示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应坚决抵制；如果有不适合当地具体情况的部分，可以而且应该提出修改、补充的意见，在报请上级领导机关同意后实行。

全党一定要服从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唯一领导中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拥护还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还是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是我们党同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进行斗争的根本问题。全党服从中央就是要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地执行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毛主席曾经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任何一个党的组织或个人都不能另立中心，另搞一套，不能对党中央的指示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合口味的就



听，不合口味的就不听，而必须把自己的全部行动纳入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轨道。

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模范地遵守党的这些纪律，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更要以身作则。党的高级干部是不是自觉遵守和执行党的纪律，是直接关系到他们所领导的那个地区和部门能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问题。地位越高，责任越重，遵守纪律越显得重要。有的人把纪律看作是专为普通党员制定的，是管群众的，而把自己“特殊”在纪律之外，这是十分错误的。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执行党的纪律，对下级，对群众，不是放任自流，便是搞一言堂、家长制。党的纪律削弱了，就会为那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开方便之门。全党的纪律性加强了，就可以及时揭露野心家、阴谋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并同他们进行有效的斗争。

加强党的纪律，就要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论联合政府》）党的纪律要求有高度的集中，又要求有充分的民主。党内民主是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所必不可少的一环，是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创造能力和负责精神，以及他们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使他们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才能有真正的集中，有自觉的严格的纪律。没有民主不行，形式主义的民主也不行。但是，我们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组织无纪律。党的民主集中制要求我们，既要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要把自己的行动置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用党的纪律约束自己，而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毛主席说：“**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样，才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林彪一伙为了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总是千方百计



地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无产阶级纪律。他们一方面鼓吹奴隶主义，扼杀党员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妄图使人们不分阶级、不看方向、不问路线地盲目服从，为其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另一方面又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冒充无产阶级的民主，以涣散党员和群众的革命斗志。在他们的毒害之下，我们有的同志往往不懂得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不懂得党的纪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它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高度觉悟的基础上的，执行党的纪律，应是广大党员的革命要求和自觉的行动，因而不能自觉地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纪律，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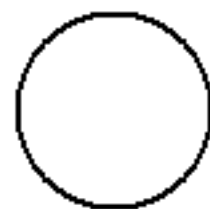
对于党的民主和纪律，要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来看待，不然就分不清是非，划不清界限。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对于毛主席所制定的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自觉性，坚决执行，根本不存在什么奴隶主义的问题。如果对党的正确路线不执行，或者表示迟疑、动摇，是违反党的纪律的。对于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要有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不去反对修正主义，不去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这就违背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同样也是违反党的纪律的。

遵守党的纪律的问题，实质上是世界观的问题。无产阶级世界观是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思想基础，资产阶级世界观是破坏纪律的思想根源。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人，自觉地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着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心为革命，完全彻底为人民，他就必然把党的纪律看作是自己行动的规范。满脑子装着资产阶级脏东西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党，根本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他们争地位，搞宗派，闹独立性，在思想和行动上同党的纪律格格不入。我们有些同志由于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就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违反和破坏党的纪律。因此，加强纪律性，归根到底是一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我们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实践，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加强党的纪律性，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把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永远传下去

“南京路上好八连”党支部



正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怀着热烈兴奋的心情，贯彻党的十大所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深入开展批林整风，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一九七四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特有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它是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有效武器，也是不断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的巨大力量。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重视用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来建设我们的党。毛主席经常拿党在艰苦斗争年代的事例教育我们，要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增强抵制资产阶级腐蚀的免疫力，保持无产阶级的本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连队党支部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把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作为加强连队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使全连团结一致，较好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深刻地阐明了艰苦奋斗与执行正确路线的关系。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我们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项重要保证，而这种革命精神也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下才能得到发扬。通过批林整风运动，反复学习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发扬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仅意味着在生活上要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广大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持并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朝气蓬勃，斗志昂扬，不屈不挠地为巩固无产阶级



专政这个目标而奋斗。

在我们连队曾经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些刚入伍的新同志，怀着朴素的感情，迫切想把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接过来。这些同志往往比较简单地认为，穿上了草鞋，从老同志手中接过针线包，就是接过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是一些入伍较久的老同志，对于怎样才算真正发扬了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认识也不是很清楚的。为了使大家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全面理解艰苦奋斗的含义，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利用各种机会，特别是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引导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分析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把艰苦奋斗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着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通过学习，使干部战士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尖锐而复杂，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不但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而且有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林彪反党集团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实现他们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不择手段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其中也包括反对、破坏毛主席提倡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他们不断宣扬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就是妄图从思想上解除我们的武装，腐蚀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使我们党变质。今天我们要抵制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腐蚀，不但要在生活作风上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还必须在政治上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懂得了这一点，党支部就更加自觉地组织干部战士认真看书学习，注意把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政治上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思想上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工作上保持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密联系起来。一九七一年秋天，连队接受了一项紧急的政治任务。当时，天正下着大雨，有的同志饭都没有吃，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激励着他们迅速行动。同志们团结一心，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大家对于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感到由衷地高兴。平时，党支部也积极引导大家在生活上克勤克俭，自觉地为革命节约一分钱、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一寸布。

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存在，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存在，使得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精神不可能和和乎、顺顺当地继承下来，发扬开去，而要依靠反复深入的教育，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的体会是，领导上要充分重视，发现问题要及时分析研究，要以正面教育为主来启发同志们的自觉性。只有这样，



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一九七二年春天，我们连队第三次回到上海南京路担负执勤任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南京路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新的环境面前，连队出现了一些思想问题。当时，有的同志只看到南京路上无产阶级的新风多，看不到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还有它的影响，一度出现了松口气的思想，个别同志在生活上也产生了贪图安逸的苗头。这一新的情况，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党支部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教导，学习了党的基本路线，回顾解放二十多年来，连队几进南京路，每次都要经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战斗的历史经验，认识到干部战士之所以能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粉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一个重要原因，是党支部反复认真地抓了艰苦奋斗教育。今天，少数同志在三进南京路后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苗头，固然说明他们在胜利形势下对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认识不足，也说明了支部工作中还有薄弱点，领导干部有自满思想，放松了教育。而放松教育是对党和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于是党支部及时抓紧了形势教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教育，使同志们懂得了在胜利形势下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重要性，克服了思想上的麻痹松懈情绪和生活上贪图安逸的苗头。

革命的精神，来自革命的实践。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精神，单靠纸上写嘴上说是出不来的，只有置身于三大革命运动中间，才能磨练培养出来。连队一九七二年在返回南京路时，有的同志一到驻地，主张作一些规定，适当限制战士们与社会接触。经过了解，原来是怕出漏子，怕不能保持艰苦奋斗作风。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开了支委会，会上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依靠几条规定能不能把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挡住，使战士迅速成长？讨论中出现两种意见：有的同志认为，重返南京路，是我们学习老同志“拒腐蚀，永不沾”，身居闹市，艰苦奋斗为人民的好机会，主张让战士多接触社会，经风雨，见世面，虚心向南京路上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学习。另一些同志则认为，连队成员更新了，战士们年纪轻轻的，既没有喝过旧社会的苦水，又没有闻过战争的火药味，缺少阶级斗争的基本功，还是少出去保险，主张多在屋里搞教育训练。我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并结合连队成长的历史，回顾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使同志们一致认识到：“拒腐蚀”的能力，是在接触社会，同资产阶级各种影响的斗争中提高的，“永不沾”的意志，也是在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有组



织有领导地放手让战士们接触社会,在实践中培养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而不是加以各种不适当的限制。限制接触社会,并不能培养战士们的艰苦奋斗精神,反而会使他们经不起阶级斗争的风浪,不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支部领导成员的认识统一后,党支部进一步做好有关干部的思想工作,然后发动群众,订出计划,组织干部战士深入工厂、码头、里弄、商店、学校,进行社会调查,开展群众工作,在完成执勤训练任务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志们冒着酷热,来到装卸任务繁忙的上海港,学习码头工人志如钢,千难万险无阻挡的高贵品质,在劳动中培养艰苦奋斗作风。连队还多次到上钢某厂,向钢铁工人学习,一起战高温,夺高产,锤炼革命意志。同志们从小工厂创大业,小船台造出万吨轮等许多动人事迹中,既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又学到了南京路上、黄浦江畔工人群众艰苦奋斗闹革命、搞建设的可贵精神。连队还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干部战士在实践中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出现了主动打扫马路,整修公园,拾金不昧等许多新人新事。同志们说:通过革命实践,学到的是新风,发扬的是正气,对艰苦奋斗的意义认识更深了。

在进行艰苦奋斗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干部的路线觉悟,使之成为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的榜样,不但可以使战士们从干部身上具体感受到我党我军的艰苦奋斗光荣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且能促进干部思想革命化,同战士打成一片,永葆革命的青春。因此,我们注意培养连队干部经常自觉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们生产劳动拣重担挑,长途行军抢战士的背包背,晚睡早起,做出榜样。去年年初,连队新战士实弹射击,原定的日期碰上天气不好,大家遵照毛主席关于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教导,决定按原计划进行。部队一拉到靶场,风雨扑面,泥泞地滑,有的同志产生了畏难情绪。党支部副书记、连长着重讲了在艰苦条件下磨练意志,培养作风,对提高战斗能力的意义,接着第一个卧倒在地,作了示范射击。连长的榜样鼓舞着同志们,大家不顾风吹雨打,斗志高昂地进行实弹射击,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回到连队,连长又不顾自己换洗,忙着组织炊事班烧姜汤,为战士们烘烤湿衣服。新战士初次体会到完成艰苦任务之后的快乐,也感受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任重而道远。为了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我们一定要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把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永远传下去。



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

田 凯

鲁迅说过：“能象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反动统治阶级把孔子抬到吓人的高度，尊孔子为“圣人”，奉孔教为“圣道”；而劳动人民却反其道而行之，指孔子为“盗丘”，斥儒经为“妖书”。这两种不同的态度，鲜明地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和反动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

孔子作为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他的言论和行动，都是直接对抗奴隶解放的伟大历史潮流的。因此，当他刚刚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其反革命生涯的时候，奴隶们就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情况，在专门辑录孔子言行的《论语》里已有所透露；《庄子·盗跖》更是生动地描述了奴隶起义领袖跖同孔子面对面的斗争。当时跖所领导的奴隶起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奴隶主贵族闻风丧胆，“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孔子妄图以他那一套仁义道德说服跖不要犯上作乱，结果被跖驳得哑口无言，“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面无人色，狼狈不堪。《庄子·盗跖》虽是寓言，但毕竟是春秋时代客观现实的反映，它说明了起义奴隶对孔子这个奴隶主贵族代言人的强烈的阶级仇恨和无畏的斗争精神。



《论语》中记有孔子的弟子子路同荷蓀丈人的一段对话：“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一针见血的批判，表现出劳动者对孔子这个剥削者、寄生虫的极端鄙视。从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成为刻画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典型语言。《庄子·盗跖》写孔子请见跖，跖斥之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者，拒之门外，不屑一见。不劳而获正是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本性，这个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的存在正是奴隶们受苦受难的根源。孔子这个不耕不织却要美衣美食的剥削者，提出了一整套论证剥削有理、劳动可鄙的反动理论，还设想出一个剥削者不劳而获、劳动者劳而不获的“理想”图景。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认为奴隶主只要用礼、义、信等去维持自己的统治秩序，人民就会服服帖帖地任从他们剥削和压迫，用不着自己去干种庄稼这类鄙事。奴隶们看穿这是孔子替剥削者设计的治国方法，因而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社会理想。可见，奴隶们反对孔子，从根本上说，是他们反抗剥削压迫、争取自由解放的阶级要求的反映。

孔子复古倒退的反动政治立场，也遭到了奴隶们的猛烈抨击。孔子生活的时代，奴隶制的崩溃已是大势所趋。他却打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旗号，为挽救奴隶制的灭亡而到处奔波。劳动人民对孔子的倒行逆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怒。有一个守门人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斥之为不识时务的顽固派。他的弟子子路向正在“耦而耕”的长沮、桀溺两人问路，长沮、桀溺也乘机嘲弄孔子：“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论语·微子》）奴隶制的崩溃有如滔滔大水，谁能改变这个历史趋势？孔子妄图改变，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奴隶起义领袖跖更直截了当地怒斥孔子妄称文武，是古非今的反动行径，指出孔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妄图开历史倒车，顽固维护罪恶的奴隶制度，是罪恶极重。

对于孔子建立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奴隶们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跖断



然宣布：“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在孔子看来，人人都讲孝悌，犯上作乱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因而孝悌是“仁”的根本。跖对孔子“仁”的批判，也正是从这个根本开始。他列举事实，数说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不慈”、“不孝”、“淫湎”、“放杀”、“暴乱”，揭露孔子妄作孝悌完全是为了欺骗人民。跖按照奴隶阶级的利益，提出了与孔子截然相反的道德观。他认为奴隶主不劳而获是最不道德的，而奴隶们造奴隶主的反，把他们霸占的不义之财夺回来，才是最道德的。在夺取这些财产时，“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吕氏春秋》）对于勇、义、智、仁等道德范畴，都作出了自己全新的解释。《吕氏春秋》坚决反对这种“盗”的道理，但这正表明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意识形态上毫无共同之处。

奴隶们从孔子的言行中，认清了他极其恶劣的政治品质，并给予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孔子满嘴仁义道德，自吹“天生德于予”，俨然以“圣人”自居。而在奴隶们看来，他不过是一个“诈巧虚伪”、卑鄙无耻的家伙。跖严辞斥责他是个“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的反动政客；是个“好面誉人”，“亦好背而毁之”的“巧伪人”。寥寥数语，把孔子的丑恶嘴脸勾画得活龙活现。“巧伪人”，同我们所说的伪君子、政治骗子、两面派的意思类似。孔子确实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嘴上高唱“爱人”，鼓吹“为政，焉用杀”，可是上台刚刚七天，就把宣传革新道理的少正卯杀害了。他背着跖说跖“为天下害”，当着跖又说跖身兼天下“三德”，这不是面谀背毁的两面派吗？跖对于孔子的这种揭露，至今仍不失为我们识别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的宝贵经验。

孔子出于反动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本性，对奴隶极端仇视，甚至公开辱骂劳动人民是“不可与同群”的“鸟兽”。奴隶们对于他当然也是深恶痛绝的。孔子所到之处，劳动人民无不嗤之以鼻。匡人把他拘留起来，陈人不给他饭吃，郑人骂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起义奴隶发誓要“死而操金椎以葬”，“下见六王五伯，将敲其头矣”！（《吕氏春秋》）就是死了也要同孔子所代表的奴隶主阶级斗争到底。《吕氏春秋》作者站在孔学立场上记录这些材料而坚决加以反对，认为



“辨若此，不如无辨”。但这正反映出奴隶们的反抗的声音是压不倒的。

奴隶们反孔斗争的革命精神，反映了他们推翻罪恶的奴隶制度的决心。正是由于奴隶们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才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制的统治基础，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到了封建社会，孔子用以维护奴隶制度的一套社会等级学说和宗法伦理观念，经过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番改造，遂又成为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成为地主阶级用来统治农民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历次农民革命斗争，总是触及到孔子及其反动思想。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断然否定“君权神授”，这实质上批判了孔子的唯心主义天命论和他那一套“君君、臣臣”的反动说教。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要变地主阶级的“天”为农民阶级的“天”，实际上也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有力批判。唐末农民起义首次打出“平均”的旗号，起义领袖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宋代农民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元末红巾军起义提出要“杀尽不平”，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均田”、“免赋”等等，都表现了我国农民反对封建制度的朴素的平等、平均要求。这种思想显然是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孔子思想根本对立的，因而历次农民起义都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地冲击了孔子这尊封建制度的护法神。

起义农民还以直接的革命行动，向孔子这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圣人”挑战。金末红袄军起义，由郝定率领的一支队伍攻占曲阜时，就烧毁了孔庙，“殿堂庑廊灰尽什伍”，还把据传是孔子亲手栽种的三棵桧树烧掉，以表示对他的无比愤怒。明朝中期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曾攻占曲阜，于孔庙驻军一夜，在这个“圣地”喂养战马，还把奎文阁中珍藏的“四书”、“五经”扔进污水池，以表示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切齿痛恨。此外，起义农民对于那些“称引书史”，反对革命的士子、儒生也常常采取严厉措施，甚至把他们杀掉。打击这些反革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就是打击他们所卫护的孔学。



十九世纪中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也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声势浩大的讨孔运动。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一开始就明确地把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同摧毁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学结合起来，对孔子及其反动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一年，洪秀全就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捣毁了他任教村塾中“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公开向孔子宣战，向整个封建制度宣战。后来，为了启发农民群众冲破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他曾编了一个故事，借“皇上帝”的权威，严厉斥责孔丘之书“甚多差谬”，把人都教坏了。“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孔丘。孔丘跪下再三讨饶，哀求不已。这个“皇上帝”正是争取解放的革命农民的化身，“皇上帝”对孔子的谴责和鞭挞，就是革命农民对孔子的无情批判和声讨。这个故事表现了太平天国革命坚决反孔的鲜明色彩。

洪秀全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认为孔子的反动思想是封建统治各种罪恶的思想根源。因此，太平天国把儒家经典宣布为“妖书”，明令禁止诵读。“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定都南京后，还专门设立“删书衙”，由洪秀全亲自主持，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进行审订删改，试图批判地吸取其中某些合理的东西。结果，在他们看来，卷帙浩繁的儒家经典中，“祇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二句能合天父之意。”（《盾鼻随闻录》）可见太平天国对孔子思想的批判是相当坚决的。

太平天国发表了一系列革命文献，阐发革命的理论，并依据这些理论制定了一系列革命的政策和措施，从理论和实践上荡涤了孔子的反动思想，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革命发动时期洪秀全创作的《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原道救世歌》，定都南京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后期颁布的《资政新篇》等革命文献，总结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经验，把我国古代农民革命的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它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直接指向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孔子思想。



值得提出的是，太平天国坚决批判了孔学鼓吹的“男尊女卑”的反动思想，猛烈地冲击了束缚妇女的封建夫权和纲常名教，提出了解放妇女的革命主张。洪秀全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原道醒世训》）他主张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使妇女在经济上与男子平等。在太平天国革命队伍里，妇女可以参政做官，可以同男子并肩作战，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使妇女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都与男子平等。为了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还明文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禁止买卖婚姻，禁止蓄婢、卖淫，废除缠足等侮辱妇女的陋习。太平天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表明当时我国农民阶级冲破封建宗法统治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太平天国革命对孔子思想的否定和批判，以及它在革命实践中焚孔庙、毁木主、删儒经、禁道学的坚决反孔行动，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极端恐慌和刻骨仇恨。绞杀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曾国藩哀叹：“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他并号召反革命的“抱道君子”，“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讨粤匪檄》）反动派的诅咒和哀鸣，也从反面说明太平天国的讨孔运动真正打中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要害。

两千多年来，我国劳动人民英勇不屈的反孔斗争前赴后继，这是他们反对腐朽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个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集中表现。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是一条阶级斗争的规律。反动派把维护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孔子思想抬得越高，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也越坚决。

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反孔斗争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这些剥削阶级在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要求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曾强烈反对鼓吹复古倒退的孔子思想。他们对孔子复古主义的揭露和批判，



往往是尖锐的，深刻的，具有革命意义。但是，他们批孔也只能达到这个地步。劳动人民则不仅揭露孔子是个复古顽固派，而且揭露孔子是个剥削阶级寄生虫。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成为新的统治者后，由于历史地位的变化，他们从真老虎变成纸老虎，不再要求社会变革，而是着力于巩固自己这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于是逐渐从反孔派变成尊孔派。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和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相一致的，他们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此，在革命高潮到来时，劳动人民总是站在反孔斗争的前列。

新兴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反对孔子，是为了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劳动人民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地位，他们反对孔子，则是要反对一切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劳动人民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了同孔子的“仁义”学说根本对立的“分均”的革命观点，这是任何进步的剥削阶级思想家都不可能达到的。劳动人民在斗争中提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等贵贱，均贫富”等革命口号，反映了他们要求根本废除等级制度、以至废除阶级差别的朴素愿望。列宁指出：“**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劳动人民要求消灭贵贱、贫富差别，主张平等、民主的革命本质，决定了他们对于孔子维护不平等制度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必然要比任何剥削阶级思想家都更勇敢。他们不仅是从思想上，而且在革命实践中进行了对孔学的批判，思想斗争同政治斗争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历史上劳动人民对孔子的批判，虽然与剥削阶级思想家有其不同的特点，但毕竟还有自己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不论奴隶阶级还是农民阶级，都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他们不能提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去代替旧的社会制度，也不能用科学的世界观去对抗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他们不可能揭露孔子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儒、法斗争所代表的阶级内容。因而他们的反孔斗争，尽管给了孔子及其反动思想以巨大的打击，但却不能最后战而胜之，也不能取而代之。这个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阶



级，它所进行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

伟大的五四运动时期，我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开始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揭开了我国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新一页。“打倒孔家店”就是这个时期提出的响亮的战斗口号。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新民主主义论》）“五四”以后，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文化生力军，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向孔子思想所代表的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表现了无产阶级同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的彻底革命精神。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文章中，密切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孔子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鲜明地批判了孔子的所谓“仁政”的反动性，成为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主席领导的第一次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大战役——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铁的事实撕去了“孔孟之道”的虚伪幕罩，揭露了武训这个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的反动面目。这是向资产阶级的一场进攻，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孔学的第一场针锋相对的战斗。此后，批孔还是尊孔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战线上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内容。

今天的斗争，是历史上斗争的继续。林彪一伙继承历史上反动派的衣钵，祭起尊孔崇儒的破旗，妄图借孔子之尸，还资本主义之魂，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服务。因此，我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继承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革命精神，在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中，彻底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夺取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胜利，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孔子是怎样利用编纂历史 维护奴隶制度的？

牛 致 功

有史以来的一切剥削阶级，都利用编纂历史为本阶级服务。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崩溃阶段。奴隶主阶级由于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顽固地进行垂死挣扎。活动在这个时期的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没落奴隶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妄图利用编纂历史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度，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表现。

孔子是怎样利用编纂历史维护没落的奴隶制度的呢？

修《春秋》，为维护奴隶制度而编纂史书

《春秋》，本来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后来经过孔子的整理加工，充分反映了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孔子自己说过：“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另外，从《春秋》和《论语》的思想完全一致方面看，孔子和《春秋》确有密切的关系。

孔子为什么要修《春秋》？司马迁认为，由于“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于是孔子便产生了“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的想法。（《史记·太史公自序》）“周道”，就是西周奴隶制全盛时期周公建立的一套制度。在奴隶制度面临末日的时候，孔子妄图阻挠历史前进，恢复“周道”。由于他倒行逆施，“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



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但他还是不甘心失败，要进行挣扎。在他看来，与其空发议论，不如利用历史上的具体事实来宣传他的反动政治观点。可见孔子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企图于奴隶制度正在崩溃的时候，用编纂史书的办法，从舆论上为挽救奴隶制度投一剂续命汤。

春秋时期，编写历史是“天子之事”。各国历史都是由专职的史官编写的。孔子既非天子的史官，又非各国的史官，他在晚年却决心用编纂史书的办法为挽救奴隶制度的灭亡而大喊大叫，足证他是由于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本性促使他为维护旧制度而拚老命的（他是在修完《春秋》的第三年死掉的）。同时，他把编纂史书的矛头直接指向正在破坏奴隶制度的“乱臣贼子”，即掌握部分实权“执国命”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孔子冒着这种政治风险，更可见其不甘心失去统治地位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本性了。

孔子根据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和是非标准，扬“善”抑“恶”，尊“贤”贱“不肖”。他要把灭亡的奴隶制国家恢复起来，把断绝的奴隶主后代承续下去。所以，《春秋》是具体针对春秋以来“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的政治形势进行评论的。他坚决反对当时进步的变革，妄图通过对这些具体事实的评论，使人们知道《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君臣父子都“不可以不知《春秋》”；懂得了《春秋》，人们就会知道，君不象君就会遭到反对，臣不象臣就会被杀，父不象父就是无道，子不象子就是不孝，这都是最大的过错。非常明显，《春秋》的基本思想是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也就是说，孔子编纂《春秋》是为了从舆论上加强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顽固地反对革命势力对奴隶制度的破坏。当然，这是徒劳的。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任何力量也抵挡不住。

掩盖事实真相，为维护奴隶制度而歪曲历史

毛主席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



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

孔子为了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和压迫，他极尽歪曲历史之能事，不仅隐瞒历史真象，颠倒是非黑白；而且还把弄虚作假，歪曲历史的恶劣手法提到理论高度，上升成为编写历史的神圣原则，即“《春秋》笔法”，使干了大量坏事、丑事的反动统治者得以在历史上窃取美名。

孔子歪曲历史的手法很多，主要的有：讳、褒、贬、讥等几种。

讳，是回避，也就是隐瞒历史真象。春秋末期，由于奴隶暴动的沉重打击，新兴地主阶级乘机逐步成长壮大，从而使奴隶主阶级日趋没落，已往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因此，“时衰道丧”，不利于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事件与日俱增。孔子为了鼓动奴隶主们作垂死挣扎，他编纂《春秋》时就一面大肆宣扬奴隶主们昔日的威风，一面又把奴隶主们倒霉的事实掩盖起来。“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这就是孔子“讳”的几个重要方面。

“为尊者讳”，就是维护周天子这个最高奴隶主的地位。春秋以来，周天子的地位日益下降，昔日的威风扫地以尽，有几代天子死的时候，连埋葬费也凑不起来，甚至王室的臣子不睦，周王也无能为力，只得听他们到晋国去打官司。奴隶主总头子丧失原有的地位，引起了旧秩序分崩离析的连锁反应。孔子是痛心疾首的。因此，尽管他无法扭转历史的车轮，从实际上恢复周天子的地位，但他在编纂史书的时候却是竭力要维护周天子原有的地位的。公元前七〇八年，由于郑庄公不尊重周天子的地位，周郑双方开战。周桓王亲自率军出征，战争结果，郑军大败王师，更严重的是桓王的肩膀还中了郑军一箭。天子讨伐臣子，被打得落花流水，还几乎丧命，当然是莫大的耻辱。孔子为了掩盖天子的耻辱，维护“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的旧秩序，竟于《春秋》中把周桓王对郑的作战记为“王伐郑”，而且对王师溃败和郑大夫“射王中肩”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真象则避而不记。多么明显，丧师受伤的战败者又被孔子打扮成堂堂皇皇的周天子了。这种为天子讳耻扬威的手法，是孔子奴隶主阶级的本性的自我暴露。

如果说“为尊者讳”是从政治方面维护最高奴隶主的统治地位，那末，“为亲



者讳”就是从血缘关系方面维护各级奴隶主的统治地位。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周公是孔子最理想的圣人，他做梦也想见周公。同时，周公因有功于周室而“有天子礼乐”，鲁是保持西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最完备的国家。所以，孔子编纂《春秋》是以鲁为主体，尊奉周的正统和宗主权的。因而，他对巩固鲁国奴隶主的统治特别关心。凡是鲁国奴隶主集团内部的不光彩事，他都讳莫如深。例如春秋时期，鲁国的国君有七个被杀或被驱逐，孔子都是按照“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的原则处心积虑地加以掩饰。明明是被弑的，《春秋》却记为“公薨”；其实是被驱逐出境的，《春秋》的记载却是“公逊于齐”。他为鲁昭公的“讳”，是更明显的例子。鲁昭公娶吴女为妻，吴鲁同属姬姓之国，同姓相婚，是破坏礼的。但当别人问起此事时，孔子却很干脆地回答：鲁昭公“知礼”。（《论语·述而》）关于这件事情的过程，孔子修《春秋》时均未触及，只是在鲁昭公的这个老婆死的时候，他才记了“孟子卒”三个字。对于国君夫人去姓而称“孟子”，正是为鲁昭公“讳”同姓相婚之疾（非）的手法。

所谓贤者，就是孔子认为有功于奴隶制度的人。晋文公是以“尊王”来标榜自己的，这正符合孔子的维护奴隶主等级制的原则。于是孔子对于他的所谓过错，也都是用“讳”的办法加以掩饰的。公元前六三三年，晋楚及其与国在城濮（山东濮县）会战。结果晋胜楚败，晋文公的名声大大提高。晋文公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特于“践土之会”以后，又在今河南温县大会诸侯，同时，还把周襄王也召去了。诸侯召天子，是违背孔子认为的君臣之礼的。所以他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晋文公所标榜的“尊王”的口号，又是被孔子视为贤德的。孔子为了“讳”天子被召之耻与晋文公的“非礼”之过，于是就在《春秋》中记了“天王狩于河阳”一句。这样，对天子来说，当然名正言顺；对晋文公来说，又毫不相干。真是一举两得，为尊、贤之“讳”的目的都达到了。

“尊”是指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亲”是指奴隶主的家族，“贤”是指对维护奴隶制有功的人物。为这些人“讳”，无疑就是为整个奴隶主统治集团掩恶扬善。不言而喻，孔子“讳”的原则，就是巩固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



讳是隐瞒，褒贬就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褒，是孔子对于维护奴隶制度的有功者的赞扬。周天子的地位孔子认为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因而，凡是拥护周天子的人都是他褒的对象。

贬和讥，是孔子反对新生事物的手法。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新生的封建制度正在茁壮成长，代表封建制度的革新势力千方百计地在破坏没落的奴隶制度。对此，孔子是深恶痛绝，怒不可遏。所以，凡属此事，他不是贬便是讥。

公元前四八二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代表陈恒杀了齐国的国君简公。这是新兴地主阶级对顽固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胜利。这对孔子来说，正是当头一棒。因此，他极力煽动鲁哀公对陈恒兴师问罪。由于鲁哀公处于自身难保的地位，因此孔子的打算未能得逞，但他对陈恒的“笔伐”是决不放过的。他在《春秋》极为简略的文章中，不仅写上“齐陈恒执其君”，而且又写上“齐人弑其君”。不厌其烦地宣扬陈氏的所谓弑君之罪，正说明孔子顽固地反对革新。

公元前五九五年，鲁国实行了“初税亩”制度，也就是按土地的多少征收赋税。显然，这是井田制度遭到破坏，土地私有制出现的结果。这也刺痛了孔子这个奴隶制度的卫道士。他在《春秋》中写上“初税亩”三字。初，指前所未有。孔子用“初”的本意就是讽刺这是违背旧制度的东西。所以《左传》对此解释为“初税亩，非礼也。”《公羊传》更明确地解释为“初税亩，何以书？讥。”这更证明，孔子对于任何新生事物都是格格不入的。

孔子对待奴隶的态度更是反动透顶。他根据“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的原则，把奴隶视为可以任意被驱使的牛马，绝对不可使其懂得任何道理。奴隶与奴隶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此，如果说属于剥削阶级的革新派的活动还可以用贬、讥的笔法写入史册的话，那么，奴隶的革命造反行动连载入史册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当时的奴隶暴动，《春秋》都不记载。但在《春秋》里，连块陨石落地、鹤飞过宋都也要记载，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奴隶还不如石头和水鸟。

孔子利用讳、褒、贬、讥等手法歪曲历史不是偶然的，《论语》里有一个故事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真实目的。有人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人偷了人家的羊，他



的儿子证实了他的偷盗行为，这是一件好事。”孔子听了，冷言冷语地说：“我根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那里是父亲能隐瞒儿子的罪恶，儿子也能隐瞒父亲的罪恶，这才是真正的好事，因为这样最符合父慈子孝之道。”在宗法制度的奴隶社会里，父慈子孝和君礼臣忠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都是讲的下对上要服从，不准犯上作乱。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得很清楚：“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就是说，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人，是不会犯上作乱的。不犯上作乱，就是“忠”。由此可见，孝是巩固奴隶主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为了维护这个重要问题而掩盖事实真相，正说明他歪曲历史的目的是为反动的政治服务的。

孔子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开创了歪曲历史的恶劣先例。他的《春秋》和“《春秋》笔法”，后来被反动的封建史学家捧为金科玉律，全盘继承。鲁迅说得好：“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还说：反动统治者“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谎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仍“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十四年的“读经”》）汉代反动思想家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汉书·董仲舒传》）“素王”就是有王之德而无王之位的意思，“文”是指的法规。在董仲舒看来，孔子著《春秋》，说出了事事必须遵循的王法。司马光又继承《春秋》的传统，编纂了为地主阶级总结反动统治经验的《资治通鉴》。至于“《春秋》笔法”，更是被吹得神乎其神，有人说《春秋》“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春秋谷梁传》序）总之，“《春秋》笔法”成为后历代反动史学家尽力仿效的典范。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编写历史，这种“《春秋》笔法”是应当彻底批判的。

褒旧贬新，为维护奴隶制度而宣扬开倒车的复古主义历史观

孔子修《春秋》，凡是有利于维护奴隶制度的人和事，他都要褒；凡是破坏奴



隶制度的人和事，他都要贬。这是他的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复古主义历史观的反映。董仲舒一语道破了孔子反动历史观的特点：“《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春秋繁露·楚庄王》）这就是说，《春秋》的基本观点是赞美复古，反对革新，其目的，是想达到“法先王”，即反对新兴地主阶级代表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复辟奴隶主统治时代“先王”的旧秩序。一句话，宣扬开倒车的复古主义。

中国的奴隶制度从夏发展到西周，达到了繁荣的时代，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最为完备。所以孔子虽然以“巍巍乎”、“荡荡乎”等动听的词藻歌颂了传说中的古代，但他理想的具体境界还是西周。他认为周朝的道德，至高无比。同时，他明确表示，周朝的礼仪制度是根据夏商两代的制度制定的，最为完备，所以他是赞成周朝的。他还公开声明：“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这就是说孔子认为只要有机会，就决心把周文王、武王之道复兴起来。孔子不仅“好古”，而且还要“敏以求之”（《论语·述而》）。这一切说明，拉历史开倒车的复古主义是孔子唯心史观的特点，按照西周的标准恢复奴隶制度是孔子唯心史观的政治内容。正当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封建制度正在对奴隶制度取而代之的时候，孔子宣扬这种历史观是极其反动的。

与此相反，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思想，则宣扬历史进化的观点，主张“法后王”。商鞅在反对顽固势力时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史记·商君列传》）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把历史分作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后一个阶段比前一个阶段进步。所以他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韩非子·五蠹》）按照法家的观点，战国时期比春秋时期进步。这与孔子的那种开倒车的复古主义历史观是针锋相对的。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激烈斗争的表现之一。因此，如果说实践了法家思想的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那么，奴隶主阶级思想的代表孔子就是厚古薄



今的典型顽固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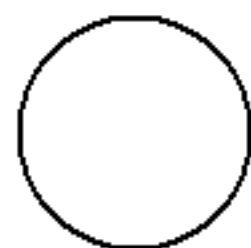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是一面镜子，不同的阶级对待它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先进阶级总是利用历史说明自己的历史任务，为推动历史前进开辟道路，而没落阶级则利用历史以古非今，借古讽今，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逃避历史的惩罚。解放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斗争中，毛主席针对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刘少奇、林彪都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的反动派。刘少奇曾经用歪曲历史的方法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把卖国主义电影《清宫秘史》吹捧为“爱国主义”，就是他用歪曲历史来宣扬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典型表现。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利用历史作为他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他的那些死党，还编写了这样那样的反动史书，歪曲和篡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为林彪树碑立传。但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这是谁也抹杀和歪曲不了的。林彪竭力利用历史并加以歪曲，只能说明他同孔子一样，都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妄图挽救旧制度的不可避免灭亡的命运，为实现其反革命复辟阴谋制造舆论。

孔子利用历史妄图恢复江河日下的奴隶制度而彻底失败了，林彪利用历史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复辟资本主义也粉身碎骨了。历史证明，任何妄图用开倒车的复古主义去达到自己的可耻目的，歌颂古代的反动派来为现行的反动行为辩护的反动派，都会象孔子和林彪一样，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而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则将在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中，越来越巩固，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兴旺。



巩固和发展大学教育革命的成果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我国各族人民满怀革命豪情，迎接一九七四年的到来。放眼祖国，到处是一派团结战斗、朝气蓬勃的兴旺景象。教育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形势大好。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大学教育阵地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领导斗批改，成千上万的工农兵上大学，一批工农兵教师登上大学讲台，这样，就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为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从根本上改造大学教育阵地创造了条件。几年来，北大、清华两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认真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决走《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的光辉道路，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开门办学。文科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各系科在缩短学制、精简课程、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正在积极进行试验，不断取得新的经验。广大工农兵学生同革命教师一起，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一代新型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正在茁壮成长。大学教育阵地的这场深刻变革，虽然开始只有几年，但已显示出无产阶级教育的强大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社会主义大学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大学教育阵地处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之下，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现象十分严重。那时的北大和清华，封、资、修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曾多次对旧的教育进行了冲击，但是攻也攻不动，包括一九五八年那样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运动也被扼杀了。一九六六



年，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毛主席的伟大号令下，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工人阶级和它的可靠同盟军贫下中农，配合解放军战士，开进了学校，冲破了剥削阶级对学校的统治，开始了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教育阵地的历史新时期。这个革命的行动，是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反潮流，是防止出修正主义、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措施。

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来领导学校，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旧的习惯势力的顽强反抗。当前，随着教育革命的不断深入，资产阶级又拿起“业务”这个武器，向无产阶级进攻。有人散布什么“斗批改进入了业务领域，不通晓业务就没有领导权”的谬论，妄图排挤、取消**工人阶级**的领导，对抗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业务工作都是为一定阶级的思想所指导，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抽象的超阶级的“业务领域”是不存在的。学校的斗批改是一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几年来，我们围绕着教育方针、办学道路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斗争，在教材内容、教学方法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难道仅仅是“业务领域”的问题吗？毛主席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离开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指导而“进入业务领域”，就是取消党的基本路线，就很可能进入修正主义的“领域”。学校从来不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是阶级斗争的阵地。办好教育，关键在于方向路线正确与否。而这些事关大局的问题，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正确解决。文化大革命前后教育阵地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这一伟大真理。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不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形势，就不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校的政治方向和办学道路，使学校成为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阵地。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教育制度，存在着两个颠倒的现象：一个是阶级路线的颠倒。工农群众创造了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我们国家的主人，但大批工农及其子女却被拒之于学校的



大门之外。另一个是认识路线的颠倒。人的知识、才能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旧学校却按照唯心论的先验论，脱离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进行教学，使学生越学越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群众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这条办学道路的反马克思主义、排斥工农兵、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实质。一九六八年，毛主席指出：“**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样，就把被封资修旧教育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了。毛主席在《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中所指出的道路，是堵塞资产阶级通过大学这个渠道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是同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一类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道路；是彻底破除“三脱离”的旧教育制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结合起来，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

坚持《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的道路，是古今中外教育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对于这场革命，资产阶级极其恐惧和仇视，而一些受旧传统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则抱着怀疑和观望的态度。有些人挖空心思在所谓“教育质量”问题上大做文章，说什么“现在培养的不算真正的大学生”，蓄意贬低工农兵学生。他们在所谓“提高教育质量”的借口下，搬出一套所谓“老经验”，要搞什么“正规化”。他们的所谓“经验”，其实是旧教学方法的翻版；所谓“正规”，其实是旧教育制度的陈规；所谓“提高”，不过是向资产阶级的老路倒退罢了。无产阶级是决不能照这一套办事的。社会主义大学固然要使学生受到各种专业教育，但首要的是让学生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使他们在学校期间就成为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这一伟大斗争的参加者，并在斗争中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把他们培养造就成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们讲质量，首先要看方向，看路线，看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就是从业务情况来看，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在学习期间又坚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这就有利于学生掌握比较全面的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不看方向、路线，不看学生的政治觉悟，离开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只看死读硬记了多少本本和条条，这是资产阶级的质量观。



广大工农兵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健康成长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资产阶级质量观。几年来，北大、清华的工农兵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在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中立场坚定，冲锋在前，敢于反潮流，成为无产阶级改造大学的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开始改变了过去学文学的不会为工农兵写小说的状况，通过下厂下乡，深入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与有关单位共同创作并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和小说作品。学习电子计算机的工农兵学生，不再象旧大学那样，只能从本本上学原理。他们参加了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的试制，有的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改进意见。最近，两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在校内外参加各种科研项目和实际战斗任务，普遍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清华大学电力系锅炉专业十五名学生，设计改建某电厂油炉，在设计中处处虚心向工人群众学习，反复试验，上马不到一个月就突破了原来由教师作的设计方案，缩小炉膛体积三分之一，节省了材料。这项设计任务的难度和所达到的水平，都超过该专业文化大革命前六年制学生的毕业设计。北大化学系石油化学专业和分子化学专业，不久前向燃化部提交了十份学术报告，都是学生参加科研的成果。有些项目，如从渣油中直接制取苯酐，在全国专业会议上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他们赞扬工农兵学生在学习期间就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显示出一代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长。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要培养的那种从书本到书本的“三脱离”的大学生根本不能相比的。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已经取得了这样好的成绩，可以相信，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我们的教育质量必将有更大的提高。前景是令人欢欣鼓舞的。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刻触及了广大教师的灵魂，有力地推动了他们世界观的改造。几年来，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广大教师批判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反对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反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罪行，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业务上进行再学习。两校已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教师到工厂、农村参加了一年左右的劳动锻炼。大多数教师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路线觉悟有了较大提高，在教学、科研和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也刻苦改造和磨练自



己，在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事业中焕发了革命青春。清华大学水利系有位教授，研究了三十年的泥沙，过去只在玻璃槽里找论文数据，对我国最大的泥沙河流——黄河却望而生畏，成效甚少。文化大革命后，他决心改造世界观，背起行装，沿着黄河步行踏勘五千余里，跨越五省五十一个县市，与老船工同坐一条船，同睡一张铺，同拉一副纤。经过这样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和同志们一起为治理黄河泥沙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共同编写了一本理论与实际结合较好的新教材。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鼓舞他决心为社会主义作出更大贡献。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教师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是会有反复的。原有教师队伍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仍然占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我们的国家抱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个估计是根据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实际表现，进行阶级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承认不承认这个估计，实质上是承认不承认教育阵地上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坚持还是背离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有的人不肯正视自己世界观上的问题，不去主动改造自己，这是不对的。恩格斯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社会实践是检验世界观的标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工人阶级领导学校、走《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的道路采取什么态度，是对一个人世界观的最好鉴别。许多同志正是在这些斗争风浪中自觉改造自己，取得了很大进步。如果不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认真改造思想，却硬说自己的世界观已经没有问题了，这岂不是自欺欺人吗？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有人鼓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要“团结百分之百”。结果怎么样呢？害得许多人放松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无限膨胀，而有的右派分子却得到纵容、包庇。这种历史教训，决不应当忘记。党的十大指出，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全面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就必须坚持用党的基本路线，分析研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严格区分并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反动的思潮，要敢于旗帜鲜明地进行



批判；对于世界观、教育观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要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实践中逐步解决。这样，就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中来。

几年来教育战线的巨大变革，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坚决拥护和热烈欢呼这场伟大的革命，积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成果。资产阶级则颂古非今，颂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之古，非文化大革命后教育阵地深刻变革之今。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摇头派。近几年来，教育战线上围绕着如何对待工人阶级领导、《五·七指示》和“七·二一”指示的道路，如何估计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学校，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教育要不要革命等问题展开的尖锐斗争，归根到底，就是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历史上每一次大的革命之后，人们不仅有一个理解和消化的过程，而且必然伴随着一场肯定还是否定这场革命的斗争。可以预见，随着这场斗争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将展示得越加明显，大学教育必将发生更加深刻的变革，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必将在斗争中完善和巩固起来，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必将在社会主义的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起来。我国教育事业的伟大成就和灿烂前景，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腐朽不堪的教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他们那里，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在试图“改革”教育，但是，任何灵丹妙药都无补于反动社会制度的必然灭亡。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实行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学校才能获得新生，教育事业才大有希望。

斗则进，不斗则退；斗则胜，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这是一条普遍的经验。我们要牢牢掌握党的基本路线，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继续发扬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领域时那种反潮流的英雄气概和调查研究、谦虚谨慎的革命作风，放手发动广大工农兵学生和革命教职员工，经常运用“四大”武器，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

——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

初 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我国各条战线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在文艺战线上，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取得了重大的战果。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之后，《龙江颂》、《平原作战》、《杜鹃山》一朵朵社会主义文艺新花又竞相开放。工农兵英雄人物扬眉吐气地登上了文艺舞台，把千百年来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的历史的颠倒，重新颠倒了过来。这一变革，不仅推动了文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且对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起了巨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要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不能忘记已经走过的战斗历程。一九六二年九月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并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标志着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了新的进攻。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控制的文艺领域发动了革命。文艺革命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开展起来的。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新的进攻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这样，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就不是单单搞一两出戏的问题，而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的革命样板戏要把帝王将相、牛鬼蛇神赶下舞台，让工农兵成为舞台的主人，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这触动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根本利益。反动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同样也不会自动退出文艺舞台。他们如丧考妣，暴跳如雷，穷凶极恶地进行抵制和破坏。



无产阶级要攻克京剧等地主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资产阶级却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妄想把革命现代戏扼杀在摇篮之中；无产阶级要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资产阶级却采取“偷梁换柱”的方法，费尽心机地歪曲、丑化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无产阶级要用革命现代戏牢固占领文艺阵地，资产阶级或恶毒地攻击谩骂，妄想搞垮它，或施放糖衣炮弹，企图腐蚀和分化瓦解革命的文艺队伍。这场斗争涉及到文艺的方向路线、创作方法、文艺队伍等各个方面，是一场两个阶级短兵相接的搏斗。无产阶级经过披荆斩棘的艰苦战斗，粉碎了刘少奇一伙的对抗、破坏，终于取得了重大的战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从文艺领域点燃起熊熊的烈火，开始了伟大的进军。

革命样板戏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思想，深刻地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生活，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生活，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雄伟壮丽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

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期间，“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映红了杜鹃山；十年内战时期，红色娘子军的战旗飘扬在硝烟弥漫的琼崖岛；白毛女的斗争阐明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伟大真理；《红灯记》、《沙家浜》、《平原作战》展现了抗日战争有几亿英雄的壮丽画面；追剿队发动群众智取威虎山，解放全中国军号雄壮；中朝人民并肩作战奇袭白虎团，国际主义凯歌嘹亮；社会主义的海港，洋溢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豪情壮志；人民公社的农村，传扬着共产主义风格的龙江颂……。

这一幅画卷是那么丰富广阔，深刻典型。它之所以能达到广度与深度的完美统一，首先在于它是站在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生活、表现生活，抓住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矛盾，深刻揭示出矛盾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热情地歌颂了各个历史时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反映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作品，深刻地表现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思想，关于依靠群众的思想，关于党指挥枪的思想，以及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无论是《红色娘子军》，还是《智取威虎山》、《平原作战》，都形象地表明了被压迫人民要翻身得解放，必须用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而“战



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即使是有一定篇幅描写地下斗争的作品，也是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红灯记》把李玉和的地下斗争放置在抗日战争风起云涌武装斗争的广阔背景下刻画，正确体现了地下斗争是对党的武装斗争有力配合的伟大思想。《沙家浜》突出了人民军队的作用，结尾正面打进去，点出了武装斗争的主题，同时还生动地表现了复杂的对敌斗争中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政策和策略。《杜鹃山》正面歌颂了毛主席建军路线，实际上也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林彪悲观失望错误思想的深刻批判。这些生动的历史画卷，在今天具有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正如工农兵群众一致称赞的：革命样板戏是我们学习党史、军史、革命史的形象化教材，是我们进行路线教育的形象化教材。

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思想，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斗争生活，关键在于写好阶级斗争。刘少奇、林彪都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吹鼓手，他们及其同伙在文艺上大肆贩卖“无冲突论”，还胡说什么距离我们时代越远越好写，实质上就是否认和反对文艺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海港》、《龙江颂》的成功，正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判。围绕着援外任务和散包事故，在看似风平浪静的上海港激起了阶级斗争的狂波巨澜；在堵江抗旱这似乎纯属人与自然斗争的事件中，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表现得多么尖锐激烈。《海港》、《龙江颂》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思想，敢于写阶级斗争，敢于写思想冲突，善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善于写矛盾的转化，并且触及到世界观的领域。方海珍对韩小强的思想教育，江水英对李志田的耐心帮助，都显示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巨大威力。《海港》如果是就事论事去表现一个散包事故，《龙江颂》如果只是反映人与自然的斗争，或以自然斗争淹没了阶级斗争，主题的现实意义就不可能这样深刻，英雄人物形象就不可能这样高大丰满。这一对姊妹篇各自以特殊的矛盾冲突、鲜明的人物个性和独特的艺术构思，揭示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开创了文艺反映当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生活的新生面。

革命样板戏是中国革命雄伟壮丽的历史画卷，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灿烂夺目的艺术画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半个世纪



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千百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的历史。从反映二十年代斗争生活的《杜鹃山》到反映六十年代斗争生活的《海港》、《龙江颂》，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丰功伟绩，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运动。柯湘、洪常青、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严伟才、方海珍等等都是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又是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杰出代表。

在以往的一切旧文艺中，剥削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总是歪曲历史，把他们的代表人物描绘成“救世主”，而把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视为渣滓。现在，一个个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威武雄壮地树立在社会主义文艺舞台上，放射出绚丽的光彩。这些英雄形象是文艺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文艺作品中的所谓“英雄豪杰”所不能比拟的。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他们正是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真正代表。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树立，展现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斗争，这是对林彪之流所宣扬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有力批判。

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是在斗争中开始的，又是在斗争中发展的。这个斗争从未间断过。最近又有一种论调，就是攻击我们的作品少。这是阶级敌人放出来的阴风。出现这种现象是并不奇怪的，正是阶级斗争在文艺问题上的反映。

关于艺术作品的多和少的问题，决不能离开了政治方向、路线问题孤立地谈论。早在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就曾指出：“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周扬一伙控制下炮制的毒草，数量多不多？多，简直多得充斥市场，泛滥成灾。它们美化叛徒、特务、地主资产阶级，丑化社会主义和工农兵，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吹捧机会主义路线。这种货色越多，放毒就越多，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越有害。对于这种“多”，我们不但毫不希罕，毫不留恋，而且深恶痛绝，要严加批判，把它们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这正是时代赋予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一个战斗任务。无产阶级要牢固地占领阵地，是必须有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局面。但是，这



种繁荣局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要经过斗争，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一批具有高度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作品来带头闯路。革命样板戏不愧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艺术的开路先锋。它们认真地实践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冲破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舞台的面貌，把那些曾经霸占舞台几百年的牛鬼蛇神赶下了舞台，使那些数量浩繁的封、资、修文艺作品相形见绌，显示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所向披靡的巨大威力。革命样板戏直接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了革命的舆论，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充分认识革命样板戏的意义和作用，是充分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翻开文艺史，地主阶级搞了几千年，资产阶级惨淡经营了几百年，请问：他们的作品得以流传的能有多少？传至后世的曾见几何？而我们仅仅在几年时间里，就搞出了这样一批具有高度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革命样板戏，这些作品活跃于舞台、银幕之上，生根于亿万人民群众的心中。从西藏高原到东海之滨，革命样板戏的雄壮歌声在祖国大地上传扬回荡；从城市工矿到农村边疆，革命样板戏的战斗故事在亿万群众中家喻户晓；山区的老大娘为了观看样板戏的巡回演出，兴致勃勃地赶路几十里；张起放映样板戏电影的银幕，顿然使整个渔岛欢腾雀跃；“越是艰险越向前”成了鼓舞革命战士奋勇前进的战斗口号；“龙江”风格已在工农业战线上蔚然成风。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把这一切看作是文艺战线上一个历史性的胜利，以继续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呢？

革命样板戏是来之不易的。它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的斗争，往往为了一句台词，一句唱腔，都得斗争好几个回合。革命样板戏的创作过程，既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又是一场深刻的艺术革命。一种艺术形式当它所表现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引起艺术形式本身的变化，思想内容的革命势必要求艺术形式也来一场深刻的革命。旧京剧、旧芭蕾舞剧是表现中国或外国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艺术形式，无产阶级要运用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工农兵的战斗生活和思想感情，就必须对原有的艺术形式进行彻底的改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遵循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深刻批判了对文艺遗产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的谬论，对旧京剧、芭蕾舞剧进行了改造。大胆实践，勇于创新，标社会



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创造出了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崭新的无产阶级艺术。革命样板戏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成果，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对一字一句，一腔一板，一招一式，反复加工，不断改进，使作品的思想内容不断深化，艺术日臻完美。革命样板戏创作的历史，每一页都铭刻着共产主义者呕心沥血的辛勤劳动，每一页都记载着革命文艺战士披荆斩棘的战斗历程！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局面的形成，总是和文艺队伍的改造联系在一起的。任何文艺作品总是在一定世界观、艺术观指导下创作出来的。艺术革命首先是个思想革命的问题。要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好作品，就要求文艺工作者艰苦地改造世界观、艺术观。革命样板戏的创作，就是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文艺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深入工农兵，学习工农兵，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在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中改造世界观、艺术观的结果。革命样板戏创作的实践，锻炼和培养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并推动着整个文艺队伍的改造和建设。这就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还仅仅是个起点。这是一个伟大的起点，光辉的起点，它的前途是不可估量的。如果把革命样板戏比作傲霜雪、斗严寒的红梅，那么，红梅的绽开必然会引出一个万紫千红、百花盛开的春天。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艺已经日暮途穷，临近终点了，“落花流水春去也”！文艺的春天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当前，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正在蓬勃兴起，涌现了一批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工农兵斗争生活的优秀作品；各种文艺书刊的出版发行日益增多，文学、戏剧（包括地方戏曲）、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曲艺以及其它艺术的创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工农兵业余文艺演出和评论活动十分活跃。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新高潮即将到来。

回顾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十年的峥嵘岁月，我们感到激情满怀，展望今后的十年、二十年，我们更是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在我们面前将会有曲折的斗争，但我们的前景将是更加灿烂光辉。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去夺取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更大胜利！



无产阶级必须牢固占领文化阵地

季 如 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群众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受到了沉重打击，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革命样板戏得到了广泛普及，各种形式的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革命的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无产阶级的新风尚大大发扬，文化阵地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但是，必须看到，文化领域内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很繁重，斗批改还需要继续深入。在广大城乡文化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激烈的。比如，当前在某些角落里“四旧”歪风有所抬头，一些坏戏、坏书、坏故事、坏歌曲时有传播，就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斗争的反映。

城乡文化阵地上长期存在和反复出现阶级斗争，并不奇怪。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就不可能不反映到文化领域中来。城乡文化阵地与广大群众的生活、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历来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场所。各个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都要利用文化这个武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无产阶级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要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批判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而不甘心失败的反动阶级，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总是要利用千百年来旧的传统观念和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文化同无产阶级进行反复的较量。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不止，文化阵地上的阶级斗争



不息。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长期反复地进行着。

建国以来，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同资产阶级进行了多次交锋，对封资修的文化进行了反复的批判。每斗争一次，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就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真正解决，决不能指望经过一、两个回合的斗争就可以一劳永逸。如果不充分地估计到文化阵地上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从而主动地批判和打击资产阶级的影响，那么就有可能走到邪路上去。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牢固占领文化阵地。

有的同志对占领城乡文化阵地的政治意义认识不足，把文化活动看成只是“调剂精神”的单纯娱乐活动和演几出戏、唱几支歌的小问题。这是十分有害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文化都反映着一定阶级的思想、情感、趣味、愿望和理想，都带有阶级的烙印，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兜售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世界观，是为巩固剥削阶级制度和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则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是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服务的。文化的这种阶级特性，决定了文化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总是同政治战线上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相联的。而且，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又总是要从文化阵地上表现出来。

文化是“调剂精神”的单纯娱乐活动吗？在世界上，超阶级的文化和单纯娱乐活动从来没有过，过去没有，现在也不存在。任何文化娱乐活动，都是和一定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思想情感，一句话，都和一定的世界观紧密联系着。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对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历来都是批判的。很难设想，无产阶级能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化来“丰富”自己的“娱乐活动”。如果不警惕抵制，反映地主资产阶级观点的那些坏歌、坏书、坏戏就会乘虚而入。如果任其泛滥，它就会腐蚀我们的干部，腐蚀我们的群众，腐蚀我们的下一代。这能说是单纯的“娱乐活动”吗？毛主席曾深刻地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毛主席的这一指示，



击中了刘少奇、周扬一伙的要害。我们的同志应引以为戒。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决批判和抵制封资修的坏东西，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划清界限，决不能与它们和平共处，更不能任其泛滥。

有的同志说：“锣鼓响不响，庄稼照样长。”这种观点不对。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巩固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又对经济基础起着巨大反作用。思想文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是起巩固、促进的作用，就是起瓦解、破坏的作用，互不关联，相互分家的情况是没有的。反映着无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社会主义文化，通过对群众进行生动形象的路线斗争教育，鼓舞人们的斗志，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而腐朽的地主资产阶级文化，则腐蚀人们的思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现实的情况表明：那里封资修思想文化泛滥，那里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到影响，革命、生产就搞不好；反之，那里抓了文化阵地的阶级斗争，积极开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活动，那里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就不断涌现，革命和生产就得到顺利发展。有的群众说得好：“听了黄色歌，思想就退坡；看了革命戏，浑身有力气。”这说明，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不是与发展生产没有关系，而是关系极大。

同时，我们每一个人民公社、生产队，每一个工厂、车间，处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短兵相接的地方，既是生产阵地，又是思想文化阵地；既有抓生产的任务，又有抓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革命的任务。而且，只有首先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包括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社会主义生产才能得到更快地发展。对此，党的组织不是可以不管，而是必须放在重要位置上，认真地抓好、管好。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无产阶级要牢固地占领城乡文化阵地，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长期以来，刘少奇、林彪出于反革命复辟的需要，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等反动谬论，极力维护旧思想、旧文化，疯狂抗拒和破坏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不深入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



就不能彻底战胜封资修的思想文化。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时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群众，教育群众。在开展基本路线教育的时候，要结合文艺路线的教育。工农兵群众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主体，也是革命文化队伍的主力军。只要他们掌握了党的基本路线，提高了识别能力，进一步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就能够自觉地同那些毒害人们的旧思想、旧文化以及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作斗争。那样，封资修的思想文化就无藏身之地，而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就会更加蓬勃地发展。

满腔热情地支持文化领域中的新生事物，这是我们牢固占领文化阵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在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新生事物，出现了一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化队伍，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崭新革命内容、反映社会主义时代要求的作品，并且创造了一些新的文化活动形式。这些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占领文化阵地的尖兵，是同一切旧思想、旧文化作斗争的有效形式。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富有革命朝气，充满了生命力，比起那些腐朽没落的封资修的东西，要高出千百倍。我们要兴无产阶级文化，灭资产阶级文化，就必须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大造舆论，善于发现文化领域中的新生事物，满腔热情地支持它们，使它们不断地提高和完善，为占领文化阵地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要继续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积极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文化活动，在报纸、刊物上经常发表指导性的文艺评论，努力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经验表明，只有继续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并在样板戏的带动下，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塑造出一批又一批高大丰满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才能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永远赶下舞台，使工农兵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用社会主义思想牢固占领文化阵地。

“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必将彻底战胜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让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扬继续革命、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抓好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用社会主义思想永远牢固地占领文化阵地！



充分依靠人民群众 加快社会主义建设

伟大的创造力蕴藏在群众之中

——安徽淮南大通煤矿的调查报告

安徽淮南矿务局大通煤矿，已有六十多年的开采历史。解放以前，由于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掠夺，被破坏得百孔千疮，遗留下水、火、废墟三大灾害。按解放后掌握的资料，这个矿到一九六七年就要报废。然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批林整风运动，这座老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依靠工人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不仅发掘了新的煤源，而且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克服种种困难，战胜水、火、废墟三大灾害，为国家增产了大量的煤炭。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止，全矿连续六十五个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年产量超过设计能力百分之八十。一九七三年全矿提前三十三天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国家规定的七项指标全面完成。全矿呈现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

老矿焕发了青春，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

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

大通煤矿依靠工人群众办好煤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对待群众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矿党委领导成员和各级干部，正是在斗争中，不断加深对相信和依靠群众的认识，摆正自己和群众关系的。



这个矿一九六八年三月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新的领导成员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比较注意密切联系群众，遇事同工人商量，经过全矿干部群众的努力，到一九六九年，这个矿就被评为全省工交战线学大庆的先进单位。但是，在成绩面前，少数领导同志产生了自满情绪，依靠群众的观念淡薄了，听不进群众的批评。有一年冬天，矿上一个青年写信给报社，批评大通矿取暖用煤有浪费现象。这本来是件大好事，说明群众有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身在煤海，惜煤如金。可是少数领导同志却认为这是在大通矿的红旗上抹灰。工人对领导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上级领导发现以后，要他们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这才引起了矿党委的重视，坐下来重温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教导，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经过学习，大家认识到，自己的路线觉悟不如群众高，爱护国家财物的观念不如群众强。群众的批评不会给红旗上抹灰，干部害怕群众批评却会使红旗变色。认识提高以后，他们公开向群众和报社作了检讨，并因势利导发动群众反浪费，改进经营管理，掀起了群众性的揭矛盾、挖潜力的高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全矿的大好形势。

从这里，大通矿领导成员体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不易。是否相信和依靠群众的问题，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反映，绝不是经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是一辈子都要注意解决的问题。稍一放松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忘记群众。而什么时候忘记了群众，什么时候就会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从此，矿党委在看书学习中把相信和依靠群众的问题作为一个重点课题反复认真学习，在批林整风中，经常联系实际批判“领导高明论”、“群众落后论”，帮助干部从世界观上真正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严防干部由普通劳动者变为官老爷。党委发现有些干部口头上讲群众路线，但在工作中却不能很好地依靠群众。这说明，树立坚定的相信和依靠群众的观念，不仅是个理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在实践中才能逐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因此，党委要求干部下井和工人一起劳动。干部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穿上工作服深入群众，参加劳动，感受果然大不相同。比如，采煤三队的工人一次在一个废墟中发现有



遗煤，要求把它采出来。干部请示上级后决定不采。可是工人不同意。干部解释说：“上级已经批准，不采是合理合法的。”工人反驳说：“这不合社会主义之理，不合总路线之法。按照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这块煤应当采。有困难是事实，但可以想办法解决。干革命那能不担一点风险呢？”结果，工人们巧干苦干，硬是从这个废墟中掏出了一万多吨煤炭。

类似这样的事例很多，使干部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比较深刻地理解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个真理。干部从实践中体会到参加劳动对改造世界观的巨大作用，因此，参加劳动更加自觉，要求也更高了。矿党委去年又制定了“一、二、三”的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即一年矿级领导干部、科室干部劳动一百天，队干部二百天，班组长三百天。不少干部主动到艰苦的地方去劳动，和工人一样，下井一身汗水，上井满身煤灰。

为了使干部不断增强相信群众的观念，摆正自己和群众的位置，大通矿党委还定期开门整风，从群众中汲取政治营养，自觉地把自已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工人群众看到干部真心实意地改进作风，也敢于和乐于批评和帮助干部，有意见及时向干部提出。

为工人当家做主创造充分的条件

大通矿党委还体会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工人当家做主的基础，但还需要领导者努力为工人当家做主创造条件，以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条件包括：

一、不断改进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形式，从组织上保证工人有效地参加企业管理。这个矿成立革委会后就建立有工人参加的生产管理、财务监督等组织，对多快好省地发展煤炭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随着企业管理机构的进一步健全，他们把工人监督组织改为工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参加的三结合企业管理机构，在党委和革委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检查各部门、各单位对路线和政策的执行情况，讨论生产计划，审查预决算，开展企业经济分析活动。这样，工人的意见和建议，反映快，处理及时，效果显著，有利于调动群众参加管理的积极



性。原采煤五队有一度煤炭质量不高，灰分超过国家规定的指标。在讨论会上，有人认为提高质量费工费时，会影响产量，五队其它各项经济指标完成得都很出色，原煤灰分高一点问题不大。工人群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分析了煤炭质量不高会给用户造成浪费的危害，找出了质量不高主要原因是管理不严，并提出了改进办法。结果很快就使原煤含矸率和原煤灰分都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二、创造条件让工人开阔眼界，努力克服社会分工给他们带来的局限。企业管理机构的工人代表处在劳动岗位上，实践经验多，但有局限性，对全局了解少。根据这一情况，党委经常给他们讲解国内外的大好形势，及时传达上级党委的指示，介绍本矿三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和动向，组织经验交流和外出参观，帮助他们开阔眼界，胸有全局。有一度，这个矿的坑木消耗较多，矿领导把这个情况告诉工人群众后，工人们就千方百计地节约坑木。参加矿企业管理的一个老工人坚持在下班后迟上井，到工作面拣零散木料，供采煤使用。矿里还派参加成本管理的一个老工人到木材产地去参观。他回矿后到处向人宣传木材来之不易，希望大家节约木材。他在发料时不仅做到合理发放，还主动到采掘队同工人一起研究改进支架方法，想方设法使用代用品。经过广大工人的努力，现在代替木材使用的已有钢铁、水泥、矿渣、高粱秆、棉花秸、芦苇等二十多种。全矿每采万吨煤消耗的坑木，已下降到十立方米以下，大大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

三、提出主攻方向，大搞群众运动，解决生产上的关键问题。大通煤矿矿老设备差，生产条件困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矿党委就集中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及时提出改变生产条件的主攻方向，采取打歼灭战的办法，依靠群众一个一个地解决。这样大大地调动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他们在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的支持下，先后创造了比较先进的采煤法和灭火技术。这些革新创造经过上级鉴定，已向外地推广。此外，矿党委还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建了三个小煤窑，把大矿井挖不到的小块煤田也挖了出来。大搞群众运动，攻克生产难关，锻炼了群众，使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鼓舞斗志，不怕困难，越是艰险越向前。一九七一年，要开采三号主井地下的煤炭，三号主井需要拆除。这样，井下出煤的任务就要由原来只担负上下料、上下人的副井来承担。可是，副井每天最高的提升能力远远低于



这个矿的平均日产煤炭的数量。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矿党委向群众交了底，广大工人说：“为革命多作贡献，再大的困难也要上，井架倒了，我们的革命精神不能倒”。全矿迅速掀起了一个改造副井的革新热潮，在没有停产的情况下，很快实现了二十多项技术革新，使副井每天提升能力比原来提高了一倍多，保证了煤炭生产计划的胜利完成。

教育工人群众当好煤矿主人

相信和依靠群众，是不是意味着领导者的责任减轻了，政治思想工作可以放松了呢？大通矿党委通过实践认识到，工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是不能自发产生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虽然已被推翻，但它们的尸体还在腐烂发臭。因此，党委必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帮助工人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只有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工人群众，使他们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才能真正成为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主人，才能更好地发挥主人翁的作用，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矿党委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采取办学习班、坚持定期学习、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等多种形式，密切联系实际，对工人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大通，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残杀工人的“万人坑”，矿党委就把它作为阶级教育、路线教育的课堂。每当吸收新工人、新党员，学习班接收新学员时，都首先到“万人坑”前接受教育，加深对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解。矿党委还针对工人中存在的思想问题，组织工人去“万人坑”前面忆苦思甜。在批林整风中，为了使群众加深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的认识，矿党委就组织群众到“万人坑”前面去开批判会。工人们看到坑内前辈们垒垒的白骨，仇恨满腔，怒火万丈，他们愤怒地说：“我们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翻身做了主人，林彪竟想谋害毛主席，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想让‘万人坑’重演，使我们工人再受二茬罪，这万万办不到！”

大通煤矿在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时，还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特点，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做过细的工作，提高群众的路



线觉悟。有些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往往嫌苦怕累，劳动纪律差。矿党委就请老工人向他们诉旧社会的苦，讲新社会的甜。使他们了解，今天煤矿工人的劳动仍然比较艰苦，但这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是为革命吃苦。如果只想到个人前途，只强调自己的兴趣，忘记了工人阶级肩负的历史重担，那就不会有革命的理想和热情。经过这样深入细致的教育，许多青年工人树立了革命的苦乐观，决心扎根煤矿干革命，成为生产上的突击力量。

大通矿的老工人多，约占全矿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老工人的阶级觉悟比较高，在革命、生产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老工人是不是也要经常帮助教育呢？有一个老工人的思想转变过程，给了大通矿党委很大的启示。这个老工人解放前是童工出身，一无所有，现在是样样顺心，感到自己该享享清福了，要求到井上劳动。组织上根据他的要求派他到“万人坑”阶级教育展览馆去工作。他在向参观的群众进行阶级教育的过程中，自己也受到了教育。他检查自己由井下到井上，主要原因是思想上退步了。阶级觉悟提高以后，他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不应当放下当家做主的重担。于是他又主动要求重返生产第一线。从这个事例中，大通矿党委认识到，对老工人也需要不断教育，帮助他们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

老工人焕发出旺盛的继续革命精神，又带动了退休的老工人和职工家属，他们纷纷主动到矿上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矿党委因势利导，把他们组织起来，办起了石灰厂、采石场、砖瓦厂、耐火材料厂和农副业生产队等十多个厂、队。几年来已创造了三百多万元财富，自力更生地解决了矿井生产所需要的许多材料，有力地支援了煤炭生产。

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大通煤矿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决心戒骄戒躁，认真找差距，不断挖掘潜力，为完成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努力奋斗。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 联合调查组
淮南市革命委员会



依靠群众, 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

赵彦章

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步伐, 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关系到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的落实。河北省是我国北方重点产粮区之一, 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对于实现彻底改变南粮北调的光荣历史任务, 具有重大的意义。

解放前, 河北省的农业非常落后, 粮食亩产只有八十多斤。建国以来,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 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 由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粮食产量仍然低而不稳, 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落后局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 全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使农业生产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一九六七年起连续获得了丰收或较好的收成。一九七三年, 虽然春季严重干旱, 秋季多雨, 但粮食总产量仍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棉花、油料等都有了很大发展。经过全省广大人民群众의 艰苦奋斗, 初步实现了粮食自给。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发展社会主义农业, 必须充分依靠群众。不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 要加速农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靠什么去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呢? 我们体会到: 最主要的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干部和群众, 积极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中, 全省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干部, 认真学习、实践党的基本路线, 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声讨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他们在改天换地的斗争中, 意气风发, 斗志昂扬, 不畏艰难困苦, 充分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农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发展农业问题, 说到底是个路线问题。路线决定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和速



度。抓基本路线和抓农业生产是“纲”和“目”的关系。抓了“目”丢了“纲”，就会迷失方向；抓“纲”带“目”，才能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过去，有些同志处理不好革命和生产的关係，往往就生产抓生产，忽视了抓路线。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使大家认识到：什么时候坚持了正确路线，依靠群众大办农业，生产就跨大步；什么时候正确路线受到干扰，群众的积极性就受挫折，农业生产就无起色，甚至会走到邪路上去。因此，领导农业生产，一定要用党的基本路线作指针，抓革命，促生产。

要解决好农业生产的方向、道路问题，还要不断地向广大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广大贫下中农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不能忽视。在农村，两个阶级的斗争，始终围绕着是巩固集体经济还是削弱和破坏集体经济，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展开的。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不仅在后进队有，先进队也有，只是形式不同，程度不同。在大好形势下，有的人往往看不到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产生和平麻痹思想。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各级党委都结合实际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整风运动，发动群众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摆阶级斗争的表现，忆资本主义的危害，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使广大农民进一步认识到，如果放松了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就要泛滥，集体经济就要受到破坏。所以，对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阶级斗争必须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一刻也不能放松。

毛主席制定的关于农村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代表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根本利益，完全符合当前农村实际情况。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总是采取各种反革命手法，竭力破坏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林整风运动以来，全省在深入揭发和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反复向农村干部、群众宣传和落实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经济政策，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展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引导他们向大自然进军，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为加速农业的发展打下基础。改变生产条件是长期的战斗任务，要坚持群众路线，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制订出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广大贫下中农长期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他们对自己那里的山山水水最熟悉，对怎样改造山山水水也最有经验。只要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对生产条件因地制宜地进行全面的改造。从河北省



来说，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一个是春旱，一个是秋涝，多少年来总是如此。依靠群众，解决干旱和洪涝的问题，可以说这就抓住了农业生产上的要害，抓住了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的关键。

形成春旱秋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海河长期得不到根治。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发出的“**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表达了河北省人民摆脱自然灾害的迫切心愿，是从根本上改变河北省农业面貌的伟大战略方针。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的鼓舞下，以大寨为榜样，学习沙石峪人民“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出大力，流大汗，进行了规模空前、气壮山河的改造大自然的战斗，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了根治海河的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每年有几十万民工战斗在海河工地，还有几百万人在全省各地搞水利配套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形成了一个千军万马战海河、社社队队搞工程的热潮。文化大革命以来，开挖、疏浚了漳卫新河、子牙新河等骨干河道二十多条，总长二千多公里；开挖、疏浚了二百多条支流河道和十二万多条沟渠配套工程；修筑防洪大堤二千多公里。经过治理，使海河下游基本上形成河渠纵横、沟洫相通、排灌结合的水利系统，排洪、排涝能力有很大提高，初步控制了洪涝灾害。

在依靠群众解决防涝问题的同时，还发动群众大力解决抗旱问题。毛主席提出的“**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方针，高度概括了治水的辩证法，科学地反映了旱与涝、灌与排之间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解决干旱的问题同解决防涝问题一样，既要看到眼前，又要有一个长远打算，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地进行综合治理。我们体会到，只有着眼当前，立足长远，旱时要注意涝，涝时要想到旱，抗旱防涝两手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河北省来说，打井抗旱实际上是根治海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以来，全省各地基本做到一年四季常年打井不停，机井不断增多，水浇地面积日益扩大。这样，涝时能排，旱时能浇，旱涝保收。

要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落实毛主席提出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还需要对山区和平原，山、水、林、田进行综合治理，搞好田间水利配套工程。这样，才能为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项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开拓广阔的前景，取得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动权。



要加速农业发展的步伐，还必须发动群众，实行科学种田，改革耕作制度。一些高产社、队的事实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迫切问题：当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比如粮食亩产过了千斤，棉花过了百斤，如果不实行科学种田，就很难再大幅度提高产量，农业生产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但是，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影响，留在人们头脑里的旧框框是很多的。实行科学种田，就要打破某些框框。

以前，有些人一直认为小麦是低产作物，比较忽视对小麦的科学种植和精心管理；加上河北多数地区无霜期只有二百天左右，收了小麦，再种一茬，水、肥、劳力都很紧张，所以不愿多种小麦，把一年的希望都寄托在大秋作物上。长期存在的“重秋收，轻夏收”的老习惯，就是这样形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推动下，广大群众从小麦生长的规律中总结出：小麦主要生长在冬春两季，在冬春很少出现病虫、风、雹、洪涝等灾害，为小麦的生长提供了很好的自然环境；随着海河的治理，机井的大量增加，化肥工业和养猪积肥的发展，以及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些都为适应小麦喜水、喜肥的特点，解决夏收秋种劳力紧张等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栾城县近三年来大力发展小麦生产，全县小麦面积由二十一万亩扩大到二十六万亩，增加了四分之一；单产由二百七十一斤提高到五百二十七斤，增长近一倍；总产由五千七百万斤提高到一亿四千万斤，增产一倍多。实践证明：小麦不是低产作物，而是高产作物；而且收了小麦再种一茬，多数地区是做得到的。各地总结了群众的这个经验，大面积种植小麦，变一季为两季，粮食产量不断提高。

过去，有些人总认为一块地要棉花就不能要粮食，要粮食就不能要棉花，粮、棉等作物种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社、队经过试验证明：实行间作套种，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一个重要途径。搞间作套种就是变一年一熟为一年几熟，使有限的土地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在实行间作套种中，广大群众发挥了自已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形式，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成安县何横城大队，在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他们经过几年的反复试验，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特点，充分利用空间、阳光和地力，采取高秆作物与低秆作物、喜阳和耐阴作物、直根与须根作物、早熟与晚熟作物间作套种的办法，在一块土地上长出了粮食、棉花、油料等不同作物，



由过去的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三熟、四熟或两年七熟，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群众性科学种田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人们经常谈论的“河北打出江南粮”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实践的问题了。

农业生产并不是孤立的。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需要各行各业的支援。没有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援，没有工业提供更多的农业机械，农业生产的发展总要受到一定影响。支援农业必须强调树立全局观念，克服“与己无关”、“支农吃亏”等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级党委遵照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充分发挥工业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中的主导作用，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农业，支援农业的技术改造，以逐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强调要坚决地把工业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增强了工业支援农业的自觉性，坚定了支援农业的方向。在工业支援农业中，要正确地发挥县、社“五小”工业的作用。“五小”工业可以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配套，这样就可以使农业机械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为了更好地支援农业，必须不断克服那种贪大求洋和“重造轻修”的思想，强调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根据生产的需要和可能，统一规划，合理安排，坚持“修造结合，以修为主；土洋结合，以土为主；大小并举，以小为主”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因地制宜地发展为农业服务的县、社“五小”工业，同时还要加强县、社、队三级农具修造网的建设。目前，有许多县基本上做到了大修不出县，中修不出社，小修不出队，加强了农机具的维修和管理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

要加快农业生产的步伐，必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把党的路线和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是发展农业的根本方针。但是，要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位贯彻落实，还必须依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措施和办法。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各阶级的动态，认真抓好典型，掌握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和规律，这样才能提出比较正确的措施和办法，及时批判和纠正各种错误倾向、错误思想，有力地指导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农业要上去，干部必须下去。只要领导干部深入第一线，真正转变了领导作风，不是作官，而是革命，那么他们在群众中就有威信，就能带领广大群众进行改天换地的斗争，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贡献。



把山区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李 顺 达

我国的山区很多，毛主席对山区建设非常关心。解放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山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想想旧社会我们山区人民的苦难生活，看看今天社会主义山区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我们西沟大队住在太行山的脊梁上，山大沟深，石多土少，旧社会是个金、木、水、火、土五行俱缺的穷地方。解放后，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为革命建设山区，初步改变了西沟的面貌。文化大革命以来，步子迈得更大，生产发展更快。粮食生产，解放前亩产不到一百斤，现在是年年超千斤；办社初期山上只有几棵树，现在除发展了一万多亩叶绿葱葱的松柏树外，还种了十多万株干鲜果树；牧业、副业也有很大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大。高级社前我们一年要吃国家几万斤返销粮，现在每年向国家交售三十多万斤商品粮，三十多万斤干鲜果，还有其他农副产品。我们原来规划的“山上绿油油，牛羊满山沟，乱石河滩变良田，粮食年年大丰收”的美好理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建设山区靠什么？二十多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不靠天，不靠地，最根本的是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大寨精神，靠发动群众大干苦干，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贫下中农说：“要想面貌变，必须艰苦干”，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党的基本路线是统帅一切工作的总纲，给我们干革命、搞建设提出了总任务和总政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发扬艰苦奋斗、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



劳动。”要完成党的基本路线提出的任务，不艰苦奋斗，苦干实干，与修正主义路线斗，与懒汉懦夫思想斗，与艰苦的自然条件斗，企图侥幸取胜，那是不可能的事。在这方面我们深有体会。一九五五年，根据群众的要求，我们计划扩大初级社。可是，正在这节骨眼上，刮来一阵“砍社”风，说我们“居住分散条件差”，步子走得“太快”了，逼我们下马。是上马，还是下马？我们想，虽说西沟居住分散条件差，可是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高，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艰苦奋斗，合作社一定能办好。我们不理他们那一套，带领群众大干苦干，山上栽树，沟里筑坝，河滩垫地，我们的社不但没有下马，反而快马加鞭，很快转成了高级社，以后又建立了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叛徒、卖国贼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等谬论，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反对我们抓革命，促生产。贫下中农坚决批判和抵制了林彪的干扰和破坏。他们说：种田为革命，丰收多贡献，这是咱们的本分；要是农民不种地，种地不打粮，那才是不革命，假革命。大家把工地变成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战场，越干越起劲。几百斤重的大石头，抬起来一溜小跑。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带来了经济上的丰硕成果。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分不开的。不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艰苦奋斗就没有方向；没有艰苦奋斗、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党的基本路线也不能更好地得到贯彻落实。

艰苦奋斗、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是革命的传家宝，是我们贫下中农的政治本色。过去，我们夺取政权，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靠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得来的；今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继续保持和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只有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才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的同志说，过去穷，需要艰苦奋斗，现在富了，用不着艰苦了。这种思想不对。艰苦奋斗是革命的光荣传统，是我们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精神的表现，我们要永远保持下去。现在，我们国家底子还薄，还不算富。就是富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也不能丢。再说，一个大队富了不算富，全中国富了才算富。我们不能为个人或小集体艰苦奋斗一阵子，而应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艰苦奋斗一辈子。

艰苦奋斗，建设山区，必须同各种害怕困难，不安心山区建设的思想作斗争。



不安心山区建设的思想表现很多，中心问题是不想愚公移山，而要搬家下山。有些同志对山区的认识不正确，怕艰苦，总想离开山区。这些同志没有看到，山区在我国占相当大的比重，能否把我国山区建设好，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件大事。党把山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必须越是艰险越向前，坚决把它完成好。如果都怕艰苦，搬家下山，那山区叫谁来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撇下山区，到了共产主义也不能不要山区。何况，山区的条件“差”和所谓艰苦也是相对的。就自然条件来说，山区是比平原差一些，但山区又有平原不具备的好条件。人们常用“没土净石头”这句话来形容山区。“净石头”算是坏条件吧，其实只要我们把石头开下来，垒成岸，筑成坝，闸成谷坊，再垫进土，“净石头”就能转化成水平梯田米粮仓。可见，山和沟不是包袱，而是财富。有山可以栽树，有坡可以放牧，有沟有滩可以造地。要是把能造林的荒山都绿化起来，能放牧的山坡都利用起来，能造地的沟滩都开发出来，穷山区就会变成社会主义大宝库。这里的关键就看我们能不能象愚公那样，每天挖山不止。只要愚公移山精神在，穷山沟不愁富不起来。只要对山区有了正确认识，又有雄心壮志，艰苦奋斗，两三年就会有变化；如果坚持干它个十年二十年，一定会出现一个更大的变化。因此，我们必须经常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前途教育，使他们正确认识山区，热爱山区，安心建设山区。这是建设好山区的前提。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艰苦奋斗，建设山区，必须克服“等、靠、要”的思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智慧在群众中，力量在群众中，办法在群众中。要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但是有的同志不这么看，他们常常把援助看得比群众还重要。一说改变山区面貌，他们就借口山区条件差，想当伸手派：栽树等树苗，闸沟等材料，治滩要贷款。到底是国家支援重要，还是发动群众重要？我想举个例子说明。我们平顺县有个南耽车大队，这个大队，一九六九年以前，依赖国家办水利，搞了四年，花了国家两万多元钱，收效不大。一九七三年，他们批判两眼向上的依赖思想，大搞群众运动，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只花了六千元，就修了一条七里长的水渠，扩大水浇地三百亩。这说明，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上，不能光靠



支援。不然，就会越靠人越懒，越靠志越短，群众发动不起来，面貌也变不了，暂时变了，也巩固不下来。因为国家支援终究是个外因，是个条件；要想变化，说到底，还得靠内因，靠群众。我们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责任，绝对没有向国家要这要那的权利。

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必须坚决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开源节流，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开支。毛主席说：“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只有坚决执行勤俭办社，勤俭建国的方针，少花钱多办事，集体的家底才能慢慢变厚，社会主义力量才能逐步增强。光开源，不节流，大手大脚，有钱多花，山区建设是搞不好的。在办社初期，我们订了“五不花钱”的制度：山上有的不花钱买，地里能长起来的不花钱买，能修修补补再用的不花钱买，能自己动手制造的不花钱买，能自繁自育的不花钱买。现在，我们大队的公共积累已经达到五十多万元，但这个制度我们还一直坚持着。会计用的小木尺，买一把花不了几分钱，可我们从没舍得花钱买过。收益分配，我们适当安排积累与分配的比例，注意多积累一些。我们为什么抠得这么紧呢？因为贫下中农懂得：财富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来之不易。在旧社会，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终年不见天日；现在日子好过了，但不能忘记旧社会的苦，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受冻挨饿的人民。节约几分钱是小事，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大事。我们贫下中农要胸怀全国，放眼世界，为革命事业而勤俭节约。高楼是一砖一瓦垒起来的，社会主义财富是一点一滴攒起来的。我们西沟正是由于一直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才为生产积累了资金，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集体经济的巩固，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人民公社化以来，我们购置各种大小农机具和加工机具三百四十多部（件），总值十几万元，都是靠我们自己积累的资金买回来的。

艰苦奋斗建设山区，得有个长远打算。有人说那是“远水不解近渴”，当年生产还紧张，哪能顾得上以后。这种想法不符合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远水到底能不能解近渴？我从实践中体会到，远和近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近水不一定能解近渴，远水也不一定不能解近渴。拿栽树来说，早栽树，早歇凉；迟栽树，迟



歇凉；要是不栽树，就永远也歇不上凉。栽树是这样，发展农业生产也是这样。办社初期，我们想在河滩上打坝造地。由于我们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看到河滩造地能多打粮，没看到山上光秃秃，沟里没工程，拦不住洪，蓄不住水，保不住滩，结果，造一次，冲一次，一连造了四次，冲了四次。一九五六年以后，我们接受教训，既顾当年生产，更抓长远建设，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山水沟滩综合治理，一气干了八年，山上造林近一万亩，沟里闸谷坊五百座，河滩造地四百亩，到一九六四年，粮食亩产一下子从四百多斤增加到六百多斤，现在又达千斤。这些事实说明，远水看来远，其实并不远，关键看我们抓不抓，早抓迟抓，抓得好不好。抓了，抓早了，抓好了，远水就能变成近水，远水就能够解近渴。事情就是这样，不论干什么，只要有远大理想，全盘考虑，统筹兼顾，苦干实干，总能干出个名堂来。

我们说建设山区必须艰苦奋斗，决不是说不要科学态度。相反，要艰苦奋斗，必须讲科学，凡事都按客观规律办。要不，艰苦奋斗就是盲目奋斗，即使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山区建设也搞不好。拿荒山播种来说，原来我们不懂荒山播种的规律，成活率很低。低，我们也不管，心想：低不低没关系，只要我们年年播，播多了，荒山总能披绿装。我们年年播，羊井底大队也年年播，可是，成效大不一样，人家的一些山坡已经绿化了，我们的山头有的还是光秃秃。后来，我们到羊井底去取经，才知道，种树得有个科学办法。以后，我们参照羊井底的办法，采用鱼鳞坑播种等方法进行播种，大大提高了成活率，荒山坡很快绿化了。毛主席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在艰苦奋斗，建设山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深深感到，我们的建设速度还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今后，我们决心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进一步搞好批林整风，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出大力，流大汗，加速山区建设的步子，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魏 秉 奎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鞍钢二十多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突飞猛进，钢铁生产不断创造历史最高纪录。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三年，综合生产能力增加了一百万吨以上。这是落实“鞍钢宪法”的结果，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通过学习十大文件，我们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方针，有了更深的认识。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几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它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方针，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正确的道路。只要坚持这个方针，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我们过去执行，现在执行，将来永远要执行这个方针。就好比家庭过日子，日子好了，也要勤劳，也要节俭。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封锁我国的时候，我们要执行这个方针；在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国的国际交往越来越多、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今天，仍然要执行这个方针。这是为什么？从根本上说，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是党的基本路线决定的。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工业，为的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决不能抢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靠任何外来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只能按照本国具体情况，依靠本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利用本国资源，挖掘本国潜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就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离开了这个方针，也就离开



了党的基本路线。长期以来，刘少奇、林彪一伙推行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疯狂抵制毛主席的这个伟大方针，妄图使我国永远不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引狼入室，勾结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重新霸占中国这块土地，把我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把我国劳动人民重新推进火坑。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绝对不容许的。我们一定要站在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看问题，提高执行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自觉性。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工人阶级是有志气、有能力的，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先进技术，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外国的先进技术，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创造的，为什么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不能创造出来呢？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一样，都有一双劳动的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我们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如果看了几样外国设备，听了几句外国情况，就以为外国的工业和技术样样都好，盲目崇拜外国的东西，那是十分错误的和有害的。

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靠的是剥削本国人民，掠夺别国人民。他们的所谓“发达”、“富有”，是建筑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贫困和痛苦上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一方面加紧对本国人民的搜刮，另一方面疯狂榨取别国的财富，出卖本国的资源。他们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一小撮统治阶级**的需要。看起来，他们某些工厂用的人比较少，但不知有多少殖民地附属国人民，为他们提供廉价劳动力，给他们提供原料；看起来，他们某些工厂的自动化水平比较高，但不知有多少工人因此被解雇而失业。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所用的原料、燃料和材料，大部分是以极低的价格掠夺别国的。他们的工业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目前，资本主义世界到处在闹“油荒”、“原料荒”，日子很不好过。阿拉伯国家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石油输出略有减少，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就受到影响，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用马拉汽车的“洋相”。我国的国民经济是建立在自力更生的深厚基础上的，是巩固的。任凭世界其他地方刮起什么风



暴，闹这个荒，那个荒，我国的国民经济仍然在发展中胜利前进。这个鲜明的对照，不是很说明问题吗？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暂时比较先进是事实，但是，他们腐朽的社会制度，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的技术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严重的束缚；即使暂时比较先进的东西，也还有落后的地方。我国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穷国，技术比较落后，但是，由于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我们不仅能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速度发展工业，而且能够在科学技术上有出色的发明和创造。在鞍钢三十多年的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旧社会我当童工时所在的鞍钢铸管厂，原来设备陈旧、工艺落后。解放后，工人群众迅速改变了这个老厂的面貌，并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前实现了铸管生产的连续化。鞍山电业工人创造的超高压带电自由作业新技术，也达到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事实说明，只要我们坚持政治挂帅，敢想敢干敢革命，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发展工业，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的是自己动手，艰苦奋斗。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从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引进技术、引进设备上。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发展中国工业，主要靠中国的内因起作用，靠我们自己的辛勤劳动。鞍钢大孤山铁矿需用一种名叫“长臂电铲”的重要设备。过去，单纯依赖进口，等了十多年没有等到。经过文化大革命，矿党委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发动群众，很快就搞成了这种设备。这说明，只有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吃现成饭是不可靠的，吃了也是不能健康的。依赖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来发展工业，不仅不是什么“捷径”，而且是一条弯路、邪路。那种要走“捷径”的想法，实际是懒汉懦夫世界观的表现。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并不排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闭关自守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历来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适当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迷信外国的东西。这里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一个科学的态度。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这就是说，要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鞍钢有一个无缝钢管厂，它的全套设备都是从外国进口的。刘少奇一伙推行爬行主义、洋奴哲学，把洋设备看作是“老虎屁股”、“佛爷眼珠”，而把工人看作是洋设备的奴隶。结果，这个厂的生产很长一段时间徘徊不前。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对这套洋设备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系统改造，根本改变了这个大洋企业的面貌。一九七三年，这个厂的生产水平已超过原设计能力的一倍以上，钢管品种比原设计增加了五千多种。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是为了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只学不创，只学不超，还是爬行主义，仍然不能推动事物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只有充分相信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社会的财富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创造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建立在这个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刘少奇、林彪一伙推行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就是从他们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不相信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我们队伍中的少数同志，一时迷信“洋设备”、“洋技术”，正是因为没有牢牢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他们只看到外国的某些先进设备，却看不到中国的工人群众；不懂得落后的设备在先进的工人群众手中也会变成先进的东西，先进的设备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也不可能充分发挥效能。是不是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从根本上说，是个路线问题。实践证明，那里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那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落实得好；那里只相信、依靠少数人，那里就必定不能坚持这个方针。为了加快鞍钢生产的发展，中共鞍山市委决定在改造原有平炉的基础上，发动群众新建大型氧气顶吹转炉。全市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学生、职工家属积极参加了会战。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他们克服了设计、设备制造、施工等许多困难，迅速建成了两座我国目前最大的转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代表了群众的心愿，充分发挥了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群众的革命热情和辛勤劳动，又保证了这个方针的落实。

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需要高速度地继续前进。“**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贯彻十大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靠什么调动积极性？

上海港务局第二装卸区 孟增林

前些时候，我们装卸区工人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靠什么调动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干活是为了什么？我们老工人对这一点体会最深刻。解放前，我们装卸工人被那些帝国主义分子、资本家看成“臭苦力”，在码头上成天当牛作马，累断筋骨，拚死拚活挣了几个钱，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更不用说养家活口了。解放后，我们工人翻身当家做主人，政治有地位，生活有保障，比起旧社会来，一个在地狱，一个在天堂。今天这种扬眉吐气的日子，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装卸工人打破了过去只在码头上工作的常规，经常冒着风浪出海，突击抢运货物，想到的是祖国的荣誉，为的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和支援世界革命，那里是为的几个钱呢？

依靠物质奖励能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吗？这要看调动的是什么积极性。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一种是个人的积极性。要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最根本的是靠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专门去搞物质奖励有时也能刺激一下积极性，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做事就是为了拿钱，——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这种个人主义的积极性越高，离社会主义也就越远。它会使我们变得目光短浅，斤斤计较，只看见自己鼻子前面的一点利益，忘掉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远大理想。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主张搞“物质刺激”，胡说什么工人、农民想的是“搞钱”，这是对我们劳动人民的污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革命先烈，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在枪林弹雨中，敢于冲上去，把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难道他们是因为得到物质刺激后才这样做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庆、大寨两面红旗，也不搞什么物质刺激，而是依靠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刘少奇、林彪之流鼓吹“物质刺激”，目的是为了腐蚀我们工人阶级，把我们引向资本主义邪路，在中



国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工人决不能上这个当。不然的话，就一定要吃二遍苦，受二回罪。

有人说，生产超额了，多给点奖金，工作就要好做些。我看不见得。单纯依赖奖金，会使我们的干部脱离群众，放松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恢复管、卡、压的老一套。结果不是工作好做，而是带来更多的麻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我们装卸区推行了形形色色的奖励制度，名目繁多，最多的时候达到二十八种。什么可以评奖，什么不可以评奖，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就象紧箍咒一样，把我们工人的手脚捆得紧紧的。如果那个工人在装卸劳动中擦破块皮，对不起，不但他本人评不上奖，整个组的奖金都给吹了。这样一来，每评一次奖，就留下了一大堆问题，造成了工人之间的不团结。大家都说是“评奖，评奖，越评越僵”。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先进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我们办企业靠马克思主义，靠思想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靠物质刺激。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办企业的路线，一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条是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思想政治工作到底灵不灵？我们装卸三队的例子是最生动的说明。三队党支部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职工，批判林彪一类骗子的反革命罪行，进一步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划清两条路线的界限，认识到工人是国家的主人，也是企业的主人，就普遍提高了参加企业管理的责任感。三队的党支部坚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正确处理人与人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队一百零六名职工结成一个革命整体，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全队出勤率一九七三年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十月份有三个组出勤率达到百分之百。这个队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非常高，班组和个人之间经常开展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去年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三队并没有给每个人去多塞几个钱，而是坚持路线教育，坚持思想政治工作，怎么能说调动群众积极性就非靠钱不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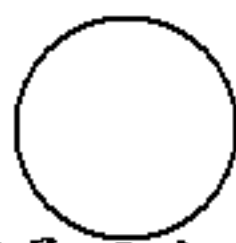
毛主席教导我们：“**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同时，毛主席也教导我们要认真注意执行各项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我们必须坚持这样去做。在落实各项经济政策的同时，不断地提高广大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能否搞好这项工作，关键在于我们领导相信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不相信群众的觉悟。关于究竟要不要有一点物质奖励的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但决计不能忘记的是，办社会主义企业无论如何不能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杂 文 ·

孔 夫 子 在 莫 斯 科

康 立



孔夫子曾经被孟子称颂是“圣之时者”，但这位圣人在生前其实是不大行时的。他曾经满腹牢骚地说过：“如果我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了，我就乘着木筏到海外去！”

事隔两千多年，正当中国人民对反动的孔学开展批判的时候，这位在中国已经不行时的圣人，竟应了他当年的话。现在，孔夫子在莫斯科，岂但是行时，简直可以说是红得发紫。什么“创立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的思想家啊，“令人尊敬的”“国务活动家”啊，“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啊，见诸书刊杂志上的这种肉麻吹捧，俯拾皆是。

孔夫子会在莫斯科如此走运，这在他自己自然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但我们对此却并不难理解。“圣之时者”，摩登圣人也。孔夫子在生前固然到处碰壁，但在死后却是着实交了一阵子好运的。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反动统治者没有不尊奉孔夫子的。到了近代，孔圣人又添了一批新的吹捧者，这就是那些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强盗们。

外国侵略者尊崇中国古代的圣人，在当时是很为那些遗老遗少们所引以为荣的。但其实这与其说是尊崇，不如说是利用。摩登圣人之所以摩登，是因为他自从死了以后，一直当着敲门砖的差使。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想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他们的幸福之门，而外国侵略者想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侵略中国之门。两者所敲的门虽有不同，但不仅用的是同一块砖头，为的也是同一个目的——把中国人民置



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奴役之下。归根到底，主子敲开侵略中国之门的希望是寄托在奴才的敲开幸福之门上的。对于这种里应外合的双簧戏，中国人民是实在见得够多的了。

辛亥革命刚推翻了清王朝，封建余孽陈焕章就组织了一个“孔教会”，说要以“大昌孔子”来“效忠素王”。英帝国主义分子、复辟封建王朝的鼓吹者庄士敦立即报名参加，声嘶力竭地叫喊尊孔是尊“千古相传之大义”。辛亥革命革的是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命，庄士敦却偏要翻这个案，认为这是违犯了“千古相传之大义”。目的何在？不问可知。

过了不久，正当野心家、阴谋家袁世凯通令全国“尊崇孔圣”，并带头演出了祭天、祭孔丑剧的时候，沙俄文化特务盖沙令从莫斯科远道来到中国，到处发表尊孔演说，胡说什么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国实现“古道之复兴”，不致“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竭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准备。

独夫民贼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把孔子生日定为“国定纪念日”，宣布共产主义是“不仁的邪说异端”，“‘剿匪’（应读作反革命围剿）就是行仁”。当时有个美帝学者也在大肆鼓吹“儒教是支配一切的”，其教义是“对人友善”。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在支持蒋介石这个妄图“支配一切”的反动独裁者实行卖国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大汉奸汪精卫也热衷于“纪念孔子”，胡说只有卖国才能体现“儒教的真精神”。此论一出，日帝学者盐谷温立即表态支持，声称：“今天如果要把中国从危亡中救出来，舍复兴孔教之外无他法。所称东亚新秩序此语，如果换句话，就是要‘恢复孔子之教’是也。”真是一语破的。原来“恢复孔子之教”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

尊死圣人，从来是为了尊活“圣人”。在中国，尊孔就是尊反动派，尊卖国贼，尊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这类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也就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口口声声“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的原因。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如果外国人来天中国”，“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

孔子这个人，无论在生前或死后，他的命运都是和没落阶级的复辟活动扭结在一起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样如此。叛徒刘少奇风尘仆仆地跑到曲阜



“朝圣”，口口声声“孔老夫子伟大”。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读书，不看报，却也要充斯文，宣扬孔学“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搞倒退，复辟资本主义。今天社会帝国主义的尊孔，也和过去帝国主义的尊孔一模一样，尊的是那些反动派、卖国贼，即刘少奇、林彪之流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正如苏联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位部主任所供认的：尊孔的“现代题材和历史题材配合得很适当”。说得更确切一点，应当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古代的和现代的孔夫子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使苏修把中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的指望落了空，这当然难怪它要如丧考妣、悲痛欲绝的了。于是，又是追悼，又是招魂，在莫斯科惊惶交加地演出了这样一出尊孔的闹剧。

支持反动，就必然反对进步。要否定今天中国人民对孔子的批判，就一定要否定历史上进步阶级对孔子的批判。正是由于这一点，法家和秦始皇就成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及其外国主子的主要攻击对象。在莫斯科演出的这出尊孔闹剧中，苏修学者气急败坏地声称：法家的主要罪恶是“加强法制”，而孔子和儒家则是讲“仁”的。一联系“现代题材”，“不仁”就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罪状，而讲“仁”则成了苏修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的功德。

法家是讲“法治”的。“法治”者，专政也。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不实行专政的阶级？从来没有过。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在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对反动的儒家进行了批判，明确宣布要实行地主阶级专政，打击了形形色色的复辟分子，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其实，儒家又何尝不要专政，不过是不要地主阶级专政而要奴隶主阶级专政罢了。孔夫子宣称：“仁”者，爱人也。但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一切人，爱的只是反动的奴隶主。他一上台，就杀了少正卯，堕三都，什么杀人、毁城的事都干上了，这算是个什么“仁”？根本是在骗人。孔子提出“仁”，反映了他不仅是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并且是一个残忍而又阴险的伪君子。

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征。“历史题



材”是这样，“现代题材”也是这样。就在苏修大骂法家“加强法制”，并用以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他们却在国内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即所谓苏联的法制“落后于生活”。苏修的内务部长在一九七二年的报刊上大声训斥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的“工作规模和效率还不完全符合生活的要求”，叫嚷“不允许任何偏离法律要求的现象”。它强调用法律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强劳动纪律，这就明明白白地把苏联的广大劳动人民当成了专政的对象，表明了勃列日涅夫之流的统治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孔子也好，苏修也好，都是一些十分虚伪的家伙。他们口头上都讲“仁”，目的都是为了反对革命阶级的专政，以便他们自己实行反动阶级对革命阶级的专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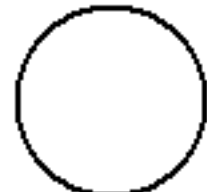
莫斯科的尊孔丑剧闹了半天，响应者寥寥无几，很有一点演不下去的样子。聊可告慰者，前一阵子，盘踞在台湾省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了一次“祭孔典礼”，在“钟鼓饔玉，礼乐脩舞”声中，咒骂着中国人民的批孔是“用马、列、斯的所谓‘不断革命’与‘斗争到底’教条，企图消灭孔子所主张的仁义道德中心思想”。这几句话真是说得妙极了！它从反面说出了马列主义和孔学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这样一个真理。但在苏修的《历史问题》杂志上，竟有位历史学家觑着脸说：首先“宣布人民的利益是治理的最终和最高目的”的，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孔子和孟子。在一个自称“马列主义者”的口里，尊孔的调子唱得这么高，真是绝妙地揭穿了苏修口头上讲的“马列主义”，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共产主义。从这里，也可看出这批修正主义者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

莫斯科的尊孔闹剧至今还在继续闹着。它能闹出个什么名堂来呢？鲁迅早就说过：反动派“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用这块砖头敲幸福之门，老沙皇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用这块砖头敲侵略中国之门，但结果都是门没有敲开，反而敲破了自己的头。今天，社会帝国主义又沿着这条老路用孔夫子这块砖头来敲中国的大门，作为这出闹剧的目击者，我们不妨提一点意见：你们的老祖宗老沙皇横敲竖敲都碰了壁，难道你们这种拙劣的表演还会有更好的下场？



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一期到第十二期总目录

(题目后面括弧里前一数字是期数, 后一数字是总页码)



列 宁、毛主席语录 (共六十八条)

元旦献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四年元旦社论 (1 · 7)

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10 · 875)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5 · 431)

短评: 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 (2 · 107)

短评: 认真学 深入批…………… (3 · 197)

短评: 注意总结经验…………… (4 · 291)

短评: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6 · 483)

短评: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 (9 · 783)

转载: 批“克己复礼”
——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人民日报》社论 (3 · 200)

转载: 党是领导一切的……………《人民日报》社论 (7 · 581)

批 林 批 孔 反 修 防 修

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田 凯 (1 · 39)

孔子是怎样利用编纂历史维护奴隶制度的? ……牛致功 (1 · 47)

林彪与孔孟之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2 · 110)

铁证如山——从孔府的罪恶看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洪 群 (2 · 118)

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罗思鼎 (2 · 126)

读柳宗元《封建论》……………周一良 (2 · 134)

“克己复礼”就是要开倒车……………天津轮胎厂工人评论组 (2 · 142)

中庸之道是政治骗子的哲学……………上海东风线厂工人 沈逸珍 丁佩蓉 (2 · 145)



揭穿“人道主义”的骗局——评苏修叛徒集团尊孔反法的丑剧

-安徽师范大学学员 刘洋林 朱英武 黄志宏 任学玲 刘奇葆 (2 · 147)
- 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河北景县董故庄大队党支部 (2 · 152)
- 孔子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康 立 (3 · 202)
- 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辽宁大学 李 时 (3 · 209)
- 揭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实质.....上海吴泾热电厂 郭企元 (3 · 221)
上海重型机器厂 黄土耀
- 从“天马”的下场看天命论的破产.....内蒙古阿巴嘎旗 乌云格日勒 (3 · 224)
- 污蔑劳动人民就是反对革命.....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六号门工人评论组 (3 · 227)
- 我们革命妇女最恨孔孟之道.....大寨大队铁姑娘队 (3 · 231)
- 孔丘其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4 · 295)
- 评《吕氏春秋》.....罗思鼎 (4 · 301)
- 攻击干部下放劳动就是要复辟.....北京东城区“五·七”干校大批判组 (4 · 325)
- 走上山下乡的革命路.....广西恭城县挖沟大队小黄埠生产队插队知识青年小组 (4 · 329)
- 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梁 效 (5 · 398)
- 林彪反革命策略的破产——批判一份黑笔记.....余 凡 (5 · 406)
- 深批“克己复礼”.....广东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番茅大队党支部 (5 · 420)
- 孔丘的仁义道德与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燕 枫 (6 · 486)
- 人民英雄不容抹煞——批判尊孔派对柳下跖的歪曲和诬蔑.....甘 清 (6 · 492)
- 论商鞅.....梁 效 (6 · 500)
- 从“天马”看林彪野心家的世界观.....靳 南 (6 · 520)
- 尊孔是为了复辟和倒退.....河北献县南河头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本林 (6 · 523)
- 孟轲——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田 力 (7 · 613)
- 儒法斗争是“狗咬狗”吗?.....翟 平 (8 · 691)
- 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罗思鼎 (8 · 694)
- 儒法斗争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李 群 (8 · 705)
- 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陈 今 (8 · 711)
- 论王充的反儒斗争.....钟 达 (8 · 718)
- 韬晦之计和林彪的复辟阴谋.....师 平 (8 · 724)
-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评《韩非子》.....梁凌益 (9 · 800)
- 李自成起义军对二程的批判.....钟 宙 (9 · 810)
- 劳动人民就该做主人.....山东邹县野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郑成礼 (9 · 824)
- 论“黔首”.....石 仑 (10 · 933)
- 评白虎观会议与《白虎通》.....洪善思 (10 · 941)



| | |
|--------------------------|-----------------------------|
| 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 | 罗思鼎 (11·995) |
| 《三字经》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 | |
| ——剖析《三字经》的两个增补版本..... | 合肥市杏花村公社 方玉荣 李敬 (11·1010) |
| 批“半部《论语》治天下”..... | 卞石中 (11·1013) |
| 儒家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 | 吴杨 (12·1082) |
|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 魏理 (12·1088) |
| 论法家与“清官”的根本区别..... | 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工人理论小组 (12·1095) |
| 正义战争必然胜利 | |
| ——批判《盐铁论》中儒家的军事投降主义..... |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八九舰理论小组 (12·1100) |
| 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 |
| ——学习《新民主主义论》..... | 洪广思 (1·16) |
| 打好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 |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战士 赵忠范 (2·154) |
| 批林批孔是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 | 燕枫 (3·216) |
| 放手发动群众 掌握政策界限..... | 中国共产党上海第五钢铁厂委员会 (3·234) |
| 联系路线斗争实际批林批孔..... | 河北安平县南王庄大队党支部 (3·239) |
| 认真看书学习 深入批林批孔..... | 北京友谊商店百货部青年业余学习小组 (4·315) |
| 发扬知难而进的精神..... | 湖北应城县炮竹大队评论组 (4·365) |
| 五四时期批孔斗争的历史经验 | |
| ——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 | 史众 (5·391) |
| 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头..... | 严章 (5·413) |
| 批林批孔联系实际的一个做法..... | 河北饶阳县邹村大队党总支 (5·416) |
| 团结战斗 批林批孔..... | 天津动力机厂工人 孟庆瑞 (5·424) |
| 认真学习 知难而进..... | 上海工程机械厂工人 虞和康 (5·428) |
| 注意解决路线问题..... | 中国共产党武鸣县委员会 (6·508) |
| 培养积极分子 深入批林批孔..... | 青海共和县蒙古大队党支部 (6·516) |
| 批孔与路线斗争 | |
| ——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孔的论述..... | 靳志柏 (7·601) |
| 批林批孔促进了革命团结..... | 济南铁路分局济南电务段党总支 (7·621) |
| 我们是怎样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的?..... | 新疆乌鲁木齐县反修大队党支部 (7·626) |
| 批林批孔要抓住路线问题..... | 北京铁路分局党委会 (7·631) |
| 正确处理领导机关和基层的运动的关系..... | 朱江 (7·636) |
| 认真看书学习 掌握理论武器..... | 池恒 (8·683) |



| | |
|--|------------------------|
|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研究儒法斗争····· | 方 铮 (9 · 794) |
| 批林批孔中坚持看书学习····· | 天津第二毛纺织厂党委会 (9 · 816) |
| 我们是怎样开展批林批孔的····· | 北京市第一一二中学党支部 (9 · 820) |
| 批林批孔与知识分子的进步····· | 杨荣国 (10 · 916) |
| 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 | 梁 效 (10 · 926) |
| 继续抓好学习和批判····· | 吕 真 (12 · 1070) |
| 杂文：孔夫子在莫斯科····· | 康 立 (1 · 93) |
| 杂文：评万事“无有大于此者”——蒋介石的“元旦文告”说明了什么？····· | 康 立 (2 · 157) |
| 杂文：呓语····· | 阳 戈 (11 · 1056) |
| 国际述评：在所谓“能源危机”的背后····· | 常 谦 (2 · 185) |
| 国际述评：贪得无厌的国际剥削者 ——揭穿苏修所谓“天然盟友”的假面具····· | 南 景 (9 · 860) |

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 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 | |
|-------------------------------------|-------------------------------|
| 把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永远传下去····· | “南京路上好八连”党支部 (1 · 35) |
| 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洪 城 (2 · 174) |
| 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 | 郑 磊 (4 · 309) |
| 深入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 | 沈 思 (8 · 727) |
|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些体会····· |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八连党支部 (8 · 735) |
| 批林批孔 促进战备····· |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六连党支部 (8 · 739) |
| 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 |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四连党支部 (8 · 743) |
| 发扬官兵一致的革命传统····· | 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某部红一连党支部 (8 · 748) |
|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批判林彪反对党领导军队的罪行····· | 田 军 (9 · 827) |
| 儒家的“以礼治军”与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三三二仓库理论小组 (9 · 833) |
| 揭穿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嘴脸····· |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兵某部六连党支部 (9 · 837) |
| 用党的正确路线教育连队·····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某部四连党支部 (9 · 841) |
|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某部三连党支部 (10 · 900) |
| 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的一点体会····· | 武振轩 (11 · 988) |
|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 燕 枫 (11 · 1004) |



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昆 骏 (12·1077)

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 加强党的建设

| | |
|---------------------------------|----------------------------|
| 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 | 池 恒 (1·11) |
| 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 青 岩 (1·23) |
| 共产党员要加强纪律性..... | 洪 原 (1·30) |
| 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 | 田志松 (2·160) |
| 反修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 |
| ——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 辛 风 (3·242) |
| 要团结大多数 | |
| ——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点体会..... | 谢 祚 (4·354) |
| 学会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 | 洪 原 (4·359) |
| 在斗争中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伍..... | 山西浑源县刁窝大队党支部 (6·512) |
| 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大团结..... | 庄 宁 (6·527) |
|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 钟 文 (7·583) |
| 革命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 洪 思 (7·587) |
| 抓紧理论队伍的建设..... | 河南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党委 (7·592) |
| 注意发展女党员..... | 广西梧州市第二轻化工业局党委 (7·597) |
| 干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 | 中国共产党临西县委员会 (7·669) |
| 做革命团结的促进派..... | 齐 新 (8·686) |
| 坚持革命团结 深入批林批孔..... | 齐 力 (9·786) |
| 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 | 洪 宇 (10·878) |
| 亿万人民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 | 俞 彤 (10·885) |
| 工人理论队伍的一个创造——大连红旗造船厂的调查报告..... | (10·948) |
| 团结是胜利的基本保证..... | 甘 戈 (10·953) |
| 进一步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 | 夏 平 (10·957) |
| 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 吕 真 (10·962) |
| 掌握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 | 池 恒 (11·975) |
|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 薛 仑 (11·979) |
| 正确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 | 黎 新 (11·984) |
| 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 池 恒 (12·1065) |
| 加强革命团结 争取更大胜利..... | 郑 实 (12·1074) |



- 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大队党支部 (12·1119)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好得很……中国共产党辉县委员会 (12·1124)

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文 化

- 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初 澜 (1·61)
 无产阶级必须牢固占领文化阵地……季如春 (1·67)
 让工农兵英雄形象牢固地占领故事片阵地……江 天 (3·266)
 英雄光照射银幕——评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平原作战》《杜鹃山》……江 天 (6·548)
 小戏创作的可喜收获——评越剧影片《半篮花生》……方 进 (6·554)
 来自群众斗争生活的艺术——谈大兴县业余文艺宣传队的舞蹈创作……辛文彤 (6·558)
 京剧革命十年……初 澜 (7·645)
 军民情意深似海——评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秋 实 (10·921)
 演冬子，学冬子，做党的好孩子……祝新运 (11·1035)
 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光
 ——影片《闪闪的红星》的一些创作体会……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创作组、摄制组 (12·1105)

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

- 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人民日报》评论员 (2·178)
 到底是谁家的“工具”？——评安东尼奥尼的“中辩”……华 言 (3·249)
 评晋剧《三上桃峰》……初 澜 (3·254)
 “大有大的难处”——从《红楼梦》看反动没落阶级的虚弱本质……方岩梁 (4·334)
 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初 澜 (4·343)

- 重视革命的历史文物……卫 今 (4·350)
 从银雀山竹简看秦始皇焚书……卫 今 (7·640)

教 育

- 巩固和发展大学教育革命的成果……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1·55)
 批林批孔运动推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5·451)



在本学期化学学习中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体会
大连海运学院无线电系导航专业 731 班学员 赵 兵 (5 • 456)

把农业大学办到农村去.....西北农学院革命委员会 (5 • 459)

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教学改革——湖北监利县棋盘中学的调查报告..... (5 • 464)

大力普及牧区小学教育——青海玛多县的调查报告..... (5 • 469)

我国教育阵地的深刻变革.....朱 研 (10 • 910)

卫 生

进一步办好合作医疗.....韦 革 (7 • 652)

在斗争中加强赤脚医生队伍.....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党委会 (7 • 656)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工 业

伟大的创造力蕴藏在群众之中——安徽淮南大通煤矿的调查报告..... (1 • 71)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魏秉奎 (1 • 87)

靠什么调动积极性?.....上海港务局第二装卸区 孟增林 (1 • 91)

充分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岳 衡 (2 • 165)

从农业出发办好地方工业.....庄 宁 (3 • 260)

批林批孔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天津冷轧带钢厂党总支 (4 • 367)

依靠群众发展电力工业.....江 雷 (4 • 371)

一万三千个合同是怎样完成的?.....上海铜厂革命委员会 (4 • 376)

抓革命 促生产——沈阳第一机床厂的调查报告..... (5 • 443)

依靠群众搞好铁路运输.....山海关铁路机务段党委会 (5 • 447)

批林批孔推动了技术革新——天津自行车厂的调查报告..... (6 • 539)

自力更生的力量在群众之中.....上海市毛麻纺织工业公司党委会 (6 • 544)

加强协作 快装快卸.....上海港务局党委会 (7 • 659)

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找油找气.....中国共产党大港油田委员会 (8 • 752)

路线搞对头 生产争上游——柳州铁路分局桂林北站的调查报告..... (8 • 769)

重视环境保护工作.....郭 寰 (9 • 789)

为革命多出煤.....开滦煤矿唐家庄矿党委会 (9 • 855)

走自力更生发展石油工业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大庆油田委员会 (10 • 890)

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哩.....“风庆”轮党支部 (11 • 1019)

关键在于端正领导的思想政治路线——四川汽车制造厂的调查报告..... (11 • 1026)



| | | |
|------------------------------|---------------|-------------|
| 发展工业一定要开展技术革新····· | 宫效闻 | (11 · 1037) |
| 技术革新必须依靠工人群众····· | 北京第一机床厂党委会 | (11 · 1043) |
| 新厂也需要搞技术革新····· | 天津市第一石油化工厂党委会 | (11 · 1047) |
| 自力更生发展新技术——上海中国电工厂的调查报告····· | | (11 · 1051) |
| 小厂也能造出四百吨大平板车····· | 河北沧州市交通局四〇〇小组 | (12 · 1114) |

农 业

| | | |
|--|--------------|-------------|
| 依靠群众，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 | 赵彦章 | (1 · 77) |
| 把山区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 李顺达 | (1 · 82) |
| 勤俭种田 越种越甜——湖北崇阳县后溪大队的调查报告····· | | (2 · 171) |
|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 广东英德县望河大队党支部 | (4 · 321) |
| 增产节约广积粮····· | 洪 桥 | (5 · 439) |
| 文化大革命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 | 河北大名县杏现大队党支部 | (6 · 535) |
| 发展农业靠群众····· | 齐 跃 | (7 · 664) |
| 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 1974—1980 年农业发展规划(修订草案)····· | | (8 · 760) |
| 学大寨 讲路线——湖北随县环城公社八一大队的调查报告····· | | (8 · 765) |
| 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 湖南岳阳县毛田公社党委会 | (9 · 845) |
| 执行正确路线 夺取小麦高产——河南新乡地区的调查报告····· | | (9 · 850) |
| 坚持革命 努力前进····· | 大寨大队党支部 | (10 · 896) |
| 毛主席的光辉照列表····· | 西藏隆子县列表公社党支部 | (10 · 905) |
| 争取社会主义农业的更大发展····· | 赵丰年 | (12 · 1129) |
| 总结抗旱经验 促进农业发展····· | 贺建农 | (12 · 1134) |
| 学大寨就要抓路线····· | 宁 江 | (12 · 1140) |

商 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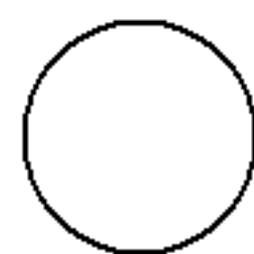
| | | |
|-------------------|-----|-------------|
| 做好农村社会主义商业工作····· | 柳 彤 | (6 · 531) |
| 两种经济制度的鲜明对照····· | 夏力之 | (11 · 1030) |

科 学 史 研 究

| | | |
|--------------------|-----|-------------|
| 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和改造····· | 李之棣 | (3 · 271) |
| 人类在变革物质中认识物质····· | 李 柯 | (6 · 563) |
| 对人体认识的两种世界观斗争····· | 金 卫 | (12 · 1146) |



红旗



一九七四年 2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目 录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短评：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 (5)

林彪与孔孟之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8)

铁证如山

——从孔府的罪恶看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洪群 (16)

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

——读《王荆公年谱考略》.....罗思鼎 (24)

读柳宗元《封建论》.....周一良 (32)

“克己复礼”就是要开倒车.....天津轮胎厂工人评论组 (40)

中庸之道是政治骗子的哲学

.....上海东风线厂工人 沈逸珍 丁佩蓉 (43)

揭穿“人道主义”的骗局

——评苏修叛徒集团尊孔反法的丑剧

.....安徽师范大学学员 刘泽林 朱英武 黄志宏 任学玲 刘奇葆 (45)



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

..... 河北景县董故庄大队党支部 (50)

打好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

..... 中国人民解放军
沈阳部队某部战士 赵忠范 (52)

杂文：评万事“无有大于此者”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说明了什么?..... 康立 (55)

抓大事 抓路线 抓政治思想工作

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

..... 田志松 (58)

充分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岳衡 (63)

勤俭种田 越种越甜

——湖北崇阳县后溪大队的调查报告..... (69)

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洪城 (72)

锄毒草 化肥料

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

——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 《人民日报》评论员 (76)

国际述评：在所谓“能源危机”的背后

..... 常谦 (83)

☆ 二月一日出版 ☆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毛主席语录

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语录

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

(短评)

一个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掀起。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这是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的关键，是上层建筑领域里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努力作战。

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抓大事，要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就是当前全党的大事，全军的大事，全国人民的大事。不批林批孔，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是放弃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进攻，这样下去，势必滑到修正主义的斜路上去。我们必须引起注意和警惕。

为什么要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呢？因为林彪同历史上的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一向尊孔反法，多次攻击秦始皇。他对腐朽不堪的孔孟之道五体投地，把它视为信条，奉为经典，贴在和藏在那些阴暗的角落里。他的反革命言行中，浸透着孔孟的反动思想。林彪尊孔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出于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为推行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他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对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因此，要深入批林就必须批孔，批孔正是为了深入批林。只有通过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正因为这样，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就不是个“学术问题”，也不是象有的人所认为的仅仅是“文化教育界的事，与己无关”；恰恰相反，它是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紧密联系的政治问题，是工、农、商、学、兵、政、党都必须关心的反修防修的大事。这怎么能说“与己无关”呢？“不破不立”，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必须批林批孔。我们不信“中庸之道”，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者，把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打好打胜批林批孔这一仗。

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要着重揭露和批判林彪利用孔孟之道妄图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这个阶级的死硬派，他反对变革和进步，坚持复古和倒退。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是妄图复辟日益崩溃的奴隶制，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克己复礼”，是他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很懂得“克己复礼”的政治含意，对它心领神会。他认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林彪万事中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效法孔子的“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孔子不是说过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吗？林彪正是继承了孔子的这个衣钵，妄图把被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扶植起来，让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使我们的国家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林彪宣扬“德”、“仁义”、“忠恕”，贩卖“中庸之道”，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教子尊孔读经，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等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这就是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还要着重揭露和批判林彪的反动世界观及其根源。孔子为了复辟奴隶制，是以反动的“天命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为思想基础的。林彪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就是来自孔子的“天命论”。他胡说自己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把自己比作“天马”，可以在空中“独往独来”。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是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是他妄图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林家世袭王朝的精神支柱。这也正表现出林彪这个反动派的虚弱性。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的“天才论”，结合批判孔子的“天命论”，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认识到维护“吃人”制度的剥削阶级世界观的反动性，认识到无产阶级世界观同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的长期性。



批林批孔，触及到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有一些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如轻视劳动，蔑视妇女，瞧不起工农群众，看不惯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崇洋复古，以及“开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这些除了有它们的社会阶级根源外，都可以从孔孟之道那里找到思想根源。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要通过深入批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清除这些流毒。

批林批孔必须掌握思想武器，加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许多著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毛主席对于孔孟之道和尊孔思想多次深刻的批判；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都是我们批林批孔的强大思想武器。联系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才能把批林批孔的斗争搞深搞透，真正分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论和唯心论、革命和反革命，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批林批孔中的许多有质量的文章、资料和发言，都是作者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而产生出来的，要坚持这样做下去。

在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从来是站在反孔斗争的前列，是批孔的主力军。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每一次农民革命战争，总是冲击了被反动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子。他们对孔子的批判一次比一次更勇敢、更深刻。但是，由于他们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因而不可能用科学的革命理论彻底战胜孔子的反动思想。这个任务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才能完成。现在放在我们工农兵肩上批林批孔的担子是很重的。我们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继续发扬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孔孟之道批个落花流水，批得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积极投入战斗。“工农兵文化低，不懂古文，批不出水平”，这是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对工农兵的污蔑。工农兵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和丰富的斗争知识，在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方面，已经涌现出一批敢于和善于斗争的生气勃勃的先进分子，他们必将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做出更巨大的贡献！

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带领群众切实抓好批林批孔这件大事，领导干部要做出榜样。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批林批孔中促进和加强广大群众的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我们坚信，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有几亿工农兵做坚强的主力军，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林彪与孔孟之道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在党的十大精神的鼓舞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激烈搏斗中，“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当前蓬勃兴起的批孔斗争，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老根的一场战斗。在林彪居住的黑窝里，到处充斥着儒家的思想垃圾，散发着孔学的霉烂臭气。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反动的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林彪一伙无论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上篡改党的理论基础，还是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结成死党、拼凑反革命队伍，在策略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剥开林彪的画皮，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丑恶嘴脸。

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的政治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克己复礼”。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林彪和他的死党连续写下了四条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万事中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春秋末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奴隶们纷纷起来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大力倡导革新，向奴隶主展开夺权斗争，使奴隶制旧秩序——“礼治”处于全面崩溃之中。孔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把这种“礼崩乐坏”的大好形势诬蔑为“天下无道”，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



动政治纲领。他的“复礼”，就是要镇压奴隶起义，反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的革新路线，把社会拉向倒退；要按照周礼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奴隶主阶级专政；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已被推翻的奴隶主政权和丧失了特权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向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反夺权。总之，孔子的“复礼”，就是复辟。林彪也是搞复辟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反革命本性和政治需要，所以林彪紧紧抓住“克己复礼”不放，认为“唯此为大”。他搞反革命政变和《“571工程”纪要》，正是他“复礼”内容的最好说明。

林彪的“复礼”，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一伙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诬蔑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制造矛盾”；他们竭力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大肆诽谤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诬蔑为“危机四伏”、“停滞不前”，把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描绘成漆黑一团。一句话，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切，都不符合他们的“礼”。他们和孔子一样，都是颂古非今、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

林彪的“复礼”，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在写下“克己复礼”条幅的同时，还学着孟子的腔调，告诫他的死党要“当务之为急”。他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呢？请看：

一九六九年冬，林彪亲笔题书“王者莫高周文……”的条幅，挂在床头，自称“人主”，自比“文王”，急于要实现当皇帝的美梦。

一九七〇年，林彪再三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抛出他的反党政治纲领，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急于要当“国家的头”，阴谋篡党夺权。接着，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未遂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林彪一伙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急于“夺取全国政权”，并于九月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林彪反党集团“复礼”的首要目标，是他们反革命战略的“当务之急”。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要在我国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在国内，他们照搬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进行复辟变天的反革命活



动，猖狂叫嚣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到那时，大大小小的黄世仁、南霸天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叛徒、特务、卖国贼王明之流就会大摇大摆地重新上台，成为林家王朝的“座上宾”，千百万革命者就会惨死在他们的反革命屠刀之下，亿万工农群众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国际上，他们按照自己的座右铭——孟子的“小国师大国”行事，进行投降卖国的反革命活动，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林彪这个“超级间谍”的阴谋得逞，我国锦绣河山就会遭到苏修坦克的蹂躏，社会帝国主义强盗就会在我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民就会成为亡国奴。

总之，林彪捡起孔子“克己复礼”的破旗再三挥舞，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但这一切，不过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林彪就是这样的反动派，他本来想打着苏修主子的“核保护伞”，登上儿皇帝的宝座，结果却葬身沙漠，扛着“克己复礼”的破旗，走完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穷途末路，到孔老二那里报到去了。

用孔孟反动哲学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有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它服务的反革命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孔孟的反动哲学。他用孔子的天命论、天才论反对唯物论，用中庸之道反对唯物辩证法，用儒家的“德、仁义、忠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发动了全面进攻。

孔子鼓吹“天命”，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叫作“天”老爷，他生育万物和人，主宰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他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周文王等奴隶主所以有权统治人民，就是因为受命于天，而周公和孔子本人所以有“德”成为“圣人”来“教化”人民，也是因为受命于天。这完全是一种为了维护奴隶主专政而制造出



来的宗教神学的唯心理论。孔子“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就是从这种反动的天命论引伸出来的。林彪为了篡权复辟，把孔子的这一套唯心论当作宝贝。他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八个大字，悬挂在床头正中墙上，自比天马，把自己说成是上天赐给人间的象龙一样的神人、超人和天才。他还在给其死党的题词中，把他们自吹的“美德”说成是“受于天”，这同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岂不完全是一路货色！多年来林彪及其死党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用谣言和诡辩把天才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枉费心机。他亲手写的“受于天”三个字，证明了林彪的天才论是孔子天命论的翻版，他坚持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就是企图论证他是“受于天”的最高统治者。

林彪说什么“中庸之道”“合理”，这就暴露了他反对革命、反对辩证法的真面目。孔孟所谓的中庸，就是做什么都要合于“礼”，既不过度又无不及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叫作“庸”。一句话，按奴隶制老规矩办事，不能有丝毫偏离和改变，就是中庸之道。这完全是反动阶级维护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对于这种东西，林彪赞不绝口，说是“合理”。按照这种“理”，林彪恶毒咒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是什么“过分”、“全左”、“做绝了”、“斗绝了”、“乱了套”。好家伙，一大堆帽子扣上来。其实，这丝毫无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恰恰说明了林彪所坚持的，是一条维护旧制度旧秩序妄想开倒车的极右路线。林彪的所谓“过分”，就是用中庸之道反对革命。毛主席早就批驳了这种谬论，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林彪说“乱了套”，无非是乱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一套，不乱这一套，就不能消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怕乱你们这一套吗？这才刚开始，到全世界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还差得远呢。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唯物辩证法，“**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是扶植新事物战胜旧事物，还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这个斗争在理论上必然表现为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林彪用孔孟的中庸之道反对辩证法，正是他搞极右路线的一个思想根源。

林彪说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是“人的关系”的原则，并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还说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他完全抽掉人的阶级性来讲什么“仁爱之心”，抹煞阶级对立来讲什么“人的关系”，



这就是拿孔孟之道的反动的人性论，篡改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

儒家所宣扬的人性论，是一种虚伪的唯心主义理论，它总是宣扬一种先验的超阶级的人性。孔子宣扬什么“仁”就是“爱人”，孟子说“仁心”是人生来就有的，“人性善”。他们果真不分阶级地爱所有的人吗？没有那回事。郑国把起义奴隶“尽杀之”，孔子不是表扬他们干得好，赞为“善哉”吗？孟子不是专门论证对奴隶和劳动者进行剥削和统治是“天下之通义”吗？对新兴地主阶级，他们也是一点不爱的。孔子在鲁国代行宰相，一上台就杀了革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孔子的学生冉求为新兴地主阶级干事，孔子就马上开除他的学籍，断绝师徒关系，还要煽动学生攻他。这就说明孔孟讲的什么不分阶级的“人类之爱”，什么天生的“仁心”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剥削阶级中的奴隶主那一小撮，只是那个反动的奴隶制度。林彪讲什么“仁爱之心”，可是，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凶相毕露地叫嚷：要一口“吃掉”无产阶级，要谋害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要把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统统打下去，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被我们打倒的那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就是林彪的“人性”，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蒋帮头目在林彪死了两年后哀悼他说：“林彪……较有人性，这就是孔子的伦理学说潜在人心的佐证。”蒋帮的这种赞扬，对林彪的人性究竟是什么货色，是一种绝好的说明。

反动阶级拼命宣扬人性论，一方面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关心人民的“仁义之主”，掩盖自己的吃人真相。另一方面，则是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向先进阶级的革命暴力兴师问罪。孔子不是骂新兴地主阶级是“有勇而无义为乱”，骂造反的奴隶是“有勇而无义为盗”吗？孟子更是这样，他破口大骂革命暴力是“杀人盈野”，“杀人盈城”，是“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应当处以极刑。林彪完全承袭了孔孟的一套，以反动的人性论为理论根据，猖狂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大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仁”。“‘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无产阶级对于一切敢于反抗的反动阶级的反动分子，必须给以坚决无情的镇压。不这样做，我们就要亡国，地主资产阶级就要复辟。在林彪的假仁假义后面，难道不就是要用反革命暴力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对于反动派的反革命暴力，我们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革命的暴力来镇压反革命的暴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



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玩弄儒家权术，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林彪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搞修正主义，决定了他在组织上搞分裂、结党营私，在策略上要两面派、搞阴谋诡计。为了在党内隐藏下来，为了拼凑反革命队伍，伺机而动，实现其“复礼”的野心，林彪指使他的死党和一些人，挖空心思从四书五经、中外历史、以至小说谚语中搜寻材料，研究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权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所总结的一套反动统治术和两面派的伎俩，都成了他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重要思想武器。

孔子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制，提出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为处理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准则，林彪在反党集团内部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林彪的“君使臣以礼”，是一种虚伪的姿态。林彪明明是一个法西斯独裁者，他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他却偏要唱起“使臣以礼”的腔调，打出“求贤”的招牌。其实，他这里所说的“礼”，不过是封官许愿、请客送礼、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一句话，就是用名利地位收买拉拢一些人为其反革命复辟事业服务。当他的死党的狐狸尾巴被群众揪住时，他便利用职权，包庇保护，使其蒙混过关。他的所谓“求贤”，就是按照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拼凑大小反革命“舰队”。

林彪标榜“君使臣以礼”的真实意图，是要他的死党“臣事君以忠”。象历代反动统治者一样，林彪也把“忠君”思想作为维持其反革命队伍内部统治的精神支柱。他宣扬孔孟“敬上”、“无违”的“忠孝”之道，提倡绝对服从；他强迫其特务组织成员向林家父子宣誓效忠，要他们“永远忠于”林家父子；当林彪反党集团末日来临的时候，他还发出“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训令，妄想要其反革命“舰队”成员为“林家王朝”殉葬。这些事实说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就是孔孟之道的纲常名教。

林彪十分欣赏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把它抄录下来，挂在墙上，作为反革命的信条。林彪对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多次耐心的批评教育，怀恨在心，伺机反扑。为了阴谋篡党夺权，他反复告诫自己，要“忍耐”，切勿因“匹夫之勇”



而败坏了“复礼”的“大谋”，“耽误自己终身大事”。在“忍”的背后，林彪咬牙切齿，磨刀霍霍，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实际上是胡风“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

为了“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实现他的“大谋”，林彪把“韬晦之计”奉为至宝。一九七〇年三月，正当林彪反党集团紧锣密鼓策划篡党夺权的时候，林彪指使他的死党把“韬晦”二字记在黑笔记上，并亲笔抄录了《三国演义》上赞扬刘备用“韬晦之计”欺骗曹操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在这里，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虎穴”，自比为暂时栖身于“虎穴”中的“英雄”。这就不仅暴露了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同时也暴露了林彪用两面派手段乔装打扮，把反革命真相掩饰起来，等待时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毒手的狰狞面目。

为了伪装掩饰自己，“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又根据孔孟的所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就会大难临头等说教，暗地里制定了一系列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什么“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什么“面带三分笑”，这一切，无须多加一字，就活灵活现地暴露了林彪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道？

林彪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样，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不折不扣的尊孔派。人们会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什么要到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那里去寻找思想武器，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为什么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之流尊孔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首先，林彪之流的尊孔是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和阶级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它自己的阶级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在思想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在



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产物，买办性和封建性是这个阶级的根本特性。他们历来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文化的顽固的维护者和狂热的推销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谁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思想文化上也只能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寻找武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之流，搞修正主义，乞灵于孔孟之道，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阶级的特点。出身在地主兼资本家家庭而又长期抗拒世界观改造的林彪，更是如此。

其次，从历史根源来看，孔孟之道原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极大欺骗性的剥削阶级思想体系，它的实质是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是剥削压迫之道，反革命复辟之道。它后来被腐朽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所利用，也被妄想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成为一切搞复辟、搞反共的反动派的思想武器。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大力提倡、强制推行孔孟之道，使它渗透到旧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年深日久的传统观念。一切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总是祭起尊孔的破旗，千方百计地利用孔孟之道，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反对革命，主张倒退，他们尊孔也就毫不奇怪了。修正主义头子林彪，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但他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大讲孔孟之道，这完全是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一致，要搞复辟的反革命本性决定的，完全是出于利用反动的传统观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当前开展的批林批孔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不批孔，不批判尊孔反法思想，实质上就是不批林。深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思想，对于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铁 证 如 山

——从孔府的罪恶看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

洪 群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尊孔反法，把腐朽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为了用事实揭露孔孟之道的反动性，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我们对孔府的累累罪恶进行了调查。

曲阜是孔子的家乡。孔府是孔子后裔居住的地方，座落在曲阜县城。历代反动统治者，为了利用孔子维持其统治，对于居住在这里的孔子嫡系后代，从政治上、经济上予以特别“眷顾”。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封建帝王赐给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以世袭“衍圣公”的封号，所以孔府过去称为“衍圣公府”。它是一个庞大的贵族地主庄园，是一个拥有官员和种种司法特权的世袭“小朝廷”。这个“衍圣公府”，完全继承了他们老祖宗孔子的衣钵，口头上高唱“仁义道德”，实际上却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铁的史实，充分揭露了林彪所吹捧的孔老二所宣扬的一套“道理”，就是剥削之道、吃人之道；所谓“德”、“仁义”、“忠恕”，不过是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维护和巩固其剥削阶级统治地位的反动精神支柱。

所谓“仁政”、“德治”，就是对 劳动人民实行镇压和屠杀

孔老二的高足弟子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复礼”四个字，就是反动孔学的核心，就是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一伙找到这四个字，如获至宝，大书特书，互相赠答，置之枕边座右，把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孔子是爱讲“仁”、“德”、“爱人”的。比如，什么“为政以德”呀，什么“仁”



是“爱人”呀，等等，真是说得天花乱坠。林彪和历代反动派一样，都极力吹捧孔子的所谓“仁义道德”。他们为了利用孔老二这具僵尸为其罪恶行为辩护，便把孔子一抬再抬。孔子于汉平帝元始元年被封为“褒成宣尼公”，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被封为“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被封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被封为“至圣先师”，清世祖顺治二年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蒋介石也吹捧孔子为“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不管反动统治阶级和林彪一伙给孔子戴上多少桂冠，都遮盖不了他那副伪君子的嘴脸。他主张镇压奴隶起义，对于主张革新的人深恶痛绝。他在鲁国代行宰相之职才七天，就杀掉了当时的革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孔子的所谓仁政也好，德治也罢，都不过是骗人的东西。他的“仁”和“德”是施于奴隶主的，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从来都是缺德无仁，有的只是血腥的残害和屠杀。

林彪胡说“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他们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吹捧为“人类美德”、“极高的美德”。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在所谓“文章道德圣人家”的“衍圣公府”里，对劳动人民实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仁政、德治吧。

“衍圣公府”内设有公堂：大堂，二堂，三堂。据“孔府档案”的一些记载来看，凡孔氏族人和孔府佃户、庙户、仆役等犯了“法”，“衍圣公府”可以自行传讯或断结。红签一投就可以随便抓人，绿签一拔就可以任意打人。孔府内还备有恫吓劳动人民的金瓜、钺斧、牙棍、蛇枪、鬼头刀等仪仗和用来摧残劳动人民的皮鞭、黑红棍、锅拍枷、铁锁链等刑具。过去孔府还向人宣称，皇帝赐给“衍圣公”虎尾棍、雁翅镜和金头玉棍，用它打死人可以不偿命。

“衍圣公府”为了维护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统治，还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机构和管理系统。内部设有六大厅，即：知印厅、掌书厅、百户厅、管勾厅、典籍厅、司乐厅。其中管勾厅主管收租，下设“管勾衙门”。百户厅掌管林庙守卫，不设“百户衙门”。此外，还有圣庙执事官四十名（从九品到三品），属员几百名。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孔府还组织有“奉卫队”。

封建王朝还赐给“衍圣公”许多特权。他可以卖官鬻爵，封建王朝给他四十个官位，由其任意出卖。他可以控制曲阜知县，曲阜知县从唐开始常由“文宣公”（“衍圣公”的前封号）、“衍圣公”们兼任，明代改为孔氏世职，到清乾隆时虽然改为“不必拘用孔氏族人”，可“在外拣选调补”，但还须在“衍圣公”的严格控制之下。另外，他还可以对地方官吏发号施令。



“衍圣公府”倚仗封建王朝给予的种种特权，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迫害，它实际上是一个挂着“文章道德圣人家”招牌的凶残衙门。“衍圣公”们把孔庙、孔林、孔子出生地尼山和埋葬孔老二他爹的防山，说成是圣地、“圣脉所在”，任何人不准侵犯，如有违者，轻则罚，重则处死。一九一二年春天，曲阜林前村孔昭贞为饥寒所迫，不得已到孔林砍了一点树枝，就被孔府爪牙抓住打了个半死。送往县衙门后，县官奉了“衍圣公”的旨意，给孔昭贞戴上五、六十斤重的锅拍枷，牵着他在孔林四周和附近村庄游街示众。每天游一次，一直游了三个多月。孔昭贞的腰被压弯了，最后致成重残。曲阜鲁源村贫农孔继成于一八九四年的一天，在离尼山半里多远的自己地里挖出了一块石头，孔府便以破坏孔家风水的罪名，将他毒打关押了半年多，逼得他家里把仅有的五亩祖业地全卖了，又卖儿卖女，最后才把人赎出来。这说明孔子主张的“仁政”、“德治”，只不过是他们对劳动人民实施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块遮羞布。在它的背后掩盖着的，是反革命刽子手的凶相。

孔子的后代“衍圣公”们，遵照他老祖宗反对“犯上作乱”的旨意，勾结封建官府，对农民起义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他们打着守卫祖宗祠庙的招牌，强迫劳动人民为他们筑寨圩，挖城壕，建围墙。同时，他们还通过各地的爪牙，训练壮丁，招募乡勇，镇压起义农民。农民一旦揭竿而起，他们就向官府通风报信，资助粮饷，请求援兵，或组织反动武装配合官府屠杀起义的农民。

据“孔府档案”记载，一七二一年一月，泗水县盐民起义，“衍圣公府”立即请清政府派骑兵、步兵驻守曲阜，并调驻守台庄营的清兵去泗水镇压。他们对起义军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起义军首领孔振公不幸被捕，押至长清县横加迫害。孔振公威武不屈，绝食反抗，最后壮烈牺牲。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起义时，“衍圣公”也急忙给户部咨文，捐银三千两，接济清政府对太平军大肆屠杀。一八五三年，以宋继朋为首在邹县组织白莲教，一八六〇年，正式举起义旗。年底孔府密报山东巡抚。山东巡抚得信后，立即调兵前往镇压。一八六三年，杀人刽子手僧格林沁亲率大军围攻教军根据地，宋继朋牺牲。据邹县《掩埋白莲池尸骨记》碑文载：这次镇压后，只见“白骨累累，如山堆积”，尸首“除废肢断骨不计外，其可数者二万余具”。又据邹县《平定白莲池教匪掩埋枯骨碑记》载：几年后，乡人又在“高山峻岭，悬崖峭壁，以及井窖沟渠等处”，“搜寻遗骨一万余付”。仅明清两代，孔府就伙同反动政府先后镇压过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多次。

“衍圣公府”还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串通一气，血腥屠杀革命人民。据南泉村贫下中农控诉：抗战初期，日寇进入曲阜后，孔府大摆宴席，欢迎



日寇，并把他们安插到对孔府反抗最激烈的南泉村。日寇在村中无恶不作，把全村一百七十多户群众的家产全部毁掉。一九四六年曲阜第一次解放，彭希志当了民兵自卫团团长，领导群众斗争了孔府的总管家孔霁光。但当我解放军暂时撤离曲阜后，孔府就勾结还乡团头子韩小眼等，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彭希志被捕后，遭受了种种酷刑，但他始终没有向敌人低头，最后壮烈牺牲。被杀害的还有村妇救会长李玉桂、农会委员王景喜、财粮干事孔庆合等许多革命同志。

这些血泪斑斑的事实说明，孔子和他的后裔“衍圣公”们，以及林彪等一切反动派，嘴巴上整天挂着“仁义道德”，实际上却是用鞭子、刑棍、屠刀、枪炮去残害劳动人民。就在这仁政、德治的招牌下，淌尽了人民的血泪，堆起了人民的白骨，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他们的仁政、德治就是暴政、屠杀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也必须对一切反动阶级实行专政，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但是，林彪一伙却拚命从孔学这个破烂的思想武库中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仁”。毛主席对反动派的这类攻击和叫骂，早就作了批判：“**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充分说明了林彪是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刽子手，是革命人民凶恶的敌人。我们对他们就是不施仁政。

所谓“富民”、“利民”，就是杀民、害民

孔老二梦寐以求的是要复辟奴隶制度，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他嘴上却说什么，人口多了，再“富之”，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叛徒、卖国贼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要把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他攻击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富民穷”，嘴上也就假惺惺地唱着孔老二的“富民”、“利民”的滥调。

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孔子本人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却过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他一方面娓娓动听地说要“富民”、“利民”，另一方面却又要劳动人民“贫而无怨”，甘受剥削阶级的奴役和压迫。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所鼓吹的“富民”、“利民”完全是一套骗人的把戏。事实也正是如此。



只要 we 看一看继承祖训的“衍圣公”们在经济上是怎样对劳动人民实行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就可看出孔子主张的“富民”、“利民”到底富的是哪家的“民”，利的又是哪个阶级了。孔府的罪恶史，劳动人民的血泪仇，就是对孔子“富民”、“利民”的最好揭露，也是对林彪之流鼓吹孔孟之道的有力批判。

毛主席说：“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事实正是这样。“衍圣公府”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最长的地主庄园。“衍圣公府”最盛时期，所霸占的土地多达一百万亩，遍及鲁、冀、豫、苏、皖五省，仅在山东就有五屯、西厂、十八官庄。据曲阜红庙村的调查，解放前，全村二千二百五十亩土地中，孔府就占有一千四百四十五亩，再除去本村地主、富农占有六百七十亩，广大贫下中农却只有一百三十五亩，仅占全部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六。

孔府这些土地从哪里来的？是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其掠夺手法：一是历代封建王朝的赏赐，即假封建皇帝之手进行掠夺；二是趁农民破产之危，变相掠夺和兼并；三是以办学堂和祭祀孔老二为名，假手地方官吏霸占；四是孔府直接强行圈占。据“孔府档案”记载：清咸丰年间，孔府借清查祀田为名，说江苏沛县等地，有元代钦拨祀田九十顷，派平阳屯屯官唐守忠“率众数千人蜂拥沛境”，“遍插圣公府三字旗帜”，“灭没庄村百余处”，竟占地“三千二百余顷”，超过孔府原称地数的三十五倍多。只是因为强占过多，影响封建国家的剥削收入，最后封建政府没有认可这么多。

孔府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方式多种多样，手段极为毒辣。

第一种剥削方式，是地租。孔府的土地名目很多，有私田、祀田、汤沐地、脂粉地等。在这些土地中，有的收租粮，有的收银子。地租剥削量达百分之五、六十。但由于孔府敲诈勒索的手法极多，其实际剥削量大大超过上述数字。

佃户向孔府交租时，除正额地租外，还要受许多额外剥削。孔府的佃户们悲愤地说：“那时向孔府交租，过一道门坎就剥一层皮”。第一道门坎是验租。佃户的租粮一送到，小甲（催租头目）便要挖出一升粮食检验粮色，挖出的这升粮食不再倒回，硬被小甲占有。以后成为惯例，佃户每次交租，都要先提出一升给小甲，名曰“验升粮”（也称“合子粮”）。有时小甲以验粮色为名，还要先用风车扇，一扇就去一大堆，全归他们所有。第二道门坎是“量租”。孔府在量租时还有一种特殊的剥削方法，就是“斗尖”和“地皮”。量租时，倒满了还要倒，一直倒出尖来，流到地下。流到地下的粮食叫“地皮”，归仓头（农民称他们为“仓老鼠”）；尖出来的粮食叫“斗尖”，用一把木刀刮下来，单收起来归管事的。最后一道门坎是



入仓。入仓得向仓头送钱说好话，要不就得吃气。真是：“进了孔府步步难，步步血泪步步冤”。

第二种剥削方式，是强迫农民“纳贡”和服役。孔府为了满足其腐朽生活的需要，还指派一部分农民为其额外“纳贡”和无偿服役。有专门为孔府提供食用的粉条户、豆芽户、香椿户、桃户、杏户、年菜户、鸭蛋户、鱼户、菱米户等；有专供孔府生活享用的盘子户、碟子户、炊帚户、笤帚户、檀香户、年花户、花炮户、门神户、屠户、船户等；还有专供孔府婚丧祭祀使唤的喇叭户、点炮户、杠子户、盒子户、猪户、羊户、祭牛户、祭羊户、洒扫户等。在孔府的户人中，还有一种叫做嚎丧户。“衍圣公”家死了人，自家人不哭，强迫嚎丧户替他们哭。孔府可以硬行指派户人，一经指定为户人，便要听候使唤，没有人身自由，而且要世代承袭下去。

为孔府服役的农民，受尽了人身摧残。据曲阜县齐王官庄老贫农赵凤玉说：有一年旧历腊月二十七，他替孔府往北京皇帝那里送礼物，两人一辆二把手车，从曲阜到北京一千二百多里路，来回得走一个多月，可是盘缠只发给十八天的。路远载重，腿肿得象瓦罐一样。肩膀被磨烂了，车祥、衣服和皮肉粘在一起，揭都揭不下来，晚上睡觉只好让车祥带在肩头上，最后落了残疾。

第三种剥削方式，是额外加派和强迫送礼。孔府倚仗权势，额外向农民征收财物。据“孔府档案”记载，孔府每年都要向农民额外征收什么“年例”银、“年例”棉、“年例”布、“年鸡”和“年猪”。总之，孔府里的过年度节、婚丧嫁娶、生孩子、过寿日等，都是农民们的祸事，征财敛物，不一而足。

第四种剥削方式，是放高利贷。孔府的高利贷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开办钱庄。打着兑换银钱，便利乡民的幌子，从中牟利。农民兑换一吊，只给八百。二是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放粮。春借一斗，麦后还二斗。三是借种粮。佃户无种，孔府垫支，收下粮食后加倍偿还。四是放牛租。买牛一头，用银八两，租给佃户时却作银十一两，限三年还清。

第五种剥削方式，是霸占集市，收取税银。孔府除霸占了屯集二十二个外，还霸占了许许多多的义集。

此外，孔府还利用封建帝王赐给的权力卖官鬻爵，大发横财。而出钱买官的都是地主豪绅，他们买官用的钱，归根到底还是从劳动人民身上搜刮来的。

以上仅是孔府的几种主要的剥削方式。而当时的劳动人民，又是过着怎样的悲惨生活呢？据“孔府档案”记载，顺治十七年，独山屯佃户马朝会等控诉孔府说：“去岁催征，屯户无奈，有破家罄产者，有货男卖女者，情极难堪。”又据红庙村的调查，当时全村一百一十户，有九十多户给孔府当佃户，过着“破屋露着天，



破衣露着皮，破锅漏了底”的悲惨生活。一九二七年遭灾，几乎颗粒未收，而孔府的租粮，却少一粒也要治罪。因此，全村有八十五户外出逃荒要饭，三十多户共卖了六十多个孩子，饿死七十多人，有十二户全家死绝。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户膏”。看吧！这些就是“衍圣公”们在他们老祖宗的“富民”、“利民”的说教下，对劳动人民进行种种奴役剥削的滔天大罪。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孔子主张的“富民”、“利民”就是杀民、害民吗？

孔子的“富民”、“利民”主张，是他的治国方案之一，有着鲜明的阶级倾向。正如鲁迅在批判孔子时所指出的那样：“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一针见血地说明了孔子“富民”、“利民”的阶级内容和它的反动实质。

今天，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妄图在孔学“富民”、“利民”词句的打扮下，进行资本主义复辟。剥掉他伪装的画皮，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所要“富”的是一小撮被打倒了的的地主、资本家，所要“利”的是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就是说，他们要叫劳动人民重新过牛马不如的生活，重新受地主资产阶级和“衍圣公府”的剥削、奴役和压迫。我们要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戳穿孔子和林彪之流的谎言。

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是为剥削阶级的 反动统治培养接班人

教育问题，说到底是为哪个阶级培养人材、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教育都是阶级的教育。孔老二办教育，是为奴隶主贵族培养人材，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反革命两面派林彪，教子尊孔读经，“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是为了建立林家世袭封建法西斯王朝，阶级性都是十分鲜明的。

孔老二说：“有教无类”。反动统治者一直大肆吹嘘孔子所主张的“有教无类”是什么不分阶级招收学生，把孔子打扮成“全民教育家”，这完全是欺人之谈。有的同志已经揭穿了“有教无类”的原意是主张不分氏族、按地域编制、对奴隶进行强制教练的一种反动手段。事实上，孔子一贯仇视劳动人民，他的学生樊迟“请学稼”，被他骂为“小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学而优则仕”，学的目的是要去做官的。他所培养的弟子，自然都是贵族和奴隶主的子孙，不可能有劳动人民。就是那个“在陋巷”“不改其乐”的颜回，也是“世世仕鲁为卿士”的贵族子弟，“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饘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线麻。”孔子办的学堂，有个招生条件，就是至



少要交十条干肉的学费，才可做他的学生。在当时，奴隶哪里能交得出十条干肉呢？从孔子后代继承祖训办起的四氏学（孔颜孟曾四氏学）来看，入学的也仅限于地主富商的公子少爷，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是没有资格进这个学校大门的。

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曲阜县就出现了“圣人门前文盲多”的现象。据统计，一九四六年，全县只有小学八十四所，在校学生仅四千人。中学两所，在校学生仅五百人，还不都是本县人。全部入学人数还占不到全县总人数的百分之二。这些学生中，又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等剥削者的子弟。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奇怪，正是孔老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反动谬论造成的恶果。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县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发展更快。到一九七三年，全县有小学四百一十一所，在校学生达七万七千四百三十四人，中学五十七所，在校学生达一万八千一百零一人。这说明，“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孔氏封建堡垒中的四氏学，是历代王朝用来为其培养大批奴才的学校。四氏学教规中说：“养成贤材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在清代，它的教授、学录常由七、八品官吏充任。在科举方面，省试举人，如果填榜时没有姓孔的，便不能开榜，这就是所谓的“无孔不开榜”。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中，曲阜县中进士的共有四十四名，其中四氏学的学生占三十三名。在嘉庆和光绪之间，曲阜县选为翰林的八名进士中，有四氏学的学生七名。这些人分别做了知县、知府、按察使和员外郎，成为劳动人民的凶恶敌人。四氏学于一九二四年改为明德中学后，继续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培养有文化的奴才。

从孔子教学的实践和孔府办学的目的和历史，都清楚地说明：“学而优则仕”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一切剥削阶级都要为本阶级培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官僚，因此他们都极力鼓吹“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教育思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提出的“读书做官论”，林彪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都是“学而优则仕”的翻版。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方针，彻底划清了无产阶级教育同一切剥削阶级教育的界限，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规定了明确的目标，这是确保无产阶级政权永不变色的一项根本大计。我们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林彪一类骗子所吹捧的孔孟之道和散布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毒素彻底扫除干净，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占领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

——读《王荆公年谱考略》

罗 思 鼎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一位比较进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自命孔门正统的道学家们的眼中钉。资产阶级阴谋家林彪所奉为至宝，并用以作为他搞阴谋、搞政变的立论根据的那篇托名伪造的《辨奸论》，就是当时道学家对王安石进行造谣、诬蔑和中伤的一篇代表作。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清代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以下简称《考略》)。这是一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辩护的著作。它驳斥了宋朝以来道学家对王安石的攻击，为研究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儒法论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结合批林批孔来研究封建社会的这场儒法论战，有助于我们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阴谋手段，有助于我们揭露林彪反动世界观的根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儒家思想的反动性和儒、法两种思想斗争的历史演变过程，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自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以后，逐步演变成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法家主张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实际上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但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复古、尖锐地批判孔学的学派，却长期处于被封建统治者咒骂、排斥的地位。法家学派从汉代以后虽日趋消沉，但实际上地主阶级中一些主张搞革新的政治家，如桑弘羊、曹操、柳宗元、王安石等人，往往从提倡变革的先秦法家学派中寻找思想武器。因此，汉代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革新和守旧的斗争，在思想领域里往往以儒法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宋代，它直接反映为“荆公新学”和反动理学的对立。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所谓“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后，为了替推行新法制造理论根据，吸收法家思想而创立的一个新学派。有进步必有反动。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这一政治派别的思想代表程颢、程颐在反对新学的斗争中，发展了反动的孔学，形成了极端唯心主义的理学即道学。这场新学与理学的斗争，实质上是封建社会中长期进行的儒法斗争的继续。

北宋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都是极端的尊儒反法派。他们把同王安石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捍卫孔孟道统的斗争。《考略》指出，顽固派异口同声地攻击王安石“挟管(仲)商(鞅)之术”^①，是少正卯那样的革新派。道学家程颢兄弟首先跳出来攻击新学，惊呼“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按：王安石字介甫)，“坏了后生学者”^②，表示要同它拚命。司马光的喽罗吕诲攻击王安石“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辨，行伪而坚”^③。范纯仁大骂王安石“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④。南宋以后，道学家朱熹等人更是杀气腾腾地叫嚷王安石“学本出于刑名度数”^⑤(意指王安石的学问都是以法家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如果落在孔子手里，必然要受到“少正卯之诛”^⑥。这些孔门之徒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是要残酷无情地镇压劳动人民和本阶级内部的革新派的。林彪这个孔老二门徒，一面假惺惺地讲什么“和为贵”，咒骂法家是“罚家”，同时大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在暗中策划反革命政变，也正是继承了孔子这个“巧伪人”的一套手段。

地主阶级顽固派以保卫孔子自居，斥责王安石的新学崇尚法家思想，是违背儒家正统的异端邪说，从反面说出了事物的真相。王安石在当时确实是一位有尊法反儒倾向的人物。变法期间，他把“先儒传註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⑦，代之以自己撰述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用来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顽固派骂他是商鞅，他针锋相对地回答：“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⑧他嘲笑汉儒的烦琐哲学是坑害人的“无补之学”^⑨，骂他们是区区修补，百孔千疮。至于对那些“据经泥古”的儒生，则抱着极其蔑视的态度指出：“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⑩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⑪（“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旧的传统不能作为依据，流言蜚语用不着去顾虑”）这三句话，和孔子所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⑫（“对天命要畏敬，对王公大人要畏敬，对圣人的言论要畏敬”）直接相对立。这一下，在当时死



水一潭的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死守儒家反动传统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司马光竭力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再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⑬。文彦博也跟着喊叫：“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⑭。王安石则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是如此。”^⑮他在《兼并》诗中愤慨指出：“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⑯，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顽固守旧的俗儒是大地主兼并势力的走狗，是变法的凶恶敌人。

思想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是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环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这场儒法斗争，归根到底，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宋代在变法开始前，一小撮大地主霸占了全国十分之七以上的土地，广大农民日益赤贫化，自耕农以及中小地主大批破产，造成了“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⑰的严重局面。这种状况既促进了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又进一步缩小了赋税的来源，引起了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一上台，就提出了反兼并的理财措施，力图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他一再说：“理财为方今先急”^⑱；“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⑲。办法呢？“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⑳。他特别推崇汉朝著名法家桑弘羊坚持推行的“建本抑末”、“绝兼并之路”^㉑的法家经济政策，认为“摧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㉒。这就是要用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来重新调整权力和财产。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㉓。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地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的疯狂破坏。他们口口声声攻击王安石变法“用贱陵贵，以邪妨正”^㉔，“夺富民之利”^㉕，使“上户”“年年出钱，无有休息”^㉖。当时司马光身居洛阳，暗地里以“真宰相”自居，亲自指挥顽固派的捣乱活动，发誓要推翻新法。苏轼、苏辙兄弟之流，则是典型的投机派。他们有一套适应形势的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原来是恪信儒家信条的孔孟之徒，但在变法舆论高涨期间，也大唱起“常患法之不变”^㉗的调头。等到逆流一来，他们就马上把脸一变，落井下石，攻击王安石“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㉘（“使老百姓只知道财利而不懂得仁义，只看到刑罚而看不到道德”）。

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社会基础是很狭隘的。他们提出抑制兼并，目的是为了缓和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稳定中小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它并不可能改善



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因此也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变法派内部，也是各有各的心思，真正态度坚决的只是极少数。其中有的人根本就是投机分子。有个叫邓绾的，就是为了过官瘾而附和变法的，当别人斥责他时，他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②宋朝的社会危机是由封建制度本身所决定的。王安石由于其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幻想在不根本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作些修修补补，走改良的道路，这只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他的法家思想也是不彻底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至于王安石的变法实践则比他的理论更要软弱，时停时续，时松时紧，从来也没有被认真实行过。后来，顽固派司马光上台执政，推翻了一切变法措施，竭力鼓吹儒家的反动理论，加速了宋王朝的灭亡。

反动的道学家们企图把北宋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说什么“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③。事实上，北宋王朝的灭亡，正如蔡上翔《考略》中所指出的，完全是“苟且因循不振之故”^④（“苟且偷生、因循守旧而不知奋发图强的原因”）。换句话说，北宋的覆亡恰恰是由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守旧的路线造成的，是理学家们造成的。鲁迅说得对：“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老调子已经唱完》）

林彪跟着宋朝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屁股后面，恶毒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用以咒骂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咒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中国人民，正暴露出林彪路线的卖国主义本质。果然，林彪投奔苏修，自我爆炸，成为不齿于人类的叛徒、卖国贼。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粉碎内外敌人阴谋的斗争中，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欣欣向荣，继续胜利前进。

二

要正确认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根源和蔡上翔在《考略》中为王安石辩诬的意义，还必须进一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中儒法论争的全过程。

秦代以后，地主阶级的历代统治，是建立在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专政的基



基础上的。他们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一面，可是却十分嫉视法家学说中提倡变革的一面。因此，整个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趋势，是儒家学派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而法家学派却越来越受排斥和咒骂。秦始皇是公开提倡法家思想的，“焚书坑儒”就是对先秦儒法斗争的一次革命性总结。在汉代，汉武帝虽然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把孔学封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实际情况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④。

孔子在思想界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逐步向反面转化为反动派的过程一致的。汉武帝以后，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历代都有人对他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桑弘羊就痛骂孔子是一个反动政客，直率地斥责孔子和他的学生“不耕而学，乱乃愈滋”^⑤。东汉的桓谭“非圣无法”^⑥，对待孔子也有点不太尊敬。王充则专门写了《问孔篇》，揭露孔子的说教“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直言不讳地说：“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⑦西晋的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⑧，结果为了这桩罪名而丢了脑袋，可见这时的孔圣人已经是不能随便得罪的了。到了唐代，孔子被抬上了“文宣王”的宝座，连唐玄宗这个风流皇帝也哼起了“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⑨的调子。但就在这时，用大不敬的态度直呼孔老二名字的也还大有人在。李白自称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⑩，对孔圣人有点油腔滑调，很不礼貌。直到唐代后期，韩愈大谈特谈孔孟的“道统”，说什么“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⑪，孔子才开始被看作神圣不可触犯的偶像。但就是韩愈这个铁杆尊孔分子，有时也还难免要与孔圣人开个小玩笑。《石鼓歌》中的“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就是在讽刺孔子不到秦国，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宋代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向后期过渡，这种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转折点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清代李慈铭说：“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少有更张，则群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为循默，不敢少出意见”^⑫。李慈铭的立场是反动的，但他认为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封建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和僵化，这个意见却是不错的。蔡上翔在《考略》中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地主阶级一天天走向下坡路，孔子的地位也被封建统治者越抬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反动的程朱理学由于继承和发展了孔学的反动思想，在大地主阶级的支持下，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反动统治思想。这



些道学家们为了维护孔孟之道，到处散布流言蜚语，不择手段地对王安石及其新学进行攻击和歪曲，正如《考略》所指出的，“种种阴谋诡秘，有同鬼域”^{④①}。《考略》揭露了《辨奸论》是南宋道学家邵伯温冒名苏洵所写成的一篇造谣作品，它胡诌一通“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鬼话^{④②}，目的是为了攻击王安石是“阴贼险狠，与人异趣”^{④③}的大奸大恶。这个邵伯温还捏造说，他的老子邵雍在洛阳天津桥上听到杜鹃的啼声，就预见到政治将发生变乱，十年之后，果然发生了王安石变法。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早在清代初年，李绂就已指出：《辨奸论》“无端造谤”，“诬枉而失实”^{④④}。蔡上翔更进一步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但是，《辨奸论》这种卑鄙无耻的造谣手段，却受到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的赏识。他以伪《辨奸论》为理论根据，捕风捉影地罗列一堆现象，大谈“政变”经，用什么“见微而知著”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妄图为其篡党篡政的阴谋服务。这充分说明林彪同历史上那些反动道学家一样虚伪无耻，只能靠搞唯心论，散布谣言，玩弄阴谋诡计过日子。林彪欣赏《辨奸论》，就是刻骨仇恨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中国革命人民，这种仇恨是地、富、反、坏、右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后来集中表现在见不得阳光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当中。

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是林彪所特别崇拜的一个南宋反动道学家。就是这个朱熹，编了一部《三朝名臣言行录》，把以前攻击王安石的一切反动言论统统收集了起来，流毒极深。蔡上翔指出：“安石得谤于天下后世，固结而不可解者，尤莫甚于《言行录》。”^{④⑤}自从这部书问世以来，王安石受到了更恶毒的谩骂和污蔑。有人甚至捏造说，阎罗王新造了一个“变古狱”^{④⑥}，又说地狱中有个“被械白鬚”的人，“乃王安石介甫”^{④⑦}。明代有个叫周德恭的反动理学家竟大骂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小人”^{④⑧}。到了清代，钱大昕咬牙切齿地攻击王安石“得罪于名教”，是“狂惑丧心之大恶”^{④⑨}。这种极端嫉视和害怕任何改革的心理，说明封建社会已经走向衰落和崩溃了。

在地主阶级逐步由真老虎变为纸老虎的过程中，尊法反儒思潮的总趋势只能是一浪低于一浪。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儒法论争表现为法家节节胜利和儒家步步败退。在西汉前期，儒法两派在思想界也还保持着“两刃相割，利钝乃知”^{⑤⑩}的对垒局面。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是一场儒法的大论战，斗争的结果是法家桑弘羊的失败和遇害。此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法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却继续被地主阶级中的进步思想家所接受。这时的儒法



论争，主要表现为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学派和正统的儒家学派的斗争。王安石是有法家倾向的，但已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法家；他批判了孔子的反动论点，但不敢指名道姓批判孔子。在他以后，不少思想家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形式下冲击了孔孟之道，但却往往又抬出了孔子来作为护法神，竭力表白自己是真正的孔子之徒。黄宗羲反程朱，不反孔孟，还借用儒家的“三代之法”来反对“一家之法”的专制统治。戴震袭用了王安石的经注形式对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们都不敢公开打出法家的旗号，也不敢公开批判孔子。其中有些人反对了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却又陷入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之中。清代乾嘉学派中的不少人刚跳出了宋代理学的圈子，又陷进了汉儒烦琐考据的泥坑。蔡上翔同样也不例外。他在《考略》一书中肯定了王安石变法，同时却又想竭力证明王安石的思想是合乎“真孔孟之道”^①的。上述事实说明，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地主阶级中的尊法反儒思潮也已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了。

我们回顾封建社会儒法斗争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国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的政治势力的利益。他们尊儒是为了维护或复辟其反动统治，反法是为了反对进步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今天，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尊孔，刘少奇、林彪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起尊儒反法的黑旗，就是为了妄图在我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露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实质，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我们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性，批判儒家的反动性，目的“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同时，这也是为了揭露和批判林彪这个政治骗子怎样利用历史上的反动思潮和反动学派向无产阶级进攻，以便更好地同他们作斗争。我们必须深入批林批孔，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全面专政而努力奋斗！

注：

①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七第一一六页

② 程颢、程颐：《二程全书·遗书二上》（四部备要本第二〇页）

③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四第二〇四页

④ 《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⑤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一第三九四页

⑥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九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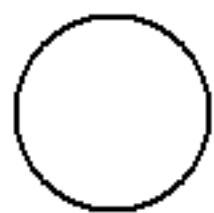
⑦ 《宋史·王安石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六



- 一页) :
- ⑧ 王安石: 诗《商鞅》, 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二第三五五页
- ⑨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第一〇二页
- ⑩ 《宋史·王安石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五九页)
- ⑪ 《宋史·王安石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六一页)
- ⑫ 《论语·季氏》
- ⑬ 《宋史·司马光传》(四部备要本第二八一九页)
- ⑭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二一第三页
- ⑮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二第四三四页
- ⑯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四第七四页
- ⑰ 王安石:《风俗》, 见《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九第七三八页
- ⑱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第一五页
- ⑲ 王安石:《答曾公立书》, 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第七七三页
- ⑳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八第一二九页
- ㉑ 《盐铁论·复古》
- ㉒ 《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 ㉓ 《宋史·职官志》(四部备要本第一一九一页)
- ㉔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第九页
- ㉕ 苏轼:《诗病五事》, 见《栳城集》三集卷八(四部备要本第六三六页)
- ㉖ 司马光:《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劄子》, 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第九页
- ㉗ 陈亮:《铨选资格》, 见《龙川文集》卷一一第一一六页
- ㉘ 苏轼:《上神宗皇帝万言书》, 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四第二页
- ㉙ 《宋史·邓绾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七五页)
- ㉚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八页
- ㉛ 蔡上翔:《读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第一一二页
- ㉜ 《汉书·元帝纪》
- ㉝ 《盐铁论·相刺》
- ㉞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 ㉟ 《论衡·问孔篇》
- ㊱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三二二页
- ㊲ 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 见《唐诗三百首》
- ㊳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见《李白诗选》第二六八页
- ㊴ 韩愈: 诗《荐士》, 见《韩昌黎全集》卷二
- ㊵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九九三页
- ㊶ 《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〇第一五六页
- ㊷ ㊸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〇第一五〇页
- ㊹ 李绂:《书邵氏闻见录后》, 见《穆堂初稿》卷四五第二八页
- ㊺ 《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六页
- ㊻ 洪迈:《夷坚乙志》卷一第三页
- ㊼ 吴开:《漫堂随笔》, 见《说郛》卷六四
- ㊽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八页
- ㊾ 钱大昕:《王安石狂妄》, 见《十驾斋养新录》卷七
- ㊿ 《论衡·案书》
- ① 《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九第一四二页



读柳宗元《封建论》



周一良

历代评论秦始皇的文章，咒骂者居多，只有极少数人肯定他的成就。在正确评价秦始皇的文章中，唐代柳宗元（公元七七三——八一九年）的《封建论》是杰出的一篇。《封建论》肯定秦朝废除分封，设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进步意义，指出这种措施对于维护统一，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必要性，从而正确估计了秦始皇革新进取的历史作用。柳宗元在议论历史的同时，还联系当时的政治局势发表了意见，使自己的史论为政治服务。《封建论》是值得我们认真读一读的一篇好文章。

秦始皇尊崇法家学说，反对儒家孔孟之道。他的目标，是防止已经崩溃的奴隶制复辟，维护和巩固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进步意义的封建地主制。秦朝采取了各方面的措施，废除西周以来奴隶制社会分封诸侯的办法，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官爵不再世袭，一切赏罚以对于封建地主国家的功过为标准。秦朝统一以后，全国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也划一起来。对于反对这些措施，妄图恢复战国分封割据局面，梦想开倒车回到奴隶制社会的儒生，和他们制造这种舆论的书籍，秦始皇采取了坚决镇压手段——焚书坑儒。作为一个统治阶级人物，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当然，在封建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统一只能是有限度的。但是，秦始皇第一次统一全中国的功绩，在我国历史上仍然不容忽视。当新兴地主阶级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初期，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要求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建立。秦始皇顺应了这种形势，毅然决然排除旧势力的影响，实现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设立郡县，由中央派官吏去统治全国。秦朝统一局面下创立的很多制度，为以后两千多年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秦始皇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围绕着统一事业这个中心。他兼并六国后十年里，巡行全国东西南北各地，纪功刻石，其主要目的也不是游山玩水，而是为



了提高中央集权的威信，以巩固统一。毛主席指出，封建地主阶级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秦始皇当时正是这样的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废除分封诸侯，设立郡县，是秦朝摧毁战国旧制，统一全国的关键措施。秦朝以后，历代的政治家们，往往争论“封建”* 和郡县的得失利弊。不少人把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由之引起的统治的不稳固，归咎于秦废“封建”和立郡县。柳宗元的《封建论》，对于否定秦废“封建”的种种说法，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阐明了郡县制的优越性，肯定了秦始皇的革新和进步。

柳宗元的时代是八、九世纪之交，上距秦完成统一约一千多年。他回顾了秦以后的历史，注意了这段历史的经验，提出了从发展观点观察问题的看法。

首先，柳宗元从“生人之初”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阶段讲起。他描绘那时人类所处的环境是遍地野草树木，到处奔走着成群的野兽，而人类自己既不象野兽那样能抓扑和咬人，又没有羽毛，因而“莫克自奉自卫”，就是说不能养活自己，保护自己。柳宗元的描述，和先秦著名法家韩非所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韩非子·五蠹篇》），是一脉相通的。这样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看待远古人类社会，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符合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而儒家则认为只有远古的人类处于最理想的黄金时代，以后社会不是向前进的而是倒退的，今不如昔，因此向后看，宣扬“法先王”，一切要复古。孔子就是鼓吹这种历史倒退的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来为他开倒车复辟奴隶制、反对封建制服务的。柳宗元从发展的观点来观察，所以能认识到“封建”制要为郡县制所代替，正确地论证了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的进步作用。

柳宗元在论证“封建”制被郡县制代替的合理性以前，先追溯了“封建”制的起源。他认为，在远古时代，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象荀子所说那样，“假物以为用”，也就是借外物为自己所用。借外物为用必然会相争，相争不息必然会去找

* 这里的“封建”，是旧史书上的术语，指象西周以至春秋战国那样，分封诸侯，各自建立独立王国的制度，柳宗元的《封建论》即指此，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地主霸占土地剥削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本文凡在这个意义上用的“封建”，都加引号。



那能评判是非的人,于是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各级统治者。相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几个国的国君都去听从威望最高的人的命令,他就成为天子。所以天子是最后产生的。从天子到乡里之长,凡是有恩德于人民的,他们死后,人们一定要继续尊奉他们的后代为首领,因而形成世袭相承的“封建”制。柳宗元的结论是,秦以前分封诸侯,世代承袭,割据独立的“封建”状况,“非圣人意也,势也”。也就是说,这不是某些个人的意志所造成,而是时势——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他所谓的“势”,当然没有也不可能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去理解,但至少他认为,“封建”是客观时势或环境所造成。这种看法,在当时还是进步的。

在柳宗元关于“封建”制起源的论述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荀子·劝学篇》说,借助于车马的人,并不是脚比别人利便,而能行千里;借助于舟船的人,并不识水性,而能渡江河,因为他们“善假于物也”(会借助于物)。柳宗元运用了“假物”的思想,而他所说的“必将假物以为用”的“物”,似乎不仅是指生活资料,而是包括生产工具,所以才能“为用”。恩格斯教导说:“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人类之最初区别于动物,就在于用手劳动而制造了工具。一旦从事制造工具,原始人类在和自然界作斗争时就有了划时代的武器,能够战胜和改造自然。柳宗元在描述人类“莫克自奉自卫”以后,提出“假物以为用”,他是不是非常朦胧地多少意识到了原始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重大意义呢?关于国君和统一天下的天子,柳宗元认为最先是由逐步推戴而产生出来的。这种说法当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但是,儒家用孔孟之道的天命说,来巩固和提高皇帝的绝对权威,象汉代董仲舒之流说什么“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顺命》),宣扬统治天下的皇帝之出现是天的意志和命令。对比之下,柳宗元的观点不是比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要进步得多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公然号召革命群众去当董仲舒。国民党反共分子、叛徒陈伯达急起帮腔,一唱一和。林彪反党集团这样热衷于吹捧董仲舒,正是捡起孔孟之道的垃圾作为思想武器,来搞资本主义复辟,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尊儒反法,吹捧董仲舒,和他们咒骂秦始皇一样,都出于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



《封建论》论述了古代奴隶社会中“封建”制的起源以后，指出秦朝改“封建”为郡县的措施的优越性，肯定了这一改革。柳宗元对比了秦以前的“封建”和秦代的郡县制度，指出周代“封建”的弊病是诸侯强盛，天子指挥不动他们，形成所谓“末大不掉”。到周平王东迁以后，天子的地位已经降到和诸侯差不多，“周之丧（灭亡）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秦兼并六国后废除侯王，变革旧制，设置郡县，改派地方官，政权集于中央。柳宗元称赞秦始皇这一革新措施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这就充分明确了秦朝统一在巩固统治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柳宗元又观察秦以后直到唐代一千多年的历史，以封建统治的巩固与否为标准，论证了设立郡县的“秦制之得”，和汉朝初年立宗子，封功臣的“封建”之害。他指出，汉朝初年部分地实行“封建”，屡次出现分封诸侯的叛乱，郡县长官却不曾背叛中央，“有叛国而无叛郡”，所以秦朝制度的优越性很明显。汉以后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这一事实也是不会改变的了。然后，他归结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说“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肯定了唐承秦制是合适的。其实，唐朝虽然实行郡县制，自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形成许多独立王国，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已经大为削弱。柳宗元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在于州县，而在于军队，他认为当时“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柳宗元赞扬秦制，赞扬唐承秦制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针对当时各地藩镇而发的。他认为唐朝当前的统治，只要善于掌握军队，谨慎选择地方官，国家就可以治理好。这是反对骄兵悍将向长安的中央政权大闹独立性的议论。柳宗元在《封建论》里讨论历史，同时也含有古为今用的意味，使他的文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服务。对于古代一些有见解的史论文章，我们不是都应该这样去领会吗？

有人质问：郡县制如果确是“得”，为什么秦王朝很快就覆灭了昵？柳宗元回答说：因为秦朝统治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群众，“人怨于下”，所以大呼成群，揭竿而起，一下子推翻了秦的统治。“失在于政”，“非郡邑之制失也”。又有人质问：夏、商、周、汉四朝，都沿用“封建”而统治长久，秦行郡县制而国祚短促，如何解释呢？柳宗元反驳说：曹魏沿袭汉制，晋朝又沿袭魏制，都实行“封建”，不是也并不长久吗？唐朝改变办法，实行郡县制，到柳宗元时，王朝维持已近二百年。



可见并非实行“封建”才能巩固统治。柳宗元还指出，汉代“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意思是说明，汉代只是在部分时期和部分地区实行分封，实际上还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柳宗元又进一步论证，在“封建”制下，不问有无才能，生下来就成为封国的统治者，而真正有才能的人，反不能发挥作用。如果实行郡县制，地方官吏“有罪得以黜（罢免），有能得以赏”，早晨任命后发现他不好，晚上就可以罢免。这样，中央集权的国家对于全国地方指挥自如，当然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就有保证。

柳宗元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替封建统治者谋求巩固政权的方法，竭力阐明郡县制之有利于统一。同时，从中国历史长远发展考察，他肯定了秦朝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制的积极意义，这种肯定是正确的。对于柳宗元这样封建地主阶级中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思想家、政治家，如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能够比较正确地估价他的言论和行动。对于秦始皇，也是如此。虽然秦始皇对人民进行了严酷的压迫和无情的榨取，但他的革新精神和所奉行的法家“法后王”政策，却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向。他废除奴隶社会长期实行的分封制，改设郡县，从而巩固了统一，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东西方各国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都实行过分封；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阶段，也都出现过实行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古代埃及奴隶主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在全国设若干州，州长由法老（国王）任命、调遣。古代波斯的奴隶制帝国，也把全国分为许多郡，由国王派郡守管理。罗马帝国设立行省，由奴隶主的皇帝派官统治。可见郡县制与奴隶制社会并不是永远互相排斥的，郡县制与封建制社会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上述这些奴隶制国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之得以加强，全国统一局面之得以巩固，都和实行郡县制密不可分。以古埃及而言，后来州长职位逐渐变为世袭，形成变相的分封制，中央集权即被削弱，统一也就不巩固了。在秦始皇统治初期的具体情况下，反对秦的统一，要求恢复六国分封旧制的人，大都是信奉孔孟之道，梦想恢复殷周奴隶制和礼乐之治的儒生和旧贵族。因此，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兴封建地主制和维护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就必需扫除这两方面的障碍，而这些障碍恰恰来自同一反动势力。因此，秦始皇的两项任务在打击同一反动势力的基础上一致起来。这两项任



务的完成，在当时，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都具有进步意义。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曾经大反秦始皇，骂他焚书坑儒，说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是的，我们就是要表扬秦始皇“法后王”的革新精神，肯定他打击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维护新兴地主制的历史功绩，称赞他废分封，立郡县，第一个统一中国的贡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熟读柳宗元的《封建论》。林彪咒骂秦始皇，是为了反对进步，反对革命暴力，以便于自己复辟资本主义。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旧倒退，必然遭到彻底破产。

“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今天处在二十世纪，上距柳宗元的时代又是一千多年了。对于两千二百年前在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意义，我们不仅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来观察、分析，而且有条件从更长远的时间和更广阔的视野来加以评价。在中国，政治上较长期的统一，对于封建社会里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的融合，多民族国家的巩固，都起着积极作用。国家的统一，对以后中国各族人民抵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独立，也是有利的。如果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不是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而是处于战国纷争或藩镇割据的局面，必然给予帝国主义强盗更多可乘之机，他们“分而治之”的阴谋就更容易得逞，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粉碎敌人瓜分阴谋的力量，必然会受到削弱。今天，在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奴役以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换了人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七亿人民正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做着前人未曾做过的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统一，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必不可少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祖国今天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历史条件及伟大意义，和两千二百年前秦始皇时代的统一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但是，两千二百年前的统一，在适应革新进取的要求方面，在符合上升的进步阶级的需要方面，不是也和今天的统一有着类似之处吗？

封建社会的统一，是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联系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



在消灭分裂割据时，“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在巩固封建制，反对奴隶制复辟中起了积极作用，对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但到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因素时，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越是强大，它抵制、压抑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反面作用也就越明显。这正说明，历史是在辩证地发展。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抵制奴隶制复辟、维护新兴的封建地主制所起的积极作用，当然也不应该否定封建社会里国家的统一。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柳宗元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仍然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秦朝第一次统一中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柳宗元对于秦废“封建”立郡县的评价是正确的。秦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统一时期约占三分之二，分裂时期只占三分之一，而且分裂的期间越来越短，元、明、清三朝的统一局面，连续了六百几十年。国家的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上不可阻挡的总趋势，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共同一致的要求。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卖国贼林彪也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好，他们搞什么另立中央，寄希望于什么“健康力量”，都是妄图破坏我们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来实现颠覆分裂的阴谋，最后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把我们伟大祖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种黄粱美梦，是违反历史发展趋势的，是与七亿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注定只有破灭。

柳宗元能够正确认识秦始皇统一的功绩，是和他在哲学上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分不开的。他的《天说》认为，天亦即自然根本不能“赏功而罚祸”。他的《非国语》六十七篇，主要是反驳《国语》一书中用天道、天命之类孔老二的儒家反动历史观去解释历史。例如《国语》记载宋人杀了国王，晋人借机攻宋，说宋人违反天道，天必然要加以惩罚。柳宗元反驳说：自古以来，有多少杀人抢劫比宋人严重得多的，他们却活得很好而且长寿，天的惩罚又在哪里？他还质问说：讲到天，我怎么能知道它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呢？柳宗元对于天的看法和解释，是继承了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子，而和孔孟之道的先验论是根本对立的。由于哲学思想上鲜明的唯物主义因素，才能从客观的形势和环境，从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来观察历史，才能正确评价秦的统一。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柳宗元也和顽固保守、专开倒车的儒家完全不同，而是



倾向于革新。他在顺宗时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一派，坚决反对宦官掌握政权和兵权，积极改革德宗统治时的一系列措施。对于唐代实行郡县制而仍然出现反对中央统治的叛乱，柳宗元解释其原因说：“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他认为“有叛将而无叛州”，并非由于没有分封诸侯而造成地方叛乱。柳宗元参加的王叔文革新派，受到宦官以及中央和地方守旧派的打击。他们拥立宪宗，逼迫顺宗退位，对王叔文一派大加排斥。柳宗元也从首都长安被斥逐到边远地方，贬为低级地方官。唐以后的封建文人评论柳宗元，大都推崇他在文学上的革新——古文的造就，而很少人同情他的政治活动。这是长期以来主张保守倒退的儒家孔孟之道的恶劣影响。

宋代有两个政治主张上对立的人，对柳宗元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这种评价的分歧，对于我们了解柳宗元很有帮助。主张变法革新的王安石称赞柳宗元是“天下之奇材”（《读柳宗元传》），对于主张革新的柳宗元表示了敬意。王安石还说，尽管柳宗元遭到贬黜，没有被任用，仍然“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就是说，他虽然政治上失败了，其他方面却做出了建树，在历史上留下了业绩。王安石这就充分肯定了柳宗元在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反对王安石变法，竭力维护旧制度的苏轼，对柳宗元的评价则另是一样。他虽然也同意《封建论》的某些观点，却公然辱骂柳宗元是“小人之无忌惮者”（什么都不怕的小人），表示不赞成柳宗元的《非国语》，而且概括起来说：“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见《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所载苏轼的《报江季恭书》）。“礼乐”是孔老二拼命鼓吹的“礼治”的标志，柳宗元对它采取否定态度，认为是不足道的事物，因为他在政治思想上是继承法家的。儒家宣扬“天人感应”，认为天有意志，主宰一切，能够影响人世，赏善罚恶。柳宗元不相信什么天道，说“苍苍者焉能与吾事”（《断刑论下》），意即天哪里能管我们的事。这是唯物主义思想。柳宗元在唐代思想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是站在唯物主义一边的。他的历史观点和政治主张，是与他的哲学思想一致的，并在《封建论》里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尽管苏轼公然污蔑柳宗元，但他上述两句带有贬意评语，却从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予了柳宗元非常确切的评价，从今天看也是高度的评价，这是顽固派苏轼决想不到的吧？

（原载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北京日报》，转载时作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补充）



“克己复礼”就是要开倒车

天津轮胎厂工人评论组

两千多年前，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孔子，为了维护日趋崩溃的奴隶制，抛出了“克己复礼”这个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从那以后，凡是主张开倒车的反动家伙，都把“克己复礼”的反动主张引为经典，奉为至宝。林彪及其死党，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多次互相题词，胡说什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在九大以后，林彪反复鼓吹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这就充分暴露了林彪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子野心。

孔子处在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期。反动的奴隶制以及维系它的反动的上层建筑——“周礼”，已经土崩瓦解，新兴的封建制逐渐地确立。面对着这场新旧两种制度的斗争，孔老二顽固地站在反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叫嚷什么：“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就是说，孔子要人们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那么什么是“克己”、什么是“复礼”呢？在当时这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孔老二的所谓“克己”，从奴隶主贵族内部来说，就是要加强团结，防止互相倾轧；对奴隶主以外的革命阶级来说，就是要束缚他们的思想，控制他们的行动，防止他们起来“犯上作乱”，不准他们造反，以巩固摇摇欲坠的奴隶主阶级的专政。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奴隶制的一套腐朽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以便阻止和破坏新兴封建制度的建立，镇压奴隶的反抗，继续维持奴隶主的天下，把历史拉向倒退。

两千多年过去了，孔老二的阴魂仍然不散，他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又被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拣了出来，当作法宝，作为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及其死党卖命地鼓吹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亿万工农兵群众，热烈欢呼这个伟大的胜利。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恶毒攻击和无耻的诽谤，为一小撮被打倒的阶级敌人鸣冤叫屈。林彪在这时抛出“克己复礼”的反动谬论，集中地代表了他们反革命的利益、要求和愿望，道出了他们反革命的心声。林彪疯狂叫嚷的“克己复礼”，究竟是什么玩艺儿？在他们那里，“克己”就是要他的死党为他们阴谋篡权复辟卖命，按照法西斯的“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而所谓“复礼”，就是要复封建主义的“礼”、资本主义的“礼”、修正主义的“礼”，就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手段篡夺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里直言不讳地供称，要在苏修“核保护伞”下，充当儿皇帝。这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让地主资本家重新骑在我们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使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我们决不答应的。

林彪的“克己复礼”与孔子的“克己复礼”，尽管时代不同，他们所要复辟的剥削制度不同，但是，他们的实质是一样的。他们的政治路线，都是复辟已经腐朽没落了旧的剥削制度，都是反对进步，反对革命，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倒退。历史上的孔老二为了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社会变革，提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主张。这就是说，他要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起用没落的旧贵族人士。一句话，就是要复辟奴隶制，把在社会大变革中被推翻的奴隶主及其代表人物，重新捧上历史的宝座。林彪及其死党，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恢复地主资本家失去的天堂，大肆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这实际上是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可见，林彪和孔子都是没落的旧制度的卫道士，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家伙。

毛主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历史经验说明，每当一场大的社会变革之后，在如何评价这



场大的变革的问题上，往往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斗争的实质，是坚持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变革，还是反对社会进步，否定社会变革。这种斗争，经常是同尊孔与反孔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我国劳动人民掀起的一次次革命斗争，总是触及到孔子及其反动思想。而一切妄想复辟、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都是尊孔的，他们总是祭起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的“法宝”，为已经灭亡的反动制度和反动阶级招魂，向进步的社会制度和革命阶级猖狂反扑。今天，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依然存在，并且将长期存在。建国以来，在历次大的政治运动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如何评价这场政治运动的大辩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如何对待这场大革命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肯定与否定、前进与倒退的斗争。我们要通过批林批孔斗争，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坚决反击阶级敌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和诬蔑，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当前，批林批孔斗争正在蓬勃开展。孔子是搞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林彪是拜倒在孔子脚下的忠实门徒。林彪不仅从理论上鼓吹孔子的“克己复礼”，把它当作座右铭，而且在行动上实践“克己复礼”，大搞反革命复辟。斩草必须除根。深入批林批孔，彻底批判林彪贩卖的孔老二的黑货，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体系，批判林彪所鼓吹的孔子的“克己复礼”的反动主张，就能更深入地揭露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和他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从思想上挖林彪的“祖坟”，清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深入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革命，必须打一场人民战争。“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那种认为批林批孔仅仅是学术界的事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委要抓大事。批林批孔斗争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全党的大事，是阶级的大事，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我们工农兵要继承历史上劳动人民批孔斗争的光荣传统，学习他们批孔斗争的历史经验，努力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掌握思想武器，坚持斗争哲学，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中庸之道是政治骗子的哲学

上海东风线厂工人 沈逸珍 丁佩蓉

两千多年前，孔子把中庸之道奉为最高的道德。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林彪又称中庸之道是“合理”的。两个骗子，一脉相承。真是无独有偶。

何谓中庸？孔子的忠实信徒朱熹有一个注脚：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经过这一番解释，此道看上去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实际上却是一个弥天大谎。

在阶级社会里，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都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各个阶级之间，不可能有统一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恩格斯说过：“**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世界上那有什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我们受过阶级压迫的工人都懂得，资本家必然要偏向资本家，工人当然也一定是偏向工人。正如鲁迅所说的：“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不管作者如何将真象掩盖起来，偏和倚，总要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

中庸之道是一种骗人的哲学。孔子鼓吹中庸，有其鲜明的阶级内容，是深刻地打上奴隶主阶级的烙印的。中庸的目的，就是要“复礼”，复辟西周奴隶主阶级的等级制度。凡是主张倒退的，就一定要骗人，但是，这种骗人的哲学又总是为他们自己的行动所戳穿。就拿孔子来说，他的一生使尽了反革命权术，八面玲珑，貌似公允，实际上是伺机而动，一遇机会，就显露出凶残横暴的本相来。孔子一口一个仁者“爱人”，但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一切人，爱的只是反动的奴隶主。他一上台，就杀了少正卯，堕三都，什么杀人、毁城的事都干出来了，这算什么仁者“爱人”？根本是在骗人。号称“亚圣”的孟子，对孔子的这套骗术，也心领神会，说什么“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公开宣扬骗人有理。历史上鼓吹中庸之道的，都是一些政治骗子。朱熹的伪道学就是这种骗人哲学的标本之一。那个视中庸为“圣人之言”的曾国藩，倒是以“杀人如剃头”的大刽子手而闻名。蒋介石一面高喊中庸之道，一面却挥舞屠刀，大肆屠杀革命人民。叛徒、



卖国贼林彪也是这样。他在鼓吹中庸之道的时候，却在暗地里磨刀霍霍，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用极其残暴的法西斯手段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镇压广大革命人民。总之一句话，中庸之道，不过是反动派镇压人民群众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一切问题，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历史，观察社会。“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阶级社会里，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这些根本对立的阶级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那里谈得上什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呢？林彪鼓吹中庸之道，目的就是想用它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放弃同帝、修、反和国内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斗争，好让他们这伙坏蛋去搞复辟。林彪用中庸之道，恶毒攻击我国人民的反修斗争，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我们一定要识破他们这种反革命伎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只有坚持斗争，才能扫除一切害人虫，才能斗出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来。

孔孟和林彪鼓吹的中庸之道，表现在哲学上，就是折衷主义，调和论，在一切尖锐的斗争面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这也正是一切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法。机会主义者为什么要掩盖自己的观点呢？因为他们是一群混在工人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蛀虫，他们需要掩盖自己的真象。林彪一伙有句自白：“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这不就赤裸裸地暴露了机会主义者骗人哲学的反动实质吗？他们需要用这种骗人的哲学，给自己的脸上贴金，需要用中庸之道来蒙蔽人民的眼睛。假象毕竟是假象，真象迟早总要暴露，他们总要错误地估计形势，跳出来，撕破自己的假面，把真象告诉大家。到头来只能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林彪的下场不就是如此吗？

共产党人从来是开门见山，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因为我们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我们不谋私利，光明正大，特别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更是旗帜鲜明，敢于斗争，敢于坚持原则。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

孔子垮台了，林彪也垮台了。但是，批判孔孟和林彪所鼓吹的中庸之道，仍然是我们当前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



揭穿“人道主义”的骗局

——评苏修叛徒集团尊孔反法的丑剧

安徽师范大学学员 刘泽林 朱英武 黄志宏
任学玲 刘奇葆

近年来，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导演下，莫斯科一直在上演着尊孔反法的丑剧。那些奉旨行事的苏修御用文人，声嘶力竭地为孔学大唱赞歌，调子已经高得无可再高。他们胡说什么“孔子和孟子都宣布人民的利益是治理的最终和最高目的”，孔孟的“仁政”“为经历了许多世纪的人道主义传统奠定了基础”。在他们的眼里，孔老二简直成了“人道主义”的老祖宗。

然而，历史却无情地嘲弄着这场丑剧的演出。苏修叛徒们即使替孔子穿上十打“人道主义”的时髦服装，也决计改变不了这个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本来面目。孔子曾毫不掩饰地声称，他的终身奋斗目标就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即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重新扶起失去权势的贵族，并为此而惶惶如丧家之犬，奔走呼号了一辈子。他说过“仁者爱人”之类的鬼话，但他爱的只是奴隶主贵族，决不爱奴隶们。他恶狠狠地咒骂劳动人民是“鸟兽”，叫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要奴隶们乖乖地听任奴隶主的驱使和奴役。一旦奴隶们敢于起来反抗，他更是凶相毕露，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郑国的正卿游吉血腥镇压了奴隶暴动，孔子立刻大声喝彩，喊叫“善哉”，露骨地发泄他对奴隶阶级的刻骨仇恨。孟子的终身奋斗目标也是为没落奴隶主搞复辟。他对人民的敌视态度，跟孔子别无二致。他主张的“仁政”，只是把孔子鼓吹的“宽猛相济”的反革命两手加以发挥而形成的一套“治民”之术。他说：“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对于劳动人民，对于奴隶，他是要“使”、要“杀”的，不过是要使得巧妙，杀得不露痕迹罢了。看看孔孟的言论和行动，哪能找得出一点为“人民的利益”的影子！正如鲁迅所指出：



“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孔孟的所谓“人道”，不过是奴隶主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奴隶之道！苏修叛徒们无耻地吹捧孔孟的“仁政”思想，甚至不惜把他们打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这只能说明他们就是当代的孔孟，是一小撮打着为人民谋利益的幌子而专事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老爷。

尊孔必然反法。在苏修叛徒们看来，法家主张“法治”，主张“公开的极权主义”，就是“反人道主义”。因此，他们给实践法家主张的秦始皇安上“历史上最残酷的暴君”的帽子，大骂“焚书坑儒”是“残忍行为”，是对“儒家的人道主义”的“驱逐”。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这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他实行“焚书坑儒”，完全是为了打击那些图谋复辟奴隶制度的反动儒生，进一步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国家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总是需要凭借暴力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对于被统治的阶级说来，从来就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法治”是这样，“仁政”又何尝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孔子在鲁国充任司寇刚刚七天，便以“乱政者”的罪名，杀害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人士少正卯，并且暴尸三日以示众，这不是很有些法西斯气味吗？此外，奴隶主阶级车裂商鞅、射杀吴起，也都能充分说明“仁政”丝毫不“仁慈”。不过，法家敢于公开宣布“法治”要凭借暴力，正说明他们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阶级。而孔孟却用“仁”学的虚伪词句，竭力掩盖奴隶主专政所使用的反革命暴力，只能证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在当时已经日暮途穷，除了进行欺骗而外，再没有别的出路。苏修叛徒们对法家大加诋毁，对“仁政”尽情美化，恰恰表明他们自己的屁股是坐在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营盘里。

苏修叛徒集团之所以要歪曲历史，反法骂秦，决不是因为闲得无聊，要去找两千年前的死人算账。就在他们发出的对秦始皇的恶骂中，有人特意“提醒大家”，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又象秦始皇时代那样”，“扼杀”了中国“文化的伟大成果”。直到最近，还有人扯着嗓门骂我们以法家“极权主义”之“古”，用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今”。不难看出，这帮叛徒所以要那么卖力地尊孔反法，正是为了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亿万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奋起批判封、资、修的反动文化，向包括孔学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发动了英勇的进攻。这在我们叫做革命的大批判，在苏修则叫做“扼杀”“文化的伟大成果”。可见他们的“成果”，正是我们的糟粕，他们心中的宝贝，正是我们民族的痛疽。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必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我们摧毁孔学这个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精神支柱的斗争方兴未艾，今后还将更加深入地^①进行下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我们正是在彻底破除封、资、修反动文化的伟大斗争中，开创着无产阶级文化的新篇章。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把千百年来由剥削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着的舞台夺了回来，一批光彩夺目的工农兵英雄形象，登上了文艺的舞台；我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正在改变着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生气勃勃的工农兵学员，跨进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赤脚医生象雨后春笋般地在成长，医务工作者背起药箱到农村去，改变着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总之，我国的各个文化领域，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深刻变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争艳、春色满园的大好景象。勃列日涅夫之流的蹩脚的造谣专家们，在那里拼命制造“消灭文化”之类的拙劣谣言，除了进一步暴露他们自己是一伙剥削阶级文化的辩护士以外，丝毫不能阻挡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奔腾向前！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势力，极大地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苏修从我国内部进行反革命颠覆的阴谋。苏修叛徒们气急败坏，无可奈何，骂我们是“极权主义”。我们说，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极权主义”者，专政之谓也。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你们这帮叛徒们篡夺苏联人民的革命果实的沉痛教训证明，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如果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坚决镇压妄图复辟的资产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要遭殃，社会主义的江山就要变色。马克思早在一八七五年就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整个历史时代，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也把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区别真假马克思



主义的试金石。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保障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广泛的民主权利，而对反动派的反革命活动坚决予以取缔和镇压，这正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修叛徒们越是攻击我们，越是暴露他们自己背叛马列主义的无耻嘴脸。它从反面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此狂叫怒骂，究竟是在给谁撑腰打气，是一目了然的。刘少奇、林彪这两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头子，都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刘少奇在六十年代重新抛出的黑《修养》，散发着孔孟之道的臭气。林彪一伙也把孔学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他们把孔子的“仁”学吹上了天，竟然宣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他们以孔子“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还高唱孔孟“仁义”、“忠恕”的滥调，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为他们用法西斯手段篡权复辟大放烟幕。因此，这伙叛徒、卖国贼博得了苏修叛徒集团的青睐。随着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活动的逐步加紧，苏修尊孔反法的调子也愈来愈高。他们一唱一和，反革命的主旋律就是咒骂我们是“独裁”，是“极权主义”。苏修大肆吹捧孔孟的“人道主义”，大骂法家“反人道主义”，秦始皇是“暴君”，林彪就在阴暗角落里咬牙切齿地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是“独裁”；苏修鼓吹“儒家赞成建立一个仁政的政府”，林彪便亮出“仁政”的招牌，叫嚣要将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苏修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扼杀文化”，林彪之流便哼起唐代章碣的诗，含沙射影，诽谤文化大革命是“焚书坑儒”，妄图变天夺权。只要把苏修尊孔反法的表演同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纲领稍加对照，人们就不难发现，苏修尊孔反法的目的就是反华，就是要把刘少奇、林彪这类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扶为“儿皇帝”，变中国为苏修新沙皇的殖民地。然而，哪里料到，林彪还没来得及说出苏修要他说出的“决定性的话”，就已经自我爆炸。“超级间谍”葬身沙丘，外国主子跌足三叹。新沙皇同刘少奇、林彪一伙玩尽了捣



鬼的花样，到头来不过是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毛主席曾经指出：“**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苏修叛徒集团正是这样。自从他们篡权复辟以后，就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新型官僚资产阶级的天堂，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地狱。他们一方面不断强化法西斯专政，在全国各地设立大量监狱、集中营和所谓“疯人院”，疯狂镇压革命者和劳动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又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肆宣扬所谓“人道主义”，妄想给自己的法西斯专政披上一件“仁慈”的外衣。然而，他们越是高唱“人道主义”的陈词滥调，就越是暴露出自己面目的虚伪和可憎。最近他们上演的话剧《外来的人》，据说是对“人道主义”作了“现代的严格的理解”，苏修文化界的头目们为此着实大吹大擂了一番。然而，在观众面前出现的主人公却是一个“小小独裁者”。此人同孔子一样，很有些恶霸作风，满台只听见他对工人的训斥声。面对着怒火满腔的工人群众，他暴跳如雷，疯狂叫嚣：“得制服他们，得卡住他们的脖子！”这真是活龙活现地反映出在苏联横行霸道的资产阶级新贵族们的法西斯嘴脸。

玩弄“人道主义”的骗局来愚弄人民，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的惯用伎俩，也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惯用手法。当年第二国际的叛徒考茨基之流就是这么干的。列宁曾无情地嘲笑过这些“卑鄙英雄们”：“少谈些什么‘劳动民主’，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民权’等等空话吧。现代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些夸大的词句里，是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欺诈手腕的，正象每个有生活经验的人，望见‘善良君子’极‘光滑的’面貌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确地断定他‘大概是个骗子’。”（《伟大的创举》）列宁这番话也准确地画出了勃列日涅夫这伙骗子的尊容。不管新沙皇怎样求救于孔子的亡灵，乞灵于“人道主义”，都掩盖不住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孔子这块“敲门砖”早已不灵了，救不了苏修叛徒们的命。等待他们的，必将比第二国际叛徒们更可耻的下场！



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

河北景县董故庄大队党支部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当董仲舒。”董仲舒是什么人？林彪为什么吹捧董仲舒？

提起董仲舒，俺们贫下中农就气、就恨！这个董仲舒是孔孟之道的吹鼓手，是地主阶级的狗奴才。两千年前，西汉的时候，董仲舒向皇帝献了条毒计，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说，当今皇帝的天下象烂木头泥巴墙，一冲就垮。要防止老百姓造反，就要建一道思想堤防，这道堤防就是孔孟之道。孔孟之道要人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不反抗，不斗争，俯首帖耳当奴隶。他认为用这一套来麻痹束缚老百姓，皇帝的宝座就牢靠了。董仲舒因为宣扬孔孟之道，维护封建制度有功，成了地主阶级的大红人。两千年来，封建皇帝念念不忘他的功劳，称他是“百儒之首”、“七十三贤”、“二圣人”。在我们董故庄这里盖了“董子庙”，立了“董子像”，挂了“阐道醇儒”的匾，还赐给董庙大片的庙地。直到解放前夕，董庙里一直不断香火。

从前，董故庄一带的土地，大都是董庙的庙地，穷人连块搭窝棚的地角都没有。董故庄的穷人祖祖辈辈给董庙扛活，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点亮了董庙里的蜡烛，熬干了脊梁骨里的油。“董子爷”是剥削阶级的“爷”，是牛鬼蛇神们的“爷”，是俺们贫下中农世代代的仇敌。在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的今天，林彪又跳出来吹捧董仲舒，俺们贫下中农一听，肺都气炸了！俺们要揭露他的阴谋，戳穿他反革命的狼子野心。

吹捧死人，是为活人服务，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林彪这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惯会耍弄“偷梁换柱”的手段。他要人们“都当董仲舒”，说穿了，是他自己要象董仲舒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就是说，他表面上打着这样那样的招牌，实际上是要“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把孔孟之道和他的反动思想抬到“独尊”的地



位，妄图达到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林彪这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腐朽透顶，反动透顶，拿不出什么新鲜玩艺来和无产阶级较量，只好从孔家店里拣点破烂当成复辟的武器。林彪的反动思想，就是从孔孟之道里脱胎出来的。孔老二讲“天命”，说“老天爷”把人分成“上智”和“下愚”，“君子”和“小人”。奴隶主是“上智”、“君子”，是当然的统治者，奴隶是“下愚”、“小人”，只能当牛做马。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是“天然合理”。孔老二就是用“天”来愚弄奴隶，维护腐朽了的奴隶制。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也学孔老二的把戏，把“天”搬了出来。不过他变了个手法，讲“天才”，把人的聪明愚笨说成是先天的，其实还是孔老二的“天命”的黑货。他把自己打扮成天生的“天才”，把工农兵群众看作是天生的“群氓”。“天才”天生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群氓”天生没头没脑，只能跟着瞎跑。他就是这样来制造反革命舆论，欺骗群众，妄图达到他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目的。孔老二宣扬“忠”，要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对周“天子”尽“忠”。他想用对周“天子”的“忠”把奴隶主团结起来，共同镇压奴隶的反抗。林彪为建立封建买办的法西斯王朝，原封不动地接过孔老二的“忠”，当成反革命的精神支柱。他们一伙用“忠”来组织反革命的“联合舰队”，培养“无限忠于”林家王朝的“阶级感情”，不但对林彪要“忠”，对林彪的小子也要“忠”。孔老二鼓吹“仁”。他的“仁”，是对奴隶主贵族的“仁”。孔老二活着的时候东跑西窜，为的是恢复破败了的奴隶制国家，把倒了台的奴隶主贵族扶到台上去。对于奴隶主贵族，孔老二“仁”得很，对于奴隶，对于进步力量，他就不讲“仁”了。他把革新派杀了头，又到处帮助奴隶主镇压奴隶的暴动，一副刽子手的嘴脸。林彪操着孔老二的腔调，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模样，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仁”。他的“仁”，是对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仁”。他的“仁”，就是妄图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对失去“自由”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政治上的解放”，让他们重新上台。对于广大革命人民，则要实行白色恐怖。他采取极其野蛮的法西斯手段，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充分暴露了他所叫嚷的“仁”是什么货色！

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一个坑里的蛆。一个要用孔孟之道来挽救剥削制度的灭亡，一个要用孔孟之道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都没有好下场。尽管他们叫喊“不成功便成仁”，要同革命人民拚个你死我活，但是他们成不了“功”也成不了“仁”，而是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打好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战士 赵忠范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不断深入，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也在不断深入。许多同志口诛笔伐，积极投入到这场阶级斗争中去，正在出现一个万炮齐轰林彪和孔孟之道的可喜局面。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如何对待这场斗争？是挥戈上阵、积极参战，还是徘徊观望、按兵不动？是发动群众、起促进作用，还是向群众泼冷水、当促退派？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的同志对这场斗争的意义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要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打好这场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

要彻底清算一条错误路线，必须分析它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我们要把批林引向深入，就要做这个挖“根”寻“源”的工作。否则，遇有适宜的气候，没有挖出来的黑根，还会冒出毒芽，没有填死的毒源，还会泛起毒流。那么，林彪的“根”在哪里、“源”在何方？请看事实：当林彪一伙迫不及待地要篡党夺权，而抛出反党政治纲领时，他们搬出了孔子的“正名”之说为根据，叫嚷如果不把国家大权交给他，就是什么“名不正言不顺”，妄图使其反革命复辟活动合法化；当他们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动突然袭击，抛出反党理论纲领时，又拣来孔子的“天命论”为救命草，顽固地坚持唯心论的“天才论”，无耻地为自己涂脂抹粉，妄图实现反革命复辟；当他们躲在阴沟里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时，又钻进“孔家店”里，翻出所谓“仁政”、“礼治”等破烂货，以“不成功便成仁”做强心剂，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镇压革命人民，“解放”一切牛鬼蛇神；当他们肆意攻击党的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政策时，还是以孔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为反动武器。够了，这些铁的事实，足以使人们大开眼界：哦，原来林彪思想上政治上的一条黑根子在这里呀！

在中国，历来的反动派无不尊孔反法，对孔子追谥加封，捧上云天，幻想借助孔子的亡灵，来维持他们垂死的统治。近代史上，这种尊孔反法的丑剧连续不



断。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刽子手曾国藩，到窃国大盗袁世凯；从张勋、康有为尊孔复辟，到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反革命生涯，无不抬出孔子作为自己反动行径的理论根据。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与这些反动人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都是尊孔崇孔的。陈独秀吹捧孔孟是“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王明胡说什么孔孟之道是“民族美德”，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篡改历史事实，宣扬“孔子思想在当时是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的，到今天还有其合理的因素”，“应该充分利用它”。他的黑《修养》，实际上就是孔孟之道的翻版。叛徒、卖国贼林彪紧步王明、刘少奇的后尘，和盘端出孔子的反动思想，加以乔装打扮，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敲门砖”。历史证明，占据统治地位的反动阶级，以孔子的反动思想为自己的统治辩护，借以愚弄人民；失去统治地位的，以孔子的反动思想蛊惑人心，妄图卷土重来，复辟上台。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孟之道是一种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历代反动派，包括刘少奇、林彪之流虽然与孔子不是处于同一时代，但他们同为没落的剥削阶级，在思想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林彪就是中国现代的孔子。我们通过对孔子这个反动奴隶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深刻批判，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黑根，可以进一步认识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把历史车轮向后拉的极右实质，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因此，批孔和批林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要人人挥笔上阵，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批孔是“哲学家、史学家和‘秀才’们的事，和工农兵关系不大”。这种观点既抹杀了批孔斗争的阶级性质，又否定了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

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说成是“打笔墨官司”的“纯学术讨论”，这是资产阶级惯用的伎俩，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从来是阶级斗争的战场，不是超阶级的世外桃源。而阶级斗争从来是千百万群众的共同事业，决不只是少数“学者”、“秀才”的事情。党的十大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正在开展的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是同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密切联系着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是剥削阶级赖以向无产阶级反扑的桥头堡。能否打好这一仗，是关系到党变不变修、国家变不变色的大事，与我们每个同志都息息相关，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置身事外。



毛主席在总结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广大工农兵群众，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主体，最聪明，最有才能。不仅是政治、经济战线上的主力军，而且也是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主力军，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最有发言权。毛主席历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指出什么工作都要大搞群众运动，反对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争，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交给全国人民讨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极大的信任和鼓舞。我国革命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只有勇敢地登上上层建筑的舞台，才能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内，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一些专业工作者做一些专门研究，发表一些有材料、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是必要的。但是，只靠这一个方面，是打不垮顽固的敌人的。要真正制敌于死命，必须靠万弹齐发的密集火力。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非常顽固，不肯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的。只有全国人民一起行动起来，才能使旧思想失去藏身之所。孔子的反动思想流毒很广，根深蒂固。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到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它仍然阴魂不散，频频作祟，这就更加看出有必要发动亿万群众奋起批判，以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孔子的反动思想，表面看起来象个庞然大物。其实，不过是只纸老虎而已。他的思想和实践都是违背客观现实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我们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完全有理由蔑视他，有能力有信心批倒批臭他。鲁迅说过：“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能象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孔子是反动统治阶级捧起来的，人民群众从来不买他的帐。从孔子在世之日，到孔子死掉以后，一直受到人民群众痛快淋漓的批判。当时的劳动人民就一针见血地批判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经常使他处于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狼狈境地。近代史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在军事、政治上打击地主阶级的同时，也在思想上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孔运动。洪秀全砸掉了孔子的牌位，斥之为“妖魔”，“教人之书多错”，使反动的儒家孔教的威风扫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的今天，人民群众如虎添翼，批判能力大大提高，批判孔子这具政治僵尸，更加不在话下。“**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让我们挥起革命的战笔，积极参加当前这场阶级斗争，把林彪和孔孟之道批透批臭。



· 杂 文 ·

评万事“无有大于此者”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说明了什么？

康 立

要认识批孔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感谢蒋介石，这一次又跳出来给我们上课了。他在最近发表的一九七四年“元旦文告”，就是一份绝妙不过的反面教材。

这篇“文告”，说长不长，短短二千余字，尊孔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它面对着中国人民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惊叫：“五千年圣哲相传的道统”处于沦亡之中，“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忧患，国民最大的痛苦，祸固无有大于此与急于此者！而国民革命的责任，亦无有大于此与急于此者！”

好一个“无有大于此与急于此者”！这句话颇为忠实地供出了蒋介石与孔子相依为命的关系。蒋介石此人是以尊孔反共起家的。他岂止在今天，而是长期以来一直把尊孔看成是“无有大于此者”的。一九二八年，蒋介石亲自到曲阜“朝圣”，并宣称孔子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孔教可以“正人心”、“辟邪说”。以后，配合对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他又多次举行祭孔的典礼，鼓吹孔子的教义，就象鲁迅所尖锐批判的：“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重视尊孔？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

一切反动派总是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蒋介石演了一生尊孔反共的丑剧。结果呢，共产主义没有能在中国铲除掉，蒋介石王朝在我国大陆的反动统治却被共产主义给铲除掉了。但就在他逃窜到我国的海岛上以后，尊孔仍然是蒋家反动小朝廷中的一桩头等大事。什么孔孟学会啊，什么祭孔典礼啊，



群魔乱舞，闹得不亦乐乎。更有甚者，这个小朝廷中的一批孤臣孽子，以法西斯特务头子陈立夫为首，在前几个月筹划捐建一座孔子的铜像，准备远涉重洋送到美国去。竖立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新建的所谓“中国文化公园”中。这批反动派们过去长期地用孔子欺骗和毒害中国人民，今天又异想天开地妄图用孔子去欺骗和毒害美国人民。用心固然良苦，但前车可鉴，到头来终究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死孔子从来是与将要死亡的阶级存亡与共的。蒋介石在台湾的反动统治，从精神上说，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死孔子来苟延残喘的。他们一天不尊孔，日子就混不下去。因此，中国人民一起来批孔，蒋介石就深感大难临头，坐立不安，惶惶然不可终日，简直怕得到了极点，活象挖了他的祖坟一样。这就是他情不自禁地惊呼“祸国无有大于此与急于此者”的原因所在。

将尊孔看成头等大事，把批孔视作洪水猛兽，这是一切没落阶级的共同特征。蒋介石是这样，别的反动人物也都是这样。远的不说，就在中国近代，每当革命人民起来对孔子及其孔学开展大规模批判的时候，那些反动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们都如丧考妣，痛哭流涕，总要自己跳出来作一番拙劣的表演。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孔子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声讨，大刽子手曾国藩跳出来哀叹：“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反动的孔学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攻击与否定，大卖国贼袁世凯跳出来惊呼：“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民德如斯，国何以立。”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孔子及其反动的孔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封建余孽林琴南等惊痛欲绝，把这次批孔运动看成是洪水猛兽时代的来临，气急败坏地到处称颂“孔子为圣之时”，诅咒革命人民“覆孔孟，铲伦常”是“叛亲蔑伦之论”。思想斗争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这一小撮反动分子在思想上搞尊孔，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搞复辟，对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在中国，尊孔派历来就是复辟党、辫子兵的代名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孔夫子及其死党，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遭到了批判和清算。孔学作为反动的意识形态，正在被革命人民送进坟墓。帝修反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破产。因此，国内外的反动派们



都对这场革命感到特别痛恨和仇视，一个个忍不住跳将出来，为保卫所谓“圣哲相传的道统”而进行垂死前的疯狂反扑。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以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自居，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搞什么“四书集句”，叨念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他和他的死党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连续四次把这几句话写成条幅，相互赠送，挂在卧室内作为座右铭。这桩事实，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蒋介石和林彪，一个说尊孔是“大于”一切、“急于”一切的事，一个说“克己复礼”是“悠悠万事”中最“大”的事。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尊孔看成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特别重要手段，把亿万革命人民的批孔视作灭顶之灾，这件事是很富有启发作用的。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反动的孔学对于剥削阶级来说，是他们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命根子。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坚决把批孔当成头等大事来抓，推动批林的继续深入，进一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归根到底，这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孔孟之道是林彪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所信奉的反动道统，我们一定要对它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咒骂我们“大搞‘批孔小组’‘批孔会’‘批孔墙报’……来‘刨根问底的深入批判孔子’，使‘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这几句话总算是说对了。蒋介石听着，我们不仅已经这样做了，并且还要继续这样做。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还在后头呢！我们就是要“刨根问底的深入批判孔子”，还要进一步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毫不掩饰地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批孔运动的极度恐惧心理。这个“文告”实际上就成了“尊孔讣告”。批孔，对于反动派是一件大丧事，对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广大人民来说就是一件大喜事。为了祝贺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为了从蒋介石“文告”这份反面教材中看清批孔如何使反动派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特在此发表评论。



抓大事 抓路线 抓政治思想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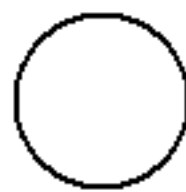
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

田志松

党的十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号召各级党委要注意抓大事，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在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过程中，我们应当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深刻领会抓大事对于反修防修的重要意义，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现在，一个批林批孔相结合的革命大批判高潮正在全国蓬勃兴起，这是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开展的一场新的进攻。批林批孔是当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抓大事，就要抓这件大事。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以及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他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孔决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这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反修防修的大事。各级党委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姿态，放手发动群众，认真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切实把这件大事抓紧抓好。

什么是大事？什么叫忘掉了大事？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毛主席曾经反复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可避免地



要反映到党内来，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为搞马克思主义同搞修正主义的斗争。毛主席经常告诫全党：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并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它有国内阶级根源，又有国际背景。修正主义者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相勾结，妄图在我国搞复辟，这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特点。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先后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个反党集团的斗争，都是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他们代表帝、修、反和国内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妄图通过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国就要沦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果实就要丧失。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抓大事，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可忘记反修防修，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从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革命，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革命也是这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一七八九年爆发到一八七五年第三次共和国成立，经过了八十六年，中间交织着复辟和反复辟，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内战和外战。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尚且如此，何况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革命，不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反复较量，胜利是不可能巩固的。我们一定要看到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看到反修防修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持不懈地反修批修。

党委要真正成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指挥部，就必须关心全局，经常讨论政治形势、政治路线、政治思想工作、党的政策等重大问题。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要着重于研究这些问题。如果整天埋头小事，不认真看书学习，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状况缺乏真切的了解，那么，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就会分不清阶级阵线，分不清路线是非，就会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这已为两条路线斗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所反复证明。毛主席曾尖锐地指出：如果“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



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毛主席的这段话，深刻指明了抓大事的重要性和不抓大事的危险性，是对全党同志深刻的教育。

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林彪之流，总是极力反对和破坏我们抓大事。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刘少奇就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既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那还有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事可抓呢？叛徒、卖国贼林彪居心险恶地叫嚷：我国已经“毫无修正主义”了，既然“毫无修正主义”，那岂不等于说没有反修防修、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大事了吗？这完全是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翻版。显然，这不过是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抓大事的一种手段，完全是为了骗人。林彪这个最阴险最毒辣的反动家伙，一面反对我们抓大事，一面把孔子复辟奴隶制度的反动纲领当作他的座右铭，不断鼓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就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事实上，林彪一伙在高唱我国已经“毫无修正主义”的和平曲的同时，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磨刀霍霍，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加紧策划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列宁曾经指出：“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刘少奇、林彪正是这样。他们破坏我们抓大事，就是为了干他们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大事。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他们这一套反革命策略，并与之划清界限，才不会上他们的当。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忘掉了抓大事，而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那么，不管自觉不自觉，客观上都是适应了阶级敌人的需要。

毛主席从来都是抓住大事不放的。我们党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兴旺发达，我们的国家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就是由于毛主席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这个纲，紧紧抓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教育全党，团结全国人民，打退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的代理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凡是关系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毛主席都是亲自抓的，而且是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的过程，就是毛主席领导全党抓大事的过程，这是最基本的事实，也是我



们最基本的经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就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妄图用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面对这样一个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毛主席亲自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刘少奇和林彪两个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了他们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受到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大大提高了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随着时间的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越来越明显；我们对这场伟大革命的经验的了解也将越深刻。如果说无产阶级过去已经有了打败阶级敌人从外部搞武装进攻的经验，那么，我们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进一步取得了粉碎修正主义妄图从内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我们要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深刻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

当前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同各条战线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密切联系着的。在如何对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新生事物上存在的斗争，在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斗争，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斗争，关于“走后门”等问题上同不正之风的斗争，以及城乡出现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都是尖锐、激烈的。我们不可丧失警惕性。抓好批林批孔的斗争，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去解决上述矛盾。我们必须继续抓紧批林批孔这件大事，深入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批林批孔，打退资产阶级各种形式的进攻。要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继续批判尊孔反法的反动思想，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党委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各项工作才能提起纲，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完成一项工作，需要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路线问题、政策问题。抓住了路线，就抓住了挂帅的东西，决定全局的东西，就能带动和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路线搞对头了，



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就能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各项工作就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不断出现新面貌。相反，党委不抓大事，不注意阶级斗争，不注意方向道路，即使主观上想把工作做好，结果总是适得其反，甚至会走到斜路上去。有些同志看不到大事，整天陷在小事里拔不出腿来，难道他那里不存在路线问题吗？当然不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工作都有一个为哪个阶级服务、对哪个阶级有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都离不开一定路线的指导，不是执行正确的路线，就是执行错误的路线，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执行某种路线。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对抓大事的认识，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不仅各项具体工作有路线问题，政治思想工作也有路线问题。抓大事，抓路线，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提起纲来。政治思想工作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为实现党在一定时期的政治任务服务。不抓大事，不认真研究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不分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现实表现和特点，政治思想工作就没有明确的目的和正确的方向。如果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离开了党的路线，离开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事论事地去做，触及不到资产阶级，无损于修正主义，那还有什么用呢？有些地方和单位也做政治思想工作，但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破得不力，无产阶级正气上不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能得到发挥，原因就在于没有抓大事、抓路线，没有举起纲来。可见，政治思想工作离开了大事，同样会走到斜路上去。

抓不抓大事，抓得好不好，对党委的马列主义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是一个实际的考验。要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就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它是披上马列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刘少奇、林彪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他们是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窃据了重要职务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常常利用我们的同志马列主义水平低的弱点，把唯物论、辩证法篡改为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把马列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刘少奇是如此，林彪也是如此。我们要抓大事，就包括要抓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件大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弄通了，才能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掌握抓大事的主动权。事关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局，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当认真刻苦地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



充分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岳 衡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工农业增产的潜力很大，要不断挖掘潜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使国民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需要我们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继续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二十多年来，在我们伟大的祖国，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胜利，这是连我们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是靠什么得来的呢？一没有靠对外扩张、掠夺的霸权主义，二没有靠乞求超级大国援助的奴隶主义。我们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的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群众。回顾过去的战斗岁月，帝国主义曾经长期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社会帝国主义也妄图卡我们的脖子，以为不拜倒在他们的脚下我们就不能过日子。但是，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不管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施展什么样的阴谋诡计，也没有能够阻挡全国人民胜利前进的脚步。我们不但没有被“锁”住，被“卡”死，日子反而越过越好。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群众、爱国同胞的共同奋斗，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日益巩固壮大，科学技术和文教卫生事业欣欣向荣。我国已经由一个极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变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证明，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广大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一切困难踩脚下，就能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人类的历史，社会的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这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历史上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抹杀这一真理。为



了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挽救他们濒于灭亡的命运，总是把他们自己及其代表的那个反动阶级吹嘘成历史的创造者，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孔子鼓吹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谬论，就是对剥削者的无耻吹捧，对劳动人民的恶毒污蔑，是为他反对封建制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目的服务的。所谓孔孟之道，就是主张倒退的反人民之道。叛徒卖国贼林彪同历史上所有没落阶级的代表一样，也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极力鼓吹反动的天才论，胡说“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孔孟之道的翻版，正好说明他是站在劳动人民对立面的反动派。我们要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就必须抓好批林批孔这件大事，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发挥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直接关系到能不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去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会反映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也会反映到经济战线的各个领域。搞建设，搞农业，搞工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要同自然界作斗争，更要同阶级敌人，同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旧习惯，以及代表这些势力的错误路线作斗争。这种斗争是坚持什么方向、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群众。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最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有了牢固的基础。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坚持这样做，取得了武装斗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时期，要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必须继续坚持这样做。正如党的十大文件所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



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是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这个方针建立在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基础之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只有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使这个方针得到落实。列宁说：“**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比历史上任何先进阶级都要高明得多，不仅有胆略、有力量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有志气、有能力建设一个新世界。“自力更生，力在群众之中”，“依靠群众，力量无穷，脱离群众，一事无成”，这是许多同志的切身体会。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成了国家的主人的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的锻炼和学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为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源泉，这个源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把这个伟大的源泉挖掘出来，就能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建立起独立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

有的人看不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发展生产的着眼点放在进口外国的技术、设备方面，这是被批判过的洋奴哲学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反映，它的错误在于见物不见人，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定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群众的创造力。这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在生产诸因素中，生产工具固然重要，但是，“**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任何生产工具都是由人创造和使用的。外国的机器设备和技术是怎么来的？不也是劳动群众创造发明的吗？“**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广大群众说得好：“不怕没机器，只怕没志气，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是最可宝贵的。有了这种志气，就不会在困难面前垂头丧气，也不会西方资产阶级面前卑躬屈膝。我们开发大庆油田，并且做到石油自给有余，并不是因为进口了多少机器，而是因为党的领导下，激发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志气。许多赶上和超过世界



先进水平的发明创造，也是发挥广大群众创造性的结果。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有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不断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志气，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在**洋为中用**方针的指引下，正确地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就能够造出更多更好的机器设备，发展现代科学技术，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做到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有的，我们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没有的，我们也有。

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农业生产，根本的一条是要发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有了这一条，不仅物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即使物质条件较差，实际困难较多，也可以依靠群众的干劲和智慧，想出各种办法来，使困难局面转化为顺利局面，使生产得到发展。湖南省发展小化肥生产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到依靠群众的过程。过去，这个省的化肥大部分靠国家调给。能不能改变这种状态呢？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有的同志看物质方面的困难多，看群众的积极性少，迟迟不能动手。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在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指引下，决心不吃现成饭，不当伸手派，积极要求自己动手办化肥。群众促进了干部，干部起来发动群众。没有设备，就用土办法解决问题，技术力量缺，就边干边学，群策群力，通过组织会战，开展协作，终于在较短时间内建成了八十多个小氮肥厂和一些磷肥厂，使全省化肥自给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事实告诉我们，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虽然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去强求生产建设的胜利，但是在一定条件的限度内，只要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却可以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有的单位，设备也是好设备，技术力量也不差，可是生产的步子却迈得不大。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那儿的群众没有积极性吗？不是的。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是一种客观存在。问题是要善于从本质上去发现这种积极性，通过政治思想工作去调动这种积极性。无论怎样落后的单位，都不是铁板一块，死水一潭，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广大群众对落后状况总是不满的，总是要起来革命的。这是本质和主流。所谓落后单位，并不是那儿的群众落后，而是那儿的**工作落后**，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揭露矛盾，



开展斗争，积极地正确地引导群众前进。“面貌变不变，关键在路线。”只要领导深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交给群众，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就能抓住问题的症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取得抓革命、促生产的胜利。

领导者的责任，不仅要看到群众的积极性，而且要善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曾经指出：“**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这就要求我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抓好政治思想工作。要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讨论国家大事，批林批孔，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根本上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群众的觉悟提高了，眼界扩大了，就能把本职工作同阶级的利益、革命的全局联系起来，为革命做工，为革命种田，为革命而工作，就会自觉自愿地为实现革命的总目标和党的各项任务而坚持不懈地奋斗。湖南益阳地区裕民煤矿坚持经常向广大群众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调动了广大群众为革命产煤的积极性。一九七〇年以来在超过设计能力的情况下，仍然连年增产，一九七三年的产量达到设计能力的两倍以上。许多这样的事实都生动地说明，只有坚持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做到基本路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才能使广大群众振奋起革命精神，焕发出冲天的革命干劲。

一提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有的人就想到奖金。到底是靠政治思想工作还是靠物质奖励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不是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反映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为了毒化人们的思想，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复辟资本主义，曾经极力鼓吹物质刺激那一套，无耻地污蔑群众想“多搞点钱”。在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文化大革命前，一些单位搞这个奖、那个奖，五花八门，评个不停。结果呢，钱发得越多，奖评得越多，带来的矛盾和麻烦也越多。不仅没有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反而使社会主义企业走上了斜路。这个历史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还不值得记取吗？那种所谓“花几个钱，能发展生产，划得来”的论调，值得大家驳一驳。所谓划得来划不来，不能看一时，而要看长远，不能光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靠奖金刺激起来的不



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能“积极”一时，不能坚持长久。我们要继续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黑货，同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我们也要关心群众生活，反对少数人的不正之风。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使群众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昂，才能使精神变物质，不断创造出精神和物质的成果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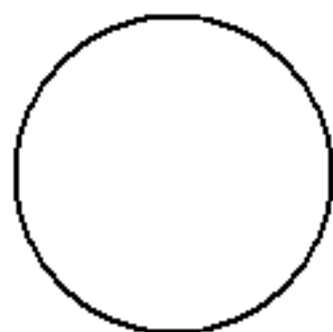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的正常进行，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但是，规章制度的产生和实施都必须通过群众。只有发动群众从实践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合乎社会主义生产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才是合理的；只有使群众认识合理的规章制度的重要性，才能把它们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这种规章制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如果企图不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而单纯依赖规章制度，通过行政手段，简单地规定几条，要群众照章办事，甚至把它当作对付群众的“紧箍咒”，那就非但不能发挥它的作用，相反会挫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中，通过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斩断了束缚群众手脚的无形绳索，群众自己起来根据革命和生产的需要，逐步制订出一些比较合理的、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得到广阔的发挥，技术革新的鲜花到处盛开，新技术、新产品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和放松政治思想工作。

从根本上说，政治思想工作，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党的基本路线，去回答、解决人们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工作有没有成效，就看对问题回答得对不对，解决得透不透。这就需要我们善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道理。有的人因为做了一两次思想工作收效不大，就埋怨政治思想工作不灵，这是错误的。不是政治思想工作不灵，而是思想路线不正确，工作方法不对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对的，问题是要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只要我们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又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在想什么，抓住了思想战线上的关键问题，并且实行以理服人的方法，有分析有研究地摆事实讲道理，不搞大帽子压人，善于“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那么这样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没有什么不灵的，就能够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引到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勤俭种田 越种越甜

——湖北崇阳县后溪大队的调查报告



崇阳县后溪大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集体经济日益巩固壮大。一九七〇年以来，特别是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以来，这个大队在连续三年粮食超《纲要》的基础上，去年又战胜洪水灾害，夺得了丰收；粮食亩产跨过了千斤，生产成本不断下降，集体储备粮和公共积累增多，社员收入普遍增加。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抓住路线，面貌大变；勤俭种田，越种越甜。”

后溪大队生产条件较差，前山靠后山，九垄十八冲，粮食产量一直比较低。人民公社化以来，这个大队的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著作，奋发图强，发扬“穷棒子”精神，带领群众，勤劳苦干，初步改变了贫穷面貌。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在后溪大队一度出现了一股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不讲实效、搞形式主义的歪风，冲击了勤俭办社的方针，破坏了艰苦奋斗的传统。有的队不搞积肥，禾苗长得不好，就突击施化肥，扩大开支，还减了产。还有的队资本主义泛滥，把集体的钱挪用搞贩卖，修房盖屋，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损害了集体经济。

通过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后溪大队党支部认识到：勤俭办社，事关路线。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不仅是增产几斤粮、节省几个钱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能否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勤俭节约还是铺张浪费，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经济领域内的反映。因此，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必须抓



好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联系实际，运用典型，经常对社员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

一九七三年，他们提出了大干苦干，粮食亩产突破千斤关的要求。这时，有的人说：“本大利大。要想产量高，就得多花钱。”也有的说：“集体钱多，只要舍得，多买点化肥，就解决问题。”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的教导，发动群众围绕“夺高产要不要降低成本”的问题开展讨论，并运用四队和七队的事例进行对比分析。这两个队一个粮食产量高，成本低；一个粮食产量低，成本高。事实说明：成本高不一定有高产量，高产量不一定要高成本；夺高产主要是靠群众的积极性，靠艰苦奋斗，科学种田。通过学习讨论，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勤俭办社的自觉性。一九七三年第四生产队更上一层楼，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七十斤，生产成本继续下降。第七生产队也赶了上来，亩产达八百八十斤，成本也降了下来。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群众认清了勤俭办社的重大意义，树立了艰苦创业的思想，许多勤俭夺高产的办法就出来了，许多困难就得到了顺利解决。在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这个大队共修小型水库和塘堰三十二处。开始修第一个水库时，有的人想靠国家投资，后来大家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没有钱买雷管、炸药，就自己动脑筋制作；没有水泥，就用石灰、沙子、黄泥做成三合土代替；没有涵管，就自己烧砖来砌。这样，群策群力，苦战几个冬春，全大队的水利建设搞起来了，初步改变了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过去，这个大队添置农具都是花钱买，有的农具坏了，就到外地请人来修理，这样既增加支出，又影响使用。近几年来，他们坚持自造自修为主，还培训了十五名铁匠、木匠、篾匠，实行亦工亦农，就地修造。同时加强农具管理，做到勤收捡、勤保养、勤修理，延长了使用时间。

办农业，大的方面要节约，小的方面也不能忽略。比如，买一条犁盘绳或牛绳只几角钱，看起来花钱不多，其实积少成多，过去，第四生产队买这些东西，每年都要花八十多元。去年，他们所需要的犁盘绳是上山割的藤子，只用了两个



工；所需要的牛绳也是自己搓的，只花了七元钱买龙须草，一年就节约了七十多元。仅这两项不引人注意的开支，全大队就可节省五百多元。

坚持勤俭办社，关键在于干部自觉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五个委员，有四个是长工出身。几年来，他们经常忆苦思甜，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作计划，办事情，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壮大集体经济出发，不讲排场，不摆阔气，尽量压缩非生产性开支，不乱花一分钱。大队办公室是借的一间房子，办公用具很简单。这个大队离县城二十多里，交通方便，干部到县城开会或因公出差，总是步行，没有在队里报销过一张车票。有人问，为什么不搭车？他们说，社员进城积肥，都是步行来去，我们上县城开会，为什么不能步行？大队按规定提成的行政管理费，年年有节余。

这个大队干部以勤劳俭朴、廉洁奉公为荣。大队七个主要干部，几年来平均每人每年参加集体劳动二百四十天以上。干部劳动上带头，生活上也不搞特殊化。有一次，党支部书记的两个小孩病了，队里干部见他有困难，借十元公款帮助他。他说：“借支十元钱要经过群众讨论，这是我和社员一起订的财务制度，我们当干部的不能特殊。”全大队党员、干部五十六人，除两人家口多、确有困难，有点超支外，其余五十四人没有超支、挪用队里一分钱。

党支部还依靠群众，实行民主理财。他们坚持每月集中生产队会计清理账目、审查开支，及时张榜公布，自觉接受群众的检查和监督，严格财务制度；经常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拒腐蚀、永不沾的思想教育和遵守财务纪律的教育，及时纠正不正之风。大家说：“社员创造的集体财富，我们一分一厘不能挪用浪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我们每时每刻都要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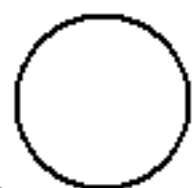
干部带头勤俭办社，教育和带动了群众。大家丰收不忘节约，富日子当穷日子过。遵照毛主席关于“广积粮”的教导，坚持年年节约一点，多卖一点，储备一点。一九七〇年以来，除完成征购任务外，卖给国家超产粮十八万斤，集体储粮十五万斤，社员储粮八万斤。

中国共产党崇阳县委员会调查组



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洪 城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革命纪律。后来，经过发展和补充，一九四七年十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四十多年来，在我军的发展史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它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加强军民、军政、官兵之间的团结，瓦解敌军、壮大自己，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起了伟大的作用。

今天，我军担负着对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的新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按照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继续发扬过去的光荣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都高度统一，步调一致，为反修防修、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在我军建军之初，毛主席就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一九四五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论述人民军队的宗旨时，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为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毛主席亲自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这条路线，明确规定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提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坚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军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广大指战员的头脑，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等。毛主席所制定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是我军的生命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这条建军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订，生动地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建军宗旨。由于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就决定了它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统一指挥，执行严格的纪律；由于这个军队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就决定了它必须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正确处理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正确执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抓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和执行，就可以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大大推进一步。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正因为纪律对于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十分重要，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反对党的正确路线的同时，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党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订和执行过程，就充满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激烈斗争。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阐明了建设人民军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批判和纠正了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为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几十年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是我军广大指战员的行动准则，在长期的执行过程中，已经成为我军的光荣传统。从工农红军发展到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尽管这支部队在人员、环境、编制、装备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却作为革命的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不断发扬光大。经过全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实践和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全国人民中间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他们学习人民解放军好传统、好作风的一个重要内容。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疯狂地破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我军历来的光荣传统。但是，林彪却炮制了一个反动透顶的缔造者不能指挥的谬论，阴谋搞反革命政变。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策划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间，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并特别强调要记清和执行三大纪律第一条，八项注意第一条、第五条。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有力地鼓舞和指引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斗争。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他们的罪恶活动被彻底揭露。林彪妄图“**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只落得个投敌叛国、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我们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为



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彻底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当前最重要的是抓好批林批孔。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是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纲。同时，我们要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我军永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这样，才能更好地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条条要执行。首先要牢记和执行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一条最要紧。

“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要贯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毛主席指出：“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必须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战争和战略问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才能做到一切行动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任何背离党的领导、不听党的指挥的行动，都将极大地危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导致对于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破坏。

我党我军半个世纪以来的战斗历程证明：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领导，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一切行动听指挥”，也就是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听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听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挥。毛主席、党中央指向那里，就战斗到那里；赋予什么任务，就坚决完成什么任务。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可南可北，可东可西。只要全军上下步调一致，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八项注意，首先要牢记和执行第一条、第五条，即“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这就是说，对战士，对下级，对人民态度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坚决克服军阀作风。这两条讲的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处理好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的大问题。毛主席说：“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论持久战》）只有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才能有效地做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处理官兵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树立尊重士兵的观念。官长必须爱护士兵，把战士看作阶级兄弟，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待战士、对待下级。要采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处理和解决问题，而决不允许采用命令主义的、压服的方法。要认真听取来自战士和下级的批评建议，虚心接受他们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

处理军民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树立尊重人民的观念。军队必须爱护人民，认识到自己是人民的子弟兵，使军队在人民的眼里看成是自己的军队。我们军队来自人民，受人民群众哺育，如果不尊重人民，瞧不起人民，就是忘本。我们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如果我们对为之服务的对象都不尊重，自以为高于人民一等，怎么能谈得上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以至不惜流血牺牲呢？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无论是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还是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我们取得胜利的決定因素之一，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充分支持和配合。因此，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必须解决尊重人民这个根本的态度问题。军爱民，民拥军，军队和人民群众真正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会被我们所压倒。

打人骂人的军阀作风，是国民党作风，严重违背我军的宗旨。军阀作风是剥削阶级军队的特征之一。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是根本对立的，他们压迫人民，他们的纪律只能靠打骂来维持。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根本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纪律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在军队内部，无论是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还是在军队和人民之间，都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奋斗。这是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政治基础。如果我们的同志不以平等待人的态度来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和军民关系，势必违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脱离群众，使自己处于同群众相对立的地位。

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十分重要。我军各级领导干部不仅是党的路线、政策的执行者，而且是带领群众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政策的组织者，他们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广大群众的行动。领导干部自觉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下级，为战士，为群众做出了榜样，就会在本地区、本部门形成人人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生动局面。

让我们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歌曲，深入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斗争，满怀信心地去完成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锄毒草 化肥料

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

——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人民日报》评论员

自从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五星红旗，新中国宣告诞生的一天起，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就对我们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抱有不同的态度。亿万革命人民和广大国际朋友表示赞扬和同情，而一小撮反动势力则表现出极端的恐惧和刻骨的仇恨。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大革命所必然遇到的一种现象。去年开始在一些西方国家放映的、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就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安东尼奥尼是在一九七二年春作为我们的客人到中国来的。他带着摄影机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但是，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



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一)

影片摄制者在解说词中说，他“不打算评论中国，而只想开始观察中国的各种面目、姿态和习惯”。这完全是骗人的。这个所谓“纪录片”，每一个镜头都有评论，这是借用反动艺术手法污蔑和丑化中国的极其恶毒的政治评论，是肆无忌惮地公开露骨地反华反共反革命的政治评论。

影片的镜头从北京天安门开始，看起来似乎是很自然的，其实，这种安排却是为整个“纪录片”的反动主题服务的。影片说，“北京是中国政治、革命的中心”，“人民共和国就在天安门宣告成立”，“文化革命的红卫兵浪潮也在这里兴起”。然后，影片“离开天安门”，带领观众开始“观察”中国，也就是要人们看看中国革命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接着就展开一连串的反动画面，把新中国糟踏得不象样子。影片的这种结构和布局，纯粹是为了把攻击矛头集中地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咒骂革命，否定革命，反对革命，就是这部影片的要害所在。

反动影片《中国》全盘否定和完全抹煞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往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安东尼奥尼把上海作为“工业化的大城市”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明明上海有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的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影片的摄制者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上海的工业“并非产生于今天”，“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而解放后“仓促建立起来的工业往往只比大的手工业工厂好些”，“上海最大的炼油厂，也是一个可怜的厂，几乎是用废料建成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大肆炫耀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华的“功劳”，竭力贬低我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伟大成就吗？影片中还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拍了一些丑



化劳动人民的镜头。作者的险恶用心是要暗示，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岂不可想而知！

安东尼奥尼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他大肆渲染林县“农民的贫困”，把一个山村说成是“荒凉和被抛弃的地方”，把一所乡村小学竭力加以丑化。安东尼奥尼还恶狠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想发现一个农村‘天堂’，那就天真了”。这不是赤裸裸地诬蔑解放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农村是人间地狱吗？

这部影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诋毁和污蔑是多方面的。从城市建设到人民生活，从文化教育到体育运动，从医疗卫生到计划生育，以至幼儿园，统统不放过。

影片完全无视我国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渲染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住屋“非常简陋”，“城市规划化令人失望”；苏州“同它的古老的面貌差异很小”；上海城市面貌的改变，不过是昔日“西方的经济帝国”在租界修建的房子“今天成了办公楼”。

影片竭力否认我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说什么“北京人是贫穷的，但并不悲惨”。承蒙这位导演先生手下留情，还说我们不算悲惨；但他的真意是嘲笑我们“贫穷”。他不是在城市和乡村拚命捕捉一些镜头，攻击人们“衣服破旧”，“劳动繁重”，诬蔑在中国到处都可以遇到“穷人”吗？所有这些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老爷的腔调！

安东尼奥尼所以把解放后的中国描绘成这样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无非是要人们得出中国不应当进行革命的反动结论。他攻击人民公社经历了“失望”，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生产系统”，使前人遗留下来的古迹已剩下“寥寥无几”，甚至借用打太极拳的镜头，造谣说“新的领导人”要“取消”这一“古老的传统”。总之，在安东尼奥尼这个反动分子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中国的革命搞糟了，只有倒退，只有复旧，才有出路。这就充分暴露了挂着“左派”招牌的安东尼奥尼的反革命真面目。



(二)

安东尼奥尼为了诋毁中国革命，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影片中对中国人民的形象和精神面貌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他企图通过影片制造这样的假象，似乎中国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地位，没有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到解放，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没有热情的。

全世界都看到，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在我们的国家，“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但是，安东尼奥尼却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好吃喝，浑浑噩噩的人群。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在林县，安东尼奥尼突然闯入一个山村，把摄影机对准那里的群众，当群众反对他这种手段时，他就诬蔑群众的反应是“有的恐惧，有的害怕”，“经常是麻木不仁和毫无表情”。安东尼奥尼大摆其“欧洲人的自傲”的架子，处心积虑地往中国人民脸上抹黑，这是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

更刻毒的是，安东尼奥尼还用拐弯抹角的语言、含沙射影的手法来向观众暗示，中国人民的精神是受压抑的，心情是不舒畅的，对现实是不满的。他在上海城隍庙茶楼的画面中插入了一句不怀好意的旁白：“这里的气氛稀奇古怪”，“既想念过去，又忠于现在”。他在这里说的所谓“忠于现在”不过是一句反话，实际上是要诬蔑中国人民对新社会的拥护是出于被迫的，并非真心实意。安东尼奥尼不是在影片中一再渲染中国人民是不自由的吗？他公然嘲讽工人讨论会的发言“重复而单调”，“不是一个真正的讨论会”，诬蔑中国儿童高唱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政治性”歌曲同他们的天真可爱不相容，因而并非发自内心。他还胡说由于人们的“谨慎”“使人几乎觉察不到他们的感情和痛苦”。在他看来，中国人民是有着不满现实的莫大“痛苦”的，只是不敢表达出来而已。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局面生动活泼，广大人民享受着真正的民主，心情无比舒畅。安东尼奥尼企图钻空子，煽动中国人民



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只能是枉费心机。感到“痛苦”的则是一小撮妄想在中国复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派。至于说什么中国人民“想念过去”，这更是污蔑。什么人“想念过去”？中国人民对百年魔怪舞翩跹的“过去”，是深恶痛绝的，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才念念不忘他们失去了的“天堂”，朝朝夕夕梦想使中国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拉不回来的，任何企图开倒车的人，必将被历史的巨轮碾得粉碎！

(三)

安东尼奥尼拍摄影片《中国》所采用的手法，也是极端反动和卑劣的。

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旧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在整个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象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而他认为可以用来污蔑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东西，则又是全景，又是特写，不厌其冗长。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影片关于天安门广场的描绘更是十分可恶。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而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象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在影片的剪接上，画面跳来跳去，好象是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其实每一个片段的衔接，都是恶意安排的。比如，影片拍摄者先是向观众介绍十三陵地下宫殿陈列馆中反映明朝劳动人民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泥塑群象，讲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惨，然后镜头一转，就出现一队青年学生扛着铁锹下乡参加劳动的情景，再转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用一位女社员在劳动中擦汗的镜头，来宣扬什么“日常的田间劳动是劳累繁重的”，并且叫嚷中国农村没有“天堂”！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今天中国农民的境遇比几百年前封建社会的农民好不了多少。

影片在光线和色彩的运用方面也是很坏的。影片的大部分都以灰暗的光线和阴冷的色调拍摄。黄浦江象笼罩着浊雾，北京的街道被抹上一层青光，林县的山



村阴影重重。总之，许多画面给人以惨淡、凄凉、阴郁、冷酷的印象。尤其恶劣的是，影片摄制者还利用配乐作为进行诽谤的手段。他在影片中没有拍过我国一个革命样板戏的镜头，却拿样板戏的一些唱段肆意嘲弄。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据有关单位揭露，这种剪接完完全全是伪造的。这是蓄意污蔑我们的革命样板戏，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真是恶毒透顶！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怀有敌意，这从他在中国的拍摄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他在解说词中公开宣扬有很多镜头是象间谍那样偷拍的。他得意地说，他在黄浦江如何“冲破禁令偷偷地拍摄了”中国军舰；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如何“把摄影机掩盖住”，“冷不防地抢摄这里的生活场面”。他还埋怨说“带着摄影机在前门大街那里行走是不方便的”。什么不方便？就是做贼不方便。更有甚者，他为了炮制污辱中国人民的镜头，在北京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竟然要别人制造社员打架的场面，让他拍摄；在另一个场合，他还要群众按照他的口味改换服装，否则拒绝拍摄。他的这种偷拍、强摄、作假的行径，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尊重和藐视。

(四)

反华影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它的国际背景的。

近些年来，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想孤立中国、颠覆中国的阴谋遭到可耻的破产。但是，我们的敌人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攻击中国革命，污蔑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他们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使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舆论准备。

人所共知，苏修叛徒集团是国际上反华的急先锋和总后台。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使出浑身解数，对中国人民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他们说，中国人穷得喝大锅清水汤，连裤子都没得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新的破坏”；中国人民“疲困不堪”，处在“严重的苦难”之中，过着“兵营式的生活”，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愚蠢的诽谤，只是暴露了苏修叛徒们的丑恶面目，



而没有使他们捞到任何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上，苏修的反华谎言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东尼奥尼的反动影片披着“客观”、“真实”的外衣来欺世惑众，又把苏修这一套造谣诬蔑搬出来，妄图起苏修反华宣传所不能起的作用。安东尼奥尼实际上不过是充当了已经破产的苏修反华宣传的应声虫。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出笼之后，美国广播公司花了二十五万美元重金购进这部影片，并在美国公开放映，还有人帮腔说这部反动影片是“吸引人的”。看来，杜勒斯的阴魂仍然附在一些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身上，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的出现，也适应了这些反动势力的需要。

安东尼奥尼是一个意大利人，但是，他决不能代表千百万对中国人民抱着友好态度的意大利人民。反华，这是广大意大利人民决不会同意的。安东尼奥尼拍摄这样的反华影片，同意大利人民和中国人民要求加强友好关系的愿望，显然完全背道而驰。

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互相了解。在同各国人民的交往中，我们从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我们一再指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从不隐讳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前进中的缺点，还有落后、反动的东西，需要继续革命。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欢迎各国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但是，谁要是冒充“朋友”而实际上却干着卑鄙的反华勾当，去博取极端仇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喝采，我们就要给予彻底揭露，以剥夺其招摇撞骗的资本。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好往来。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告诉人们，在目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下，必须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世界上总有敌视中国人民的势力，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反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华的好汉，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管使用什么武器，玩弄什么手法，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中国人民将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的：“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原载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 国际述评 ·

在所谓“能源危机”的背后

常 谦

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能源危机”。石油供应的短缺,使它们从生产到生活都受到了“石油震荡”的冲击。工厂因电力不足而关闭,汽车因缺少燃料而停开,室温降低,灯光不亮,物价随着油价迎风飞涨,股票行市则因经济前景不妙普遍下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也受到了“能源危机”的影响。“能源危机”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实经历着一个“最寒冷的冬天”。《红楼梦》中有“昏惨惨似灯将尽”之句,借用来刻画混乱黑暗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及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阴暗心情,是非常逼真的。

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国外的资产阶级报刊,有的把它说成是自然资源的原因,是什么“能源的枯竭”,有的则荒唐地把它归罪于阿拉伯人民使用了石油武器。这些说法或者回避要害,或者嫁祸于人,无非是故布迷阵,用以混淆视听而已。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前的“能源危机”主要表现为石油的供应不足。从现象上看起来,似乎是自然资源的问题,实际上根本不是。世界上包括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能源充裕得很,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可以用上千年。何况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人们正在发现并必将继续发现新的能源。资本主义世界的“能源危机”,从本质上看,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反映,是资本帝国主义制度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垄断资本对国内外人民残酷剥削和疯狂掠夺造成的,在当前,又是美帝和苏修两个超级大国疯狂对外扩张和争霸世界的直接结果。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资本论》)追逐高额的垄断利润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本性。对能源的开发,资本家考虑的不是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而是如何能攫取更多的利润。各种能源的消长变化,常常取决于利润的大小。以前,煤炭曾经是主要的动力来源,是“工业



的粮食”。至今煤炭的蕴藏量仍然丰富得很。但是，煤炭工业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普遍衰落了。即使在煤炭蕴藏量最大的美国，它在能源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现在也仅占五分之一。原因是从获取利润的角度来看，采煤远不如采油划算，因而得不到资本家的青睐。从油页岩、油砂中也可提炼石油。目前世界已知油页岩和油砂的含油量，要比石油的蕴藏量高出好几倍。但也由于不如直接开采石油的利润高，满足不了资本家的贪欲，同样受到了资本家的冷遇，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资本主义就是浪费。在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生活上的穷奢极侈，都浪费着大量的石油。石油矿脉由于胡乱钻井而被破坏，油井由于拚命放油造成压力降低而开采不出来，如此等等，致使大量宝贵的石油白白弃之于地下。据估计，美国现在的石油回采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五，也就是说，每采出一吨石油，就废弃了两吨。至于使用上的挥霍浪费那就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了。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非生产用电已占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美国报刊也承认，美国的能源消耗有一半是浪费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到处发动侵略战争，更是消耗和浪费石油的无底洞。这就是为什么当世界上的能源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丰富而多样的时候，在号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竟会发生“能源危机”的根本原因。正象有的美国人所说：“这不能怪大自然母亲，而是怪山姆大叔。”

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掠夺。由于石油在经济上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由于到国外掠夺石油可以比在国内赚更多的钱，垄断资本家放着国内的石油不去开采，而蜂拥到第三世界去抢地劫油。他们特别看中了拥有丰富的石油宝藏和在政治上、地理上占着重要战略地位的中东。在已探明的世界石油蕴藏量中，中东占三分之二。那里油层浅，钻井成功率高，出油量大，加上廉价的劳动力，开采的成本极低。如在科威特开采一吨石油的成本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这样，中东石油就成了外国垄断资本掠夺暴利的摇钱树，中东成为帝国主义各国长期争夺的焦点。二次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中东石油资源的最大掠夺者。目前，有一半以上的中东石油生产被控制在美国垄断资本手中。一九七二年底美国在中东石油的私人直接投资累计为十八亿美元，而当年获取的利润竟达二十四亿美元，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一百三十，是其海外全部投资平均利润率的十倍。战后帝国主义一时的虚假繁荣，就是建立在掠夺第三世界人民资源和血汗的基础上。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样受着帝国主义规律的支配，也以很大的野心参加到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列。它自己的石油资源有的尚且无力开采，要到西方国家去招徕和叩求投资，但对中东石油却早已垂涎三尺，拚命向中东渗透，与美国争夺



中东石油霸权。又是“军援”，又是“经援”，不惜工本，大下赌注。它大搞“军火换石油”、“机器换石油”的掠夺性买卖，并从投机倒把中，攫取高额利润。仅倒卖一个国家的天然气，苏修就赚到了百分之三百的惊人利润。苏修掠夺中东石油的奸诈手段，比起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长期以来石油问题上的真正受害者，是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产油国。拥有和提供大量石油资源的中小国家是不发达的穷国，而消耗它们提供的大量石油的国家却成了发达的富国。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正是这种不合理的状况，迫使第三世界产油国起来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而斗争。阿拉伯国家这次同仇敌忾，拿起石油武器，通过削减生产，提高油价，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这是美苏两霸在中东又勾结又争夺的直接结果。由于中东所处的战略地位和拥有的石油资源，两霸都必欲夺得中东。中东问题的背后实质上是石油问题，而石油问题又是和争夺世界霸权紧密联系着的。正如一家西方报刊所说：“谁占有石油，谁就控制世界，特别是控制靠东方提供石油的欧洲”。正由于此，两霸完全不顾阿拉伯人民的利益，长期在中东搞不战不和，支持和怂恿以色列的侵略。这种状况，逼得阿拉伯国家起来反抗。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两霸再也不能完全控制中东局势和为所欲为地掠夺别国了，石油危机不过是反映了它们的霸权危机。

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在资本主义世界引起的震动，更加清楚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现在世界上究竟谁养活谁？过去，帝国主义者一直宣扬是它们养活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如果离开它们的“援助”，这些国家的人民连一天也活不下去。现在，石油斗争再次告诉人们，原来，离开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奴役和剥削，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才真是连一天也活不下去，它们完全是叮在发展中国家人民身上的寄生虫。它们的富，是掠夺来的富，而第三世界的穷，完全是被它们剥削和掠夺造成的。石油斗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民的觉悟，加强了人民的团结，这一点将会对各国人民的斗争产生深远的影响。

“能源危机”是当前天下大乱的一种表现。它又必然会使世界形势继续朝着动乱的方向变化。现在，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都在激化，特别是美苏两霸与各国人民的矛盾以及两霸之间的矛盾发展得更尖锐了。美苏在中东的争夺，剑拔弩张，愈演愈烈。它们是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的。现在美国垄断资本的代言人所以大肆渲染“能源危机”，其目的除了在国内向人民开刀以转嫁危机牟取暴利之外，主要是对第三世界施加压力，加强与苏修的争夺，以维护在中东的既得利益。苏修为了与美国争霸中东，在对阿拉伯人民搞假支持真出卖的同时，则竭力散布所谓中东



石油“国际财产论”。它声称：“尽管阿拉伯石油在形式上是阿拉伯财产，但是实际上是国际财产”。显然，这一谬论的矛头针对着阿拉伯世界，宣扬帝国主义的“掠夺有理”。同时，它也指向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石油霸权，你不能独占，要“利益均沾”。这种帝国主义的论调，既说明了它是阿拉伯人民的凶恶敌人，又暴露了它继承老沙皇的衣钵，向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扩张的狂妄野心。但是，时代不同了，阿拉伯人民已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已经拿起了石油武器和其他武器，为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生存权利而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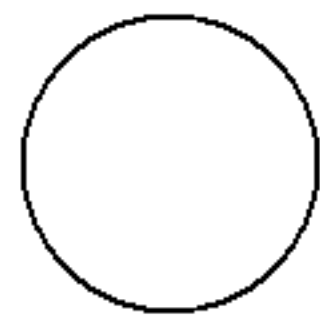
至于西方所谓世界能源即将枯竭之说，则完全是没落阶级的杞人忧天。它们总是把自己的危机和灭亡，说成是世界末日的来临。物质不灭，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能源是无穷的，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也是无限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从钻木燧石的莹莹之火，到今天的煤炭、石油、原子能和太阳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但能源的种类在不断增加，就是各种能源的用途也在发展扩大。因此，在能源问题上的一切悲观论调，都是毫无根据的。问题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能源的开发利用就和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先进的社会制度，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则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前进。就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吧。我国地大物博，蕴藏丰富，各种自然能源都有。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不仅掠夺走我国的大量宝贵能源，还给我们戴上“贫油国”的帽子。解放后的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自然能源不断涌现，不断开发。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过去完全依靠“洋油”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我国的石油不仅已能自给，而且还有出口。在能源的开发利用上，中国人民正谱写着崭新的篇章。

“能源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世界上决不会有什么“能源枯竭”，而只是资本主义“**这个反革命制度已经枯竭了，它的社会力量已经枯竭了**”。（列宁：《今日俄国和工人运动》）它是帝国主义进一步走向没落的鲜明标志。不管资本主义世界的能源供求今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则是**确定无疑、改变不了的**。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世界正在**动乱中前进**。人民是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最伟大的动力。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终将埋葬万恶的造成各种危机的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人类一定会沿着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大道迅跑，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创造出今天甚至难以想象的奇迹来。



红旗



一九七四年 3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三期 目 录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短评：**认真学 深入批** (3)

批“克己复礼”

——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人民日报》社论 (6)

孔子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康 立 (8)

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

.....辽宁大学 李 时 (15)

批林批孔是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燕 枫 (22)

揭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实质

.....上海吴泾热电厂 郭企元 (27)
 上海重型机器厂 黄土耀

从“天马”的下场看天命论的破产

.....内蒙古阿巴嘎旗 乌云格日勒 (30)

污蔑劳动人民就是反对革命

.....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六号门工人评论组 (33)



我们革命妇女最恨孔孟之道……………大寨大队铁姑娘队 (37)

放手发动群众 掌握政策界限

……………中国共产党上海第五钢铁厂委员会 (40)

联系路线斗争实际批林批孔

……………河北安平县南王庄大队党支部 (45)

反修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辛 风 (48)

锄毒草 化肥料

到底是谁家的“工具”？

——评安东尼奥尼的“申辩”……………华 言 (55)

评晋剧《三上桃峰》

……………初 澜 (60)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从农业出发办好地方工业

……………庄 宇 (66)

让工农兵英雄形象牢固地占领故事片阵地

……………江 天 (72)

科 学 史 研 究

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和改造

……………李之棣 (77)

☆ 三 月 三 日 出 版 ☆



毛主席语录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认真学 深入批

(短评)

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发展着。广大工农兵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投入战斗，有力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也积极行动起来，形势一片大好。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以后，斗争锋芒直指林彪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直指林彪宣扬的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同时在各条战线上对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给以有力的回击。深入开展这场运动，必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始终要抓好的重要问题。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孔孟之道作为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革命人民要战胜它们，批倒它们，也必须掌握自己的理论武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我们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真正学到。结合批林批孔，认真看书学习，才能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不致迷失方向。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揭露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



反动本质。广大群众深切体会到，林彪所鼓吹的孔孟之道，虽然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只要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武器，进行阶级分析，并联系到这些黑话出笼的历史背景，揭露林彪反党集团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罪行，就能抓住它们的反动本质，使它们原形毕露。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必须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反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把学习和批判紧密结合起来。要用学习来带动批判，用批判来促进学习，边学边议边批。这样才能批得准，批得深。我们党的历史证明，每一次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同时也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在斗争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是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重要任务。

批林批孔，必须以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作指导，紧紧抓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林彪宣扬孔孟之道的内容很多，中心的一点是“克己复礼”，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要按照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个极其反动的政治主张办事，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让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我国反动统治，使我们的国家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要“兴”的是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他要“继”的是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之“世”，他要“举”的是牛鬼蛇神包括王明之类汉奸卖国贼这帮“民”。这是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所在。抓住这个反动实质，才能打中要害。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首先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反复批，深入批，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就认识得更清楚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的重要性就更明确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体会就更深刻了。对于林彪所宣扬的孔孟之道的其他各个方面，也要围绕“克己复礼”这个中心，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一条一条地进行批判，从政治上、从思想理论上进一步加深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的认识，使革命大批判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要把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引向深入，必须联系实际，即联系当前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两个阶级、两条道



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存在，这是客观的事实。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正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林彪虽然早已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了，但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没有肃清，他所代表的国内外反动势力，也没有停止过向无产阶级进攻。**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批林批孔都要联系到路线问题。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最关紧要的问题。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更要警惕和反对修正主义思潮。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肯定还是否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是支持还是敌视，归根到底是一个路线问题，是坚持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问题。这些都是大是大非，必须通过群众性的批林批孔斗争，加以解决。要牢牢掌握批林批孔这个中心，防止纠缠于某些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在斗争中，要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批林批孔搞得越好越深入，群众干部的觉悟就越高，就越能搞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一些人民内部的问题，可以在批林批孔的战斗过程中求得正确解决。

群众运动起来以后，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就成为指导运动的重要方法。典型是体现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具有很大的鲜明性。认真抓好典型，做到“**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在批林批孔群众运动中，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注意不断总结**经验**，抓好典型。还要组织一些有较深刻分析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批林批孔文章，以促使运动的深入发展。

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要以积极的态度，深入到群众中去，同群众一起战斗，并在斗争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只要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认真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各项部署，波澜壮阔的批林批孔运动必将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深入开展起来。



批 “克己复礼”

——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人民日报》社论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兴起。

当前，许多地方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首先集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效果较好。

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他把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这面破旗，视为至宝，称为万事中的大事。在九大以后，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到一九七〇年元旦，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林彪及其死党就写了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林彪“复礼”的政治纲领，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他对抗毛主席的多次指示，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名正言顺”地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林彪“复礼”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他把自己吹成“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天马”自居，自比文王，为他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他接过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狂妄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林彪这条“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在中国搞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早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就告诫全党：“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



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更是一次尖锐复杂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抓住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深入地进行批判，就能进一步认清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这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极为重要。

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妄图复辟修正主义那一套的罪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恶毒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种种谬论，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坚持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罪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总之，要通过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广泛深入地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各项工作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批林批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这是我们战斗的武器。我们要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学好学通，批深批透。在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时，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著。这样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理解反对修正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战斗任务，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紧紧掌握批林批孔这个中心，放手发动群众。要把革命大批判一步步地持久深入下去，防止纠缠于某些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要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能够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的。只要我们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就一定能使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

（原载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孔子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

康 立

王明、刘少奇、林彪这类机会主义头子，都是一小撮政治骗子。如果我们穷根究底的话，在中国，他们的祖师爷应该推孔老二。研究孔老二这个历史上的骗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识别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

大凡政治骗子，总有一套骗术。他们在骗人时都道貌岸然，信誓旦旦，装得一本正经。孔子和儒家之徒，明明是一批说假话的专家，但是在嘴上挂着的，或者在公开文书中写着的，总是一个“信”字。一部《论语》中，讲到“信”的地方有三十八处之多，什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什么“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说来说去，无非是表示他们的说话是算数的。有一次，孔子由于经常言行不一而遭到了他的学生们的怀疑，他竟当着许多人的面，捶胸顿足，发誓赌咒地说：“你们这些小子，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的吗？我对你们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论语·述而》）其实，孔丘此人，历来是极不老实的。他公开宣称：做父亲的偷了羊，做儿子的应当替他隐瞒。反之，儿子犯了罪，父亲也应当替他隐瞒。这就是真正的“正直”（《论语·子路》）。看，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的逻辑吗？

孔子同一切政治骗子一样，把说假话，耍两面派，看作是做人的诀窍。他的学生中有个叫子贡的问他：什么样的人才可算“士”？孔子回答：只有那些维护奴隶制的忠臣、孝子才可称为“士”。至于“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说到做到，那只不过是卑贱而又固执的“小人”罢了，根本不配当没落奴隶主阶级的谋臣（《论语·子路》）。总之，不骗人，就成不了“君子”，当不了野心家。他还公开鼓吹同党内部也要相互欺骗，说：“可以同他一起求学的人，未必能和他走同一条道路；能



和他走同一条路的人，未必能同他一起依礼而行；能同他一起依礼而行的人，未必能让他知道内情，参与机谋。”（《论语·子罕》）孔子认为，即使是同党也不能信任，必须各自心怀鬼胎，尔虞我诈。深得孔门心传的孟子，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政治骗术，厚颜无耻地提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离娄》）。这就是说，凡是开历史倒车的“大人物”，说话不一定要兑现，行动不一定要做到。这是赤裸裸地提倡骗子哲学。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对这套骗术揣摩备至，心领神会。他把“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收辑在精心编纂的《四书集句》内，奉为至宝，并且宣扬：“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由此可见，这伙政治骗子是依靠说谎混日子的。他们不说谎，就一天也混不下去。

在当时，奴隶起义的领袖跖曾经当面斥责孔子是“巧伪人”。“巧伪人”者，政治骗子之别名也。这种“巧伪”的特点，是由孔子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孔子是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死硬派，一生鼓吹的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他所玩弄的那套反革命两面派骗术，归根到底，是服从于这条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孔子要搞复辟，开历史的倒车，这是不得人心的。他周游列国，到处受逐，活象一条丧家之犬，只能靠政治欺骗混日子。但既要骗人，就难免不露出马脚。因此，他经常言行相违，处于不能自圆其说的窘境。鲁昭公娶了同姓的吴女做妻子，按照儒家的学说是符合“礼”规定的。但孔子为了庇护国君的声誉以维持奴隶制的统治秩序，硬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强词夺理地说鲁昭公是知“礼”的君子（《论语·述而》）。理由呢？“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明明是违犯了“礼”，却偏要说成是合于“礼”，还要说这样做的本身就是“礼”的组成部分。所谓“礼”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是很可以一目了然的。

在孔子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再捣鬼”的两面派形象。他表面上说什么“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怕没有官做，就怕不懂得“礼”，不能自立于世）（《论语·里仁》），又说是什么“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装得十分清高；实际上三个月没有官做，便急得不得了，发牢骚说：“我又不是葫芦，怎么能挂起来光图好看而不能吃的呢？”（《论语·阳货》）他口口声声说什么“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事实上，他培植和



训练了一批死党，形成了一个以复辟奴隶制为宗旨的小集团，对于这个集团里的人，稍不合己意，就立刻满脸杀气地叫嚣：“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口头上唱的是“仁者爱人”的高调，说什么“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可是，他上台不到七天，就把主张革新的另外一个党派的代表人物少正卯给杀掉了。鲁迅对于孔子和孔子之徒的这种两面派行为曾辛辣地指出：“‘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骸，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了。”（《病后杂谈》）

孔子不仅在政治上善于耍弄两面派手法，生活上也是一个极端虚伪而又无耻的家伙。孔子不是强调父母死了必须居丧三年的吗？但当他的老娘死掉以后，自己身上还在披麻带孝，一听到季氏家举行宴会，立刻急急忙忙赶去赴宴，结果被季家的执事阳虎赶了出去，说：“我们老爷请的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没有你小子的份儿！”（《史记·孔子世家》）一顿臭骂给轰出门去。孔子不是强调什么“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吗？可是他到卫国以后，由于求官心切，却偷偷走后门见了卫国国君的夫人南子，一进门就赶忙俯伏在地，连大气也不敢出，这副丑态见了实在叫人难受，连他的学生子路也对他老大不高兴。当时孔子只能象江湖上卖膏药的那样对天发誓：“我如果有不正之心，雷轰电劈”（《论语·雍也》）。孔子在口头上不是讲什么“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的吗？可是他在担任鲁国司寇的时候，年俸高达六万斗粟。衣、食、住、行，都十分讲究。论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盘子里的肉片要切得薄薄的。论穿，黑色的衣服要配紫羔皮，白色的衣服配鹿皮，黄色的衣服配狐皮，过的完全是奴隶主贵族的糜烂生活。明代的李卓吾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生活这么豪华，说“圣人”不要富贵是骗人的。章太炎也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这是很能刻画出孔子的伪君子的残忍而又阴险的嘴脸来的。事隔两千多年，孔老二的信徒林彪也学得了这一套。林彪和他的死党相互吹捧什么“温文、豪放、理智”，实际上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林彪所信奉的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他的内心世界，和孔子一样，是极其肮脏丑恶的。



孔子是政治骗子。儒家之徒在反动孔学的熏陶下，学得了一身虚伪而又阴险的好本领，都是一小撮政治骗子。

西汉初年，封建统治者奉行的是法家的政策。汉高祖不信儒。文帝、景帝实际上信奉的都是法家的一套。汉武帝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有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郑列传》）这实际上就是批评汉武帝尊儒反法，做得不对。其实，汉武帝对法家倒是并不嫉视的，他所任用的官吏如桑弘羊等，大都是奉行法家主张的。这种情况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

信奉孔孟之道的儒生当大官的越多，官场风气也就越虚伪腐败。汉宣帝时有个儒生叫陈万年的，就极善于奉承拍马，讨得了丞相丙吉的欢心，做到了御史大夫的高官。他生病的时候，要他的儿子陈咸在床边听他的训话，絮絮叨叨地一直讲到半夜。陈咸越听越烦，越听越倦，最后不禁打起瞌睡来了，一头撞着屏风，头上起了个疙瘩。这一下，陈万年恼火极了，要举起棍子打他，说：“老子苦心教训你，你反而打瞌睡，不听我的话，是何道理？”陈咸回答说：“大人说的，儿子都听明白了，不过是教我如何奉承拍马罢了。”（《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这几句话，倒是颇为淋漓尽致地说破了所谓儒生、儒吏们的真面目。

在西汉的统治者中，真正信奉儒家学说的是汉元帝。他当太子的时候，一再劝他的父亲汉宣帝要任用儒生，结果挨了汉宣帝的一顿批评，汉宣帝叹气说：“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元帝纪》）事实也确如汉宣帝所说的那样，元帝是个既愚蠢而又死要面子的皇帝。他的老师肖望之是个有名的儒学大师，元帝对他推崇备至，十分信任。但当时宦官弘恭、石显与肖望之有矛盾，奏告元帝说：肖望之“为臣不忠”，应当“召致廷尉”。“召致廷尉”是进监狱的别称，元帝根本不懂得这层意思，却不懂装懂，稀里糊涂地批准了这道奏章。后来汉元帝发现肖望之进了监狱，不禁大吃一惊。要宣布肖望之无罪吧，等于承认自己无故处罚老师的罪名，面子上下不来。特别是弘恭、石显两个人，提出了儒家的为尊者讳耻的原则，竭力反对肖望之官复原职。汉元帝只得打肿脸充胖子，将错就错，索性把肖



望之撤职罢官。后来，元帝一面说要尊师重道，下诏说：“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汉书·元帝纪》），准备任用肖望之为宰相，一面却又听信弘恭、石显的主意，把肖望之又一次关进监狱。肖望之老泪纵横，仰天长叹，服毒自杀了。汉元帝得知后，哭了一场，骂弘恭、石显说：“果然杀吾贤傅！”（《汉书·肖望之传》）其实，汉元帝有什么好埋怨的呢？凶手就是他自己，就是他所信奉的孔孟之道。肖望之死得也是活该，谁叫他用儒家的理论来培养与熏陶汉元帝的呢？结果呢，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汉元帝用肖望之教他的这套孔学来对待肖望之，肖望之就受不了了，只得到阴间去找“孔圣人”诉冤去了。

西汉的政治以汉元帝为转折点，此后一直走下坡路。《汉书》的作者班固评论汉元帝说：“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汉书·元帝纪》）。这话是有道理的。凡是尊奉儒家的，总是讲究繁文缛节，搞形式主义的一套。汉宣帝是不信儒的，他骂儒家之徒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元帝一反宣帝的行事，尊儒反法，结果汉朝的政治越搞越糟，元、成、哀、平四朝，一代不如一代。尊儒的结果，是西汉的灭亡。

在东汉，由于封建统治者继续提倡孔学，尊儒反法，读经成了升官发财的捷径，知识分子中的风尚极其虚伪、腐败。当时有个儒生叫许武的，在他自己被举为孝廉后，和两个兄弟串通，演出了假分家的丑剧，要他的两个弟弟假装“让产”，使他们获取美名，也得被举为孝廉。最后，许武又大会宾客，宣布自己为使两弟成名而有意蒙受贪财的恶名的苦心，从而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名声。《今古奇观》有一则《三孝廉让产得高名》的故事，就是根据这桩事实铺陈叙说而来的。从这桩被地主阶级引为美谈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所谓儒生，是一群自欺欺人的政治骗子，为了向上爬，完全可以不择手段。又如赵宣葬父母，在墓道中居住达二十多年之久，名震遐迩，成为轰动一时的大孝子。朝廷屡次请他出来做官，他却坚持在墓道中守孝，孝名愈来愈大。后来一查，他在墓道中连续生了五个儿子，



这一下骗局方才被揭穿。鲁迅说得好：“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汉代的劳动人民，对儒生这种虚伪无耻的行为作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当时有首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在人民群众的眼中，以清流自居的儒生却是浊如泥的。其实，就是地主阶级内部的进步思想家，也瞧不惯儒家之徒这种虚伪无耻、掩耳盗铃的欺世行径。在西汉，法家桑弘羊批判儒生是“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在东汉，王充针对汉代的社会风尚指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王符在《潜夫论》中批评汉代儒者是“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两面派、政治骗子。到了汉朝末年，信奉法家的曹操对这批虚伪无耻的儒士深恶痛绝，一再表示“吾欲整齐风俗”，对汉代儒生的歪风邪气进行了坚决的打击。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随着地主阶级的逐步由真老虎变为纸老虎，孔子在思想界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宋代，出现了以“伪学”著称的道学。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把孔孟之道发展成为程朱理学，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特别是朱熹，他编纂了《四书集注》、《通鉴纲目》来对孔学进行发挥，影响极大，流毒甚广，是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就是这个朱熹，由于深得孔学真传，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伪君子。他为了泄私愤，对无告的官妓严刑拷打，阴谋搞政治陷害。他平时口口声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听说建阳县学堂风水好，就用粗绳大索把孔子塑像捆绑起来搬走，结果把孔子的手脚也搞断了，闹得舆论哗然。他口口声声“百行孝为先”，但虐待老母，自己吃好米，给他的母亲吃发霉的米。其实，道学家都是一批寡廉鲜耻的伪君子、真小人，又岂仅是朱熹而已！元朝一建立，南宋的那批道学家纷纷卖身投靠，比谁都要积极。因此，元朝也是崇儒的，官方修的宋史就列了专门的章节来给宋代的道学家树碑立传。明代的李贽曾经辛辣地讽刺道学家说：“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李卓吾：《初潭集》卷十一）李贽本人是从儒家营垒中杀出来的，对其中的黑幕了解得比较清楚，因此，他直率地指斥这批道学家的行为简直同猪狗一样。



孔子及儒家之徒的两面派、伪君子的虚伪行径，反映了没落阶级处于没落境地中所采取的垂死挣扎的手法。因此，历史上一切没落阶级要搞复辟、开倒车，就都要尊孔学、学孔学，向孔子这个政治骗子的祖师爷顶礼膜拜。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就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全盘继承了从孔孟到朱熹的骗人衣钵，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伪君子。他亲自编纂了《四书集句》，抄录背诵，身体力行。他还公然标榜要学习朱熹的“待人”哲学。长期以来，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志壮坚信马列”的“英雄”，实际上却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抄录《三国演义》中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充分暴露了他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他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当成“虎穴”，只是勉强地暂时地“栖”一下，到一定时候就要搞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他的野心极大，不能“说破”，即不能公开，不能见太阳，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同一小撮死党去阴谋策划。用什么方法能不被识破呢？就是“随机应变”，即随着形势的变化相应地进行不断的投机，以欺骗人民，欺骗党，用表面的伪装的“变”来“掩饰”他不变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本质。他刻骨仇恨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中国革命人民，这种仇恨是地、富、反、坏、右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它集中地表现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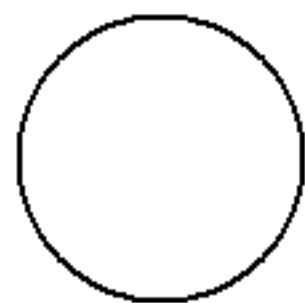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无论是孔子还是林彪，都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今天，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我们彻底批判孔子及儒家之徒的两面派行为，可以增强我们识别林彪之流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能力，将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本刊转载时略有改动）



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



辽宁大学 李 时

秦始皇是我国古代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尊法反儒，厚今薄古，坚持革新，反对倒退，在中国历史上起了促进统一的进步作用。但两千多年以来，地主资产阶级中的尊孔派，都竭力抹煞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叛徒、卖国贼林彪同样用孔孟之道肆意歪曲历史。他借咒骂秦始皇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今天，关于秦始皇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不仅是史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而且是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奴隶们反抗奴隶主贵族的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在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复较量过程中，地主阶级专政逐步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进一步统一中国成了当时广大人民的要求。秦始皇统一六国，适应了人民群众要求统一的愿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

秦始皇能完成统一，就秦王朝本身来说，起决定作用的究竟是什么？是由于个别将领的能征善战呢，还是由于有一条符合历史发展的政治路线？如果把秦统一六国的功绩都归于秦将王翦、王贲父子，认为与秦始皇无关，或以此来贬低秦始皇，那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历史事实，否定了政治路线的决定作用。对于这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必须根据客观的事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秦统一六国，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战国时期，封建制正在代替奴隶制。



反对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篡权复辟，铲除封建割据的诸侯王国，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是当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自秦孝公至秦始皇，秦坚持了一条变法革新的政治路线，适应了历史的发展。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建立起各项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奖军功”、“教耕战”等政策，“劝民耕农利土”，“习战陈之事”^①，“外连衡而斗诸侯”（“对外实行‘连横’政策而使诸侯各国自相争斗”）^②。从此，新兴地主阶级开始掌握了政权，经济力量迅速增长，军力日益强大，“秦之锐士”远远胜过“齐之技击”、“魏氏之武卒”^③，并且“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宰割天下”^④。到秦始皇时，秦国经历了六世，一百余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比东方六国占着绝对的优势，由原来落后、贫弱的地位，一跃而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先进、最富强的诸侯国，具备了统一六国的有利条件。当时“三晋”（韩、赵、魏）的很多劳动人民都跑到秦，从事生产和当兵；东方六国的一些新兴地主阶级人士如李斯、尉繚等纷纷投奔到秦，做“客卿”，为秦谋划统一。这都说明当时的人心向着先进的秦国，希望由它完成统一。但在秦始皇即位初年，相国吕不韦掀起复辟逆流。他继承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思想，主张分封诸侯，妄图复辟奴隶制，并把早已灭掉的卫国重新恢复起来。这是对历史的反动。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三八年亲政之后，打倒了吕不韦、嫪毐反动集团，是一次法家改革路线的重大胜利，这就为统一六国扫清了道路。

与此同时，六个诸侯国虽都在不同程度上向封建地主阶级专政转化，但由于没有坚持或彻底实行社会改革的政治路线，因而谁也没有力量起来统一中国。楚国幅员最大，人口最多，兵数最众，公元前三八一年吴起变法失败之后，掌握军政大权的始终是昭、景、屈等大贵族，“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臣百姓”^⑤，统治者倒行逆施，社会矛盾重重，民不聊生。赵国在武灵王时期，改革军制，“胡服骑射”^⑥，兵力比较强大，而政治、经济却没有相应改革，赵氏宗族专政，“上下不相亲”、“贵贱不相信”^⑦，各种社会矛盾也很尖锐，怨声载道。魏国在战国初期，因李悝变法，“尽地力之教”^⑧，虽曾盛极一时，但过了不久，旧



贵族势力抬头，“平余法”等政策不能继续贯彻下去，国力就逐渐衰退了。齐国，地主阶级掌权虽早，也有过一些改革，但是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田氏宗族势力也很大，以致未能使改革进行到底。韩国的改革也不彻底，象著名法家韩非的政治主张并没有被实行。至于燕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改革。这些诸侯国旧贵族势力专权比较普遍，楚春申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齐孟尝君等贵族奴隶主代表人物“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⑨。由于这些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不象秦国那样蒸蒸日上，加上他们只顾各自的利害，不可能真正实现什么“合纵”，在互相攻伐中又大大削弱了国力，最后只能被秦所消灭。

由此可见，战国七雄对峙的时候，秦国由弱变强，并不是偶然的。正如荀子所说：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⑩。就是说，这不是什么碰运气的偶然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其它六国由强变弱，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历史根由的。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⑪，六国“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⑫，终于导致了秦的胜利，六国灭亡。这个历史事实充分说明，秦统一六国，不能孤立地归结为个别将领的作用，而是由于秦始皇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级，他所实行的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路线起了决定作用。

毛主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这就告诉我们：自古以来，军事路线同政治路线总是紧密相联的。政治路线决定了军事路线，军事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军事路线是为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并为后者服务的。

秦始皇根据他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采纳了著名法家李斯、尉繚的建议，制定了统一六国的战略部署。首先，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派姚贾等人出使并粉碎了六国诸侯的“合纵”政策^⑬；接着“乃使其良将随其后”^⑭，集中优势兵力，一个一个地攻打六国。他的作战部署是，从取韩开始，再南北出击，破赵、燕，灭魏、楚，横扫两翼，然后歼灭齐国。攻“三晋”和燕、楚时，使人劝齐王放弃“合纵”政策，“不助五国攻秦”^⑮。秦始皇这一作战部署，贯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远交



近攻”的战略方针。韩、魏是“天下之枢”^⑩，“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堵塞着秦国的要道，而掩护着华山以东的其他几个诸侯国”）^⑪。特别是韩，乃秦的“心腹之病”^⑫。如果燕、齐、楚、赵等国联合起来支持韩、魏反秦，“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⑬。鉴于这个形势，秦国自孝公以来，多次用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商鞅用于秦，而收魏”，“范雎用于秦，而收韩”^⑭。这样，秦国能够粉碎六国“合纵”的战略，利用敌方矛盾，各个击破，得寸有寸，得尺有尺。秦始皇根据新的形势，继承了早就行之有效的这个“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进军神速，自公元前二三〇年灭韩开始，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灭齐结束，十年之内，“并吞战国，海内为一”^⑮。

六国诸侯面对秦国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他们除调动所有军队进行顽抗之外，还施展各种阴谋诡计作垂死挣扎。燕太子丹妄想颠覆秦国，重振诸侯，秘密派了亡命徒荆轲窜到秦国去谋刺秦王。齐王建派人到秦国，妄图离间秦国君臣，进而瓦解秦国。这种搞暗杀、挑拨离间的卑鄙手段，是没落阶级的阶级本性及其反动政治路线的必然表现。结果，他们都没有得逞。燕太子丹导演了“荆轲刺秦王”这种孤注一掷的阴谋暗杀，既挽救不了反动奴隶主阶级的灭亡，也阻止不了新兴地主阶级走历史的必由之路，而且只能以荆轲“一去兮不复返”而告终^⑯。去到秦国的齐客，反过来为秦国服务，“劝（齐）王朝秦”^⑰，加速了齐国灭亡。这些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反动人物，战场上一败涂地，阴谋诡计又遭败露，终究免不了一朝覆没。

秦始皇非常重视统一六国的战争，亲自部署和领导了这场战争。他在关键时刻，于公元前二三四年“之河南”，公元前二二八年“之邯郸”，公元前二二四年“游至郢、陈”^⑱，三次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促进了战争的胜利。同时，又在军事胜利的过程中，为了巩固战果，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政治措施，即把灭掉的诸侯国改设为郡县，把新占领区内的奴隶主贵族和大商人迁徙到容易控制的地方或边远地区，扩大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秦始皇实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⑲，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是他的军事路线的胜利，更重要的



也是他的政治路线的胜利。

王翦、王贲父子等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打了几个胜仗，主要是因为秦始皇战略指挥的正确。当秦楚之战，李信等人带领二十万秦军首战告捷，随后遭到楚军袭击而挫败时，秦始皇派王翦带六十万大军继续击楚，楚用全部兵力抵抗秦军。当时的战略形势是：秦已取得灭韩、魏的胜利，无后顾之忧，兵强马壮，秦始皇敢于集中兵力，以逸待劳；而楚军则以劳对逸，陷入困境，难以持久，“乃引而东”。于是王翦挥军追击，“大破荆（楚）军”^②。当然，王翦个人在这一战役中，是有作用的，但他这个作用也只有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正确战略指挥下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试想：没有“远交近攻”的战略，没有秦始皇的统筹全局，没有秦军早已取得灭韩、魏，破赵、燕的胜利，王翦个人能在这一战役中取胜吗？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源源不断的粮草供应，王翦以逸待劳的战术能行得通吗？没有秦国稳定的政治局面，巩固的地主阶级专政，王翦一人能打败强敌吗？一句话，没有符合历史发展的政治路线，单凭王氏父子那样几名将领能打出统一的天下吗？不能，“**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离开了秦始皇的法家改革路线来谈论王氏父子的战功，就是离开了政治来谈论战争，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是背道而驰的。

政治路线的正确，决定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最终必胜。但以王翦个人来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常胜将军”，他领兵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公元前二二九年，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③当时王翦受挫，一年内没有多大进展。后来，由于秦始皇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一方面从内部分化瓦解敌方，一方面大举进军，猛烈攻击，才取得了平赵战争的胜利。

然而，王翦没有自知之明，往往居功自傲，甚至要挟秦始皇。公元前二二六年，王翦攻下燕都蓟城之后，便“谢病老归”^④。公元前二二四年，秦始皇为了灭掉实力比较强大的楚国，“复召王翦”，要他带六十万大军击楚。王翦开始推辞不干，勉强答应后，又向秦始皇“请美田宅园池甚众”。秦始皇好言抚慰他，他却不听，对秦始皇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



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大军已经出发，他还三番五次地讨价还价。王翦以功臣自居要挟秦始皇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当时就有人不满地对他说：“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②秦始皇并没有迁就王翦这种刚负重任就多“请田宅”的无理要求，只付之一笑^③。他既坚持了法家的“论功行赏”的原则，又没有使王翦失去立功的机会，继续信用他。所谓“翦为宿将，始皇师之”^④，就反映出秦始皇起用已经退出战场的老将，发挥他的作用，有其任人唯贤的政治原则。

其实，在战国时期要论名将，王翦父子还不能名列前茅。如廉颇就是战国时期少有的名将，他曾屡次打败过齐军，两度攻拔过魏地，也曾大破燕军取得五城，还在长平抵御过秦军，“以勇气闻于诸侯”^⑤。可是，为什么廉颇不能象王翦父子那样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立功呢？归根结底，是因为赵国的政治路线不正确，社会改革不彻底，赵王任人唯亲，旧贵族逆历史趋势而动，没有秦国那样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条件，廉颇也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再如李牧，曾与廉颇齐名，同为赵国名将，有谋有勇。他曾“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⑥。就征善战而言，王翦与李牧相比，无论军事谋略，还是勇猛冲杀，都差一筹。李牧在赵国虽有战功却未能善终，最后因赵王受人挑拨而被杀掉了；而王翦在秦国则能为统一六国而战，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这从正、反两个方面都说明：在阶级斗争中个人是受一定的政治路线支配的。政治路线对了，将领的作用可以得到发挥；政治路线错了，将领还能发挥啥作用？不仅“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还会垮台！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社会变革，归根到底，就是新兴的阶级战胜没落的阶级。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就是新兴地主阶级战胜旧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斗争史，也是改革彻底的国家战胜改革不彻底的国家的历史。秦之所以能消灭六国，实现统一，并不是由于王翦父子起了决定作用，而是由于秦始



皇所代表的坚持革新、坚持统一、坚持进步的政治路线战胜了主张倒退、主张分裂、主张复辟的反动路线。这里，如果把将领个人看做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那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实现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正确的革命路线起决定作用。毛主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这是在革命实践中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反复证实了的真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结果。叛徒、卖国贼林彪，顽固地坚持反动的唯心史观，鼓吹英雄创造历史，把党和人民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创造的丰功伟绩窃为己有，就是妄图改变党的路线，推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篡党夺权，投靠苏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开历史倒车，结果被前进的历史车轮轧得粉碎。当前，在继续深入批林批孔的伟大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彻底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注：

①⑩⑬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②④⑪ 贾谊：《过秦论》

③⑫ 《荀子·议兵》

⑤ 《战国策·楚策三》

⑥ 《史记·赵世家》

⑦ 《战国策·秦策一》

⑧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⑨ 《史记·春申君列传》

⑫⑱ 苏洵：《嘉祐集》卷三《六国》

⑬ 《战国策·秦策五》

⑭ 《史记·李斯列传》

⑮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⑰⑲ 苏辙：《栾城应诏集》卷一《六国论》

⑳ 《史记·平原侯主父列传》

㉑ 《史记·刺客列传》

㉒ 《战国策·齐策六》

㉔②⑤⑲ 《史记·秦始皇本纪》

㉖⑳⑳⑳⑳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㉗ 《战国策·赵策四》

㉘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㉙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批林批孔是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

燕 枫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一个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这是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是关系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国内被推翻的地、富、反、坏、右，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总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修正主义者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图谋颠覆和侵略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也要收买那些甘当儿皇帝的里通外国分子。因此，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了巩固经过流血牺牲得来的政权，必须坚决镇压明火执仗的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更必须时刻警惕和粉碎修正主义头子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

历史经验表明，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凡是搞修正主义的，往往要向孔学的垃圾堆里寻找反革命的思想武器。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他们同我国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都是尊孔的，都是孔家店的门徒。在当前的情况下，把批林和批孔紧密地结合起来，彻底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弄清修正主义头子为什么总是要尊孔及其尊孔的政治目的，对于坚持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林彪反党集团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镜子。林彪利用孔孟之道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为其反革命的复辟活动服务，是极为猖狂的。在政治路线上，林彪接



过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口号，作为他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纲领，妄图让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专政。在思想路线上，林彪把孔老二的“天命论”、“生而知之”等一套唯心论的先验论，以及“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拿过来，改头换面，炮制了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无耻地宣称自己的“美德”“受于天”，以此作为建立封建法西斯林家王朝的精神支柱。在组织路线上，林彪用孔孟的反动处世哲学，大搞阴谋诡计，结党营私，甚至发展到训练法西斯的特务队，要他的死党为“林家王朝”的反革命事业效忠、“成仁”。大量事实证明，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门徒。

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在加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时候，为什么都要抬出孔丘来顶礼膜拜，并拾取其思想破烂作为旗帜向党进攻？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地、具体地加以分析，就不难找到答案。

从孔丘思想的实质来看，就是反对改革，坚持复辟，反对前进，主张倒退。这正适合于修正主义者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孔丘作为反动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本来是为复辟日趋崩溃的奴隶制、开历史倒车服务的。以后，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不断加工改造，强制推行，孔孟之道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共产党宣言》）孔孟之道作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尽管历代统治阶级从自身的需要出发，从不同的方面作了解释和发挥，它的本质始终是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孔丘的思想体系一直忠实地为维护旧制度服务，为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和反动派搞复辟效劳。反动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剥削制度的理论、纲领，许多在孔学中得



到体现。所有这些，是同修正主义者搞反革命的倒退，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要求完全吻合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要到孔学中去寻找思想武器，向党和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原因。

从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发展事实来看，孔学被修正主义头子看中并加以利用，也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主张并推行资本主义路线，一般地说，要以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十分软弱，而“**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独立的可与封建文化思想相匹敌的思想体系。在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的一个短暂的时期里，资产阶级的所谓新学，虽然在旧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推动下，一度反对过孔家店，有同中国封建文化作斗争的作用，可是，因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它上阵还没有打上几个回合，“**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随着无产阶级登上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相抗衡的，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成了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复古思想的维护者和鼓吹者。林彪这个修正主义头子，要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不能不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那里，继承这个“尊孔读经”的衣钵。

林彪特别看重孔孟之道，是因为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这种思想更能欺骗人。它满纸“仁义道德”，骨子里是“压迫有理”、“剥削有理”；它假惺惺宣扬什么“爱人”，实质上是主张成千上万地“吃人”。历代的剥削阶级正是利用孔学来欺骗和愚弄人民，以维护和巩固其反动统治的。列宁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第二国际的破产》）孔孟之道的欺骗性，就表现在它给刽子手穿上



了牧师的服装。在社会主义时代，地主资产阶级虽然被打倒，但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有势力，还要和我们反复较量，靠什么呢？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靠孔孟之道，靠这种反动思想的流毒和影响。这是他们用来向无产阶级进行夺权斗争的思想武器。修正主义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是一伙政治骗子，他们既要搞反革命活动，又要骗人，孔老二的一套颇合他们胃口，于是就被他们奉为至宝。

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从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来看，王明、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头子大肆宣扬和贩卖孔孟之道，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历史上的外国侵略者，为了征服我国人民，在实行野蛮的军事侵略的同时，往往要抬出孔老二，利用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中国固有的反动腐朽的旧文化，作为他们殖民统治的思想工具。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报〈奇哉所谓……〉》）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孔孟之道是中国的“国粹”，是一把使人“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深深打上了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统治经验的印记，更具有欺骗、麻醉中国人民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是曾经疯狂叫嚣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要“恢复孔子之教”吗？长期以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分子不是也在大搞尊孔丑剧，大骂秦始皇吗？他们无耻宣传孔丘是中国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胡说什么“儒学”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等等。这些，都说明外国和中国的反动派唱的是一个调子，都从反面揭露了孔丘思想的反动实质。林彪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奴才和走狗，他决心投靠苏修，充分表明他是准备要当儿皇帝的。今天，我们针对林彪利用孔孟之道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进行深入的批判，也就沉重地打击了苏修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狂妄野心。

恩格斯曾经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情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旧中国绵延几千年之久的孔学，是典型的剥削阶级传统，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



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阻力，必然要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摧毁。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英雄”“好汉”，都曾“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搞尊孔的修正主义头子也无一例外，他们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妄想用孔老二这块砖头“敲”开资本主义复辟之门，阻挡历史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结果摔死在蒙古沙漠上，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林彪和孔丘，虽然生长时代不同，所代表的阶级力量也不同，但他们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相同之点。他们都站在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立场上，顽固地要恢复已经灭亡的旧制度，力图阻挠社会按照自己的发展方向前进。因此，我们今天的批林批孔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一场深刻、尖锐的路线斗争。斗争的实质，就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坚持革命还是搞复辟的问题。通过批林批孔的斗争，把林彪反党集团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同孔孟之道相对照，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就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修正主义的特点及其思想根源，了解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了解孔学的反动性，以进一步从思想上同它们划清界限，在今后同修正主义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

当前，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亿万工农兵作为批林批孔的主力军，正在口诛笔伐，向林彪反党集团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向孔老二及其整个反动思想体系猛烈开火，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开辟着广阔的道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掌握理论武器。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要带头参加批林批孔，在斗争中接受反修防修的教育，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经常想一想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要不断地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鲜经验，使自己的思想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需要。让我们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积极工作，努力作战！



揭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反动实质

上海吴泾热电厂 郭企元
上海重型机器厂 黄士耀

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再宣扬什么待人要“以仁爱之心”，“以宽宥原谅之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谬论。这一套是从反动阶级的“圣人”孔老二那里拣来的腐朽货色。

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加到别人身上”。乍一听，是何等的迷人悦耳啊！可是，我们劳动人民通过自己长期切身痛苦的经验，早就看穿了这种谬论的反动本质。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是剥削阶级压迫、剥削被剥削阶级，就是被剥削阶级起来打倒剥削阶级，从来也不存在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剥削阶级之“欲”，必为被剥削阶级所“不欲”。反过来，也是一样。孔老二是“恕道”的发明人，可他实行过没有呢？没有。比如，“死”，这大概是孔老二所“不欲”的吧，那么他是不是不以“死”“施于人”呢？实际上，他却偏偏爱杀人，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个满嘴“恕道”的“巧伪人”，就亲手制造了两起血淋淋的残杀事件：一是为了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二是为了维护奴隶主的尊严，下令残害了在齐鲁两国国君夹谷相会的会场表演节目的艺人。这证明，开口闭口“恕道”的孔老二，实际是个一点也不“恕”的法西斯刽子



手。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所“不欲”的东西，是一定要“施于”奴隶、农民和工人的，历来是这样。奴隶主是不愿当奴隶的，却偏要广大奴隶世代代作奴隶；地主、资产阶级是不愿作牛马的，却偏要广大农民、工人过着连牛马也不如的痛苦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工人都有一本血泪帐，挨皮鞭打，住滚地龙，吃猪狗食。资本家花天酒地的剥削阶级“欲望”越旺，施于我们工人的压迫剥削就越残酷。总而言之，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与孔老二的骗子哲学正相反。所以，一提起那个“恕道”，我们工人就怒火满胸膛。戳穿了看，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就是欺人之道，吃人之道。

恕道、恕道，明明做不到，那为什么从孔老二到林彪都要提倡这一套呢？这自然也是有原因的。孔子讲“恕”，用之于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是妄想要大家在所谓“礼崩乐坏”的残局面前同舟共济，死死地抱住奴隶制的旧秩序，为“复礼”而“克己”。用来对付奴隶们和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则可以劝诱他们不要“犯上作乱”，不要变革，不要暴力革命，以维持正在急剧崩溃中的奴隶制。总之，讲“恕”是为了“复礼”，即复辟。孔子对奴隶们的反抗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怕得要死，就用“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套来骗人，这实际上是一种阶级调和论，是麻醉剂。所以，后来的一切反动没落的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缓和激化了的阶级斗争，都喜欢提倡这个“恕道”。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从来没有实行过什么“恕道”，又决不肯将“恕道”束之高阁，而且越是残酷无情地镇压劳动人民的反动派，嘴里越是要念着“恕道”，这个秘密被鲁迅一针见血地揭穿了。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就说过：“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鲁迅所看透的这个“秘密”告诉我们，几千年来之所以总有一些人要抱住“恕道”招摇撞骗，原来是恶鬼装菩萨有这种特殊的需要。

列宁曾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第二国际的破产》）从孔



老二到林彪的一切伪装菩萨的恶鬼，都是一身兼二任，既是刽子手，又是牧师。这些家伙讲“恕道”，是为了“使民杀而不怨”，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和统治。

在旧社会，剥削阶级对我们劳动人民从来没有搞过什么“恕道”；在今天，在我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对于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能够讲“恕道”吗？不能。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打倒叛徒、卖国贼林彪之类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林彪一伙对此怕得要死，于是就装出一副菩萨心肠，哼哼唧唧地念起“恕”经，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妄图用这种腐朽的孔孟之道麻痹我们的思想，解除我们的思想武装，以便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什么待人要“以仁爱之心”，“以宽宥原谅之恕”，难道无产阶级能以“仁爱之心”待资产阶级，而不讲阶级斗争吗？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我们能报以“宽宥原谅”，而不加以反击吗？如果依了林彪一伙的话去做，对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讲“恕道”，搞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就意味着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复辟，意味着被打倒的反动阶级重新上台。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无产阶级不需要隐瞒自己的观点，从来就公开表明对敌人是不施“仁政”，不讲“恕道”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们鼓吹孔老二的“恕道”，我们就一定不能对敌人讲“恕道”；他们抬出孔老二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一定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相反，欲望相反，一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决不可能**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一切反动派不用说当然是“不欲”的，而我们革命人民则必强“施于”他们，这是毫无疑义的。



从“天马”的下场看天命论的破产

内蒙古阿巴嘎旗 乌云格日勒

林彪是孔老二反动天命论的鼓吹者。两千多年前，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孔老二编造了一套“天命”的胡说，自吹“知天命”，“老天爷”把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交给他了。两千年后，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捧出了“天命”的破招牌，学着孔老二的腔调，说什么“温文、豪放、理智”是“受于天”的，自比“天马”，要在天下“独往独来”。这充分说明，林彪和孔老二是一个庙里的反动喇嘛，念的都是一本反动、复辟经。

林彪和孔老二念的“天命”经，把人的命运说成是由“老天爷”安排的。孔老二的门徒就曾经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那就是说，林彪和孔老二这些所谓“圣人”、“天马”，应该治理天下，主宰世界，享尽人间富贵，而我们劳动人民只能世代受奴役，受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一切都是“老天爷”安排的，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命运。其实，这是地地道道的骗人鬼话。我们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相信孔老二的天命论，也不相信林彪“受于天”的谣言和欺骗。

我是贫苦牧民的女儿。我们家在解放前，祖祖辈辈给王爷牧主当奴隶，受尽了剥削和压榨，尝尽了人间痛苦。可是，到我这一代，草原上升起红太阳，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一切全变了样。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还作为光荣的工农兵学员进了大学。最近党组织和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又要我担任旗委副书记的职务。这些在旧社会连作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在今天却成了现实。按孔老二的说法，“老天爷”安排了劳动人民的命运，要我们世代做奴隶。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命运变好了呢？这是由于革命，而不是什么“天命”。同样，孔老二自称是“天降”的“圣人”，林彪也说自己是“受于天”的“天才”、“天马”，命定要做统治者。可是，孔老二不仅复辟没有搞成，而且落得象丧家的狗，



人人喊打的下场。林彪这个“天马”虽然逃到了天上，但只能“独往”而无法再“独来”，很快从天上掉下来，摔了个粉身碎骨，从“天马”变成了死马。林彪把自己一伙说得神乎其神，是什么“天马”“天才”“超天才”，为什么竟然遭到这样可耻的下场呢？就是因为他们是妄想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派，是同人民相敌对的。可见，没有什么命定的富贵和贫穷，也没有命定的统治者和奴隶，那个“主宰一切”的“老天爷”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草原上的牧民都知道，头顶上的蓝天不会说话，也没有象人一样的意志，它根本不能决定人们的命运。孔子和林彪凭空捏造了一个“老天爷”，说它安排了人的命运，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是唯心主义的荒唐理论。林彪妄图用这一套来对抗马克思主义，欺骗蒙蔽劳动人民，是绝对办不到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人民群众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够改天换地，能够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蒙古民族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旧社会，我们蒙族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受尽了国内外反动派和王爷牧主的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孔老二和林彪说这是“天命”所定。我们这里的王爷牧主也是这样讲，他们把几十户贫苦牧民赶到荒滩上居住，起个名字叫“高黑艾力”，意思是“苦命村”。可是，我们在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和各族革命人民一道，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王爷牧主的统治，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现在“苦命村”不苦了，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团结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生产一天天发展，生活一天好似一天。我们大队，解放前只有几百头牲畜，还大多是牧主的。解放后，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胡说，我们队缺水是“老天爷”安排的，谁也改变不了落后的面貌。可是我们却在党的领导下，斗垮了阶级敌人，开展了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用双手修建了一座两千来平方米的水库，改变了缺水的面貌，使生产得到了发展。现在，我们有近两万头牲畜，购置了拖拉机、柴油机、抽水机、剪毛机、割草机和马车，有十几万元的公共积累。贫下中农、贫下中牧的家里摆上了半导体收音机、缝纫机，生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幸福。这些变化是那儿来的呢？是“老天爷”给的吗？不是。是我们贫下中农、贫下中牧在党的领导下，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结果。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孔老二和林彪的谎言。不是“命由天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



人民群众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是天下的主人。

孔老二的天命论是维护压迫，维护剥削，反对革命，压制反抗的反动理论，是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支柱，是反动派施行反动行为的理论基础。孔老二不是大讲什么“畏天命”吗？他就是妄图用天命论来欺骗和吓唬劳动人民和进步力量，拉历史倒退，使没落奴隶主的统治永远平安。他的这一套成了历代剥削阶级维护反动统治的法宝。过去草原上的王爷牧主，骑在我们贫苦牧民头上作威作福，把我们压榨到死亡的边缘。他们怕我们起来反抗，怕我们推翻他们的统治，也宣扬什么“天上有玉皇，地上有帝王，地下有阎王”。他们宣称自己是天生的王爷牧主，要我们劳动人民老实地听从他们的使唤，象绵羊一样温顺地服从他们的统治，谁要是起来造反，进行革命斗争，谁就会触犯“玉皇、帝王”，死了以后还要受“阎王”的惩罚。然而，我们没有听他们那一套，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林彪一伙抬出孔老二的僵尸，扛起天命论的黑旗，同那些被我们打倒的王爷牧主骑在一匹马上，哼的一个调调。林彪想干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草原上的狼要吃人，把自己打扮成猎狗模样。孔老二要“复礼”，林彪想复辟资本主义，都给自己披上“天命”的外衣。然而，狼总归是狼，总是逃不脱牧人的眼睛。林彪鼓吹天命论，把自己装扮成“受于天”的“天马”，他的目的，是妄图以此来欺骗和吓唬我们工农兵群众，要我们放弃革命，放弃斗争，解除武装，听凭他们这一小撮叛徒卖国贼称王称霸，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把历史拉向后退。林彪和草原上的王爷牧主是一丘之貉，是劳动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深深懂得，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那些被打倒的王爷牧主和一切反动派就要重新上台，我们劳动人民就会重新落入苦难的火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容忍的。工农兵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天下是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的天下，历史的车轮决不允许倒转。林彪的可耻下场，恰恰说明天命论救不了反动派的命。

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天马”完蛋了，林彪这个卖国贼摔死了，天命论再一次破产了，但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实践告诉我们，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我们决心用战斗来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让人民的天下永不变色。



污蔑劳动人民就是反对革命

天津铁路分局天津站六号门工人评论组

历代的反动派总是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把劳动人民骂成大傻瓜。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孔老二就吹他自己和奴隶主贵族是“上智”，把奴隶们说成为“下愚”。叛徒、卖国贼林彪搞的也是孔老二那一套，他自比“天马”，而恶毒污蔑我们工人、农民整天想的就是“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是林彪敌视劳动人民的反动唯心史观的大暴露。

广大的劳动人民是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革命运动的主力军。谁否定工农群众，谁就是反对革命。怎样对待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水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焦点。毛主席和我们工农群众心连心，最信任我们，最看重我们。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话大长了我们劳动人民的志气，给我们撑了腰。一想到这些话，我们心里就热呼呼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纵有再大的困难，再凶恶的敌人，也都不在话下。可是叛徒、卖国贼林彪，跟毛主席大唱反调，把我们工人农民污蔑为只知“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的庸人，这就充分证明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死对头！

批判林彪的黑话，一定要具体分析它出笼的时代背景。林彪污蔑我们的这个话，是在日本鬼子侵略我国快要投降的时候说的。当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抗日战争究竟是谁打的？胜利果实应该属于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十分尖锐的斗争。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彪别有用心地胡说什么工人农民想的不是抗日，而是“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这不明明是要把人民群众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双手送给蒋介石吗？谁都知道，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国人民群众，在八年的浴血抗战中，想的、干的是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



国。多少人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象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就是优秀的代表。对这点，我们六号门老工人是深有体会的。那个时候的六号门，岗楼密布、狼狗成群，活象一座人间地狱，我们亲眼看到自己的阶级弟兄惨死在日寇刺刀之下，那真是满腔怒火，血海深仇啊！我们一心想的是报仇雪恨，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林彪却故意歪曲事实，跟蒋介石坐在一条板凳上，一个叫嚷日本是我打的，一个叫嚷打日本没有老百姓的份，老百姓整天想的都是“油盐酱醋柴”，那里懂得什么抗日。真是一个吹笛，一个按眼。林彪究竟在替谁说话，他代表的是那个阶级的利益，难道还不清楚吗！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抗日战争中，要不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实行全面抗战，打人民战争，打持久战，这是抗日战争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的投降卖国进行了坚决斗争，反对了党内机会主义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发动广大群众坚持八年艰苦抗战的结果。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奋斗，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

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证明了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就拿六号门的今昔变化来说，解放前，封建大把头拿着“龙票”、“龙签”，张口说“这个地盘是我的”，闭口说“离了我，你们这帮穷鬼吃谁去”。明明是我们六号门工人养活着大把头，大把头硬说是他养活我们。三座大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那真是天高没咱伸腰的权利，地大没咱立脚的地方。可是在他们统治的六十二年中，六号门照旧是一片开洼不见房，刮风不见人，下雨淌泥浆。解放了，我们斗倒了大把头，我们一心想的是革命。只二十五年，这里仓库、罩棚一大片，马路通道平展展。工人们驾驶龙门吊，开着叉车跑。货运量比解放前提高上百倍。就是那些曾经被封建把头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臭苦力”，如今当了国家干部，登上了上层建筑的舞台，管理着国家大事。为什么能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难道这是想“油盐酱醋柴”想出来的吗？是那个“圣人”恩赐的吗？当然不是。这一切都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指引下，靠我们六号门工人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六号门的翻身史，是我们六号门工人群众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写出来的。我们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社会的发展要靠我们劳动人民来推动。历史已经证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我们的前进。“六亿神州尽舜尧”，毛主席这句话把我们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心意都说出来了。而林彪却污蔑我们是什么只知道“油盐酱醋柴”的蠢货，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林彪恶毒污蔑我们工人农民的话，同孔老二鼓吹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谬论完全是一路货色，都是反动的唯心论。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这是对孔老二、林彪最有力的批判。为什么卑贱者最聪明呢？就是因为他们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而反动的剥削阶级或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高贵者”之所以最愚蠢，就是因为他们鄙视群众，脱离实践。大庆工人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亲自参加了打井采油的战斗，获得了勘探准、钻井快、出油多的聪明才智；大寨的贫下中农亲自参加了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实践，获得了荒山变“江南”的聪明才智；我们六号门老工人跟装卸这个活打了几十年交道，摸到了装载长、方、圆、扁、轻、重、整、散等各种货物的脾气，获得了巧装满载的聪明才智。我们常说的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就是这个道理。孔老二、林彪根本反对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这个伟大真理，极力鼓吹“生而知之”的唯心论，根本同劳动群众、社会实践沾不上边，那儿来的聪明才智！孔老二不是自以为很有知识吗？其实，是一肚子秕糠。林彪自封为“超天才”，比谁都强，揭开一看，原来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都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什么“天马”！不过是一只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螳螂罢了，这才是最蠢最蠢的了。

林彪不是一再叫喊他想的和劳动人民想的不是“一套”、“有天壤之别”吗？我们说，正是这样，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地主资产阶级，同叛徒、卖国贼林彪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想的、说的、做的和他们想的、说的、做的当然有“天壤之别”，决不会是“一套”。我们想的是革命、前进；他们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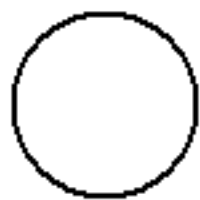
是复辟、倒退。我们想的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他们想的是当皇帝，是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们想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他们想的是搞阴谋诡计，把中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立脚点根本不一样，当然想不到一块儿去。

历代反动派都是鼓吹孔老二“上智下愚”那一套的，不管他们怎么说，说了多少，无非是要说明：压迫有理，反抗有罪。我们六号门老工人对这点最清楚。日本鬼子管我们叫“臭苦力”，国民党反动派管我们叫“臭装卸夫”，封建把头管我们叫“臭扛大个的”，都是妄想把我们整治成“饿死怨命苦，屈死不反抗”的顺民，服帖帖受他们统治。林彪所以污蔑我们劳动人民只知“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也是打的这个鬼主意。他自吹是“天才”，他的脑袋天生“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应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劳动人民是“愚”，分不清鱼目和珍珠，就应该听他摆布。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完成他“克己复礼”的“终身大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地主资产阶级宣扬的唯心史观时说，他们的目的是要证明老百姓“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这话揭了他们的底，捅到他们心窝上了。

凡是污蔑、整治劳动人民的人，决不会有好下场。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孔老二就是这样的反动派，被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吞没了。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六号门的封建大把头，也是这样，他们在逞能一时之后，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我们劳动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大步大步地前进了，想阻挡社会发展的反动派，却被历史抛进了垃圾堆。林彪这个反动家伙，自称“天马”，妄想在社会主义的天下“独往独来”，开历史倒车，最后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谁跟老百姓作对，到头来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们革命妇女最恨孔孟之道



大寨大队铁姑娘队

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孔老二和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黑窝里的两条毒蛇，都是我们劳动妇女的仇敌。

孔孟之道是吃人之道。两千多年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用孔孟之道来维护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听了老一辈对旧社会、对孔孟之道的血泪斑斑的控诉，激起了我们心头的万丈怒火。在那黑暗的旧社会，广大劳动妇女最受压迫、最受鄙视，生活在人间地狱的最底层。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提起这四大绳索，提起孔孟之道，我们劳动妇女有多少仇恨要诉，有多少苦水要倒啊！我们常听老年人说：“旧社会，妇女不如一根草。”在我们这里过去流传着一句话，说什么“娶到的妻，买到的马，由我骑，由我打”。“三纲五常”那些吃人的“礼教”在旧社会不知坑害了我们多少妇女。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砸烂了捆在妇女身上的四条封建绳索，广大劳动妇女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在家中的地位，都从根本上改变了。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我们劳动妇女撑起了半边天，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人。就拿大寨来说吧，大队党支部九名委员中有三名女委员，二十七名党员中有十名女党员。团支部七名委员中有四名女委员，二十八名团员中有十一名女团员。林彪宣扬孔孟之道，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把“三纲五常”的绳索再重新套在我们劳动人民的脖子上，捆在我们劳动妇女身上，要我们再回到旧社会的人间地狱去，这是痴心妄想，是决不能得逞的。

孔老二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男人对妇女的压迫、



欺侮。极力鼓吹鄙视妇女的反动谬论，宣扬男尊女卑，男主女从，胡说什么：“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林彪也在阴暗角落里，恶毒污蔑我们劳动妇女。两个坏蛋，一个腔调。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毛主席这段话大长了我们劳动妇女的志气，是对孔老二、林彪污蔑妇女谬论的有力批判。无数事实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国广大劳动妇女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革命战争时期，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工作，在前线，在后方，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涌现出无数象刘胡兰这样的女英雄、女烈士。解放后，广大劳动妇女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支伟大力量，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大寨的女社员常年顶烈日，冒严寒，同男社员一道奋战在虎头山上，从整地到下种，从夏锄到收割，样样活儿都干得很好。姑娘们还同科学技术人员一道积极开展科学试验，试种的水稻亩产一千二百多斤，试种的棉花亩产皮棉八十斤。一九六三年，大寨遭受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我们为了同特大洪灾作斗争，头顶烈日，脚踩烂泥，把几百亩冲倒的庄稼用自己的双手一根一根扶起来。在冰冻三尺的寒冬，为了修复被洪水冲坏的梯田，姑娘们提出了“天冷冷不了我们的热心，地冻冻不了我们的决心，寒风吹不倒我们的信心”的口号。姑娘们坚持同男社员一道战斗，从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铁姑娘队就这样在斗争中组织起来了，我们成了改造大自然的主人。十多年来，铁姑娘一茬又一茬地成长，现在一共有二十八名队员。其中有高中毕业的十七人。她们安心上农业“大学”，立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铁的事实是对林彪、孔老二的谬论有力的回击。

孔孟之流胡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林彪也叫喊什么“忠孝节义”要“用其内容”。他宣扬这一套是妄想用反动的封建道德来腐蚀革命人民，束缚我们劳动妇女的手脚，要我们放弃阶级斗争，不要革命，服服帖帖去替地主资产阶级尽“孝”守“节”，以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大寨铁姑娘不买林彪和孔老二的帐，不受他们



的骗，不上他们的当，要造他们的反。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敢造修正主义的反，敢造资产阶级的反，敢同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错误倾向斗，越斗心越明，眼越亮。在同旧的传统观念斗争中，姑娘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始终站在前列。由于孔老二的流毒，有的人看不起庄稼人，养女不嫁庄稼汉，我们大寨的姑娘就同这个旧观念作斗争。大寨的姑娘们热爱农村，安心农村，立志在农村干革命。多年来，大寨的姑娘不进城，不少人还出嫁到偏僻的山庄。我们经常登门上户宣传社会主义新风尚，揭露剥削阶级旧习惯。铁姑娘带头实行晚婚。办婚事，一条扁担两只筐，一套“毛选”带身上。不送“礼”，不受“礼”。村上死了人，不占棺材，不穿白，而是开追悼会。逢年过节，家家忆苦思甜，人人讲成长史。我们在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方面作出了些成绩。但是孔老二遗留下来的臭气毒气不会打扫一次、二次就干净了，破“四旧”也不能一劳永逸。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经常在进行着。我们要经常批，深入批，反复斗。

叛徒、卖国贼林彪大肆贩卖孔老二那一套，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齐上台，使我们的国家退到旧社会去，让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和劳动妇女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叫我们姑娘们去过白毛女的生活。我们坚决不答应。在旧社会，大寨的天是地主富农的天，大寨的地是地主富农的地。那时候大寨有六、七十户人家，其中地、富四户，就这四户吸血鬼，把大寨贫下中农吸得无立脚之地，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当长工的多，背债欠帐的多，讨吃要饭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寻死上吊的多。光卖儿卖女的就有二十多户，还有七户被害得灭门绝了户。解放后，我们大寨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旧大寨变成了新大寨，穷大寨变成了富大寨，人变、地变、产量变，农林牧副都有很大发展，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彻底把林彪贩卖的孔老二的破烂货扫进历史垃圾堆，决不让旧社会的悲剧重演。



放手发动群众 掌握政策界限

中国共产党上海第五钢铁厂委员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战斗号令，一场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我们厂内迅猛展开。由于批林批孔反映了广大工人群众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革命要求，运动一开头，就充分显示出工人阶级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的巨大作用。“炼钢必须去磷去硫，革命就要批林批孔。”广大工人群众发扬一月革命风暴的精神，几天之内，贴出了一万多张革命大字报，召开了成百次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全厂工人口诛笔伐，斗争锋芒直指林彪、孔老二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群众发动之快，斗争热气之高，为近年来所少有。

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批判修正主义，同时注意掌握政策界限，把运动不断地引向深入。

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林批孔，必须狠批林彪“克己复礼”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紧密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样，才能充分激发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我们厂批林批孔的战斗一打响，广大群众从林彪及其死党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就写了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这件事中，更加清楚地看透了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工人同志说，“复礼”就是复辟，孔老二要复辟奴隶制，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真是“黑渣白渣都是渣滓，林彪孔老二是一个模子”。许多工人沉痛地回顾了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切身经历，控诉了刘少奇、林彪一伙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



认识到如果让林彪“克己复礼”的阴谋得逞，那就是党变修，国变色，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头落地。工人同志愤怒地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容颠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历史不容开倒车。

在狠批“克己复礼”时，工人同志联系当前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大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痛斥“今不如昔”的种种谬论。而这种“今不如昔”的谬论，在我们厂也有反映。第一电炉车间的工人群众，联系本厂、本车间的斗争实际，对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变化，从办社会主义企业是坚持政治挂帅还是搞指标第一，加强企业管理是主要靠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还是靠规章制度“卡”群众，在发展生产技术上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热情支持新生事物还是压制和束缚群众的积极性等几个方面，揭露了厂内、车间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主要表现：一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又逐渐改头换面地出现了。例如，在质量管理上，文化大革命前，是靠少数专业管理人员卡群众，炉前质量检验员有一块“禁止出钢牌”，不管工人操作是否合理，只要他认为不对，就可用这张“王牌”禁止工人出钢，严重地挫伤了工人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中，把这项不合理的制度冲了，建立了群众性的质量检查和专业人员检查相结合的质量检验制度，人人把关，加强了工人内部的团结，调动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而现在，“禁止出钢牌”虽然没有了，但是，只靠专业人员检查，不相信群众的那种“我管，你干”的现象又露头了。二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有的得不到支持。例如工人群众创造的“同炉渣洗”冶炼碳钢的新工艺，自力更生搞成的五吨真空精炼炉等等，由于存在一些缺陷，而受到冷遇。这些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办企业路线上是巩固、发展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的大是大非问题，是前进和倒退的斗争。工人群众通过这样联系现实斗争，批判“克己复礼”，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更加认识到批林批孔对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伟大意义，也进一步认识到在路线斗争中“斗则进，不斗则退”的真理，因此都以主人翁的精神，大胆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挥了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使批林批孔运动更广泛、



深入地发展。

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林批孔，必须牢牢掌握批林批孔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着批林批孔斗争的深入，广大群众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时，也联系到厂内有些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例如，在有些车间里，工人群众对少数干部当中流行的所谓“三难”思想，即所谓“群众难弄，干部难当，工作难做”的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三难”思想，实质上是“今不如昔”的一种反映。还有些人，他们低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某些新生事物，看不惯，瞧不起，把社会上的某些资产阶级歪风邪气都算到文化大革命的帐上。这些都反映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从思想实质来说，都是一种复辟倒退思潮的反映。因此，当这些问题开始在干部和群众中揭开的时候，少数讲过一些错话的人，心情比较紧张。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作了研究，认为在深入批林批孔中，一方面要坚持斗争哲学，紧密联系本单位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把问题揭深揭透；同时又要紧紧掌握批林批孔这个中心，把斗争矛头对准林彪、孔老二，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对于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要注意划清这样一些界限：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还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问题一时想不通，讲了一些错话；是敌视、咒骂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还是因为受了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做了或说了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成长发展的错事、错话。凡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都要按照毛主席教导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对于上面所说的某些错误思想，可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和辩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能够从讨论和辩论中分清路线是非，提高觉悟。这样，我们就能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其中包括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组织起浩浩荡荡的



批林批孔大军，使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

从我们厂的初步实践看来，只要这样做了，就能进一步发挥广大群众和干部批林批孔的革命积极性，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我厂第二中心试验室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在批判林彪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罪行的时候，始终以批林批孔为中心，并且联系现实的斗争实际，批判了贪大求洋、洋奴哲学，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他们一边批判林彪、孔老二，一边学习有关文件，同时联系实际，重新审查了两个工程的施工方案，提出“可增可不增的设备坚决不增；可用国产设备的坚决不进口；能够自己制造的设备坚决不向国家伸手”。经过发动群众初步讨论，削减了七台原来打算进口，价值几十万美元的设备，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和外汇，进一步贯彻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林批孔，要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群众运动的持续高涨。开始，少数同志有顾虑：这样一个大的运动，会不会影响生产？也有个别同志怕抓了生产，会不会重复文化大革命初期“抓生产，压革命”的错误。党委及时抓了这个问题，在干部和骨干中统一了思想。批林批孔，要开批判会，写大字报，学好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搞调查研究，需要花一定时间。但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列宁说过：“**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我们厂的实践证明：工人群众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焕发出来的革命积极性是难以估计的。他们一肩挑起了两副重担，豪迈地提出：既要当好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又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闯将。运动开展以来，工人同志坚持在生产以外的时间闹革命。如果因为参加批判会，准备批判稿，部分同志需要占用生产时间，班组里留下的同志就自觉地把他们的任务担当起来，一个人完成两个、三个人以至更多的工作量，比平时干得更加出色。因此，每当厂里批林批孔斗争掀起高潮的时候，生产也往往会出现高潮。一月三十日，全厂召开批判大会，第一电炉车间抽出了三分之一的工人参加大会，可是，就在这一天，日产量比平时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二月一日



到二十日，全厂电炉钢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钢材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以上，取得了革命、生产的双丰收。

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批林批孔，党委一定要敢于领导，站在运动的前头。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以为实施具体领导，就是束缚群众的手脚，因而遇到问题不点头、不摇头，错误地认为这是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可以避免重犯路线错误。对此，我们在学习中，以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指示为武器，回顾了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认识到我们有的同志之所以有这些错误思想，根本原因是对当前这场政治斗争还很不理解，没有真正领会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指示的精神实质，而从思想上来说，还是怕群众、怕革命，是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当前，在批林批孔这场严重政治斗争中，是积极还是消极，是敢于领导还是不敢领导，是对每一个党组织有没有战斗力的严峻考验，也是对每个领导干部的考验。党委要真正成为带领广大群众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指挥部，就得教育干部“**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要走在前头，就得轻装。有些同志怕群众联系实际揭矛盾，问题摆了一大堆，难以解决，而不解决就会被动；有的同志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领导运动就缩手缩脚。对于这些同志，我们着重帮助他们认识在当前这场斗争中，领导不应该把自己放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应该坚决同群众站在一起战斗。群众揭矛盾，并不是要整几个干部，而是为了批林批孔，防修反修。干部有错误，就应当诚恳接受群众批评，自觉革命，改了就好。党委要及时地做好工作，帮助和鼓励他们纠正错误，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

我们厂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我们决心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反复领会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的精神实质，努力加深在这场重大政治斗争的认识，提高觉悟，坚定信心，依靠群众，大胆领导，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把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切实抓紧抓好。



联系路线斗争实际批林批孔

河北安平县南王庄大队党支部

我们南王庄大队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迅速掀起了批林批孔的高潮。我们大队党支部加强了对这场运动的具体领导。同时，我们也充分发挥贫协、共青团、妇联会等组织的积极作用，并组织骨干串门串户，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现在，全村的干部、党员、青年、妇女、学生和老人，都普遍发动起来了。广大群众怀着对林彪、孔老二的深仇大恨，到处摆起了战场，口诛笔伐，人人参战。大队、生产队已经召开批判会六十多次，在会上发言的有六百多人，办批判专栏十八处，写批判文章二百六十多篇。大家对林彪和孔老二妄图复辟的反革命罪行，愤怒地进行了声讨和批判，批林批孔的怒火越烧越旺。

批林批孔是一场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虽然孔老二死了两千多年，林彪也完蛋了，但他们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因此，批林批孔必须充分发动群众，首先联系林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在批判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使这场斗争深入下去、开花结果的一个重要问题。

林彪和孔老二是一类货。他们一个唱的“复礼”调，一个念的复辟“经”，都是要开历史的倒车。我们在批判“克己复礼”这个反动纲领时，回顾了南王庄农业合作化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九五四年，我们村三户贫农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带头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可是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有人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硬要把他们这个社砍倒，逼着他们散摊子。三户贫农坚决顶住了这股复辟风，把社办下来了。他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高度赞扬，毛主席说：“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但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并没有死心，



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在国民经济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一伙极力鼓吹“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黑货，我们村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富农分子就跳出来，叫嚷“牲口分户饲养”，鼓吹“单干”。贫下中农又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阶级敌人又跳出来捣乱，他们胡说三户贫农办社是“假的”，妄图否定三户贫农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夺权变天。贫下中农纷纷起来，及时地戳穿并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林彪搞资本主义复辟，最适合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需要。如果他们上了台，就会把贫下中农重新推到苦水坑里，再吃二遍苦。在批判林彪“克己复礼”这个反动纲领时，大家回忆了解放前地主残酷压榨贫下中农的悲惨情景。那个时候，南王庄全村三百来户，欠地主债的就有二百一十户，要过饭的有一百二十四户，卖儿卖女的五十四户，给地主扛长活、打短工的三百八十多人。一些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用自己在旧社会血泪斑斑的家史，愤怒控诉和批判了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通过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忆旧社会的苦，进行深入批判，对“克己复礼”的反动本质就看得更清楚了。贫下中农认识到，林彪搞“克己复礼”，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就是要复辟倒退。广大贫下中农说：林彪妄想让我们走回头路，绝对办不到。我们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走下去。

要坚持“五亿农民的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中庸之道”，不断地同阶级敌人斗，同资本主义倾向斗。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联系了解放以来南王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认识到所谓“中庸之道”，就是“转向之道”、“复辟之道”，斗则进，不斗则退。六队有个地主分子，平时装得象个猫似的，骨子里却时刻妄想变天复辟，一有机会就进行破坏。有一次在浇地时，他故意用铁锨砍伤牲口，使生产受到影响。群众当场抓住这件事，批判斗争了他。由于我们坚持了斗争，不断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使我们大队的革命和生产不断取得新成绩。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有的人头脑里阶级斗争观念淡薄了，认为敌人该斗的斗过多少次了，该批的批过多少回了，他们已经是“霜打的茄子——蔫了”，成不了什么“气候”了。可是阶级敌人并没有死心。在一次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时，还是那个地主分子，又跳出来，破坏农业学大寨。阶级敌人就是这样歹毒，他们是从来不讲“中庸”的。大家还联系资本主义倾向，批判了“中庸之道”。有一个队，以搞副业为名，违反国家规定，私自买了一部分油料，拿到大队油坊加工。党支部发现后，制止了这种错误作法，并组织干



部和群众讨论、批判。但有的人思想转不过弯来，认为没有必要拿到群众中去讨论，用不着批判。在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联系副业生产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分析，认识到：不顾国家计划，怎么赚钱就怎么干，就会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他们表示，今后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一切削弱集体经济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作斗争。

联系我们南王庄这一场场斗争，批判林彪、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大家受到了深刻教育，进一步认识到，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大家都当“和事老”，我们国家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南王庄也不会有今天。贫下中农说得好：林彪一伙鼓吹“中庸之道”，就是不让我们搞阶级斗争，妄想捆住我们的手脚，让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决不上他们的圈套。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还联系农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教育群众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例如，林彪曾经宣扬孔孟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我们大队的阶级敌人就散布什么“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在批判这种谬论时，贫下中农联系村里的阶级斗争实际，认识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实质就是让人们俯首帖耳，听任林彪之流搞资本主义复辟。有一个老贫农用南王庄解放前后的变化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谬论。他说：“解放前，咱南王庄是个旧河道、白沙滩、祖祖辈辈受熬煎的穷村子，地主老财说咱受罪是命里注定。可是解放后，天还是这个天，地还是这块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靠咱这些泥腿子，平岗填沟，打井修田，把一个穷村子变成了棉过百、粮超千、树木成林果满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是靠‘命’给的，而是靠革命得来的。”

随着批林批孔斗争的逐步深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有了新的提高。贫下中农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成为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关心国家大事，热爱集体，已成风气。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决心越来越坚定。我们村现在有二十五岁以下初中、高中毕业生一百多人，经过批林批孔，都表示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受到沉重打击，社会主义新思想进一步发扬。

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贫下中农，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反林彪、孔老二之道而行之，坚持斗争，坚持革命，认真抓好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大步前进。



反修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辛 风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光辉著作，是适应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历史时代的需要，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激烈搏斗中写成的。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怎样对待帝国主义，怎样对待战争和革命的问题，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列宁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斗争的最伟大的旗手。在这场斗争中，列宁写下了一系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的重要文献，《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是一部代表性的著作。列宁在这部著作中，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矛盾以及它同修正主义的联系，指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垄断资产阶级为维持其反动统治，用从殖民地和附属国掠夺来的高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造成了工人运动的分裂。列宁批判了考茨基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反动谬论，彻底地揭露了他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的丑恶面目。这部著作，是指引全世界无产阶级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战斗纲领。

列宁的著作，发表于半个世纪以前。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但是，正如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那样，今天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通过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所作的理论概括，今天仍然是我们批判社会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概括了大量的实际资料，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就是说，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彻底批判了考茨基为帝国主义所下的**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按照考茨基的说法，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而是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既然是“情愿采取”的政策，就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似乎经济上的垄断可以和非掠夺、非暴力的政策并存。列宁指出：“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政治上的垄断制和经济上的垄断制割裂开了，来为他的鄙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即‘裁军’、‘超帝国主义’之类的谬论扫清道路。这种理论捏造的全部用意和目的，无非是要掩饰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从而为同那些帝国主义辩护士即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实行‘统一’的理论辩护。”（《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内的垄断统治通过资本输出和扩张经济势力形成国际垄断，必然要推行霸权主义，直到通过战争来达到它们按照实力瓜分世界的目的。垄断统治一天不改变，帝国主义各国的根本政策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列宁说：“同托拉斯和银行的政策‘作斗争’而不触动托拉斯和银行的经济基础，那就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不过是一种善良而天真的愿望而已。”列宁所阐述的这一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它的政策的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资本帝国主义，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帝国主义。

和资本帝国主义一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是垄断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前，苏联工人阶级通过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占有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的性质，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的。“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



上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国家政权，疯狂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国家政权性质变了，从根本上说，国家所有制的性质也就变了。社会主义国有制已经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也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在苏联的国有企业里，工人阶级完全处于无权和被奴役的地位。企业经理有权“占有、使用和支配”企业所属财产，有权“出租”、“转让”和“出售”企业“闲置”的生产资料，可以自行“招收和解雇工人”，随意把工人踢出工厂大门。在那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关系，完全是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横征暴敛，巧取豪夺，通过利润和税金等形式无偿地占有企业工人创造的大量财富，并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和名目繁多的额外收入，贪婪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六、七十卢布，而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的工资高达几千卢布，相差几十倍到一百倍。苏修的许多文艺作品中，都描写了这种无情地压迫剥削工人以养肥自己的所谓“当代英雄”。

苏联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其实质来说，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它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蜕变来的，集中程度更高，垄断性更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推行霸权主义的经济根源。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什么在“援助”和“友谊”的幌子下，向许多国家扩大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攫取高额利润？为什么同美国帝国主义既争夺又勾结，妄想称霸世界？为什么声东击西，加紧争夺欧洲，争夺中东，并且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区扩张？为什么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掠夺东欧国家，陈兵中国边境，在亚非许多国家进行颠覆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产生于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它的国外政策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内政策的继续。只要苏修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变，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不变，它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必须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来观察苏修的政策。把经济基础和政策割裂



开来,就不可能认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毛主席指出:“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个论断完全适用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引起它的寄生和腐朽的趋势。列宁指出:“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考茨基胡说什么资本主义“比半个世纪以前具有更大的生命力”,这完全是给帝国主义涂脂抹粉。

帝国主义寄生性和腐朽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人为地在某些方面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资本家为了追求超额利润,必须采用新技术,否则就会在竞争中破产。在垄断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资本家可以获得垄断利润,就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改进技术的动力,甚至要人为地阻止技术进步了。

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的腐朽趋势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不平衡,少数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腐朽性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是这种状况。美国就是一个腐朽性很突出的国家。美国经济一直依靠国民经济军事化来支撑,军火生产在各个经济部门所占的比重日益增长,民用工业落后。工业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都低于日本、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战后已经多次爆发危机,美元一再贬值。连美国统治集团也不得不哀叹今非昔比,美国的地位大大下降了。另一个超级大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情况同样不妙。它为了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也日益加紧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使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到军火生产上。苏修公布的军事费用数字同实际数字距离很大。据估计,一九七二年,苏修的实际军事费用,约占国家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苏修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为美国的一半左右,而它的军费却与美国相差无几。军事开支的庞大,军事工业的恶性膨胀,造成民用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落后,农业长期停滞。现在,苏修的工业



总产值增长率不断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粮食不足，商品奇缺，物价高昂。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内债外债与日俱增。为了应付国内经济一团糟的局面，苏修极力向资本主义国家乞求贷款，拍卖资源，但是，这不过是饮鸩止渴，只能使矛盾更加尖锐化。

两个超级大国表面上神气十足，架子很大，到处伸手，用各种手段互相争夺，内部却矛盾重重，虚弱得很，经不起风吹草动。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弄得原形毕露。一个“石油武器”，就把美帝国主义搞得惶惶不可终日了。

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就是说，这种制度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发展到极点，接着就是革命的开始。列宁尖锐地批判了臭名昭彰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的谬论。指出考茨基宣扬什么“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从而可以停止战争，废除军备，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是“**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它和社会主义之间，根本不可能再出现什么“超帝国主义”阶段了，帝国主义的崩溃，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帝国主义阶段，金融资本的统治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武力来解决矛盾，就没有别的出路。“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市侩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按照实力，在某一个时候，在某些问题上，表面上达成一些协议，也只是为了暂时承认现状，以便准备力量在下一回合中进行更大的争夺。一旦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任何“协议”都会统统变成废纸。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事情见得还少吗？

今天，世界上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这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



国家，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进一步争夺。苏修叛徒集团宣扬什么“军事缓和”、“政治缓和”，完全是为了欺骗世界人民，为它的霸权主义打掩护。苏修叛徒集团宣扬什么“持久和平”，是重新搬出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的谬论，掩盖自己的侵略目的和叛徒嘴脸，阻碍国内人民和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正如列宁当年批判考茨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过的：“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呢，——**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的根本问题。**”苏修叛徒们也说什么要“缓和”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引起的种种矛盾，但“天下大乱”的事实却每天都在无情地揭穿这种修正主义的谎言。他们天天喊“缓和”，实际上无论在欧洲，在中东，在印度洋，都处于剑拔弩张之势。现在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什么欧安会，中欧裁军会，都是空话，目的是向欧洲人民散布和平幻想。这一点，欧洲也有许多人越来越了解了。苏修美帝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苏美两家的所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已经谈了四年多，越谈，双方的核武器越多。最近，就在二月十九日第二阶段会议复会这一天，苏修竟再次向太平洋水域发射能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新型洲际导弹，以表示其核裁军的“诚意”。真是绝妙的讽刺！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愈演愈烈，把整个世界闹得很不安宁，大大加剧了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这对革命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唤醒和锻炼了人民，特别是加强了第三世界的团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主宰世界命运的决定力量。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衰败没落。“**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无可奈何花落去”。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十世纪初，列宁同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奏。今天，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列宁非常确切地把考



茨基称之为“**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者。就是说，考茨基虽然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辩护士。苏修叛徒集团作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和考茨基在阶级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也有不同之处。它已经篡夺了国家政权，运用整个国家机器实行帝国主义政策。苏修叛徒集团不仅宣扬修正主义谬论，而且利用从其他国家攫取的高额利润，收买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工人贵族（不管是已经掌握政权的还是没有掌握政权的），在全世界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为了维护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利益，实现它侵略和扩张的野心，苏修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对于别的国家，除了用武力占领、干涉之外，还千方百计从内部进行颠覆。在这方面，全世界人民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一切先进的人们，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揭露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并同它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

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我国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林彪这个“超级间谍”，就是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叛徒、卖国贼。他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把我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林彪攻击我们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做绝了”，正表明他们是一伙，正表明我们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打中了这伙叛徒的要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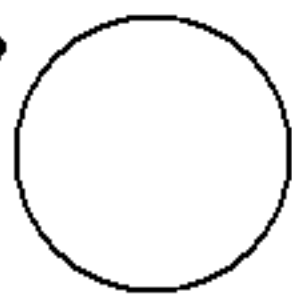
列宁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同时，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同修正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当前，就是要通过批林批孔，深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认真阅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可以从中学习列宁怎样把反帝反修密切结合起来的斗争经验，掌握反修斗争的锐利武器，把当前批林批孔斗争搞得更加深入，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锄毒草 化肥料

到底是谁家的“工具”？

——评安东尼奥尼的“申辩”



华 言

一年多以前，安东尼奥尼提着他那便于进行偷拍的“超八毫米摄影机”，极为得意地离开了他所敌视的中国。这个自称为“天生的悲观主义者”的导演，此时此刻倒并不“悲观”，他为这次在中国钻了一次空子——以特务手段拍摄了反华影片而沾沾自喜：拿这部反华影片作为投靠新主子的“礼物”，岂不可以改变自己很久以来“怀才不遇”的处境？然而，安东尼奥尼毕竟高兴得太早了。这部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现在正受到中国人民义正辞严的批判。许多国家的人民，包括意大利人民和许多友好人士在内，也都纷纷谴责他的无耻的反华行径。

于是，安东尼奥尼慌了手脚，急忙跳出来“申辩”道：“凭良心，我没有作过这样事，我不承认污蔑中国和歪曲中国现实的指责。”安东尼奥尼的“良心”，就是帝国主义强盗和骗子的“良心”。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正是“凭”着这种“良心”，疯狂侵略和瓜分中国。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以后，他们又“凭”着这种“良心”，恶毒地“污蔑中国和歪曲中国现实”。中国人民对这种“良心”实在是领教得够多了，早就看透了。而安东尼奥尼居然还象宣布真理似地宣布这样的“良心”是洁白无瑕的，这能骗得了谁呢？看来，他似乎至今仍在迷信法西斯头子的那句“名言”：谎言重复多次就会变成真理。所以他在“申辩”中，不只是竭力洗刷自己的罪行，甚至还倒打一耙，说中国人民批判他这部反华影片是把他当作了“一场兴起的政治争论



的适时的工具”。

这可不得了。堂堂一个名导演，怎么忽然成了一种“适时的工具”呢？其实，只要把安东尼奥尼的“良心”放在阶级斗争中去考察，就可以知道他自称“工具”的说法，正暴露出他自己的真实嘴脸。他的确是一种“工具”，但不是什么中国人民把他当作了“政治争论”的“工具”，恰恰相反，是他甘心情愿地充当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工具”。

何以见得安东尼奥尼是充当了这样的“工具”呢？这应该从他所谓的“政治争论”谈起。谁都知道，我国国内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国外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就在苏修叛徒集团的“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以后，我国人民正在深入进行批林整风的时候，安东尼奥尼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闯进了中国。他从自己漆黑的“良心”出发，采用种种卑劣的电影手法，把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中国拍得一团漆黑。他通过一系列肆意歪曲的画面和用心险恶的解说，妄图证明过去作为帝国主义冒险家“乐园”的旧中国，比现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要“繁荣”得多。这种“今不如昔”的论调，同林彪反党集团污蔑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妄想“克己复礼”的反革命叫嚣，多么相似！安东尼奥尼来华以前，曾向西方记者表白：“我此行不带脚本”。其实，他的“脚本”早就有了，林彪和他的后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内容，不就是他现成的“脚本”吗？林彪“克己复礼”不成功，“天马”跌下来变成了死马。要说这个打击对苏修有多么大，那就甭提啦！安东尼奥尼当然也不愿意看到由于林彪的垮台而在中国断了“复礼”的烟火。所以，在这“一场”兴起的政治争论”的时刻，他才把苏修污蔑中国的那一套反华滥调再现于银幕上。这究竟是适应了谁的需要，充当了谁的“工具”，岂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有趣的是，在问题揭开之后，有个西方记者偏要刨根追底，去问安东尼奥尼究竟是不是“俄国的应声虫”。安东尼奥尼“耸了耸肩膀”，表示“不打算说得稍明确点”。他很难为情地说：“这只是表面，……是吗？”要这位导演公开承认自己是“应声虫”，未免使他太下不了台阶。但是，安东尼奥尼为了顾全面子，居然把“应声虫”说成只是“表面”的现象，这就欠妥了。既然这位先生惊慌失措到了



语无伦次的地步，那也不必太使他为难了。关于这个“应声虫”是否同苏修的反华声音配合得“适时”的问题，还是让事实来“说得稍明确点”吧——

在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初之间，苏修开动它的宣传机器，拼命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经济处于停顿状态”。于是，安东尼奥尼来到我国以后，不反映我国“抓革命，促生产”的真实景象，却在反华影片中硬污蔑说“文化革命打乱了生产系统”。请问，安东尼奥尼先生，这不就表明你这个“应声虫”“应”的完全是同一个调子吗？

还是在一九七二年初，苏修污蔑我国人民“不自由”，甚至胡说革命“使儿童丧失人的感情”。所以，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当家做主、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视而不见，见而不拍，却在其反华影片中恶意暗示中国人民受压抑，污蔑中国儿童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政治性”歌曲和他们“如此可爱”的年龄不相协调。请问，这不就表明你这个“应声虫”的“良心”是完全和苏修心心相印的吗？

也是在安东尼奥尼来华之前不久，苏修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历史文物不计其数”。安东尼奥尼为了替苏修这一诽谤作印证，在反华影片中胡说什么我国有的城市现在“遗留下来的完整无缺的古迹已寥寥无几”。安东尼奥尼宣称这次来中国拍片“是寻找形象的，而不是寻找判断”。其实他的“判断”本来就不用“寻找”，事先就是以新沙皇的反革命“判断”为判断的。既是如此，他怎么会“寻找”中国人民的革命形象？他又怎么会反映出我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真实情况？又怎么可能把我们文艺舞台上英姿飒爽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当作他拍摄的“形象”呢？

又是一九七二年初，苏修叛徒集团七拼八凑地拍摄了一部大肆污蔑我国的电视纪录片。此片毫不掩饰地说：希望中国“重新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希望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重新”变成黑暗世界。于是，安东尼奥尼在拍完同一主题的反华影片回到罗马以后，特地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用一种算命先生的腔调介绍自己的体会说：“更大的可能是中国将会被污染，而不是我们被净化。”这里所谓的“污染”与“净化”，显然是双关语。就是说，中国“更大的可能”是被资本主义改造过去，而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句话毫不



新鲜，它是当年杜勒斯的预言，也是今天新沙皇的心愿。然而，杜勒斯看不到这一预言的实现就去见他的上帝了；新沙皇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心愿变成现实，却偏偏目睹了刘少奇、林彪相继完蛋！心愿未遂就成了心病。怎么治好这种心病呢？最好的药方就是攻击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谁如果能把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后的现状说得越糟糕，那么他医治这种心病的疗效就越灵光。在这个意义上说，苏修拍的反华电视片的确不如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疗效大。这是因为：前者是苏修自己关门炮制的，人家一看就不可信，而后者是打着“公正”、“客观”的幌子，钻到中国来拍摄的。安东尼奥尼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的所谓“更大的可能”云云，与其说是讲给罗马记者们听的，倒不如说是讲给莫斯科新沙皇听的。他的潜台词是说：陛下请放心吧，我这个“工具”所拍的这部片子正在为实现您的心愿服务呢！

果然，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一出笼，新沙皇看了之后真象吃了补药一样心花怒放。当中国人民起来反击的时候，苏修赶忙纠集它国内外的宣传工具，拼命给安东尼奥尼撑腰打气。例如一家苏修报纸竭力吹捧“他是一位大艺术家，举世闻名的电影导演”，“过去没有任何人曾经这样想过”他是一个“反动分子”。它还公然说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现实的无耻歪曲不算是“污蔑”。苏修这样露骨地为这个“工具”鸣冤叫屈，显然是想挽回他的失败，以便通过这部反动影片掀起一股反华恶浪。但是，苏修叛徒集团在匆忙之中却忘记了两点：第一，时代前进了，在世界人民的觉悟日益提高的今天，谁想反华就只能孤立他自己；第二，安东尼奥尼过去所以能比苏修其他的间谍起更大的作用，就在于他还披着一件“自由”的艺术家外衣，如今你们拼命庇护他，岂不是正好暴露了这个所谓“举世闻名的电影导演”和你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告人的肮脏关系吗？

安东尼奥尼投靠苏修并不是偶然的。此人为反动派效劳，远不自今日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当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风起云涌的时候，他一头栽进了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开始了忠实地为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卖命的反动生涯。这时他拍摄的纪录影片中，把劳动人民拍成愚昧无知的“可怜虫”，充分发挥了他作为法西斯“工具”的反革命作用。一九四二年，他根据意大利法西斯宣传机关“政



治片与战争片摄制处”的命令，为了给沾满人民鲜血的法西斯军队树碑立传而编了电影剧本《一个航空员的归来》，肉麻地吹嘘法西斯空军如何“英勇善战”，如何“忠于法西斯意大利”。这样一个老牌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革命人民中间早已是臭不可闻了，而在苏修的心目中他不但不“反动”，还香得很呢，这就充分说明他们沆瀣一气，臭味相投。明于此，人们对这个“工具”如此“适时”地拍摄反华电影，苏修又如此“适时”地给他喝彩，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现在，安东尼奥尼的“良心”已经昭然若揭了。对这位先生的政治面貌，如果要“一言以蔽之”的话，借用他在这部反华影片中污蔑中国人民的那句“既想念过去，又忠于现在”，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是“既想念过去”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又忠于现在”的勃列日涅夫之流。在十八世纪意大利，有一出著名喜剧，叫做《一仆二主》，写的是一个自称“口齿伶俐，能随机应变”的小丑，在伺候两个主人的过程中如何从中渔利。在二十世纪意大利，安东尼奥尼用自己的反动言行，自编自导自演了另一出“一仆二主”。但这出戏并不是喜剧，剧里的小丑随着他的老主子被反法西斯战争打得家破人亡，就成了一条丧家的乏走狗，这便是他“天生的悲观主义”的来由。但后来他在“悲观”中总算得到了一点欣慰，从苏修统治者勃列日涅夫之流的身上看到了法西斯主义并没有绝种，他就摇尾乞怜找到了新主子。这个小丑虽然也“能随机应变”，但决不能改变自己失败的命运。安东尼奥尼的“一仆二主”，上半场戏以其老主子的灭亡而落幕，下半场戏尚未结束，但它的结局则可以在此预告：他和新主子的拙劣表演也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末了，还要提一笔的是，盘踞在我国领土台湾省的蒋介石集团，最近也拚命在为安东尼奥尼大吹特吹。他们简直象吹肥皂泡似的，把这个被世界人民嗤之以鼻的反华小丑吹成了“一位世纪性的大人物”。牛皮吹得如此之“大”，倒恰恰成了“世纪性的”笑话。但这也不足为怪，蒋介石集团早就陷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绝境，整天用叫喊“处变不惊”来掩饰极度惊慌的心理，现在忽然发现了这根稻草，怎能不赶快抓住呢？可惜稻草毕竟只是稻草，无论怎样吹嘘它的反动作用，它也救不了蒋介石的命。妄图依靠这个苏修的“工具”来打强心针，继续作垂死挣扎，与全国人民为敌，只能使自己灭亡得更快。



评晋剧《三上桃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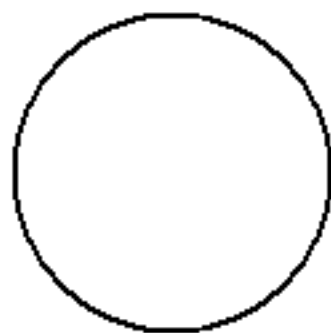
初 澜

当前，文艺战线的形势同各条战线一样，一派大好，欣欣向荣。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蓬勃兴起，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越来越多，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情鼓励和欢迎。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迅猛发展的趋势，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取得的新胜利。但是，文艺战线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总是敏锐地反映着社会上的政治斗争。在大好形势下，冒出个把毒草，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由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的晋剧《三上桃峰》，就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

《三上桃峰》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说的是某公社杏岭大队，以欺骗手段把一匹病马当作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发现此事，亲自三上桃峰，退款道歉。

该剧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声称：“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嘛！”“《三上桃峰》就是要通过小题材表现大主题”。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三上桃峰》的“大主题”究竟是什么？



《三上桃峰》的出笼，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

在我党的历史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战斗任务。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在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不久，刘少奇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人民群众，保护牛鬼蛇神。刘



少奇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窜到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以“四清”为名，行复辟之实，炮制了一个旨在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桃园经验”。王光美狂妄地说：“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习桃园。”妄图用桃园对抗大寨，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以及“桃园经验”，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向深入。

但是，刘少奇一伙贼心不死，负隅顽抗。王光美不得不从桃园撤退以后，还留下一个“巩固组”，送去一匹大红马，死守桃园这块阵地。他们不仅在桃园附近立起了一块高达丈余的石碑，上刻“永不忘记”四个大字，为她树碑立传，王光美还亲自跑到旧文联礼堂作报告，策动文艺界运用文艺形式来为她树碑立传，歌功颂德。

就在这样的历史政治背景下，一九六五年夏天开始，在被旧中宣部这个阎王殿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围绕着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主持宣传的人特意提醒说：这个“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唐山地区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深思。”“深思”什么？就是要人们看清楚这个故事是为王光美涂脂抹粉的，是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导演的“桃园经验”翻案的。

在这场阶级斗争中，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及其同伙，倾巢而出，喧嚣一时。在当时被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的文艺界，以《一匹马》的故事为题材的报告文学、连环画、纪录影片和各种样式的戏剧、曲艺，纷纷出笼。旧中宣部的一个副部长，指令在北京的某一话剧院赶排同一题材的《春风杨柳》，叫嚷“要搞出样板，起示范作用”。旧文化部的一个副部长，计划亲自带领一个文化工作队去抚宁县，把王光美蹲点的这个地方搞成群众文化活动的“样板”。

紧步周扬之流的后尘，一九六六年一月，山西省的《火花》戏剧专刊，以卷首的显赫位置，发表了根据上述通讯改编的大型晋剧《三下桃园》。请同志们注意：通讯中的真实地名是“桑园”，剧本却偏偏改为“桃园”。一字之易，点在题上，更为醒目。剧中大唱什么“社社队队全一样，唯有桃园大不同”，用反动的“桃园精神”，对抗毛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他们唯恐观众看不清楚这个戏的政治意图，还煞费苦心设计了原通讯中没有的人物——一个姓王的女县长，让她从幕后走到前台，颐指气使，招摇过市，用她之口点破这个剧本的主题



在于歌颂桃园“社教运动的胜利果”。这是在文艺舞台上为刘少奇、王光美树起的又一块“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三下桃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这块“碑”被推倒了，打碎了。事隔八年，在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励下，《三下桃园》改名为《三上桃峰》，又被重新搬上舞台，把这块被推倒了、打碎了的“碑”又树了起来。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从《三下桃园》到《三上桃峰》，中心事件没有变，故事情节没有变，基本的人物关系也没有变。惹人注意的三处改动是：一、“桃园”变为“桃峰”；二、时代背景从“四清”运动后的一九六五年推到了一九五九年；三、那个姓王的女县长不见了。然而，越描越黑，欲盖弥彰。这些改动，除去说明炮制者完全知道一匹马的故事的政治背景，完全知道《三下桃园》的政治要害，作贼心虚，害怕马脚太露以外，丝毫不能说明别的。

人们不禁要问《三上桃峰》的炮制者和支持者：既然明明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三下桃园》，明明知道这个毒草剧本的要害所在，为什么现在又为它改头换面，乔装打扮，迫不及待地搬上舞台？

《三上桃峰》的炮制者曾经说过：“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戏早就红了！”一语泄露了天机：他们这个戏跟刘少奇是同命相连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刘少奇垮台了，他们如丧考妣，于心不甘。经过几年的炮制，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了，就明目张胆地把《三上桃峰》抛了出来，大喊大叫什么“《三上桃峰》是山西的代表性剧目！”“《三上桃峰》是经过七年锤炼的。别的戏不上，行；《三上桃峰》不上，不行！”当演员表示不愿排练这个戏时，他们竟威胁说：“是毒草也要演”，不演就“以破坏革命现代戏论处”。看，他们要用这个戏来为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气焰何等嚣张！可是，当革命群众揪住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之后，他们又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什么“没有看过原来的报道”呀，“不知道这个故事有什么政治背景”呀，等等。躲躲闪闪，支支吾吾。事实胜于雄辩。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三上桃峰》是经过精心炮制，有人批准，有人支持抛出来的。《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抵赖不掉的！

二

从《三上桃峰》的政治背景看，是为刘少奇翻案的。从《三上桃峰》所表现的政治内容看，也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为刘少奇、林彪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



第一,《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竭力鼓吹刘少奇、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三上桃峰》却千方百计地掩盖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大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二而一”。对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杏岭的贫下中农和党员不反击,不斗争。剧中还将老六美化为想为集体“办好事”的人。对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杏岭大队的大队长李永光,不仅不去表现党员、群众对他的斗争,反而为他开脱罪责,把他的错误性质说成是什么“本位主义思想”,还为他评功摆好,故意回避这场尖锐激烈的路线斗争。

在这个戏里,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可真是个人人“忠恕”、个个“礼让”的“君子国”呵!当年大刮吹捧“桃园经验”的妖风时,报纸上不是有人通过讲述小说《镜花缘》里“君子国”的故事,号召人们在创作中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君子国”吗?《三上桃峰》的炮制者果然把一个“君子国”搬上了舞台。这个“君子国”不是别的,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已经建立过的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劳动人民重新受压迫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王国!

第二,《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狂热地宣扬刘少奇、林彪所贩卖的“孔孟之道”,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冒充为共产主义风格和无产阶级思想。

风格是观念形态,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风格是有阶级性的。《三上桃峰》所宣扬的这种不讲阶级、不讲路线、互相“礼让”的“风格”,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两千多年前,反动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丘之流鼓噪什么“忠恕”、“克己”,什么“礼之用,和为贵”,目的是“复礼”。刘少奇、林彪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也大讲什么“以德报怨”、“忍辱负重”,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目的是复辟。《三上桃峰》所宣扬的“风格”,就是这种主张倒退、反对革命的孔孟之道,是束缚革命人民斗争意志的精神枷锁。剧中的“风格”体现者、主要人物青兰,就是奉行孔孟之道的典型人物。她在全剧中的行动,就是往来奔波于杏岭、桃峰之间,忙于补过失、堵窟窿。这是个只抓小事不抓大事、只顾“马情”不顾敌情的政治庸人。炮制者把这样一个依照黑《修养》的



规格铸造出来的人物，冒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赋予她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名字，就是要人们学习青兰，做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以便推行他们“复礼”、复辟的反革命政治路线。

第三，《三上桃峰》的炮制者，采用含沙射影的卑劣手法，使用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语言，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诋毁和谩骂。

全剧结构的中心是马。戏的开头，作为主要人物的青兰，在初上场的唱段中唱道：“持续跃进，万马奔腾”；接着，在同一场，她又唱道：“他扬鞭催马猛驰骋，菊花青怎经得猛烈奔腾”，于是，全剧就围绕着这匹病马兜起圈子来。剧本告诉人们，这是一匹患有“脑迷症”，“病了好几个月”的病马，此马“千万不能猛骑快跑”。后来，它被猛骑了一阵，由于“快速奔跑使猛劲”，就“浑身淌汗，四肢发抖”，卧倒在地，终于死去了。对此，剧本叫嚷“要接受教训”。好一个“接受教训”！须知这个剧本是把故事的发生年月别有用心地改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的。这时，正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革命红旗高歌猛进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剧本刻意讲述一个“跑死病马”的“寓言”，它的矛头所向难道还不清楚吗？这种咬牙切齿的咒骂，和赫鲁晓夫对我们的诬蔑有何不同？和刘少奇攻击大跃进是“搞的太猛，出了毛病”的黑话，有何不同？和林彪一伙攻击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的黑话，有何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人民群众的劳动所结出的胜利果实是抹杀不了的，这种咒骂只能暴露出这个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更有甚者，当剧本写到病马累死之后，另一匹马就立即登场了。这匹大红马是由剧中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牵上台的。这匹象征着资本主义“胜利”的马一上场，就博得了满台人物的一片喝采：“好马！好马！好马！”连用三个“好”字。无需再做解释了，作者的用心已十分明白。他们就是要通过这两匹马的对比，咒骂党的正确路线，呼唤资本主义复辟。

晋剧《三上桃峰》大肆兜售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黑货，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他们叫嚷这出戏要表现的“大主题”，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刘少奇、林彪和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有人还叫嚷这出戏“好就好在突破了样板戏的框框”，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敌、与革命样板戏为敌的反动面目。《三上桃峰》正是顽固地坚持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集“无冲突论”、“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人性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之大成的大毒草。



三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过去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复辟与反复辟、倒退与反倒退的激烈斗争。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要作垂死的挣扎，妄图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进行复辟的一个常见方式，就是利用文艺为历史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翻案。六十年代初，有人抛出《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如今又冒出个《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就是这一阶级斗争规律的生动例证。

从《一匹马》、《三下桑园赎马记》，到《三下桃园》，再到《三上桃峰》：桑园改桃园，桃园变桃峰；一匹病马上台又下台，下台又上台。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不管革命的阶级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的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还是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想避免，也不可能。它说明了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从来就是政治战线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反映。某些地区、某些部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现象，就是政治上那股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翻案风在文艺上的表现；这也是和国际上阶级敌人反华、反共、反革命的反动逆流相呼应的。它还说明了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击中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要害，他们必然要跳出来进行破坏和捣乱。

因此，我们对大毒草《三上桃峰》的批判，不是一般的文艺论争，不是什么创作问题，而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斗争，今后还要长期地进行下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一定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密切注视思想文化战线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新特点，反击一切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大好形势，夺取新的胜利！

（原载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从农业出发办好地方工业

庄 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的地方工业呈现出一片蓬勃兴旺的景象。钢、铁、煤、电等基础工业，直接为农业服务的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以及具有不同特点的轻工业，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地、县办的和社、队办的“五小”工业，星罗棋布，遍及城乡。地方工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农业，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形势大好的标志之一。

发展地方工业的经验又一次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经过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遵循“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坚持立足于农业、服务于农业的正确方向，从而促使我国地方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要进一步加快地方工业的发展，最根本的是必须抓大事，抓路线。当前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斗争，是批林整风运动的继续和深入，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搞好这场斗争，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抓紧抓好这件大事，才能促进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我们应当深入地进行批林批孔，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认真总结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对社会



主义工农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中央统一计划下，为加速农业的发展，继续办好地方工业。

从农业出发办地方工业，需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发展地方工业，加强对农业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这是进一步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迫切要求。**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不断发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耕作制度的改革，复种面积的扩大，要求工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机械、工具、化肥和其他产品。这就不仅需要中央办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发挥支援农业、武装农业的骨干作用，而且尤其需要积极发展地方工业，以适应农业的需要，促进农业的发展。我国农业正处在机械化的过程中，**需要工业**提供物质技术装备的数量是很大的；而且地域辽阔，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经营的农业生产项目各不相同，生产工具也不尽一样，要求工业提供的技术装备也是各种各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中央的大型企业，不积极发展地方工业，就不能完全满足发展农业生产的这种大量的、多方面的需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努力发展地方工业，使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就能更好地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更加有力地支援农业，推动农业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能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地方工业？关键在于路线。广西横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使得有的同志滋长了依赖、等待的思想，缺乏积极性，结果，县办工业发展很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办工业的积极性。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围绕农业的需要，积极发展地方“五小”工业。现在，这个县已拥有钢铁、煤炭、农机、化肥、水泥、农药等县办厂矿四十多个，为支援农业连年丰收贡献了力量。地方工业从基础薄弱到基础雄厚，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需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雄厚的工业基础总是从薄弱的基础



开始的，任何比较完善的工业产品也都是从不完善来的。只要我们路线对头，有从农业需要出发办地方工业的积极性，总是能够把事情办好的。大的做不了可以从小的开始，复杂的还不会做可以先搞简单一点的，有的项目今年不能办，明年可能办起来，今年办得不那么好的，明年后年可能办得好。这样，在支援农业的过程中，地方工业就能从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比较迅速地发展起来。

当然，在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条件下来发展地方工业，困难是比较多一点。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困难。但是，更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为迅速发展地方工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我国的工人阶级、广大劳动群众成了国家的主人，“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了加快农业生产的前进步伐，广大群众不但有发展地方工业的高度积极性，而且有发展地方工业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问题。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问题都好解决，没有资金自己筹，不懂技术就在实践中总结提高，缺乏设备，就土法上马，土洋结合，就能够因地制宜地办很多的事情，使地方工业较快地发展。

采取积极的态度，认真办好直接为农业服务的支农工业，这是发展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支农工业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提供先进技术装备的。支农工业办得越好，对农业提供的先进技术装备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工业对农业的主导作用就越明显。同时，支农工业对农业的支援效果越大，农业发展的速度越快，就能为地方工业提供更多的粮食、原料、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使地方工业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不仅如此，支农工业的发展，要求基础工业为它提供更多的钢、铁、煤、电，这就逼着基础工业加快前进的步伐，以适应支农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认真办好支农工业，是地方工业坚持从农业出发，全心全意为农业服务的重要表现。

支农工业是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但是并不等于只要办支农工业就自然而然地为农业服务了。先办什么，后办什么，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都



得从农业的实际需要出发，才能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农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对支农工业，既要求有制造，又要求有修理；既要求有主机，又要求有配件；既要求数量多，又要求质量好；既要求适应不同地区的特点，又要求供应及时，价格低廉。支农企业如果重视主机，轻视配件，注意一个方面的需要，忽略另一个方面的需要，就很难全面满足农业的需要。同时，农业的需要又是发展的、变化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需要。支农工业如果不注意农业生产的这种不同情况，仍然是老品种，老规格，就不可能收到支农的实际效果。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不好，是检验一个支农企业是不是全心全意为农业服务的重要标志。因此，支农工业要做到产品为农民所欢迎，不能简单地以为生产某种支农产品就算完成了任务，而是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实现。要使自己的思想、作风、规章制度等适应支农的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农业，熟悉农业，自觉地做到从农业的需要出发，想农业之所想，急农业之所急。这样，才能使支农产品适应农业生产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使支农工业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发展。

要办好支农工业，还必须认真地考虑到农业提供的可能。为了发展农业，想多办一些支农工业，这种积极性是好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办支农工业同样要考虑农业所能负担的实际可能。办工业，即使是支农工业，对农业有支援、促进的一面，也有对农业依赖的一面。如果光看支援一面，忽视依赖一面，光讲需要不看可能，在同一个时期，企图百业并举，那就会在资金、物资、劳动力上与农业发生矛盾，甚至去挤农业，把支农变成“挤”农。这样一来，地方工业的发展也势必受到影响，甚至也可能被挤下来。即使在农业丰收的情况下，也要在充分估计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冷静地考虑实际的可能性，决不能忘乎所以。应该分别轻重缓急，该办还是不该办，先办还是后办，集中办还是分散办，上面办还是下面办，等等，进行全面规划，以便集中力量，对准方向，从解决主要矛盾入手，更好地支援农业。



从农业出发办好地方工业，还必须重视发展轻工业。轻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和重工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能认为“轻工业多些少些没有关系，挤点让点没有问题”。农业生产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常常要经过轻工业的加工，才能成为生活资料，以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农村作为工业的广阔市场，也需要向轻工部门出售各种原料，才能增加集体和社员收入，从而吸收大量的工业品。同时，轻工业的特点是，投资少，收效快，积累多。认真办好轻工业，就能较快地增加地方积累，以较多的资金支援农业和重工业。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发展农业和重工业的同时，注意了轻工业的发展，使轻工业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七〇年以来，轻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三，全区轻工业每年提供的积累（包括手工业所得税），约占全区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就说明，发展轻工业不是“可挤可让，可多可少”的，而是从农业出发办好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环节。

毛主席说：“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毛主席这一指示，深刻地揭示了农业与轻工业的关系，指明了发展轻工业从农业出发的必要性。轻工业是加工工业，有没有人去加工，有没有原料可供加工，加工出来的产品能不能销出去，那一样都与农业有直接关系。目前，我国轻工业的原料大部分来自农业，农业发展的情况，对轻工业发展的规模大小、速度快慢，影响就更大。从农业出发办轻工业，就要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使轻工业的重点和布局适应农业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要根据各地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资源情况，技术基础，因地制宜地确定在什么地方办什么厂，办多大规模的厂。既要充分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发挥地方特长，又不使之出现“办新厂，挤老厂，办小厂，挤大厂”的现象。例如，在适宜发展甘蔗生产的地区，就可以重点发展糖厂，在水果产量较多的地方，就可以重点建立食品加工厂。这样，轻工业立足于地方资源，就能有充足的原料，得到更快的发展。如果看不到农业对轻工业的基础作用，就轻工业抓轻工业，就加工搞加工，就常常会使轻工业缺乏原料，造成劳动力、资金和设备的浪费。结果想



快反而慢，甚至还会扯农业的后腿。

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从农业出发办好地方工业的根本保证。在办地方工业的过程中，办什么厂，不办什么厂，生产什么产品，不生产什么产品，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坚持政治挂帅，还是搞利润挂帅，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表现。许多为农业服务的支农产品是薄利多销的。同时，办地方“五小”工业的资金主要是地方自筹，收益主要也是归地方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往往容易从利润出发，只看到某种企业可以多盈利，某种产品可以多赚钱，而不讲农业需要，不顾国家统一计划，把工业支援农业的社会主义协作关系，看成是单纯的商品交换关系。那样就会使地方工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资本主义开方便之门，给阶级敌人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以可乘之机。要坚持从农业出发办好地方工业，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分清路线是非，坚持政治挂帅，反对利润挂帅；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如果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就会迷失方向，地方工业就会滑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

因此，我们办地方工业，不能只抓办工业的日常事务，要抓办工业的根本大事。要认真搞好批林批孔，深入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联系办地方工业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批判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打击阶级敌人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破坏活动。要使办地方工业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认识到发展地方工业并不是单纯经济问题，而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认识到工业支援农业，也不是单纯的工农业两大生产部门的互相协作问题，而是无产阶级支援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方面，是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措施；从而做到高瞻远瞩，胸怀全局，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服从国家统一计划，保证地方工业沿着为农业服务的轨道前进。



让工农兵英雄形象牢固地 占领故事片阵地

江 天

最近,新摄制的几部彩色故事影片的同时上映,给新春的文艺生活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影片上映以后,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注意。这批影片和最近在华北地区文艺调演中出现的一批优秀剧目汇合在一起,显示了我国电影戏剧战线的繁荣景象。这对于那些诬蔑文化大革命后电影戏剧事业“今不如昔”的论调,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革命故事片的创作,是在革命样板戏的推动下搞起来的。前几年,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革命样板戏搬上了银幕,不仅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中普及了革命样板戏,而且积累了如何运用电影艺术的规律来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拍摄经验。这对故事片的创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摄制的几部彩色故事影片,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和拍摄经验,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战果。

这里,想概要地谈一谈《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这三部故事影片所取得的可喜成就和不足之处。

这批影片所反映的题材,都是社会主义时代工农业战线上的火热斗争生活。当我们看到《火红的年代》中的炼钢工人,顶住社会帝国主义刮起的妖风,敢于打破洋框框,炼出了“争气钢”;看到《艳阳天》中的东山坞贫下中农,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百折不挠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看到《青松岭》中的老饲养员,一把夺过赶车的鞭杆子,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的时候,我们怎能不为影片中所展现的壮丽情景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这些故事影片热情地歌颂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歌颂了革命人民的崇高精神,这对于当前各条战线都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鼓舞作用的。这些影片所以受到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首要的原因就在于作品的题材来自三大革命运动。



故事片选择什么题材，是关系到创作方向的大问题。毛主席指示我们，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陆定一、周扬一伙却以所谓反“题材决定”论跟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在他们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下，大部分故事片的取材，或是琐碎的家务事，或是帝王将相的封建霸业、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就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不是还有人不愿去表现三大革命运动的重大题材，却热衷于写什么生活中的小磨擦吗？更有甚者，竟还有人公然把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黑戏改头换面，拿到社会主义舞台上展览！这也说明了文艺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所以，当我们为故事片创作的新成就而高兴的时候，还必须同时反击文艺黑线回潮，继续批判反“题材决定”论，为工农兵英雄形象牢固占领文艺阵地而进一步扫除障碍。

《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所反映的斗争生活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前，但都能立足于今天的时代高度去处理题材，提炼主题。因此，它们既比较准确地再现了那个时期的斗争生活，又使主题具有今天的思想高度和鲜明的时代精神。《火红的年代》没有停留在炼钢生产的技术问题上，它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事关路线的大问题：要不要炼“争气钢”，实际上就是敢不敢坚持走毛主席指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问题。今天，摆在我们每个革命同志面前，仍然有一个敢不敢“争气”的问题。敢于“争气”，就是敢于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敢于反潮流，敢于拿出革命闯劲来，不怕承担责任和“冒风险”。只要我们敢于这样，就必然能创造出人间奇迹来。影片正是从这个思想高度给人们以丰富的联想，使我们亲切地感受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生命线。《艳阳天》表现的虽是农业合作化时期在分配问题上的两条道路斗争，但由于原作者和编导者努力运用党的基本路线去观察和概括生活，这就深刻地表明了东山坞的这场斗争，其实是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之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青松岭》也同样如此。它围绕着由谁执鞭赶车的问题，以这个具体矛盾反映普遍规律，说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仍然要同我们作长期的反复的较量，他们玩弄的手段极为狡猾，我们必须百倍提高革命警惕。这一切都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的电影创作，只有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千差万别的特殊矛盾中揭示出带有规律性的内容，从而使主题思想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这几部影片所表现的斗争生活，离开今天已有



十几年来，为什么它依然能激励我们的革命斗志，其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深刻的主题思想必须通过丰满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才能得到体现。这几部故事影片所取得的成绩，最突出的方面，就表现在赵四海、肖长春、张万山等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生气勃勃地走上了银幕中心。

这几个英雄人物的共同特征，是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这一共同特征，在不同的英雄人物身上，又有其具体表现。在赵四海身上，是他强烈的革命反潮流精神；在肖长春身上，是他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硬骨头精神；在张万山身上，表现为不怕年老有病，敢于同资本主义歪风邪气作不疲倦的斗争，热心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一个个犹如巍然挺立的青松，泰山压顶不弯腰，风吹浪打不回头，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不愧为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顶梁柱。看，赵四海面临被撤职的压力，却毫无惧色：“你可以停我的职，但是，钢是要炼下去的，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走定了！”肖长春顶住失去孩子的悲痛，一语揭穿阶级敌人的毒辣阴谋，劝父亲：“你挺起腰板来，让那些坏蛋们看看，搞社会主义的人都是硬骨头！”万山大叔回击了敌人钱广的要挟，在夺鞭之后，响亮地回答：“要让大车走正路，咱不掌鞭，谁掌鞭？”这些发自英雄内心的语言，铮铮有力，铿锵作响，抒发了中国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创业过程中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使这些英雄形象闪烁着光辉的时代精神。

这几部影片在塑造主要英雄人物方面，努力学习和运用了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如在一九六五年拍摄的影片《青松岭》中，主要英雄人物是方纪云还是张万山，很不清楚，谁有戏就给谁，平分秋色，结果谁也突出不了。新摄制的影片《青松岭》，分清了主次，以张万山这一英雄人物为中心进行布局，摆正了他和其他人物之间突出和陪衬的关系，从而使张万山的英雄形象得到了充分的刻画。如对“夺鞭”这场高潮戏，进行了周密的布局。在夺鞭之前，安排了秀梅发现并关心万山大叔的腿病，张万山向青年痛诉落下腿病的遭遇等情节，这一切渲染就为后来张万山迈开病腿、跃上高坡夺过鞭子的高潮戏作了铺垫。而在张万山夺过鞭子之后，影片接连用了几个特写镜头，表现秀梅、大虎、方纪云的惊喜、感动心情，又作了渲染。这就不仅使夺鞭这一主要事件展示出张万山的坚强性格，而且在设计其他人物和事件时，也以他为中心，使张万山的性格光辉集中投射在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思想焦点上。影片《艳阳天》为了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肖长春，在改编中也进行了再创作。比如，小说中“一锅野菜”的细节是用来描写马老四的，现



在影片用它来刻画肖长春，并把它插在弯弯绕受了马之悦的挑动而跑到肖长春家门前闹“缺粮”的情节中间，当肖家的锅盖一揭开，就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肖长春把仅有的半袋小米献给集体喂牲口而自家宁可吃野菜，并且还不准小石头告诉人，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马之悦的卑鄙行为、弯弯绕的私心杂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正是这一对比，使弯弯绕深感内疚，使肖长春的形象更加饱满，也使得戏剧矛盾比小说更集中、紧凑了。

为了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影片还调动了电影艺术手段。如在张万山深情地讲述自己为什么要夺鞭的这场戏里，导演为了揭示张万山的内心世界，对这一大段激动人心的对白的处理，没有用分切很碎的镜头，而是用了一个长镜头，在镜头内部进行场面调度，造成符合人物心情、能恰当表现人物情绪的各种景别，从而表现了张万山在孙福逼他交鞭、周队长对他不信任、方纪云为他担忧的特定情景下，他全心全意为革命、为人民的崇高共产主义思想。这个长镜头为演员提供了表演的有利条件，而扮演张万山的演员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条件；他在整个影片里都是演得朴实而又亲切的。在《火红的年代》中，赵四海批评白厂长“已经不象我们工人的厂长”时，导演用了一个近景，着重去表现赵四海的眼神，使这一英雄人物既为白厂长的思想蜕化而痛心、但又热切地希望他早日转变的不平静心情，得到了细致的刻画。又如《艳阳天》中有一个画外钟声的渲染，也是很有深意的。当群众在马之悦诱骗下纷纷离开打麦场去寻找孩子时，肖长春立刻洞察到一场严重的暴风雨已经来临，他压下满腔的怒火和悲痛，飞步来到大树下，用力拉动钟绳。这宏亮的钟声，烘托出肖长春千言万语难以表达的心声，震撼了整个山村，使阶级亲人惊醒过来，团结起来，使阶级敌人感到末日来临。由于努力调动电影艺术手段去展现英雄人物的共产主义精神境界，这几部影片不仅在思想性上，而且在艺术性上也达到了新的水平。它们在取景、色彩、用光、画面处理等方面，也都较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影片有了很大的提高。

为了进一步促进故事片创作的发展，我们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必须重视创作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前一个时期，在故事影片的创作方面所以进展比较缓慢，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创作思想上还存在着“无冲突论”的问题。这三部影片在揭示矛盾冲突方面，总的来说写得还是好的，表现了强烈的时代感，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火红的年代》能够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反映路线斗争，很富有现实意义，可是阶级斗争这条线并没有写好，它未能与路线斗争有机地结合起



来。应家培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面目不清，行动缺乏内在的根据，他搞破坏放的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交待清楚，因而阶级斗争这条线显得是游离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题的深化。《艳阳天》着实写了阶级斗争，但还不敢充分地激化矛盾。这只要把影片同小说原著比较一下即可看出。马小辫几次持刀想杀肖长春的情节在影片中去掉了，这就显出不如小说写得那么尖锐复杂。影片让小石头不死，这是改得好的地方，但既然孩子未死，那些哭哭啼啼的渲染就显得多余，并且还影响了矛盾冲突的高潮。《青松岭》在敢于激化矛盾这一点上比前两部影片写得好，但写矛盾的解决还比较简单。解决矛盾的关键，落点不在张万山身上，而是靠外调材料，这实际上是避开斗争，避开英雄人物来解决矛盾。

社会主义文艺反映生活，从本质上说就是反映现实中的阶级斗争。而“无冲突论”，则否定了社会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存在，因而违背了文艺反映生活的根本规律。刘少奇、林彪一伙在政治上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上鼓吹“无冲突论”，都是出于一个政治目的，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宣扬阶级调和，否认阶级斗争，这是剥削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惯用的手法，中外古今，概莫能外。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必须联系文艺战线上的路线斗争的实际，狠批孔老二的“中庸之道”，狠批林彪反对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的修正主义谬论，从根本上肃清“无冲突论”的流毒。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生活中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都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来的。我们的作品所反映的矛盾冲突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就塑造不出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所以，在创作中，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从实际生活出发，敢于揭示阶级斗争，敢于写矛盾的激化，敢于写两类矛盾的转化，并努力学会写好矛盾的解决，力避手法雷同，相互模仿。如果在创作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缺点，也不要怕，可以通过实践，总结经验，改正错误，努力学习，不断提高。

这几部故事片的出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既然是开端，就不可能十全十美。革命样板戏已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打开了广阔的道路，我们坚信，只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我们就一定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故事影片来！



科 学 史 研 究

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和改造

李 之 棣

人类能不能正确地认识地球和能动地改造地球，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它完全可以由人类本身社会实践的历史来说明。

人类是地球发展的产物。大约在二百万年前，当地球表面温度下降、冰期到来的时候，森林面积的迅速缩减迫使人类的祖先——古猿从树上移居地面，于是手脚开始分化，直立行走，完成了从猿到人的决定性一步。在原始时代，火山爆发，电闪雷击，引起森林起火是很可怖的，但人们却从中得到启发，“钻燧取火”，“焚林而田”；在同水这种自然力的斗争中，人们学会了刻木为舟，捕鱼为食；自然界“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们却逐步把野生植物栽培为作物，把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畜。人类就是同冰期、火山、洪水、猛兽等险恶的自然条件作艰苦斗争中，逐步改造了自然，也改造了自己，提高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扩大了自己的自由。

这个历史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曲折。如我国古书中有在黄河流域“塞九河以广田居”的记载。这是一项气吞山河的壮举，但由于没有很好掌握自然规律，引起了水患。水患有两重性：它危害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又推动人民去掌握治水的规律，于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通过多次总结经验，终于逐步学会了治水本领。两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就造出了象四川都江堰那样伟大的水利工程。广大劳动人民从战天斗地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人定胜天这一真理。我国广为流传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民间寓言，就是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的生动写照。



自从人类分化为阶级以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实践论》）人民群众是认识和改造地球的主体，他们是按照地球本来的辩证法来逐步认识地球的。而一切反动阶级总是歪曲和掩盖地球运动的客观规律，宣扬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人们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局部到全体地认识和改造地球的历程中，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和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在斗争中，唯物论和辩证法不断得到发展，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断遭到破产。这个斗争，今天还在继续。回顾人类对地球认识和改造的历史，可以使我们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彻底驳斥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种种悲观论调；使我们进一步懂得辩证唯物论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是认识和改造地球的锐利武器。

“地方”还是“地球”，地球是不动的还是运动的？

人类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天地里？围绕这个问题，两种世界观展开了长期反复的斗争。

古代人是在狭小范围里从事生产的，所以认识很受局限。在我国，曾有“天圆地方”的看法。那时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不能科学地解释，产生了对自然的信仰和种种臆测，还往往把天地人格化，例如说天圆象头顶，地方象双脚，天有四时，人有四肢等，并逐渐引出神的观念。正如恩格斯所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阶级社会里，对天地的唯心论的愚昧观念被剥削阶级利用，炮制成愚弄和压迫人民的精神枷锁。如我国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丘，就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西汉的儒家代表董仲舒也宣扬“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谬论。这都是为反动统治服务的。

但是，一些亲身参加生产实践的人们，根据直观经验，坚持从自然本身说明自然。他们认为大地和海水一样是一个略有起伏的平面。随着航海事业的兴起，人们开始用天象导航，当沿南北方向航行时，发现北极星高度有变化；从陆地远望迎面驶来的航船，也是先见桅顶后见船身，这些情况只能用海面和地面弯曲来解释。在我国曾有“天如覆盖，地如覆盆。地中高而四隤，日月随天转运”的看法。就是说，天地都是一个大穹隆，只不过地比天缓平一些罢了，但仍然以为几



千里外天和地是连在一起的；天动，而地不动。东汉时，一些商人和旅客发现，从西域到东海之滨相隔万里，所看到的太阳和月亮几乎一样大小，于是对天地相连的说法发生了怀疑。唯物论者王充就曾明确指出，天地是不相连的。科学家张衡根据月亮圆缺的变化，指出月亮只反光不发光，而月蚀是地体的阴影，设想大地是一个球体。在东汉时很多人开始相信“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在西方的同一时代，从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到古罗马人托勒密，对于地球形状也经历过这样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的逐步认识过程。从“地方”到“地球”，确是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唯物论对唯心论的一次巨大胜利，这胜利打破了人们对天地的神秘观念，从而视野顿开，并为地动说提供了前提。如我国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就认为地球是动的，并用地动来说明一些天文现象。在中世纪的西方，随着封建阶级日趋反动，大地球形假说被纳入了为宗教服务的托勒密地心说和地球不动论。

十六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兴起，伴随着一系列地理发现，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环球航行，大地球形假说被证实了。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现代大工业的出发点。”（《自然辩证法》）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哥白尼根据前人积累的天文材料，提出了科学的日心说。他的《天体运行》一书，是对教会权威的宣战，从此自然科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人们认识到，人类居住的地方——地球，原来不是什么上帝所赐予的宇宙中心，而是太阳系中一颗运转着的星球。

地球上的自然条件变不变，是突然“灾变”还是有规律地变？

地球上的自然条件变不变？对于这个问题，自古以来也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变，例如我国古代就有“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的说法；另一种是不变，董仲舒就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

十八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分工越来越细，自然科学门类的划分也日益增多，这本来是生产与科学的进步，但同时又使人们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往往失去全面观察事物的能力，把事物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一成不变的。林奈的物种不变论和牛顿的机械论便是这样一股思潮，影响到自然科学一切领域。例



如，人们认为山河湖海自从被创造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以后也不会自行改变。由于这个论点有利于反动统治而得到宗教势力的大力支持。康德——拉普拉斯天体起源假说“**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自然辩证法》）它启发人们考虑，如果地球是逐渐形成的，那么地球上的地质、地理、气候状况和生物区系也不会一成不变，并且有它自己的形成过程。但是最能驳斥不变论的是人们的实践，例如，在欧洲兴修水利和开发矿业时，普遍找到了海生贝壳和珊瑚化石，这就说明这个大陆过去曾是一片汪洋。神学家们最初妄想用圣经上说的诺亚洪水来解释这一切。但是接着人们又发现，有的岩层是倾斜的，在倾斜的岩层的侵蚀面上往往又覆盖着另一套水平岩层。英国人郝屯正确地指出，这是海底沉积的水平岩层先经地壳运动褶皱隆起，被流水夷平后，再经地壳运动而下沉，在上面重新沉积了水平岩层。这一发现向不变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自然科学的自发辩证法的步步逼迫下，宗教势力变换了手法，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地球上自然条件是在变；另一方面又鼓吹这是上帝为了惩罚万物而发动的灾变，并用高官厚禄鼓励人们用科学成果加以论证，于是种种奇谈怪论就相继出现了。有人说所有的山脉都是突然形成的，每次造山就是一场灾难；有人说在西伯利亚冻土中发掘出的皮、肉、毛保存完好的猛犸象本身是热带动物（后来证明是寒带动物），是在气候骤然变冷时活活冻死的；尤其是考古发现意大利的两个大城镇在一次火山喷发时被埋在火山灰之中，更引起了广泛恐怖。宗教势力抓住这些尚未得到科学阐明的地质现象大力渲染，宣称既然人们的生命危在旦夕，还搞什么革命！快祈求上帝保佑吧！

生物学家居维叶就是利用巴黎盆地动物化石的研究成果来支持岌岌可危的神学的。他在地层剖面中也看到了一系列地层不连续的现象，而且每个侵蚀面上下的岩层中所含的化石动物的形态和构造不同。居维叶从物种不变论出发，武断地认为，生物物种的这种变化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由一种异常突然的超自然力完成的，地层中每个不连续代表一次大灾变。他还根据一些假象臆造出最后一次灾变发生在五千多年前，以与圣经上的诺亚洪水相附会，并恶意地把这种灾变叫作“革命”。因此，当他的代表作《地球表面的革命》出版之后，立即得到封建王朝的加官晋爵。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革命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它以一系列重复的创造行动代替了



单一的上帝的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的杠杆”。（《自然辩证法》）实际上，在居维叶的“灾变”后面，隐藏着林奈的不变，同样给上帝留下了位置。

当时，欧洲有些进化论者曾试图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批驳灾变论，由于论据不足，没有成功。随着矿冶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地质资料日益增多，许多地质现象也得到了阐明，这就为从地质学角度批驳灾变论准备了条件。给予居维叶灾变论以致命一击的是地质学家赖尔。他在《地质学原理》一书中，用当时所能搜集到的丰富材料批驳了灾变论。赖尔首先研究了地表各种自然力对岩石的剥蚀、搬运和堆积过程，认识到过程是缓慢的。当他把现代地质过程同欧洲的第三纪地质过程加以比较时，发现两者十分相似，据此提出：“现在是认识过去的钥匙”，从而确立了“将今论古”的地质学方法。在这个方法指导下，赖尔又用现代地壳缓慢升降运动去说明地层剖面中的各种现象。在他看来，过去曾发生过的地壳缓慢的升降并没有什么神秘，也不需要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完全可以用人们现代所看到的地质过程来理解。后来，赖尔又根据人们逐步建立起来的地层系统表，考虑到岩层形成的缓慢程度和地壳反复升降的情况，科学地估算出地球的年龄绝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几千年，而是数以万万计。地球有着自己实在的历史，而地壳中成千上万米厚的地层就是一部地球史教科书。尽管赖尔对地质过程的认识存在着缺陷，恩格斯仍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指出：“只是赖尔才第一次把理性带进地质学中，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这样一种渐进作用，代替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发所引起的突然革命”。（《自然辩证法》）不变论及其变种——灾变论从此宣告破产。

从此，人们认识到象流水、冰川和风这些外动力，不断把陆地上的岩层毁坏，并将其碎屑搬运到江河湖海中去，这些松散堆积物经过千百万年逐渐硬化成岩；而象地震、岩浆活动一类内动力，则将地下岩浆带到地表，并将海底的岩层抬出水面形成山脉和岛屿，使之重新遭受外动力的毁坏，从而形成“旧岩层不断毁坏和新岩层不断形成的系列”。（《反杜林论》）这样，一方面是外动力在使地面趋于平缓；另一方面是内动力在使地面趋于起伏；在不断的矛盾斗争中地球上的自然条件万象更新，而且沿着一定方向变化。如一、二十亿年前的火山活动就比后来强烈，那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海水中的硅化合物以及地面上的火山物质都比后来多。经过河流长期侵蚀和搬运，海水中盐分也在逐渐增长，河、海生物逐渐分化。自从三亿多年前植物由海中发展到陆地上以来，空气中的氧气增多了，而植物和氧气



的增长又为海生动物移居陆地准备了前提，并经过一系列演化阶段终于产生了人类。人类今天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不可缺少的各种资源不是一成不变的，都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人们认清了它形成的规律，就能能动地促使自然条件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并按照客观规律改造自然和开发资源。这样，人们对地球的认识和改造的能力就大大提高了一步。

地球是重复着同一过程，还是在辩证地发展着？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地球的认识和改造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一方面，地质调查已由一条条山脉扩展到整个大陆，而各大陆地质资料的积累使大陆之间的地质比较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地球物理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地球内部并非均一，而是分为地核、地幔和地壳，就象鸡蛋可分为蛋黄、蛋白和蛋壳一样；平均厚达几十公里的地壳也不是“铁板一块”，可分为下层和上层，而大洋壳和大陆壳的结构和厚度都不相同。对地球的这些新认识，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探讨地球的历史发展。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地球是怎样发展的？

围绕着这个问题，两种世界观激烈地斗争着，斗争的焦点首先是：我们居住的大陆除了升降外，是否还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水平移动。

一九一二年，魏格纳根据大西洋两边大陆的地形、地质构造、古生物区系、古气候和矿产分布的比较，提出了大陆漂移科学假说。他用丰富的地质资料论证现有各大陆是由一个古陆分裂漂移形成的，而大洋也是不断更新的，大陆和大洋都不是固定的、永存的。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就发现了地壳运动，如我国《诗经》上就有“百川沸腾，山冢岑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说法，但是千百年来，人们习惯地认为地壳运动就是地壳原地升降。而大陆漂移说却大胆地提出在地球史中地壳可以一漂千里，这岂不是“异想地开”的“邪说”吗？因此，这个假说一经提出，就引起极大的轰动。

其实，魏格纳的假说是依据几个世纪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材料得出的。早在十七世纪，继新大陆发现并弄清楚它的轮廓之后，欧洲人就惊异地发现，大西洋两边岸线形状如此吻合，以致若将欧非大陆和美洲大陆并在一起空隙甚少，从而产生了大陆漂移的思想萌芽。十八世纪，布丰根据大西洋两边生物区系的比较，也设想两边大陆过去曾经相连。十九世纪中叶，斯尼德尔根据陆生生物化石的



研究,明确指出,大西洋是在晚石炭世(约二亿七千万年前)后由大陆分裂漂移而形成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又有许多人先后指出,亚欧大陆曾自北向南整体运动过,致使其南缘的“古地中海”闭合隆起,形成从阿尔卑斯到喜马拉雅连绵万里的宏大山带。所有这些材料和看法对于许多地质学内行来说是熟知的,但是由于旧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宁愿牵强附会地设想在各大陆之间都有一架“陆桥”来引渡古代的陆生动植物,也不敢设想陆块之间曾发生过大规模水平移动。而魏格纳是一个青年气象工作者,对于地质学是外行,但正是这个外行作出了内行们所不敢想也不敢作的新论断,向传统的大陆固定论和大洋永存说提出了挑战。

由此可见,大陆漂移说的产生,决不是出于某个人的天才或灵感,而是人类对地球认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然,它也必然有时代的局限。这个假说的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设想大陆漂移是发生于地壳的上、下层之间,但这是与岩石粘度的计算相矛盾的。传统学派抓住这个缺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整个假说全盘否定,斥之为“毫无科学根据的幻想”。由于这个缺陷的克服有待生产和科学的发展,所以到了四十年代,主张大陆漂移的活动论思潮日趋沉寂,而主张大陆不动的固定论思潮又时兴起来了。二十世纪中叶,欧美和苏联的某些固定论者断言,原始大陆和原始大洋在地球上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并提出大陆扩大和大洋缩小就是地壳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他们看来,大陆、大洋及其各地质构造单元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地壳的发展则永远重复着同一过程,即由活动性的大洋壳向稳定性(或僵化)的大陆壳转化。照此类推:全球大洋壳完全转化为大陆壳之日,就是地球僵死之时,那时,地壳运动也就消失了。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亚洲幅员广大,有着丰富的地质内容。随着地质调查的开展,亚洲新的地质发现,同固定论的旧观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例如中国古陆就从来没有僵化过,而是以不断更新的形式活动着。二十年代以来,我国地质学家李四光运用力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世界的特别是东亚的地质资料,发现在亚洲和其他大陆上都存在着各种不同力学性质的地质构造型式,它们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着一定分布和组合规律。这些规律不仅清楚地反映出各个大陆地壳水平运动的普遍性,而且还反映出它们与地球整体运动的内在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适应地球深部和海底



探矿以及地震预报的需要,地球物理学和海洋地质学取得了进展,一些重大发现给予地壳活动论以有力支持。这些发现告诉人们,无论大陆壳还是大洋壳都曾发生过大规模水平移动,而且连壳下地幔物质也在缓慢流动着。所谓“原始大洋”并不原始,因为一般洋底岩石年龄最老不超过早期中生代(约二亿二千万年前);太平洋底也并不“太平”,而是在不断地移动着,因此,任何一个大洋都不可能“永存”。

恩格斯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自然辩证法》)根据半个世纪以来生产和科学实践中发现的新材料,人们对活动论作了新说明,提出了新假说。有一种假说设想,在地球史中,随着上地幔软流层的缓慢流动,大陆壳跟着一起漂移,而大洋壳则不断被卷入地幔之中,地幔物质经过对流,由大洋中脊或大陆裂谷以岩浆的形式溢出,使大洋底不断扩张和更新。以李四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地质工作者,则设想地球内部的物质运动必然引起地球自转变速,它不仅使地表水体扁率发生变化,从而推动两极与赤道之间的海水进退;并且会引起地壳中较柔性岩石发生经向和纬向缓慢流动,从而造成地表各种构造型式的规律分布。尽管各种活动论假说侧重的方面不同,而且存在着一些尚待研究的问题,但它们共同的见解都认为地球不是在僵化,而是以某种新形式活动着;地球的发展不只是数量增减和重复,而是有飞跃和剧变;地球发展的原因不在于地壳局部的偶然因素,而在于地球内部必然的矛盾斗争。人们有根据设想,在地球内部,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也是在矛盾斗争中展开它们的历史。在斗争中,地球的各种物理场(力场、磁场、热场等)、地球的两极和赤道以及自转速率都在沿着一定方向变化着,就连一年有十二个月和三百六十五天也不是固定的,如在三亿多年前,每年就是十三个月和三百九十天左右。放射性同位素的发现和研究进展使我们有理由推断,地球各种元素也不是永存的,而是处于不断兴衰转化之中。因此,整个地球由里到外,由无机界到有机界,“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其实,固定论的基本哲学论点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是违反辩证法的陈腐观



点，它们关于“发展原理、进化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都是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和革命）弄得残缺不全”。（列宁：《卡尔·马克思》）可以预见，随着生产和科学的发展，固定论所维护的形而上学偏见将不断遭到失败，而活动论所引出的辩证法论点将不断得到发展。固定论的衰落和活动论的兴起无疑是人类认识地球的又一个进步，它激发着人们打破传统观念，解放思想，去更大胆地找寻和开发地球深部和海底的无穷无尽宝藏，并在预防乃至利用或消除破坏性地震的斗争中采取革命性措施，以造福于人类。

地球的未来一定属于人民

“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类能不能改造地球？是不是人定胜天？对于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两种对立的见解。历史上一切反动的腐朽的阶级都是叫人听天由命，例如，孔丘就鼓吹“畏天命”，却说他自己“知天命”；而叛徒、卖国贼林彪则自比“天马”，自吹“受于天”。在这些反动派看来，地球上的一切都遵循于“天命”，而“天命”的体现者就是所谓“天子”、“天才”、“天马”之类。总之，他们要人民群众做帝王将相的奴隶，同时也做地球的奴隶。但是，奴隶们从来不听他们这一套，公开申明“不畏于天”！人民群众和历史上的革新派无不坚信人定胜天。例如，法家代表荀子就明确指出：“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进一步指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驳斥了儒家的天命论和“君权神授”说。这都是说人要制服自然界，使自然界为自己服务。

近年来，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在环境、粮食、资源等问题上大作悲调文章，叫嚷人类的“生态危机”、“粮食危机”到来了，“资源枯竭”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引起一片混乱和不安。但是，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去观察，这类悲观论调的欺骗性是不难揭穿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人与物的关系，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决定的因素是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人民群众改造环境的能动性发挥得怎样，首先取决于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资料掌握在垄断资产阶级手里，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反动统治阶级破坏自然环境，放任三废毒害人民；把人民血汗换来的粮食据为己有，而不管人民死活；把人民辛勤挖掘出来的大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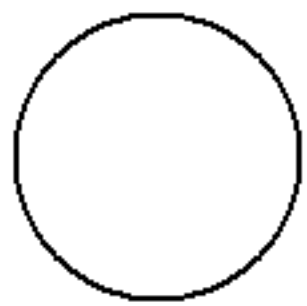


资源制成炸弹、凝固汽油弹和核弹屠杀人民。这些事实说明，帝、修、反已完全堕落为害人虫，迟早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从本质上说，不是“生态危机”和“粮食危机”到来了，而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总危机加深了；不是“资源枯竭”了，而是资本主义**“这个反革命制度已经枯竭了，它的社会力量已经枯竭了”**。（列宁：《今日俄国和工人运动》）如果说，十九世纪初的灾变论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的垂死绝望的话，那么，毫不奇怪，现行的悲观论调正是帝、修、反灭亡前夜的哀鸣！与此相反，**“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焕发出无限的创造力，向地球开战，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辽阔的国土上，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斗出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令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什么世上的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人间的奇迹都能够创造，立下愚公移山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国古代人民关于移山填海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两种社会两重天。人民群众要有效地改造地球，首先要改造社会；要做地球的主人，首先要做社会的主人。**“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论人民民主专政》）地球诞生至少四十五亿多年了，迄今仍然充满活力，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作为物质的一种具体存在形式，地球也有一个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它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出来，也将在一定条件下否定自己，转化为更高级的存在形式。**“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人类随着地球的发展，不断地改造自己，也将转化到更高级的阶段。今胜于昔，是历史的必然，而一切反动的统治阶级不欢迎这条真理。他们炮制了“不动论”、“不变论”和“固定论”，以寄托他们奢望“永存”的美梦。当革命宣判他们死刑的时候，就一再发出“地球末日”的嚎叫，以掩盖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是，革命潮流势不可当，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人类自身及其活动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内，都将**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突飞猛进，有如旭日东升，使以往的一切黯然失色。社会的未来属于人民。地球的未来也一定属于人民。**



红旗



一九七四年 4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目 录

短评：注意总结经验..... (5)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孔丘其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9)

评《吕氏春秋》.....罗思鼎 (15)

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郑磊 (23)

认真看书学习 深入批林批孔

.....北京友谊商店百货部青年业余学习小组 (29)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广东英德县望河大队党支部 (35)

攻击干部下放劳动就是要复辟

.....北京东城区“五·七”干校大批判组 (39)

走上山下乡的革命路

.....广西恭城县挖沟大队小黄埠生产队插队知识青年小组 (43)



文 化 战 线

“大有大的难处”

——从《红楼梦》看反动没落阶级的虚弱本质……………方岩梁（48）

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初 澜（57）

重视革命的历史文物……………卫 今（64）

在 斗 争 中 努 力 学 习

要团结大多数

——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点体会
……………谢 祚（68）

学会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洪 原（73）

发扬知难而进的精神……………湖北应城县炮竹大队评论组（79）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批林批孔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天津冷轧带钢厂党总支（81）

依靠群众发展电力工业……………江 雷（85）

一万三千个合同是怎样完成的？

……………上海铜厂革命委员会（90）

☆ 四 月 一 日 出 版 ☆



毛主席语录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要认真总结经验。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毛主席语录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语录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



毛主席语录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
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
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
校。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
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
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
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
的两大派组织。



注意总结经验

(短 评)

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过程中，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注意总结经验。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进行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总是不断提醒我们要注意总结经验。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各个革命时期的各次重大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各条战线的革命工作，都及时地进行了科学的经验总结，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胜利前进。毛主席一再强调指出，应该尊重前人的经验，尊重外国革命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的经验，尊重中国革命的经验。如果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是说，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就不可能认识中国革命斗争的规律，引导革命斗争走向胜利。我们党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形成了重视总结经验的好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每打一仗，每开辟一块地区，每进行一次政治运动，都认真总结经验。全党就从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掌握革命斗争的规律，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这个过程，正如毛主席简明概括的：“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解放以来，毛主席又谆谆教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新的革命，过去我们只有民主革命的经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要很好地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毛主席在领导全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深刻地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沿着正确的航向胜利前进。

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善于通过科学的总结经验，来提高自己的认识。在革命实践中，我们会得到许多感性认识，但这种认识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只有对这些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即通过认真的总结经验，才能使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才能了解客观运动的规律性，才能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真正变为自己的东西。应当说，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革命导师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就没有革命理论，也就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同时，总结革命斗争经验，也是做好革命工作的重要环节，不重视总结经验，不重视把自己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和自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就不能做好革命工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政治领域、文化思想领域、经济领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积累了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对于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应当经常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例如，毛主席关于坚持革命大联合的指示，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经验之一。“**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执行毛主席这个指示，对于掌握斗争大方向、揭露公开和暗藏的阶级敌人，对于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就要牢记这个经验。又如，“**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才能识别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才能识别和批判修正主义以及其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这也是毛主席总结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必须坚持这样办，促进理论同实际的结合。同时，“**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时刻注意的大课题。**”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既要很好学习和充分运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基本经验，又要在群众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新的经验，以



不断推动运动的发展。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总结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就向全党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这一重要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必须很好地研究自己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给以科学的总结，从中吸取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帮助我们认识和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批评那些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的共产党员，谆谆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两千多年前孔老二妄图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和思想，直到现在还为叛徒、卖国贼林彪视为至宝，利用来作为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我们还看到，在我国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尊孔与崇洋又总是结合在一起来反对中国人民革命。这些历史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它带有中国历史的特点，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历次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也是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必须牢记的。当然，任何历史现象都不会是简单的重复，各有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阶级基础。但阶级斗争有共同的规律性，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可以作为我们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借鉴，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批林批孔运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科学地分析两千多年前封建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敌对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对于我们认识今天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仍是有意义的；对于我们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觉悟，也是有帮助的。

经常不断地总结批林批孔运动的经验，是我们正确指导运动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工作。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革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它象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性。要搞好这场反修防修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党中



央的路线、政策去实践，并在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通过认真总结经验，逐步掌握运动的规律性，具体认识怎样做才能充分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怎样做才能正确地掌握斗争大方向，深刻地批判孔孟之道，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罪行；怎样做才能更好地联系当前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促使运动不断深入发展；怎样做才能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等等。一个阶段的工作要总结，不同类型的典型经验也要总结。要抓基层单位的典型，更要抓领导机关的典型。越是运动发展得快，越需要我们做好总结经验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和群众在一起，分析运动的过程，明确运动的重点，研究政策界限，并把从群众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又回到群众斗争实践中去加以检验、丰富和发展。

总结经验需要化气力。为了正确地指导运动，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必须化这个气力，并且要亲自动手。总结经验会有一个过程。有的经验在较短时间内就可以总结出来，有的经验则需要较长时间，经过反复的实践和认识的过程才能总结出来。有的领导同志也搞总结经验，但有时只是罗列一些现象，拼凑一些材料，并没有从中真正总结出可以提高认识、推进工作的经验教训来。有的领导同志把总结出来的经验丢在一边，没有再进一步贯彻到工作中去，使这些经验更深化、更完善、更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至于有的同志从消极方面接受经验教训，不是通过总结经验而提高认识，推动工作，这当然更不是总结经验的正确态度。

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相信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经验总有正、反两个方面。成功的经验，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方向，应当大力推广。错误的经验，可以使我们得到教训，变得聪明起来，获得对事物比较正确的认识，从而可能向成功转化。这一点也是我们在总结经验时所必须注意的。让我们在总结经验中更好地掌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动批林批孔斗争取得更大的胜利！



批 林 批 孔 反 修 防 修

孔 丘 其 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孔丘其人，顽固凶狠却又十分虚弱，阴险狡诈而又极端腐朽。这是他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本性，也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今天，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

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

孔丘（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生活的春秋末期，奴隶起义、平民暴动、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把腐朽的奴隶制度冲得“礼坏乐崩”，使整个奴隶主阶级面临灭顶之灾。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占领历史舞台。

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他的祖先原是宋国的大贵族，后来搬到鲁国。到他父亲聊叔纥（聊音邹，纥音合）一死，孔家就更加日益没落。孔老二从小接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教育，年轻时就走上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道路。阶级的衰败和家庭的没落，更使他顽固地、狂热地为恢复被夺去的“天堂”而斗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孔丘终生的



复辟梦想。它的集中表现，便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

什么是“礼”？就是西周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孔老二把它吹得天花乱坠，说：“周代的制度是多么昌盛，多么丰富多采呀！我崇拜它！”（《论语·八佾》）实际上，周代实行的奴隶制，是一种在当时已经过时的极其反动、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它的“丰富多采”，正是无数奴隶的鲜血染成的！在这种制度下，奴隶主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待。一匹马一束丝就能换五个奴隶。奴隶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被迫从事极繁重的劳动，受到残暴的压榨。如果逃亡，抓回来后就要被活活锯掉一条腿，然后被扔到荒野“与禽兽为伍”，悲惨地冻饿而死。而奴隶主却靠着榨取奴隶的血汗，过着极其奢侈腐化的生活。甚至在他们死后，也要建筑富丽豪华的大坟墓，还把大批奴隶残酷地杀掉或者活埋，作为殉葬品，有时一次达上百人之多。孔丘要复的“礼”，就是这种奴隶的地狱，奴隶主的天堂。这种大批摧残劳动力、大量浪费劳动成果的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孔丘这个家伙对于往日奴隶主阶级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十分怀念，对于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刻骨仇恨，满脑子反革命复仇思想。看到烽烟滚滚的奴隶起义，孔老二破口大骂是“强盗”和“祸害”，恨不得斩尽杀绝。郑国奴隶主在一次镇压奴隶起义时，杀害了全部参加起义的奴隶，他听到后狂叫“杀得好！”（《左传·昭公二十年》）孔丘的“克己复礼”，就是奴隶主屠杀有理，奴隶造反无理，他完全是奴隶解放的死对头！

在孔老二心目中，周朝奴隶制的一切，从井田到法律，从音乐到酒杯，都是尽善尽美、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新兴地主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任何一项革新，对于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涌现的一切新生事物，孔老二都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学生冉求去帮助革新，促进封建生产关系发展，他就恶狠狠地要门徒“鸣鼓而攻之”；晋国铸了刑鼎，破坏了奴隶制的贵贱秩序，他诅咒人家要“亡国”；甚至在他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取了政权，还拚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再三请求讨伐。

孔丘如此仇视新事物，以种种努力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简直达到了发狂的地步。孔老二这个“复礼”狂，正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



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

孔丘此人，阴险狡猾。明明要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吃人政治，却偏偏装出一副“爱人”的面孔。他平时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不射窝里的鸟，不用带许多钩的大绳钓鱼，简直是不仅爱人，而且连鱼、鸟都爱。实际上，他是一个心黑手狠的恶鬼。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假仁假义地熬了一点粥给服苦役的奴隶喝，孔丘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触犯了“周礼”，急急忙忙派人砸了饭锅饭碗，把粥泼在地上。这就是孔丘的“仁者爱人”，真是虚伪到了极点！

孔丘还拼命鼓吹“信”。说什么“做人不讲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妄图要人们相信他孔老二才是天下最讲信用的人。其实，“信用”从来就是有阶级性的。孔老二的所谓“信用”，不过是奴隶主贵族骗人的手段。他自己就承认“君子只注意坚持正道，而不必守信用”。（《论语·卫灵公》）就是说，为了实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之道，什么撒谎骗人，什么背信弃义的勾当都可以干。有一次孔丘路过一个叫蒲的地方，被当地起义抗卫的群众包围，不准他去卫国。孔老二指天发誓，与蒲人订下盟约，保证不去卫国。但刚一被释放，他就跑到卫君那里，递情报，出主意，要卫国派兵镇压起义。当面赌咒发誓，背后冷箭黑枪，这就是孔丘的信用。

政治骗子都很注意窥测方向，见风使舵，经常涂改自己的脸谱。用孔丘自己的话说，就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这就是说，国家形势对复辟有利时，就大喊大叫，赤膊上阵；形势不利时，还要坚持复辟活动，但表面上要说好话，装笑脸，不露马脚。公元前五〇一年，鲁国发生了一次政变。公山不狃以费城为据点，准备推翻新兴地主阶级季桓子等人的统治。公山不狃派人与孔老二联络。一心要复辟变天的孔老二欣喜若狂，手舞足蹈，企图利用这次政变，从费城起家，干一番“复礼”的大事业，大叫要“使周代的制度在东方复兴”（《史记·孔子世家》），抛出了一个反革命复辟的行动纲领。但是，这次政变很快就失败了。孔丘贼心不死，摇身一变，隐瞒了自己要参与政变的真象，还说了一个政变头目的坏话，蒙蔽了季桓子，骗取了信任，居然当上鲁国首都行政长官，并很快窃取了警察总监和代理宰相的要职。就这样，孔丘这个政治骗子改用“钻进去”的战术，篡夺了鲁国的一部分权力。



凶狠残暴的大恶霸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孔丘一上台，就立刻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疯狂地推行他的反动政治路线，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特别把广大妇女压在社会最底层。

孔丘这个公开申明搞政治根本不需要杀人的伪君子，稍一得势，就露出了一副大恶霸的凶残面目。他当代理宰相仅三个月，就对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少正卯下了毒手，杀了之后，还下令把尸体示众三天。

少正卯是鲁国的大夫，是一位法家的先驱者。他宣传革新思想，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在他周围“聚徒成群”（《荀子·宥坐》），集合了一批先进的社会力量。甚至孔老二的学生也纷纷赶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讲，弄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王充：《论衡·讲瑞》），学生好几次都跑光了，冷冷清清，只剩下颜渊一个人。少正卯的革新理论严重威胁着孔老二的复辟事业。孔丘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要干掉他。按照周礼，“刑不上大夫”，而且少正卯声望那么高，杀害他必然遭到舆论的谴责，甚至孔老二的学生也表示反对。然而孔丘为了反革命复辟的需要，根本不顾舆论的反对，利用他篡夺的代理宰相的权力，给少正卯硬安上五大“罪名”，极端凶残地把他杀害了。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血腥的阶级报复。

列宁说：“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孔丘的“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奴隶主阶级法西斯式的专政。孔丘杀害少正卯这一事件告诉我们，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超阶级的“仁政”。代表反动阶级的复辟势力一旦上台，就会象孔丘那样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革命者就会人头落地。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不学无术的寄生虫

孔丘从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政治需要出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集中了西周文化的天生“圣人”、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欺世惑众。后代的反动派同样是为了维护



和复辟旧制度的需要，也把孔老二捧为“大学问家”。这个纸老虎，必须彻底戳穿。

孔丘是什么“大学问家”吗？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毛主席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整顿党的作风》）孔老二这个家伙，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劳动，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而是一个满肚子秕糠的大草包。当时劳动人民就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的生产知识等于零。他向学生灌输的所谓礼乐仁义，也完全是奴隶主贵族僵死的旧文化。他修的《春秋》，更是颠倒历史，混淆黑白，是一本无耻美化奴隶主头子、恶毒攻击革新势力的变天账。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当中，有不少人写了专门著作，总结了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某一方面的经验，在认识史上有所贡献。特别是法家的一些优秀代表，如商鞅、荀子、韩非子等人，更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阐发了革新的思想，丰富了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而孔老二这个家伙却是“述而不作”，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儒家经典《论语》也不是孔丘的亲笔，而是他生前的一些言行，由他的徒子徒孙回忆记录下来，拼凑而成，鸡零狗碎，杂乱无章。查其内容，更是反动腐朽。不是鼓吹“天命”论，就是大念复辟经，再有便是如何搞阴谋、耍两面派以及腐朽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什么“粮食越精越好，肉切得越细越好”，“烹调不到家，不吃。肉切得不方正，不吃”，“穿黑色的羊羔皮袍，一定配上黑色的罩衣；穿白色的鹿皮袍，一定配上白色的罩衣；穿黄色的狐皮袍，一定配上黄色的罩衣”；什么对国君如何毕恭毕敬，对权臣如何笑脸相迎，在大庭广众之中如何装出一副忠厚老实的面孔，在社会上如何骗取正人君子的美名。（《论语·乡党》）看，乌七八糟，腐败不堪，这就是儒家的经典！卑鄙无耻，百般钻营，这就是孔丘的学问！明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无学无术”。（《焚书·答耿中丞》）连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也瞧不起孔丘那一套，说在孔丘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还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哲学史讲演录》）这对于孔老二这个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倒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到处碰壁的丧家狗

毛主席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孔丘一生，到处搞复辟，到处碰壁。当时人民群众骂孔老二“累累若丧家之狗”，这句话生动地概括了孔老二一生的遭遇。这是他推行那条倒行逆施的政治路线的必然结果。

孔老二打着“克己复礼”的破旗，坐着一辆马车，颠颠簸簸，先后到过齐、卫、宋、陈、蔡、楚等国，奔波了十几年。但所到之处，不是坐冷板凳，就是被驱逐出境，大家都厌恶这个死顽固。卫国国君听说孔丘善于搞阴谋，派人带着武器出出进进地盯着他；齐国和宋国的新兴势力还要杀掉他。孔老二每次都夹着尾巴狼狈逃窜。在陈、蔡，新兴势力还派人把孔丘一伙包围在野地里，使他们七天吃不上饭，饿扁了肚子，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还病得爬不起来。连他的几个得意门生也大闹情绪，对孔老二那一套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孔老二在劳动人民那里，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种田的，背筐的，守门的，都对他群起而攻之。有的唱歌嘲笑他，有的斥责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反动派。匡城的老百姓还把他包围了五天，要杀他。孔老二几乎丢了一条老命。有一次，孔老二装出一副亲善的样子，面带三分笑，心藏一把刀，跑到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柳下跖那里，妄图用“仁义道德”的说教和名利地位的诱饵瓦解奴隶起义军。柳下跖满怀革命的义愤，痛斥孔老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吸血鬼，是当面说好话、背后搞阴谋的两面派，是油嘴滑舌、“诈巧虚伪”的“巧伪人”，是“罪大极重”的“盗丘”！骂得孔老二脸色刷白，两眼发黑，丧魂落魄地滚跑了。（《庄子·盗跖》）

孔丘到处碰壁，连他的弟子们也纷纷离开了他。孔老二哀叹：“如果我的主张行不通，我要坐着木筏到海外去。能跟随我的人，大概只有子路了。”（《论语·公冶长》）但就是这个子路，也在一次维护奴隶制的战斗中被人砍成肉酱，成了奴隶制度的殉葬品。孔丘如果还想坐着木筏亡命海外，就连一个追随的人也没有了。到处碰壁，众叛亲离，这就是一切搞复辟的反动头子的必然下场。

马克思说：“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死抱住孔老二僵尸不放、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人，他们的前途是不美妙的。世界的未来属于无产者！



评《吕氏春秋》

罗思鼎

秦统一六国前夕，秦始皇与吕不韦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吕不韦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商人、大政客，招集一批以儒生为主的“食客”，编纂了《吕氏春秋》一书，鼓吹复辟、倒退和分裂，为他在秦国复辟奴隶制进行舆论准备。但是长期以来，这一段历史受到了颠倒和歪曲。吕不韦和《吕氏春秋》被说成是社会进步的代表，而秦始皇却反而受到了贬斥和指责。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把这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的真相弄清楚，并从中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一)

吕不韦何许人也？他是个“家累千金”、奔走于秦、赵等国的大商人，也是一个“家僮万人”的大奴隶主。凭着雄厚的财势和赌徒的手腕，他在秦国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支持下，把一个原来流落在赵国当人质的公子异人送回秦国当上了秦庄襄王，他自己也因此当上了丞相。庄襄王死后，十三岁的秦始皇继位，秦国的大权就落到了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政治投机的成功，是秦国国内外奴隶主复辟势力相互勾结的结果，反映了当时工商奴隶主同贵族奴隶主联合起来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动向。

《吕氏春秋》的出笼在秦始皇八年，当时正是吕不韦不可一世的时候。这部反动著作，继承和发展了孔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主张，提出了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

什么叫“兴灭国”？就是要把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扶植起来，恢复西周时期诸



侯林立、各霸一方的状态。在当时，这是一条反对统一、坚持分裂的反动道路。吕不韦从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出发，造谣惑众地说：“观于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审分览·慎势》）他居然认为国家越是分裂，传世就越长久，名声就越响亮；所谓“神农氏”传了十七世，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竟被说成是因为能够与大小奴隶主共同享有天下的缘故。吕不韦用这种杜撰的理论，竭力反对统一，提倡维持当时各国割据的局面，鼓吹“存亡继绝之义”决不可废（《审应览》）。他把已经灭亡的卫国重新恢复起来，就是这种反动政治主张的具体实施。

战国末期，在奴隶们反抗奴隶主阶级的斗争的推动下，全中国范围内由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已成为当时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秦国处在这个潮流的最前头。孔丘七世孙儒生子顺在当时就发出了“不出二十年，天下尽为秦乎”的哀鸣（《孔丛子·执节》）。秦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反对奴隶主残余势力的篡权复辟，铲除分裂割据的诸侯王国，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以达到全中国的统一。吕不韦妄想保持当时诸侯割据的分裂状态，甚至要求恢复奴隶主的分封制度，这是历史的反动。

什么叫“继绝世”？就是要把丧失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重新扶植起来。在封建制已取代了奴隶制的秦国，这就是反对进步、提倡倒退。坚持还是反对“继绝世”，在当时表现为儒法两家的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的争论。孟子这一派厚古薄今，主张法先王，崇拜夏、商、周，妄图复辟奴隶制。荀子这一派厚今薄古，主张法后王，引导人们向前看。这两派是当时对立的两大阵营。李斯是荀子的学生，属于荀子的一派，他拥护秦始皇，赞成在秦国行之有效的法家政策，坚信秦始皇的封建统一事业一定能够胜利。

吕不韦的立场与李斯完全相反，属于孟子一派。他反对秦始皇，对秦国的封建主义社会制度没有半点看得上眼。一翻开《吕氏春秋》，到处充满着“今不如昔”的论调，什么“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啊（《有始览·听言》），什么“当今之时，世罔甚矣”（《开春论·期贤》）。总之，在吕不韦的眼睛里，天下一团漆黑，糟糕透了。原因呢？吕不韦认为这是由于周朝奴隶制受到了破坏的结果，而要改变这种混乱局面，就必须开历史的倒车，回到西周的奴隶制时代去。他说：“今周室既



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有始览·谨听》）

吕不韦所崇拜的周天子，是一个被抛进了历史垃圾堆的奴隶主贵族的最高头子。吕不韦要把已经“绝世”的奴隶主贵族的头子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就是妄想造成社会的大倒退。吕不韦所说的“强者胜弱，众者暴寡”，实际上是指新兴地主阶级战胜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站在封建制一边的众人镇压了孤立的反动奴隶主。这些都是值得庆祝的大好事。一个进步的阶级推翻一个反动的阶级，这是暴烈的革命行动，决不能搞什么温良恭俭让。吕不韦发出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诅咒，正暴露了他顽固地反对社会变革、坚持复辟倒退的反动立场。

什么叫“举逸民”？就是要让被打倒了的奴隶主阶级重新上台。吕不韦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又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孟春纪·贵公》）其实，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公私观。在阶级社会中，国家即所谓“天下”是有阶级内容的，只有某一个阶级专政的“天下”，而决没有代表包括敌对阶级双方利益的“公天下”。各个阶级所讲的“公”，从来都有一定的阶级内容，不是也不可能是超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公”，包括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决不包括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吕不韦所说的“公”，是奴隶主阶级的“公”，是为了谋取奴隶主阶级一党一派的私利。他鼓吹“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孟春纪·去私》），就彻底地暴露了他那反动奴隶主的丑恶嘴脸。他对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即所谓“贤者”，是“封”，是裂土分爵，全力扶植；对于新兴地主阶级即所谓“暴”民，是“诛”，是斩尽杀绝，寸草不留。爱憎是何等分明！什么“公则天下平”，完全是骗人的假话。

关于“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争论，归根到底，是一场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吕不韦叫嚣复古倒退，咒骂“今不如昔”，目的是为了在秦国贯彻执行反动的儒家的政治路线，变地主阶级专政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从这一点出发，他对法家的政治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咒骂法家商鞅忘义而趋利，是无信的小人；诬蔑法家吴起是个自大狂，最后不得好死。他还强调治理天下要用儒家的“德”和



“义”，不能用法家的“严罚厚赏”这套办法，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了。至于孔老二这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在吕不韦的眼中完全是一个了不起的“圣人”。他吹捧孔丘在鲁国执政三年，鲁国男女分途，路不拾遗，谁也比不上他的政治才能。他同情孔丘官运不亨通，在当时没有得到重用，以致造成了周天子的垮台和天下的大乱。他还完全重复孔丘那套陈词滥调，说什么“圣人用德要求自己，天下四面八方的人就都会归顺于仁了”（“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季秋纪·精通》）。这实际上是“克己复礼”的翻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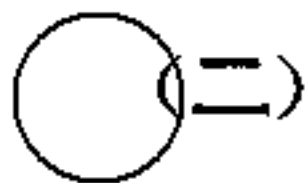
吕不韦在秦国执政期间，为了推行《吕氏春秋》所提出的这条反动政治路线，在组织上大力扶植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势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大搞分裂活动。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秦国形成了以宦官嫪毐为首的新奴隶主集团。嫪毐在公元前二三九年被封为长信侯，拥有大量领地、官室和奴隶，在当时权势很大。秦国的大小官吏一见面就相互询问：“与嫪氏乎？与吕氏乎？”（《战国策·魏策》）秦国的政治局一度落在吕氏和嫪氏奴隶主集团的控制之中。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封建制终究要代替奴隶制，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在秦国掀起复辟逆流的吕不韦和嫪毐，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都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秦始皇决心沿着法家的道路，把秦国这场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事业进行到底。吕、嫪奴隶主集团的党羽遍布朝野，权倾公卿，他毫无惧色。面对吕不韦发出的所谓“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的恫吓（《似顺论》），他也不动摇。他尽管遭到反动奴隶主阶级的极端嫉视和百般咒骂，仍然放手任用法家李斯为客卿，坚定地执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因此，秦始皇二十一岁刚亲政，嫪毐集团就狗急跳墙，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一场奴隶主的武装政变。然而，这场叛乱很快就被秦始皇镇压下去了。揪出了嫪毐，也就暴露并孤立了吕不韦。吕不韦于次年罢官，两年后畏罪自杀。秦始皇的一连串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为秦统一六国扫清了道路。封建地主阶级在当时是真老虎，是生气勃勃的先进者。秦始皇作为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敢于藐视和打倒那些庞然大物，不愧是在全中国第一个完成了封建统一事业的地主阶级革命家。



吕、嫪集团在秦国十余年惨淡经营，根深蒂固，为什么会顷刻瓦解、一朝覆亡呢？这是因为当时人心所向，要统一不要分裂，要前进不要倒退。秦始皇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终于在这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历史前进的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和孔老二、吕不韦一样，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是一条搞复辟、倒退和分裂的路线。他诬蔑秦始皇是“暴君”，咒骂法家是“罚家”，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伟大成果，诽谤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妄想“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已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重新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制造分裂，到处封官许愿，培植死党，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自以为比磐石还要巩固。但事实上一触即溃，一冲就垮。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中国人民，不是已经将这些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抛向一旁了吗？



《吕氏春秋》号称《春秋》的续篇，二者是既相同又不相同。孔丘修《春秋》，通过对历史的褒贬笔削，鼓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以达到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目的。在这一点上，《吕氏春秋》与《春秋》是相同的。但在表现形式上，二者就很不同了。孔丘在《春秋》中树起了儒家的黑旗，露骨地鼓吹复辟、倒退。《吕氏春秋》要狡猾和隐蔽得多。它被称为“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实际上是用“杂家”的面目来掩盖极右的儒家本质。这是一种以折衷主义面目出现的反动思潮。

《吕氏春秋》所以采用折衷主义的手法，是由于当时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孔丘修《春秋》的时候，封建制还刚刚兴起，鲁国奴隶主贵族的势力还比较强大，所以敢于公开宣布他的复辟理论。到了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的时候，随着奴隶主阶级力量的日益衰落，孔孟儒家的“显学”地位早已发生了动摇。秦国又是法家势力最强大的地方，一直奉行着法家的政治路线，儒家的名声很臭。在这种形势下，吕不韦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只能搞折衷主



义,在“杂家”的招牌下贩卖儒家的黑货。这标志着当时秦国地主阶级的力量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奴隶主阶级,标志着吕不韦所代表的奴隶主阶级的彻底没落和反动。

《吕氏春秋》的这种折衷主义的特点,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当时由于发生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动,思想领域中出现了各种思潮和学派,相互攻击,各不相下,号称“百家争鸣”。其中,有的反映了奴隶和奴隶主阶级的争论,如柳下跖对孔丘和儒家的批判。有的反映了奴隶主阶级内部的争论,如儒家和道家的争论。有的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争论,如儒家和法家、名家的争论。到了战国后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进入了最后决战的关头,斗争的日益激化使阶级阵线渐趋明朗,各家的混战局面为儒法两家鲜明的对垒所代替,并出现了名家归于法家的新情况。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双方,根据不同的阶级利益和政治路线,各自力图对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状况进行总结。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体现了当时历史前进的方向,敢于以横扫千军的气概对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各家学说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韩非的《五蠹》篇就是这样一篇杰出的代表作。儒家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在奴隶制彻底崩溃的局势面前,不敢正面摆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只能用躲躲闪闪、含含糊糊的态度,标榜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用折衷主义的旗子来掩护对法家的反扑。《吕氏春秋》就是这样的一部典型作品。它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作了总结。

杂家从来不杂。“**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吕氏春秋》的本质是宣扬反动的孔学,这一点已在前面说明了。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吕氏春秋》对待其他各家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它是怎样在折衷主义旗子的掩护下,成为奴隶主阶级反动思想的集大成者的。

先看道家。儒家和道家都代表没落的贵族奴隶主,在反对新兴地主阶级这一立场上是一致的,但在方式上有区别。儒家讲“有为”,大声疾呼地要求把新兴地主阶级扼杀于摇篮之中;道家讲“无为”,想搞“无为而无不为”,认为无声的包围和扼杀要更有效得多。儒家强调对地主阶级要积极进攻,道家主张采取消极退守的战术。儒家宣扬旧的奴隶制统治秩序动不得,道家则宣扬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无必要和不可能,因而两者都主张倒退、复古。吕不韦为了篡政夺权,也利用



了道家“无为而治”的理论，强调“君道无知无为”（《市分览·任数》），要求秦始皇做一个不学习、不问政治、光知吃饭睡觉的傀儡皇帝。他在《吕氏春秋》中叫嚣“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季春纪·圆道》），目的就是要秦始皇自愿让位给他这个“贤者”，以便他放手地在秦国进行复辟奴隶制度的活动。

再看阴阳家。《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大讲特讲五德终始，阴阳家的气味很浓。其实，这正是反映了儒家极右派——思孟学派的特点。五德终始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变化的结果是退回到古代奴隶社会中去。思孟学派的创始人子思和孟轲面临着奴隶制彻底瓦解的战国时代，吸收了阴阳五行的学说，利用这种历史循环论来为自己的复辟、倒退辩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神秘主义的唯心哲学。但是，从此也就开始了秦汉时代儒生与方士的合流，出现了一批自称能见微知著的骗子。汉代董仲舒所创建的“天人合一”的畿纬神学，就是建立在所谓五德终始的理论基础上的。从子思、孟轲到董仲舒，《吕氏春秋》在这中间起着桥梁的作用。它所鼓吹的什么“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先知必审征表”（《恃君览·观表》）等反动论点，就是后来为董仲舒所发展并被政治骗子林彪所推崇的那套“见微而知著”的鬼把戏。

最后看法家和名家。它们在《吕氏春秋》中都是受攻击的对象。法家是吕不韦最主要的敌人，但由于秦国法家势力强大，《吕氏春秋》有时也被迫说几句假话，提出什么“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慎大览·察今》）。然而狡猾的是它空喊一阵，根本不谈变法的具体内容，而对法家的攻击却是具体而又恶毒，完全是在玩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骗子手法。名家强调“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尹文子·大道下》）。它是法家的同盟军，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但不如法家激进，带有调和、妥协的气味，旗帜不那么鲜明，影响也就远远不及法家。战国末期，名法合流，名归于法。《吕氏春秋》中对名家的攻击，实际上矛头是完全对准着法家的。

《吕氏春秋》是以儒家为主的没落奴隶主阶级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它反映了奴隶主阶级中的各种集团面临着当时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威胁，结成了反动同盟。《吕氏春秋》在折衷主义破旗的掩护下，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武器，组织了一场对法家思想的反革命围剿，从各个方面向新兴地主阶级发动了进攻。它对于汉代



以董仲舒为首所掀起的一股尊孔逆流有着重要的影响。汉朝儒家所整理成的《礼记》，其中的《月令》篇是割裂《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中各篇拼凑而成的。汉朝儒家尊崇的《孝经》，和《吕氏春秋·孝行览》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吕氏春秋》开启了两汉儒家托古改制的先河。从孔丘、孟轲经过吕不韦到董仲舒，又经过韩愈到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组成了一条一脉相承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也是一条反对革新、坚持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

历史现象常常会有相似之处。《吕氏春秋》这种以折衷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动思潮在今天仍还可以看到，例如苏修叛徒集团就是用折衷主义来掩盖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的。鼓吹折衷主义，在革命阵营内部制造分裂，这不仅是奴隶主阶级在覆灭前夕的表现，也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的共同特征。历史上，当反动阶级在向革命阶级进攻的时候，它根本不讲折衷、调和，而是残酷镇压。但当革命阶级向它发动反攻的时候，它就大唱起折衷主义的调子，掩护退却，以便一朝卷土重来，好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

林彪一伙极力宣扬的所谓“中庸之道”，就是折衷主义的一种表现。从哲学上说，它是要永远保持旧的矛盾统一体，永远保持旧质的稳定性，把旧事物看成是神圣的、永恒的，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从政治上说，就是维护阻碍历史发展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反对革新，反对革命，反对社会的前进运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在尖锐的革命斗争的面前，当机会主义者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平正、公允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表面上不偏不袒，实质上千方百计保护反动派，对革命派则是力图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假的总是假的。他们既要干反革命，就难免不露出马脚，决不可能将真相完全掩盖起来。林彪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的政治骗子，但最后还不是照样彻底垮台了吗？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对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批判，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林彪所鼓吹的“中庸之道”反动本质的认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折衷主义反动本质的认识。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把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

郑 磊

一九七〇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一九七一年初，正当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的重要时刻，福建省新华书店出版了题为《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的小册子。这本反动小册子的出笼，曾经喧闹一时。从一月到九月，连出三版，印刷七次，印数达三百多万册，连锁带送，散发到全国许多省市。还编入高中课本，甚至准备译成外文。在这本小册子里，作者明目张胆地吹捧林彪是什么“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积极为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准备舆论。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彻底揭发批判这株为叛徒、卖国贼林彪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大毒草，弄清其来龙去脉，肃清其流毒，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清算林彪及其死党阴谋复辟的罪行。

—

这本反动小册子出版以前，在一九六〇年曾经发表过同名的文章。林彪亲自看过那篇文章，并加以赞赏。事隔十年，作者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经过精心修改，以小册子的形式抛了出来。从它的出笼时机和内容来看，是紧密地配合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林彪及其死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拟就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其中有一项叫做“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一月份出版的这本小册子，就是他们“开展政治攻势”的重要“舆论工具”。五月，作



为配合这个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重要步骤，加印二十万册，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发到他们一伙所把持的一些要害部门。六月，正当林彪死党进一步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猖狂地推行其反革命阴谋的时候，此书作者又亲自布置把小册子改排大字本，封面颜色要鲜艳，并擅自向全国征订推销。七月，此书作者更急如星火，督印黑书。他派人坐镇出版机关，一日数次催问进度，力求快印、快装、快发，限定“九月以前要印完”。请同志们注意，这句话不可等闲视之，它道破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就是在九月八日，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破产以后，九月十三日林彪和他的几个死党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是一张触目惊心的时间表。它无可辩驳地证明，小册子的出笼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指挥的阴谋活动。林彪及其死党象奔丧一样催印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要赶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枪声打响以前做好舆论准备。

这本反动小册子，顽固地宣扬林彪反党集团破产了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

吹捧林彪是“统帅”，就是为了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林彪不是叫嚷“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吗？不是炮制了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谬论，狂妄地提出军队要由他“直接指挥”吗？在《“571工程”纪要》中，也叫嚣什么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即服从林彪反党集团的“统一指挥”。这本反动小册子狂热吹捧林彪是什么部队的“统帅”、“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执行林彪的命令“就是胜利”，正是和林彪一伙的这个叫嚣相呼应，为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服务的。其罪恶目的，是要推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在中国复辟。

吹捧林彪是“非凡的天才”、“异于常人”，就是为了坚持“天才论”的反革命理论纲领。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林彪一伙所鼓吹的唯心论的“天才论”。但是，林彪及其死党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批判，继续宣扬这个反动观点，声称“要承认天才，学习天才，宣传天才，保护天才”。天才是谁？反动小册子毫不掩饰地回答，就是林彪。岂但是“天才”，而且是“非凡的天才”，也就是所



谓“超天才”了。林彪及其死党如此狂热地宣扬反动的唯心论的“天才论”，就是贩卖孔孟的“天命论”，妄图证明他们是“受于天”、脑袋长得和别人不一样的“至贵”、超人。这和《“571工程”纪要》里叫嚣的“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为林彪上台制造反动理论根据。

由于小册子作者为叛徒、卖国贼林彪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有功，林彪看了这本黑书以后，赶忙传令嘉奖，“很表感谢”。而作者也就把这个嘉奖当成“特大的好消息”，更加起劲地“宣传”他的主子了。

毛主席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有利用小说反党的，有利用戏曲反党的，也有利用回忆录反党的。形式虽有不同，目的完全一样。《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就是打着写回忆录的幌子，为林彪所代表的反革命阶级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发生。如果我们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不加注意，掉以轻心，就会吃大亏。

二

袭用孔老二的反动的《春秋》笔法，放肆地篡改历史，是这本反动小册子为林彪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一个铁证。书中只字不提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等光辉指示，把这些已经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一笔抹杀，而一味吹捧林彪重视建立根据地，“有远见”，胡说什么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彪“英明果断的指挥”的结果，还说什么辽沈战役就是林彪“天才”、“英明”的“一个最生动的说明”。

历史事实真是这样吗？

大家知道，一九四八年，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对我十分有利，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东北广大军民根据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有了巩固的后方，政治军事形势对我更为有利。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明胆略，及时地组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



役，毅然决定从东北战场开始，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展开战略决战。辽沈战役是毛主席亲自部署和指挥的，从准备到结束，发了几十份电报，作了一系列及时的具体的指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就是其中的两次电报指示。林彪却从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一再对抗毛主席的战略决策。

毛主席从全国战局出发，指出辽沈战役的主攻方向应指向北宁线，“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这样，就能“关门打狗”，把蒋军关在东北，各个歼灭。林彪却一再坚持将主力留在北线打长春，声称这是他“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加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被林彪攻击为“不甚适宜”的“其他意见”，就是毛主席关于我军主力南下北宁线的指示。经过毛主席多次批评后，林彪不得不于一九四八年九月上旬部署部队南下。南下以后，毛主席明确指示：“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林彪在攻打锦州的部署业已完成的关键时刻，又提出回师北上打长春的“建议”。由于毛主席的英明指挥，纠正了林彪的错误，才取得了锦州作战的胜利。攻克锦州以后，毛主席指示迅速派军队控制营口，堵塞敌军退路，林彪也拒不执行，结果让一部分敌军从营口入海逃跑。

在辽沈战役中，林彪一直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对人民的力量估计过低，看不到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看不到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可能性，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把东北敌人全歼在东北境内。在北线，他虽然嘴里说要打长春，但长时间徘徊动摇。让他南下，又不敢到敌人侧后作战，不敢打锦州。锦州作战开始以后，林彪仍然把南线敌情看得十分严重，怕这怕那，顾虑重重。大量事实说明，整个辽沈战役期间，两种军事思想、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辽沈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正确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是我军广大指战员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结果，是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



是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领导和组织者，这是任何伪造也抹杀不了的历史事实。

其实，此书作者对当时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心里是明明白白的。小册子在讲到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的时候说：“一般人按照通常的打法看来，以先打长春为宜”。这个“一般人”是谁呢？就是林彪。但是，作者做贼心虚，没有交代。反而耍了一个花招，说什么林彪“深知”我军“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拿下锦州”。这样就完全颠倒了历史。本来是主张先打长春的林彪，竟变成“深知”“可以一鼓作气拿下锦州”的林彪了。革命的人们必须“深知”林彪反党集团这套把戏，不为他们的反革命手法所欺骗，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为了替林彪制造所谓“天才军事家”的神话，在这本反动小册子里，花了整整一节的篇幅，竭力吹捧林彪的“一点两面”之类的所谓“战术原则”，胡说它是“具体运用十大军事原则的杰出成就”，是“对部队的实战经验，加以提炼集中的结果”。实际上，林彪的所谓“战术原则”，完全是他对抗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而炮制出来的黑货。

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避敌之长，击敌之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兵力部署上，要求“**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作战形式上，强调以运动战为主，“**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林彪的“一点两面”之类，则反对打歼灭战、运动战，主张打击溃战、消耗战；反对四面包围敌人，主张孤立、片面地在一点上搞兵力的绝对集中，实际上是把敌人赶跑了事。毛主席指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均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而林彪鼓吹的“四快一慢”（即所谓准备要快、前进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击要快，总攻发动时机要慢），则把准备与把握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战机对立起来，把局部和全局对立起来。说到快，他就鼓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不管三七二十一”，打“莽撞仗”；说到慢，他又鼓吹军事保守主义，胡说“没有准备好，不执行命令，不打



是对的”。林彪这套货色，是为他的消极避战，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服务的。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贯串着唯物论和辩证法，一切从实际出发，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要求机动灵活地处置各种情况。林彪的“一点两面”、“四快一慢”之类，则脱离我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无视具体条件，是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大杂烩。

就是林彪这样一些杂七杂八的玩艺儿，被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明明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是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贯彻执行了十大军事原则获得胜利的，经过此书作者的秃笔一摇，却成为“东北所有敌占大城市”全是在林彪的“战术指导下”拿下来的了，这种颠倒事实真相的表演，实在卑劣。

为了狂热地吹捧林彪，这本黑书还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林彪本来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却被吹捧为什么“苦学深思”，“手不释卷”，有“渊博的学识”。林彪本来是一个专搞阴谋诡计，满脑袋剥削阶级思想的家伙，却被吹捧为什么“公而忘私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彪本来是一个从世界观到生活方式都反动腐朽、糜烂透顶的伪君子，却被吹捧为什么“生活作风简朴得惊人”，“以非凡的毅力艰苦工作”。**“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剥去反动小册子给林彪披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优秀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等等的伪装，露出来的乃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

这本反动小册子是为林彪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大毒草。但是，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在抛出这本小册子的地方，这株毒草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和批判。一九七二年，我们也看到一点轻描淡写的批判。这种批判，与其说是批判小册子，倒不如说是为了表白小册子的出笼是“背着”组织，没有人“批准”，仅仅是由作者亲自下令搞的。事情真的是那样吗？这么大的一件事，没有人支持，没有人“批准”，办得成吗？由于这本书大量发行，流毒全国，关于这本小册子出笼的阴谋，现在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毛主席指出：**“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深入揭发和批判这株大毒草，将会使我们从反面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



认真看书学习 深入批林批孔

北京友谊商店百货部青年业余学习小组

我们百货部青年业余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小组，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成立的。一年多来，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马列著作的部分章节，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光辉著作，提高了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也促进了世界观的改造。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后，我们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批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进一步认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通过认真看书学习，提高了我们革命大批判的水平，使批林批孔逐步走向深入。

开始，我们对在批林批孔斗争中还要不要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这个问题，认识也是不一致的。有的同志认为，现在要学的材料那么多，能把有关批林批孔的材料和报纸的社论、文章好好学一学就不错了，还要继续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有困难。有的同志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学。大家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同志们说，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为了掌握理论武器，参加批判修正主义的战斗。我们过去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对于认识林彪这个政治骗子的真面目起了很大的作用。批孔是批林的深入，只有更好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通过批判林彪所鼓吹的孔孟之道，进一步从政治



上，思想理论上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决不能把学习和批判割裂开来。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又一次批判了林彪散布的马列主义“过时”的谬论。大家说：林彪恶毒攻击马列主义离我们“太远”了，这是一个政治阴谋，目的是欺骗广大革命群众，不让我们掌握马列主义，以便他们搞阴谋诡计，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要说远，孔孟离我们更远，林彪他为什么不嫌远，还要把两千多年前的孔孟之道搬出来，作为他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呢？这只能说明他们反动思想体系一致，臭味相投。我们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战胜修正主义，也必须掌握自己的思想武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学习好，运用好。

大家还联系我们正在学习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进行了讨论。一九〇八年，列宁为了批判俄国的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把距离当时二百年的老牌唯心主义者贝克莱拉出来一起批，深刻地揭露了波格丹诺夫和贝克莱的血缘关系，指出波格丹诺夫之流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谬论，都是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黑货的翻版。毛主席发动批林批孔，同列宁当年批判波格丹诺夫一伙同时批判贝克莱，其基本精神是一样的。林彪大肆鼓吹两千多年前的孔孟之道，我们把孔老二和林彪的反革命谬论对照起来批判，就能彻底地揭露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清算他们反动的思想体系。这样一分析，更加深了我们对批林必须批孔的认识。

通过讨论，大家认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但不能停，而且应该结合斗争的实际，进一步学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就是要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根据批林批孔斗争的需要，不仅要继续选学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而且一年多来已经学过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还应重新学，反复学。于是，我们合理安排了学习时间，重新制订了学习计划，把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学习有关的文件、报纸社论结合起来，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集中火力，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用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 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极右实质

为了弄清林彪“克己复礼”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我们反复学习了列宁《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有关章节和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大家围绕着为什么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总是集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同志们把考茨基和林彪加以对比：考茨基一面攻击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搞“个人独裁”，一面又鼓吹资产阶级的“纯粹民主”；林彪则一面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专制”、“独裁”、“绞肉机”，一面又宣扬“仁义”、“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套反动的孔孟之道。他们的话为什么这样相似呢？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列主义国家学说中最核心的内容，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和巩固，必将使一切修正主义者维护或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阴谋彻底破产，因此，他们总是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修正主义者拚命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这一点儿也不新鲜。帝国主义早就这样骂过我们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深刻地指出：“**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这就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林彪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宣扬要施行“仁政”，实质上就是要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同时，也使我们更加看清了林彪是国际上帝、修、反和国内被推翻的反动剥削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这样，大家对《国家与革命》中“**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基本观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创建的新的历史观时指出，马克思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卡尔·马克思》）学习了这段话，大家更明确了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中心是政权问题。机会主义者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什么？考茨基是以“纯粹民主”为幌



子，鼓吹要建立“议会共和国”，搞资产阶级专政。林彪是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要对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就是要在中 国复辟资本主义。

大家认识到林彪“克己复礼”的极右实质后，怀着满腔的怒火，纷纷用自己的苦难家史和村史，愤怒声讨林彪妄图把社会主义新中国拉回到黑暗的旧中国的反革命罪行。我们小组八名青年，有六名来自门头沟地区。解放前的门头沟煤矿，是一座人间地狱。矿工们过着悲惨的生活，每天给资本家干活长达十几个小时，腰压弯了，腿累断了，所得到的仍然是饥饿和死亡。劳动人民的白骨，填满了门头沟矿的万人坑，这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仁政”！

伟大导师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大家坚定地表示：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针锋相对，通过批林批孔斗争，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用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 痛斥林彪“克己复礼”的理论纲领

为了深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理论纲领——“天才论”，我们认真学习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有关章节。列宁指出：“**所有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和所有俄国马赫主义者都非难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更确切些说，他们都重复康德主义者、休谟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用以反对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那些陈腐的论据。**”大家把林彪、孔老二和贝克莱的言论加以对照，看出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都把唯心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孔老二鼓吹“生而知之”、“天生德于予”；林彪宣扬“天才论”，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贝克莱以及马赫主义者赤裸裸地宣扬“自我”，似乎他们是“世界上只有自己才存在的钢琴”，这是多么相似！一条唯心主义的黑线把他们贯穿起来了。他们的共同特点，正如列宁说的，都是“**最纯粹的唯一论**”。一切反动派都是代表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利益，是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对立的。他们十分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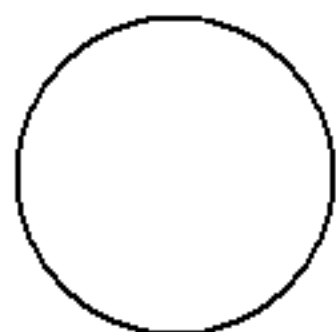


立，从来不敢也不肯承认客观现实。毛主席指出，他们所以要乞灵于唯心主义，“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

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哲学“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大家结合学习这段语录，讨论关于认识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关系，更加清楚地看到，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哲学都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贝克莱为了反对“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维护“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发誓宁肯让人说饶舌和罗嗦，也决不放过“根除”唯物主义的任何机会。林彪一伙也是如此，他死抱住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不放，就是为了把自己说成是“天才”，是“圣人”，为他篡党夺权，建立林家王朝做反革命舆论准备。但是，无论林彪这匹“独往独来”的“天马”，还是贝克莱之流那架“发疯的钢琴”，都永远改变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历史的事实宣告了他们唯心论的彻底破产。

通过对林彪“克己复礼”的理论纲领的批判，我们懂得了一切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是人们的认识路线。我们每一个革命青年，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使自己的思想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才能自觉地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形形色色的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

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批判林彪搞复辟倒退的罪行



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林彪和他的死党连续四次书写“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这决不是偶然的。林彪为什么这样痛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联系这个问题重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出发，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每一次社会的变革，总是要“消灭先前存在的所



有制关系”。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就必须摧毁，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每当这个时候，新兴的进步的阶级和没落的反动的阶级，就要展开一场消灭还是保护旧的所有制关系的生死搏斗。这种变革经济基础的斗争也必然要反映到上层建筑领域里来，只有通过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斗争，才能使新的所有制关系得以建立和巩固。

孔老二在奴隶制崩溃的春秋末期提出“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就是要复辟西周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林彪恰恰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也提出要“克己复礼”，他的反革命用心是很清楚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要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林彪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拚命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一心要复地主资产阶级之“礼”，企图用旧的上层建筑的力量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把历史拉向倒退。但是，历史总是要按照客观规律前进的，它的发展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科学预见的那样：“**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搞复辟、倒退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林彪一伙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只能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轧得粉碎。我们一定要认准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党的领导下，永远站在斗争的前列，发扬无产阶级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促进派。

通过前一阶段的学习和批判，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只有学得深，才能批得透。我们小组成立的时间还比较短，只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初步收到了一点成效，但还是很不够的。我们决心遵循毛主席关于“**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的教导，继续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要象列宁指出的那样：“**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广东英德县望河大队党支部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我们这个大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也出现了新气象。广大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批林批孔打击了资本主义势力，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这个运动来得很及时。”

我们大队平均每人有耕地两亩多，还有大片荒地可以开垦，生产潜力是很大的。可是，过去批判过的“金钱挂帅”、“三自一包”等修正主义黑货，近年来有的又重新出现，有些生产队实行副业包产到人，一些社员外出搞副业，因此农业生产上不去，要吃国家返销粮。许多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为此感到着急。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有的同志对批林批孔的重要意义以及同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关系弄不清楚，认为批判林彪和死了两千多年的孔老二，解决不了眼前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远水救不了近火。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广大群众和干部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原来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这就使我们加深了对开展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批林批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农村，通过批林批孔运动，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进一步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使社会主义牢固地占领农村阵地，才能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促进农业大上快上。

由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孔孟之道在农村的影响是很广的。这种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其反动性就在于它阻碍着社会的前进。林彪就是利用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思想武器，妄图达到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批林批孔



运动中，联系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把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使批林批孔成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

我们紧紧抓住“克己复礼”这个反动纲领，作为批林批孔的重点。通过批判，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认识到，林彪效法孔老二鼓吹“克己复礼”，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把我们劳动人民推回黑暗的旧社会，再过那种水深火热、牛马不如的生活。一提起旧社会，贫下中农就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纷纷起来控诉解放前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一篇篇苦难史，一笔笔血泪帐，激起了大家对于林彪“克己复礼”的极大义愤，加深了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的认识。一些老贫农说：“提起解放前，受过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谁不悲愤！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要把劳动人民再投进火坑，谁不痛恨！”经过反复批判“克己复礼”，人们对于“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大家决心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批判“克己复礼”的同时，还联系我们对资本主义倾向斗争很不得力的问题，组织大家批判林彪所宣扬的孔老二的“中庸之道”，使大家认识到这是反动剥削阶级用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毒药。林彪胡说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农村中的阶级敌人则散布什么“宁与千人好，不与一人仇”，目的都是为了松懈革命人民的斗志，以便他们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群众和干部懂得了“中庸之道”就是复辟之道，自觉地克服了“老好人”思想，积极地大胆地揭发了我们大队各种倒退的现象。社员群众尖锐地指出，所有这些现象，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整个形势联系着，是林彪反党集团鼓吹“克己复礼”，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那股反动思潮在农村中的反映。农村中的阶级敌人散布“精仔搵钱，傻仔耕田”、“队有千金，不如自家日进一文”等谬论，是和林彪同声相应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使大家看得很清楚，林彪搞“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适应国际上帝、修、反的需要，代表了国内地、富、反、坏、右的利益，我们这里的阶级敌人同林彪是一个鼻孔



出气的。

在群众揭发出大量问题以后，我们党支部引导广大社员群众按照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原则，对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进行了批评帮助，对于那些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论调，发动群众开展了讨论和辩论，划清是非界限，进行自我教育。

我们这里有的人，原来对于实行副业包产，允许社员个人外出搞副业，缺乏正确认识，说什么“副业包产能增加集体收入”，“社员个人外出搞副业是依靠劳动赚钱，不算资本主义”。通过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提高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生产队去年初开了七十亩荒地，扩种了水稻和经济作物，使农业大上快上有了良好开端。但后来在资本主义思想影响下，他们允许一些社员外出搞个人副业，结果水稻发生虫害无力除，种了甘蔗也没有施肥，粮食和经济作物都减了产。而另一个生产队去年夏天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召回外出搞个人副业的社员，大抓农业，晚造获得了增产。摆出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进行对照分析，大家认识到：让社员个人外出搞副业，只能使少数人一时多得几个现钱，结果是腐蚀了外出人员的思想，挖了集体经济的墙脚，影响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它不仅不能增加集体收入，反而损害了集体经济。能说这不算资本主义倾向吗？经过这样一分析，擦亮了大家的眼睛。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干部和社员，主动起来控诉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对自己的毒害。他们沉痛地说，“顾了个人发家，就看不到资本主义复辟”，表示要记取教训，肃清林彪和孔老二的流毒，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大道。

我们党支部委员会有一个主要成员，今年春节前后，在他所住的生产队搞水稻包产到组，还要在全大队推广，说什么农业要大上快上，“非包不可”。其他支委和大多数生产队长都不同意，但因受“中庸之道”的影响，明知不对，也不开展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这次，大家打破了“中庸之道”的束缚，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他说：“我这是为了调动社员积极性。”大家针对他这个思想，就启发他回顾过去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时的情形。那时候，有个生产队搞了包产到组。分组时，一户社员因为劳力弱，各组都不要，差点变成单干户。分组后，各组争耕牛，争农具，争肥料，经常闹纠纷，阶级敌人乘机破坏，挑拨群众闹不团结。



包产到组的结果是粮食减产，社员不团结，阶级敌人称心快意。大家说，如果不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而沿着那条路子滑下去，那不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吗？林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克己复礼”，就是妄图让我们走回头路，我们怎么能不吸取过去的教训呢？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帮助他转变了立场。他承认了错误，并表示要坚决改正。

这样紧密联系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批林批孔，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带来了生产面貌的初步改变。人们议论说：“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害人害己，祸国殃民，万万干不得！”我们加强了对集体副业的领导，不少外出搞个人副业的人回来参加了集体劳动。高良生产队有个富农分子，煽动社员盲目多种高价作物，破坏集体的种植计划，当即遭到群众的批斗。全大队社员群众和干部积极修订生产计划，决心搞好农业生产，争取今年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产量大幅度增长。目前，各生产队都积极积肥和修水利，搞好春耕生产，劳动热情的高涨，为几年来所未见。

我们大队批林批孔以来的实践证明，当前农村中经济领域内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必须通过批林批孔运动，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大家继续革命、反对复辟的自觉性，才能得到解决。这几年我们大队某些资本主义倾向反复出现，除了别的原因以外，从我们的工作上来检查，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一些资本主义倾向，往往只采取某些行政措施来处理，而没有把它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解决，即使有所批判，也只是抓了现象，没有挖到根源。对于一些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的议论，没有及时抓住，组织群众展开讨论和辩论，从思想上、路线上分清是非，而是听其在群众中流传。这就势必要迷失方向，走偏道路。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我们决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搞好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的战斗堡垒。



攻击干部下放劳动就是要复辟

北京东城区“五·七”干校大批判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广大革命干部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上“五·七”干校，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学工，学农，从事群众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广大干部经过下放劳动，发扬了党的光荣传统，密切了同工农群众的关系，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支又红又专，作风正派，能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无产阶级干部队伍，正在茁壮成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成果。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出现，是对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旧思想、旧传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是对一切反动派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因此它必然会遭到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疯狂反对。叛徒、卖国贼林彪和苏修唱一个调调，恶毒攻击干部上“五·七”干校是“等于变相失业”。这是对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公然对抗，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猖狂进攻，是对党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和政策的无耻诽谤。这充分暴露了林彪鄙视劳动，仇视劳动人民的反动立场，是他背叛马列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又一条罪证。

林彪恶毒诬蔑干部下放劳动的反动谬论，和两千多年前孔孟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一路货色。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实际上就是说，剥削阶级应该不劳而获，被剥削阶级应该世代永远被奴役，受剥削。这是赤裸裸的“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剥削阶级理论。林彪和孔老二一样，极端鄙视劳动，仇视劳动人民。在林彪看来，干部根本不是普通劳动者，不是人民的勤务员，而应是统治工农群众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如果下放劳



动，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去和工农群众一起干革命，那就“等于变相失业”。很清楚，林彪和孔孟宣扬这种同劳动人民完全敌对的反动思想，都是要倒退，要复辟。我们同林彪在是否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否坚持走“五·七”道路问题上的斗争，是几千年来广大劳动人民和孔孟之道斗争的继续，也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培养为那个阶级服务的干部，是把干部培养成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还是培养成为地主资产阶级效劳的官老爷，这是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同资产阶级干部路线的一个分水岭，是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公社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代替为剥削阶级效劳的官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伟大导师列宁曾多次指出，要防止国家机关职员蜕变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并告诫说：“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论粮食税》一书纲要）不幸的是，列宁的预言竟在苏联得到了证实。苏修叛徒集团阴谋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了一个与广大劳动人民相对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关系完全是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一小撮无产阶级的叛徒，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为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国家，变成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地狱。毛主席总结了国内国际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且为了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执行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干部路线，正确地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干部队伍和怎样建设干部队伍的问题。

毛主席深刻指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



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发出了光辉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干部队伍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措施。干部下放劳动，上“五·七”干校锻炼，正是为了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培养一支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有高度路线觉悟，密切联系群众，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队伍。只有这样的干部队伍，才能保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林彪抛出攻击干部下放劳动的反动谬论，是同他搞“克己复礼”，要复辟的反动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其罪恶目的是妄图使我们的干部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群众，脱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分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看不见路线斗争，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蜕变为修正主义的精神贵族和特权阶层，以充当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使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但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说教无法挽救孔老二“复礼”的破产，“等于变相失业”的恶毒诽谤，也无法改变林彪反党集团彻底灭亡的命运。与林彪的反动愿望相反，阶级敌人的攻击和反对，不仅丝毫动摇不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决心，而且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昂首阔步地行进在光辉的“五·七”大道上。

我们东城区“五·七”干校是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建立起来的。建校几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培养无产阶级干部，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教育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的头脑。毛主席教导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我们在“五·七”干校，一面学习，一面生产，通过劳动和插队锻炼，向贫下中农学习，学到了很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干部下放劳动，到“五·七”干校学习锻炼，与群众保持直接的经常的联系，虚心向群众学习，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有利于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断改造世界观，增强抗拒腐蚀的能力，纠正不正之风。通过参加劳



动，许多同志深有体会地说：“铁锹不擦要生锈，人不劳动要变修”，“长期不劳动身子越呆越懒，心和群众越远”，“锄头一扛官架子就打掉了一半”。劳动是改造世界观、防修反修的重要途径。在我校的“五·七”战士中，有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在战争年代，她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不怕苦，不怕死，在大生产运动中和群众一起开荒种地，一心想的是革命，很少考虑自己。解放后进了大城市，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丧失了警惕，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长期坐办公室，参加劳动少了，接触工农少了，逐渐滋长了资产阶级贪图享受的思想。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教育，又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向贫下中农学习。当她走进贫下中农的家，想起当年在陕北和群众同甘共苦的战斗生活，情不自禁地喊出：“大爷，我又回来了！”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她，激励她积极参加冬季盖房、挖引河等比较艰苦的劳动，紧密结合实际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这样又使她重新焕发了革命的朝气。她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有体会地说：“修正主义路线是白糖拌砒霜，使我变了思想，忘了过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使我恢复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焕发了革命的青春。”

经过在“五·七”干校学习锻炼，许多老干部发扬了艰苦奋斗、紧密联系群众的革命传统，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不少年轻的干部也都滚了一身泥巴，增强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更加朝气蓬勃。许多“五·七”战士回到工作岗位以后，继续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做到职务变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变；环境变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变。群众说：“干部上‘五·七’干校和不上‘五·七’干校就是不一样。”这些事实对林彪攻击干部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的反动谬论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搞复辟倒退的人绝没有好下场。孔老二是这样，林彪也是这样。我们“五·七”战士清醒地认识到，林彪虽然已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决反对任何破坏“五·七”干校的妖风邪气，进一步办好“五·七”干校，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持无产阶级的干部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以实际行动回击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



走上山下乡的革命路

广西恭城县挖沟大队小黄埠生产队插队知识青年小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取得了巨大胜利。面对着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新生事物，广大人民群众热烈赞扬，积极支持；而叛徒、卖国贼林彪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恶毒咒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企图把青年引向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邪路，变成他搞“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用心极其阴险狠毒。

引导青年走什么样的道路，是一个培养什么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同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由政治路线所决定，并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老二，一贯轻视劳动，敌视劳动人民，反对青年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他大骂要求学农种菜的樊迟为“小人”，不准自己的学生过问耕田种地的事，拼命向学生灌输轻视劳动的思想，胡说什么耕田种地，就要挨饿；读好书，才能升官发财。（“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孔老二为什么这样仇视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呢？因为在他看来，只要统治者掌握了奴隶主阶级一套统治术，如“礼”、“义”、“信”之类，就可以迫使老百姓服从他们，供养他们，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孔老二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学生做不劳而获、欺压劳动人民的寄生虫，当维护周礼、复辟奴隶制的门徒。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批判了孔老二的这种反动思想，指出他的弟子“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走的是一条背离历史发展方向的穷途末路。林彪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恨之入



骨，正好说明他和孔老二是一丘之貉，其反动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一个破口大骂耕田种地的是“小人”，一个恶毒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目的都是要复辟旧制度，开历史的倒车。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不仅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无产阶级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引导青年坚定地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列宁也指出，青年“**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内国际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又多次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我国广大知识青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上山下乡、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一条充满阳光雨露的革命路、幸福路。

一九六九年一月以来，我们先后有三十九位知识青年来到小黄埠生产队插队落户。每当我们到来时，整个山寨就象办喜事那样，贫下中农敲锣打鼓、放鞭炮迎接我们，给我们扫住房、安床铺，教我们煮饭做菜，向我们介绍队里情况。我们到了队里以后，各级党委、革委会负责同志**又经常**来看望我们，同我们促膝谈心，鼓励我们扎根农村干革命。广大贫下中农把我们当作亲生儿女，政治上对我们耐心进行再教育，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劳动中手把手教我们，帮助我们搞好学习，安排好生活。老贫农、生产队长还把我们请到家里，给我们讲家史、村史，讲农村两条路线斗争史，激发我们的阶级感情，帮助我们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感到，生活在革命大家庭里，生活在贫下中农中间无比温暖。一九六九年春，我们亲手栽下的第一棵“扎根树”——柳树，现在已长成碗口粗了。我们决心迎着时代的东风，在小黄埠生根开花，为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献出自己的青春。林彪把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把党和贫下中农对我们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诬蔑为“变相劳改”，真是反动透顶，荒谬至极。这充分暴露了他敌视工农、仇视劳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本性。

知识青年和工农相结合，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通过五年多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工农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正是他们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知识青年只有长期地、无条件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经受锻炼，才能把立足点移到工农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也才能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刚到农村时，旧思想使我们同贫下中农格格不入。后来，在广大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我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努力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贫下中农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自觉性，认真改造世界观，增强了无产阶级感情，才逐步地使我们和贫下中农心连着心。如有两个女同学，开始和群众一起开展对敌斗争时，坏人背地里威胁她们说：“你们连地皮还没站热，就管得那么宽，妹子家，做事留三分呀！”她们听后心里有点嘀咕。生产队政治指导员就和她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帮助她们坚定了同阶级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接着，她们同贫下中农一道反复查对材料，揭出了一个隐藏二十多年的坏家伙。经过阶级斗争风浪的锻炼与考验，她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如，有几个同学接受了生产队交给的设计、安装小水电站任务，开始整天在书本上打转，设计的图纸不合要求。贫下中农就带领他们到邻近社队的电站去参观学习，启发他们把书本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使他们思想开了窍。后来这些同学虚心拜贫下中农为师，刻苦钻研，边干边学，终于同社员们一道，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就把电站建起来了。有个女同学开始担任队里的饲养员时，怕脏怕臭，感到这样长久下去，没有出息，几次要求调换工作。贫农老妈妈、饲养员就给她讲家史，并言传身教，使她爱上了养猪事业。她积极学习中曲发酵技术，学习防治猪病的技术，学习人工配种的新方法。在她带动下，生产队的集体养猪有了很大发展。还有个女同学，敢于打破这里“妇女不上灰窑”的旧习俗，带领妇



女上窑烧石灰，由于她们敢想敢干加巧干，结果所烧的窑出石灰比男社员出的还要多。

我们在农村的革命大熔炉里，晒黑了皮肤，炼红了思想，增长了才干，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茁壮成长。我们已有两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八人加入了共青团，有十二人担任农村中小学教师，有二十五人被贫下中农评为先进知识青年，有四人参加大队、生产队领导班子，有四人分别被选为县委常委，自治区、地区团委委员和地区妇联委员。看到知识青年的健康成长，贫下中农都十分高兴。事实证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农相结合，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最好途径。不管林彪一伙怎样声嘶力竭地攻击咒骂，都丝毫动摇不了我们坚持上山下乡，继续前进的决心。

毛主席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五年多来，我们同贫下中农一起，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战天斗地，使我们队的面貌有了较大的变化。小黄埠原是一个三面环山、村前一条黄水沟的小山村。这条沟的源头是一个浑水洞，又叫“龙王洞”，与地下河相通，夏秋两季洪水危害最大，有时，大好晴天，洞内突然冒出洪水，把田地淹没冲坏。一九六六年，社员们曾在浑水洞前修筑大坝。可是当大坝刚刚合龙时却被洪水冲垮了。阶级敌人幸灾乐祸，说什么“在龙王头上动土，自讨苦吃”。贫下中农和我们知识青年，不信阶级敌人散布的那一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在一九六九年春天雨季之前修复了大坝。这一年三次洪水，副坝又被冲崩了三次，我们和贫下中农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最后，顺着洪水冲击的方向，用石头砌成五十多米长，四十五度斜坡的缓冲排洪道，两边另修了排水沟，这样蓄水方便，排水迅速，终于拴住了“龙王”的鼻子，建成了一座蓄水二十万方的水库，把水患变成水利。这一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总产量比一九六六年增加四倍。以后，逐年把水坝加高加固，不断改变生产条件，使旱涝保收田从原来二十八亩增加到二百五十亩，还可以把二百多亩旱地改为水田。

解决水害以后，我们又同贫下中农一起积肥改土，大搞科学种田，试验推广良种，使粮食产量连年上升，总产量从一九六八年的九万斤提高到一九七三年的



十八万七千斤。近几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队里购置了拖拉机、柴油机、水轮机、碾米机、粉碎机、插秧机和打谷机等，开办了榨糖、榨油、碾米等各种农副业的加工，还自己生产土磷肥。我们知识青年积极为农业技术改造贡献了力量。此外，我们和贫下中农一道，种下的一百二十多亩油茶树，已长两、三尺高，种下的二千多株柑桔，已结出丰硕的果实。旧社会十种九无收的穷山寨，如今机器隆隆响，荒山成了米粮仓，农林牧副齐发展，人换思想地换装。每当我们回顾几年来的战斗历程，就为自己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贡献了一分力量而感到光荣、自豪。我们和社员们一起战天斗地，用汗水洗刷了旧思想，加深了对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意义的理解，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也坚定了坚持在农村干革命的决心。知识青年需要到农村锻炼，农村需要知识青年去建设。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林彪反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企图阻挠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绝不上当！

千百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都认为，读书做官是正道，读书务农是斜路。我们革命知识青年，就是要反这个旧传统观念的潮流，就是要反这股封、资、修的潮流。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雄伟步伐，踏碎了反动阶级把复辟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的迷梦。林彪一伙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肆意造谣诬蔑，进行绝望的挣扎。但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两千多年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孔老二，周游列国，奔走叫卖，鼓吹“克己复礼”，推销“学而优则仕”的破烂货，挽救不了奴隶制的崩溃灭亡；今天的林彪求助孔老二的亡灵，兜售孔孟之道，妄图恢复剥削阶级已经失去的“天堂”，也只能是白日做梦，枉费心机。

孔老二的“学而优则仕”引诱不了我们，林彪的“变相劳改”论动摇不了我们。近来，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我们又栽下了第二棵“扎根树”——松树，决心象青松一样，扎根农村志不移，任凭风吹雨打不动摇。面对林彪的恶毒攻击，我们豪迈地回答：读书务农，无上光荣！上山下乡，前途无量！坚持乡村，为革命奋斗一生！



文 化 战 线

“大有大的难处”

——从《红楼梦》看反动没落阶级的虚弱本质

方 岩 梁

《红楼梦》第六回写刘姥姥来到荣国府。王熙凤觉察出她是来借钱的，就抢先诉苦：“谁家有什么？不过也是个空架子。”她恐怕刘姥姥不信，又继续叹了一番苦经：“我如今接着管事，这些亲戚们又都不大知道，况且外面看着，虽是烈烈轰轰，不知大有大的难处，说给人也未必信。”

“大有大的难处”^{*}，这真是一语道破了贾府的没落趋势和困境，典型地反映了正在走向没落的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征。今天苏修、美帝两个超级大国，大则大矣，但外强中干，困难重重而无法摆脱，在这一点上，倒是很象《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用“大有大的难处”刻画这类反动的“庞然大物”的虚弱本质，不也非常逼真吗？

王熙凤说“大有大的难处”，本意是为了搪塞刘姥姥启齿要钱，但也确是贾府日子一日难似一日的自供。《红楼梦》中的贾府，是“最有权势极富贵的”金陵四大家族的首席代表。它的根底很深：“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但是，到王熙凤“接着管事”的时候，这个“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贾府，已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开始衰落了。贾府早已潜伏着的种种矛盾和危机，一进入“末世”就愈加充分地暴露出来。王熙凤首当其冲地卷入了贾府重重

* 此句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在八十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甲戌本、庚辰本中均作“大有大的艰难去处”，意思是一样的。



矛盾的漩涡之中。她要出来扭转颓势，支持贾府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就比较敏锐地感到了这个“难处”。

贾府虽已进入“末世”，但表面上还是有着珠光宝气般的繁荣。要知它的“难处”，你就不能光看它那个“烈烈轰轰”的现象，那叫做虚有其表。还是那个冷眼旁观的古董商冷子兴有点眼力，他没有被贾府外表的“葱蔚溷润之气”所迷惑，看出贾府“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对王熙凤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是个很好的注脚。“内囊尽上来”了，这是一切反动阶级处于没落时期的共同本质。而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的虚弱，都要千方百计维护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架子”。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越大越虚，非垮不可。

贾府的虚空首先表现在经济上的入不敷出。地租剥削是贾府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但是，贾府主子们享乐欲望的无限膨胀，同有限的剥削收入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荣宁二府拥有巨额的庄园土地，单宁国府的地租庄子钱，一年就有三五十万往来，荣国府还要大得多。庄地上榨取来的一切，填得满贾府主子们的无底欲壑吗？还是不行。第五十三回描写黑山村乌庄头到贾府缴纳地租的一幕，就很说明问题。乌庄头不过管着宁国府八九个庄子，而所交的地租，除了猪、羊、鸡、鱼和鹿、獐、熊掌、海参等各种山珍海味以外，还有柴炭三万多斤，米一千多担，现银二千五百两，已经是够骇人听闻的了。而宁国府的贾珍仍不满足，皱着眉头说道：“这够做什么的？……真真是叫别过年了！”荣国府的开支比宁国府还要大得多，“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入不敷出的矛盾就更加尖锐了。这些不管农民死活的寄生虫，一天比一天感到钱不够用。这种境况，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中揭露十八世纪德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烦恼时所说的：“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

大年夜下，从黑山村传来的农村经济破产的消息，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本质。由于走向没落腐朽的地主阶级维护落后的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即使逼得广大农民倾家荡产，也不能克服自身的经济危机。贾府越往后走，日子就越不好过。第七十二回写到荣国府卖了大铜锡家伙四五箱子，才凑上钱给贾母过生日；贾璉求鸳鸯把贾母的金银家伙偷出一箱子典押



千数两银子来支付用场。这种危机在第七十五回，终于反映到贾母的粥锅里了，连“老祖宗”吃的红稻米粥也是“‘可着头做帽子’了，要一点儿富余也不能的”。高鹗的续书中写贾赦、贾珍被抄家后，贾母、贾政相继查问家底，方知“旧库的银子早已虚空，不但用尽，外头还有亏空”，“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儿”。这种情况，也并不只是贾府才有，据贾母说，史家以前也是摆了几年虚架子，不消一二年就完了。贾家的仆人也说“这是家家这样的”。可见，经济破败衰退，成了封建社会末期普遍的不治之症。其实，一切反动没落阶级都是这样，他们维护着反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造成经济上的萧条萎缩，反过来又必然把自己推进难以解脱的深渊。

面临着日益逼紧的经济危机，贾府的主子们肯放下“大架子”、收起“大排场”吗？他们是万万不肯的。尽管发生亏空，“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你看，宁国府的晚辈媳妇秦可卿死了，贾珍嘱咐协理丧事的王熙凤说：“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要好看为上”。贾珍请了几百名和尚道士做了四十九天“法事”；用的是一副价值一千两银子以上的贵重棺材板；为着“丧礼上风光些”，又花了一千两银子行贿替贾蓉买个官职。荣国府的排场就更大了，单是元妃省亲一次，就特地大兴土木建造了一个“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仅仅去江南采买戏班子和彩灯、花烛并各色帘帐，就花去五万两银子。他们自己也明明知道，“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但还是要将银子花得象淌海水一般。这真是“黄柏木作了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摆这个大排场干啥，还不是死要面子，虚张声势！

偌大一个贾府，难道竟无一人看出大排场越摆越难吗？不。也有人目睹“难处”而主张紧缩，在议论着“省俭之计”。寄居贾府而没有权力的苏州小姐林黛玉就敏锐地觉察到：“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他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野心勃勃而很想掌权的薛宝钗也向王夫人建议过：“如今该减省的就减省些”，“说不得当日的話”。这个一心要争宝二奶奶地位的封建淑女，献计是为了拍马，以求“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黛玉也好，宝钗也好，虽然各有各的处境，各有各的目的，但都不是掌权的人，说些“省俭”话，不过是书生发点空议论。



掌有实权的王熙凤在贾府是决策性人物。她看到“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说是“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但是，财迷心窍的王熙凤，根本不可能为整个家族的前景设想出一套“省俭之计”来，她最为关心的是装满自己的口袋。她对平儿说：“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背地里不恨我的。”其实，她那些“省俭的法子”，全是为了无休止地积攒所谓“体己利钱”。最后贾府被抄时，从她的屋里弄走的她和贾琏历年积聚的东西并“体己”，不下“五七万金”。还搜出两箱作抵押的房地契、一箱借票来。这就是她重利盘剥，损家肥己的证据。只要自己能捞到油水，她哪里管帐房里“寅年用了卯年”的。王熙凤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一个阶级。剥削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使“凤辣子”的全部心机和才干，都用在如何利用贾府的混乱，谋取个人和王家的权势实利上。这深刻地说明，象贾府这样的没落家族，象贾府主子们这样的没落阶级，与“省俭之计”是水火不容的。

被称为“镇山太岁”的探春小姐，在曹雪芹笔下是作为地主阶级的改革家形象出现的。她比凤姐更年轻，论“才干”和“魄力”，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凤姐还“更利害一层”。她也不象王熙凤那样独断独行，而是和李纨、薛宝钗一起搞了个“三驾马车”式的集体领导，天天在那个“议事厅”研究政策。她逛一次赖大家园子，就留心探问园子的出息，发现“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惨淡经营出一套“兴利除宿弊”的改革方案。她提出把大观园的花果竹木的出产当作商品卖钱，算是“开源”，她又减免一些笔墨、脂粉之类的费用，算是“节流”。她搞的“紧缩政策”，听起来是怪不错的，但要真正实行起来，也是“四面楚歌”，到处树敌。你看，探春的生身母亲赵姨娘为弟弟赵国基的死少给了“赏银”，不是雄赳赳地吵上门来了吗？邢夫人女儿迎春房里的司棋为了要吃一碗鸡蛋不称心，不是引起大观园厨房的一场争权斗争吗？处于没落阶段的反动派，固然是到处扩张，到处碰壁，但你只要一搞“紧缩”，内部矛盾就更尖锐。紧缩到谁的头上，谁就要闹气。这就难怪探春的“紧缩”政策引起了王熙凤的一番慨叹：“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克薄。”其实，探春的“紧缩”也不过是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对于贾府的庞大开支来说，无异杯水车薪，哪里又能拯救得了贾府的经济危机呢？曹雪芹对探春表示了同情和惋惜，说是“生于末世运偏消”。这里倒



是说出了一点历史的辩证法：对于一切处于“末世”的反动没落阶级来说，它那江河日下的历史命运，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即使再多出几个“才自清明志自高”的贾探春式的人物，最终也还是免不了要滚进坟墓。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怎么办呢？贾珍有句话，说明了他们整个阶级的方针：“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这个“你们”，就是指的农民。地主阶级所享尽的人间乐事，本来就是用农民所受尽的人间苦楚换来的。但是，有压迫就有反抗。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历史的一条规律。贾府的逻辑是，不和农民要，找谁去？而广大农民的逻辑是，不消灭贾府一类寄生虫，就活不下去。这样，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当然不会也不可能去歌颂或正面描写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但我们透过《红楼梦》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小说开卷第一回就讲到甄士隐的家乡：“水旱不收，贼盗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从这幅凋敝的、动乱的农村生活的图画中，我们不是看到了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情景吗？第五十三、七十五回以及高鹗续写的第一百零六回，也提到贾府逼租遇到了困难，“庄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地租的数量已“不及祖上一半”，这不也透露了广大佃户抗租斗争的讯息吗？

贾府围墙外的农民怒吼起来了，贾府这个深宅大院里面也很不平静。我们透过大观园的竹林花丛，可以看到贾府广大奴婢的生活饱和着泪水、哀怨和痛苦，有的跳井上吊，有的含恨而死，血泪斑斑，怨声载道。贾府的奴隶们虽然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尚未达到阶级意识的真正觉醒，却也接二连三地发出了愤怒的呼喊和激烈的抗议，“各屋里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后院着火，此起彼伏。它们同广大农民的革命汇合成强大的暴风雨，冲击着贾府的围墙，震撼着整个封建王朝，使它象一条桅断帆裂的破船在风雨飘摇之中沉没下去。

经济危机必然加剧政治危机。今日苏修、美帝的状况和昔日的贾府也十分相似。它们都是大而凶，虚而弱。就说经济吧，号称“发达社会主义”实为在社会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苏联，工业速度不断下降，农业生产长期停滞，财政恶化，商品奇缺，粮食不足，内债外债有增无减，日子一天天不好过。曾经号称“金元



帝国”的美国，财政赤字庞大，黄金储备下降，内外债台高筑。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架子虽没完全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它们摆着虚架子称霸，搞了那么多的军事基地，战线拉得很长，摊子铺得很大，不能不每年付出庞大的军费开支。它们的“裁军”进行曲唱了多年，但军费越“裁”越多，军火生产越“裁”越增加，核试验越“裁”越起劲，使整个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危机频繁发生。勃列日涅夫既想充当“裁减军费”的旗手，又要争夺扩军备战的冠军；既要冒充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恩人”，又不得不象乞丐那样低三下四地借债告贷。两个超级大国都是这样一些死要面子的浮肿病患者，硬是要摆出那个盛气凌人的“大架子”。为了摆脱困境，它们的逻辑也还是“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不过，这个“你们”，比贾珍说的范围要大得多，在国内，是指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在国外，则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广大人民。它们对内加紧剥削，对外加紧扩张掠夺，恨不得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内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以及广大中小国家的反抗和不满。若是想稍为“紧缩”一点什么呢，它们内部各个垄断集团的争吵就立刻加剧。它们正处于岩浆隆隆欲出的火山口上。今日超级大国的困境同昔日贾府的困境是多么相象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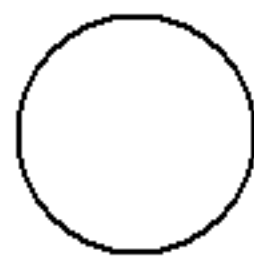
王熙凤说“大有大的难处”，还反映了贾府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在这里，围绕着谁掌财政大权，继承权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夫妻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嫡庶之间，内讧交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愈演愈烈。这些人，虽然是一家子“骨肉”，但“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红楼梦》集中写了贾府不同派系的夺权斗争。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的重大事件，就是邢夫人、王夫人派系矛盾的丑恶表演。荣国府掌实权的是二房的王夫人和她的内侄女王熙凤，长房的邢夫人决不甘心这种无权的地位。傻大姐在大观园拾到了一只“绣春囊”，这对贾府来说当然算得上一桩“伤风败俗”的大事。邢夫人抓住“绣春囊”，自以为捏住了刀把子，可以狠狠整一下王夫人、王熙凤。邢夫人一心只想搞臭王氏姑侄，为夺权制造舆论。当邢夫人派心腹王善保家的气势汹汹地打上门去的时候，王夫人先是“气死了个死”，继而是王熙凤推个一干二净，最终引起王夫人、凤姐对大观园的奴婢们来一次突然袭击。在抄检过程中，两派的主子喽罗都想抓住对方的弱点置于死



地，扩大自己的势力，吵得不可开交。探春与王善保家的大打出手，各有各的后台老板。探春从中看到了整个家族必然衰亡的命运，因而感慨了一番：“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这种“自杀自灭”的狗咬狗的争吵，说明贾府内部日益增长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蕴藏着行将爆发的总危机。

历史的发展总是这样：一个阶级愈是走向没落腐朽，内部的倾轧和争霸称雄也就愈是加剧地进行。今日的苏修、美帝不也是这样吗？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国内，围绕着高额利润的分配，政治权力的争夺，和施政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同派系的争吵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派得势了，另一派不高兴。另一派得势了，这派又不高兴，一点也不太平。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为了争夺世界霸权，更是争斗不休。苏修和美帝，谁都想整谁，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一个“欧洲问题”，一个“中东问题”，把这两只“乌眼鸡”的形象画活了。列宁说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尽管它们的部长们一再发表和平调整争执问题的声明，但是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问题上采取任何一个重大措施而不发生分歧都是做不到的。”苏修、美帝两个超级大国都曾一再指天发誓地发表“缓和”和“合作”的声明。但实际上，往往是“缓和”声明的声音尚在人们耳际缭绕，就各自调兵遣将争斗起来。它们嘴里讲要搞什么“均衡”，那里均衡得了呢？谁不想高过对方一着，压过对方一头。所以，它们的谈判，是越谈越僵，“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现在，连美国《华盛顿明星新闻报》也公开说，“美苏缓和的阶段正达到一个时期的结尾”。苏修起劲鼓吹的“缓和”假象已经象肥皂泡一样破碎了。不过它不是“自然”破碎的，而是在“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剧烈争夺中破碎的。

贾府所代表的反动没落阶级的崩溃是不可抗拒的。曹雪芹形象地展现了这一趋势，但他无法正确理解它，因而经常作出宿命论的解释。那是不对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



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毛主席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历史上处于反动地位的阶级的衰亡，有一个深刻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过程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进步战胜反动，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

但是，反动没落阶级的衰亡过程，往往又会表现出种种复杂的形态。《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有的是摆了几年虚架子，就塌下来，如史家；有的是一蹶不振地衰落到底，如薛家；有的是下降中又出现暂时的回升，盛极而衰，如贾家。认识这种复杂的衰亡形态，极为重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也有类似的情况。如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政治上成为“世界宪兵”，军事上成为“头等强国”，经济上是所谓“金元帝国”。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帝国主义交了红运，是资本主义的“返老还童”呢？不是。正当美帝国主义不可一世的时刻，毛主席就指出：“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果然，五十年代初期，美帝就从它的“顶峰”上跌落下来，今天，连它自己都哀叹大大不如从前了。苏联从五十年代中期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很快就作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做着建立横跨欧、亚、非、拉的殖民大帝国的迷梦。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积累的财富，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用作炫耀武力的资本。他们势头十足，神气活现，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但是，你既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就必然受着帝国主义规律的支配。果然，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剥削引起了苏联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发展，赫鲁晓夫垮台，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接踵而来。今日的社会帝国主义，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已经是内外交困，一天天烂下去了。

毛主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这是对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派的本质的最为深刻的概括。“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贾府是这样的纸老虎，苏修、美帝两个超级大国也是这样的纸老虎。

貌似强大的纸老虎，有时也能唬人。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剥开一切骗人的假象，把客观事物最本质的东西揭示出来，就能看清纸老虎的虚弱本质。它们越是吹嘘自己，越是表明内心的惶恐；它们把自己的脸打得越肿，越表明是虚假的



肥胖；它们越是“千里搭长棚”，就越能暴露不可胜数的弱点。有些人由于不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种种外强中干的假象所迷惑，因而看不见或者过低估计了人民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反动“庞然大物”的力量，盲目迷信所谓西方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这就有点象刘姥姥盲目崇拜当时的贾府一样。西方有什么？戳穿西洋镜，不过是个空架子。苏修多几枚导弹，多几吨钢铁，又有什么了不起！导弹不能当饭吃，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革命的人民。小国能够打败大国，穷国能够战胜富国，这不是为近代世界革命史一再证明的吗？在今天的世界上，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烈火越燃越旺，战斗团结日益加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反对超级大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正在蓬蓬勃勃地声势浩大地发展着，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早已走完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正处于它的“**第一个时代的封建主所处的‘地位’**”。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千疮百孔，腐朽不堪。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上，一切都动摇了，“超级大国”虽然“大”，但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简直没有任何好转的希望了。

贾府是一面镜子。贾府的“难处”，反映出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难处”，也可以用以照出苏修、美帝两个超级大国的“难处”。《红楼梦》中的探春小姐，在贾府管过一阵子事以后，讲过一段话：“我说：倒不如小户人家，虽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儿们欢天喜地，大家快乐。我们这样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利害！”今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各有一本难念的经，正处在危机四伏的狼狈境地，种种“说不出的烦难”，比昔日的贾府“更利害”！这两个超级大国都背着一个“大”包袱，越背越重，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已经滑到了崩溃的边缘。看纸老虎的现在，就可以知道纸老虎的未来。不管苏修、美帝如何挣扎，如何自吹自擂，毕竟是“昏惨惨，黄泉路近”，它们灭亡的命运是决计改变不了的。

“大有大的难处”，装腔作势的王熙凤对这一点是说对了。二百多年前的曹雪芹当然想不到，我们无产阶级还可以借用他“十年辛苦不寻常”铸成的《红楼梦》这面镜子，照出一切反动没落阶级虚弱的本质和覆灭的命运。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感谢曹雪芹。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阅读和研究这部政治历史小说，才能从中吸取有益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

初 澜

当前关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正在展开。这场讨论，反映了音乐战线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我们相信，通过辩论，必将对今后社会主义音乐创作与音乐理论的健康发展产生有益的影响。

一九六三年，音乐战线曾展开过关于德彪西问题的讨论，对某些吹捧西方印象派音乐理论与作品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那次批判，对于当时泛滥于音乐界的崇洋复古思想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它与当前这场关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应该以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待西方资产阶级音乐这个问题展开的。当前这场讨论，更集中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音乐理论的核心——人性论；批判的作品不仅触及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印象派、现代派音乐，而且触及到资产阶级的古典音乐。

所谓古典音乐和印象派、现代派音乐，其实是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这两个历史阶段，资产阶级的政治面貌、思想感情在音乐上的反映。二者在历史作用和艺术形式上是有所区别的（前者若干作品不同程度地有反封建的历史作用，后者完全没有；前者在艺术形式上对我们来说，尚有某些可供借鉴之处，后者则一无可取），但它们在创作思想和创作理论上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贯串着资产阶级人性论。这种人性论后来又被修正主义承袭下来，继续扩散其反动影响。当前出现的那种宣扬资产阶级音乐作品无社会内容的论调，它的实质就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这次讨论中涉及到的一些资产阶级音乐作品，有的是有标题的，有的是无标题的，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把音乐作品分为“标题音乐”与“无标题音乐”，单纯从标题上去划分音乐有无社会内容，这本身就是一种抹煞阶级内容的手法。我们只有



具体地分析资产阶级音乐作品的阶级内容，抓住修正主义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这一实质，彻底揭露其欺骗性和危害性，才能把这场讨论和批判进一步地引向深入。

毛主席在批判人性论时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重温这段话，对于我们揭露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本质，对于我们认识音乐的阶级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抽象的人性论，从来就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武器。特别是行将灭亡的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更是死抱住人性论不放，把它作为挽救本阶级的灭亡，疯狂进行复辟活动的舆论工具。一心妄想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的孔老二，可算得上鼓吹人性论的祖师爷了。他和他的门徒极力鼓吹什么“仁”与“和为贵”之类的说教，叫嚷“人要是离开了仁，怎么能推行乐教呢？”（“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强调“音乐的作用可以唤起人们和谐的感情”（“乐以发和”，引自《史记·滑稽列传》），“音乐的根本任务是搞调和”（“和，乐之本也”《吕氏春秋·察传》）。孔丘所谓的“仁”与“和”，就是抹煞矛盾，否认斗争，反对革命，坚持开历史的倒车。他在政治上主张复辟奴隶制，在文艺上必然要搞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他大肆吹捧奴隶主阶级的“君子之乐”，拼命打击适应社会变革的民间音乐，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体现儒家观点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更是起劲地宣扬：音乐的作用就是为了调和人与人的关系，使人们互相亲近，没有怨恨（“乐者为同”，“同则相亲”，“乐至而无怨”《乐记·乐论》）。又说什么有了“礼”，就能划分贵贱等级；而音乐统一了，就能使上下、贵贱不同等级的人们互相关系和睦（“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记·乐论》）。这就是要通过传播反映奴隶主阶级思想感情的“君子之乐”，掩盖剥削，掩盖阶级矛盾，腐蚀劳动人民的斗志，使他们驯服地接受剥削和压迫。历史的阶级斗争经验告诉我们：一切反动阶级为了巩固本阶级的政权，必定要鼓吹人性论，以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

苏修叛徒集团在复辟资本主义、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也极力鼓吹人性论。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搜罗了一切人性论的破烂，不遗余力地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音乐，吹嘘它们充满了所谓“人民性”和“人类的共同感情”；胡说资产



阶级古典音乐“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或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感染力上,都是没有界限的”,“始终能够使政治见解各不相同的人们都得到艺术欣赏的快感”,着力掩盖作品所反映的阶级内容,把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全民的”、“全人类”的人性。苏修叛徒集团在宣扬人性论方面所花费的气力,比历史上地主资产阶级以及老修正主义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目的就是为了麻痹和腐蚀苏联人民的革命意志,加强其法西斯专政。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周扬一伙大肆贩卖封、资、修文艺和人性论的黑货,同样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目的。在这条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下,出现的许多掩盖资产阶级音乐阶级内容的人性论观点,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否认音乐作品的社会内容。例如,宣扬德彪西的标题音乐作品“传达出一种新的对自然世界的充满诗意的感受”,“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

二、用抽象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来掩盖感情的阶级性。例如,鼓吹资产阶级音乐表现了所谓“人的崇高的感情”、“真挚的感情”等等。

三、宣扬音乐具有超时代、超阶级的社会作用。例如,鼓吹要“让人民都能享受”西方资产阶级音乐中“健康而明朗的作品”,甚至胡说什么古典音乐能“鼓舞着我们今天更奋勇地为和平、为进步、为全人类更光辉的未来而斗争”。

只要我们作一简单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前出现的宣扬古典音乐“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只有抽象的“情绪的变换和对比”和“健康、明朗”等等修正主义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地主资产阶级、新老修正主义早已唱滥了的老调子。只是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新的形势下,这些老调子适应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需要,又重新冒了出来。

资产阶级音乐作品“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吗?抹煞了音乐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音乐岂非就成了赤裸裸的“纯粹的音响形式”?资产阶级所标榜的什么“纯音乐”,什么唯美主义等等,都是骗人的鬼话。它既否认了音乐内容的阶级性,同时又否认了审美的阶级性。毛主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在阶级社会里,总是离不开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与阶级斗争。音乐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也必然包含具体的阶级内容,不可能有超阶级的“社会内容”。例如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古典作曲家巴哈、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作品,不同



程度地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内容，反映了与封建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与政治要求，适应了以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封建阶级专政的历史发展趋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的。恩格斯在《关于德国的札记》中曾指出：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是德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仰仗外人鼻息的时期”，也“是以贝多芬为代表的音乐的繁荣昌盛的时期”。贝多芬在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鲜明地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理想，成为德国古典作曲家中最突出的代表。但是，正因为贝多芬等古典作曲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反映社会内容的，他们不可能不带有本阶级的偏见。他们的作品中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也具有欺骗性的一面。就拿西方古典音乐的代表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来说，在该曲末乐章的合唱部分，高唱“一切人类成兄弟”，“拥抱起来，亿万人民，大家相亲又相爱”，就是在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贝多芬所处的十九世纪初的历史环境下，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反对封建割据造成的国家分裂的革命要求。但是，作品中鼓吹的超阶级的“人类之爱”，在阶级社会里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正是在这种虚假的“人类之爱”的旗帜掩护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着极其残酷的剥削。我们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资产阶级古典音乐作品，才能真正看清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的阶级实质，以及它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作用与消极作用。而抛开阶级分析，否认古典音乐作品有“社会内容”，把它看作是超时代、超阶级的空空洞洞的东西，实际上是为掩盖其阶级内容制造了一块遮羞布。

在这块遮羞布的后面玩弄的把戏是这样的：既然具体的“社会内容”没有了，那就只能把资产阶级音乐说成是“仅仅表现某种情绪的变换和对比”。这里所谓的“某种情绪”，是指哪个时代、哪个阶级的情绪呢？没有明确的答案。看来，这是在故意回避问题的实质。列宁在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指出：“决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因为“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进一步，退两步》）回避明确地提出问题，目的是为了掩盖阶级内容。而这种修正主义论调宣扬的没有阶级内容的“某种情绪”，其实正是资产阶级“人性”的代名词。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人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任何音乐作品都不是超阶级的个人情绪的表现，总是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资产阶级的音乐作品，不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派的，是有标题的还是无标题的，其中所表现的“情绪的变换和对比”，不管怎样隐晦曲折，总是反映着本阶级的政治要求，从属于本阶级的政治路线的。例如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是一部宣扬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作品。这部乐曲的第一乐章的主调，根据贝多芬自己的解释，是描写“命运的敲门声”。整个乐章通过主调和副题两种音调的对比和变化，表现所谓“人与命运的搏斗”，实际上反映了十八世纪末期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要求冲破封建束缚的政治愿望。这里的“情绪的变换和对比”就是有鲜明的政治内容的。如果说，从上述一个作品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它的阶级倾向，那么，从不同阶级的作品的对比中，更可以看出阶级本质的差异。这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年代尤其如此。例如在十九世纪末期，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在巴黎公社的革命风暴猛烈冲击下摇摇欲坠。势不可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洪流，反映在狄盖特于一八八八年作曲的《国际歌》中，是一种充满战斗豪情、气势磅礴的音乐形象。它充分展示了无产阶级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彻底革命精神。而在同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许多音乐作品中，却是充满了“世纪末”的极端颓废、绝望的情绪。这种音乐形象，如同“一架发了疯的钢琴”，完全是一个面临灭亡命运的没落阶级丑恶灵魂的自我写照。《国际歌》与德彪西作品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前者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兴起，后者标志着资产阶级音乐已经走向没落、腐朽。而这，又正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的帝国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音乐领域中的必然反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音乐领域中的两军对阵，正是反映了这两个对立阶级在政治领域中的激烈斗争。如果用那种抽象的“情绪的变换和对比”的观点来代替具体的阶级分析，就必然会将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音乐作品混为一谈，这样，既掩盖了音乐领域的阶级斗争，同时也就否认了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它的历史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施里加的唯心主义观点时，曾经指出：“他的本领不是要揭露被掩盖的东西，而是要掩盖已经被揭露的东西。”（《神圣家族》）这句话，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一个分歧点。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要揭露被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掩盖的



东西；而他们贩卖人性论，恰恰是在“掩盖已经被揭露的东西”。修正主义的这种“本领”，我们不是已经领教够多了吗？

人性论掩盖资产阶级作品的阶级内容，目的是为了保护它，美化它，使它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阶级都可以接受的东西。在我们眼前的人性论观点就是这样：先是一笔抹煞了资产阶级古典音乐的阶级性，紧接着就公开吹捧这些作品是“健康、明朗”的。原来前面说的那句“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就是为了引出和烘托出这个“健康、明朗”的主调！但这种调子也是老掉牙了，它不过是刘少奇、林彪一伙鼓吹的“有益无害”论、“咖啡文艺”的翻版。既然资产阶级古典音乐对无产阶级来说，内容是“健康”的，形象是“明朗”的，那还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进行分析、批判么？不必了，“全盘继承”就是了。还要搞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么？也不必了，只要把那些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音乐作品统统拿到我们舞台上来演奏就行了。推而广之，一切封、资、修的文艺作品都可以通过“健康、明朗”的人类共同的“某种情绪”打开缺口，卷土重来，重新向无产阶级争夺文艺阵地！对于广大工农兵群众来说，哪里是什么“享受”？这是腐蚀和毒害！

在音乐领域里，要不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是关系到这一领域前进还是倒退，是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回到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下的老路上去的问题。当前，音乐领域中出现的一种崇洋复古的倾向，其实质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开倒车，恢复过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下一套。这种崇洋复古倾向的思想根源就是人性论。

音乐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毫不奇怪的，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存在着人性论的流毒，就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崇洋复古的倾向。人性论抹煞阶级界限，使人们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丧失革命警惕，其结果必然导致对资产阶级的投降。所谓崇洋复古，正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革命原则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音乐界的某些人，对外国资产阶级音乐作品盲目崇拜，赞叹不已，甚至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失去警惕。他们总觉得西方古典音乐就是“高”。只要一说到“要提高创作、演奏水平”，就拜倒在西方古典音乐的脚下，而对我们革命的、民族的优秀作品，对我们的革命样板作品，则对不起，全忘了，把文艺革命的方向和任务忘得一干二净。这表面上看来是个崇拜西洋音乐技巧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主



要原因就在于受人性论的影响太深，思想上分不清资产阶级文艺与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界限。音乐领域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音乐阵地，要改造音乐队伍，要克服崇洋复古倾向，就必须坚持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

我们批判崇洋思想，并不是说以后“洋”的全不要了。现在有些人看到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坚持用阶级观点分析西方古典音乐，就说我们是“排外”。这种别有用心地攻击，恰好暴露了自己骨子里的“媚外”。另外，有些同志则把批判和借鉴对立起来，以为要批判就不能借鉴，要借鉴就不能批判。这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无产阶级对西方古典音乐，从来不是一概肯定，也不是一概排斥，而是根据“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一贯方针，批判其资产阶级的思想内容，改造和利用其某些可取的艺术形式。这是一件十分细致的工作，也是一场十分复杂的斗争。因为在具体的作品中，形式总是为其内容服务的，内容与形式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我们对某些古典音乐的艺术形式进行改造的同时，它所表现的资产阶级思想内容又可能会对我们产生潜移默化的腐蚀作用。这里存在着一个谁改造谁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阶级观点分析古典音乐作品，首先从思想内容上划清阶级界限，同时在艺术形式上对我们有用的和无用的不同成分进行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这才可能谈得上有益的借鉴。如果我们的同志听信了人性论抹煞阶级界限的一套鬼话，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在资产阶级文艺面前丧失了鉴别和批判的能力，那就只能被它改造过去，成为它的俘虏，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借鉴呢？因此，要贯彻执行党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正确方针，也同样必须批判人性论。无产阶级已培植成功的十几个革命样板作品，正是由于从理论到实践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坚持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正确方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是我们文艺战线（包括音乐战线在内）的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决不可因为文艺战线的大好形势而放松了这项重要的批判任务。今后，随着阶级斗争的时起时伏，资产阶级人性论还会变换各种形式向无产阶级进攻。对此，我们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随时给予坚决的回击。让我们在当前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更进一步地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重视革命的历史文物

卫 今

毛主席教导我们：“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主席这一教导，是我们搞好文物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我们不仅要重视古代的历史文物，还必须重视近代和现代的革命历史文物。

革命文物，是革命历史的见证。特别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所遗留下来的革命文物，具体地、生动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有着十分强烈的革命感染力。看到它，使人仿佛重新置身于那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或是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黑暗岁月，仿佛重新见到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前仆后继、顽强奋战的英勇事迹。看到它，使人能够进一步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如何冲破重重阻碍和困难，战胜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取得革命胜利的。毛主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民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革命文物，正是形象地体现了这种革命精神。保护它，运用它，帮助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牢记无产阶级政权是怎样得来的，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群众对革命文物一直是十分重视的。解放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就颁布了征集革命文物的重要法令，许多老根据地的革命群众，纷纷把自己过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珍贵革命文物献给国家。韶山、一大会址、井冈山、古田、遵义、延安等重要的革命纪念地，都经国家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革命文物



的调查、征集、管理、宣传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许多地方对重大的革命历史运动和重要的革命纪念地进行了群众性的调查、访问，系统地搜集有关的资料，发现了不少重要的革命文物，并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有些地方举办了小型、多样的革命文物展览，组织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参观学习。还有些地方把重要会议移到附近的革命纪念地举行，学习革命传统，激发革命斗志。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都深深体会到：革命文物是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是发扬革命传统精神、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武器。

正是由于革命文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有着重大的作用，它从来是两个阶级激烈争夺的阵地，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战场。隐藏在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野心家，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都别有用心地把黑手插到这个领域里来，颠倒是非，伪造历史，大造谣言，大搞翻案，为自己树碑立传，妄图用来作为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具。刘少奇这个出卖工人运动的叛徒、内奸、工贼，竟然篡改安源工人运动的历史，厚颜无耻地把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安源工人运动的功绩记到他的账上，把自己打扮成所谓白区工人运动的“领袖”。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同伙在这个阵地上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更加疯狂。这个政治骗子，本来是一个既怕苦又怕死、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动摇分子，却要把自己吹嘘成井冈山道路的“开辟者”。他们伪造了大量材料，把毛主席亲自部署和指挥的一些重要战役篡改成林彪指挥的。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林彪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子野心。这些事实从反面教育我们：必须把革命文物这个阵地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为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要重视革命文物工作，关键在于提高我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对革命文物重视不重视，在我们的同志中间表现为两种精神状态。一种是积极的、认真负责的。在这些同志看来，要做好革命文物工作，必须坚持以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指导思想，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学习革命史，努力提高辨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严格按照革命历史的本来面目办事，既要谨慎、勤于商量请示，又要敢于负责、不怕担风险。而另一种则是畏畏缩缩、怕犯错误。这些同志从消极方面去看



待革命文物阵地上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产生了种种畏难情绪。这除了由于“路线斗争不可知论”的错误思想在作怪之外，主要还是因为把个人的得失看得高于一切。于是，在工作中既不认真学习，也不搞调查研究，而是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把依靠领导变成一种消极的依赖和等待，甚至还错误地以为“搞革命文物不如搞历史文物保险”。殊不知，因为怕犯错误而怕搞革命文物，恰恰会导致更大的错误。轻视或放弃革命文物这个阵地，实际上就是轻视或放弃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在有的领导部门中，那种极其重视古代文物而完全不重视近代和现代革命文物的观点，是厚古薄今的一种表现。面对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呼声，应该是增强我们的革命责任感，而不是听而不闻、无动于衷。只要我们把党的利益、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我们一定能够使革命文物工作做得更好，更出色，更引人入胜。

在革命文物中，还应该充分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遗留下来的丰富文物。有的同志对和重大历史事件直接有关的革命文物比较重视，而对群众性的革命文物却往往容易忽视。这是把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割裂开来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离开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斗争，就谈不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群众性的革命文物，正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重大的革命历史运动，生动地体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威力。例如冀中平原的地道战遗迹，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筑成的地下长城，它不仅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革命人民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并且铭刻着他们善于斗争的丰富经验，对当前进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轻视群众性的革命文物，实际上就是轻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群众性的革命文物，具有它的地方特点，便于群众学习本乡本地的革命斗争历史，就近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好教材。我们必须把群众性的革命文物当作宝贵的革命财富，加强保护、管理和宣传，充分发挥它的教育作用。

要保护好革命的历史文物，应该注意保持它的原貌。对于重要的革命纪念地，还要注意保持附近环境的原貌，不要另搞富丽堂皇的新建筑、新摆设。革命



文物本身就是最富有教育意义的。它周围的环境，应该体现出当时进行革命斗争的实际面貌。只有保持它和附近环境的简朴的原貌，才能使青年人了解我们的革命前辈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干革命的，才能使青年人了解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搞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和摆设，把革命纪念地和附近环境的面貌改变得面目全非，就不是真正的保护，而是喧宾夺主，它的效果恰恰是背离原有的革命传统精神。

加强对革命文物工作的领导，要实行党委领导、专业工作者和群众的“三结合”。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抓路线，使革命文物工作能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全局出发，有计划、有重点地把这项工作抓起来。有关文化部门要依靠群众，采取切实的措施，积极征集革命文物，作好详细的原始记录；对革命文献和实物，要进行细致的鉴别、整理和研究；认真搞好革命文物的陈列展览。特别要努力创造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运用革命文物对年青一代进行教育，让他们懂得应该怎样保卫和建设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江山，当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千秋万代永不变修！

在强调重视革命文物的同时，历史文物的工作也要继续革命。历史文物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物。这是一笔珍贵的遗产，是证明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实物资料。我们应该根据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有重点、有区别地做好历史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要打破地主阶级金石学和资产阶级考古学的框框，反对繁琐考证和单纯挖宝思想。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历史文物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清除孔孟之道的流毒，丰富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的认识，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服务。

当前，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我们一定要适应革命形势对文物工作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在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在反修防修的路线教育中，文物工作是应该而且可以积极主动地做出更多贡献的。让我们在党的十大精神的指引下，发扬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在文物阵地上作出新的贡献。



在斗争中努力学习

要团结大多数

——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点体会

谢 祚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指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重要性，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当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结合斗争实际，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这部光辉著作，注意分清敌我，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定不移地团结大多数，这是保证运动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我们要“**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就必须深入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不断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就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但是，阶级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在继续进行着。现在，正在全国蓬勃发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



一场关系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正以敢于反潮流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揭露和批判他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兴天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革命罪行，并对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给以有力回击。在日益深入发展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必须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团结大多数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条基本原则，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对于政治形势的科学分析和阶级力量的正确估量基础之上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反杜林论》）

在阶级社会里，不论什么时候，反动没落的阶级总是少数，革命的人民总是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总是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相一致的。广大群众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认识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极少数”，这不是主观的愿望，而是客观实际，是对敌我力量对比的最正确的估计，是一条简明而深刻的真理。我国革命斗争实践证明：坚持团结大多数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能超越任何障碍，战胜任何困难，取得革命的胜利。反之，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去团结大多数，把圈子紧缩得小小的，搞孤家寡人政策，就必然使革命遭受挫折。

毛主席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这就是毛主席给我们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划分人民和人民的敌人的界限。按照这个界限，属于人民这个范围的同样是大多数。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贫下中农是最可靠的同盟军。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即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妄图复辟倒退的，只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只不过是一小撮。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才能够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又一次地给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使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象现在这样伟大的胜利。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人们的政治态度作出基本的估计，“**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是会得到绝大多数人拥护的。不论什么时候，如果有谁认为不需要和不可能团结大多数，那只能说明他的思想和行动与党和群众的要求有相当的距离，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在要不要团结大多数以及如何团结大多数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总是教导我们要注意团结大多数。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文献，明确指出：“**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正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日益加强，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而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这些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反对团结大多数的。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这种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在根本上同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站在对立的地位，他们只能收罗一小撮牛鬼蛇神，拼凑反革命小集团，妄图分裂革命队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林彪这两个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曾经作了十分充分的表演。他们实行“打击一大片”的反动政策，疯狂地镇压群众运动。他们在人民群众中，挑拨离间，制造纠纷，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搅乱阶级阵线。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破坏革命的群众运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当然，他们的阴谋没有也不可能得逞，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但是，却从反面给我们很深刻的教育，使我们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认识到团结大多数的重要性。我们要认真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很重要的。

毛主席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



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而且阶级敌人往往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兴风作浪。因此，我们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首先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当前就是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把斗争锋芒指向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阴谋复辟的罪行，同时反击那种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在革命人民内部，尽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矛盾，有时甚至表现得很尖锐，但是批林批孔，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却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根本利益。通过批林批孔，开展对敌斗争，使大家提高路线觉悟，才能从大局出发，团结起来，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目标而奋斗。如果不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只顾纠缠于某些问题，忘记了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怎么能做到团结大多数呢？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重要时刻，毛主席曾经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大联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之一。在革命群众内部，分裂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组织，除了别的原因以外，往往是同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分不开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也保存他们自己，玩弄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挑动群众斗群众，企图分裂革命队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夏季视察了大江南北，发出了“**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伟大号召，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逐步分清了我敌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端正了革命的大方向。两派一经联合起来，阶级敌人的狐狸尾巴就再也隐藏不住了，他们就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为了取得批林批孔斗争的胜利，我们一定要深刻记取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个重要经验，坚持革命群众的团结，决不能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对于个别妄图挑动群众斗群众，在群众中制造分裂的坏人，必须予以揭露和打击。属于人民内部的一些问题，要在批林批孔的战斗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坚持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要坚定不移地按照毛主席倡导的“**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办事。对敌人是讲力量，对人民是讲道理。对那些有争论的重大原则问题，要通过认真看书学习，进行反复讨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这样才能使矛盾得到正确解决。“**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相信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可以说服的。即使一时统一不了思想，也要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而不能不搞批林批孔，转而把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志。持有不同意见的双方，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去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对那些犯了错误甚至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促使他们吸取教训，改正错误，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这样，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其中包括那些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人，就可以团结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批林批孔大军，给一小撮阶级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在日益深入发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各级领导干部要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吸取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特别要注意正确对待和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自己的人。决不能对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就亲近，对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就疏远，因为那样会使自己与群众对立起来，同时也会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对于来自群众的意见，要热诚欢迎。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批评的。只能批评人家，人家批评他一句都不行，这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应该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群众，是有高度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的，是能够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各级领导真正能够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群众也就能够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神圣家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一定能够更好地团结起来，不断地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学会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

洪 原

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概括了革命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指导工作，推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这是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尤其是领导同志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现象都无一例外。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真理同谬误，新生事物同腐朽事物，前进同倒退，革命同复辟等等，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前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斗争，是批林整风运动的继续和深入，是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搞好这场斗争，必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促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壮大，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处理斗争中提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理解这场革命斗争的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斗争的胜利。

尊孔与反孔，是对立的统一。有尊孔，必有反孔，从古到今，历来如此。孔孟之道谬论种种，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倒退，要复辟，因而，它就适应了一切行



将灭亡的反动派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政治需要。腐朽的反动阶级要复辟、要倒退，就要鼓吹孔孟之道；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和新兴的革命阶级为了反复辟、反倒退，就必然要进行反孔斗争。两千多年来，每当进入社会制度新旧交替的大变动时期，尊孔与反孔的斗争总是变得异常尖锐。这种斗争，尽管因时代不同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但是，从实质上说，都是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反映。孔老二死掉两千多年了，怎么今天还要拿来批？就是因为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尊孔与反孔的斗争还没有完结。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因为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一致，都要复辟旧制度，开历史倒车，他就必然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如果说“五四”时期革命人民打倒孔家店的思想文化革命，是为了击败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复古倒退的逆流，促进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进，那么，我们今天的批林批孔斗争，则是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出发，粉碎林彪所代表的一切反动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对孔老二，对修正主义，对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过去批，现在批，将来还要批。这个斗争，还要长期地进行下去，不到阶级消灭之日是不会止息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的社会。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有政党就有党内路线斗争。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构成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内容。希望没有矛盾没有斗争，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违背对立统一规律的形而上学观点。没有矛盾，没有斗争，就没有世界，没有人类社会。有矛盾，有斗争，这是正常的现象，没有什么奇怪的。以为经过一次或几次大的斗争之后就不会再有激烈的斗争了，对资本主义的复辟丧失警惕，对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不敢顶，不敢斗，迁就姑息，这是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相违背的。这种情况才真正是不正常的。“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



是不会消灭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是这样，贯穿社会主义社会的始终。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我们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进行了深刻的革命，给国内外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是坚持继续革命还是倒退、复辟？在这些根本问题上，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从林彪反党集团到他们的“核保护伞”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从垂死挣扎的地、富、反、坏、右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到被赶到台湾省的蒋介石集团，无不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濒于死亡的反革命阶级决不会甘心失败，随时都要把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妄想恢复失去的“天堂”。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在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卫生革命、“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问题上存在的斗争，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把旧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搬了出来，或者在新形式下恢复旧的东西，这些都是现实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表现。掌握了对立统一这个根本规律，并且运用它去观察各种社会现象，就会懂得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就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取得斗争胜利的形势下，又热情地去迎接新的斗争。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就矛盾斗争的性质而言，只有对抗与非对抗之分，没有可调和与不可调和之别。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来解决，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不过是由于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罢了。承认不承认矛盾斗争的不可调和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同孔孟“中庸之道”的一个根本分歧。孔孟鼓吹“执其两端，用其中”、“和为贵”、“无所争”；林彪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破坏统一”。这些谬论，从哲学上说，就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用折中主义代替辩证法”。这也就是否认对立面的斗争，反对矛盾转化，反对革命变革，反对社会的前进运动，力图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表现在政治上，必然是一条调和阶级矛盾、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



林彪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历次革命群众运动是“极左”、“过分”、“乱了套”，只有“克己复礼”才合乎“中庸”。可见，“中庸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中庸之道”是骗人之道。那些满口“中庸”的反动派，对革命人民从来是不“中庸”的。他们要革命人民放弃斗争，正是为了掩护他们向革命人民作斗争。林彪兜售“中庸之道”，要我们“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破坏统一”，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麻痹革命人民，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我们放弃反修斗争，妄图把我们的党和国家“统一”到修正主义路线上去，“统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是典型的叛徒哲学，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根本对立的。

坚持斗争哲学，还是搞“中庸之道”，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则问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或者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或者是背离党的基本路线，放弃斗争，让修正主义上台，退到资本主义。二者必居其一，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党的基本路线，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上，肯定了无产阶级终将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又尖锐地指出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从对立统一规律上来理解，这是由于在矛盾发展的一个个具体过程，新旧双方的力量对比总是在斗争中彼此消长，它们的支配与被支配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矛盾转化也就始终存在着继续前进和暂时倒退这两种可能性。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要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支配地位，把历史推向前进；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却总是力图改变自己的被支配地位，把历史拉向倒退。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究竟哪一种可能性会变成现实，决定的条件就看我们能不能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始终不渝地从各条战线上进行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历史经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无产



阶级的政权是怎样垮掉的，列宁缔造的党是怎样变修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怎样变成现实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实行“和平演变”的结果。建国以来我们党内出现的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头子，都是搞修正主义、搞倒退、搞复辟的。我们的党和国家之所以没有退，没有垮，没有修，反而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巩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坚持了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在当前这场批林批孔的严重斗争面前，是冲锋陷阵，努力作战，还是消极观望，调和折中，这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严峻考验。我们应当从社会主义时期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场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勇往直前。

坚持斗争哲学，就要破字当头。革命辩证法不承认有任何“永恒的统一”。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旧的矛盾统一体不断地被新的矛盾统一体所代替，这是宇宙间不可抵抗的法则。“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粉碎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思潮，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同旧事物的顽抗进行坚韧的斗争，新生事物就无法赢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取得支配地位。“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要担心斗争会破坏关系，破坏团结，破坏统一，不要作“好好先生”。在事关路线的问题上，离开斗争，去谈“谅解”，或者把斗争和“谅解”平列起来，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宣扬“中庸之道”，磨灭革命辩证法的斗争锋芒。只有坚决地同修正主义作斗争，弄清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我们才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进一步统一起来。只有同革命队伍中的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我们才能不断增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革命团结。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无产阶级的同志关系，正是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积极地正确地去进行斗争，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更加坚强，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更加兴旺，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加朝气蓬勃。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马列主义的领导者要敢于正视矛盾，敢于



放手发动群众，抓住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运用“四大”武器，彻底揭露矛盾。矛盾是客观存在，揭，它也存在，不揭，它也存在。回避是回避不了的，掩盖是掩盖不住的。不把矛盾揭出来，它迟早总要激化。只有主动揭露矛盾，才能及时加以解决。自己有错误，要勇于自我批评，坚决改过来。我们的领导者要跟革命群众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不要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更不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我们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全面地看问题，防止片面性。要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彻底揭露、深入批判林彪和他的死党所推行的孔孟之道，批判他们妄图“克己复礼”，“兴天国，继绝世，举逸民”，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要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反击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倒退、复辟的修正主义思潮，解决现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揭露出来了，要进行具体分析，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为了更好地开展斗争，要加强调查研究，努力抓好典型。抓典型，就是把客观存在的对立面主动设置起来，积极开展对立面的斗争。既要抓好的典型，充分发挥样板的作用，又要抓坏的和由坏变好的典型，让人们通过正反两个方面进行比较，揭露矛盾，促进转化。**“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要特别注意发现和支持反潮流的典型，并且敢于把它们树立起来。不要怕议论纷纷，鸦雀无声并不是好现象。一个新事物出来，引起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议论，正好可以因势利导，让群众去比较鉴别，**通过辩论**发展正确意见，克服错误意见，把大多数人的认识统一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批林批孔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必将不断破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定会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掌握，成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在斗争中掌握斗争哲学，把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发扬知难而进的精神

湖北应城县炮竹大队评论组

当前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斗争，势若燎原之火，遍及城乡。广大工农兵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批判“克己复礼”，反击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思潮，正在发挥出革命主力军的伟大作用。

批林批孔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思想革命，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继续。既然是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会遇到阻力，碰到困难。“孔老二讲的是‘之乎也者’的古话，林彪说的是‘不阴不阳’的黑话”，要批判这些东西，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一些同志来说就有一定的困难。困难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对斗争中的困难采取什么态度，是无所畏惧，知难而进，还是望而生畏，见难而退。

毛主席教导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被历代反动派捧为“圣人”的孔老二，就是纸老虎。他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迂夫子。孔孟之道，是代表和维护剥削制度的糟粕，它同社会发展规律背道而驰，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水火不相容，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是腐朽的、没落的。林彪自称“天马”，实际上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同样是只纸老虎。我们工农兵群众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有鲜明的革命立场，有丰富的实践斗争的经验。只要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不怕困难，迎接困难，就一定能战胜困难，就一定能够透过“之乎也者”的古话，识破他们的狼子野心，透过“不阴不阳”的黑



话，揭露他们的反动立场，把他们批倒批臭。

把批判孔孟之道看成神乎其神的事，不充分发挥广大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不相信广大工农兵的智慧 and 战斗威力，这本身就是中了孔孟之道的毒，正是孔孟和林彪鼓吹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观点在某些人头脑中的反映。我们大队有个老贫农，由于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识字不多。但是，他没有被这个困难所吓倒。他积极投入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不会就学，不懂就问，边学边批，联系实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事实，痛斥林彪和孔老二，打中他们的要害。这位老贫农说得好：“不怕不熟悉敌人，就怕不钻研敌人；不怕文化低，就怕不学习；知难而进，定能取胜。”这件事又一次说明：广大的工农兵虽然文化水平不一定很高，但是，懂得孔孟之道是剥削之道，是压迫之道，是复辟之道，是反革命之道，懂得批林批孔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反修防修的大事，因而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主力军上阵，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没有闯不过的难关。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难”和“易”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在一定条件下，“难”可以转化为“易”，“易”也可以转化为“难”。这里重要的问题是看有没有知难而进的精神。知难而进，遇难而攻，难就可以转化为易；望难生畏，遇难而退，见难而避，不仅不能征服困难，本来容易办到的事也会转化为难。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面前，哪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哪有攻不破的难关！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某些方面知识不够，有的东西一时读不懂，弄不通，这没有什么要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努力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我们就能掌握战胜一切狡猾敌人、击退修正主义思潮的思想武器；只要认真用一番心思去钻研反面材料，我们就能看清林彪、孔老二这些反面教员的反动面目，反动立场，反动本质。水滴石穿，肯学肯钻，难一定能转化为易。在困难面前，你示弱，它就会成为障碍，你同它斗，它就会低头。让我们发扬知难而进的斗争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批林批孔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天津冷轧带钢厂党总支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战斗号令鼓舞下，我们厂迅速掀起了批林批孔高潮。批林批孔的不断深入，进一步调动了全厂革命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革命和生产都呈现一派大好形势。批林批孔的烈火越烧越旺，生产一浪高过一浪。今年一月份超额百分之六十完成了国家计划，二月份带钢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五十点七，到三月十日，提前二十一天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国家计划。增产幅度之大，为我厂前所未有。事实雄辩地证明：批林批孔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批林批孔中，我们发动全厂的工人群众和干部，集中火力，批判了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组织二十多名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忆苦思甜，引导大家忆厂史，忆家史，忆个人成长史，很快掀起了大批判的高潮。全厂上下，群情激愤，同仇敌忾。通过革命大批判，职工们进一步认清了林彪的反革命面目，认清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工人们愤怒地说：林彪要“克己复礼”，就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复礼”就是复辟，就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让地、富、反、坏、右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上台，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把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重新打入地狱。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要是得逞，就没有我们的活路！工人们极大的义愤，变成了强大的力量。他们一致表示：要做批林批孔的主力军，也要做为革命夺高产的闯将，要用多轧钢、轧好钢的实际行动，彻底粉碎林彪及其死党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许多老工人白天



参加学习班，批判“克己复礼”，晚上继续坚持生产。青年工人组成突击队，利用业余时间给兄弟班组运送带钢坯料，支援他们夺高产的战斗。工人们豪迈地说：要一斤一两夺钢材，一分一秒抢时间。为了保卫红色江山，不怕出大力、流大汗，再苦再累心也甜。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厂的工人群众和干部深入地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生产蒸蒸日上。一九七三年的带钢产量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了四倍半。但是，由于受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的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又冒了出来，妨碍着生产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紧密联系我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群众和干部的路线觉悟，那些重新冒出来的错误的东西正在逐步纠正，这样就更加充分地发挥了工人群众和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革命和生产更加迅猛地向前发展。

在社会主义企业里，靠什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是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靠“物质刺激”，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对“物质刺激”进行过深刻的批判，但那一套东西仍会重新出现。有一段时间内全厂发放奖金、奖品的名目逐渐增多。有的车间用“记分”的方法考核**班组**的成绩，并把总分的多少当作评比发奖的重要依据。这样做的结果，助长了本位主义和生产第一的思想，也带来了忽视质量的现象。有的人为了追求产量，专挑好料用，把次料留给别的班组，因而影响了工人内部的团结。每发一次奖，总是留下一堆问题。这次批林批孔，使我们提高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靠发奖金、奖品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不正是孔老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流毒吗？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竭力鼓吹“物质刺激”，就是想要腐蚀工人阶级，妄图用钱来迷住工人们的眼睛，把人们引上修正主义的邪路。事实上，评奖的条条框框束缚了工人们的手脚，压抑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工人们这种做法是反对的，他们说：“分，分，分，把我们社会主义积极性都‘分’没了。”林彪胡说什么工人“想的是怎样搞钱”，这纯粹是对工人阶级的诬蔑。大家提高了认识，纠正了某些错误做法，通过谈心、家访等活动，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工人群众进一步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团结协作的风格。过去烤蓝工序有的班组有时挑好用的长头料，现在各班组都主动把长头料



让给别人，把短头料留给自己。有些工人还利用业余时间，把短头料预先接成长头料。烤蓝车间的镀锡工人主动帮助酸洗工人，酸洗工人又去帮助镀锡工人搞平整，他们干完了自己的工作，又组织力量到烤蓝工序去顶班生产。就这样，我们厂二月份的生产出现了三高的局面，即高于国家计划，高于去年同期，高于历史上最高水平。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工人群众和干部一起批判了林彪、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反动谬论。工人们愤怒地说：什么“上智下愚”，统统是骗人的鬼话。林彪认为自己是“天才”，劳动人民是“群氓”，目的就是妄图让我们相信，他天生就应该做皇帝，劳动人民天生就应当任他摆布，给他做奴隶。真是白日做梦！冷带车间退火班的工人们，列举出他们大搞技术革新，初步实现了热处理作业线半机械化、半自动化的生动事例，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谬论。他们豪迈地说：有毛主席撑腰，我们这些被林彪、孔老二诬蔑为“下愚”的人，就是要做工厂的主人，国家的主人，时代的主人！通过深入批林批孔，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群众的力量，进一步解决了搞技术革新是靠少数“专家”还是靠广大群众这个路线问题。过去，我们有的同志，不是依靠群众，而是依靠少数人关起门来搞技术革新，有的项目搞了两三年，毫无结果。这次运动中，在工人們的批评和帮助下，我们重温了毛主席关于“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教导，认识到必须真正从思想上承认工人群众是工厂的主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提高了认识，我们就满腔热情地支持工人群众的革新倡议和革新活动，领导和群众一起抓好两机架七连轧这个重点革新项目。三月上旬，在全厂批判“克己复礼”的高潮中，两机架七连轧机组试车成功，正式投产。七连轧机组的投产，减少了三分之一的操作人员，提高了工效一倍多，并为实现三机架连轧创造了有利条件。工人们兴奋地说：路线搞对头，一步一层楼。七连轧的成功，是我们坚持前进、反对倒退的物质成果，也是对林彪、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反动谬论有力的批判。

通过深入批林批孔，进一步提高了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自觉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注意坚持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这对于改造干部的世界观，密切干部和群众的联系，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我们抓得不紧，近年来个别干部又有“上楼回院”的现象。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和群众一起批判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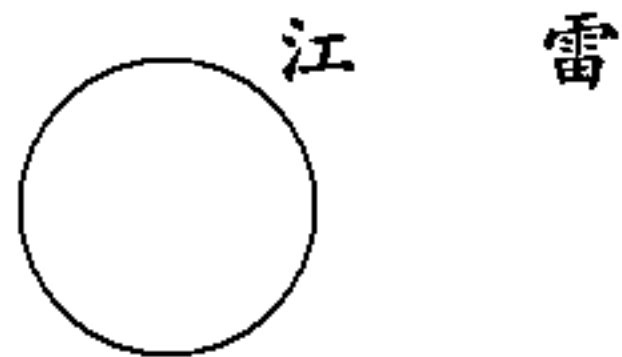
反动谬论，大家认识到：干部脱离劳动，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工作就会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错误，就要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全厂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的教导，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我们决定：党总支成员和其他领导干部，都要深入车间班组，与工人群众并肩战斗，共同抓革命，促生产。同时强调既要参加生产劳动，又要在劳动中，在和工人群众的接触中，主动向工人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力量，自觉改造世界观，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我们这样做了以后，进一步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增强了革命团结，革命和生产中出现的新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及时解决。例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工人精神振奋，不断创造新的班产纪录，坯料供应出现了紧张现象。党总支的同志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组织科室干部，利用业余时间抢运坯料，保证了坯料的及时供应，使工人们受到很大鼓舞，他们说：上下团结紧，运动搞得深；上下齐奋战，月月夺高产。

毛主席说：“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为了把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激发起来的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很好地组织起来，我们在运动中加强了对生产的领导，对各项工作进行了统筹安排，实行分工负责。大家努力做到思想上统一认识，时间上统一安排，工作上相互配合，保证了革命、生产两不误，做到忙而不乱。我们在运动中，坚持严格执行合理的规章制度：坚持按班产、日产检查生产计划的完成情况；坚持定期召开产品质量分析会；坚持开好厂、车间的生产周调度会；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和岗位责任制，等等。我们加强对生产工作的领导，受到了工人群众的欢迎。

批林批孔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有的同志有顾虑，怕开展运动会影响生产。现在，这种顾虑被生产日益发展的事实打消了。“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继续深入，必将有力地推动生产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决心进一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进一步领会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努力提高对这场斗争的认识，努力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夺取革命、生产的新胜利。



依靠群众发展电力工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激发了亿万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电力工业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九七三年全国发电能力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一点一倍，发电量增长了一点四倍，向农村输送的电力增长了三点三倍。现在，我国全国几天的发电量就等于一九四九年全年的发电量。不仅沿海的电力工业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内地也建设了一批新的电力工业基地。

我国电力工业所取得的成就，是广大干部、群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对于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电力工业，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发展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广大群众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主体。是依靠广大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靠少数人，崇洋媚外、搞爬行主义？这历来是电力工业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相信和依靠群众，坚信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历史，是大搞群众运动的历史。刘少奇、林彪一伙推行资产阶级办电路线，鼓吹办电“神秘论”、“特殊论”，用“条条专政”扼杀地方办电、群众办电的积极性，用迷信外国的“洋教条”，对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



针。一些资产阶级专家也把办电吹得神乎其神，高深莫测。他们说：“电力工业复杂，只能靠少数人办，不能依靠广大群众。”事实批驳了这种错误观点。任何科学技术，都不能离开广大劳动群众的实践，都是千百万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世界上最早揭开电的秘密的是一个印刷所的学徒，设计制造第一部发电机的是书店里的一个勤杂工。实践出真知，创造靠群众。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继续深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得到不断发挥，正在创造着资产阶级庸人不敢想象的奇迹。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能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多少年来，资产阶级专家一直把超高压输电线路看成是碰不得、摸不得的“禁区”，今天，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群众把它冲破了。鞍山的电业工人成功地创造了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超高压带电自由作业新技术。只要穿一套特制的服装，就可以自由地攀上铁塔，通过瓷瓶串，直接到带电的导线上进行检修。工人们豪迈地说，“电老虎”也是纸老虎，只要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可以驯服它。正是依靠和发挥广大群众的这种创造力，我国不仅在大江大河上修起了大坝，建成了大型电站，而且在广大农村，依靠贫下中农，破除了“泥腿子不能办电”的迷信，几年来办起了成千上万座小型水电站。事实雄辩地证明，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广大群众是办电的主人。所谓“电力神秘论”，只不过是修正主义路线强加在人们头上的精神枷锁，是资产阶级的骗人谎言。

我们要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依靠群众，高速度地建设电力工业，就必须继续批林批孔，进一步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有的人总是迷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盲目崇拜西方技术，把外国的东西都看成是好的，看不起自己生产的东西。他们站在洋人、洋机器面前，就好象当惯了奴才的贾桂一样，自惭形秽。这种奴才性十足的洋奴哲学，是修正主义思想的表现。叛徒、卖国贼林彪妄想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做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儿皇帝，在经济领域中必然要搞这一套。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



指导，有七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肩负着支援世界革命人民的光荣任务，绝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依靠进口，依靠仿制过日子。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坚持这个方针，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了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现在，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比以前更加雄厚的力量，进一步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有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就快，群众的积极性就无比高涨，群众的创造就层出不穷。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完全有可能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自己强大的祖国。对于没落腐朽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一切过高的估计，都是极端错误的。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背信弃义，撤退专家，撕毁合同，曾经扬言没有他们，中国造不出二十万千瓦的大型发电机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机电工业工人，不是已经用事实驳倒了苏修这种无耻谰言了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不仅自行设计、制造、安装了二十万千瓦的发电机组，而且三十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也已投产发电。我国工人阶级，继一九五八年试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一万二千瓩的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之后，一九六九年，又制造成功了十二万五千瓩的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接着，二十万千瓦的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也已正式投产。这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也是对洋奴哲学的有力批判。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继续深入批判林彪与孔老二鼓吹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剥削阶级世界观，批判洋奴哲学，肃清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另一个表现，是在企业里设置五花八门的繁文缛节，束缚群众的手脚，把群众当成机器的奴隶。在电力工业中，所谓“铭牌出力，不可逾越”，就是束缚群众的一大禁律。本来工厂制造发电设备，根据当时的技术条



件进行设计，规定一定的发电出力界限，即所谓“铭牌出力”，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它可以起到便于人们更好地掌握和运用设备的作用。但机器设备和任何事物一样，不是不能加以分析的。不创造一定的条件，改造设备，“铭牌”当然不可逾越；但如果通过分析，找出它的薄弱环节，创造条件，改造设备，“铭牌”就可以逾越。所以，“铭牌出力”是不是可以逾越，关键在于条件，在于人们对它采取什么态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广大工人为了给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他们依靠集体的智慧，敢于进行革新，用先进技术去改造设备中的落后部分，突破原来设计的生产水平，生产更多的产品。因此，在我们国家，逾越“铭牌”是正常的，不准逾越才是不正常的。河北石家庄热电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开展群众运动，改造了锅炉、汽机、发电机等设备，冲破多年来“铭牌出力，不可逾越”的禁区，使全厂的发电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四年发了五年的电。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一批电厂学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后，现有设备提高的发电能力等于新建一座装机一百多万瓩的大型发电厂。这样做，少花钱，多办事，既不要增人，又不要添设备，只花少量投资，少量材料，进行必要的改革，在短时间内就收到很大的效果。这是电力战线的广大群众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丰硕成果，应该继续发扬这种勇于创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电力工业同其他任何工业一样，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建立一定的规章制度是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广大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办社会主义企业必不可少的，它有利于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有利于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企业的规章制度不是为了对群众进行“管、卡、压”，而是为了更好地组织和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电力工业战线广大群众，批判了专家治厂、物质刺激、规程万能等修正主义黑货，在斗批改中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把群众管理和专业管理很好地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一些切实可行的合理的规章制度，这是群众的创造，应该认真地总结，积极支持和推广。重新搬出经过群众批判而又证明



是阻碍生产发展的旧规程，是一种倒退行为，群众是通不过的。

我国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两条腿走路方针的结果。毛主席指出：“**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我国地大物博，蕴藏着丰富的动力资源，有着发展电力工业极其有利的自然条件。南方多水，北方多煤。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广泛发动群众，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就能更好地实行大中小并举，上洋并举，水电火电并举，因地制宜，合理开发，逐步改变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加快电力工业的发展。有的同志总是低估群众的力量，认为地方办不了电，管不好电。他们没有看到各地蕴藏着办工业、办农业、办电力的巨大潜力和积极性，只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正确地发挥两个积极性，这种力量就会充分发挥出来。我国有些地区，本来电力工业比较薄弱，这些年来，由于贯彻了正确的方针，面貌很快发生变化。有一个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一九七三年一年中，对全省的电力工业工程，根据全局的需要，区别轻重缓急，抓住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建一个，保一个，投产一个，再上一个，一年就增加了四十二万千瓦的发电能力，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电力建设总和的百分之八十。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的翻身农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劈山开渠，几年之内就建设了八十多座小水电站，改变了偏僻山区的面貌。电力建设的这种新气象、新面貌充分地说明，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破除了“条条专政”，生产力就得到解放，电力工业就能得到更快发展。

应当指出：在电力工业中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并不是不要中央集中领导，不要统一计划。只有加强中央统一计划，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搞好综合平衡，才能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如果应该集中统一领导的不敢大胆领导，应当解决的问题不去认真解决，这样也不能够正确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继续抓好批林批孔这件大事，联系电力工业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依靠群众，把电力工业办得更好。



一万三千个合同是怎样完成的？

上海铜厂革命委员会

我们厂是个中型有色金属加工厂。有两个主要产品：一个铜棒，一个铜管，都是发展我国电力、仪表、化学等工业急需的产品。产品的品种规格有两千多种，每年的订货合同在一万三千份左右，供应全国成千上万个建设单位。

随着各地铜加工工业的迅速发展，我厂的生产任务越来越重。铜棒生产比较容易，发展较快；铜管制造工序多，周期长，技术复杂，成品率低，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全国各地的需要，就成了通常说的所谓“短线”产品。过去，我们厂产值、产量计划虽然完成了，但品种计划却一直完不成，订货合同年年完不成。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这种状况有了根本改变。一九七二和一九七三年，连续两年做到合同当年清，全面完成了国家计划。一九七三年铜管产量增长百分之二十八，实现了多年来第一次大幅度的增产。今年头几个月的生产情况比往年更好。

订货合同从完不成到“年年清”，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抓路线。在经济工作中，一定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我们的体会是：

一、是片面追求产值，还是满足国家的实际需要？这是企业在生产领域中用什么思想挂帅、执行什么路线的重要问题。

过去，为什么“短线”产品生产上不去，订货合同完不成呢？我们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发动群众揭矛盾。工人群众运用大字报揭露我们厂领导上存在重产值、轻品种的错误思想。对产值高、吨位大、容易生产的铜棒，上得多，上得快；而对技术难度高、批量小的铜管，则常常生产不出来，几十份、甚至几百份的合同要跨年度，延期交货。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影响下，厂里对“短线”产品有三个不接：难做的不接，批量小的不接，利润低的不接。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工人群众批判了利润挂帅，任务接下来了，但是重产值、轻品种的思想有时还要回潮。一九七二年下半年，眼看又有一批合同要跨年度拖下



来，厂里不是发动群众想办法，而是准备向几十个使用单位发一份通知书，建议三条：一、请用户改变品种，少要“短线”产品；二、如不改品种，则合同推迟到下一年度交货；三、两条都不行的话，就取消合同。没料到这三条给群众知道了，对厂领导提出了严肃批评，说：“你们的国家计划观念那里去了？你们执行的是什办企业路线？”这一批评，击中了我们的要害。

党总支抓住这件事，广泛发动群众讨论，有的说：“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是为了追求利润，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我们是社会主义企业，产值计划要完成，但要根据国家需要办事，国家急需的产品，我们必须保证完成。”有的说：“我们增产节约挖潜力，不能光挖产值的潜力，更要挖国家需要的品种的潜力。”“多增产‘短线’产品，产值可能低一些，但这为成千上万个工厂更多地增产创造了条件。”经过讨论，全厂干部和群众树立必须坚持多快好省地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观念。全厂干部带领群众奋战一个月，第一次做到扫清过去积欠的合同，全面完成了一九七二年的国家计划。

当年的合同是完成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拖欠合同只是个现象，在它的背后，却是企业管理上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没有肃清。过去，我们厂对订货合同规定的产品品种规格，从来不向工人群众交底。而是上面布置什么，下面就生产什么。这个月的产值完不成，就把下一个月度产值高的铜棒产品，提前做出来充产值，挤掉的都是“短线”产品。工人批评说：“我们完成的产值计划是干部用算盘拨出来的。”

通过深入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进一步批判了“群众落后论”的错误思想。一方面，组织领导干部、工人和管理人员走出去，访问用户，了解产品对国家建设的作用，了解用户对产品质量和使用要求，明确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目的。另一方面，将每次订货合同的底，交给车间，及早做好生产准备工作，由车间在月初公布产品品种和生产进度，每月下旬再公布当月尚未完成的品种生产情况，使工人群众心中有数，主动抓紧完成。

原来有的管理人员认为，我们厂品种上千个，如果把几十、几百份合同交给车间，工人会挑肥拣瘦，把生产搞乱了。事实恰恰相反，工人群众想国家所想，急国家所急，把产品技术难度大、周期长的尽先生产，遇到质量上的关键问题，及时发现，集体商量，许多过去解决不了的难题，都解决了。一九七二年，国防建设需要生产一批银镍铜合金管，厂里认为技术难度太大，把它推出门外。一九七



三年又要求厂里生产这种铜管，由于合同向工人交了底，工人说：“为了打击帝修反，就是用牙齿啃，也要把它做出来。”他们摸索熔炼规律，解决了银、镍、铜三种金属不能充分化合的难题，按质按期把它试制成功了。

从这里我们进一步体会到：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的辩论是不行的；辩论后，群众是主人了，下劲自然更足，就会更充分地发挥创造性。

二、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既必须有适应一定阶段主要生产任务的分工，又必须根据需要与可能，打破专业分工的界限，加强社会主义协作，才能进一步挖掘生产潜力。

我们在增产国家急需的“短线”产品时，遇到生产能力不平衡的矛盾：铜棒车间生产任务不足，而铜管车间人手又不够。怎么办？过去，我们厂的各车间、班组之间，片面强调专业分工，劳动力不能够统一调配。生产铜棒的不做铜管，生产铜管的又不做铜棒，你忙我闲，互不相关。工人批评这种现象是“分工变成分家”。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和工人群众一起反复学习了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批判了林彪散布的所谓“不同心也要协力”的谬论，使大家增强了全局观点，主动调整关系，挖掘生产潜力。工人响亮地提出：“工人阶级是一家，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共同的革命目标。”“各车间虽有一道分工的墙，但是拆了墙是一家，不拆墙也是一家。”

去年四月份，铜棒车间工人首先提出：为了支援铜管车间增产“短线”产品，要人给人，要多少给多少。去的人大干，留下的人还要加劲干。经过群众讨论，这个车间主动推选出二十名工人支援铜管车间。其他车间和组室干部也都自动报名支援，开足三班，提高了铜管车间的设备利用率，铜管月产量一下子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铜棒车间人手虽然减少了，也超额完成了计划，不但本月合同清，而且还为铜管车间挤压管坯一万根。

这件事，对我们教育很深。使我们认识到，片面强调专业分工，**是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产物。各自为政，自立门户，是狭隘的小农经济思想的反映，是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的性质不相容的。只有不断破除片面强调专业分工的观点，用无产阶级思想去统帅生产，正确处理人们的相互关系，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去年十二月份，在铜棒车间完成任务的基础上，他们又调出一百五十名工人，支援铜管车间突击增产“短线”铜管的战斗。由于大家密切协作，使



铜管的生产达到更高水平。

由于发扬了共产主义协作风格，各车间、班组、工种之间，互相把方便送给别人，用困难促进自己。过去，模具工人按专业分工开模子，现在打破了工种界限，实行一专多能。过去，拉管工人生产各顾各，现在大家掌握品种完成的进度，主动帮助没有完成计划的班组。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国家需要增产的产品，被卡在一个工序或一个车间生产不出的不合理状况，使可能挖出来的生产潜力，迅速变成了现实的生产能力。

三、在材料、设备问题上，必须破除见物不见人的形而上学思想，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针，与“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作斗争。

要大幅度地增产“短线”产品，同我们厂落后的生产设备条件，也发生了矛盾。我们厂现有的铜管拉伸机，就是昼夜三班开足，也完不成增产任务。三十万瓩汽轮机冷凝器上用的十一米半长的铜管，现有设备根本不能生产。是等待上级增添设备，还是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搞技术革新？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毛主席在“鞍钢宪法”中指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充分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这是实现自力更生方针必须采取的措施。起初，有些同志片面强调“设备定型”、“工艺成熟”，认为上级要给新的任务就要同时给新的设备，先增加新设备再增加生产。工人群众主动提出：“我们不作设备、技术的奴隶，要作设备、技术的主人”，坚持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从技术革新中挖潜力。我们厂的铜管拉伸机，十多年来一直是一次拉伸一根铜管，在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改为一次拉伸两根铜管，并且实现了送坯、衬芯、落料半自动化，每台机器的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五十，为大幅度增产铜管创造了物质条件。三十万瓩汽轮机冷凝器上用的铜管，长达十一米半，而厂里最长的拉伸机，却只有八米半，就是有大的设备，厂房也放不下。生产管理干部在办公室里着急。工人知道了，尖锐地批评说：“你们嘴上讲相信群众，办起事来，还是看不见群众。”工人群众在讨论中，举出一个例子：过去有个单位要加工一根一百米长的铝管，它的长度超过厂里拉伸机的十几倍，怎么办？大家想出一个巧办法：把马路当车间，在阴沟洞里装拉伸机的车头，开动汽车作为拉管的动力，终于把这根特长的管子拉出来了。他们说：“现在条件更好了，十一米半的管子还怕拉不出来啊！”工人群众的干劲这么大，而领导思想却落后于群众。在工人群众的促进下，厂领导立即召开各种座谈会，广



泛听取意见，座谈会变成了批判懦夫懒汉世界观的大会，变成加快“短线”产品生产的誓师大会。工人说：“舒舒服服干不了革命，设备条件再差也要上。”会后，领导干部带头同工人一起，自己动手搭工棚。三天树起八根钢梁，冒着风雨盖好屋顶。经过十八天苦战，三百六十平方米的简易工棚造成了。安装拉伸机时，原来要浇水泥底脚，但工人打破常规，大胆设想，用几块铁板代替水泥底脚。只花了一个月时间，一台二十七米长的拉伸机制造出来了。这台特长的拉伸机的制造费用，还不到同样效能的洋设备的十分之一。这台新增加的拉伸机，使特长的冷凝器铜管生产超额百分之七十五完成了国家计划。广大工人群众拿出企业主人的革命气概，就为充分挖掘企业潜力开辟了广阔道路。

四、计划内的任务要干，为国家急需的计划外的任务也要干，这是企业为满足社会主义的需要应尽的责任。

国家急需的“短线”产品，多数是通过计划或合同的形式下达到厂里。有时候，却是在计划以外临时安排的。这种任务，要求急、批量小。干不干？

过去，我们认为这是“额外负担”，强调困难，不愿意干。有一次，上海有个厂急需完成一项科研任务，需要我们协作加工一根近二米长的银铜复合棒。开始到我们厂生产部门联系，生产部门推说过去从未做过，没有办法加工。后来，他们绕过科室，直接到新材料试制小组和工人们商量。工人们了解试制这个新产品的意义以后，立即动手。大家反复琢磨，群策群力，只花了两个多小时就拉出一根银铜复合棒。以后，工人们立了一条新规矩：“凡是国家计划外急需的和临时协作任务，不论技术难度多大，批量再小，先接后做。”“宁愿自己在生产上多承担困难作减法，也要让兄弟单位多增产节约作加法、乘法。”过去，外单位协作加工要自带模具，现在基本上做到由厂里供应，解决了外单位的不少困难。去年冷冻行业为了适应战备的需要，使冷冻机体积缩小、搬运方便，要求我们厂生产一种散热效率高的散热管。这个产品，虽然没有列入国家计划，但工人们先后试制出四个品种，一次比一次先进。新型散热管的效率大大提高，使冷冻机体积缩小了一半以上，节约材料百分之六十，得到使用单位的好评。文化大革命前，每年承接的新产品只有十多种，而且还完不成，现在每年试制的新产品达一、二百种。铝合金型材是一九七〇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至今已增加到二百四十五个品种，为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作出了新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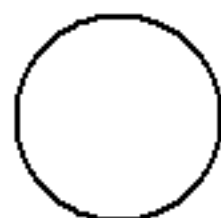
红旗

一九七四年第五期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五期 目 录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五四时期批孔斗争的历史经验

——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史 众（5）

读《盐铁论》

——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梁 效（12）

林彪反革命策略的破产

——批判一份黑笔记……………余 凡（20）

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头……………严 章（27）

批林批孔联系实际的一个做法

……………河北饶阳县邹村大队党总支（30）

深批“克己复礼” ……广东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番茅大队党支部（34）

团结战斗 批林批孔 ……天津动力机厂工人 孟庆瑞（38）

认真学习 知难而进 ……上海工程机械厂工人 虞和康（42）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

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45)

增产节约广积粮……………洪 桥 (53)

抓革命 促生产

——沈阳第一机床厂的调查报告…………… (57)

依靠群众搞好铁路运输……………山海关铁路机务段党委会 (61)

继续搞好教育革命

批林批孔运动推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65)

在本学期化学学习中对对立统一规律

的体会……………大连海运学院无线电系导航专业731班学员 赵 兵 (70)

把农业大学办到农村去……………西北农学院革命委员会 (73)

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教学改革

——湖北监利县棋盘中学的调查报告…………… (78)

大力普及牧区小学教育

——青海玛多县的调查报告…………… (83)

☆ 五月一日出版 ☆



列宁语录

世界史上的明天，将是这样的
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
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就要完全苏
醒过来，他们争取自己解放的长期
的艰苦的决战就要开始了。

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
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
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
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
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
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



列 宁 语 录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



毛主席语录

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批 林 批 孔 反 修 防 修

五四时期批孔斗争的历史经验

——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

史 众

五十五年前，五四运动的革命曙光，划破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黑暗夜空，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开始了！

一九一九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巴黎召开了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分赃会议，即所谓巴黎和会。会上，帝国主义国家横蛮地拒绝了我国提出的废除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特权的合理要求。消息传来，激起了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下的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伟大的五四运动象火山一样爆发了！五月四日，北京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帝国主义和美国政府。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六月三日后，上海和各地的工人相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工人阶级以巨人的姿态，站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列，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在工人和学生的推动下，全国各重要城市的商店，也纷纷举行罢市。这样，五四运动便发展成为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孔斗争，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无产阶级的文化生力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盟军，向“孔家店”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尖锐地揭露了“孔家店”虚伪的仁义道德，猛烈地抨击了吃人的礼教和“三纲五常”。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纷



纷出版进步刊物，“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响彻全国。批孔斗争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极大地动摇了反动统治的政治思想基础。

为什么无产阶级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在文化思想战线上首先对孔孟之道发起猛烈的冲击呢？

毛主席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新民主主义论》）五四运动时期的批孔斗争，正是适应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

孔孟之道从一出笼，就是作为复辟倒退的思想体系而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的。后来，一切反动、没落的统治阶级，都把它用来作为维护或复辟反动统治的思想理论武器。孔孟之道成为人民群众要革命、要前进的最大的精神枷锁。“五四”前夕，尊孔复古的乌云笼罩着整个中国。一九一一年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赶跑了一个皇帝，但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并没有被摧毁，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短短几年间，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就先后演出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这两出反革命复辟的丑剧。他们首先大造反革命舆论，宣扬复辟倒退的思想。不论是想当皇帝的袁世凯，还是想把宣统重新弄上皇帝宝座的张勋，都是叫嚣“今不如昔”，要倒退回去。为了实现这个反动目的，他们把尊孔读经作为复辟倒退的重要手段。袁世凯在一九一三年六月发布了尊孔令。一九一四年一月由他的御用机关“政治会议”通过祭天、祀孔两案，同年九月，举行了声势赫赫的“尊孔祀圣”大典。一九一五年又通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跟着来的便是洪宪帝制丑剧的演出。袁世凯垮台以后，保皇党康有为又勾结封建军阀张勋，再次演出尊孔复辟的丑剧。他们叫嚷要把孔学作为“国教”列入“宪法”，大肆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是无中国矣”的谬论。一时间“孔教会”、“尊孔会”纷纷出笼，群魔乱舞，猖獗一时。

同时，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永远奴役中国人民，也把孔孟之道当作“敲门砖”。美帝国主义分子李佳白之流，就曾极其卖力地宣扬孔学，鼓吹要使“孔教”与“耶稣教”“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防止“社会之骚动



兴起”，也就是反对中国人民革命。老沙皇的文化特务盖沙令，猖狂叫嚷什么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国实现“古道之复兴”，以免“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表现了刻骨的仇恨。

历史经验表明，孔孟之道不仅是封建统治者压迫中国人民的思想工具，而且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治手段。正如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看到了尊孔与复辟的联系，逐步看到了尊孔与卖国的联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孔孟之道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要打掉反动派手中的思想武器，就要反孔；要砸烂套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就要反孔。正是这样，“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喊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正是通过这一场批孔斗争，打翻了被历代反动派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撕去了孔孟之道的虚伪画皮，揭穿了它的凶残本质，带来了广大人民思想的大解放，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推动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发展，推动了整个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发展。毛主席高度评价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反对党八股》）这一科学论断，深刻地揭示了批孔斗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指出了开展文化思想领域革命的重要性。孔孟之道硬要人们相信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只许被压迫人民“循规蹈矩”，不许人民起来革命。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冲决了这个思想罗网，推翻了对反动派“造反无理”的旧案，推动人们向旧世界去反抗去斗争，从而展现了彻底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胜利前景。

思想的解放，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在过去，孔老二的尊严是不可冒犯的，孔学是天经地义的，旧礼教旧道德是不容怀疑的，“非圣非经”是最大的犯罪。“打倒孔家店”的斗争，大大破除了人们对“孔家店”的迷信，鼓舞了广大青年追求真理的热情，促使他们去寻求革命的思想武器。从五四运动开始，在中国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马克思



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等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不断出现,《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陆续出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读物、文章更是大量刊行。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们不仅揭穿了孔孟之道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而且在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中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有不少人就是以“打倒孔家店”为起点,同孔孟之道的传统观念相决裂,逐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革命道路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五四”时期就战斗在“打倒孔家店”的最前列。他在一九一八年四月组织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爆发后,为了推动革命的发展,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主编了著名的《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创办了“文化书社”,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时,以湖南为基地,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和领导了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毛主席在进行这些革命活动时,非常重视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器,尖锐地揭露了孔孟之道是两千多年来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奴役人民的专制思想,也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反动工具,人民要摆脱压迫和奴役,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彻底打破孔老二礼教的桎梏。他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已经成为澎湃的怒涛,但只有打破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才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唤起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主席把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在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中,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代表了“五四”时期批孔斗争的正确路线和方向。

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除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外,还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上,带着不同阶级的政治目的参加到“打倒孔家店”这个行列里来的。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就逐渐分化。有的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因此能够坚持前进、坚持斗争;有的则落伍、消极;有的甚至叛变。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一员主将鲁迅,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广泛的



批判。由于他坚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把批判孔孟之道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严于解剖自己，不断地改造世界观，认识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因而他能紧跟时代的步伐，站在斗争的前列，坚持批孔斗争，在斗争中一步步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毛主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

与鲁迅相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吴虞，“五四”时期虽然参加了“打倒孔家店”的行列，甚至名噪一时。然而，由于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来批判孔孟之道，因而其批判是极不彻底的。而且随着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破灭，他也就丢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颓唐、消沉，变成大烟鬼了。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陈独秀，“五四”时期也曾以“反孔”的姿态出现。但因为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害怕和反对人民革命，当他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就由“反孔”转向尊孔，叫嚣要“重新评定”孔老二的“价值”，成为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

至于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原来就是一个尊孔派。五四运动初期，他曾卷进了“打倒孔家店”的洪流，那不过是投革命之机，想捞取一点政治资本而已。因为他站在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只能是假批孔。所以他根本不去触动孔孟之道的要害，只是搞什么“文学形式”的“改良”。随着革命的深入，面对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他很快就撕下了反孔的假面，亮出了尊孔的真相，挑起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公然把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后来积极为帝国主义出谋划策，要帝国主义用孔孟之道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就充分暴露出他是一个尊孔和崇洋卖国相结合的洋奴。

“五四”时期批孔斗争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文化革命新军，才能真正批孔，只有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才能彻底批孔。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为了实现当前的革命目标和最终的共产主义理想，必须同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此，只有无



产阶级才能彻底完成“打倒孔家店”这个历史使命。一切投身到批孔斗争洪流中来的革命者，要象鲁迅那样，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勇猛地批判敌人和孔孟之道，同时也严于解剖自己，改造自己，在斗争中不断前进。伴随着批孔斗争深入发展而来的，必然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扩大和巩固，必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培育下的革命新人大批成长，这是“五四”时期批孔斗争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是近代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大革命。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新民主主义论》）当然，斗争并没有结束。五四运动以后，反孔与尊孔的斗争还在继续。各种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不断扯起“孔家店”这面破旗，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攻倒算，力图为早被五四运动推翻了的孔老二及其一套黑货翻案。从独夫民贼蒋介石到汉奸卖国贼汪精卫，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到叛徒、卖国贼林彪，都毫无例外地尊崇孔孟之道，而支持这些反动派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也都是尊孔派。它们越是腐朽没落，就越起劲地尊孔。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有阶级斗争存在，就有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存在，批孔斗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毛主席早就指出：“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反对党八股》）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总是与批判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也总是在不断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中，把革命推向前进。从“五四”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密切结合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结合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从政治上、思想上反复批判了孔孟之道和尊孔派。这种批判，成为我们党内历次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毛主席在斗争中所写的关于批孔的光辉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斗争的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是我们当前结合批林深入批孔的思想武器，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入领会。



毛主席曾经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反对党八股》）由于这个缺点，使得当时许多人不可能在批孔斗争中对历史上的阶级关系，作出科学的分析，揭露儒法斗争的阶级内容。对于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对于法家在批孔斗争中写的若干著作，也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今天，亿万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都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已经涌现出一批生气勃勃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进行批判和分析的积极分子。我们应当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进行战斗，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现状和历史，使我们在学习上大大前进一步。

批林批孔运动，是“五四”以来无产阶级领导的批孔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如果说，“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是为了击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复辟逆流，为了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播扫清道路，为了促进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进；那么，今天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清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毒素，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前进，就必须深入批孔。“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当前广泛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斗争，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更加伟大胜利的保证。所以，这个斗争是一个战略任务，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随着革命的胜利发展，人们一定会愈来愈深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批孔，与“五四”时期相比，条件已经大不相同了。我国已经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二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直接参加，所以我们能够进行这样广泛而深入的批孔运动。为了深入批林批孔，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吸取“五四”以来批孔斗争的历史经验，就一定能够搞好批林批孔运动，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读 《盐 铁 论》

——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

梁 效

在我国历史上，儒法两家的斗争从来是很激烈的。公元前八十一年（即年幼的汉昭帝继承汉武帝皇位的第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就是儒法两家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所进行的一场大论战。桓宽的《盐铁论》一书，是根据会议的记录整理而成的。盐铁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的问题。斗争双方的代表人物，一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边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光没有出场，他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桑弘羊是一位杰出的法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了几十年，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反对匈奴侵略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大权到手，很快就纠集一个山头。经过几年准备，他伙同党羽杜延年，以问民间疾苦为名，把各地选派的贤良、文学六十多人，用马车拉到首都长安，召开了盐铁会议，实行突然袭击，大肆鼓吹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秦始皇和法家，妄图搞掉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在这次会上，桑弘羊紧密结合现实斗争，以勇敢的反潮流精神，舌战群儒，力排众议，把贤良、文学们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尽管《盐铁论》的作者倾向儒家是很鲜明的，很多篇都把贤良、文学强词夺理、复古倒退的言论放在最后，但仍然没有掩盖住法家思想的光辉。几千年来，法家一直受到反动派的攻击和污蔑，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恶毒咒骂法家是“罚家”。读一读《盐铁论》，认真总结西汉中期这场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和批判林彪尊孔反法、分裂倒退、投降卖国的反动本质。



盐铁会议一开始，那些贤良、文学们立刻气势汹汹，赤膊上阵。他们集中攻击的目标，就是汉武帝时盐、铁等业的官营政策，从表面上看，攻的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怀有险恶的政治用心。因为实行盐铁官营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的一项重要措施，打掉了它，就打掉了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制一系列内外政策的一个物质基础。

贤良、文学们叫嚷说，盐铁官营，违背古代“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盐铁论·错币》）的原则。这样做，“与民争利”（《本义》），闹得国富民穷，是“民间”一大“疾苦”。同时，“末盛则本亏”（《本义》），破坏了农业生产，伤了国家的元气。你看，他们振振有词，俨然是一群忧国忧民的正人君子。

什么“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这不过是从孔老二反动思想武库里捡来的破烂。当年的孔丘就口口声声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其实，孔老二狂热鼓吹君子之“义”，就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统治的反动精神，代表着一小撮没落奴隶主贵族最狭隘的私利；他拚命攻击小人之“利”，则是为了反对新兴势力的政治经济利益。这就是儒家的“义”、“利”观的反动实质。贤良、文学们打着“义”的幌子来反对“利”，其目的是反对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妄图改变法家的政治路线。桑弘羊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阐明自己反孔尊法的政治立场，理直气壮地说盐铁官营“有益于国”（《非鞅》），并举出大量历史事实，热情赞扬法家的变法革新，指出商鞅“内立法度”，“外设百倍之利”，（《非鞅》）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终于统一了六国。而孔孟之流大谈仁义，“危不能安，乱不能治”（《殊路》），终究挽救不了奴隶制度的灭亡。从而对贤良、文学们所鼓吹的“义”、“利”观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贤良、文学们果真是不要义不要利吗？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对于那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孔孟之徒从来是贪得无厌的。不是“有酒食，先生馔”（《论语·为政》）吗？孔老二在这方面，称得上是个黑样板。在陈蔡被围、饿扁了肚子的时候，学生弄来一点酒肉，孔老二不容分说，抢过猪肉就啃，抓起酒杯就灌。虽然他反对搞商业，但周游列国的经费却仍然要靠当大商人的学生子贡掏腰包，而且是多多益善。他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们，也正如桑弘羊所揭露的，是一帮“洁言污行”、



“鸡廉狼吞”的巧伪人。汉代的那些儒生，没有一个不是削尖了脑袋想升官发财的。在暂时捞不到油水时，他们对别人得利眼红得要命，却装着不屑一顾。一旦有利可图，他们就象饿狼那样，张开血盆大口，恨不得把什么都吞下去。这就是贤良、文学们要义不要利的真相！

贤良、文学们还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攻击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大讲什么老百姓买不起铁器，吃不起盐，穿破衣的寒，吃粗糠的苦，似乎他们真的要为劳动人民谋福利了。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废除了盐铁官营，究竟对谁有好处呢？汉文帝的时候，私人可以铸钱、冶铁、煮盐，结果是吴王刘濞把持了海滨，大官邓通霸占了西山。这些人役使大批贫苦农民，使用大量奴隶劳动，大发横财，有的甚至“富埒天子”（埒音劣）、“财过王者”。（《汉书·食货志》）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私门成党”，“逆节之心作”，（《禁耕》）大搞分裂割据活动，一再发动和参与叛乱，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祸根。显然，贤良、文学们为之争利的“民”，根本不是广大劳动人民，而是这些地方诸侯王、大工商奴隶主，是一小撮妄图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而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正是为了同这些反动势力争利，在当时客观上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桑弘羊痛斥贤良、文学们说：先生们，依了你们，得利的只能是横行霸道的地方势力，而国家就什么也干不成。你们的议论，专门是为了损害中央而为地方分裂势力服务的。（《取下》）这个批判，击中了贤良、文学们的要害。他们叫嚣的“罢盐铁，退权利”（《水旱》），就是要罢掉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退给他们分裂之权、割据之权。这些要求，不过是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翻版。只是时代变了，随着斗争的发展，地主阶级内一部分人满足于既得利益，变成了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开始和奴隶主复辟势力残余勾结起来，狼狈为奸。桑弘羊同贤良、文学们进行的斗争，就是对奴隶主复辟势力残余和大地主阶级保守派的斗争。他所捍卫的，是汉武帝时代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法家路线，是历史的进步，国家的统一。历史上的反动势力在攻击进步势力的革新措施时，往往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法。林彪一伙也扯起这面破旗，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国富’民穷”，实质上他们和贤良、文学一样，根本不代表劳动人民，而是代表被革命阶级打倒的一小撮复辟势力。

贤良、文学们本来是一些“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相刺》）的寄生虫，



但在盐铁会议上竟然哼哼唧唧，大讲起“养桑麻，尽地力”（《水旱》）来，岂不是荒唐可笑！儒法两家谁真正重视农业生产，本是一清二楚的。商鞅奖励耕战，十分重视农业。秦始皇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汉武帝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法家的路线，在注重发展农业的同时，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工商奴隶主，解决了国家“用度不足”的问题：“佐助边费”，“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坚持和发挥了法家“崇本抑末”的思想，批驳了贤良、文学只有废除盐铁官营，才能“广利农业”的谬论，指出治理国家应该“开本末之途”（《本议》），使农、工、商都得到发展。没有手工业，农业工具就会缺乏；没有商业，物资就不能流通。农业工具缺乏，粮食就不能增产；物资不流通，财政就会发生困难。所以，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垄断工商，掌握物价，这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贤良、文学们企图用“广利农业”的口号反对盐铁官营，目的是逼迫西汉中央政府放弃官营工商业阵地，让工商奴隶主重新把持盐铁业，更加猛烈地兼并土地，破坏农业，从经济上挖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墙脚。

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围绕着国内政策的争论，主要表现在统一和分裂的问题上面。从秦始皇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来，这个争论一直存在。唐朝柳宗元作的《封建论》，就是对这个争论的一个出色的历史总结。汉武帝继承了秦始皇的事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保证盐铁官营政策的顺利推行，对于地方豪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当时的所谓“杨可告缗”（缗音民），使中等以上的工商奴隶主大批破产。从他们那里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史记·平准书》）。通过一系列的斗争，严重削弱了地方豪强进行叛乱的物质基础。新兴地主阶级从秦始皇开始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才基本上得到巩固。在两千多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的国家保持了统一的局面。在这方面，汉武帝和桑弘羊作出了一定贡献。叛徒、卖国贼林彪步贤良、文学们的后尘，妄图破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只能被人民所唾弃，被历史所埋葬。

二

在历史上，凡是对内搞分裂、搞割据的反动势力，对外大都是投降主义者。



盐铁会议上的那些贤良、文学们也正是这样。他们在汉武帝抗击匈奴的问题上大作文章，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

贤良、文学们祭起了孔老二的亡灵，打起“贵以德而贱用兵”（《本义》）的旗号，攻击抗匈战争是“废道德而任兵革”（《本义》），根本不应该打，全怪几个“好事之臣”在汉武帝面前无事生非，惹起了战祸。这是十足的投降主义的谬论！

对于任何战争，首先要分清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匈奴是西汉北方的一个奴隶制军事政权。它拥有几十万骑兵，奴役压迫着当时几十个小邦，俨然是北方一霸。由于西汉社会制度比匈奴进步，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先进农业国，匈奴更是垂涎三尺，把西汉看作是一块肥肉。他们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对西汉北部进行武装掠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当时匈奴和西汉的矛盾，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和西汉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是落后的奴隶制度和新兴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因此，汉代对匈奴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汉武帝坚持了抗战的立场，起用了奴隶出身的卫青和霍去病这样杰出的大将，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匈奴侵略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这场反侵略的战争中，西汉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动员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是赢得胜利的一项基本条件。特别是盐铁官营政策的实行，对于保证反侵略战争的国防费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儒家用“废道德”来责难和否定这场进步、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道德”，就是甘当汉奸的投降主义“道德”。桑弘羊反驳了贤良、文学们不区分战争性质的谬论，指出：抗匈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并不是想扩大地盘而兴师动众，是“兴义兵以诛暴强”（《结和》），打击侵略者。这就勇敢地捍卫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抗战略线**。

为了反对抗击匈奴的正义战争，贤良、文学们不惜用各种卑鄙的伎俩，制造反动舆论。他们鼓吹“抗战亡国”和“领土无用”的谬论，散布失败主义情绪。他们还拼命渲染战争恐怖、劳民伤财。什么“大军之后，累世不复”、“田地日荒，城郭空虚”（《未通》）呀，什么“老母垂泣，室妇悲恨”（《备胡》）呀，把一场正义战争描绘得凄凄惨惨。于是，他们便抛出了罢兵休战，“两主好合”，拆除防御工事，使用大量金钱与匈奴讲和的投降主张。

“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贤良、文



学们如此不择手段地恶毒攻击抗匈战争，其要害就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反动政治势力，妄图投降匈奴侵略者，以实现分裂、割据的迷梦。在阶级实质上，他们要建立的正是匈奴奴隶主侵略势力和汉族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动政治同盟。从西汉开国直到盐铁会议的一百多年中，这种内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颠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威胁，始终存在着。汉初韩王信、代王陈豨（音希）、燕王卢绾，先后与匈奴勾结，充当了可耻的汉奸。景帝时七国之乱，又有吴王、楚王、赵王和匈奴阴谋勾结。汉武帝抗击匈奴，地方豪强势力就“颇有异心”（《西域》）。汉武帝刚一去世，这伙反动势力的代表贤良、文学们就在盐铁会议上大打出手，猖狂进攻。它说明了抗战和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还在激烈地进行着。这段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搞分裂倒退的人，由于不得人心和极端虚弱，总是要寻找后台老板，借助侵略势力，破坏国家统一，充当汉奸走狗。林彪一伙为了实现“克己复礼”的迷梦，充当了苏修新沙皇的代理人，不正是这样干的吗？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站在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抗战的立场上，义正词严地批驳了贤良、文学们的投降主义路线。他正确总结了西汉历史上“和亲”政策不能制止匈奴侵略的教训，指出匈奴“贪侵”成性，“百约百叛”，一贯背信弃义，一有机会就发动侵略战争。对这样一个凶恶的敌人，决不可存任何幻想，只能用反侵略战争打败它，不能用仁义道德感化它。桑弘羊阐明了反侵略的备战思想，说事先不作准备，临时就不可能应付突然事变。因此，必须坚持屯边政策，“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和亲》），“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险固》）。只要坚持进行这场正义战争，“以义伐不义”，就会象“秋霜而振落叶”那样，彻底打败侵略者。这就狠狠地回敬了那些妄图投降叛变、破坏国家统一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

三

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的论战，反映了两种历史观的鲜明对立。这是宣扬历史倒退和倡导进步革新之间的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

贤良、文学们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他们不可动摇的信条。他们鼓吹“百世不易之道”（《刑德》），主张“法三王”，就是要把夏、商、周的奴隶制度当作万古不变的社



会模式。在他们眼里，人类不能发展，社会不能变化，历史永远停止在一点上，当国王只能当夏禹、商汤、周文王那样的国王。他们竭力吹捧“周公之时，士无贤不肖，皆可与言至治”（《利议》），拚命要求“复往古之道”（《利议》），就是要复辟古代奴隶主专政的统治秩序。谁因循守旧，顽固不化，谁就是天老爷的骄子，人间的圣贤，谁就能够“昌”。如果有谁要搞变革，那只会越变越坏、越变越糟，一代不如一代，就是“不通大道”，罪大恶极，就要“亡”。坚持这种反动的历史观，贤良、文学们就从吴起、韩非，一直骂到杜周、张汤，对法家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特别是对我国历史上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秦始皇和著名法家商鞅，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桑弘羊作为上升时期地主阶级的代表，尖锐地批判了这种反动的历史观。他认为，“异时各有所施”（《大论》），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面对现实，从形势需要出发。舜、禹和商汤、周文时的兴盛，都是根据当时的条件采取不同政策造成的。因此，要“因时而行”，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实行变革。他高度评价了法家的历史功绩，认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功如丘山，名传后世”。（《非鞅》）他特别热情地赞颂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坚决实行地主阶级专政和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认为对于孔丘那一套反动思想及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孔孟之徒，“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利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颂古非今，鼓吹“今不如昔”，是历史上一切反动势力攻击革命和进步事业的一个共同特点。从思想根源上说，都出自主张倒退、反对变革的反动历史观。反动派诬蔑现实，就要美化过去，伪造历史。贤良、文学们把汉武帝以来巩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的胜利局面，说得一塌糊涂。而把早已腐朽了的奴隶制度描绘得尽善尽美，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赋税么？微乎其微；劳役么？不过几百里，连衣服都不用换，就可以回家了；剥削、压榨么？奴隶主们是“上取有量”，从不乱来的。在这种制度下，“上不苛扰，下不烦劳”，据说，“为善于下，福应于天”，连气候都是风调雨顺。“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真是“国无夭伤，岁无荒年”，好一个极乐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哪里曾有过这种奴隶制社会？把一小撮奴隶主的天堂，美化成什么“全民”的天堂，这不过是一切孔孟之徒为了复辟旧制度时惯用的手段罢了！桑弘羊看穿了贤良、文学们“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遵道》），他们伪造历史的反动目的，就是为了推



翻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的内外政策。

这伙开历史倒车的孔孟之徒，还打出了“回到古代去”的破旗。他们滔滔不绝，说什么一切都应该象古代那样，穿衣要穿粗麻布衣；做饭把粮食放在火上烤一烤就行，连稗子也吃；住房搭草棚、挖土洞能挡风雨就可以；欢乐时敲敲木头、打打石头就算音乐，等等，不一而足。

贤良、文学们真是想回到古代去过这种生活吗？完全是欺人之谈！按照儒家的经典，“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衣食住行都有一套臭讲究，哪里肯过那种原始的简朴生活？桑弘羊指出，贤良、文学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一伙“内贪外矜”、“情貌不相副”的伪君子，钻墙洞的盗贼。在这个问题上，桑弘羊的眼睛也是很亮的，他揭露了孔孟之徒在思想品质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虚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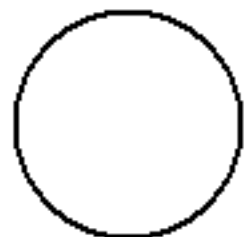
桑弘羊还进一步指出，贤良、文学们的这一套反动历史观，不但虚伪已极，而且腐朽透顶，“不合于世务”。为了彻底驳倒这些“祖述仲尼”、“诵死人之语”的孔孟之徒，桑弘羊把他们的老祖宗孔老二拉出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他说：你们所崇拜的大圣人孔丘，在鲁国吃不开；在齐国被驱逐；卫国根本不用他；匡城的老百姓把他包围起来，要杀他；困于陈蔡，断炊绝粮。孔老二这个家伙，“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贪也；不知见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大论》）这就是说，孔丘其人，明知行不通，还鼓吹开倒车，真是顽固反动；到处碰壁，还追名逐利，真是贪得无厌；不问情况，不看对象，还乱跑乱说，真是愚蠢可笑；四处挨骂，走投无路，还想苟活下去，真是卑鄙无耻。这“强”、“贪”、“愚”、“耻”四个字，活画出儒家祖师爷孔老二的没落阶级本性和反动世界观。桑弘羊对孔老二的痛斥，是继杰出的奴隶革命英雄柳下跖之后，新兴地主阶级对孔老二一次痛快淋漓的批判。今天读起来，仍能感到强烈的战斗气息。

毛主席深刻指出：一切顽固党“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和今天的林彪都是这样的顽固党，他们的眼睛是长在后脑勺上面的，只是向后看，不可能向前看的。然而，一切妄图搞复辟、开倒车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必然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



林彪反革命策略的破产

——批判一份黑笔记



余 凡

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为了反革命的需要，总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总结他的反革命经验，研究如何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路线、策略。在记录他那些不可告人的谈话的黑笔记本里，有一处写着“中庸之道”“合理”。并在这后面开列了他们应当“注意”的六个要点，即所谓“站在左的方面”，“大胆反极左思潮”，“坚（决）反右倾”，“团结大多数立场漠〔模〕糊认识错误”的，“瓦解间接同盟军”，“韬、诿〔晦〕”“操之论英雄”“范蠡”。林彪还在《辞海》“中庸”一词的旁边作了同样内容的批语，并说这些“合起来就成为正确路线”。

这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剖析这个材料，可以使人们大开眼界，进一步认识林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和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认识他“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一套手段。

这份反革命黑笔记，是林彪一伙在党的九大以后，九届二中全会以前记下的。这时候，林彪伙同陈伯达炮制的、妄图在九大公布的修正主义报告，已经理所当然地被党中央否定了。九大通过了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宣告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彻底破产，林彪的阴谋也遭到挫败。就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及其死党为了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写了许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互相赠送，妄图效法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搞复辟倒退，篡党夺权。他在这个时候记下的黑笔记，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罪恶阴谋而制定的一整套反革命的路线和策略，也是他多年来反革命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在九届



二中全会上和以后，林彪一伙就是按照这一套向党和人民发动猖狂进攻的。

在这个黑笔记里，林彪告诫他的死党第一要“注意”的，就是“站在左的方面”，即所谓“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姿态”者，画皮也。“姿态”冠以“坚决”而且要“高”，就是说画皮一定要披，伪装绝不可不要，同时还要伪装得巧妙，为了装得象，甚至可以挤出几点泪水。从林彪的这一条自白，联系到他的一贯所为，事情更加清楚了：原来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等等，都是一种“姿态”，是假的，是假象；而他搞“克己复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才是真的，才是本质。革命人民从这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林彪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并吸取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尤其是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公认的指导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居于统治地位，毛主席、党中央在全国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信。在这种情况下，修正主义者更需要伪装，否则他们就一天也混不下去。林彪伪装左派、伪装革命的目的，正是为了掩护他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指出：“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假的总是假的，伪装总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姿态”扮得愈高，必然暴露得愈充分，垮台得愈迅速愈彻底。胡风和林彪的可耻下场证明这也是一条规律。

列宁曾经指出：“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林彪在公开场合讲一些革命的词句，表面上装作“左倾高姿态”，暗地里尽干反革命勾当，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极右派。他的所谓“大胆反极左思潮”，就是他用来反对革命、坚持复辟，反对前进、坚持倒退，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修正主义的代名词，这正是他极右面目的公开亮相。

在林彪一伙看来，搞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极左”，就是违背了孔老二的“中庸



之道”，必须疯狂加以反对。这一点在林彪反党集团内部是丝毫不隐讳的，只要我们翻翻他们的黑笔记，看看他们的《“571工程”纪要》，就十分清楚了。他们赤裸裸地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历次批判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政治运动，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咒骂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原则斗争，真是咬牙切齿，一副狰狞面目。这同当年帝、修、反和国内地、富、反、坏、右对我们党的攻击，同当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向党猖狂进攻时的反动谬论，完全是一个腔调。

林彪一伙用“极左思潮”所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文化大革命搞“乱”了，搞“糟”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描绘得一团糟，疯狂地加以打击和摧残。这是他们对这场革命的刻骨仇恨、极度恐惧和垂死挣扎的表现。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耻叛徒，是维护封、资、修旧秩序、旧事物，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他们的攻击从反面证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如果说“乱了套”的话，那就是乱了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陈规旧套，把刘少奇、林彪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乱了出来。这不正是好得很吗！一切革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只有林彪及其死党和他们所代表的国内外反动派，才发出痛心疾首的哀鸣。那些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还抱有怀疑态度的人们，林彪这个反面教员不是给你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吗？林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糟得很派”的头子，那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其根子就在林彪反党集团那里。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批判他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倒退，反对复辟。

林彪在拼命反对所谓“极左思潮”的同时，还别有用心地叫喊什么“坚(决)反右倾”。右得无可再右的家伙居然在那里喊什么“反右倾”，这是为什么呢？只要看一看林彪反党集团的行动，就可以得到答案。原来，同所谓“反极左”一样，所谓“反右倾”在林彪那里也有它特定的含义。这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



反党活动而使用的一个策略，就是说：谁执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反对或不赞成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谁坚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而抵制林彪的分裂阴谋，林彪就把谁叫做“右派”。人们记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粉碎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庐山的这场斗争，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威风。对此，林彪恨得咬牙切齿，破口大骂这是什么“右派势力抬头”。很显然，林彪是接过反右倾的革命口号，来反对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借“右倾”这顶帽子来攻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革命、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产党人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

什么是左，什么是极“左”，什么是右倾，这都是**有客观标准、阶级标准的**，是不容许林彪一伙肆意歪曲和抹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按照客观世界固有的规律性去促进它的发展，才是左的，才是革命的。只有“**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科学认识，以及根据这种科学认识而制定的路线，才是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推动历史前进的。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又被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是指导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路线。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这就是真正的左。一切机会主义路线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都是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幻想看作真理，或者把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一切顽固派反动派都是如此。林彪一伙就是这种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顽固派。他们的所谓“反极左”、“反右倾”，是用他们唯心论的反动世界观代替客观真理，是以复辟倒退为标准的。凡是同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愿望相反对的，不是“极左思潮”泛滥，就是“右派势力抬头”，通通都在要打倒之列。一套修正主义的谬论，一个大党阀、大军阀的法西斯面孔，在这里已经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政治上搞修正主义，组织上必然搞分裂主义，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路线的共同特



点。林彪的第四、第五个应当“注意”的要点，正是策划组织上的分裂主义。所谓“团结大多数立场漠〔模〕糊认识错误”的，就是要网罗反革命炮灰，拼凑反革命别动队。这同孔老二的“举逸民”是一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卑鄙的目的，他大搞资产阶级政客那一套：或者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思想腐蚀之；或者请客送礼，封官许愿，拉拢收买之；或者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之。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林彪以为玩弄这套把戏就可以“团结大多数”，这只不过是他的痴心妄想。全国人民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绝大多数人总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的，总是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的。跟着林彪搞分裂，开倒车，走回头路的人，只是极少数。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决定了他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是极端孤立的。不过，林彪这个反面教员也同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样，对那些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倒是一个极好的教训：**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是我们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也是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对此，林彪一是拉拢收买，一是分化瓦解。他的所谓“瓦解间接同盟军”，就是妄图破坏革命团结，分化革命力量。他为了分裂党、分裂干部队伍、分裂群众，极其恶毒地把我们革命队伍划分为“这股力量”和“那股力量”、“上层”和“下层”，妄图从中挑拨离间。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以他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搞分裂的阴谋是永远不能得逞的。过去九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想分裂我们的党，都没有分裂成。林彪想分裂我们党，也没有分裂成，最后以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而告终。历史已经证明，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全国人民之心不赞成分裂。通过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揭露和批判，我们党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力量更加发展壮大，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黑笔记里的最后一个要点“韬、讳〔晦〕”，也就是搞阴谋诡计。如果说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策略没有什么新鲜花样的话，那么，把这种见不得人的东西无



耻地作为路线、策略问题提出来，这也算是多少有一点“新意”吧。林彪这个钻进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很懂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的情况下，要实现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决不可能是那么随心所欲的，必须胸怀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志”，腹藏“随机应变”的“良谋”。当革命形势不容许他搞复辟阴谋时，要象范蠡那样，准备假投降，以欺骗党，欺骗人民，在“忍耐”中求得重生，以利将来的发展。就是说，表面装老实，在背地里狠狠磨他的剑，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林彪把革命队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比作“虎穴”，他是“勉从虎穴暂栖身”。这就自供他是埋在革命队伍里的定时炸弹，是反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

然而，阴谋总是阴谋，搞阴谋诡计的人总是不能得逞的，总是没有好下场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林彪是搞阴谋诡计起家也是搞阴谋诡计破产的。林彪在我们党内经营了几十年，九大以后更是变本加厉，阴谋愈来愈毒，诡计愈演愈烈。他竟然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反革命的武装政变，妄图谋害我们的伟大领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法西斯林家王朝。然而，林彪的阴谋诡计，并没有能够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给谋害掉，相反却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这叫做“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个黑笔记，是林彪的一套完整的反革命策略。从反革命的伪装到反革命的内容，从反革命的口号到反革命的措施，从反革命的政治主张到反革命的组织路线，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是一个阴谋家、复辟狂的黑计划！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自白书！林彪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的勃勃野心，阴险狡诈的虚伪面孔，都通通记在这个上面。林彪把它叫做“正确路线”，并冠以“中庸之道”，这就不仅揭穿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而且道破了“中庸之道”的反动性和虚伪性。

所谓“中庸之道”，其实是反革命的复辟之道，是阴谋家的骗人之道。在中国，从孔老二以来，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为了骗人，为了复辟，无不“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老牌反革命顽固派蒋介石，不久前，还在教他的儿子学习朱熹《中庸》序中提到的“道统与心法”。所谓“道统”者，孔孟的复辟之道也，“心法”者，在“中庸”的幌子下搞阴谋诡计也。



林彪胡说“中庸之道”“合理”，把它同他的反革命路线和策略连在一起，这就说明，他也同蒋介石一样，把“中庸之道”当作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诀窍”。他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孔孟之道的信徒，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

以“中庸”为掩护，干着卑鄙龌龊的反革命勾当，是一切反动派的特征，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这样干的。陈独秀标榜的所谓“折衷的中庸的路线”，王明鼓吹的敌对党派、敌对军队、敌对阶级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敬爱”、“相互礼让”的右倾投降主义，刘少奇宣扬的两条路线斗争要“适当”，要“反对‘过’与‘不及’”的谬论，都是一路货色，一副嘴脸。就连“左”倾机会主义的头子瞿秋白，当他跪倒在反动派的脚下自首叛变的时候，也没有忘记表白自己很懂得孔孟之道。这是因为，这一类叛徒也和孔老二一样，既要反革命，又害怕公开暴露反革命嘴脸，就只好去求助于江湖骗术，把自己打扮得好象不“左”不右，“不偏不倚”，唯一“正确”的样子，以便混水摸鱼，达到反革命的罪恶目的。林彪干的正是这套把戏。恩格斯早就对这类骗子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指出：“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林彪就是这种披着羊皮的豺狼，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凶恶敌人。我们对于这类骗子，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必须认真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以免上当受骗。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也是对林彪反革命路线和策略的彻底揭露和深刻批判。林彪一伙的这份反革命黑笔记，就是在“中庸之道”的幌子下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真实记录。然而，这记录虽然真实，却不是什么成功的记录，而是破产的记录。历史已经无情地嘲笑了这一伙反革命跳梁小丑。随着林彪仓惶逃命，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及其一整套反革命的策略，也象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



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头

严 章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健康地向前发展。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紧密联系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革命大批判的洪流，冲击着流毒两千多年的孔孟之道，清除着修正主义的毒素，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全国热气腾腾，形势一派大好。

一九六六年，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毛主席曾经向各级领导干部发出号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重新学习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认真总结和群众在一起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自觉地站在斗争的前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把批林批孔搞得更好，这是各级领导同志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各级领导同志要站在运动的前头，最重要的是要不断加深对批林批孔斗争的伟大意义的理解。

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



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以及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深入批林批孔，才能彻底揭发和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妄图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进一步查清其阴谋活动，肃清其流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各条战线上反击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才能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扫除障碍，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同时，通过对孔孟之道、对修正主义的深入批判，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将大大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在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个论断也适用于批林批孔运动。

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象现在这样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批林批孔斗争，只有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才能实现。广大群众奋起批林批孔，这是大好事。没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不发动亿万人民群众，形成巨大的力量，就不可能完全摧毁孔孟之道这个剥削阶级的顽固堡垒。群众发动得越广泛，对林彪和孔孟之道的批判越深入，这场斗争就进行得越彻底，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就越巩固。面对这种大好革命形势，真正的革命者无不欢欣鼓舞，只有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才感到极端恐惧。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到蒋介石集团都在恶毒攻击这场伟大的斗争，这正好说明批林批孔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使他们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企图破了产。

今年是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中国革命



的人们对“孔家店”的批判，已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尊孔与批孔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又是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要求我们批林批孔必须紧密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解决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为了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还必须做大量的资料研究工作，认真组织理论队伍，这些都需要我们下功夫，花气力。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掌握理论武器。历史上儒法两家的斗争，在不同时期内，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反动派和革新派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了懂得这个斗争的实质，还应当对比儒法两家的论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读一点法家的著作，这也有利于深入批孔。在克服困难、深入批林批孔方面，广大工农兵群众已经创造出了不少可贵的经验。只要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发扬知难而进的革命精神，坚持不懈，继续努力作战，就一定可以在批林继续深入的同时，在批孔方面也取得更大的成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领导干部曾经经历了一个由不理解到比较理解，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正确认识批林批孔斗争，在斗争中采取积极的态度，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应当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而决不当害怕群众。要欢迎广大群众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实际所提出的批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对于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为，要坚决反对。对阶级敌人的破坏，要提高警惕。让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



批林批孔联系实际的一个做法

河北饶阳县邹村大队党总支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充分发动群众，联系当地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深入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的反动谬论，收到较好的效果。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我们大队的群众和干部积极投入了战斗。一个老贫农把林彪、孔老二的反动谬论同当地阶级敌人的言论联系起来批判，使大家很受教育。这个老贫农在旧社会给地主扛了半辈子活，累得死去活来。他想不干，另找出路，地主却恶狠狠地说：“人的命，天造定，胡思乱想没有用。”企图用孔老二的“天命论”拴住他，继续压迫和剥削他。这个老贫农回顾了自己在旧社会的遭遇，联系地主阶级对农民在政治上的压迫，在经济上的剥削，在精神上的奴役，有力地批判了林彪所鼓吹的孔孟之道。他气愤地说：“他们讲天命，就是要维护和复辟反动统治，这个反动的精神枷锁一定要砸碎。”

这个老贫农的批判发言使我们认识到，联系当地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批林批孔，这是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于是我们发动群众揭发了当地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并把它同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加以对照。从群众揭发的材料来看，我们这里阶级敌人的言论，有不少能同林彪所鼓吹的孔孟之道对上号，说明他们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写下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我们这里的阶级敌人把“克己复礼，正心修身”八个字挂在墙上；林彪鼓吹“天命论”，我们这里的阶级敌人胡说什么“人的命，天造定”；林彪鼓吹“中庸之道”，“两斗皆仇，两和皆友”，我们这里的阶级敌人就宣扬“两和结一好”，“私情打不倒”。同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能对上号的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我们整理出来三十多条。把这些材料交给群众进行批判，有力地推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

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联系当地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批林批孔，能够进一步激



起广大群众的义愤，把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旧社会的悲惨生活，贫下中农体会最深。户户都有一本苦情帐，家家都有一部血泪史。我们大队三百多户贫下中农，解放前有二百六十多人常年外逃要饭，有四十多户卖儿卖女，妻离子散，有三十三人冻饿而死。地主的黑心肠，群众看得最清。当地的阶级敌人一开口，群众就知道他要放什么毒。例如，我们大队有一个地主分子说：“忍则忍，熬则熬，忍字倒比熬字高，熬字下边四点水，忍字心头一把刀。”群众通过他这个黑话，一下子就看清了他的反动嘴脸。他表面装得老实，心里却藏着刀。联系他的反动言论去批判林彪的“忍耐”和孔老二的“以屈求伸”，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们都是搞反革命两面派，表面以伪装出现，暗中窥测方向，寻找时机，妄想复辟变天。林彪、孔老二和我们大队的阶级敌人，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家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表示一定要把他们的反动谬论批深批透。村里有六十多个深受封建礼教迫害的老大娘，过去很少参加社会活动，现在也踊跃地参加了批林批孔。一个苦大仇深的贫农社员，带病坚持批林批孔，先后在公社、大队召开的批判会上作了九次发言。现在全大队男女老少一齐参战，田间地头，饭桌炕头，到处都摆开了批林批孔的战场。

联系当地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批林批孔，能够进一步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为什么林彪和孔老二都扛着“克己复礼”这面破旗？他们要“复”的又是什么“礼”？林彪和死了两千多年的孔老二怎么联到一起的？对于这些问题，批林批孔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不少人“捉摸不透”。后来，联系我们大队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一批判，这些问题就逐步地得到了解决。大家说：“孔老二、林彪和我们大队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是‘柳条串王八——一个枝上的货’。他们都是要倒退、要复辟、要变天的反动家伙。”我们大队有两个地主分子，对孔老二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家里贴着许多宣扬孔孟之道的对联和条幅，什么“克己复礼”呀，什么“百忍为高”啊，等等。这两个家伙，表面上装得象绵羊，暗地里却盘算着搞反攻倒算。其中有一个还记了一本“变天帐”，上面写着谁分了他的地，谁分了他的房，谁借了他的债，谁欠了他的粮，让他儿子“永远记住”，妄图有朝一日同我们“算帐”。广大群众以这两个反动家伙为活靶子，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极右实质。大家认识到，林彪扛起孔老二“克己复礼”



的破旗，就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让地主资产阶级重新骑在我们的头上，使我们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人们说：“这一下子可把‘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看清了。林彪鼓吹孔老二那一套，搞倒退，搞复辟，我们就要朝前走，反复辟！”

联系当地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批林批孔，能够进一步肃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流毒。孔孟之道是阶级敌人复辟旧制度的反动理论。林彪利用它作为反动的思想武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达到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大队的阶级敌人，也把孔孟之道当成他们的精神支柱，拚命鼓吹，毒害劳动人民，妄想变天。但是过去人们对这个问题并不是认识得很清楚。有的人认为：“没念过孔孟书，中不了孔孟毒，批判孔老二，和咱挂不上号。”即使听到有人讲孔孟的话，也不把它放在心上。个别念过孔孟书的人，也分不清是非，盲目地认为孔孟之道是“圣人留下来的”。在这次运动中，联系我们大队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批林批孔，才知道原来是“中毒不知毒，见毒不能肃”。就拿孔老二的“天命论”来说吧，由于地主资产阶级长期散布它，有的人就相信了什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鬼话。我们大队的一个地主分子，解放前曾经宣扬“骑马坐轿是命里福，推车挑担是命里苦”，解放后又胡说什么“人莫心高，自有生辰造化；命由天定，何需巧用机关”，其用心是很毒辣的。当他们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时，鼓吹“天命”是让大伙听任他们的摆布，不要起来造他们的反；当他们被打倒之后，又竭力鼓吹“天命”，是不让我们继续革命，以便他们搞复辟活动，把历史拉向后退。联系阶级敌人的这些反动言论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的“天命论”，使群众和干部受到很大教育。大家坚决表示：要坚持继续革命，不能听天由命。一个曾经念过孔孟书的社员气愤地说：“孔老二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圣人’，是咱们劳动人民的敌人，他的话是骗人的鬼话，害人的毒药。”广大群众和干部在联系当地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批林批孔的同时，还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分析了当地流传的“格言”、俗话和谚语，发现有不少是渗透着孔孟之道的反动思想的，大家决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提高认识，加以批判和抵制。

联系当地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批林批孔，能够更好地解决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大队是个集镇村，有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集



体生产发展缓慢。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刘少奇、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在阶级敌人身上。阶级敌人为了破坏集体生产，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极力宣扬“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煽动人们向资本主义道上走。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麻痹人们的革命斗志，还极力鼓吹孔孟的“中庸之道”。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联系当地阶级斗争的实际，很快就把这些问题的揭露出来了，广大群众和干部受到深刻教育，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原来资本主义思想比较严重的人，看到自己上了阶级敌人的当，表示今后要把劲用在发展集体生产上。这样，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加快了农业学大寨的步伐。

毛主席教导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联系当地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批林批孔，一定要严格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根据我们的体会，最要紧的是要充分发动群众，深入揭发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选准靶子。由于旧社会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得孔孟之道在农村影响很广，许多人受到它的毒害，决不能不加区别地把某些群众因受孔孟之道的影晌说过的一些错话，同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混淆起来。阶级敌人鼓吹孔孟之道，是出于他们反革命活动的需要，是他们阶级本性决定的。他们的反动言论，同人民群众的错误认识有本质的区别。不应该把人民群众说过的错话同林彪、孔老二的反革命谬论对照着去批。只有分清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联系当地阶级敌人的反动言论进行批判，目的是为了深入地批判孔孟之道，深入地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批林批孔运动推向前进。因此，不能只顾批判当地阶级敌人，而把林彪、孔老二放到一边。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揭发了当地阶级敌人大量的反动言论，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所以火力一下子就集中到他们的身上。当时虽然批判的火力很猛，但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却批判得不够。我们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注意了掌握批林批孔这个斗争大方向，效果就好得多了。



深批“克己复礼”

广东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番茅大队党支部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红旗公社番茅大队紧密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使广大群众和干部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激起了我们黎族人民的极大愤慨。我们党支部引导群众把解放前的悲惨生活和今天的美好生活相对比，使大家看清了林彪鼓吹“克己复礼”的罪恶目的，认清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我们番茅黎寨，解放前是个半奴隶制半封建制的地区，落后的“合亩制”长期存在。那时候，山是“奥雅”“龙公”的山，地是“奥雅”“龙公”的地。全寨黎族劳动人民三百二十二人，有二百九十五人受着“奥雅”“龙公”的残酷剥削。有的沦为“工仔”，毫无人身自由，完全是个奴隶；有的沦为“龙仔”，是个半奴隶。我们黎族劳动人民整年累月吃野果，穿树皮，住草寮，黑夜燃山竹照明，冬天靠烤火取暖。“奥雅”“龙公”还勾结国民党反动派，打家劫舍，勒索钱财，常常捏造各种罪名，把劳动人民活活绞死、斩死、浸死、坑死。有许多人被逼得逃到深山密林，住进山洞，同野兽为邻。仅一九四三年这一年，番茅被屠杀和被饿死的就有一百四十三人，被迫外逃的有一百零八人。“五指山水滚滚流，流不尽黎家苦和愁；人说世间牛马苦，黎家比不上马和牛。”这首歌谣，正是解放前黎族人民奴隶生活的真实写照。

轰隆一声春雷响，五指山顶红旗扬。一九五〇年，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派来亲人解放军，配合岛上的革命队伍，解放了海南。从此，我们黎族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享有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废除了半奴隶制和半封建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生



产和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生产从靠天吃饭变为旱涝保收，生产技术从刀耕火种、牛踩田、手捻稻变成半机械化。现在，社员们住上了新瓦房，用上了电灯，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许多社员家中有了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大小钟表等祖祖辈辈做梦也难得看到的東西。解放前，番茅没有一个人识字，靠结绳记事。现在全大队有中小學生近二百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还有了大学生。正是：红太阳把五指山照亮，黎族人民得解放，黎家日子比花红，黎家生活比茶香！

广大社员回想旧社会的苦，对比新社会的甜，都说：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命根子，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要复辟资本主义，妄图逼我们再去当牛做马，他是各族人民的死敌。六十多岁的老贫农王老律说：旧社会我家三代给“奥雅”当“工仔”，父母被折磨死，妻子被“奥雅”用火红的铁条活活烫死，使我家破人亡。新社会我翻了身，入了党，两个孩子，一个当教师，一个上中学。一家吃饱穿暖，生活过得比蜜甜。林彪及其死党叫嚷“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要使我们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他们的心比毒蛇还毒，我们一定要和他们斗到底，决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通过回忆对比，批判“克己复礼”，激起了黎族人民对林彪的无比仇恨，广大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

在旧社会，黎族剥削阶级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大肆散布迷信思想。遇到自然灾害和疾病死亡，他们都要强迫和诱骗劳动人民拜天祭地，求神弄鬼。搞农业生产也要选择吉日良辰。解放后，许多陋俗被革命人民破除了，许多迷信活动被制止了，但阶级敌人还经常暗中散布反动迷信思想，挑拨民族关系。他们胡说什么“好歹由天，生死由鬼”，“山鸡孵不出凤凰，穷鬼变不了富翁”，“本地的山鸟不吃外地的树籽，黎人的土地长不出汉人的庄稼”，妄图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这些谬论的影响下，有的干部和社员存在着“听天由命”的思想，对资本主义倾向不去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反复批判孔老二和林彪所鼓吹的“天命论”。我们引导大家回顾了番茅大队的斗争历史，二十多年来，不靠天，不信鬼神，而是依靠劳动人民自己的力量，在斗争中前进的。合作化时期，我们建立了五指山区第一个合作社。那时，刘少奇大砍合作社，队里的阶级敌人也煽动社员拉回耕牛闹退社，广大群众坚持斗争，顶住了这股妖风。一九六二



年，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当地的阶级敌人也说“集体化不如合亩制好”，煽动一些人闹分田到户，群众又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一九六四年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狠抓了阶级斗争，破除信天、信命、信鬼神的旧思想，大力兴修水利，实行科学种田，使粮食亩产增加到一千五百多斤。多种经营也迅速发展，猪、牛平均每户三点六头，种植橡胶五百二十二亩。近两年来还购买了五部手扶拖拉机和碾米机、电动机、粉碎机等农具，全大队集体家当达六十一万多元。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大队对国家贡献也逐步增大。我们大队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事实使大家认识到，社会主义是斗出来的，由穷变富不靠天命，而是靠革命。我们大队的一些成就，都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大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取得的。坚持毛主席所倡导的斗争哲学，鸡毛能上天，山鸡也能孵出金凤凰。林彪宣扬孔老二的“天命论”，同黎族的“奥雅”“龙公”唱一个调子，都是为了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以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肃清“天命论”的流毒，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毫不留情地同阶级敌人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资本主义倾向斗，彻底粉碎林彪“克己复礼”的阴谋。

在群众和干部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的基础上，我们紧密联系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还是削弱和瓦解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组织社员揭露和打击一小撮宣扬“合亩制好”、妄图复辟变天的阶级敌人，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使群众和干部分清了路线是非，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黎族地区，有些人由于旧社会长期住在深山老林，过着“山鸡讨食山过山”的游居生活，单干思想较为严重，加上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阶级敌人的煽动，经常放下集体生产，私自上山打猎，砍柴砍竹，开私荒。过去有些干部对此认识不足，认为靠山吃山，上山搞点个人收入，是黎家的老习惯，不算什么资本主义倾向，因而听之任之。这次联系实际批判“克己复礼”，我们就这个问题组织社员进行讨论。去年，有个生产队，由于有些社员上山搞个人副业，插秧误了季节，加上田间管理不好，造成粮食减产，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讨论中摆出这样的事实，对大家教育很深。大家认识到：黎族人民在旧社会个人上山搞生



产，是为了摆脱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在新社会，如果离开两条道路斗争去强调黎族习惯，任凭个人脱离集体去单干，那就必然要损害、削弱集体经济，这正中林彪“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诡计。大家表示，要彻底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煽动资本主义妖风的阶级敌人，克服“重个人、轻集体”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积极搞好集体生产。

联系实际批判“克己复礼”，使我们看到，不仅社员个人有走哪条道路的问题，集体经济也有个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去年冬天，有个生产队把大量番薯拿到集市上去卖高价，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倾向，但也有人说是为集体多卖几个钱，不算资本主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联系这个问题，组织干部、社员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并开展了靠卖高价为集体多挣钱算不算资本主义的讨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具体分析，使大家懂得：为集体增加收入，应当是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如果不顾国家利益，只为小集体谋私利，就会滑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对于把产品卖给谁、卖什么价钱这个问题，必须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自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各种农副产品出售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通过批判“克己复礼”，广大群众和干部提高了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自觉性，整个大队出现了一片大好形势。干部带头学、带头批、带头干，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领群众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今年以来，大队干部平均每人每月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达二十多天，大小队干部每人搞一亩试验田。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春耕生产搞得热气腾腾。早稻插秧一结束，就开山劈岭，新造梯田一百多亩，春种作物面积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

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批林批孔运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是一次生动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只要我们抓住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个要害，紧密联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反复批判，反复讨论，就一定能够加深广大群众和干部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推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我们相信，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这个深山黎寨，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一定会日新月异，更加欣欣向荣。



团结战斗 批林批孔

天津动力机厂工人 孟庆瑞

在批林批孔斗争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满怀革命豪情，迎来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在欢庆这个伟大节日的时候，我们重温毛主席关于加强革命团结的指示，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实现革命大联合的经验，更加深切地感到加强革命大团结的重要意义。

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这些指示，指明了我们胜利前进的道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应当很好地领会并执行这些指示。批林批孔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上层建筑领域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要争取这场斗争的胜利，依靠少数人不行，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和革命人民，**加强革命团结**，共同对敌。我们常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不**握紧拳头**哪来力量？不团结哪来胜利？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革命事业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团结战斗的结果**。离开正确路线的指引，没有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要取得任何胜利都是不可能的。只有亿万群众紧密地团结起来，使批林批孔形成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妄图“克己复礼”、篡党复辟的反革命罪行，在各条战线特别是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肃清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流毒，批判那股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思潮，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为了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分裂主义。要搞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搞分裂，正是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为阴谋篡党夺权作组织准备；他们煽阴风，点鬼火，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妄图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革命队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必须彻底批判他们制造分裂的各种反革命谬论，彻底清算他们的反革命罪行，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革命人民的团结，全党全军的团结。

实践证明，什么时候革命团结搞得越好，工人阶级的力量占主导地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能贯彻执行，革命就胜利，生产也搞得越好。就拿我们厂来说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广大工人、干部和其他革命群众团结一致，因而革命步步深入，生产蓬勃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八年，柴油机的总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九届二中全会后的三年，柴油机的总产量，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七。近三年，全厂实现了一千一百多项技术革新、技术改造项目，试制成功了多种新产品。这些成绩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厂职工齐心协力，鼓足干劲才取得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牢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革命团结，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宝贵经验，象爱护眼珠一样，维护和加强革命的大团结，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坚持在本地区、在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既当革命的先锋，又做生产的闯将，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夺取批林批孔的新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

团结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阶级的团结，就没有阶级的解放。加强团结，首先要加强咱们工人阶级的内部团结。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



级，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才能把一切革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主力军作用，保证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党中央的每一个战斗号令，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咱们每个工人同志都要自觉地维护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战斗，矛头直指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人心齐，泰山移。咱们工人阶级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无往而不胜。正象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的那样，团结是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

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对立的阶级之间才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今天，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才是主要的矛盾。当然，工人阶级内部会有资产阶级影响，但只要采取正确方法去解决，就更能促进团结。咱们工人，都是同呼吸、共命运的阶级兄弟。在过去，咱们同受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有着共同的仇和恨。在党的领导下，咱们共同战斗，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又一起翻身做了主人。当前，咱们共同担负着批林批孔的战斗任务。彻底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痛击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革命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的反动思潮，这是咱们整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一致的方向，共同的愿望。如果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整个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都要重新陷入苦难的深渊，想到这点，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团结起来，攥成一个拳头，狠狠地打击敌人呢？

无产阶级肩负着消灭剥削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的历史使命。我们不仅要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而且要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毛主席教导我们：“无



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们应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阶级的重任。我们要认真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区别各种情况，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团结他们一道前进，而不是嫌弃他们。团结大多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能不能分清敌我的问题。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矛头始终对准林彪和孔孟之道，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切赞成和拥护社会主义革命，赞成和拥护批林批孔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和朋友，我们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把他们团结起来。这样，才能够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团结起来，壮大革命的力量，我们的事情才办得好。

我们讲团结，是讲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就达不到这样的团结。我们只有“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才能达到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革命需要团结，革命也能够促进团结。列宁说得好：“革命能迅速地把人们团结起来，能迅速地使人们受到启发。革命每向前发展一步都能够唤醒群众”。事实正是这样。每一次深刻的革命运动，都有力地促进了革命队伍的团结。批林批孔也必然是这样。只要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牢牢掌握批林批孔的大方向，就能在批判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的过程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从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加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团结，加强整个革命队伍的团结。

今天的胜利，是我们昨天团结战斗的果实；明天的胜利，还要靠我们继续团结战斗去争取。让我们高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步调一致地去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认真学习 知难而进

上海工程机械厂工人 虞和康

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工人阶级应当在这场斗争中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根据我自己的体会，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要经过不断努力的。

我们刚投入批林批孔斗争的时候，碰到的困难可大啦！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尽是些古人古事古文，满篇是复古倒退，“之乎者也”，一股酸溜溜的泡菜味儿。要剥去它的画皮，硬是得坐下来读一点历史，看一点古文，这可实在是够伤脑筋的。

但是，运动一深入发展，我就越来越觉得自己原来的认识太跟不上形势的需要了。实践证明：批林批孔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要深入批林，就必须深入批孔。林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他为什么那么积极地指使一些人替他收集孔孟的言论，东拼西凑地贴在他的黑窝子、写在他的黑笔记里呢？说到底，这完全是由于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最适宜于他用来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在斗争中，我认真地阅读了毛主席的著作，认识到，我党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象陈独秀、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统统都是尊孔分子。他们作为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根本拿不出象样的理论，只能拜倒在孔老二的脚下，拿孔孟之道来和马列主义相对抗。毛主席在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作斗争的时候，每一次都深刻地批判了孔孟之道，从政治上理论上对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和阶级的、历史的根源进行了彻底清算。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毛主席为了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判了孔家店



二老板孟轲所鼓吹的“温良恭俭让”这套反动的儒家理论，批判了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中庸之道”。在抗日战争期间，毛主席为了批判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整风运动中揭示了党八股和老八股的关系，指出只有对封建的老八股开展深入的批判，才能对党八股进行彻底的批判，使全党的路线斗争觉悟水平大大提高一步。今天，我们同林彪一类骗子之间进行的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同样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根据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要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必须彻底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对全党进行一次极其深刻的反修防修教育。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和小组内的工人同志一起，除了学习中央规定的批林批孔文件以外，还搜集了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儒家法家争论的文章和资料，硬着头皮看下去，一遍看不懂看两遍，两遍看不懂看三遍。我以前没有读过孔孟的书，总认为这些“圣人”们写的书大概讲的都是很高深、很神秘的学问。最近以来，我看了报纸上发表的《论语》批注、《孟子》批注，把原文、注解和批判分析文章结合起来看，还翻了几本历史书，着重了解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从中研究当时的阶级关系，这样，就基本上弄清了孔孟之流的主要的反动论点。原来，孔孟之道象绣花枕头，外面好看，里面是一包草。孔丘和孟轲都是极端仇视革命的顽固派。他们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变革，鼓吹复辟倒退，妄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后转。孔丘和林彪都鼓吹“复礼”即复辟的理论，都是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我们要使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不变颜色，就必须把批林批孔的斗争深入进行下去。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认真刻苦地读马列的书，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工人阶级完全能够挑起批林批孔的重担，在斗争中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在学习和批判中，我们着重抓住问题的本质，坚决不搞烦琐哲学，不在那些



枝枝节节的问题上钻牛角尖。比如，孔老二讲“仁者爱人”，孟轲讲“仁政”，以前我只知道是谎言，但要我说道理就说不清了。最近我重新学习了《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的书以及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将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于国家的学说，联系我们工人的切身体会来进行分析，就清楚地懂得了孔孟的所谓“爱人”、“仁政”之类鬼话的反动实质。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不可能有什么统一的人类之爱。资产阶级决不会“爱”工人阶级，我们工人阶级也决不会去“爱”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决不能对反动派施“仁政”，而是必须对他们实行专政。不然的话，我们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批林批孔斗争的深入，进一步推动了我厂广大工人和干部的学习运动深入发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厂的工人一直坚持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我们又进一步把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和批林批孔的斗争实际结合起来，仔细研究和分析孔老二宣扬的是什么观点？林彪为什么要鼓吹这些反动观点？历来修正主义者为什么都要鼓吹这一类反动观点？马克思、列宁、毛主席是怎样批判这些反动观点的？在现实斗争中这些反动观点的余毒究竟怎么样？这样把学、批、联三者结合起来，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增强识别能力，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历史的进步，什么是历史的反动，不再上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的当。事实证明，只要我们积极投入批林批孔的斗争，刻苦攻读，深入批判，就一定可以更多更好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

看书学习是一项艰苦的劳动，需要有顽强的毅力去克服困难。但是，困难吓不倒英雄汉。我们这一代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一定要坚决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做到知难而进，批林批孔打先锋，看书学习当闯将，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 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电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四月十日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发言全文如下：

主席先生：

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在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布迈丁主席的倡议下，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下，顺利召开了。联合国成立二十九年来，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政府热烈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国政府希望会议将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维护民族经济权益，为促进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当前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非常有利。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国际关系激烈变化。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状况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个“乱”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现。它加剧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瓦解和没落，促进了新生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和壮大。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



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

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象葡萄牙这样的国家，甚至还在继续野蛮的殖民统治。这种情况应当结束。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



的主要力量。

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什么“均衡裁军”，什么“限制战略核武器”，到头来都是一句空话，实际上，既没有“均衡”，也不可能“限制”。它们可能达成某些协议，但是这种协议只不过是表面的和骗人的东西，骨子里是为了进行更大、更剧烈的争夺。超级大国的争夺遍及全球。欧洲是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处在长期紧张对峙之中。它们在中东、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角逐正在加剧。它们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它们天天讲“缓和”，实际上天天在搞紧张。它们争夺到那里，那里就出现动乱。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安宁，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不是它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阐明的那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继续前进。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冲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和“不战不和”的局面，取得了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巨大胜利。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斗争深入发展。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光荣诞生。莫三鼻给、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南非、南罗白人种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拉丁美洲国家带头兴起的维护海洋权的斗争，已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第十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相互支援、同仇敌忾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前赴后继的斗争，戳穿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



国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沉重地打击了它们妄图统治世界的野心。

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激起了第二世界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这些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威胁、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日益发展。它们的斗争，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无数事实说明，一切过高估计两霸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主席先生：

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大家知道，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亚非拉人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奴役和掠夺。它们利用当地人民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推行畸形的单一经济，攫取廉价的农矿产品，倾销自己的工业产品，扼杀民族工业，进行不等价交换，榨取超额利润。发达国家的富和发展中国家的穷，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政策造成的结果。

许多亚非拉国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旧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采用了新殖民主义形式，变本加厉地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它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通过“跨国公司”这样的国际垄断组织，建立“国中之国”，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在政治上进行干涉。它们利用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提高它们自己的产品的出口价格，压低发展中国家原料价格，牟取暴利。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它们相互间竞争的激化，它们还用转嫁经济、货币危机的办法，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



应该指出的是，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超级大国在进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掠夺方面，并不逊色。它在自己那个“大家庭”中以所谓“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的名义，采用高压手段，榨取超额利润，其损人利己的程度，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也不常见。它打着“援助”、“支持”的旗号，在一些国家中搞的联合企业，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的翻版。它惯于利用陈旧设备和报废武器，标高价格，换取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原料和农产品。它大做军火买卖，成了世界军火商。它经常乘人之危，进行逼债。在这次中东战争中，它用贩卖军火赚取大量外汇，用低价买进阿拉伯石油，再用高价出售，转瞬之间大发横财。它还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是国际财产，它竟然说，“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业对这些资源的利用能力”。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理论。它比另一个超级大国所标榜的名为“相互依存”，实则维持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论调，更加露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真诚地支援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帮助人家发展民族经济，而这个超级大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更加证明它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剥削，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帝国主义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发展中国家打破它们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掠夺，扫除这些障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国家的经济资源和其他权益，这是完全正当的。

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阻止不了发展中国家在争取经济解放的道路上胜利前进。最近在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用石油作为武器，狠狠地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这件事做得好，做得对。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帝斗争中的一个创举。它大长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它冲破了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垄断国际经济的局面，也充分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进行战斗的巨大威力。既然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可以勾结在一起，任意操纵市场，严重地危害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那么发展中国家又为什么不可以团结起来，冲破帝国主义的垄断，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呢？石油斗争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在石油斗争上已经做到的事情，在其他原料问题上也应该、而且能够做到。



还应当指出：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超级大国为了扩军备战、争霸世界，必然要疯狂地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发展中国家掌握和保护自己的资源，不仅对于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反对超级大国扩军备战、制止它们发动侵略战争，也是必要的。

主席先生：

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还必须巩固这个独立，因为在国内还存在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危险。巩固政治独立必须经历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

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发展经济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只要各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在工农业现代化方面逐步地达到我们的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生产水平。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所散布的一切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论调，都是毫无根据的，别有用心。

我们说的自力更生，就是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努力增加粮食生产，有计划地、逐步地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不是脱离本国实际，而是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区别不同情况，确定各国自己的自力更生的途径。在现阶段，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民族经济，首先必须掌握自己的自然资源，并且逐步地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原料生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较大的比重。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把原料的生产、使用、销售、储存、运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平等的贸易关系，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原料，换取较多的为它们发展工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产品，它们就有可能逐步解决面临的困难，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铺平道路。

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有着共同的遭遇,今天都面临着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发展民族经济,建设各自国家的共同任务。我们有一切理由进一步团结起来,而没有任何理由互相疏远。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正在利用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些暂时分歧,进行挑拨分化,破坏团结,以达到它们继续操纵、控制和掠夺的目的。我们应当保持充分警惕。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些分歧,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在有关发展中国家内部,通过协商,求得解决。在石油问题上,有关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做出积极努力,寻求适当途径,谋求问题的合理解决,对此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应该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也应该互相帮助。我们之间的合作是真正平等的合作,是具有广阔的前景的。

主席先生:

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

我们主张,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一切外国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进行控制和管理,直到把它们收归国有。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各别地或集体地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我们支持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享有参与有关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一切决定的充分权利。

我们主张,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它们的原料、初级产品、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扩大



销售市场，确定公正有利的价格等迫切要求。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各种原料输出组织，进行反殖、反帝、反霸的联合斗争。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当是无息或低息的，必要时可以延期还本付息，甚至减免债务负担。我们反对假借援助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高利盘剥和敲诈勒索。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派往受援国的专家和人员有责任向受援国人民认真传授技术，尊重受援国的法令和民族习惯，而不应当要求特殊待遇，更不得进行非法活动。

主席先生：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过去几年内，在中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主席先生：

历史在斗争中发展，世界在动荡中前进。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困难重重，日益衰败没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相信，只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增产节约广积粮

洪 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开展，农业连年丰收。一九七三年全国粮食产量超过了大丰收的一九七一年，创造了新的水平。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国家粮食储备逐步增加，许多地方做到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我国的粮食形势一派大好。

形势越好，我们越要谦虚谨慎，决不能忘乎所以，麻痹松懈。我们虽然有了一定的粮食储备，但同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还有很大距离。继续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努力增加粮食储备，仍然是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积极增加国家粮食储备，逐步建立生产队集体储备和社员家庭储备，广积粮，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粮食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又是重要的战备物资。备战、备荒、安排人民生活，都离不开粮食。在当前大好形势下，我们不能忘记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一旦遇到战争，才能保证军需民食，夺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只有在大力发展生产和厉行节约的基础上，努力增加粮食储备，才能够更好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广大农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坚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



斗，夺得了农业的好收成，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农业的防灾抗灾能力大大增强。但是自然灾害还不能完全避免。二十多年来，大多数年份粮食是丰收的，也有一些年份是歉收的；就是在丰收之年，也有一些地区受灾。因此，我们必须从全局出发，从长远着想，继续努力，做好工作，逐步实现广积粮，为加强备战备荒的力量、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作出更大的贡献。

阶级敌人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是要竭力反对广积粮。叛徒、卖国贼林彪污蔑我们“‘国富’民穷”、“农民缺吃少穿”，其险恶用心就是妄图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煽动分光吃光，破坏粮食储备，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经常用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方法，千方百计挖社会主义墙脚。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用旧社会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不暖、一遇灾年卖儿卖女、逃荒要饭的悲惨遭遇，对比新社会生活越过越好、即使遇到灾年吃饭也有保障的事实，批判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谬论和罪行，揭露、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对广积粮重大意义的认识。广大农民丰收不忘支援国家，积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计划；丰收不忘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努力建立集体粮食储备；丰收不忘勤俭持家，节约储粮。城市人民也积极节约用粮，备战备荒。经验证明，搞好广积粮，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抓好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为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努力增加粮食储备。

生产是基础。要逐步实现广积粮，就必须鼓足革命干劲，加速农业发展的步伐。只有生产发展了，粮食增多了，广积粮才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应当看到，我国农业生产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地区之间发展是很不平衡的。许多地区生产条件基本相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却相差很多。特别是北方的许多地区，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耕地面积比较多，增产的潜力更大一些。冀、鲁、豫三省和苏北、皖北地区，过去旱涝灾害严重，粮食长期不能自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这些地区的广



大农民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治山治水，改造自然，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已经做到粮食自给有余，并出现了不少粮食平均亩产超《纲要》的县。这充分说明，低产面貌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即使粮食产量比较高的地区，只要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也完全可以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决不能认为“潜力不大，贡献不小”而停步不前。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将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将更加巩固，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将进一步提高。只要我们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用革命统帅生产，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断总结执行农业“八字宪法”的经验，加强科学种田，并对于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采取有力的预防措施，就一定可以使农业生产有更大的发展。现在粮食有余的地区，就能作出更大的贡献；粮食已经自给的地区，就能做到有余；粮食暂时不足的地区，就能尽快地做到自给，并有结余；大城市和工业比重较大的地区，就可提高粮食自给水平，为逐步实现广积粮创造更好的条件。

逐步增加粮食储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现在我国粮食生产水平还是不高的，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对粮食的需要将日益增多。只有人人注意节约，处处注意节约，才能较快地实现广积粮。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我们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过去，我们在粮食不宽裕的情况下，依靠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节约用粮，积累起了一定的粮食储备。今后，我们要广积粮，必须继续认真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社的方针，树立长期节约粮食的思想，精打细算过日子。不能认为粮食丰收了，吃粮就可以随便点，用粮就可以放宽点。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如果大家都随便点、放宽点，多吃多用的粮食就不是一点的问题，而是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斤粮食的问题。相反，大家都注意节约，全国一年就可以节余一大批粮食，用来增加储备。“**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如果因为丰收就不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讲排场，摆阔气，不仅会浪费大量宝贵的粮食，更重要的是可能丢掉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我们要认识到，是勤俭节约，还是铺



张浪费，这决不是生活小事，而是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问题。我们不同那种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思想斗，就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要十分珍惜广大农民用辛勤劳动换来的丰收成果，都要发扬我国劳动人民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婚丧喜庆、修房盖屋，都要提倡移风易俗，新事新办，反对大吃大喝，挥霍浪费。一定要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现在要这样做，将来粮食更多了，也要这样做。在任何时候，都要丰年想到歉年，平时想到战时，高产稳产地区想到因灾歉收的地区，瞻前顾后，精打细算，细水长流。

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必须从一开始就抓紧。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粮食收获季节，如果不从全年着想，统筹兼顾，计划用粮，而是看到一时粮食多了，便大手大脚，多吃多用，等到既成事实，再抓已经晚了，结果就会先吃后空，给后一段的生活安排造成困难，影响粮食的储备，增加国家供应的负担。因此，思想麻痹不得，工作放松不得，节约忘记不得，那种认为新粮刚入仓，放松一点关系不大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我们要做到精收细打，丰产丰收。从粮食收下来，就抓紧节约用粮。要加强粮食管理，既保证正常供应，切实安排好城乡人民生活，又堵塞漏洞。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学校、农场都要自觉遵守国家粮食政策，坚决反对浪费。在安排各项建设事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农业可能提供商品粮的情况。工业用粮要积极从野生淀粉和其他方面开辟来源。只要各方面都自始至终地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我们就能逐步增加粮食储备。

广积粮，是一件关系到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是一项广泛的群众工作，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才能搞好。经验证明，凡是领导重视、宣传工作搞得比较深入、群众发动比较充分的地方，即使条件比较差，粮食储备也增加得比较快，管理也比较好。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宣传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讲明储备粮食的重要意义。我们要继续抓好批林批孔这件头等大事，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必须把粮食抓紧**”的指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实现广积粮而奋斗。



抓 革 命 促 生 产

——沈阳第一机床厂的调查报告

沈阳第一机床厂的工人和干部，紧紧抓住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深入进行大批判，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各级干部同群众一道学习，一道批判，全厂呈现一派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工人群众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也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许多老工人语重心长地对干部说：“你们抓革命要全心全意，促生产也要踏踏实实啊！”厂党委组织全厂干部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使大家认识到，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斗争必将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迅猛发展。各级干部必须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用革命统帅生产，因势利导，更好地组织和发挥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夺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一个企业能不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生产能不能发展，根本问题是看党委执行什么路线。这个厂党委在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时，紧密结合本厂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影响，组织工人和干部进行揭露、批判，提高了大家对批林批孔运动伟大意义的认识，解决了干部中的一些糊涂思想。大家在回顾中清楚地看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鞍钢宪法”得到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全厂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生产连续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一九七二年后有一



段时间，由于厂党委一度在某些问题上偏离了党的基本路线，错误地把林彪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当成极“左”来批，结果越批越转向，甚至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东西又捡回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革命和生产都受到了影响。

总结这段历史教训，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在工厂企业里，两条办企业路线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束缚工人的手脚，腐蚀工人的思想，破坏工人队伍的团结。坚持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工厂就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生产就发展；放松了对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批判和斗争，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生产就遭受损失。因此，任何时候都应该把解决路线问题放在首要地位，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

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各级干部积极地和工人群众一起深入进行批林批孔。党委领导成员也分别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联系自己的思想，同工人一起批判，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找到了阻碍生产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个厂的产品质量问题，一直是近几年来生产中压力最大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过去，厂里有的领导同志，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片面强调质量检查机构和制度的作用，说什么：“卡住，卡得他们吱哇乱叫，质量就上来了”。结果，管理机构越搞越大，某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又恢复了，群众参加管理有名无实。这次工人在大字报中问道：“产品质量是靠我们工人努力干上去，还是靠制度卡上去？是靠群众，还是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把关？”这使党委很受教育。他们认识到，是不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是两条办企业路线斗争的焦点。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资产阶级路线，本质上是不相信工人群众的；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工人阶级是最有远见、最革命的阶级，工人群众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几年来产品质量上得不快，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没有做到充分相信和依靠全厂广大工人群众。在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基础上，厂党委放手发动群众，把产品质量问题交给群众，并总结推广了一些车间充分发动工



人参加管理，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的经验。工人群众对革命事业更加负责，他们自动扩大了自检和互检的范围，优质高产标兵越来越多。几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产品质量问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得到了解决，成品精度合格率由百分之七十九达到百分之百。

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在工厂企业里，机器设备是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只有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工人群众中蕴藏着的无穷的力量和智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批林批孔中，工人群众受到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个厂把学习和批判紧密结合起来，组织工人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全厂建立了三百多个业余理论学习小组，参加的人数已达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在学习中，工人群众广泛开展了忆苦思甜活动，用亲身的体会，深入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加工车间一个老工人，在旧社会从十四岁就给地主当长工，一直到解放。在批林批孔大会上，他联系自己解放前受尽反动统治阶级压榨的苦难生活，愤怒地说：“旧社会的苦我们受够了，林彪妄想变天，把我们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去，这是白日做梦，办不到！”广大工人把激发出来的革命热情投入到生产中去，很快形成了生产和技术革新热潮。装配车间十多年来装配床头箱与底座，接触面完全靠手工刮研，劳动强度大，效率低，一直没有找到解决的好办法。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工人们和技术人员一起，总结了多年实践经验，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搞了一种专用组合磨床，“以磨代刮”，提高效率十二倍。全厂今年第一季度实现技术革新八十五项，其中重大革新十八项，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

为了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增进工人阶级队伍内部的团结，这个厂党委在运动中，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林彪反党集团以及他们所鼓吹的孔孟之道，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他们坚持了这样两条原则：一是，联系实际，一定要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纠缠某些



小是小非和具体问题。二是,把解决党委领导班子中办企业路线的问题,其中包括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作为工厂批林批孔的重点。党委领导成员对群众的批评,满腔热情地欢迎。当群众对党委的意见出现分歧时,党委领导不是支持一些人、压制另一些人,而是让群众把不同意见发表出来,通过学习和讨论,逐步求得解决。厂党委还组织工人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教导,工人之间、班组之间的团结不断加强,在批林批孔中并肩战斗,在生产中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大大发扬。过去精密丝杠车床车间装配工段有些工人不大团结,使生产受到影响。通过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破坏党的团结、阴谋分裂工人队伍的罪行,大家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团结是革命步步深入、生产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他们消除了思想隔阂,工作中主动配合,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这个厂的大型车床车间、中型车床车间、液压件车间和精密丝杠车床车间,都是自己投料、自己出成品的“封闭式”车间,过去在生产上同其它车间很少往来。现在工人们改变了这种状况,一个车间有困难大家都去支援,团结协作蔚然成风。

党委的领导成员在实践中体会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必须认真地对运动和生产进行统筹安排,才能更好地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组织起来。他们在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运动的同时,对于生产也安排足够的时间进行集体讨论,并且按照常委的分工,认真组织实施。对于生产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发动群众讨论解决。工人们坚持业余闹革命,争分夺秒,团结战斗,今年第一季度全厂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其中国家急需的精密机床和大型机床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自己设计的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车床开始成批投入生产。他们决心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充分发挥骨干企业的作用,为支援国家建设和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作出更大贡献。

《辽宁日报》记者



依靠群众搞好铁路运输

山海关铁路机务段党委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铁路交通运输事业也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们山海关机务段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依靠工人阶级，认真落实“鞍钢宪法”，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抓革命、促生产，在完成运输生产任务的同时，只用了两年零四个月时间，就实现了从蒸汽机务段向内燃机务段的过渡。从一九六八年到今年第一季度，我段用内燃机车牵引列车已经安全运行三千三百多万公里，列车出发正点率达到百分之百，运行正点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六，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成本逐年降低，一九七三年的上缴利润比文化大革命前最高年份还高三倍多。几年来，不仅年年超额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而且还帮助了兄弟段的运输，支援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职工回顾本段的巨大变化，愤怒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纲领，用铁的事实痛斥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反动思潮。

交通运输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行官”，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铁路由蒸汽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对进一步改善铁路运输条件，适应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是全国铁路第一个由蒸汽向内燃过渡的机务段，开始曾经碰到一系列问题。靠谁来搞过渡；设备从哪里来；搞蒸汽机车的不懂内燃机车技术怎么办；是在完成运输生产任务同时搞过渡，还是交出运输任务，等过渡好了再搞运输？在这些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正是由于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使我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胜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开始向内燃机务段过渡时，有人按修正主义洋教条提出了一个方案，规定内燃机车的驾驶和维修人员，必须要在三十五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而且还要



学习两年理论，实习半年，然后才能工作。照这个规定办，我们段的人员就要大换班，特别是原来的骨干力量老工人都得调走。这样一来，原来担负的运输任务都得交出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广大工人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他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它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工人们说：“内燃机车是我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兄弟厂能造，我们就能开、能修。国民经济迅速发展，铁路运输要当好先行官。我们宁为革命挑重担，决不偷懒图清闲。”经过斗争，正确的思想战胜了错误思想，旧的方案被否决，一个新的方案诞生了。这就是依靠原有人员，两副重担一肩挑，既要完成运输任务，又要建设内燃机务段。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内燃机车比起蒸汽机车，技术是复杂一些，然而技术是由人掌握的，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面前，没有攻不破的难关。有人认为：“老工人年龄大，文化低，玩不转内燃机车”。事实驳斥了这种论调。这些在旧社会饱尝阶级苦，解放后翻身作了主人的老工人，有强烈的当家作主的责任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既是政治革命的先锋，又是技术革命的骨干。有一位老司机只念过三年书，但他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刻苦钻研，很快就掌握了驾驶内燃机车的技术，并且总结出一套保养内燃机车的办法。在很短时间内，全段原有机车乘务员和检修工人，都掌握了内燃机车的驾驶和维修技术，除了完成国家运输计划外，还为兄弟段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

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搞好铁路运输，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否则将一事无成。马克思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依靠还是不依靠工人阶级，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一定的文化水平对掌握技术是个有利条件，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从文化水平、年龄等方面观察人，必须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用阶级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本质上发现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正确路线，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通过机务段的改建，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个方针的伟大意义。内燃机车的配件和检修设备，起初我们



想等着上边给，认为机务段不是制造厂，向国家要，这是理所当然的。由于这种依赖思想，曾经使一些机车不能及时维修，停在库里，造成了机车“趴窝”现象。工人看到这种情况，批评说：“机车‘趴窝’的实质，是领导思想的爬行！你们眼睛向上，眼睛向外，为什么不看看我们自己的力量？”工人的批评，对我们思想触动很大。国产内燃机车是我国工人阶级在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指引下，冲破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封锁，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来的。用好修好国产内燃机车，是对帝、修、反的打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需要建设的项目很多，如果一切都向外伸手，不但会给国家和兄弟单位增加负担，而且必然要延缓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这不但是一个内燃机车的维修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针问题。

列宁说：“**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自力更生的力量就在群众之中。在工人群众的推动下，我们批判了“等、靠、要”的错误思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路线正确就会有一切。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学习大庆工人的革命精神，因陋就简，土法上马，自己动手改造旧设备，制造新设备，并在废旧配件上闹革命，很快就武装起自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正在试制高压油泵试验台的时候，进口设备到了。这时有人说：“咱们有用的了，别再费那个劲了。”工人们说：“进口设备要用，试验也要继续搞，我们不能拄着洋拐棍走路，要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最后终于试制成功了。几年来，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在有关单位帮助下，改造了二百多种旧设备，制造了大型柴油机翻转架、三百吨油压机、十五吨天车、等离子喷涂等设备，自制设备占新增设备百分之八十以上。还修复和自造了许多配件，满足了维修的需要。这样，不但完全消灭了机车“趴窝”的现象，保证了机车的正常运行，而且闯出了一条在我国自力更生建设内燃机务段的途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涌现出大量的新生事物。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爱护新生事物，这是我们能够在完成运输任务的同时，用较短的时间过渡到内燃机务段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化大革命前，工人曾把蒸汽机车上的手动摇炉改成风动摇炉，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机车进厂大修的时候又被拆掉了，理由是工人“无权”修改设计。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领导成员同工人一起劳动，接受工人的再教育，思想感情有了变



化，对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也比较自觉了。我们使用的国产内燃机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批生产的，采用了许多先进技术，有不少优点。当然，也还有缺点，需要改进。可是崇洋迷外的人看不起它，总觉得国产机车不如外国的好。工人们非常气愤，批判了这种洋奴哲学，决心使国产内燃机车成为我国铁路运输的主力。他们在使用过程中，以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大搞革新，对国产机车进行了几十项改革。我们坚定地支持了这种首创精神。制造单位也大力支持工人改革，把大部分革新项目纳入了国家设计，这对国产内燃机车质量的提高起了一定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国产内燃机车运行得很好，不良率比某些进口的内燃机车低得多。

工人们的首创精神冲破了许多旧的规章制度。例如，过去铁路规章上有“曲轴不能焊修”的规定，国内外也没有焊修曲轴的先例。工人们说：“外国没有，咱们就不兴试试？书本上没有，咱们就不兴添上？”党委支持工人建议，并作出决议：“坚持试验。失败一百次，再试验一百零一次，直到成功。”党委主要成员同工人们一起试验。大家废寝忘食，反复实践，总结经验，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终于取得了胜利。现在，曲轴裂了能焊，磨损了能补，弯了能直，焊修的曲轴有的已安全运行二十八万多公里，结束了曲轴不能焊修的历史。上级主管部门支持工人的创举，取消了“曲轴不能焊修”的规定。几年来，我们总结工人的实践经验，制订了检修内燃机车的新规章，做到了主动地、有预见性地修车，这是消灭事故，保证安全运输的重要条件。目前，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已形成制度。我们体会到，在革命的道路上，新生事物是层出不穷的，它的成长要有一个过程，如果前怕龙，后怕虎，不敢大胆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新生事物，就不可能领导群众不断地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段广大职工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夺得了革命、生产双丰收，更好地负起了“先行官”的责任。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段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通过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革命积极性越来越高，生产任务完成得更好。当前全段呈现出一片热气腾腾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形势。我们决心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继续搞好教育革命

批林批孔运动推动 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战线，正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继续前进。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两校遵照毛主席历来关于要注意路线，注意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指示，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反击学校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今年春节以后，革命师生员工和广大工农兵相结合，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投入批林批孔运动，认真看书学习，努力作战，集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联系现实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促使教育革命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局面。

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场斗争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的。几年来，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在教育阵地上表现得十分尖锐、十分激烈。文化大革命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剥削阶级统治教育阵地的状况，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渗透在教育领域各方面的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资产阶级把复辟的狂热倾注在反对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上。林彪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拼命推行“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教育战线也是奉行“兴天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复辟之道。他要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的一小



撮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重新扶植起来,在学校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恢复孔老二以来的旧教育制度,把教育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条路线的实质是极右。林彪自取灭亡之后,在批林过程中,学校中有个别人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一贯指示,转移方向,否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煽动所谓批极“左”,反对批林,而把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这场斗争,关系到学校是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还是复辟文化大革命以前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在党的十大精神鼓舞下,两校党委放手发动学校的工人、工农兵学员和广大教师,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批判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捍卫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原来对林彪路线的实质有模糊认识的同志也受到了教育,进一步认识到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进一步引导广大师生员工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狠批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加深理解**“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实践证明,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坚持还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斗争。通过批林批孔,充分认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我们就有一个坚实的基点、明确的方向,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教育革命坚持下去。

孔孟之道在教育领域流毒深广,成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精神支柱和资产阶级复辟活动的思想武器。它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阻碍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打破旧教育的“金科玉律”,就必然在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等各个方面引起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革命,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茁壮成长扫清道路。

文科是搞意识形态、研究阶级斗争的,是一定阶级的舆论阵地。文化大革命以前,旧北大文科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各个学科充斥了孔孟之道的毒素,尊孔反法思想到处泛滥。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块阵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一些课程和教材还有不少儒家的传统观念,法家依然没有地位,甚至受到歪曲,历史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界限不清,是非不明。这样的教学内容,既不符合历



史唯物论,又同无产阶级政治方向背道而驰。直到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文科还有人公然为孔老二扬幡招魂,胡说什么对孔老二“不能全盘否定”,“《论语》只能注不能批”。这些情况说明,改造文科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如果不彻底批判孔孟之道和尊孔反法思想,从各方面清除其影响,文科还可能宣传反动腐朽的意识形态,为资产阶级所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深刻地触动了文科,推动各个学科领域来一场革命。广大革命师生积极参加这场现实斗争,进一步明确了坚持革命、反对复辟的方向,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北大哲学系师生以儒法斗争为基本线索,紧紧抓住历史上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分析研究思想路线上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两军对战,批判旧哲学史中的尊孔反法思想,积极改革哲学史的教学内容。一些研究古代历史、古典文献的专业,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一步解决如何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问题。如考古专业改变了过去那种只讲器物、技术,不联系当时阶级斗争的倾向,注意运用考古资料来说明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既配合了批林批孔运动,又推动了学科的改造。

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批判了教育领域中唯心论的认识路线,推动学校进一步落实《五·七指示》,坚持开门办学,努力按照辩证唯物论组织教学。春节以后短短两个多月,两校根据教育革命以来开门办学的经验,组织广大师生到基层单位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和工农兵一道批林批孔,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继续破旧的课程体系、学科体系,改革教学内容,并且根据教育革命的需要和课程体系的变化,相应地进行教学体制的改革,加快了教改的步伐,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教学质量。过去,理工科的教学体制和课程体系,历来搞的是基础理论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截然分家的所谓“老三段”。按照这种教学过程,学生一进校就要关起门来花几年时间孤立地打书本“基础”。几年来,我们一直批判这种做法。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更加深入地批判了林彪鼓吹孔老二的“生而知之”和“上智下愚”等反动谬论,从根本上冲击了“老三段”的理论基础,揭露了它的政治要害,掀起了开门办学的新高潮。如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的一年级学员,到工厂结合参加铣床装配劳动,学习力学、制图、机械零件等课程的有关内容,突破了过去只有学完零件图才能学装配图的旧框框,在较短时间内学会了看装配图,画装配图,并且还



学了旧大学四年级才讲到的有关机床结构和运动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这样开门办学，进一步把教育置于社会上广大工农兵的关怀和监督之下，促进了师生的思想转变，同时也为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和广阔的天地。

“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广大工农兵学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赋予自己的历史重任，决心成为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批林批孔斗争中，他们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痛击修正主义路线，敢想敢干，积极发挥“上、管、改”的革命作用。首届工农兵毕业生怀着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满腔义愤和为工农兵争气的豪情壮志，投入了毕业实践，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论语》进行批判，向儒家“圣经”开刀；他们狠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完成了我国第一座地下水封油库设计任务，参加了我国具有独创性的大型数字控制机床设计工作，用直拉法提取了我国第一根作高速电子计算机用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单晶材料，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的空白。清华大学学员的三百六十六个毕业实践项目，有二百八十九项已经用于生产实践，一百一十七项达到国内新水平。北大文科学员在毕业实践中，积极参加现实斗争，写了各种文章一千七百多篇，其中在报刊发表的有七百多篇，写了二十五本书，翻译了一百六十多万字的外文资料；理科的三百八十九个毕业实践项目，有七十五项达到国内新水平。这次毕业实践无论在选题的政治方向还是在广度深度上，都是文化大革命前两校任何一届毕业生无法比拟的。

批林批孔这场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猛烈地冲击着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有力地提高了广大教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有个教师，对于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个正确估计，原来口服心不服。在参加批林批孔的过程中，他总结了解放后历次重大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发现自己的思想好象是一个“寒暑表”，变化是有规律的：每当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时，就大吃一惊；而在资产阶级势力抬头时，却感到很平静。他从这里找到了自己世界观上的弱点，对这个估计也就口服心服了，决心在斗争中加速世界观的改造。孔孟之道在我国，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有着传统的影响，许多教师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除了有它的社会阶级根源外，都



可以从孔孟之道那里找到思想根源。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深入，促使他们从孔孟之道的束缚和影响下逐渐解放出来。他们批判了林彪孔老二鼓吹“上智下愚”恶毒诬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谬论，更加坚定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决心，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虚心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批判了“师道尊严”，使革命的、团结的新型师生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清华大学发电专业有些教师，原来认为工农兵学员参加科学研究会拖延进度。通过批判“上智下愚”和否定工农兵大学生的反动思潮，他们提高了认识，热情欢迎工农兵学员参加科学研究工作。学员在教师的积极帮助下，搞调查、攻难关，并在有关单位领导和工人师傅的大力支持下，解决了某电力系统运行稳定性的课题，该项成果每天可多发六十八万度电。教师们感慨地说：“正是由于批林批孔斗争反击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清除着我们头脑中的孔老二的流毒，才有了这样可喜的成果。”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强党的领导，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不受各种干扰，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大多数，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细致的工作。对于有些资产阶级世界观较严重的老知识分子，应该耐心地引导和帮助他们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洗涤污浊，提高觉悟。要欢迎他们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取得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进步，鼓励他们在批林批孔斗争的实践中改造世界观。这样，就是一些长期尊孔的老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通过批林批孔运动，也有了进步。北大哲学系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教授，过去一直很尊孔，这次运动开展以来，他反戈一击，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批林批孔文章。党和群众肯定了他的进步，使他亲切地感到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温暖。事实说明，只要坚持党的政策，就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调动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了教育革命的蓬勃发展。但是，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斗争还是长期的复杂的，在教育阵地上清除孔孟之道和尊孔反法思想的流毒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只要我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就一定能使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本学期化学学习中 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体会

大连海运学院无线电系导航专业 731 班学员 赵 兵

编者说明：这是大学一年级学员在最近化学考试中的一份答卷。赵兵同学努力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他学习化学课的心得体会，分析了化学领域中的某些具体矛盾，很有特色，读来令人高兴。这份答卷是在改革了旧的考试制度，由学生自选题目写学习体会或学习小结以后出现的。它是教育战线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成果之一，也是对那些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大学教学质量“今不如昔”的论调的有力回击。

毛主席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对于这一论断，通过本学期化学的学习，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本学期化学学习中，着重是复习以前在中学里学过的内容。但由于几年来在工作实践中学到了一些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用这个科学的世界观来分析化学中的问题，使这一学习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有所提高，认识更加深化了。

化学中接触到许多的概念，如电子、质子，正价、负价，阳离子、阴离子，金属性、非金属性，酸性、碱性，化合、分解，氧化、还原……等等。如果我们没有学得化学知识，或者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去学习化学，则往往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或者倒立着看问题，把这些概念看作是彼此孤立的、静止的或者是绝然对立的，而看不到它们的内在联系，看不到它们是发展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是对立统一的。这样，就会把各种各样、千差万异的物质，互相分隔开来，



无法从本质上，从内部规律上，从互相联系上去认清事物，根本不可能从整体上去认识事物。用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去分析，便能看到这些事物中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促进事物的发展变化。这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认识这个纷纭复杂的物质世界。

第一、特殊的矛盾，决定着物质特殊的运动形式。

在物质的分类上，有金属与非金属之分。这两类物质并不是截然分家的，而是有着内部联系的。但由于它们在各种化学反应中所表现的运动形式往往不同，因此又可以说有着质的区别。人们之所以一开始就将这两类物质分门别类，正是从大量的实验(化学反应)中总结出来的。比如Na(钠)和C(碳)，同是与氧反应，一个生成 Na_2O (氧化钠)，一个生成 CO_2 (二氧化碳)，而它们的水化物一个是碱(NaOH氢氧化钠)，一个是酸(H_2CO_3 碳酸)。当人们深入研究到物质的原子结构时，才发现金属元素与非金属元素在原子结构上是有区别的。因此在化学反应中才表现出彼此不同的特殊矛盾，而不同的运动形式，正是由这些特殊的矛盾所决定的。

第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

从元素周期表中可以看出，一般的金属元素原子最外层电子数总是较少的，而一般的非金属元素原子最外层电子数较多。这样，同是处于外层电子不足，而前者往往是通过失去电子，后者往往是通过得到电子，达到相对稳定状态。这样，表现在化合价上，金属元素一般为正价，非金属元素一般为负价。这说明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物质的性质。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金属原子也有得电子(显负价)的可能；非金属原子也有失电子(显正价)的可能。比如第四类元素的C(碳)、Si(硅)等，有时显+4价，有时显-4价；第六类元素的S(硫)也有+6价，+4价和-2价等几种不同的状态。在周期表中可以看出，随着元素在表中的位置不同，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状况不同，如果金属性逐渐增强了，非金属性便逐渐减弱。反之一样。每种物质总有主要矛盾，并且矛盾又有主要方面，这是决定物质性质的决定因素。

第三、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比如，上面所讲的金属性与非金属性的问题，从周期表中可以看出递变规律，这种递变是由元素原子结构的周期性变化所决定的。又如，各种元素原子结构的不同，还决定着各种物质的其它种种性质的千差万别。再如，同是由C(碳)元素组成的金刚石和石墨，它们在物理性质上是差别很大的。原因何在呢？当然主



要取决于内部晶体结构的形式不同，取决于该物质的内因。

外因能够通过内因起作用，这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许多的化学反应中，加热、加催化剂等都可以加速物质的反应速度。比如，氯酸钾这种盐类，通过加热，并且以二氧化锰为催化剂，便能分解为氯化钾，同时放出氧气。但同样的外因却不能使比较稳定的盐类分解。另外，在相同的温度下（室温），Na（钠）、P（磷）等物质遇 O_2 （氧气）后剧烈氧化，而Fe（铁）、Cu（铜）等物质却氧化缓慢。这更能充分说明内因是决定的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第四、矛盾的双方各以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在学习氧化还原反应的过程中，一开始是认为氧与其它物质的反应是氧化反应，以后认识深化，认识到一种物质得氧，一种物质失氧，氧化剂被还原，还原剂被氧化；氧化、还原反应是互相联系、同时发生的。当用电子论来解释氧化、还原反应后，才真正认识了氧化、还原反应的实质是电子的得失，化合价的变化。氧化、还原反应是一对矛盾。它们各以对立的一方为存在的前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在化学反应中，有失电子的，必有得电子的；有氧化反应的进行，必有还原反应的进行。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所做的电镀锌的试验，在阳极：锌原子失去两个电子生成正二价锌离子；在阴极：正二价锌离子得到两个电子生成锌原子。此时，阳极进行着氧化反应，阴极同时进行着还原反应。这就是对立统一的证明。

总之，对对立统一的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的认识，是来自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实践的，反过来又服务于实践。尽管由于自己头脑中唯物辩证法还少，加之化学学得也不好，不能很好地以科学的世界观指导化学学习，但似乎在这方面也有所收获，加深了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反过来也促进了对化学的学习。对于教材中和老师授课中的这方面的初步尝试，我感到很好。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努力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教学，破除旧教育中形而上学的东西，正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共同的任务。

写到这里，总感到见识肤浅，如有不当之处，请老师指正。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

（本刊发表时有个别文字修改）



把农业大学办到农村去

西北农学院革命委员会

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的教导，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一九七一年底，我院在南郑县龙岗寺一座旧庙院办了陕南教学基地，设立了农作物专业。一九七二年春季，开始从陕南各县招收工农兵学员。两年来，基地党组织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批林整风，狠批刘少奇、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最近又狠批他们宣扬孔孟之道，搞复辟、开倒车的罪行，推动教育革命不断深入发展。基地的革命师生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照耀下，努力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在把农业大学办到农村去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旧西北农学院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从教学方针到教学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把学生关在学校围墙内，实行“黑板上教种田，书本里学丰产”，教学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际。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革命师生迫切要求改变这种“三脱离”的状况。我们在教育革命中，曾走过一段“校内搞三田，课堂到田间”的路程，初步解决了教学与生产脱节的矛盾。但是，“三脱离”的问题并未完全得到解决。陕南教学基地在自己没有土地的情况下，解放思想，大胆实践，采取了和生产队订立合同，合办三田（丰产田、试验田、种子田）的办法，为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大学“三脱离”的状况找到了一种比较好的途径。

合办三田，计划由学校和生产队双方协商制订，所需的劳力、肥料、种子等主要由生产队提供，师生根据教学计划参加三田劳动，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并由贫下中农、教师、学员成立三结合领导小组，共同管理三田。合办三田，使师生走出了校门，与贫下中农结合，把教学、科研带进了大田生产，为建立教学、



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创造了经验。

合办三田为打破旧的教学体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旧西北农学院是按照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这个“老三段”的顺序安排课程，以书本、课堂、教师为中心进行教学的。“老三段”把课程割裂为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的三段，使理论脱离实际，使基础课既不和专业结合，又不为生产服务。其要害是反对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让学生整天围着书本、课堂、教师转。这种教学体制必然导致“三脱离”。现在结合三田的生产任务组织综合教学，把基础课与专业课结合起来，穿插进行，合理安排。为了照顾到基础课本身的系统性，采取农闲集中学，农忙结合学的办法。例如，结合水稻育秧过程组织综合教学时，以专业课水稻栽培为主，有关的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也同时进行，这就初步冲破了“老三段”教学的框框。由于师生结合三田开展教学活动，并在生产斗争实践中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从而逐渐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三田活动是一个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但不是教学过程的全部。为了引导工农兵学员在实践的基础上向理论方面提高，他们在组织教学过程中，把三田生产与理论教学、实习活动紧密结合，这样既加深和扩大了教学需要的实践基础，又有利于学员理论学习上的提高。例如植物生理课，结合三田进行教学，联系作物合理密植，讲光合作用；联系作物叶色变化，讲碳氮代谢关系；联系作物根系生长情况，讲根系在高产中的作用。这样，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又把所学的理论及时在生产实践中加以检验和运用，不但没有削弱学员的理论学习，而且使他们学到的理论知识更深刻，更实际。

合办三田不仅有利于教学改革，而且促进了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一九七二年，他们和附近两个生产队合办三田十五亩，进行了十三项试验；一九七三年合办三田四十亩，进行了三十项试验，教师、学员写出科学论文和报告十七篇，多数已应用于农业生产。去年秋季，在连续阴雨的情况下，他们与有关单位研究，提出了小麦抗涝播种的办法，汉中地区的有关领导十分重视，立即在全区推广，保证了小麦及时播种。他们经过两年的试验，初步总结出在汉中地区种植双季稻的规律和技术措施，为在这里扩大种植双季稻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两年来，县、社先后在三田召开了现场会十一次，及时交流和推广了农业技术和生产经验。和



基地合办三田的两个生产队，在批林整风和“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实行科学种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一九七三年比一九七一年分别增长百分之四十三和百分之二十四，由后进队变成了先进队。

陕南教学基地的实践证明，把农业大学办到农村，坚持开门办学，有利于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培养革命接班人，改造教师世界观，发挥工人阶级领导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作用，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学校的一统天下。

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任务。农业大学办在农村，开门办学，路子越走越宽；办在大城市里，闭门读书，学生越读越蠢。旧农业大学，把学生关在四堵墙内，不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不接触工农群众，大学毕业了，不愿下农村，不愿为贫下中农服务。基地实行开门办学，把学生放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学员在斗争实践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给他们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使他们树立起学农、爱农、为农的思想。有一位学员，刚入学时，认为学农“要和土地、泥巴打交道，不光彩”，后来在贫下中农帮助教育下，认识到学农是革命的需要，不是不光彩，而是很光荣。他决心不辜负贫下中农的期望，刻苦学习，认真实践，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都有显著的进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共同的斗争中，学员和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建立起深厚的阶级情谊。有一次基地暴雨成灾，学员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贫下中农，他们冒雨赶到生产队，和社员一起排洪救灾。旧大学培养的学生，死抠书本，理论脱离实际，学了不会用。基地的学员，理论联系实际，在生产斗争中学习，逐步掌握了本专业所需要的基本理论，锻炼和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去年有一个队水稻发生大面积坐蔸，插秧后不发苗，社员非常焦急。学员和教师深入田间同贫下中农共同战斗，他们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找出了发生坐蔸的原因，及时采取了防治措施，挽救了坐蔸田。在贫下中农精心管理下，这个队不仅没有减产，还取得了比前一年增产百分之三十四的好收成。通过抢救坐蔸田，他们写出了调查报告和论文六篇，召开了一次以学员为主的科学讨论会，受到贫下中农和有关农业单位的好评。



农业大学办到农村，有利于教师世界观的改造和业务上的再学习。有一位老教师，过去名利思想严重，情绪消沉，到农村后，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认真改造世界观，思想感情逐渐有了转变。他下决心丢掉“知识私有”的包袱，积极参加教育革命，经常挽起裤腿在三田里劳动、观察，“晴天一身汗，雨天两腿泥”，群众亲切地称他为“赤脚教授”。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下，教师具有的只是一些书本知识，严重脱离实际。比如，气象课教师过去满足于“教室里呼风唤雨，实验室里打雷闪电”，至于“农业上的涝和旱，交给老天去管”。现在他们到基地参加三田活动以后，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活知识，并结合三田进行教学，在课程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农业大学办到农村，有利于发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作用。基地办在农村，可以使贫下中农直接参加到教育革命中来。他们除成立有贫下中农参加的三田领导小组外，平时教育革命的各项重大活动，都有贫下中农参加。为了建立“三结合”教师队伍，他们聘请了八名贫下中农当兼职或专职教师。为了进一步加强基地教育革命的领导，还成立了由县社领导干部、基地党组织、工宣队、贫下中农和师生代表参加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深入发展。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开门办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通过两年来的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把农业大学办到农村去，是在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同几千年来轻视农民、轻视劳动的孔孟之道的斗争中，一步一步前进的。

一九七二年，当我们决定在龙岗办学时，社会上吹来一股冷风：“这样一座破庙，哪象个大学的样子！”后来又有人借口条件差，提出要搬到原汉中大学的校址，有人也曾想把第一期办完，下一期不招生了。总之，在他们看来，农业大学办在农村是不行的。真的不行吗？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教导，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认识到毛主席关于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指示，长期以来基本上没有得到落实，就是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的结果。同志们说，林彪一伙搞复辟，否定开门办学的方向，就是妄图把我们拉回到旧大学那种闭门读书，



搞“三脱离”的老路上去，为资产阶级培养精神贵族，为资本主义复辟培养驯服工具。革命师生用自己的斗争实践，坚决顶住了这股冷风，他们豪迈地说：“泥巴里能踩出革命路，农村里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的大学生。”

农业大学办到农村之后，并不意味着开门办学与关门办学的斗争已经结束。曾有过一种论调：“基地办在农村，本身就是开门办学，搞好校内教学就行了。”因而有人把走出学校普及农业技术教育，当作是额外负担。就在这时，南郑县的负责同志提了一条很引人深思的意见：“南郑县四十五万人，你们只招了一名学员，给我们培养了四十五万分之一。全县六十八个公社，如果给每个公社培养一名技术员，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这一批评使基地的同志认识到，不搞普及，关门“提高”，就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基地虽然办到了农村，仍有个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如果只着眼于校内学员的培养，不适应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多快好省地为农村培养农业技术人员，就会出现四堵墙搬家，又回到关门办学的老路上去。基地党组织抓住这个苗头，组织师生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批判了“大学只管提高，普及是地方的事”的错误观点，采取多种形式开门办学。两年来，他们与地、县、社结合，举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六十二期，参加培训的达一万零五百三十一人次，与附近社队合办一年制的红专夜校一所。他们还派教师到农村蹲点，组织学员下队实践，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把校内与校外，当前与长远，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既为地方培训了大批技术骨干，服务于当前农业生产，又充实和提高了校内教学，促进了教育革命的发展。

陕南教学基地开门办学的实践，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把农业大学办到农村去，这个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下去。两年来的成绩，有力地批驳了那些认为农业大学办到农村去“不象样”、“不必要”的谬论，有力地批判了林彪一伙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妄图搞复辟、倒退的罪行。但是，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在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必须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反击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推动大学教育革命继续向前发展。陕南教学基地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方面才刚刚开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的建设还抓得不够，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摸索经验，求得不断地提高和改进。



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教学改革

——湖北监利县棋盘中学的调查报告

农村中学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几年来，棋盘中学党支部发动全体师生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认识到，在农村，广大贫下中农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主体，如果办学离开了他们的意愿和要求，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这一认识出发，他们经常地主动地深入社、队，听取贫下中农的意见，不断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工作越做越好。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学校党支部带领全校革命师生积极投入这场伟大斗争，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更加自觉地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教学改革。他们的经验集中起来就是：教学计划交贫下中农讨论；改革课程教材找贫下中农商量；教学方法请贫下中农评议；教学质量让贫下中农鉴定。

教学计划交贫下中农讨论

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有的同志曾错误地认为：“教学计划，几笔一画，历来如此”，“贫下中农只熟悉犁耙耢碾车，不懂得纸笔书砚墨，作计划纯粹是学校的事”。因此，在制订教学计划时，常常闭门造车，脱离实际。通过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家认识到：农村学校能不能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依靠贫下中农制订计划，这本身是个方向路线问题。于是，在制订新的教学计划时，党支部便一面组织师生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一面深入社会，向贫下中农调查，了解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力争把计划做好，保证教育革命健康发展。



例如，一九七〇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号召进一步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党支部就组织师生学习全会公报，深入进行调查访问，倾听贫下中农的意见。贫下中农反映说，随着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各种农业机械不断增加，科学种田的要求越来越高，耕牛、生猪迅速繁殖和发展，迫切需要农机人员、农技人员、赤脚兽医。调查回来，党支部的同志们一致表示，一定要从大办农业的需要出发，为三大革命运动培养急需人材。经请示上级领导后，确定增设农业会计、农业技术、农业机械、赤脚兽医等专业班（三月、半年、一年半的均有），同时让普通初、高中毕业班也带点专业性。这样，既为三大革命运动培养了急需人材，又使普通班学生毕业回队后也能发挥积极作用。

又如，今年春季一开学，党支部就发动师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党中央有关文件，围绕批林批孔这个中心制订教学计划，先后组织师生到码头等四个大队把计划交给贫下中农讨论。贫下中农看了说，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学校里一定要抓好，我们坚决支持。同时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搞今昔对比，用我们这里的现实材料进一步帮助师生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看清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第二，抓好批林批孔，推动教育革命。听取了贫下中农的意见，重温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师生们感到分外亲切。于是，有计划地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来校作忆苦报告，组织师生到烈士陵园、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的飞机场、了望哨、地堡炮楼等现场搞回忆对比，批判“克己复礼”，并联系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同时，坚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进一步围湖造田，扩大校办农场，建设学工学农基地，并开展繁养金小蜂、试制红铃虫诱杀剂等为夺取农业高产的科研项目，以实际行动批判林彪攻击“五·七”道路、污蔑开门办学的罪行。这样，使教学计划更接近实际，更符合贫下中农的意愿。

改革课程教材找贫下中农商量

近年来，有那么一段时间，教学科目不断增多，教学时数不断膨胀，补充教材加课本，薄本本变成厚本本，学生负担越来越重。学校党支部深入下去，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精简课程的指示，认真检查贯彻执行这些指示的



情况。贫下中农说，课程不能增多，书本不能加厚，否则，搞得学生“书包装得满满的，身体累得瘦瘦的，脑子却是空空的”，就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学校师生通过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从一九七二年下半年以来，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上，作了一些改革，将原开设的十二门课程砍掉三分之一。

课程少了，如何使学生生动活泼地学到更多的实际知识？他们根据农村三大革命运动需要和贫下中农的意见，在普通班里组织科研活动课。其中包括：农用机械、土农药和土化肥的制造和使用、卫生保健、中草药、兽医常识、珠算研究、无线电知识、木工、园艺、美术、演唱、体育、习作等。利用课余，分组活动，每周再安排两节课，组织交流，解决疑难。这样，学生负担不重，接触的知识面却比较宽，而且学得积极主动，生动活泼。

现行教材怎样改？他们根据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和贫下中农的要求，采取“删、补、换”的办法，予以调整，并补充一些与当地实际联系较紧的内容。有个教初中平面几何的教师，在他访问贫下中农和队里的会计时，发现农村经常使用“梯田截积”，但课本上没有。他便从实际出发，进行补充教学。近几年，他多次到防汛工地、长江干堤工程上参加劳动，同贫下中农和工程技术人员座谈，征求改革教材的意见，就地编写了《农村数学应用题》等乡土教材，请贫下中农讨论选定后，回校进行试教，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几年来，不仅教师主动走出去征求贫下中农的意见，贫下中农还主动上门来提建议。农业方面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他们就来告诉学校先行试验推广；农机方面有了新要求，他们就先和学校商量，加强有关教学内容。去年，高压电线架设过境，许多人就来反映，要加强电的知识教学，要走一步想两步，免得“临时抱佛脚”。

教学方法请贫下中农评议

有人说，教学方法问题是个业务问题，贫下中农管不了。这话对不对？一次，党支部组织师生到新湾大队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征求教改意见，使大家受到了教育。贫下中农直言不讳地说：“有的学生毕业回队后，笔杆子戳得鼓皮穿，做起事来不会干。”第五生产队一位贫农说，我们队里买了几台机器，出了毛病不会修。指望学生回来开，他们也不熟。结果，新机子成了“瘟鸡（机）子”。因此，



希望学校认真改革教学。

贫下中农的意见，引起了学校的重视。师生们回校后，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提高了路线觉悟。大家说，方法问题也是个路线问题，我们一定要按贫下中农的意见办。进而提出：研究教学方法，必须首先研究开门办学和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根本问题。离开了这个前提，就会走老路。

一九七二年，早稻抽穗遭到二化螟的严重危害，农基教师便集中教《水稻二化螟的防治方法》。教学时，引导学生自学后，再把他们带到棋盘大队第三生产队与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实地治虫。禾苗正在抽穗，虫害这样严重，怎么办？学生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撒毒土”，有的说“喷粉”，有的主张搞“泼浇”。教师问：“现在撒毒土能不能解决问题？”学生回忆了初步接触过的书本知识，说：“撒毒土只能在分蘖阶段进行，现在搞很难见效。”“撒毒土不行，喷粉怎样？”“螟虫在胎内危害，喷粉也无济于事。”“泼浇呢？”学生一致认为，抽穗阶段，只有泼浇最好。是不是泼浇最好？师生同贫下中农一起搞试验，结果证明是正确的。在这个基础上，很快就讲清楚了基本理论。这样教学，贫下中农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贫下中农的赞扬，使教师们受到了鼓舞。教师和学生进行教育革命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教改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党支部又因势利导，提出为了保证学生联系实际学习的机会更多一些，学得更快更好一些，有些教学参考资料是否可以交给学生自己去研究？方案一提出，有的教师就把自己的那些“内部参考”公开了。学生要自学、要靠自己学的风气广为形成。看到这个情况，贫下中农兴奋地说，教师敢于破神秘观念，这是教学方法的解放，是教育革命的深入。

教学质量让贫下中农鉴定

教学质量高不高？贫下中农看得比较清楚。棋盘中学党支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经常请贫下中农鉴定学校的教学质量，看看哪些学生回队后思想表现好，哪些学生回队后表现差；哪些学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哪些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弱；好的，为什么好，差的，



为什么差。既评毕业回队的，也评在校学习的；既评学生，也评教师和领导。每学期都搞，一年搞两三次，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几年来(主要是一九七一年以来)，从这所学校毕业出去的四百五十八名学生，绝大部分表现较好，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作出了贡献。现在已有八十五人当了农机手，一百零一人当了公社和大队、生产队农技员，七十七人当了赤脚兽医，还有的当了基层干部，成了劳动模范。下车公社高堤大队有个学生，一九七一年高中毕业回队后，边当会计，边当农业技术员，有效地解决了生产斗争中的许多问题。一九七二年，队里几块晚秧苗生了病，有人主张去掉重种。他和贫下中农一起，认真调查后，土洋结合，进行防治，全部治好。第二生产队有八亩早稻发病，也有人建议改种。他知道后，赶去检查，发现是稻瘟病，用草木灰和石灰混合撒施，几天功夫就扭转了局面，保住了秧苗。沙岭公社石闸大队有六个毕业回队的学生，个个热爱集体劳动，人人带头战天斗地。去年排渍时，几天几夜不睡觉，顶风冒雨查险情。双抢季节，起早摸黑奋战二十多天，手脚伤了也不下火线。有的人白天栽了六、七分田秧，晚上又去调查虫情。李沟公社迎接大队的四个学生从农机班毕业回队后，帮助队里开抽水机。去年夏季排渍，苦战半个月，人员不够，他们一人看管两台机器。有的人几次受伤，都不休息。有个学生头部受伤后，贫下中农劝他休息，他坚决不肯，一直坚持到最后战胜了渍灾。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写大批判文章，办大批判专栏，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发扬了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看到这一切，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这就是教学质量，这样的质量，我们贫下中农欢迎！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提笔能写革命文，搁笔会种公社地；牲畜疾病会诊治，机器损坏会修理；科学实验当闯将，大办农业出大力”。

贫下中农还经常积极主动地给学校工作找差距，发现问题，及时帮助纠正。同时，热情做好教师的再教育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路线觉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使棋盘中学越办越好。

湖北监利县教育局调查组



大力普及牧区小学教育

——青海玛多县的调查报告

位于黄河源头、札陵湖畔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个地势高寒，气候多变，条件艰苦的纯牧业区。全县有六个牧业公社，三十四个生产队。这里平均海拔四千二百米以上，在二万五千平方公里的广阔草原上，居住着四千五百多名藏族牧民。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牧主头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这里没有一所学校，广大贫苦牧民，世世代代受苦难，祖祖辈辈睁眼瞎。

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玛多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藏族人民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在经济上得到了翻身。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千里草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畜牧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藏族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广大贫下中牧文化翻身的要求非常迫切。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玛多县委把教育工作列入党委议事日程，并确定一名书记分管教育工作。一九七一年三月，县委举办了有县、社文教干部和革命教师参加的学习班，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论述，提高了干部、教师对普及牧区小学教育的认识。接着，全县出现了一个大办牧读小学，普及牧区小学教育的热潮。一九七三年，全县小学由一九六五年的四所发展到三十八所，队队有了牧读小学，在校学生增加到七百七十多名，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教师增加到五十八名。与一九六五年相比，学校增加了八倍多，学生人数增加了五倍多，教师增加了七倍多。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玛多县在普及牧区小学教育中，与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与阶级敌人斗，与旧的习惯势力斗。这些斗争，提高了干部、群众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在斗争



的实践中，玛多县委根据本县纯属牧业区的特点，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在牧区办学中普遍存在的以下五个矛盾。

一、多种形式办学，合理设点布局，解决分散放牧与集中教学的矛盾。玛多县地区辽阔，社员帐房分散，平均每十平方公里不到两个人，队与队之间的距离，近则几十里，远则上百里，就是同一个生产队社员帐房与帐房之间也距离很远。面对这种情况，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办学形式，才能方便贫下中牧子女就近上学？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认识的。有的人认为，社员帐房分散，流动性大，学校办得容易，垮得快，很难巩固，因而产生了畏难情绪；有的人受了资产阶级“正规化”教育思想的影响，认为除了正规小学以外学不了什么，对办其他形式的小学信心不足。针对这种情况，玛多县各级党组织就从路线教育入手，通过举办干部和群众学习班，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的指示，认识到办学形式问题也是个路线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认识提高以后，就在恢复过去被撤销的花石峡公社完小、努力办好县完小的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大办牧读小学，贫下中牧走到哪里，学校就办到哪里，帐房比较集中时，就把学校办在放牧场。在很短时期内，就有四百九十多名学龄儿童入了学。牧读小学的课程设置主要有藏语文、算术、阶级教育课，有条件的还教唱革命歌曲。全年教学时间，一般在一百八十天左右。牧读小学适应牧区分散、流动放牧的特点，学校办在帐房门口，学生实行半牧半读，大大提高了学龄儿童入学率。黑河公社几个月时间，就办起了牧读小学六所，学龄儿童入学率很快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第三和第五生产队的九十六名学龄儿童全部入了学。同时，为了提高学龄儿童入学率，县完小还附设了小学民族班，吸收贫下中牧子女上学，实行寄宿。

二、自力更生，就地选拔培养教师，解决学校发展与师资不足的矛盾。学校办起来以后，首先遇到的是教师不足。原来学校少，教师也少，现在有三十八所学校，需要五十八名教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有的同志认为玛多县文化落后，生产队连个会计也不好找，主张向上级要，等待上面派。但县、社党委坚持了自力更生、就地选拔的办学原则。他们认识到，就地选拔的教师，土生土长，熟悉本民族语言，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文化水平虽然低一些，但经过培训可以提高。统一了认识后，各公社就从贫下中牧中选拔政治思想觉悟高，热爱党的教育



事业，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三十四名社员当了牧读小学的教师。另外，从代课教师中转正了五名，师范学校分配和调干六名，初步解决了教师不足的问题。

新吸收的牧读教师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只有初小文化程度或只识少量的字，大部分未学过算术。因此，能不能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以适应教学需要，就成为牧读小学能否巩固和提高的大问题。县、社党委认真抓了培训提高牧读教师的工作。牧读小学办起三个月后，就举办了全县第一期教师训练班。黑河公社把每年培训两次牧读教师作为制度固定下来。札陵湖等三个公社还配备了牧读教师辅导员。通过培训，一方面帮助教师树立“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思想，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使一些对教育工作产生动摇的人，端正了态度，更加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另一方面着重提高教师的教学业务水平，解决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如黑河公社采取公办教师教民办教师、老教师带新教师的办法，使一些原来根本没有学过算术，在教学上有很大困难的教师提高了业务水平。现在这些教师都基本上能胜任初小算术课的教学工作。

三、教学形式灵活多样，解决学生上学与发展畜牧业生产缺少劳动力的矛盾。玛多县文化大革命以来，牧业生产迅速发展，牲畜头数成倍增加，这就需要补充大量的劳动力。由于牧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不同，八、九岁的孩子就可以参加放牧。这样，学生上学与畜牧业生产需要劳动力的矛盾就突出起来。加之有一些人片面地看问题，认为“不识字照样把牛羊放，念书无用场”。有的生产队强调劳动力缺乏，给教师和学生分配过多的生产任务，影响了办学。有个别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注重个人收入，不让孩子上学。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各公社通过路线教育、今昔对比和革命大批判，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了教育与生产、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学好社会主义文化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明确了普及小学教育的重大意义。同时，学校结合流动放牧的实际情况，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牧读学校在分片或设点教学时，中午上课，上午和下午学生在家参加劳动；学生跟群放牧时，教师就骑马跟群教学，有的学生白天放牧，教师就晚上教学，哪里有学生，哪里就是教师的家。此外，还采取牧忙少学，闲时多学的办法，每年剪毛、接羔育幼等大忙季节，学生以参加生产为主，教师巡回教学，个别辅导，做到了学习、劳动两不误，受到了广大贫下中牧的欢迎。

四、发动群众，提倡互教互学，解决教学间隙过长与学习效果不易巩固的矛盾。牧读小学办起来以后，一般每隔七至八天巡回教一次，有的一个月才巡回教



一次。由于教学间隙过长，回生现象很严重，有的学生年年上学，年年读“杂卡”（藏文字母读音），于是有些家长也对牧读小学产生了怀疑。实践证明，不解决这个问题，牧读小学就不能很好地巩固和发展。

针对这个问题，各级领导和革命师生一道，深入进行调查，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终于研究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几条措施，从而保证了教学质量。这些措施主要是：（1）成立学习小组。在学习小组里请“小先生”，教师离开后由“小先生”辅导。（2）提倡能者为师。有条件的家庭，父教子，兄教弟。如黑河公社第六生产队有个社员当教师不在时，仍然坚持教孩子读书识字，仅四个月他家的两个孩子就学完了藏语文一册的三分之一的课文。（3）普及小学教育与成人扫盲相结合。采取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互教互学，共同提高。（4）县、社干部下帐房驻队或检查工作时，碰到学生就问，不会就教。一年多的实践证明，采取这些办法，不仅防止了教学间隙过长容易回生的现象，而且使学生学得快，记得牢。如黄河公社江旁小学，办学仅仅两个月时间，大部分学生就学会了三十个藏文字母，能拼四百多个单字，有的还学会了用汉文写“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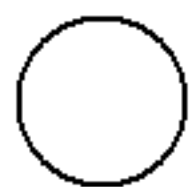
五、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学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解决学校发展与经费不足的矛盾。玛多县在普及牧区小学，大办牧读学校过程中，批判了那种“两眼向上”、“两手向外”和“牧区条件差，办学靠国家”的单纯依赖思想，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坚持因陋就简、勤俭办学的原则，全县除两所全日制小学由国家投资修建外，一九七一年以来新办的三十四所牧读小学，都是依靠群众办起来的，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在教学设备上，生产队一般除给教师配备一匹乘马，给学校缝制一顶帐房外，只花少量的钱，买一块小黑板和一些粉笔。贫下中牧满意地说：“牧读小学花钱少，办大事，是牧区办学的好形式，普及教育的好方法。”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玛多县在普及牧区小学教育中取得的成绩，有力地驳斥了林彪一伙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谬论。目前，全县牧读小学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他们决心进一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狠批林彪一伙“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把牧读学校进一步办好。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文卫科 调查组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文化教育局



红旗



一九七四年 6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六期 目 录

短评：**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5)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孔丘的仁义道德与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

..... 燕 枫 (8)

人民英雄不容抹煞

——批判尊孔派对柳下跖的歪曲和诬蔑..... 甘 清 (14)

论商鞅.....

梁 效 (22)

注意解决路线问题.....

中国共产党武鸣县委员会 (30)

在斗争中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伍

..... 山西浑源县刁窝大队党支部 (34)

培养积极分子 深入批林批孔

..... 青海共和县蒙古大队党支部 (38)

从“天马”看林彪野心家的世界观.....

靳 南 (42)

尊孔是为了复辟和倒退

..... 河北献县南河头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本林 (45)



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庄 宁 (49)

做好农村社会主义商业工作柳 彤 (53)

文化大革命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

.....河北大名县杏现大队党支部 (57)

批林批孔推动了技术革新

——天津自行车厂的调查报告 (61)

自力更生的力量在群众之中

.....上海市毛麻纺织工业公司党委会 (66)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胜利前进

英雄光辉照银幕

——评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平原作战》《杜鹃山》.....江 天 (70)

小戏创作的可喜收获

——评越剧影片《半篮花生》.....方 进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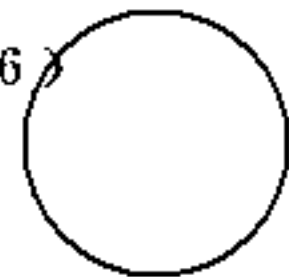
来自群众斗争生活的艺术

——谈大兴县业余文艺宣传队的舞蹈创作辛文彤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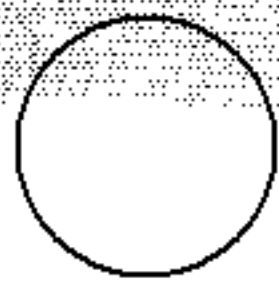
科学史研究

人类在变革物质中认识物质李 柯 (85)

☆ 六月一日出版 ☆



毛主席语录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



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毛主席语录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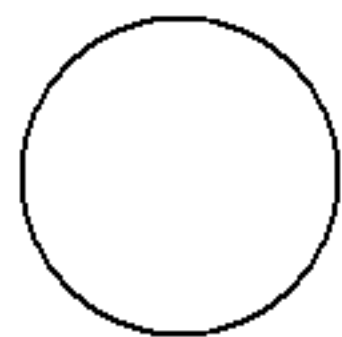
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

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



毛主席语录

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短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正在深入发展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斗争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重要性。

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要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作极大的努力。为了适应政治思想战线这种斗争的需要，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坚持下去，进行到底，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就成为一个不能忽视并且要用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理论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认真地研究历史和现状，从理论上正确地说明革命斗争中提出的实际问题，科学地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经验。这对于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毛主席早就指出：“**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注意建立和加强理论队



伍，为党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服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建立和加强。批林批孔斗争既是发展理论工作的强大动力，也是培养理论队伍的最好学校。几个月时间的批林批孔斗争，仅就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历史知识，提高对古代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规律性的认识来说，在广泛性方面，就比多少个文科大学所能做到的还要多。为了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弄清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密切联系实际，刻苦钻研问题，不断进行学习、批判、再学习、再批判。许多同志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反复学习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学习了怎样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习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包括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批孔的许多重要论述。在这过程中，逐步提高了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了人们对理论重要性的认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

理论队伍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军队，是要在政治思想上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我们要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出有战斗力的理论队伍来。认真看书学习和参加实际斗争相结合，**从战争学习战争**，应当是我们培养理论队伍的主要方法。只有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理论队伍，才能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进行深刻的科学的批判，真正攻克敌人的思想堡垒，不断夺取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革命的新胜利。只有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理论队伍，才能促进“**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善于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加以检验、丰富和发展。



要在各条战线上大力培养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也要建设同实际斗争密切联系的专业理论队伍，并使他们同工农兵理论队伍结合起来，以大大提高我们整个理论队伍的战斗力和战斗力。

理论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并且要长期坚持下去。学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和首先的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掌握这个无产阶级的锐利思想武器。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不可能战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战胜孔孟之道。开展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革命，有许多工作要做，能不能把这些工作做好，决定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决定于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对理论队伍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理论队伍是否符合革命斗争需要的标准。我们应当努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培养理论队伍，需要全党动手。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订出具体规划和措施，认真实施。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机关等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些已经作出了较好的成绩，应当注意发现和培养。同时，要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以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更好地完成我们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各地都有一些在批林批孔斗争实践中组织和加强理论队伍的经验，需要加以总结。对于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如何深入，应当在分析情况的基础上，有一个大体的规划。我们相信，通过批林批孔，一定会较快地培养出一支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理论队伍，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出贡献。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孔丘的仁义道德与 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

燕 枫

鼓吹孔丘的那一套仁义道德，是林彪推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深入批判林彪在这方面的谬论，看看他是怎样把孔老二反动腐朽的思想拿来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的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严厉地指出过：“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论持久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阶级敌人要把孔老二的仁义道德搬过来，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必然要竭力掩盖它的反动阶级本质，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林彪正是这样干的。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在他的黑笔记里，就把孔老二的“德、仁义、忠恕”叫做是什么“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是“历史唯物主义”。他胡说什么孔丘的“仁、勇、智”就是讲“团结”，讲“斗争”，讲“唯物论”，并叫嚷要“用其内容”。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它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又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人们的善恶观念和道德原则也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所谓永恒的、超阶级的道德是根本不存在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



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反杜林论》）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青年团的任务》）

被林彪称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要继承其内容的孔老二的仁义道德，到底是哪个阶级的道德观呢？

孔老二的道德核心是所谓“仁”。一部《论语》，讲到“仁”的地方就有一百多处。什么是仁？这个政治骗子毫不含糊地回答：就是“克己复礼”。“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孔老二看来，仁与不仁，道德与不道德，完全是以“复礼”，也就是以维护和复辟奴隶制为标准、为转移的。所谓忠、孝、节、义之类，不过是“仁”在各种关系中的具体应用。孔老二所说的“忠”，有其确定的阶级内容，就是要人们忠于奴隶制政权，忠于各国国君和周天子，死心塌地地为奴隶主阶级卖命，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所谓“孝”，就是要人们绝对服从宗法的家长制的统治，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在家，作专制家长的奴隶；在邦，作天子或国君的顺民。所谓“义”，是指行为要服从奴隶制统治秩序，反对任何损害奴隶主贵族的“犯上作乱”现象。至于被孔老二奉为“天下之达德”的“知、仁、勇”，从道德方面来说，也完全是为其“复礼”的政治目标服务的。正如孔老二自己所供认的，他提倡“知、仁、勇”，就是为了“修身”、“治人”、“治天下国家”，使奴隶制永世长存。可见，孔老二的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道德信条，是日趋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一套后来被腐朽的地主阶级加以继承改造，成为维护反动的地主阶级专政、毒害和欺骗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一再宣扬这一套。林彪宣扬这些东西，只能表明他顽固地站在反动立场上，“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

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林彪鼓吹孔老二腐朽不堪的仁义道德，就是要“用永恒的绝对的道德原则的观点来提出自己的一切政治要求”，推行其“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妄图抹杀和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不是狂热鼓吹孔老二的“德、



仁义、忠恕”，可以作为“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吗？不是在伪善地侈谈“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以“仁爱之心”“忠恕之道”对待一切人吗？在林彪这些反动的说教里，人与人之间的阶级界限，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复辟的严重威胁，统统不存在了。正象恩格斯揭露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林彪这个妄想把无产阶级专政“吃掉”的野心家，竭力宣扬这种“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的“老调子”，其目的就是用反动、虚伪的阶级调和论，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林彪反党集团所以要鼓吹孔孟之道，疯狂地咒骂秦始皇和法家，完全是为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对叛徒、特务和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服务的。

道德作为一定的阶级意志的直接表现，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剥削阶级总是要利用旧道德来掩盖他们凶狠、阴险的真面目，掩盖他们推行反动的政治路线。我们摒弃孔老二的一切道德说教，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剥削阶级的利益，为维护~~和复辟~~反动没落的奴隶制服务，为维护~~和复辟~~走向灭亡或已被推翻的一切反动没落的剥削制度服务。林彪一伙是国内反动派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的阶级本性是极其凶恶和极其虚弱的。他们要把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要让被打倒的阶级敌人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他们所干的这种反革命事业是不得人心的。因此，他们需要欺骗，需要伪装，需要利用孔老二的仁义道德来为他们推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对于林彪鼓吹孔老二的仁义道德的反动目的，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

林彪推销孔孟的仁义道德，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王明、刘少奇等都曾经贩卖过。林彪死党、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积极配合国民党，篡改马克思主义，宣称“中国的旧道德，如‘忠孝



节义’，‘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在现代可以成为新的美德”。不仅如此，陈伯达还竭力吹嘘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声称只要改一个字，变成“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能使这个“封建社会的美德转变为极高的人类美德，而且在哲学上恰是由唯心论转变到唯物论”。这完全是鼓吹阶级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的胡说八道。在阶级社会中，对立的阶级之间，只有“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或“人所不欲，要施于人”，而没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妄想灭亡中国，“不欲”自己被赶出去，我们就要把这个“不欲”施于它身上；国民党反动派妄想吃掉共产党，“不欲”解放区的巩固扩大和人民军队的发展，我们就要把这个“不欲”施于它身上。没有这一条，还有什么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什么抗日战争的胜利？反之亦然，我们“不欲”的一切，国内外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要施于我们身上。抹杀了这一点，就是抹杀了阶级斗争全部的历史经验。总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好，“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好，本质上完全一样，都是剥削阶级用来欺骗和愚弄人民的谎言，反动统治阶级本身谁都没有实行过而且根本不准准备实行的。所不同的，只是后者比前者多了一层近代资产阶级所常用的超阶级的色彩罢了。今天，林彪又袭用机会主义者所惯用的手法，把反映古代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和需要的道德，“转变”为适应现代资产阶级和帝修反需要的道德，并给它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然而也正在这里，充分暴露了林彪一伙是地地道道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货真价实的政治骗子。

除了企图欺骗、麻痹革命人民以外，林彪贩卖孔老二反动的道德信条，还有一个目的，即用它来威胁和强迫其一小撮死党，以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拿“忠”来讲，就是要林彪的死党去干叛党叛国，危害毛主席、党中央的坏事，“永生永世、世世代代”忠于林家父子。再说“孝”，就是要他的法西斯小舰队按照“事父母敬而不违”、“以从亲之令为孝”的精神，对林彪的反革命旨意曲意逢迎，言听计从。而所谓“仁”和“义”，则是要他的死党以反革命的共同利益为重，紧密勾结，即使失败了，也要“不成功便成仁”，如此等等。总之，是要以孔老二的仁义道德作为反革命内部纪律，统一其死党的思想和行动，使他们服从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死心塌地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效劳。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以一小撮反动派的主观幻想为转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不



管林彪怎样乞灵于孔老二的反动思想，妄图以此“统一”其死党的意志，为在中国搞反革命政变服务，其阴谋是决不能得逞的。看吧，林彪及其死党在策划反革命阴谋时，总是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什么仁义道德也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的虚弱与恐慌。林彪不是要他的死党“不成功便成仁吗”？可是，当反革命“联合舰队”覆没的时候，带着花岗岩脑袋去“成仁”的，真是寥寥无几。就连林彪这匹“独往独来”的“天马”，在“不成功”时也决不肯“成仁”，而是仓皇逃命，狼狈投敌，可耻地投奔苏修，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最后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由此证明了所谓仁义道德的彻底破产。

毛主席说过：“**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人民服务》）无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先烈们为革命而英勇牺牲，这是比泰山还重的。而林彪为其反革命阴谋丧生，则是比鸿毛还轻。正象马克思批判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时说的那样的，林彪这个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杀害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人民、投降苏修的叛徒、卖国贼，“**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法兰西内战》）

正当林彪反党集团起劲地宣扬儒家道德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也遥相呼应，紧密配合。他们用修正主义的观点解释孔丘，吹捧孔丘，把孔丘其人和他的反动思想吹到了天上。他们胡说孔老二的道德原则就是为了培养“君子”。而这种君子是“对于饮食、财富、生活舒适和物质利益漠然置之”，“毕生献身于崇高的思想，为人民服务，探求真理”的“完人”，是“各种美德的综合体”。啊哟哟！真想不到，“君子”，这个两千年前孔老二心目中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理想人物，在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苏修眼里，今天竟然成为如此不可超越的“摩登圣人”，给加上了这么多的桂冠。然而，苏修叛徒集团把修正主义观点和孔老二的“君子”“合二而一”，竭力美化的卑鄙目的和手法，是欺骗不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的。人们完全清楚，苏修叛徒集团吹捧孔老二的道德观，吹捧“君子”，首先是为了反华；同时，也是为了将这种“君子”树为修正主义的典型，把他们一小撮特权阶层打扮成道貌岸然的“君子”，以欺世惑众，维护其法西斯统治。其实，孔老二所说的“君子”，就是反动统治者的代名词，是和“小人”即奴隶相对照而言的。苏修叛徒集团声嘶力竭地吹捧“君子”，恶毒地咒骂所谓“追求荣华富贵的小人”，



不打自招地暴露了他们站在人民的对立面，顽固推行修正主义的叛徒嘴脸，证明他们象列宁所斥责的叛徒考茨基一样，“是糟踏马克思主义的头号伪君子”。（《第二国际的破产》）

孔老二的道德信条，贯串着一条黑线，这就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人性论。剥削阶级为了从思想上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在进行道德说教时，往往要搬出超阶级的“人性”作为伪装，标榜他们道德的“全民性”，妄图掩盖剥削阶级道德的阶级本质。正是在这一点上，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丘的人性论，曾为以后两个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走向腐朽没落时一再利用，直至今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时候曾经指出，“**各色英雄好汉都在道德哲学中为了真正的道德而各显神通。费尔巴哈为了人而爱人，圣布鲁诺爱人，因为人‘值得’爱，而圣桑乔爱‘每一个人’。**”（《德意志意识形态》）林彪以及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也必然要贩卖这一套破烂。他们企图捏造出这样一种神话：敌对的阶级之间存在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义道德关系，存在着“人类共同的感情”，存在着彼此发生共鸣的“忠恕”之心和“人类之爱”。苏修为了证明孔老二的仁义道德，是同他们长期以来宣扬的“人道主义”口号一脉相通，一再声称孔老二“仁的本质在于‘真正同情’别人”，“把任何人都看成人”。但事实上，苏修叛徒集团从来都不把国内人民和世界人民“看成人”，他们对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政，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和颠覆，他们吹捧孔老二，正是为了在“人道主义”纱罩下面掩盖其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毛主席指出：“**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对林彪和苏修鼓吹的仁义道德的批判，同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联系起来。

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一场尖锐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决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仁义道德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要象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努力“**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荡涤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污泥浊水，使共产主义道德更加发扬光大。



人民英雄不容抹煞

——批判尊孔派对柳下跖的歪曲和诬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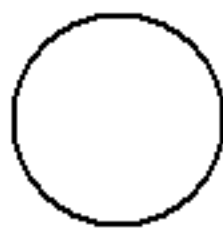
甘 清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对于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劳动人民和一些进步的思想家，都肯定跖，颂扬跖，怀念跖；而反动派和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则象当年孔老二一样，一提起跖，便吓得脸色苍白，惶恐万状。他们始则竭力诬蔑跖，攻击跖；继则歪曲史实，抹煞跖，否定跖，妄图否定跖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否认跖的批孔实有其事，把跖说成“子虚莫有”，从而替孔老二掩盖反革命罪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应当遵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历史唯物论的教导，彻底批判尊孔派对柳下跖的攻击诬蔑，肯定柳下跖在批孔斗争中的功绩，驳倒封建文人制造的反动寓言说，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柳下跖是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是批孔的英雄

春秋末期，柳下跖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被孔老二在“笔削春秋”时给一笔抹煞了。孔老二的信徒们为了替孔老二掩盖反革命罪行，更是竭力攻击、诬蔑柳下跖，并且不惜采取编造、歪曲历史的卑鄙手法，妄图抹煞、否认柳下跖。有关柳下跖的事迹已经被孔孟之徒搅得混乱不堪，柳下跖的形象更被他们糟踏得不成样子。尽管如此，只要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仍然能够拨开尊孔派们散布的迷雾，暴露出事物的本质：柳下跖确实是一位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历史上劳动人民中的批孔英雄。

柳下跖的具体生卒年月，已不可详考。综据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大体可以肯



定他是春秋末期鲁国北部柳下地区人。《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说柳下跖生得身材高大，目光炯炯，声若乳虎，英姿勃勃。他的思想象喷泉一样不循渠道，意志象旋风一样不受束缚，英武足以击退进攻的敌军，辩才足以驳倒巧伪弄舌的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在袭击奴隶主宅院的时候，他表现得机智勇敢。袭击前，必先进行详细周密的调查，弄清奴隶主榨取奴隶血汗得来的宝贵财物隐藏在什么地方；袭击时，身先士卒，带头冲锋；撤退时，不怕牺牲，沉着殿后；在决定是前进还是后退的关键时刻，能够当机立断；对于从奴隶主手中夺回来的胜利果实，分配得公平合理。由于他身上具有上述优秀的品质，因而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受到革命人民的尊敬。

相传柳下跖当时所率领的奴隶起义军多达九千人，驰骋天下，所向无敌，奴隶主贵族的军队望风披靡，莫敢与战。起义军所过之处，大小诸侯国的奴隶主贵族，无不吓得魂飞魄散，龟缩在城堡里不敢出来。奴隶主们一提到跖就非常头痛。

柳下跖生活于春秋末期，这个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动的伟大时代。虽然当时的奴隶制度已行将崩溃，但是，反动的统治阶级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资本论》）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就是我国古代史上被剥削阶级通过武装斗争，解决社会矛盾的一次伟大的尝试。

柳下跖领导的起义军，使各诸侯国奴隶主武装闻风丧胆，于是作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孔老二，为了配合奴隶主对柳下跖起义队伍的暴力镇压，便亲自出马，去见柳下跖，妄图以“造大城数百里”，“尊将军为诸侯”作诱饵，骗跖放弃武装斗争，充当奴隶主的顺民。作为奴隶起义杰出领袖的柳下跖，不仅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在同孔老二面对面的舌战中同样是一位气吞山河的好汉。针对孔老二的丑恶表演，柳下跖手按宝剑，声如猛虎，义正辞严地批判了孔老二拚命维护、复辟奴隶制的累累罪行，痛斥他是：“作言造语，妄称文武”，企图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鼓吹“孝悌”之道“欲求富贵”的盗丘；“好面誉人”的“巧伪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说他罪大该杀，命他立即滚开！柳下跖一席话把孔老二吓得面无人色，目瞪口呆，



无言以对，狼狈而逃。

柳下跖同孔老二的论战，是革命同反革命、奴隶同奴隶主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正面交锋。跖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真理在手，敢于藐视成汤、文、武之类的历代奴隶主头子，以及他们的“圣人”孔老二这样一些庞然大物；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深刻批判了孔老二鼓吹的一套维护奴隶制的吃人的旧礼教和旧观念，光辉照耀千古。

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在不同程度上反对过孔老二，但是象柳下跖批判得如此尖锐深刻的却不多见。这是因为跖所代表的奴隶阶级，生活在奴隶制的残酷压迫、剥削之下，最了解孔老二那套说教的反动本质。柳下跖痛斥孔老二的事实深刻说明：孔孟之道是劳动人民的死敌，而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劳动人民总是站在批孔、反孔斗争的前列。因为，劳动人民如果不首先起来冲破孔老二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那套反动精神枷锁，就不会敢于起来造反。

柳下跖领导奴隶起义有着鲜明的旗帜。他大胆宣扬“先王”之行不足法、“圣人”之道不足贵的革命造反精神，坚决反对孔老二的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的反动谬论；为奴隶们争取眼要看色、耳要听声、嘴要辨味、志气要满足的权利，反对孔老二的不合于礼不看、不合于礼不听、不合于礼不说、不合于礼不作的人身禁锢；追求“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平等社会，反对奴隶主任意压迫、剥削、摧残奴隶，过着不劳而获寄生虫生活的奴隶制度。正因为有着这种明确的社会要求，跖所率领的奴隶起义军才表现得立场坚定，目光远大，高官厚禄骗不了，武装镇压吓不倒。奴隶起义军不仅从经济上打击了奴隶主，而且从政治上动摇了奴隶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柳下跖确实是一位领导奴隶起义的杰出英雄，从来没有任何一部书记载过跖是怎样失败的。《史记·伯夷列传》中说：跖“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吕氏春秋·当务》篇里记载：跖临死时叫人将铜锤放到棺材里，说如在地下遇见成汤、文、武等这些商、周的大奴隶主头子，将敲碎他们的脑袋。这番话充分表现了柳下跖对那些“先王”们的无比仇恨，对孔老二复古倒退思想的深恶痛绝。生前未能完成推翻奴隶制的革命事业，死后还要在地下和他们较量。看，柳下跖的斗



争精神是多么顽强彻底啊！

公元前一世纪，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大起义，在罗马史上写下了天翻地覆的一页。马克思称赞他“**具有高贵的品格，为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代表**”。（《致恩格斯的信（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列宁誉之为“**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论国家》）柳下跖在春秋末期领导的我国奴隶大起义，不论就其起义规模、起义时间和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来说，都是可以同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大起义互相辉映的。柳下跖的起义，不仅在我国古代史上应当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世界奴隶革命史上也是值得一书的。

劳动人民永远铭记柳下跖

毛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在劳动人民看来好得很！一些主张革新和进步的人士，也曾给予过它一定的积极评价。但是历代尊孔派则对柳下跖视若洪水猛兽，拼命地攻击他，诬蔑他。

孔老二的嫡传徒孙孟轲，胡说什么柳下跖的门徒是一些听到鸡叫就起床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奔波的人们；（《孟子·尽心上》）力图在秦国复辟奴隶制的大奴隶主吕不韦，把柳下跖领导的起义军贬为“开闭取楗”、钻穴逾墙的“小偷”；（《吕氏春秋·异用》）西汉尊孔派的代表人物刘向，诬蔑柳下跖“凶贪”；（《说苑·丛谈》）南宋尊孔派头子朱熹，在编辑《孟子要略》时，把《孟子》全书删了三分之二，但却没有忘记保留孟轲对柳下跖的攻击；清代反动文人俞樾，极其恶毒地辱骂柳下跖是“虎豹之属，贪骨之类”，等等。其实，历代尊孔派对柳下跖的上述攻击，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不过是孔老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唾余罢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恩格斯：《反杜林论》）剥削阶级所谓超阶级的、统一的、永恒不变的道德，是骗人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无产阶级并不一般地否认人们的利益，而只是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是代表着哪个阶级的利益。毛主席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革命就



是为了改变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就是为了争得某个或某些阶级的利益。恩格斯指出：“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正是为了争取奴隶阶级翻身求解放的利益，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对历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孔孟之徒恶毒攻击柳下跖领导的起义军是“孳孳为利”，其罪恶目的，是为了替反动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起义制造反革命舆论，妄图使劳动人民永远在他们的剥削奴役下甘当顺民。其实，孔孟之徒都是疯狂追逐私利的吸血鬼，是一伙极其虚伪无耻的两面派。孔老二嘴里说什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实际上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下》）叛徒、卖国贼林彪，诬蔑劳动人民见面时只会说“恭喜发财”，而实际上他正是复辟资本主义、鼓吹“一本万利”的政治骗子。这就是从孔老二到林彪这些两面派所谓讲“义”不讲“利”的真面目。

毛主席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尊孔派为了搞复古倒退，反对革命，竭力攻击跖；劳动人民要反抗，要革命，热情颂扬跖。古代劳动人民对于柳下跖的这种颂扬本身，就是对尊孔派们攻击柳下跖的一个有力回击。

柳下跖领导奴隶起义的英雄事迹，早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就已经在劳动人民当中传播得家喻户晓，有口皆碑。法家代表人物荀况，在《荀子·不苟》篇里记述了这种情况，说：柳下跖的革命事迹吟咏长在人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

在黑暗的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为了获得自身的解放，敬仰柳下跖，怀念柳下跖，把他颂为英雄。南宋末年周密著的《癸辛杂识·宋江三十六赞》中就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对柳下跖的这种思想感情。他说：古代人赞扬柳下跖为革命人民的圣人，是因为他对于革命的信仰达于极点，能够出类而拔萃。在后世的一些民间戏剧、小说中，也有柳下跖的英雄形象出现。在河南濮阳县、山西太原市郊的人民群众中，至今尚有许多关于柳下跖英雄事迹的传说。



由于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在劳动人民当中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在他生前和死后，都有不少起义的奴隶，打着跖的旗号聚众造反，打击奴隶主的统治。因此，后世就有了许多关于柳下跖坟墓和遗迹的传说，这些正是柳下跖活在劳动人民心中的证明。《庄子集释》、《史记集解》、《史记正义》、《后汉书注》等书记载：今山东省泰山和历城县东平陵、山西省平陆县“临河曲”，以及陕西省华阴县“潼乡”都有柳下跖坟。明代修的县志中载：今河南省濮阳县、山东省章丘县也有柳下跖墓。唐人段成式在他著的《酉阳杂俎》里说：“高堂县（即今山东省章丘县）有鲜卑城”，城旁有柳下跖冢，“冢极高大”，起义农民“尝私祈焉”。山西《太原县志》记载：今太原市南郊柳子谷山上，有柳下跖“插旗石”一块，“石上有臼，深三尺许”。总之，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柳下跖的英雄事迹，一直在劳动人民当中传颂不止。于是不仅鲁国有跖，齐国、卫国、晋国、秦国也都有跖，跖满天下。

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柳下跖，将永远作为古代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榜样受人敬仰。他的英名已经永远铭记在劳动人民的心坎中，流芳百世。而那些攻击、诬蔑柳下跖的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们，则象一切反动派一样，最终被劳动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封建文人制造的“寓言”说是一个骗局

柳下跖是一个确证无疑的历史人物。对于他的革命事迹，从战国到东汉的四、五百年间，虽然遭到孔孟之徒的恶毒攻击，但是并无一人提出过怀疑。西晋时期，随着孔老二在思想界反动地位的确立，为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服务的主观唯心主义玄学占据了支配地位。尊孔派们出于反革命的需要，视《庄子·盗跖》篇记载的柳下跖批孔事实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他们认为即使再继续对柳下跖进行更多的诬蔑，也抵消不了柳下跖批孔事迹在劳动人民当中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影响。于是，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玄学家郭象，便通过对《庄子》一书的注释，采取篡改、歪曲历史的拙劣手法，硬把《盗跖》篇说成是“寓言”，妄图否认柳下跖批孔确有其事，否定柳下跖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后来注《庄子》的人，由于多属孔老二的信徒，也



大都采用了郭象的说法。因而，一千多年来，从西晋郭象开始编造出来的这个歪曲历史的反动寓言说，就成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奉行的正统观念，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

尊孔派们编造的这个欺骗了人们一千多年的反动寓言说，外表颇为吓人，但是戳开一看，则十分荒唐可笑。

郭象判《庄子·盗跖》篇为寓言的重要手法，就是把柳下季牵强附会为柳下惠，接着便武断地说：“展禽（即柳下惠）是鲁僖公时人，至孔子生八十余年，……不得为友，是寓言也。”然而，柳下季和柳下惠是两个人，这在先秦著作中是记载得一清二楚的。综据《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书所载以及郑玄、赵岐等人注释，柳下惠姓展名禽（一说名获字禽），在鲁僖公时（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六二七年）任过司寇属下的士师（即“警视总监”下边的监狱长）。而柳下季则是孔子同时代人。《吕氏春秋·审己》篇说：“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韩非子·说林下》记载了与《吕氏春秋·审己》篇大体相同的内容，但将柳下季写成为乐正子春。而乐正子春是曾参的学生，（鲁昭公十九年《公羊注疏》）这是柳下季与孔丘同时代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庄子·盗跖》篇称“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本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郭象硬把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生拉硬扯在一起，这是对历史的公然伪造。

柳下季是孔丘同时代人，“柳下季之弟”柳下跖也是孔丘同时代人，这在西汉桓宽著的《盐铁论》、东汉许叔重作的《淮南子》注和明代焦竑写的《焦氏笔乘》中，都有着明确的记载。而《庄子·盗跖》篇的注释者，则置这些记载于不顾，闭起眼睛硬说：“跖者，黄帝时大盗之名。是跖之为何时人竟无定说。……读者勿以寓言为实也。”“跖者，黄帝时大盗之名”的提法荒诞至极！黄帝是传说中的原始社会人物，那时怎能会有“大盗”（起义奴隶）？西周之前，尚无“盗”字，那时把劫掠财物的行为写作“寇攘奸宄”。（《尚书·周书·康诰》）“盗”这个字，是春秋时代才有的。它在《春秋》一书中，首次出现于公元前五六三年（鲁襄公十年），是专门用于对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犯上”行为进行诬蔑的。统



治阶级诬蔑柳下跖为“大盗”，正好说明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发生在春秋末期，柳下跖与孔丘是同时代人。从史书记载奴隶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状况来看，象柳下跖领导的那样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也只有在前五五〇年之后才有发生的可能。

《庄子·骈拇》篇和《战国策·齐策四》都说柳下季和柳下跖是鲁国北部柳下地区人。郭象对于这些先秦古籍的记载视而不见，而对于东汉以后李奇的《汉书》注释则奉为至宝，说什么“跖，秦之大盗也”。“跖，秦之大盗”一语，在秦汉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根据。

尊孔派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故意散布迷雾，制造疑团，从而达到抹煞跖确有其人，跖批孔实有其事的反动目的。

然而，骗子的谎言怎能掩盖得住历史的真实。柳下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这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跖的名字和跖的革命事迹，在先秦两汉的著作中有着大量的记载。目前已经查到的就有：《商君书》、《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盐铁论》、《论衡》、《汉书》等十七部著作四十五篇文章。如果历史上从无柳下跖其人，怎么能够在四、五百年的长时间内有这样多的人写文章一再提到他？怎么有许多情节在不同学派的著作中记载得基本一致？对于这样众多的古籍记载，西晋以后的尊孔派们是推翻不了的！

《庄子·盗跖》篇，是后人根据劳动人民关于柳下跖英雄事迹的许多传说写成的。这样的作品，虽然难免会有某些细节的出入、后世语言和作者错误思想的混杂。但是，只要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是可以作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握住历史的真实的。根据劳动人民传说写成的作品，比之孔老二的信徒们按照“合于道者著之，离于道者黜去之”（韩愈：《杂著·读荀》）的唯心史观炮制出来的官方“经典”，要可靠得多。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们应该歌颂劳动人民的批孔、反孔斗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把孔孟之道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让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迎着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论 商 鞅

梁 效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杰出代表。他所进行的变法运动，是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时代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是，由于尊儒反法思想的反动宣传，商鞅这位大有作为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很长的时期内却一再受到攻击和诬蔑。“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章太炎：《尴书》）叛徒、卖国贼林彪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拾历代反动派的牙慧，恶毒咒骂法家和商鞅，借以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事业。今天，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的阶级内容，正确评价商鞅和法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



一

商鞅（？——公元前三三八年），本名公孙鞅，卫国人。他“少好刑名之学”，（《史记·商君列传》）年轻的时候，就跑到法家发祥地之一的魏国，在崇尚法家的魏国宰相公叔痤那里当一名家臣，研究和总结了李悝、吴起等早期法家的理论和变法经验。后来到了秦国，由于主持变法获得显著成功，当上了秦国的大良造（相当于相国兼将军），并被封为商君。因此，历史上又称他为商鞅。

商鞅所处的时代，是新兴的封建制度取代腐朽的奴隶制度的社会大变革时代。那些反动的奴隶主贵族，被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杀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没落奴隶主阶级同人民大众、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新兴地主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统一要求同奴隶制分封制造成的割据状态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革命和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十分激烈。“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



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新民主主义论》）在当时这样一个“天下大乱”的形势下，社会向何处去？人们向何处去？各个阶级、各个政治集团都纷纷提出自己的方案。这就是当时“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儒家的孟轲，大言不惭，把自己比作“救世主”，狂叫：“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然而这个家伙抛出来的仍是一条“克己复礼”、让历史大开倒车的反动路线。其他各家各派的人物，也都拿不出切中时弊的有效办法。只有法家才看到了社会前进的方向，而商鞅在和儒家的尖锐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法家前辈的学说，制定和实践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适应了时代提出的任务，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纵观全局，我们可以看到：在同时期形形色色的政治家、思想家中间，商鞅是一位最能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物。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和反动儒家之间的两条思想路线斗争，主要表现为主张社会变革的进步历史观同主张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的斗争。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就是一个反对变革，主张“克己复礼”，倒退到西周奴隶制社会去的复古狂。与商鞅几乎同时的孟轲，继承了孔丘这条复古路线，主张一切按旧章程办事。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咬牙切齿地诅咒历史上代替旧事物的新兴力量都是罪上加罪的大“罪人”，攻击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新生事物。针对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商鞅痛快淋漓地驳斥了那种“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谬说，针锋相对地提出“不法古，不修今”的战斗口号，指出“法古”则落后于时代，“修今”则跟不上形势，坚决反对复古倒退，反对故步自封。他从“世事变而行道异”的历史观出发，提出了“适于时”，（《商君书·画策》）“恃其势”，“恃其数”（《商君书·禁使》）的原则，就是要认清时代的变化，根据形势的需要，采取不同的办法。李悝、吴起在变法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提出象商鞅那样鲜明和完整的变革路线。商鞅在创立法家思想路线方面有着重要的建树，超过了他的法家前辈。

在政治路线方面，商鞅提出了“法任而国治”（《商君书·慎法》）的“法治”路线，和儒家的“礼治”路线鲜明对立。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礼，也没有超阶级的法。儒家给“礼治”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从孔丘念“仁”经，到孟轲讲“仁政”，



仿佛“礼治”之下，一切都是“以德服人”，充满了人类普遍的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其实，那“礼治”并非不讲镇压和刑法。礼治礼治，“克己复礼”而治，就是要恢复周代的奴隶制度。儒家反对变法，要保护和实行的正是旧的奴隶主阶级的法。看，孟轲之流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活动是何等残忍：搞进步的统一战争吗？“服上刑”！要用最重最重的刑法。开垦荒地，发展封建经济，破坏井田制吗？也要重法处置。在这里，恻隐之心呀，仁爱之心呀，统统抛进茅厕里去了，“礼治”终于露出了它残暴的奴隶主阶级专政之法的狰狞面目。

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就比较坦白些。他公开主张“法治”，其本质就是主张变革，要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这是他分析当时社会矛盾得出的正确结论。他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察要”，也就是要捉住社会时弊的要害。什么是“要”呢？他认为，当时社会的大问题就是“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一人耕而百人食”。从事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人太少，而游手好闲的人太多了。商鞅把社会上的游食者列为五大“奸民”，即“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这五大“奸民”，主要就是那些享受世卿世禄的奴隶主世家贵族，大工商奴隶主，以及那些为了维护旧制度到处奔走、钻营官职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这些人不但象病虫害毁庄稼那样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而且还在上层建筑领域里鼓吹礼乐、仁义，反对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商鞅对此尤为深恶痛绝，点名痛斥儒家“仁义、礼乐”这一套是危害人类的“虱”！他认为，当时最大的急务就是去掉这些“奸”和“虱”。商鞅的这一主张确实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随着奴隶制度的日益崩溃，寄生的奴隶主阶级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就越来越突出地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除掉这个社会赘瘤，才能使社会前进一步。

为了除掉“奸”和“虱”，商鞅提出以法和农战为主要内容的变法路线。就是充分发挥地主阶级专政的作用，一方面作为“去奸之本”，以严厉的刑罚狠狠打击奴隶主阶级反动势力；另一方面采取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等措施，以壮大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商鞅认为，“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商君书·开塞》）这比起李悝的“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晋书·刑法志》）来，其不同之处是把主要打击矛头明确地指向没落奴隶主阶级。当然，李悝和商鞅的法治，



也包含对劳动人民的镇压，这是他们的剥削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另外，商鞅“以战去战”，“以刑去刑”的思想，闪烁着朴素辩证法的光辉，毫不含糊地公开主张用新兴地主阶级进步的统一战争去消灭反动奴隶主的诸侯割据战争，用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代替没落奴隶主阶级专政，鲜明地反映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生气勃勃的革命锐气。

二

商鞅变法是商鞅一生的主要政治实践。他运用法家的革新学说，紧密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先后两次在秦国实行变法，制定了一系列破旧立新的变法措施：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确立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普遍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坚决实行“法治”，进一步强化地主阶级专政；废井田，“开阡陌封疆”，重农抑商，招民垦荒，从法律上确认封建土地所有制，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他借助革命暴力，摧毁了秦国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新旧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中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

列宁说：革命“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又说，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就是“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论策略书》）在秦献公武装夺取政权的基础上，商鞅变法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需要，打破了秦国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使秦国由一个奴隶制国家转变为一个封建制国家，这是商鞅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分封、等级、世袭的制度是奴隶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是奴隶主阶级层层统治和世世代代剥削广大奴隶的制度。商鞅废除奴隶主贵族的分封、等级和世袭特权，代之以新兴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正是当时新旧社会制度斗争的重大问题。商鞅规定，“国以功授官予爵”，（《商君书·靳令》）不以农战，则无官爵，沉重打击了那些“贵族卿士之家”和依附于他们的“游惰之民”，改变了奴隶主贵族把持政权的“君弱而臣强”的局面。同时，通过奖励军功“而显耕战之士”，使各级政权逐步转移到新兴地主阶级手中。后来，商鞅又在秦国普遍推行县制，剥



夺了奴隶主贵族的地方特权，废除了他们的私家武装，把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大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

商鞅充分发挥新的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采取种种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消灭旧的经济基础，用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这是商鞅又一重大的历史功绩。

商鞅变法前，秦国奴隶制的井田制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地大而不垦”的情况，“有地方数千里”但粮食还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尤其是，井田制的存在，保存了奴隶主贵族在土地上的世袭垄断特权，妨碍了封建国家的政治统一。商鞅颁布“开阡陌封疆”的法令，废除了井田制，承认地主、自由民土地私有制，这是生产关系方面的一次根本性的大变革，它摧毁了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奠定了地主经济在秦国的支配地位。在新的封建所有制下，社会仍然是建立在阶级剥削的基础上，但剥削形式改变了，原来完全没有权利的奴隶，变成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自己支配自己**”（列宁：《论国家》）的农民，即已经不算地主的直接私有物了。他们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秦国“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落后面貌。

为了保证变法革新的顺利进行，商鞅坚决实行法治。他认为，法令是地主阶级的生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主张“刑无等级”，赏罚要“不失疏远，不违亲近”，彻底否定了奴隶社会“刑不上大夫”的制度，公开宣布对敢于违法的奴隶主贵族要实行坚决镇压。他在秦国公布了统一的法律，禁止奴隶主势力为非作歹，使他的变法事业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路线正确，后来居上。商鞅变法的正确路线，使秦国“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国以富强”，（《韩非子·和氏》）迅速由一个被诸侯看不起的奴隶制弱国，一跃而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的封建制强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攻击商鞅的“法治”“包含着一系列反动的概念”，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咒骂法家是“罚家”，这不过是孔老二徒子徒孙的老调重弹。恩格斯说：“**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商鞅坚决实行法治，充分发挥暴力的革命作用，对反对变法革新的反动势力采取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这正是他的事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苏修、林彪咒骂革命的暴力，把进步说成反动，这正说明他们和历史上的没落奴隶主贵



族一样，都是人类社会的“奸”和“虱”，是倒行逆施的复辟党。

三

在商鞅变法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极其激烈的斗争。商鞅的一生就是与奴隶主反动势力顽强斗争中度过。

变法前，在秦孝公面前，商鞅与旧贵族政治代表甘龙、杜挚就“要不要变法”问题，展开了一场尖锐的论战。斗争的结果，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的革新理论，击败了儒家鼓吹“法古”、“循礼”的陈词滥调，从思想理论上为变法扫清道路。变法刚开始，奴隶主贵族利用传统习惯势力，煽动成千成千人在首都闹事，“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史记·商君列传》）妄图一举扼杀初试锋芒的变法运动。后来，他们又唆使太子犯法，公开挑衅，蓄意破坏变法路线的贯彻。面对着这种严重的政治形势，商鞅没有被反动保守势力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也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他敏锐地抓住问题的症结，指出：“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史记·秦本纪》）决心狠狠打击那些破坏变法的顽固派。割了公子虔的鼻子（劓刑），在公孙贾脸上刺字（黥刑），严惩了太子的两个师傅——真正的幕后策划者；还杀了犯法的奴隶主贵族祝懣；并把捕获的七百多个破坏变法革新的反革命分子全部在渭水边镇压了。商鞅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对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实行专政，对旧社会旧势力的垂死挣扎实行革命镇压，充分表现了商鞅作为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政治代表敢作敢为的战斗精神。

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纠集一小撮死党，继续策划反革命活动。一些本来“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的旧贵族改变策略，装作奉公守法的样子，挤出一副笑脸，竟娓娓动听地论起变法的好处来；而反动儒生赵良则是另一副面孔，在奴隶主贵族指使下，赤膊上阵，舔起儒家唾余，跑到商鞅跟前，歇斯底里地咆哮：“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指责商鞅变法不得人心，要商鞅弃政下台，隐退归田，否则就要来收拾他，反动气焰嚣张已极。阶级敌人软硬兼施，又是阿谀奉承，又是威胁讹诈。商鞅头脑清醒，坚持了法家路线，他痛斥那些“当面捧场、背后骂娘”的旧贵族是“乱化之民”，把他们



统统迁到边城去，摧垮这伙地头蛇的老巢；并断然拒绝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最后通牒”，以把变法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和行动，回敬了赵良这帮反革命侏儒。

然而，商鞅变法毕竟是地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一死，与旧贵族勾搭在一起的太子驷上台执政，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牛鬼蛇神纷纷从阴沟里爬了出来。公子虔们立即大肆造谣，诬告“商君欲反”，（《史记·商君列传》）秦惠文王（即太子驷）下令逮捕商鞅。公元前三三八年，反动派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这个杰出的法家战士。商鞅以身殉职，为新兴地主阶级革新事业献出了生命，结束了战斗的一生。

杀害商鞅，是奴隶主复辟势力对新兴地主阶级血腥的反攻倒算，是继孔丘杀少正卯，楚国旧贵族乱箭射死著名法家吴起之后，又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暴行。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儒家与法家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没有调和的余地。苏修叛徒们宣扬儒法合流论，说什么儒法两派“追求同一目的”，这种拙劣的谎言，卑鄙的伎俩，既不能抹煞血迹斑斑的历史事实，也丝毫无助于掩盖他们自己今天对革命力量的法西斯暴行。

商鞅被害后，秦惠文王推行了一条排斥法家、信用旧贵族的政治路线，秦国的政局出现了暂时的反复，这说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然而，“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商鞅被害，“秦法未败”，商鞅的路线和事业并没有被消灭。这一点，值得分析和研究。

列宁说：“革命愈深入，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商鞅在变法期间，从开阡陌封疆、奖励耕战到废除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制度，从建立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到“燔诗书而明法令”，总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深深地掘了旧地基，给奴隶主阶级以强有力的打击，使新兴地主阶级成为左右秦国政治的强大力量，使商鞅之法的继续推行有了一个牢固的阶级基础。同时，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比较注意宣传，他认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商君书·定分》）因而使得“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策一》）人民群众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变法革新的好处，就成为抵制和反对旧制度复辟的巨大物质力量。



总之，秦法之所以未败，根本的原因在于，商鞅之法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复辟势力只能得逞于一时，决不能倒转历史的巨轮，决不能改变封建制度必然要代替奴隶制度的历史规律。

商君身死法未败，秦皇终奏统一功。尽管出现了一些波折，秦国还是继续沿着商鞅变法的法家路线前进。王充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乃至采取焚书坑儒的坚决镇反措施等等，都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深的基础上，成功地实行和发展了商鞅等人的法家路线。沿着这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路线前进，秦始皇为祖国统一、历史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封建社会的“千古一帝”。

对于商鞅这样一位在历史变革激流中斗争一生的人物，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褒少贬多，但却泾渭分明。历史上那些主张革新的进步人们，大都肯定商鞅的历史功绩。战国末年的韩非在自己的出色著作中，记述了商鞅的英勇业绩，发展了商鞅的先进思想，成为法家理论集大成者。西汉著名法家桑弘羊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丰富了商鞅的学说，他针对儒家贤良文学攻击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的谬论，指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功如丘山，名传后世”。（桓宽：《盐铁论·非鞅》）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在顽固党对商鞅一片咒骂声中，以大无畏的精神，写出了“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的战斗诗篇，（《商鞅》）并在变法实践中，贯彻商鞅的理论。与此相反，历史上那些守旧、复古派则从反动的政治需要出发，往往大骂商鞅变法。西汉的“孔老二”——董仲舒就恶毒攻击说，秦国“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造成了祸国殃民的结果。（《汉书·食货志上》）宋代保守派苏轼，攻击商鞅变法使老百姓“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亡”，借此发泄对王安石革新事业的刻骨仇恨。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伙披着羊皮的豺狼，他们手中没有真理，只得捡起这些儒家肮脏武器，妄图借攻击商鞅，来诋毁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看，这批马列主义的叛徒，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儒家的对立面法家，正确评价和阐述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和尊儒反法思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



注意解决路线问题

中国共产党武鸣县委员会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我县深入开展。我们充分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和机关干部，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纲领，同时紧密联系本县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帮助县委提高路线觉悟，进一步把路线搞对头，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全县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

通过批林批孔，解决县委“一班人”如何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开始我们并不是很自觉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经过反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逐步认识到运动的重点要放在领导机关，而就一个县来说，关键在于把县委的路线搞对头。如果不把路线搞对头，县委“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回顾一下我们的工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我们县罗波公社有个凤林大队，原来是全县比较后进的大队。为了改变这个大队的面貌，县和公社曾先后两次派人去蹲点。但由于没有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认真抓好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所以落后面貌一直没有改变。后来，县委一位领导同志带领机关干部，第三次到这个大队蹲点。他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对群众和干部进行了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打击了进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批评了资本主义倾向，从此这个大队的面貌发生很大变化，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多种经营也有了发展，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县委领导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全县工作的好坏关系极大。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注意解决县委“一班人”的路线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主席说：“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要搞好批林批孔这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解决县委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坚决相信和依靠群众。我们重温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县委常委内部开展了如何正确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依靠群众来解决领导机关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基本经验。忘记了这条基本经验，就会重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领导很不得力，甚至压制群众的错误。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群众，才能正确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提高对错误路线的识别能力，坚定纠正错误的决心和信心，把县委的路线搞对头。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敢字当头，和群众一起，并肩战斗，向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即使犯有某些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县委“一班人”提高了认识，积极地投入了运动，认真学，深入批。同时，还采取召开常委扩大会、各种类型座谈会和走出去征求意见等方法，发动广大群众和机关干部，紧密联系实际，揭露和分析县委在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

经过广泛深入的发动，群众和干部用大字报、会议发言和来信来访等形式，向县委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批评意见。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县委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面，有抓一阵松一阵的现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些新生事物，支持不够有力；在农业学大寨问题上，两种思想的斗争还没有很好解决。对于群众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通过深入批林批孔，不断提高认识，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加以改正。

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一阵松一阵，不能坚持抓下去，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认识不足。抓了一阵，取得一些成绩，就认为“差不多了”，“可以管一阵子了”，因而就放松下来，忘记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委领导成员走出去，同广大工农群众和机关干部一起，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进行深入的批判。通过批判，大家进一步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大家说，林彪一伙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同他们针锋相对，坚决斗争。思想提高了，行动就自觉了。前段春耕大忙，又遇到严重春旱，怎么办？大家一致意见：要抓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抓批林批孔，以批林批孔为动力搞好春耕生产。我们十一名常委，除两名留在机关照顾日常工作外，都带领机关干部下到基层，发动群众批林批孔，大干苦干。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同一些机关干部到陆幹大队，发现这里春耕进度慢，经过调查，原来是阶级敌人利用孔孟之道在进行破坏。他们胡说什么“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妄图用“天命论”来涣散人们抗旱抢插的斗志。根据这个情况，县里去的同志帮助大队党支部放手发动群众，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天命论”，并联系这个大队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批斗了有现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这样，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了抗旱抢插的进度。县委及时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了这个大队抓批林批孔、促抗旱抢插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广大群众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当它们刚刚诞生的时候，我们还是热情支持的。近一两年来，对有些工作却没有认真过问，致使有的新生事物不能很好地巩固和发展。通过批林批孔，在广大群众的严肃批评和热情帮助下，我们提高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林彪反党集团拚命攻击、诬蔑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其险恶用心，就是妄图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新生事物抱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积极扶植还是漠不关心，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认识提高了，便立即采取措施，积极扶植新生事物的成长。我们先后组织了有一百六十多名医务人员参加的宣传队，分期分批深入到问题较多的大队，对合作医疗进行了整顿，并总结推广了一些先进大队坚持办好合作医疗的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全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建立起来的合作医疗制度，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对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一新生事物，我们也有重视不够的问题。在运动中，我们召开工人、贫下中农



座谈会，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并采取措施，充实加强了驻校宣传队。我们还组织革命师生到先进的学校参观学习，推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和进行教育革命的经验。这样，全县教育革命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局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些地方贫下中农组织起自己的理论队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使批林批孔运动搞得有声有色。我们认为，这是批林批孔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应该大力支持，于是总结推广了这方面的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办起了批林批孔学习班。县委已先后培训工人、贫下中农理论骨干五百多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林彪一伙恶毒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激起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义愤。大家用我们县农业学大寨取得的成绩，对林彪一伙的无耻谰言给以有力的回击。通过批林批孔，广大群众和干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大好形势。这就要求我们县委克服保守思想，以适应新的形势，加强对农业学大寨的领导。我们有的同志原来认为，经过几年的努力，保水田不少了，粮食产量不低了，对国家贡献不小了，群众生活不错了，因而不想大干苦干了。很显然，这种思想，不符合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不适应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形势，也违背广大群众和干部要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只有坚决克服这种思想，才能带领群众不断夺取新的胜利。经过反复学习讨论，并深入批判林彪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县委领导成员统一了思想，振奋了革命精神，决心加快农业学大寨的步伐。除了抓好当前生产以外，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全县的水利条件，我们通过实地勘察，通盘考虑，作出了修建乔响引水工程的全面规划，这项工程完成后，可扩大灌溉面积六万多亩，现已开始动工。与此同时，我们还抓了现有水利设施的配套成龙，组织专业队常年施工，对四个水利灌区的三百多公里干渠进行整修，堵渗防漏，加快流速，提高灌溉效能。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批林批孔运动的革命洪流，正在推动着社会主义事业大步前进。我们决心沿着毛主席、党中央指引的航向，继续把全县的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进一步把县委的路线搞对头，团结全县各族人民，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



在斗争中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伍

山西浑源县刁窝大队党支部

我们大队，是个二百六十多户的偏僻山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根据斗争的需要和贫下中农的要求，逐步建立和培养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理论队伍。

对于建立贫下中农理论队伍的重大意义，我们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的。

批林批孔开始后，全队的干部和群众怀着极大的革命义愤，向林彪、孔老二的反动思想猛烈开火，积极投入了战斗。但是，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有一些群众文化水平低，对林彪孔老二的黑话弄不懂，对他们的反动谬论往往批不到要害处。同时，孔孟之道的流毒在我们大队也还存在。什么“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的封建说教，什么“和人一条路，惹人一堵墙”的“中庸之道”，什么“命里有五升，不用起五更；命里二合半，累死也扯淡”的“天命论”等等，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运动引向深入，就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抓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抓住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从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批深批透。

运动中，我们还总结了本大队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批判了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路线，刹住了资本主义妖风，生产大发展，粮食产量翻一番。可是，由于我们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认识不清，抵制不力，前几年又出现过一些资本主义倾向。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深思：为什么对错误路线识别不了呢？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批判过的东西又有反复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执行毛主席革



命路线的自觉性。

通过分析运动的形势和总结历史经验，我们深刻认识到，要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要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要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建立贫下中农自己的理论队伍，“**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贫下中农这支农村批林批孔的主力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这是在农村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

认识提高以后，我们立即着手建立和培养理论队伍的工作。今年二月，经过贫下中农推荐，挑选了十二名路线觉悟高、表现好、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由党支部书记挂帅，建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理论组。其中有老贫农，有知识青年，有妇女。我们注意团结革命的知识分子，把学校教师中的积极分子也吸收到理论组。随着运动的深入，陆续吸收批林批孔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使理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已经发展到三十人。

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是批林批孔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它的产生，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必然伴随着一场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理论组刚成立，阶级敌人就攻击说：“泥腿子要能学理论，除非老牛能上树。”组里有的同志也认为理论很高深，有点望而生畏，觉得大老粗啃书本，握笔杆，是高不可攀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组织理论组的同志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分析农村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大家体会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要使农村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阵地，贫下中农就必须努力坚持学习，“**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还组织大家回忆旧社会地主富农垄断上层建筑领域，全村没有一个贫下中农读过书的历史事实，狠批了孔老二宣扬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谬论。大家认识到，阶级敌人在旧社会剥夺贫下中农读书认字的权利，就是要使劳动人民乖乖地给他们做奴隶；现在他们又攻击贫下中农学理论，就是企图阻止贫下中农掌握革命的思想武器，以便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于是，大家坚定了学好革命理论的信心，发扬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掀起了学习高潮。一位六十岁的老贫农，参加理论组的时候，不识一字，但他知难而进，不能读书



找人念，不认识字请人教，经常坚持到深夜，努力攻克文化关，攀登理论山。几个月来，理论组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实践论》、《矛盾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

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在斗争中产生，也必须在斗争中培养提高。毛主席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培养理论队伍，也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开始时，有的同志以为理论组就是学理论，坐在家里读书写文章。结果，他们写出的文章，往往脱离实际。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后，及时帮助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把他们放到斗争的第一线，和社员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批林批孔，让他们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提高。在批“克己复礼”时，为了更好地结合当地的阶级斗争实际，理论组调查了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事实：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咒骂我们民主政府是“坏人当道”；日寇投降后，地主还乡团攻击我们的革命政权是“暴政”；现在，地、富、反、坏、右又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整得他们“活不下去”。为什么阶级敌人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呢？围绕这个问题，理论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识到：国家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人民的护身法宝，阶级敌人攻击它，就是为了复辟。林彪一伙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绞肉机”，就是妄图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通过调查、学习、批判，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使理论组的同志经受了锻炼，增强了斗志，增长了才干，更加朝气蓬勃。党支部副书记，过去有“让人一步自己宽”的思想。参加理论组学习以后，批判了“中庸之道”，领导群众对破坏春播生产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有力的斗争。

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伍，要注意解决他们学习和劳动中的实际问题。我们根据业余理论队伍是在坚持集体生产劳动的业余时间活动的特点，既给他们创造一定的条件，让他们多读一点书，又教育他们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我们帮助他们制定了必要的学习制度和灵活多样的学习形式，农闲多学，农忙挤时间学，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学习读物，还请下乡干部和学校教



师给他们作理论辅导和上文化课。他们既当先生，又当学生，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一方面给群众作辅导，一方面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在理论组内部，注意发挥老、中、青三结合的优点，让青年人向老贫农学习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老贫农向青年人学文化，互帮互学，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我们大队的理论队伍建立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已经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这一革命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

在理论组的带动下，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更加自觉，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理论组的成员，经常向社员群众宣传看书学习的重要性。他们深入到政治夜校、田间地头、家庭院落，组织和帮助群众认真读书。经过学习，群众尝到了学习革命理论的甜头。他们说：“学好理论真管用，事情根由分得清。”大家普遍感到学习理论之后，站得高了，看得远了。

理论组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带头发言，带头批判，是批林批孔的先锋和骨干。党支部经常和他们一起分析运动的形势，针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和理论辅导工作。运动开始，他们写了《孔丘是什么人，林彪是什么人，批林和批孔是什么关系》的辅导材料，帮助群众提高了对批林批孔重大意义的认识。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针对林彪、孔老二的谬论，帮助群众选学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掌握批林批孔的思想武器。为了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他们深入到贫下中农中进行阶级调查，写出了九份家史和村史，还帮助一百八十多户贫下中农召开了家庭批判会。针对在联系实际问题上出现的不敢联和纠缠具体问题的倾向，党支部和他们一起分析了本大队现实阶级斗争的表现，引导群众联系实际，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路线斗争觉悟，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随着干部、社员精神面貌的变化，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到处都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革命和生产都取得了新的胜利。



培养积极分子 深入批林批孔

青海共和县蒙古大队党支部

我们蒙古大队，有四个生产队，一百四十一户社员，多数是蒙古族，少数是藏族、土族、回族和汉族，通用藏语。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广大群众和干部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战斗。广大贫苦牧民在旧社会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苦大仇深，对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极端仇恨，很快就形成了批林的高潮。但是，由于许多人不知道有个孔老二，不知道孔孟之道是些啥，加上对一些古人、古事很生疏，所以，批孔比起批林来，困难更大些。

知难而进，还是见难而退？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在困难面前，我们大队党支部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规定的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认识到批林批孔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都是尊孔派。孔孟之道是他们开倒车、搞复辟的思想武器。要批判修正主义，就必须同孔孟之道作斗争。不批孔，就不可能深入批林，就不可能彻底战胜修正主义。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贫下中牧主力军的作用，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去实践，在前进中克服困难，积累经验。

毛主席说：“**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我们感到批林批孔如果没有足够数量和一定水平的本民族的骨干队伍，要克服困难，取得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也是不可



能的。运动一开始，我们就举办学习班，培训了六十多名积极分子作为骨干。随着运动的发展，不断壮大了积极分子队伍，现在骨干人数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批骨干分子有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他们中间，有的人虽然学过一些汉文、藏文，但都学得不大通。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在组织学习时，首先把印有汉、藏两种文字的批林批孔文件和材料，一句一句地对照，使他们弄懂弄通。我们还针对林彪的谬论和孔孟之道，选了七十多条毛主席语录，译成藏文，组织他们学习，掌握批林批孔的武器。党支部副书记尼玛，只读过四年书，开始接触到儒法斗争的历史时，弄不清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和“焚书坑儒”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就坐下来，硬着头皮读了一点历史，懂得了“焚书”就是秦始皇下令烧毁了散布孔孟之道的书，“坑儒”就是活埋了四百六十个主张复辟倒退的反动儒生。接着他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教导，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历史事实，认识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一次反复辟、反倒退的革命行动。林彪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其目的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样就更加看清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他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成发言稿，在大小队会上对林彪和孔老二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通过刻苦学习，深入钻研，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提高了思想和理论水平，成了批林批孔的闯将，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一支理论辅导队伍。这些积极分子对中央文件精神接受较快，理解较深。他们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熟悉本民族的情况。在他们的广泛宣传和积极带动下，全大队的批林批孔运动就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用本民族通俗的语言和群众熟悉的事例讲解文件，就能使群众了解孔孟之道的反动观点，开展批判。在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时，群众对“克己复礼”这个词感到生疏难懂，有的人甚至按“克己复礼”的藏语译音作了错误的理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先把孔老二所以要坚持“克己复礼”的原意向群众讲清楚。然后，联系本地区解放前的反动统治制度，来说明“周礼”的内容。解放前，王公、千百户各霸一



片草原，分割统治劳动牧民。统治阶级内部又分成千户、百户等几个不同的等级。王公、千百户死了，就由长子继承统治权。他们世代代骑在贫苦牧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些，就和“周礼”中的分封、等级、世袭等制度相类似。这样一讲解，使群众了解了“周礼”的阶级内容及其反动实质，认识到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要恢复奴隶制，开历史的倒车。林彪扛起孔老二“克己复礼”这面破旗，要学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就是要“兴”被我们推翻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牧区“继”王公、千百户的反动统治的绝世，“举”反动的牧主头人，让那些牛鬼蛇神重新上台。广大群众抓住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批判击中了要害。贫苦女牧民兰措说得好：“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牧主头人想变天，原来他们念的是一本复辟经，走的是一条回头路，都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大家从这里认识到，孔老二的那一套，尽是一些替奴隶主贵族讲话的“吃人”道理，虽然孔老二讲的古话不好懂，但是，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有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一定能够戳穿孔老二这只纸老虎，把他批倒批臭。

毛主席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根据这个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科学观点，我们觉得，联系广大贫苦牧民的切身体验，是深入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我们这个地方，反动统治阶级散布了许多反动思想，广大贫苦牧民是深受其害的。这些反动思想，有的是和孔老二的谬论息息相通的，有的甚至是从孔老二那里搬来的。长期以来，“天命论”是束缚贫苦牧民的精神枷锁。反动牧主头人曾经大肆宣扬“长相好坏父母生，命运好坏前世定”，“幸福灾难在老天，平安苦痛在佛爷”等谬论，用以麻痹和愚弄群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贫苦牧民联系自己的切身体验，对“天命论”进行了批判。贫苦牧民丹增，在旧社会当了二十年“塔哇”（寺院的苦工），活佛曾经对他说：“我们心灵，前世就知道念经，有命当佛爷；你们愚笨，你们的命就是背水、倒灰、喂牲口，当‘加麻’（做饭的）。”可是解放后，还是这个丹增，却翻身做了主人。他的老伴在旧社会被牧主骂作只能当奴隶的“笨



人”，现在当上了大队的妇女干部。丹增说：“这些难道都是因为命吗？不是的。活佛的鬼话和孔老二讲的完全一样，都是用来骗人的。旧社会我们受苦受难，是由剥削制度造成的。我们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有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来就没有什么天命。林彪宣扬孔老二的‘天命论’，就是反对我们革命，妄想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决不能上他的当。”在批判孔老二“仁者爱人”的反动谬论时，广大群众通过回忆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深刻地揭露了“仁爱”的吃人本质。他们说，反动牧主头人嘴里讲着什么“仁”、“爱”，象蜜糖一样甜，干的事却象豺狼一样狠毒。林彪也鼓吹什么“仁爱之心”，但背地里却要搞反革命政变。所谓“仁爱”，就是给狼身上披上羊皮，给刽子手献上哈达。“仁爱”是假的，吃人肉，喝人血才是真的。大家表示，一定要分清狼和羊，对阶级敌人决不能施“仁政”，而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践证明，把孔孟之道和少数民族地区反动统治阶级的罪行联系起来，并联系自己深受其害的切身经历，广大群众就能深刻认识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就能批得深，批得透。

在斗争中，我们体会到，广大贫下中牧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克服困难深入批林批孔的有利条件。关键是要加强领导，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每组织一次大批判，都要先开骨干会，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讲一点历史知识，并联系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把要批判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搞清楚；同时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让他们带头批判。这样做的结果，充分发挥了贫下中牧的主力军作用，闯过了一道道难关，使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地向前发展。

根据社员居住分散、流动性大的特点，我们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组织群众开展批判。一般说，多开小会，少开大会，妇女老人和儿童白天开会批判，放牧员晚上集中批判。居住特别分散不便集中的，由骨干去进行个别辅导，组织他们开帐房批判会，家庭批判会，联户批判会，使他们都能够参加批林批孔，受到反修防修的教育。现在，全大队处处摆战场，男女老少齐上阵，在辽阔的草原上，批林批孔的烈火越烧越旺。



从“天马”看林彪野心家的世界观

靳 南

在林彪床头正中墙上，挂着一张他自己手书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反动条幅。林彪自比“天马”，梦想“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庄子·在宥篇》），充分暴露了他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反动世界观。

“天马”，本来也指的是一种吃草而供人们使役的马，只不过是比较好一点的马而已。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时，先是把得到的乌孙马叫“天马”，后来又得到大宛的汗血马，比乌孙的马更好，所以“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许多人作歌咏赋，把这种马吹得神乎其神，竟说成是上帝赐给人间的神物。一些帝王将相和所谓贤人智士，往往以“天马”自喻，借以标榜自己才能出众，生就不凡，是“受命于天”的。他们身在人间不愿作人，偏要当马，岂非怪事？原来，神化“天马”，正是为了神化自己。自比“天马”，不是要象汗血马那样，叫人去骑，或者拉车干活，而是要“独往独来”，横行天下，称王称霸。

《汉书·礼乐志》载有两首《天马》歌，集中地描绘了“天马”的形象。难得封建文人雕文吐字的功夫，虽然说的是马，但人们从这里却可以看到自比“天马”的林彪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反动嘴脸。

“天马”欲望无边，思想和行动不受任何约束（“志倣傥”），它能够脚踩浮云（“籥浮云”），腾空而飞（“晡上驰”），转瞬万里（“逝万里”），奋摇高举，谁也不能与之相比（“将摇举，谁与期”）。（均见《汉书·礼乐志》）后人常以“天马”来歌颂人，也无非是说他如何与众不同，超凡入圣。李商隐称赞别人策划军机是“手为天马，心绘国图”（《为举人上翰林肖侍郎启》），即手指所向，便可“奇功”而“就”。陆游的《悲歌行》中也说“士如天马龙为友，云梦胸中吞八九”。实际上，“天马”的形象，活现了一副纵心所欲，横行霸道，翻云覆雨，独步天下的野心家的脸谱。林彪自比“天马”，正好说明他是这样一个妄图扭转乾坤、让历史车轮倒转的野心家。他妄图“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以达其篡权复辟的目的。他纠集一伙死党，精心炮制《“571工程”纪要》，并且密书“手令”，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颠覆无产阶级



专政。这正是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反革命野心的极端表现。但是，无视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力量的人，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林彪以“天马”自居，妄图“独往独来”，以为依靠少数人搞阴谋活动就可以决定一切，这种反动的世界观，决定了他的反革命活动只能遭到彻底的破产。

《天马》歌中说：“太一况，天马下”。“天马”为“太一”尊神所赐，象征着人间的帝王。“天马”和“独往独来”连在一起，这就如同庄周所说，是“至贵”的“独有之人”，可以“独治天下百姓”。（《庄子·在宥篇》）“天马”既是天生神物，就能够“游阊阖，观玉台”（《汉书·礼乐志》）。“阊阖”本指天门，“玉台”本指上帝居住的地方。后人把“阊阖”引伸为王府的宫门。唐代王维诗“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描绘的就是大开宫门，各国使臣向皇帝朝拜。林彪这样醉心于“天马”，说明他日夜所做的是皇帝梦。他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胸有大志，腹有良谋”的“英雄”，以当代的周文、齐桓自居；另一方面，又视人民为鸟兽，只能任他宰割。过去的帝王崇信“凤独立”、“鸾无群”的孤家寡人哲学，林彪也正是这样一个唯我独尊、“独往独来”的恶棍。他效法孔老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之道，疯狂破坏和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但是，妄图高踞于群众之上，做统治人民的“独夫”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林彪坚决与党和人民为敌，最后只能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天马”又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阴谋家的化身。它会玩弄各种骗局（“精权奇”），身披两色皮（“虎脊两”），变化如鬼神（“化若鬼”）。（《汉书·礼乐志》）凡是野心家，无不玩弄阴谋诡计，随机应变，掩饰自己，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毛主席揭露和批判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总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面派。长期以来，林彪千方百计地施展“天马”的惯技，把“面带三分笑”、“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骗子哲学，作为处世的诀窍。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要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英国状况》）。林彪的勃勃野心，注定了他必然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之所以要这样做，正象毛主席说的那样：“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逃脱不了彻底灭亡的命运。

神化“天马”，自比“天马”，鼓吹“独往独来”，是历史上反动没落阶级唯心主义、唯我主义腐朽世界观的表现。他们由于手中没有真理，政治上极端虚弱，总是要靠自吹自擂过活。孔老二自吹“天生德于予”；孟轲自命“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庄周狂呼“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陆象山扬言“吾心即是宇宙”，如此等等，真好象没有他们这些人，地球就不转了。林彪这匹“天马”的反动世界观，所以同这些人的反动思想息息相通，因为他们都是腐朽没落阶级的代表。

在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死不悔改的“独往独来”者。陈独秀用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仇视革命群众运动，大骂中国工人阶级“幼稚”，诬蔑农民运动“过火”，搞右倾机会主义的“独往独来”，向蒋介石反动派打出白旗，结果堕落成反动的托洛茨基派。王明自称“百分之百”正确，以太上皇自居，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实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中国革命实际，先是“左”得出奇，后又右得要命，直至投靠苏修，堕落成为叛徒、卖国贼，最近又一命呜呼，独往而无来。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另立中央，最后成了孤家寡人，只身逃跑，到国民党那里当了特务。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匹“天马”虽然是“行”了“空”，但却自我爆炸，葬身荒漠的一抔黄土之中，同样是独往而无来了。历史雄辩地证明：“**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绝妙的是，在中国，螳螂亦称“天马”，林彪这个“独往独来”的“天马”，实际只不过是**以臂当车的螳螂**，怎能不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碎！

我们的党，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完全彻底地、全心全意地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坚持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我们要坚持毛主席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坚决反对林彪“独往独来”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的建设的指导原则，也是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搞“独往独来”的锐利武器。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批林批孔这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进行到底。



尊孔是为了复辟和倒退

河北献县南河头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本林

我们村东北有个汉王坟，方圆六七十亩大。这个汉王就是汉武帝刘彻的哥哥刘德。他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尊孔派。秦始皇下令烧了孔孟的书，他对这件事恨之入骨，下决心“传经翼圣”，把传播孔孟之道作为自己的终生大事。他被封为河间王以后，就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在民间大肆搜罗孔孟的残书，有的出高价收买，又修又补，有的一字一句地抄下来。最后，他把孔孟的这些破烂儿整理出来，献给了汉武帝。这个人死后被封为“献王”，因为他献过书，人们叫他“献书王”。献县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刘德搜书、献书，是对秦始皇烧书的反扑。他为接续孔孟之道效了犬马之劳。历代反动统治者和地主老财捧他为“千古贤王”，庙越修越大，坟越堆越高。他们一面大骂秦始皇烧书犯了弥天大罪，一面大捧刘德献书使孔孟之道绝处逢生，象一盏明灯照亮了天下。

反动统治者和地主老财为什么对刘德这个家伙那样亲？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翻了他的老底，剥掉了他的画皮，不但看清了刘德这个“献书王”的真面目，也进一步认清了林彪鼓吹孔孟之道，推行“克己复礼”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汉武帝的时候，儒法斗争是很激烈的。汉武帝虽然表面尊儒，心里是不信儒的。刘德为什么要向汉武帝“献书”？说穿了，就是因为他嫌汉武帝执行了削弱诸侯王国，巩固国家统一的法家路线，妄想用孔孟的儒家路线去代替它。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



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刘德这个奴隶主残余势力的代表，散布反动的孔孟之道，就是为向新兴地主阶级夺权制造舆论的。他叫嚷什么不学孔孟之道，就象离开了太阳，黑灯瞎火地辨不清方向。“献书”就是他向汉武帝夺权的一次试探，是一场革新与复旧，前进与倒退的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他献书时，向汉武帝大讲了一通倒退、复古的谬论，明里暗里攻击当时推行的法家路线。汉武帝一听很恼火，就连讽带刺地说：汤靠七十里得天下，文王靠百里得天下，你要努力啊。刘德一见自己的诡计被识破，几十年的心血落了空，就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慌里慌张地跑走了。他回来以后，整天心惊胆战，揣着酒杯过日子，第二年春天，就见孔老二去了。

一切反动派搞复辟，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改变路线。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朝思暮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就是为了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他和孔老二、刘德打的是一面黑旗，唱的是一个调，走的是一条道。林彪把孔孟之道当作宝贝，编什么《四书集句》，把孔孟的黑话贴满了他的黑窝，又抄又背，妄图用孔孟之道作为他复辟倒退的思想武器。但是，“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林彪的阴谋败露以后，仓皇逃命，一头栽到蒙古的温都尔汗沙漠里。林彪虽然与孔老二、刘德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他们的下场是多么相仿啊！

刘德这个尊孔派，吹捧儒家、反对法家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给对方抹黑，给自己搽粉，骂法家“残忍”，吹儒家“仁慈”。刘德声言，只要实行了孔老二的“仁”，天下就能永远太平；只要用孔老二的“德治”，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他还假惺惺地贩卖什么，天下有一个人挨饿，就等于我挨饿，有一个人受寒，就等于我受寒。好象他最关心老百姓。实际上他玩的还是孔老二的一套，用所谓“仁政”、“德治”，来攻击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林彪和刘德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他也把孔老二的“仁政”搬了出来，大骂法家是“罚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仁”，是“暴政”，是“绞肉机”。他的黑心就是妄想要我们对那些过去骑在劳动人



民头上的黄世仁、南霸天施“仁政”，对他们“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很清楚，林彪的“仁政”，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林家王朝的法西斯专政。

在阶级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的“仁政”是什么？我们贫下中农最清楚。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吃尽了地主资产阶级“仁政”的苦啊！那时的南河头，又叫“难和愁”。村里大部分人都是被地主老财逼得走投无路，拉着讨饭棍，逃荒到这里来的“叫花子”。那会儿有这样一首民谣：“长工日子苦难言，地主鞭子身上缠，年轻给人当牛马，老来孤身去讨饭。”这就是孔孟之道的“仁政”、地主资产阶级的“仁政”！我十一岁就给地主当放羊娃，吃糠咽菜、挨打受骂，饱尝了这种“仁政”的滋味。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我们贫下中农才当家做了主人，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五一年，我们九户佃农办起了全县第一个合作社，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去年，我们大队的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二百多斤。如今，家家住新房，户户有余粮。旧社会的“难和愁”，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幸福庄”。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深深感到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命根子。

一切反动阶级，本来都是对穷人不吸完骨髓、榨干油，就不撒嘴的毒蛇，但他们总是把“仁政”喊破了嗓子、叫破了街，假装他们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这种现象，告诉我们一条阶级斗争规律：所有搞反革命活动的反动派，都是打着“仁政”的招牌，用“仁政”、“德治”一类的瞎话来掩盖他们吃人的本质。这是因为他们只代表一小撮剥削阶级的私利，没有半点真理，所以他们总是玩弄老虎捻佛珠的把戏，摆出一副伪善的面孔。我们决不受他们的欺骗！

从孔老二到刘德，从刘德到林彪，上下几千年，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事实证明，凡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算上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反法的。他们尊来尊去，都是为了倒退，愚弄老百姓；反来反去，又都是为了阻挡社会往前走，镇压老百姓。在批林批孔中，我们仔细掂量了这里头的道理，认



识到，批孔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孔孟之道经过历代反动阶级的加工改制，成了一种反动剥削阶级的统治思想，它的那一套“向后退”的反革命理论，一切反动派都可以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拿来应用。所以，要前进，就得割断孔孟之道这个“绊马索”。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尊孔与反孔、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取得的。就拿我们大队来说，一九五一年，我们办社拔穷根，阶级敌人就出来“挡横”，宣扬孔老二的“天命论”，诬蔑我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妄图进行破坏。我们九户佃农硬是不信“天命”信革命，把合作社办了起来，当年就获得了丰收。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打着关心人民生活的旗号，强制推行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硬让分田到户，牲口分户喂养，阴谋把我们拉到资本主义的路上，又被我们顶回去了。文化大革命中，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煽动下，有的同志迷失了方向，私自主持分了集体的一部分储备粮。对这种现象要不要进行斗争？有人又拿出孔孟之道，说什么“人和为贵”，“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要叫人想，不要叫人骂”，等等。我们认为这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原则问题，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大事，坚决按照毛主席关于“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教导，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大辩论，打击了阶级敌人，批判了资本主义思想，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分清了路线**，纠正了错误，增强了团结。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事实教育了我们，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孔孟之道就必然会冒出来。要革命，就得批孔。毛主席说：“**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这就决定了批孔斗争也必然是长期的。不能指望孔老二的毒菌，打扫一次、两次就干净了。我们体会到，对孔孟之道，批判一次，头脑就清醒一点，觉悟就提高一步；但一放松警惕，又会还魂。因此，必须经常批，深入批，反复斗，斗到底！



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大团结

庄 宁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亿万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这是我们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依靠这个力量，我们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当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必须重视这个历史经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国家要统一，人民要团结，这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几千年来，勤劳、勇敢的我国各族人民，在祖国的土地上，共同生活和斗争，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开拓了辽阔的疆土，创造了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早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就实行法家路线，废分封，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粉碎了奴隶主的复辟活动，结束了七国并立、诸侯纷争的局面，第一次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二千多年来，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尽管疯狂地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制造割据和分裂，但是由于国家的统一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统一的局面仍然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的一百多年里，我国出现了分裂混乱状态，这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买办阶级的投降卖国所造成的。很多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不惜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艰苦奋斗，但是都失败了。我国亿万人民群众团结统一共同愿望，只是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推



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夺取了政权以后，才得以真正实现。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省，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腐朽势力所阻碍不了的。

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大团结，是无产阶级专政区别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显著的标志。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所进行的群众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而且也能够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来同敌人作斗争。无产阶级团结的人越多，力量就越大，无产阶级专政就越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越兴旺，就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所以，毛主席经常不断地教育我们要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把“**要团结，不要分裂**”作为我们必须坚持的三项基本原则之一。

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危害和破坏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的阶级根源。国内外阶级敌人，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处心积虑地要破坏我们的团结，分裂我们的队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也总是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妄图分裂我们的党，破坏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这样干的。他打着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黑旗，竭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搞分裂、复辟活动，妄图使我国倒退到“**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去。但是，林彪搞分裂、搞复辟的罪恶活动是违背党心、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林彪反党集团被彻底粉碎，充分证明了我们党的团结的力量，**证明了**我国人民团结的力量。通过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罪行，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必将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革命团结。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搞好革命团结，也要依靠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才有革命团结的方向，才有革命团结的基础，才能真正搞好革命的团结。所以，讲团结，就要讲路线。我们讲的团结，也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团结。各级党的组织，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要自觉地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好党的团



结，搞好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革命团结搞得好不好，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只有严格区分了敌我，才能团结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孤立、打击真正的敌人。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在革命的原则基础上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往往不容易一下子区别清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严肃地按照党的路线、政策办事，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不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以感情代替政策。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决相信，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干部是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敌人只是一小撮，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是可以团结、也一定能够团结起来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去做好工作。看不到存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思想上右倾麻痹，把敌人当朋友，这是错误的；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也是错误的。历史经验表明，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我们必须注意吸取这个历史经验。在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根据党的路线和政策，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当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为了使运动继续前进，就要更加注意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而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爱护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要挫伤这种积极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认真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不但要团结一切愿意参加批林批孔的同志，而且要团结那些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这样，就可以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大多数，我们一定要采取毛主席倡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和斗争是对立的统一。革命的团结是要通过斗争来实现的。正确地开展批评或者斗争，是实现团结必不可少的条件。特别是放手发动群众对问题和错误进行揭发批判，以弄清问题，分清是非，都是完全必要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地去揭露，去分析，去解决，“**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才能



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证明了团结——批评——团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方法，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继续坚持这样办。各级领导同志，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对于群众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所提出的批评和意见，要热情欢迎，正确对待。凡是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从群众的揭发批判中，吸取经验教训，焕发继续革命的朝气，勇于承认错误，同错误划清界限，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在同群众一起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经受锻炼，将功补过。这样，就能同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为革命作出新贡献。

坚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注意清除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不利于团结的错误思想言行，这对于增强革命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的人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不是以维护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增强人民的团结为出发点，而是为小派别、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而纠缠不休，离开了批林批孔的大方向。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对革命团结只能起破坏作用，同社会主义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团结统一的愿望，也是背道而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革命的大联合，革命大团结，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切革命同志都要牢记这个经验，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革命团结的促进派。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胸怀革命全局，放眼共产主义大目标，焕发革命精神，努力为人民服务，为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多作贡献。切不可为小派别、小团体或个人的私利遮住了自己的眼睛，以致上了阶级敌人分裂革命队伍、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革命和生产、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当。

毛主席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当前全国形势很好，广大群众积极地投入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我们一定要继续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加强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的中国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做好农村社会主义商业工作

柳 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农村商业部门在支援农业，支援工业，支援出口，保障社员生活需要，促进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对农村商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继续重视农村商业，切实加强领导，进一步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

农村商业是整个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同农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的一个纽带。我国广大的社会主义农村，是最广阔的国内市场。毛主席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目前，我国城市和工矿区所需要的粮食、副食品和轻工业原料，出口物资中的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全部或大部分要经过农村商业部门从几百万个生产队收购上来；销往农村的日用工业品和生产资料，全部或大部分要经过农村商业部门供应到亿万农民的手里。做好农村商业工作，正确发挥商业部门联结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作用，就可以扩大工农业产品交换，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加强我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进一步密切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农村商业又是农村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农业生产关系密切。农村商业部门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正确的经营方针，认真落实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努力做好购销工作，就能促进粮食和多种经营的全面发展，不断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帮助农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重视农村商业，加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对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

毛主席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



去占领。”农村商业历来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的重要阵地，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为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是企图让资本主义占领农村商业阵地。在我们党准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叛徒、卖国贼林彪跟着刘少奇大肆鼓吹“四大自由”，妄图发展资本主义。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形成以后，刘少奇、林彪一伙仍然贼心不死，大肆鼓吹自由市场、自由价格、自由竞争。他们兜售这一套黑货的险恶用心，就是要让资本主义卷土重来，重新占领农村商业阵地，从流通领域打开缺口，割断城乡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小撮阶级敌人，也在一些地方的市场上兴风作浪，搞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巩固了社会主义商业阵地。

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做好农村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农村商业阵地上来。同时还要看到，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垮台了，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必然要在农村市场上反映出来。因此，农村商业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还是很尖锐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必然要进行捣乱和破坏。他们或者通过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破坏生产；或者采取各种手段，腐蚀拉拢我们的一些干部，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把社会主义企业变为资本主义企业。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保持清醒的头脑，研究市场阶级斗争的特点，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如果放松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放松了对农村市场的管理，放松了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甚至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听之任之，就会削弱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紧密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依靠广大群众，切实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反对资本主义



倾向，保护社员在农村集市上的正当交易，不断巩固和加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

加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生产是基础。生产发展了，商品流通才能不断扩大，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农村商业部门一定要把支援农业生产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通过购销活动，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要认真做好农业生产资料和社员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不失时机地把农副产品收购起来、调运出去，使商品流通渠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城乡物资交流，保证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如果不从生产出发，在购销工作中片面追求利润，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该收购的东西不积极收购，农村需要的物资不及时组织供应，就会削弱农村社会主义商业的力量，给阶级敌人搞投机倒把以可乘之隙。因此，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坚决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的要求，做好农村商业工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地区的农村商业部门在支持生产、搞好购销工作方面，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例如：帮助社队认真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搞好生产规划，开展多种经营，并同生产队订立结合合同，把生产和收购结合起来，做到参与生产，指导生产，支援生产。加强调查研究，了解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的需要，积极组织货源，及时供应，不违农时，当好农业生产的后勤。合理设置收购网点，充实基层收购力量，发挥农村代购代销店的作用，按照国家规定的政策，及时把各种农副产品收购起来。实践证明：凡是这样做的，农村商业工作就越做越活，路子就越走越宽，在支援生产、保障人民生活需要方面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村商业要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组织好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还必须不断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农村社会主义商业是新型商业。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社员群众服务，是农村商业职工的光荣职责。做好这项工作，体现着党和国家对广大社员群众的关怀。那种怕麻烦、嫌零碎、图省事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农村商业职工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经营作风，进一步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许多地方做到了经营品种、服务项目适合社员群众的要求，购销形式、营业时间、手续制度有利于社员群众抓革命、促生产；许多商店在搞好门市营业的同时，还坚持送货下



乡，服务到队，购销结合，以卖带修，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把农村社会主义商业办得更好。

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是加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农村商业阵地的斗争，同整个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下，各地区、各部门密切配合，广大群众参加，才能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农村商业网点分散，联系面广，政策性强，只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监督，搞好企业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发挥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使企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农村商业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实行贫下中农管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依靠群众监督的一种好形式。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村商业在党的领导下，实行贫下中农管理，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更好地加强对商业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服务，更好地加强市场管理，对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起了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加以支持和爱护。那种认为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可有可无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贫下中农是农民中的大多数，是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主力军。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是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在商业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农村商业要不要实行贫下中农管理，是一个关系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问题。各级商业部门要正确对待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结合实际，总结经验，不断提高，使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蓬勃发展，茁壮成长。

加强农村商业，活跃城乡经济，巩固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农村商业工作搞好了，整个商业工作就比较主动，城乡市场就更加繁荣兴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各级商业部门必须把农村商业放在重要位置上，积极帮助基层企业改进工作、解决问题。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进行，健康发展，形势大好。我们要抓紧抓好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努力做好工作，树立全局观念，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不断巩固和加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贡献。



文化大革命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

河北大名县杏现大队党支部

我们杏现大队，地处黄河故道的大沙滩。过去，两千九百多亩土地，全是沙土岗、茅草窝，自然条件很差。旧社会，风调雨顺的年头，一亩地也只能收个百八十斤粮食。解放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干部群众想进一步把粮食搞上去，但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亩产到了三百来斤，就再也上不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和当前开展的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调动了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人变、地变、产量变，农业生产出现了一年一大步，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继一九六七年粮食亩产上《纲要》之后，一九六八年过“黄河”，一九七〇年跨“长江”，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连续两年超千斤。一九七三年的粮食总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了二点八倍。今年一千多亩小麦普遍生长良好，预计产量将超过往年。花生、棉花和林、牧、副、渔各业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较快地发展起来。

连续七年大幅度增产的事实又一次说明，路线是根本，群众是英雄，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就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农业生产，为革命事业多作贡献。

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焕发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我们党支部对于怎么调动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识很不一致。多数同志主张抓阶级斗争，推动生产斗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搞好集体生产。可是个别人认为：地主被打倒了，富农不富了，都是挣工分吃饭，抓阶级斗争也抓不来



粮食，主张靠开小片荒，增加自留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由于认识不统一，步调不整齐，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集体生产当然不会迈出大的步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联系实际揭发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加深了干部群众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纲，就不可能调动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即使在某些方面有一点积极性，也很可能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根本搞不了社会主义农业，更不能使集体生产持续跃进。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我们越来越比较自觉地去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过去，我们队有的人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是由于他们头脑里缺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把组织干部群众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作为根本大事来抓。大队办了政治夜校，选拔培养了一百二十名辅导员。根据社员的居住远近，由生产队办了五十个联户学习班。政治夜校定期学习，联户学习班分散学习，辅导员随时随地帮助群众搞好学习。几年来，根据形势和任务，采取有学有议的办法，联系实际，不断地组织群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忆苦思甜，引导群众把自己的一镰一锄和革命的大目标联系起来，正确认识为革命种田是自己的光荣责任；社会主义的财富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不是坐等出来的。社员群众比过去，看现在，明确了方向和前途，懂得了劳动为了什么，就自觉地为革命吃苦耐劳，再苦再累心里也甜。

赶集上市，走亲访友，一早一晚，节日休息，这些时候和场所，往往容易被资产阶级钻空子，向群众散布封、资、修的毒素，腐蚀人们的思想，涣散革命斗志。可是，这种情况又往往被忽略。因此，我们针锋相对，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用无产阶级思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大队先后办起了业余文娱宣传队、图书室、电影放映小组、阶级教育展览馆、有线广播等，通过各种形式，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反对资本主义倾向，歌颂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批判封、资、修的旧思想、旧文化。



长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结果，社员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成了推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们大队沙丘多，壕沟多，风沙大。迅速发展农业，就必须改变生产条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改变生产条件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天不怕、地不怕，千难万险踩脚下。大家说：“大寨能开山凿石，在虎头山上种出好庄稼，沙石峪能万里千担一亩田，在青石板上创高产，我们就能搬掉大沙丘，填平大壕沟，在黄河故道上绘新图。”正是依靠社员群众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几年来，我们搬掉了一百多个大小沙丘，填平了十条大小壕沟，在四个大风口上建起了七百亩防风林带，打机井三十二眼，平整土地两千七百多亩，修排水渠六条，实现了平均九十亩地一眼井，旱能浇，涝能排，旱涝都能稳产高产。

过去我们大队家底薄，缺资金，这对我们改变生产条件，是一个大的矛盾。是伸手向上，还是自力更生？是依靠外援，还是依靠自己？贫下中农通过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发扬。打井缺砖，我们就自己烧窑，植树造林没有树苗，我们就自己采树子，搞苗圃，自育自栽。能不买的不买，能自制的自制；工程较大，花钱较多的项目，在连年丰收、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经过群众讨论同意，年终分配时，按照政策适当多留一些积累。大家说：明天来自今天，今天的长远利益，必然要变成明天的现实利益。众人拾柴火焰高，自力更生的伟力在于群众之中。就是这样，我们没有伸手向国家贷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初步改变了生产条件。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必须跟贫下中农商量。贫下中农有智慧，有远见，熟悉本地的土质、气候，最懂得怎样做才能多快好省。因此，生产建设的重大问题，例如一年生产计划的制订，年终分配方案的提出，重大生产建设的实施等，我们都首先让群众反复酝酿讨论，把群众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实行。这样，群众看到自己是发展生产的主人，就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对待，去实现。而群众的意见，又往往比我们想得高明、正确。



一九七一年，我们大队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八百八十斤。党支部在讨论下一年的生产指标时，多数同志提出，依靠群众，挖掘潜力，来年可以闯过千斤关。可是个别同志却流露出“歇脚”、自满的情绪，说什么：“沙碱薄地过长江，沙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要过千斤关，实在不敢想。”能不能闯过千斤关？我们组织群众进行了讨论，贫下中农说：我们为革命种田，就要甩开膀子迈大步，过了“长江”不算完，坚决闯过千斤关。党支部坚决支持了贫下中农这种革命积极性，带领群众总结经验，挖掘潜力，为实现闯千斤的计划艰苦奋斗。一九七二年，遇到了历史上特大干旱，一春无雨，威胁着小麦的丰收，夏收后干旱继续发展，严重影响夏播任务的顺利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散布流言蜚语，妄图瓦解我们的斗志。贫下中农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更没有被阶级敌人的谣言所动摇。大家批判了阶级敌人的谬论，斗志更加昂扬。在充分利用原有水利设施的同时，还自力更生开辟新水源，采取人力、畜力换班，机器不停的办法，昼夜抗旱浇水。天大旱，人大干，秋后粮食亩产达到一千零六十一斤的好收成。这一事实，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群众的力量能胜天，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生产潜力就能一挖再挖，粮食产量就能一增再增。

从此，我们更加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党支部定期开门整风，听取群众的批评，接纳群众的建议；坚持同群众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从劳动中总结群众的发明创造，表扬群众的先进事迹，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恰当地组织群众搞好生产。社员群众看到干部真心实意的尊重自己，就经常及时地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向干部提出来。过去，我们大队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后来，我们采纳了群众的建议，把村边五个废坑塘加工整理，放养鱼苗，在路边、渠岸植树造林。还大力发展了养猪业，全大队集体和社员家庭养猪达一千四百多头，平均一人一头多。同时，搞起了油坊、粉坊、砖窑、编织等副业，每年为农业提供资金七万多元，使农、林、牧、副、渔都有发展。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依靠群众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深深感到，我们前进的步伐还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今后，我们决心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抓革命，促生产，进一步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为革命做出新的贡献。



批林批孔推动了技术革新

——天津自行车厂的调查报告

天津自行车厂是一个有三十八年历史的老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的生产发展很快。一九七三年产量达到八十六万辆，相当于一九六五年的二点四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乡市场对自行车的需要不断增长，要求这个厂迈开更大的步伐。今年以来，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这个厂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在短短几个月内，实现了一百七十五项技术革新，新建了自动化、连续化生产线六条，制造和改造了一大批设备，把企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到年产近百万辆的新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自行车产量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三；五个月的产量，等于文化大革命前最高年份一年的产量。

为什么在这几个月之内，企业的面貌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厂的工人们说得好：“因为有了批林批孔的思想基础。”批林批孔促进了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开展，使蕴藏在群众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得到了发挥；批林批孔打破了许多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使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得到了解放；这就带来了技术革新和生产的大发展。

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天津自行车厂技术革新的蓬勃开展，是这个厂党委抓大事，抓路线，抓批林批孔的结果。开展技术革新，进行老厂改造，贯穿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着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如果不从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解决思想上政治上前进与倒退的问题，生产技术领域里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就不能真正得到解决。今年以来，这个厂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批“复礼”，促前进，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工人们说：林彪要拉历史倒退，我们不但要开展革命大批判，击退复辟、倒退的逆流，而且要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



历史前进。如何使老厂、老设备更好地发挥潜力，适应革命的需要？大搞技术革新，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的问题，就摆在人们面前了。电镀车间镀锌工序是生产上的短线，为了克服这个矛盾，他们早在去年下半年就着手搞一条震动式的镀锌自动生产线。但由于按“常规”办事，按部就班地搞设计、搞试验，用了半年时间只完成一半的工作量。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工人、干部满怀革命激情，再也不满足于这样的进度了。群策群力，仅用了八天时间，就把余下的一半工作量统统完成了。震动式镀锌自动生产线在批林批孔中胜利建成了！在电镀车间的影响下，全厂群众纷纷行动起来，迫切要求以批促干，大干快上。厂党委因势利导，四月份全厂开展了一个技术改造的会战。全厂职工怀着对林彪一伙搞复辟倒退的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坚持大干苦干，二十五天的时间，实现了一百多项革新，完成了平时至少半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原先搞了多年没有搞成的技术革新项目，经过十天、二十天的群众奋战搞成了；一些多年没有解决的技术难题，群众发动起来后很快解决了；一些专家、权威认为不能搞或搞不成的新工艺、新设备，工人们搞出来了。工人、干部普遍反映：从来没见过群众的热情这么高涨，大家的干劲这么大，在短时间内取得的效果这么显著。

要把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必须用唯物史观战胜唯心史观，在领导思想上真正解决相信和依靠群众的问题。自行车厂党委体会到：是否相信和依靠群众的问题，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斗争的反映。相信和依靠群众，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这绝不是经过一次运动就能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是要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才能解决。例如有人说：搞生产，可以搞群众运动；搞技术改造，不好搞群众运动。又有人认为：搞小改小革发动群众可以，搞大型自动生产线，靠群众运动不行。还有一些同志，他们一般地也承认开展技术革新要依靠群众，但他们只注意一部分技术比较全面的机修工人，而不注意去发动占多数的在生产第一线的操作工人。为什么这些同志在口头上也讲相信群众，一碰到实际问题却忘记广大群众了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批林批孔中，厂党委领导成员深入到车间班组，和广大工人、干部一起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愚”、“生而知之”、“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通过批判，各级领导成员进一步认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真理，增强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广大工人群众也进一步认识到“**实践出真知**”的道



理，更加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这个厂今年搞的一些重大的技术改造项目，如震动镀锌生产线、卷钢纵剪连续生产线、曲柄机加工自动生产线、电镀自动生产线、挡泥板自动画线机等，全部都是工人群众参加设计搞出来的。不但机修工人积极参战，连以前很少参加技术革新活动的生产操作工人，在技术改造大会战中也十分活跃。广大操作工人冲破“上智下愚”的精神枷锁，在技术革新中大显威力，是这个厂今年以来开展技术革新的一个特点。车圈车间的磨口工序，过去是三十年代落后的工艺操作，每个人最多一天磨六百个车圈，磨一个车圈要倒腾四次，劳动强度很大。文化大革命前，工人们多次提出要改革这道工序，却始终没有下文。批林批孔以来，磨口工人决心自己动手搞自动磨口机。他们在工余时间凑在一起，把各自的操作手法归纳、分解为机械动作，分别在自己使用的设备上进行了多次试验，提出了五个方案。然后，又把这些方案中的精华加以集中，确定了一个方案。车间党支部发动全体机修工人、技术人员同操作工人一起进行讨论，完善了这一改革方案。结果从设计到投产，仅用了七天的时间，就制成了一台车圈自动磨口机。这台设备凝结着操作工人的智慧，采用了许多先进技术，它可以一下就完成人工磨口的四个动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节省一半劳动力。这一仗的胜利，大长了工人志气。这个厂今年实现的技术革新项目，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以操作工人为主或有操作工人参加设计的。许多车间女工也打破“男尊女卑”的精神枷锁，发挥“半边天”的作用，搞了不少革新项目。广大操作工人同机修工人一起登上设计舞台，这就使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有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开展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必须广泛地实行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天津自行车厂今年在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中，更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批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鞍钢宪法”规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得到落实，广大工人意气风发，广大技术人员的世界观也在不断转变，使“三结合”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通过批判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广大技术人员进一步认识到：知识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技术人员必须积极投入群众运动，和工人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才真正有用武之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更多的贡献。现在，许多技术人员不脱离现场，不脱离工人，不脱离劳动，发挥自



己的特长，当群众的参谋，和工人在一起，共同搞设计，一起造机器。有的技术人员过去习惯于闭门造车，耳目闭塞，还摆架子，碰见问题躲着走，解决问题慢腾腾。在这次会战中，却把图板搬到了会战现场，说：“我这图板就放在这儿，不再搬回办公室了。”工具车间过去靠少数人关起门来设计车把立管缩头切口机，两个月一张图纸也没画出来。这次会战中，车间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结合在一块，大地做图板，粉笔画线条，七嘴八舌讨论了一个多钟头，方案就凑出来了。大家高兴地说：批林批孔促使“三结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开展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党委要热情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新生事物。天津自行车厂在这个问题上也曾遇到一些思想障碍。有的人迷信专家权威，对群众性技术革新总是喜欢评头品足，讥笑群众运动缺乏科学性，苛求群众革新只能一次成功，而不允许有一点挫折。自行车厂党委批驳了这种错误观点。他们认识到：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搞群众运动，合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本身就是一种科学态度；科学是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离开了群众的实践，什么科学也不会有。他们敢于承担责任，热情支持工人群众的大胆设想，不怕花点学费，准备顶住暂时失败后的一瓢冷水、一股冷风。厂党委的同志说：人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为什么不允许群众搞革新有几次反复，花点学费呢？通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从中得到经验教训，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革新可以一次成功，有些革新要反复几次才能成功；统统要求一次成功，那是形而上学的，不科学的。事实上，许多技术革新，专家搞也不能保证成功，为什么苛求群众一次搞成功呢？实践总是这样证明：少数人闭门造车搞革新，出的乱子不少，浪费很惊人；相反，凡是发动广大工人、技术人员群策群力搞的技术革新，由于集中了大家的智慧，考虑总是比较周到，付的学费并不大。象天津自行车厂这次搞的一百多项技术革新，基本上都是成功的，多数已在生产上发挥作用。

在批林批孔中，这个厂的党委抓住刘少奇、陈伯达在天津自行车厂散布的“工人搞革新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等谬论，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武器，发动群众进一步深批了洋奴哲学。工人们说：在刘少奇、林彪、陈伯达这些家伙的眼里，只有洋人，没有我们工人，只有资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我们要有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根本不信刘少奇、林彪那一套。通过批判，广大工人、干部、



技术人员决心进一步清除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这次他们搞的那么多的技术革新，基本上都是学创结合，立足于创。象自行车挡泥板装饰线，历来是用手工画的，费工费时。以前曾有专家研究过把它改为自动化，搞了半年多没搞成。有的人听说外国现在也还是采用手工画线，对这项革新就根本没有考虑。这次群众运动一起来，二十几个工人组成攻关小组，边研究、边实践，不到一个月，就把本厂独创的动画线机搞了出来，基本上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

群众有智慧，有改变生产条件的强烈愿望；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就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今年三月，国家把一批大型卷钢分配给自行车行业改制成带钢，在生产上使用。在通常情况下，要把这种重达五吨、宽一米半的卷钢加工改制成一条条的带钢，需要一、二百万元投资，新建一千平方米厂房。自行车厂的工人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就找到领导说：“我们要学大庆，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土法上马，不要投资，就地搞改造。”工人们促使领导下了决心。厂党委决定搞一场制造卷钢纵剪连续生产线的会战。这条生产线，包括五吨重的龙门吊车，两吨的桥式天车和架料机、引料机、劈料机、卷料机等六台大型设备。许多大件的加工都是自行车厂原有的设备适应不了的。工人们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修旧利废，以小干大，一一把它解决了。不新建厂房，机器往哪里安装？工人们一研究，尽量紧缩准备车间现有厂房的生产用地，再不够，就把车间大墙打开，在墙外面安装了架料机，立起了龙门吊车。就这样，问题解决了。整个生产线的建成，只用了十七天时间，百分之四十的机件用的是废旧件，没建一平方米厂房，花了不到七万元。工人们说：“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造出了这条生产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天津自行车厂的事实又一次证明：批林批孔这场伟大的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必然会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生积极作用。批林批孔将把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推向新高潮。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
轻工业部 联合调查组
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



自力更生的力量在群众之中

上海市毛麻纺织工业公司党委会

羊毛衫的生产，长期以来一直是“手摇、口念、心记”的手工操作。以前，虽然进行过几次技术改造，但没有根本改变生产的落后面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们依靠工人群众，自己动手，用电子新技术改造了三十年代的旧针织横机，使我们的羊毛衫行业实现了生产自动化、半自动化，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去年在设备不增、人员减少、品种增加的情况下，产量比一九六六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比一九五八年翻了一番。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羊毛衫八厂的工人群众又奋战一百天，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电子群控羊毛衫车间。

我们羊毛衫行业生产面貌的巨大变化是靠什么得来的？靠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靠的是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靠的是工人群众的巨大创造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几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自力更生的力量在群众之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要相信和依靠工人群众。我们羊毛衫行业在电子技术改造过程中，曾经碰到一系列的问题，技术改造的“样机”从哪里来；怎样看待工人群众的智慧和实践经验；怎样对待群众中涌现的新生事物？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焦点，还是要不要依靠工人群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开始，我们曾经认为，用电子技术改造旧横机，过去从来没有搞过，还是先进口几台“样机”，比较“靠得住”。但是，有一件事对我们的教育是很深刻的。外地某毛纺厂花了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进口一套八台羊毛衫自动横机，打开一看，主轴断了，急电这个国家，但回电说：“你们把箱子打开过了，我们一概不负责。”后来这些自动横机，由于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一直派不了用场。这件事使广大工人群众强烈地感到：要发展生产技术，首先应当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依靠



广大工人群众，立足于自力更生，而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从外国进口。工人群众说得好：只要有志气，就会有“样机”！这种志气，就是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为什么外国有的，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就不能创造出来？事情往往这样，外国资产阶级越是卡我们，我们斗得越狠，反而前进得越快。不久，第十六羊毛衫厂工人就用土办法试制成一台光电式电子控制半自动横机，接着，第八羊毛衫厂工人也创造出一台数控式电子控制半自动横机。事实教育了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道路，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的力量，外国有的，我们也能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能创造出来。

我们说，自力更生的力量在群众之中，是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革命阶级。“**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工人群众长期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中，有着无穷的智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群众，能够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改造技术、改造生产的有力措施，迅速地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有些同志正是由于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往往对坚持自力更生的道路信心不足。有人说：工人不懂ABC，怎能搞电子？有人说：没有设备、条件，靠什么搞电子？确实，工人群众刚开始接触电子技术，困难碰到不少。电子技术图纸看不懂，红红绿绿的小零件也叫不上名称，技术力量薄弱，设备条件很差。但是，毛主席早就说过：“**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不懂电子技术怎么办？工人同志坚信，实践出真知，不懂可以学。第九羊毛衫厂百分之八十是中老年女工，文化程度都比较低，工人们为了长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就边干边学，不懂ABC，就回家叫子女教，不懂电子元件，就给它们取个形象化的“代号”。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厂在挡车女工中普及了有关电子技术的一些基本知识。有十八个女工大胆实践，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装出十八台电子控制箱。没有专用设备怎么办？工人就用土办法解决问题。九厂搞光控式横机时，需要加工一种齿轮，到外面去加工要花钱费时间，他们就到五金店里租了一把铣刀，改革了工夹具，在车床上照样加工出符合要求的齿轮来。缺少零件怎么办？工人们在紧急关头也能“逼”出办法来。第四羊毛衫厂在装置电子控制箱时，缺少一种电子元件，外面一时买不到，眼看要影响革新进度。有个青年工人日夜动脑筋，想办法，根据“接触”开关的原理，大胆设想，采用原子笔芯代替了光电管。由于依靠了工人群众，把原定



一百零五天工作量的任务，只用了十二天时间就完成了，而且还为国家节约了资金。这些事实，生动地证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要坚持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群众的集体智慧，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依靠工人群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就必须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创造的新生事物。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是有教训的。当第十六羊毛衫厂工人群众创造的一台光电式控制半自动横机刚出现时，我们有的同志认为它低级，因此没有热情地加以支持。而工人群众听到这个消息，纷纷到十六羊毛衫厂去学习取经，第九羊毛衫厂的工人群众，回厂后马上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在全厂迅速推广，成为我们羊毛衫行业中第一家推广电子控制横机的工厂。这件事使我们认识到，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对群众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不支持，不表态，任其自生自灭，甚至对新生事物的某些缺点横加指责，实际还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表现。后来，在九厂出现了改进光电式横机的典型经验时，我们就及时在全公司介绍、推广，把技术改造的群众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经过广大群众的努力奋战，仅仅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使十四个羊毛衫厂实现了自动化和半自动化，其中一半以上的横机应用了电子控制。

但是，当电子控制横机开始大量推广后，又普遍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产量不稳定。这时有的人指责用电子技术改造横机是“得不偿失”，甚至怀疑用电子技术改造横机“有没有前途”。是前进，还是倒退？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教导，认识到，产量不稳，这反映了新事物刚出现时存在的不完善的地方，还有某些缺点和弱点。但是，这种不完善，这些缺点和弱点是完全可以实践中加以克服的。不允许新生事物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只许它一出现就十全十美，实际上是不准群众革命。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产量降低的主要原因是挡车工扩台后操作不熟练，这是“新机”与操作方法之间的矛盾。问题找到了，我们发动工人群众，广泛地开展操作练兵，及时召开现场会，交流经验，形成一套适应“新机”的比较完整的操作方法。这就使产量不仅稳定下来，而且大幅度上升了。

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的愿望和要求。要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就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搞社会主义协作。我们羊毛衫行业的技术改造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果，这不是光靠一个工厂、一个行业群众的努力，而是依靠了全市工人阶级的力



量才实现的。我们羊毛衫行业，大部分都是小厂，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搞这样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过去我们曾认为条件不成熟。但是，技术改造的群众运动一开始，全市各行各业五、六十个单位都伸出了支援的手，组成了大会战的生动场面。有的协同攻关，派来了“技术服务队”，有的主动承制零部件，甘当配角。把我们的困难看作是他们的困难，把我们用电子技术改造旧机的任务看作是打政治仗、争气仗。我们羊毛衫行业技术改造的成果，是工人阶级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显示了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

培养一支工人阶级的技术队伍，这是**依靠群众**，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重要保证。我们羊毛衫行业中过去没有懂电子技术的人材，实现电子技术对旧机的改造，技术力量从哪里来？这是我们当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而工人同志却满怀信心地说：自己动手改造旧机，掌握电子技术也得靠自己！工人们这种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为改变生产落后面貌而迫切要求学习电子技术的愿望，对我们教育很大。为了使工人群众迅速掌握电子技术，我们举办了电子技术短训班，几年来办了八期，帮助各厂培养了四百五十多名电子技术人材。这些学员回厂后，又在厂里当教师，起着滚雪球的作用，形成了一支更大的电子技术队伍。这支队伍在实践中边干边学，成长很快，在技术改造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是不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定不移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归根结底还是由世界观决定的。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必须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刘少奇、林彪一伙推行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就是从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不相信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有无穷的智慧 and 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公司的工人群众，也曾提出过技术改造的要求，但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没有实现。实践证明，依靠工人阶级，自力更生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忘记了工人阶级，就只能滑到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去。

当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全公司的工人群众正在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我们决心，更加紧密地依靠工人群众，坚定不移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攀登新的高峰，夺取新的胜利。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胜利前进

英雄光辉照银幕

——评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平原作战》《杜鹃山》

江 天

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二周年之际，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平原作战》、《杜鹃山》与观众见面了。这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新胜利。这两部彩色影片，在《智取威虎山》等十部革命样板戏影片成就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创造，在导演、摄影、美工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影片构思严谨，拍得很生动，很有气势，使人看了很受鼓舞。

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必须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遵循“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摄制原则。它的核心问题，是要充分调动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进一步塑造和突出样板戏的英雄人物，特别是主要英雄人物。彩色影片《平原作战》、《杜鹃山》，通过电影艺术的再创造，使赵勇刚、柯湘这两个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更加丰满高大，更加光彩照人，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一，影片运用电影特有的表现手段，正确处理人物关系，激化矛盾冲突，更突出地表现了赵勇刚、柯湘的英雄气概。

在处理主要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关系时，影片始终让赵勇刚、柯湘处于斗争的主导地位。《平原作战》“爆炸军火”一场，是赵勇刚同龟田的正面交锋。影



片先以一个稍俯的横移全景，表现了车站外龟田与日寇兵架枪亮刀，如临大敌的场面。然后是赵勇刚化装火车司机稳步出场的近景。这里，利用镜头衔接所产生的对比作用，强化了矛盾冲突，渲染戏剧气氛，以敌人外强中干的凶相，反衬了赵勇刚闯虎穴、入龙潭的英雄胆略。当龟田要没收以烟土伪装的炸药箱时，一个变焦距镜头，从全景快速推成中景，拍摄了赵勇刚挺身踏箱、敞怀露枪的“亮相”，有力地突出了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杜鹃山》“砥柱中流”一场，表现柯湘与温其久的尖锐冲突，也有精采的处理。开始影片用一组镜头，充分表现温其久兴风作浪、色厉内荏的形象。同时三次插入柯湘对温其久怒目谛视、冷静观察的镜头，以动衬静，欲扬先抑。当温其久煽动战士冲向隘口的时候，用一个反拍的大全景，表现柯湘和党支部的同志们在镜头前景的山石上，坚决地挡住人流。接着，一组短促分切的镜头，通过景别与角度的巧妙处理，拍摄柯湘以泰山压顶之势，步步紧逼，严词诘问温其久，强烈地渲染了她力挽狂澜，砥柱中流的反潮流精神。

影片的摄制经验告诉我们，当主要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两军对垒、正面交锋时，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就是主要英雄人物只身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也仍然以英雄为主导，敌人为陪衬。柯湘的出场，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影片首先用俯拍的镜头和阴暗的色调，描写了众匪团丁凶恶丑陋的形象，渲染了刑场上黑云压城的气氛。随着镜头从祠堂门外的大全景缓缓推降成铁门门环的特写，传来柯湘“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的震荡长空的画外音，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在一个仰拍的全景中，柯湘昂首挺胸，迈步出门。镜头按照音乐的节奏，迅速有力地切近，展现了她的“亮相”。雪白的上衣，鲜红的血痕，强烈的顶逆光，明亮的追光，把她蔑视群敌、器宇轩昂的英姿表现得格外鲜明。这组镜头充分表现了柯湘“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努力在银幕上突出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是广大工农兵的要求，是阶级斗争现实的必然反映。那种所谓正反面人物要“轮流突出”，“谁有戏就把镜头给谁”的论调，其实质是要反面人物向英雄人物争“戏”，争“镜头”，争“中心地位”，这是修正主义文



艺黑线流毒的一种反映。如果不彻底批判这种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就必然会导致反面人物处于银幕的中心，造成“正不压邪”的恶果。

我们反对在银幕上突出反面人物，“正不压邪”，同时也反对把反面人物搞成一指就倒的稻草人，“邪不衬正”。英雄人物是和反面人物相比较、相斗争而存在的，不认真揭露反面人物的假、丑、恶，就不可能充分展示英雄人物的真、善、美。《平原作战》对龟田的处理，分寸适宜，恰到好处。影片确实给了龟田不少镜头，但我们并不因此觉得是突出了龟田。即使在单独描写龟田的场次里，也处处通过他的活动，反衬了赵勇刚。譬如“日寇诡计”那一场，一个急速升起的俯摄镜头中，龟田沮丧坐下，孤身只影，走投无路，恰似一头跌落陷阱的困兽，有力地反衬了赵勇刚的强大威力。在龟田策划假“清剿”、真进山的阴谋时，镜头又缓慢地下降推进，使人看到他狡诈险恶的内心，虽是困兽也还要作垂死挣扎。这就为赵勇刚在青纱帐里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仔细分析敌情，识破龟田的诡计，作了有力的铺垫。

影片还出色而感人地表现了主要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展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因而对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起到“绿叶扶花花更红”的作用。《平原作战》“不屈不挠”一场，精心拍摄的那棵根深叶茂的槐树，就是伟力深厚、立地顶天、打不垮、推不倒的人民群众的象征。张大娘、李胜、小英和其他张庄群众映着火光、怒视敌人的集体造型，使观众形象地看到张庄的人民群众确似一道铜墙铁壁。张大娘壮烈牺牲，小英抚娘恸哭。这时，影片给小英一个长镜头，让她尽诉心头的悲愤。小英这段“西皮滚板”的录音很清晰，达到声画交融，感人至深。影片在这里出色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同时也表现了赵勇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说明“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赵勇刚”。赵勇刚和群众一起悲愤地抬走张大娘的遗体后，影片从大槐树的特写，叠化摇出赵勇刚。他心如刀割，悲愤万分，拿起张大娘的遗物——一把为抗日斗争磨弯了缺口的铁锹，低头凝视。这时，银幕上出现了特写：晶莹的泪珠落在铁锹上面。这铁锹，这热泪，包含着多么丰富的革命内容，蕴藏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这个精心设计的特写镜



头，把工农的儿子赵勇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揭示得十分深刻，格外感人。

在处理主要英雄人物和其他正面人物的关系时，影片同样着力刻画主要英雄人物；同时也注意对其他正面人物的塑造，用以烘托主要英雄人物。影片《杜鹃山》主次分明地处理了柯湘和雷刚的关系。“情深如海”一场，是柯湘和雷刚正面冲突的第一个高潮。当柯湘对雷刚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行为进行耐心教育时，雷刚勃然大怒，踹凳拍刀，逼视柯湘。这时，全场气氛紧张。为了突出柯湘，保持舞台演出寓动于静的特点，影片没有把镜头分切过碎，而是用一个全景拍摄双方对峙的静场。然后，镜头缓缓地推向柯湘，使观众看到她从容镇静的表情，展示了她坚持原则、团结同志的崇高思想境界。在“雾岭初晴”一场，当柯湘用血的教训启发雷刚时，影片多次用近景表现了雷刚的激动心情，不仅表现了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而且用雷刚的觉醒，有力地衬托了柯湘。

第二，影片运用电影特有的表现手段，注意细节描写，拍好核心唱段，更加深刻地展示了赵勇刚、柯湘的革命精神面貌。

电影主要是视觉艺术，能够非常直接、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影片的摄制者恰当地利用了这一特长。例如，在《杜鹃山》“砥柱中流”一场中，杜妈妈身遭不幸，雷刚莽撞下山，一阵阵的狂风向柯湘扑来。在全剧矛盾冲突的这一高潮时刻，影片抓住柯湘阻止小山下山之后，激动、悲愤地抱住小山的瞬间，拍摄了她的特写：忍含热泪，强抑怒火，向小山倾吐肺腑之言。这个镜头细致地描绘了柯湘对阶级亲人的深厚感情和坚持党的原则的革命精神。又如影片用特写和近景，两次表现了田大江的药葫芦，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它前后呼应，以物托人，揭示了雷刚和田大江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特别是田大江牺牲后，雷刚手捧药葫芦，见物思人，悲恸呼喊大江时，更为动人心弦。细节描写，不但能够很好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也可以很好地刻画人物的外形。《平原作战》的武打场面和武打动作，拍摄角度好，有特色，很漂亮，同时镜头的分切和音乐的锣鼓点结合紧密，成为刻画英雄人物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智取炮楼”那场，就多次运



用特写镜头拍摄了赵勇刚用车鞭打落日寇军曹手枪，用脚挑刀，砍杀敌人，以及其他英勇格斗的动作；随着锣鼓的节奏，又用变焦距镜头拍摄了赵勇刚英武的“亮相”。这些镜头，生动地表现了赵勇刚威武雄壮的战斗风采。

革命样板戏中的核心唱段，是揭示主要英雄人物革命精神面貌的关键。这两部影片根据唱段的内容、音乐的节奏与演员的表演，细致准确地设计了一整套镜头，通过镜头的运动和内部调度，画面构图的组成与变化，光线色彩的描绘和对照，有声有色地拍摄了赵勇刚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我永不迷航”和柯湘的“壮志凌云”两个核心唱段。伴随着赵勇刚的歌唱，银幕上出现了月色微黄的夜空，一望无际的红高粱；衬托着柯湘的唱段，画面上出现了迎着滚滚乌云巍然屹立的峭石，顶着阵阵狂风倔强昂扬的劲松。情景交融，寓情于景，为刻画人物的革命精神面貌提供了特定的环境气氛，对他们的英雄气概作了形象的烘托。在这一段中，既保持了唱段的连贯和舞蹈动作的完整，又突出了演员激情饱满的表情和明亮细腻的眼神。当我们看到赵勇刚遥望延安城，柯湘遥望井冈山，想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瞩望而力量倍增、心情激荡的画面时，都会为他们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崇高精神境界所感动。

第三，影片运用电影特有的表现手段，增强环境描写，渲染时代气氛，更有效地烘托了赵勇刚、柯湘的高大形象。

在舞台演出的基础上，影片利用电影具有更多表现空间自由的便利条件，根据每场戏的特定情景，合理地延伸两侧，丰富主体景，适当增加群众场面，为主要英雄人物提供了革命斗争的广阔背景。

刻画社会环境，要符合历史真实，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达到整个历史时代的普遍性与具体环境的特殊性的统一。影片《平原作战》，导演构思很有特色。在社会环境描写上，也进行了成功的再创造。“日寇诡计”一场的开头，利用幕间音乐提供的形象，特意增设了一队日寇伤员，垂头丧气、狼狈不堪地从龟田办公室外鱼贯而过。这一场面，形象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面前惨遭失败的可耻命运；同时与第二场日寇疯狂枪杀抗日群众



的场面，形成鲜明对照，把赵勇刚智勇双全、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衬托得更加光彩。影片《杜鹃山》“春催杜鹃”一场，用横移镜头，更开阔地展现了三官镇祠堂前刑场的情景，集市冷落萧条，匪兵如狼似虎，反映了二十年代末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历史面貌。在柯湘刑场斥敌的时候，又增加了群情激愤、怒视敌人的场面，表明人民群众不甘于被奴役、受压迫，勇于反抗的革命精神，进一步衬托了柯湘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坚强性格。

在自然景物描写上，两部影片也有新的创造。它们都增设了水，但出于不同的剧情需要，各自又包含着不同的内容。杜鹃山上的泉水，清澈明亮，欢快流淌，加上蓝天白云，青山翠竹，烘托出自卫军在党的领导下茁壮成长的生动局面。而华北平原某城火车站月台旁的积水，却是污秽不堪，一洼死水。一只只鬼子的皮靴，在里面慌乱地践踏，不正是日本侵略者在赵勇刚出奇制胜的打击下，如陷泥塘、难以自拔的形象写照吗？一部影片拍了火，一部影片拍了花，也各有寓意。张庄的冲天大火，一方面说明了敌人的疯狂残暴，另一方面又烘托出赵勇刚和抗日军民心中的愤怒之火，斗争之火。田大江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影片从热血涌出指缝的特写，叠化出如血似火的杜鹃花。看到这里，谁能不为田大江“光华照河山”的英雄形象而深深感动呢？田大江的成长，是柯湘用革命思想启发教育的结果。那满山遍野鲜艳夺目的杜鹃花，既是象征着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也是对柯湘的热情赞颂。

继《智取威虎山》等十部革命样板戏影片之后，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平原作战》、《杜鹃山》的拍摄成功，表明革命样板戏影片的拍摄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但是，这两部影片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有些夜景用光不够讲究，光源不清，缺乏层次。这是今后需要注意和改进的地方。我们应当遵照毛主席关于“**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教导，对于摄制革命样板戏电影的丰富经验，进行认真总结，找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推动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进一步繁荣，让工农兵英雄形象在银幕上闪耀着更加灿烂的光辉！



小戏创作的可喜收获

——评越剧影片《半篮花生》

方 进

近几年来，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创作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小戏（包括话剧、各种地方戏曲在内）的创作和演出十分活跃，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剧目，从不同的生活侧面，反映了工农兵在各条战线上的革命斗争，展示出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的大好形势。这些作品不但在思想内容方面，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许多小戏所不能比拟，就是从艺术质量和作品数量上来看，也大大超出了过去的水平。

现已拍成彩色影片，在全国开始上映的越剧《半篮花生》，就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个。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半篮花生》以小戏的有限篇幅，生动地反映了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具体矛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很有新鲜感，应当受到热情的称赞。

《半篮花生》所以能达到目前这样的水平，是经过了重大修改之后获得的。这个提高的过程说明，要搞好革命文艺创作，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它还说明，对于党的文艺事业，一定要严肃认真，即使是一个小戏，也要反复磨炼，不断修改。

《半篮花生》是一个正面反映贫下中农“学哲学，讲矛盾”的文艺作品，剧情是紧扣住学习《矛盾论》展开的。如何通过剧中人物形象正确体现毛主席在这篇光辉哲学著作中精辟论述的唯物辩证法，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原先的剧本中，只讲了矛盾的普遍性，没有讲矛盾的特殊性，这就违背了《矛盾论》的原意，违背



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十分重视矛盾的特殊性，深刻论证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指出了不仅不同的事物各有其特殊性，而且一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也有特殊性，并着重指出矛盾的共性（即普遍性）包含于一切个性（即特殊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因此，这个剧本到底能不能正确提出和描写矛盾的特殊性问题，说明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道理，便成为它能否改好的关键。

应该说，现在同观众见面的《半篮花生》，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而使剧本的思想艺术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一出戏，不能光凭剧中人物之口去演说哲学的道理。那么，如何通过具体的人物形象和戏剧情节，把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的辩证关系，自然而生动地体现出来呢？剧本的修改，遵循党的基本路线，把原来在剧中没有出场的王有财这一人物，从富裕中农改成了摘帽地主。这一修改，起了重要的作用。农村秋收时节，小学生在课余时间拣点“地脚”花生，本来是一种普通的现象。为什么这半篮花生，竟如一石激水，在一个亲亲热热的贫下中农家庭掀起了矛盾冲突的波澜？这是由于摘帽地主搞的鬼，使这半篮花生大有文章：原来它根本就不是“地脚”货，而是王有财故意在浮土里藏下花生，叫他的儿子来约晓华去拣，“妄图把贫下中农作为挡风墙”。这具有特殊内容的戏剧冲突，揭示了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普遍性。

剧中的晓华爹，是一个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贫下中农的英雄人物。他在阶级斗争中的政治敏感和觉悟，是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矛盾、观察事物的结果。当一家人为晓华拣回来的半篮花生闹矛盾时，他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是脱离实际、泛泛而论地评判是非，而是从实际出发，从矛盾的特殊性出发，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提出了一连串疑问：“为什么‘地脚’会有这么多？为什么蛮好的花生丢田间？为什么小宝前来约晓华？为什么村里又有流言传？”经过调查研究，他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弄清了地主在背后破坏，利用拣“地脚”来挖集体经济墙脚这一事情的真相。

《半篮花生》把劳动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把认识路线同政治路线联系起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它说明，认识路线正确了，才能深刻理解和自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才能正确分析和处理好实际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红日心头照，真假能分辨”，晓华爹掌握了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尖锐武器，因而在“田里增米粮，山头竹木旺”的丰收景象面前不忘阶级斗争；



又从“半篮花生”所反映出来的这一特殊的阶级斗争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所以，修改后的剧本把王有财改成摘帽地主，就不单是个改变人物身份的问题，而是用一根阶级斗争的线索把戏剧冲突贯穿起来了。它既赋予矛盾以特殊性，同时也使主题思想更具有普遍意义。只有充分揭示出“象王有财利用‘地脚’挖‘墙脚’这样一个特殊矛盾”，才能看到农村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半篮花生》给人以深刻的思想教育，就在于此。

修改后的《半篮花生》，矛盾冲突大为加强，也深化了。这对于正确反映“贫下中农学哲学，要同三大革命紧相连”的革命学风，对于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剧中有一段描写很精彩：一家人坐下来分析“半篮花生”的矛盾，天真烂漫的晓华，在知道花生还没有煮、可以马上给队里送去的时候，就宣布：“矛盾已经解决啦，散会，散会！”但事情到这里，实际上矛盾并没有解决。所以晓华爹用“有了矛盾，就不能掩盖、调和，要彻底解决，就得充分揭露”的道理，引导大家进一步分析矛盾，终于搞清矛盾的来龙去脉，解决了问题，使一家人都感到“这个会开得真好”。“哲学解放到山洼，尖锐武器工农拿”，晓华爹这一形象，生动地表明劳动人民最热爱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己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斗争实践，“工农兵就是能攀登哲学山”。这对林彪宣扬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的无耻谰言，是一个有力的驳斥。剧中王有财散布“丰收以后无矛盾”的流言，是为了掩盖他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进攻。晓华爹心红眼亮，丰收不忘抓大事，从“半篮花生”中捉住狐狸尾巴，揭穿阶级敌人的谎言。这对林彪宣扬孔孟的“中庸之道”，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也是一个迎头痛击。

《半篮花生》的修改和提高，对于我们认识小戏创作的特点和规律，是很有启发的。在小戏创作中有所谓“以小见大”的说法。我们认为，“小”和“大”也是对立的统一。何谓“小”，何谓“大”，都是有其具体内容的，不能把它抽象化、绝对化，不能认为任何的“小”中都能见“大”。以“半篮花生”之“小”，见阶级斗争之“大”，这要有条件，即在“半篮花生”中确有阶级敌人的捣乱，所以才能从这一矛盾的特殊性中反映出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如果仅仅是一些家庭琐事中的小风波，又何以能见这阶级斗争之“大”呢？鲁迅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题材本身是有重大和琐屑之分的。只抓住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就会因选材不严而开掘不深，做不出什么大文章来。



《半篮花生》的创作表明，小戏选择的事件，尽管只是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和片段，但总要事关路线，事关大局，才谈得上“以小见大”。这就需要“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而典型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使人物的个性和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辩证地统一起来，以个性表现共性，从特殊性揭示普遍性。为什么在有些小戏中，会出现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的雷同？就是由于不注意矛盾和斗争的特殊性的结果。而那种把情节建立在“误会”、“巧合”上面的作品，使人看了无法置信，又是由于否认矛盾和斗争的普遍性所致。这两种情形，都不能做到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透过生活现象反映生活的本质。

《半篮花生》的创作还表明，在处理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上，小戏可以从小处着手，但必须从大处着眼。着手时要发扬小戏短小精悍的优越性；但立意要高，要着眼于在一个短短的小戏中如何更为深刻地表现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思想，以克服其容量较小的局限性。以小戏之“小”，见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之“大”，其实也是一种“大题小做”。这样，小戏创作才能起到“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作用。

《半篮花生》目前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矛盾的特殊性这一重要问题，现在基本上讲清楚了，但如何把这个哲学道理通过人物和情节融会贯通起来，处理得还不够理想。晓华爹靠台词解说较多，靠行动本身去说明问题还较少。造成这一缺点的原因，是由于戏剧矛盾的中心还没有完全集中在晓华爹身上。这个问题是在原先的剧本中就存在的。现在的修改虽作了很大努力，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台上几组人物关系中矛盾的对立面都是晓华娘，这就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到她身上，所以总是她显得活跃。观众的注意力，是以矛盾的中心究竟在什么人物身上为转移的。只有让主要英雄人物成为戏剧矛盾的中心，作不同侧面的刻画，才能使英雄形象高大、丰满起来。如何突出英雄人物的形象，小戏创作应该从革命样板戏的经验中认真学习，吸取营养。

总的看来，现在《半篮花生》的思想和艺术倾向都是好的。它展示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小戏创作的崭新面貌，也反映了越剧革命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小戏创作大有可为，前途无量。让我们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革命的小戏创作而继续努力！



来自群众斗争生活的艺术

——谈大兴县业余文艺宣传队的舞蹈创作

辛文彤

北京市大兴县业余文艺宣传队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全队三十几名队员，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子女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努力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坚持小队伍，创作小节目，利用小装备，深入基层，上山下乡，为广大贫下中农演出。他们的节目，除了学习演唱革命样板戏的折子戏和唱段以外，绝大部分都是自己创作的。其中的舞蹈节目，如《喜晒战备粮》、《育苗》、《旱地红花》和《扎根鞋》等等，来自群众斗争生活，有明确的思想教育意义，生活气息浓郁，格调朴素清新，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

这个业余文艺宣传队刚成立时，排练了一些少数民族的舞蹈节目，演出虽也认真，但效果并不好。贫下中农说：“看你们跳得够累的，就是不知道跳的啥。”贫下中农的批评，在宣传队演员心里引起了震动。有的同志想，我们辛辛苦苦为贫下中农演出，结果贫下中农不知我们跳的是啥，这是为什么呢？宣传队领导组织大家学习《讲话》。毛主席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艺术，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他们运用毛主席的教导总结工作，认识到这些舞蹈演出效果所以不佳，不是因为它的内容不好，而是由于当地群众不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看不懂它的内容；同时，演员自己也不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也不很理解这些动作是表现什么的，只是照葫芦画瓢。这怎么能发挥革命舞蹈的战斗作用呢？贫下中农认为，演一点少数民族的舞蹈节目也是应该



的，但更应该努力创作表现当时当地的群众斗争生活的舞蹈节目。于是，他们决心从贫下中农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吸取素材，进行舞蹈创作。

一九七〇年，宣传队员们在劳动中亲眼看到，贫下中农为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麦秋时精收细打，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这种革命精神和高尚风格，使他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们选择了一个最能集中表现贫下中农这种革命精神的场景——丰收场上喜晒战备粮，反映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所产生的巨大物质力量，创作了舞蹈《喜晒战备粮》。贫下中农看了以后高兴地说：“这个舞蹈俺们看得懂，你们把搞战备粮那股子热乎劲儿全演出来了，看了真叫人浑身添劲！”

去年春夏大旱，宣传队员们与贫下中农一起抗旱保苗，向天夺粮。在战斗中，他们看到大寨精神激发起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信心和力量，也深深为贫下中农“天大旱、人大干”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根据亲身感受，他们创作了舞蹈《旱地红花》，歌颂贫下中农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叱咤风云地征服自然的革命精神。批林整风运动以来，他们与贫下中农一起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地头田间摆战场，针对林彪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罪行，大力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后创作了反映知识青年在贫下中农教育下茁壮成长的舞蹈《育苗》和《扎根鞋》等。这些舞蹈，在田头、场院演出了几百场，贫下中农不仅是最热心的观众，而且成为最积极的创作者、评论家，一边看，一边提意见，帮助修改加工。

从群众斗争生活中选择素材，提炼动作，不是机械地模拟生活，而是要通过典型化，创作出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的舞蹈语汇。一九六八年，他们编排了一个大型舞蹈《抓革命促生产》，把翻地、送粪、播种、灌溉、锄草、收割等一系列劳动动作都搬上了舞台。可是，贫下中农看后说：“你们在台上演的动作倒是挺象咱劳动的样子，可是看起来不带劲。”“不带劲”的原因在哪里呢？他们联系实际，学习《讲话》，进一步认识到：“**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就是说，照搬生活现象，是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要求的。他们还认真地学习



了革命样板戏及其创作经验，进一步懂得，搞创作要深入生活，开采“矿藏”，还要善于加工提炼，把日常生活现象典型化。几年来，他们按照《讲话》指引的方向，遵循革命样板戏“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进行舞蹈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的体会是：

第一、从生活中选取有教育意义又为群众所熟悉的素材。舞蹈是给工农兵看的，是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必须使工农兵喜闻乐见。《喜晒战备粮》的簸粮、装袋动作，《旱地红花》的担桶、浇水动作，《育苗》的撒种、育苗动作，《扎根鞋》的纳鞋底、捻麻绳动作，都是从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吸取的。这些动作，贫下中农非常熟悉，经过艺术上加工提炼后搬上舞台，贫下中农感到格外亲切。

第二、舞蹈动作必须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和英雄群象服务。在提炼、加工生活素材过程中，应该始终把能否揭示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世界，作为构思和造型的准则。在《喜晒战备粮》中，他们设计了一个掂粮食动作。原来演员们模仿生活中的实际动作，低头抓粮、掂粮，再慢慢地撒在地上，贫下中农看了，觉得动作虽然很象，但不神气，不见思想。后来演员们改成先抓起一把粮食，掂一掂，带着喜悦心情互相看一看，点点头，表示为金灿灿的丰收粮而感到自豪，然后用一个较大动作把手中的粮食轻轻向上抛去，大家昂起头，看着粮食从空中落在场上。这一加工，贫下中农很满意。因为它既是生活中的掂粮动作，又比其更高更美，突出地表现了贫下中农掂粮时那种又喜又甜又自豪的感情。舞蹈《扎根鞋》的主题和题材也是从斗争生活中来的。宣传队员们在深入生活过程中，看到很多贫农大娘发扬过去战争年代里为亲人子弟兵缝衣、做鞋的革命传统，给知识青年做“扎根鞋”，还一针针、一线线地教他们自己纳鞋底，表现出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殷切期望。演员们决心把生活中这一动人情景搬上舞台。但生活中的纳鞋底动作，节奏比较缓慢，动作也较单调。他们为了塑造贫农大娘和知识青年形象的需要，把生活中纳鞋底的基本动作加以适当的艺术夸张，加强了这个动作的节奏和造型。比如：在表现知识青年学纳鞋底时，让她们离开小凳站起来，脚走秧歌十字步，双手飞针舞线，动作节奏由慢逐渐变快，突破了生活



中纳鞋底动作的局限，较好地表现了知识青年在贫下中农教育下继承革命传统、立志扎根农村的满腔喜悦和革命激情。

第三、正确处理源和流的关系。搞舞蹈创作，必须深入生活源泉，同时也应该学习优秀的作品。一个舞蹈的创作，一个动作的提炼，通常总要有一定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是，任何成功的艺术作品“不是源而是流”，都只能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人民生活中进行创作的借鉴，而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借鉴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喜晒战备粮》出场时的舞蹈，就借鉴了民间秧歌舞的动作，取其幅度大、节奏鲜明的长处，又吸取了战士队列教练齐步走中刚健、挺拔的特点，较好地表现了贫下中农兴冲冲走上丰收场喜晒战备粮的昂扬斗志和豪迈心情。《旱地红花》中的浇水动作，借鉴了芭蕾舞中的足尖碎步，刚劲、敏捷、熟练，有利于表现社员们争分夺秒、抗旱保苗的坚定信念。

《喜晒战备粮》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演员分成三人一组，左右两人用簸箕装粮，中间一人撑住口袋，安排了一系列装粮、撑口袋、蹶口袋的动作。演出以后有人说：“往口袋里装粮食缺乏诗意，动作硬梆梆的，太难看。”但贫下中农却说：“装粮食是检阅一年的劳动成果，装的是咱贫下中农献给社会主义的一片心，这个动作好！”同样，对于他们选用小簸箕做道具，也有人认为“太简单，不艺术”。但贫下中农却说：“簸箕是必需的劳动工具，既方便，又好看。这东西上了舞台，用得合适，看着亲切。”

同一个动作，同一件道具，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这里有一个美学观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观点。剥削者认为美的，劳动人民视之为丑；劳动人民认为美的，剥削阶级必然认为不美。无产阶级审美标准的阶级性与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标准，从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产生，并受斗争实践的检验。广大贫下中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当他们把丰收的粮食装入口袋交售国家的时候，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支援社会主



义革命的战斗豪情。这种劳动是美的，精神境界是美的，据此而提炼的舞蹈动作也是美的。小簸箕是北方农村常见的劳动工具，广大贫下中农用它精簸细拣，选最好的粮食献给国家，这种劳动是美的，精神是美的，作为道具用在这里，帮助表达了内容，也是美的。任何艺术作品，都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无产阶级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如果脱离了革命的政治内容，片面追求形式美，就会堕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泥坑。

大兴县业余文艺宣传队在实践中体会到：对于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必须牢牢地掌握住无产阶级的标准，掌握毛主席指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他们努力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激情，而对于那些软绵绵、轻飘飘、装腔作势或者无病呻吟的东西，则坚决抵制，彻底摒弃。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文艺作品，都是在同资产阶级世界观、艺术观的斗争中诞生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不仅仅是为了摄取创作素材，更主要的是为了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艺术观，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标准逐渐同工农兵趋于一致。大兴县业余文艺宣传队不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他们每创作一个节目，总是请工农兵来评论、鉴定。最近，他们听取群众对《扎根鞋》的意见，深深感受到一个节目创作的成功与否，作者的世界观和艺术观起决定性作用，不仅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要抓紧自己世界观、艺术观的改造，工农兵业余文艺战士也需要不断地改造。这种改造是没有止境的。例如，在《扎根鞋》的创作中，由于一度比较多地讲究形式，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题的集中和突出，减弱了这个舞蹈的教育效果。目前，他们正在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工修改这个节目。

这个业余文艺宣传队在创作方式上，坚持了宣传队员、领导、贫下中农三结合。由于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就使得他们的创作和演出水平不断获得提高。我们相信，植根于群众斗争生活土壤中的大兴县业余文艺宣传队，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和领导下，一定会更好地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继续前进，为贫下中农创作出更多的好节目来。



科 学 史 研 究

人类在变革物质中认识物质

李 柯



人类对物质的认识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只有变革物质，才能认识物质。“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实践论》）人们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实践活动，一步一步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认识，也跟着一步一步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永无止境。回顾这一部人类认识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深入批判孔丘和林彪所宣扬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古代对物质的表面认识

人类自从制成了第一把石刀，就开始了变革物质的生产活动。后来，人类发明了钻木取火，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第一次掌握了一种变革物质的强大的自然力，人类活动的舞台扩大了，先后发展起制陶、炼铜、酿酒、冶铁等生产部门。

粘土可以烧制陶器，矿石可以炼成金属，粮食煮熟以后可以酿成酒。从这些具体的物质形态的互相转化出发，逐步开始了人类对物质的认识。比方说，这些生产过程往往都离不开火，于是就有人认为物质世界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火，而更多的人则把物质归结为几种具体形态。我国在远古时代就有了万物是由金、



木、水、火、土“五行”组合而成的认识。后来在某些书籍中更明确地提出：“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尚书大传》）“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在西方，也有人把各种物质都归结为土、水、气、火四种“元素”，这实际上从外部形态反映了物质的固态、液态、气态以及燃烧时发光发热的现象。

毛主席说：“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实践论》）古代人的这些认识，停留在一些具体的物质形态上，是对物质结构和性质的笼统的、表面的认识。但它把物质世界看成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整体，因而又是朴素的辩证法的认识。

生产实践要求人们进一步掌握这些“元素”“相生相克”、互相转化的规律。用火烧木头，为什么木头会渗水、冒烟，最后化为一堆灰烬、复归于土呢？古代人在对物质的结构和性质的认识上，展开了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有些人坚持从物质本身说明物质转化的原因，要求深入到物质结构的内部去寻找这种原因。他们认为，事物的本质是构成物质的物质微粒。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墨经》认为，万物都是由“不可斫”的“端”即“点”所构成。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他们的观点也不完全相同）等人则提出：万物的本原是细小的、不可再分的“原子”，它们在旋涡运动中不断聚集，形成了火、气、水、土这“四元”。四元形成宇宙万物。万物最后又总要离散而复归于原子。限于当时的生产水平，这种原子论还只是一种直观的猜测。但是，它力求深入到物质的内部结构中认识物质，否认上帝对物质的支配，这是一种唯物论的物质观。

另外一些人从现象出发，把认识局限于可以感觉到的表面现象，否认人对物质的认识需要透过现象进入本质。《尚书·洪范》里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这里，润和炎，上和下，曲和直，从（铸造）和革（熔化），稼（播种）和穡（收获），都是物质形态或物质运动的某些现象。人们从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类似这样一些互相对立的性质出发，又进一步把它们概括成“阴”和“阳”。阴阳生五行，五行生万物。本来，“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



《矛盾论》如果认为只是某种抽象的性质的不同组合决定着物质的变化,就否认了有深入研究各类物质特殊本质的必要性,也就阻碍了人们进一步认识物质的共同本质。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人则认为,在物质变化的过程中,只有人们用触觉所感觉到的干、湿、热、冷这四种性质,才是万物最原始的性质,即“原性”。四性构成四元:湿、冷为水,干、冷为土,湿、热为气,干、热为火。原性的不同组合,决定着物质形态的变化。这种原性论离开物质的内部结构,单单从人们所感觉到的物质的性质去认识物质,这就迈出了脱离唯物论基本立场的第一步。当人们进一步探索决定这些原性的原因时,孔丘的门徒董仲舒认为:“元者,为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元”,实质上也就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非物质的“太一”。亚里士多德也最后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一种神秘的“以太”。这样,原性论最后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唯心论。

在冶金生产的基础上,在奴隶主、封建主“富贵寿考”的贪欲刺激下,出现了古代的炼金术和炼丹术。炼金术士们幻想靠物质的燃烧性、挥发性和凝固性的不同组合,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点铁成金。他们作了大量实验,发现了硝酸、硫酸、盐酸、氨、矾等化合物,发明了蒸馏、溶解、结晶等化学实验方法,积累了最初一批有关物质化合和分解的资料,为以后化学这门科学的诞生作了一定的准备。但是,他们的狭隘阴暗的“丹房”脱离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尽管他们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搞了一千多年,却炼不出一两黄金,充分证明了这是一条根本走不通的死胡同。

机械论物质观的兴起

十五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兴起,出现了冶金、采矿、造船、纺织等规模巨大的生产部门,逐步使用了水磨、鼓风机、纺织机等各种机械装置。在各个生产部门中,机器生产逐步取代了手工操作,人类进一步掌握了机械力为自己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物体的和天体的力学”。(《自然辩证法》)机械运动的研究促进了人们对于物质的机械结构和力学性能的认识。

到十七世纪,冶金和化工等生产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物质转化的新材料。英



国资产阶级早期活动家波义耳总结了这些新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批判了原性论的错误。他指出，在生产实践中，把砂石和灰碱融化在一起，生成的是再也不能被火分解的透明的玻璃；灰碱和油脂烧煮成肥皂，加热分解得出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渣块；葡萄在榨取时得到的是果汁，在发酵以后却可以得到酒精。同一种物质经过不同的处理，会转变为千差万别的东西，说明物质的构造和性质是复杂的，不是水、土、火、气所能组成的，更不是干、热、湿、冷所能概括的。后来，在冶金和金属加工工业中还发现，金属锻烧以后所得到的灰渣，往往比金属本身重得多。这又说明，灰渣决不是金属分解以后留下来的什么“土”，而是比金属本身还要复杂的物质。从这些事实出发，波义耳认为，元素应当是“某种基本的和简单的，或完全纯净的物体”（《怀疑派化学家》），是一切化合物和混合物的基本成份，是多种多样的。他还进一步根据物体在蒸馏、升华时先弥散为气体，后凝结为液体、固体，大块物体在溶解后可以通过织物的微孔等事实，提出元素可以分解为无数细小的微粒。微粒的大小、形状、运动等机械性质和结合方式不同，决定了元素和化合物的不同性质。这样，波义耳就在新的更高的生产水平上用微粒说复兴了古代原子论思想。

几乎和波义耳同时，牛顿在当时生产实践中已开始大规模利用机械力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力学的角度发展了微粒说，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机械论的物质观。牛顿认为，任何物质都由坚硬的固体微粒所构成，它们也同宏观物体以至于天体一样，都有质量、硬度、惯性等机械性质。一切自然现象如物质的化学作用、颜色等等，都是由微粒的这些机械性质和运动状态所决定的。

牛顿的这幅机械论物质结构图景，企图深入到物质自身的内部结构中去寻找决定各种现象的本质，就这个方面来说，这是唯物论。当时，为了描述各种物体的机械运动，必须把物体割裂成为一个一个的微粒，并且肯定它们的不可分性。正是在这个微粒说的基础上，牛顿第一次描绘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物质世界图景，把人类对物质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牛顿不懂得辩证法，由于他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他把微粒的这种不可分性绝对化了，否认微粒自身还有内部结构、内部矛盾，这就否认了物质是在自身的内部矛盾中运动变化着的，完全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机械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



成,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自然辩证法》)不变论必然导向承认上帝。微粒不可再分,谁规定的?谁制造的?只能是上帝:“据我看来,上帝开始造物时,很可能先造结实、沉重、坚硬、不可入而易于运动的粒子。”(《光学》)这样,机械论的物质观最后陷入了宗教的唯心论,同董仲舒所谓“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的唯心论的天命观没有两样。

随着人类变革物质的手段日益发展,机械论物质观的内部矛盾,愈来愈表面化。当时的工业生产,特别是冶金、煤炭、印染、玻璃等主要工业部门,都离不开燃烧。燃烧,既可以使金属变为灰渣,又可以使灰渣再变为金属;既可以使硫磺变成硫酸,又可以从硫酸中再析出硫磺。但是,机械论物质观恰恰不能解释燃烧过程中物质相互转化的现象,更不能说明燃烧现象的本质。从这种机械论物质观出发,十八世纪初,德国医生施塔尔提出“燃素说”:物体所以能够燃烧,是因为内部充满着一种没有重量、无所不在的稀薄物质,叫做“燃素”。燃烧就是释放燃素和吸收燃素的过程。燃素说第一次对燃烧现象作出了某种说明。但是,这个学说又认为,燃烧不是物质内部结构的变化,而是燃素从外面干预的结果。这就把现象当作了本质,“真实的关系被颠倒了,映象被当作了原形”。(《自然辩证法》)燃素其实就是抽象的燃烧性。它名为“物质”,实为“原性”。它完全是臆想出来的“虚假的物质”。(《自然辩证法》)当时,这种“素”几乎不约而同地充斥了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热有“热素”,光有“光素”,电磁有“电素”和“磁素”。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燃素说的创始人施塔尔不但找到了燃素,还从生命现象中找到了“活素”,照他的说法,这就是“善感的灵魂”。

辩证法物质观的发展

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蒸汽机的改进和推广把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推向了高潮。人类变革物质的手段,从机械能扩展到热能、化学能以至于电磁能等多种多样的形式。生产的发展带来了科学的发展。十九世纪,几乎各门自然科学都在自己的领域中划了一个新的时代。机械论的物质观愈来愈不能适应这个发展了,它同整个形而上学自然观一样,“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自然辩证法》)



首先，蒸汽机的广泛使用要求人们透过热的现象深入掌握热的本质。蒸汽能够推动庞大的机器运动，能量是从哪里来的？英国工人瓦特在改进蒸汽机的过程中发现，蒸汽力来自蒸汽的热量。正是蒸汽中所蕴藏的热量，才使机器转动起来。因此，热不是什么特殊的物质。一七九八年英国人伦福德发现，兵工厂里在钻枪炮口时，金属加工过程中可以不断产生高热的铁屑，说明热是从摩擦运动转化来的。后来为了提高蒸汽机的效率，在研究机械能和热能相互转化的过程中，迈尔、焦耳等人找到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数量关系，从而肯定了热不是什么物质，而是物质内大量分子的无规则运动。这就是“热之唯动说”。它从物质的内部结构说明了发生冷热现象的原因，在分子层次上把机械论物质观打开了一个缺口。

同时，蒸汽机的使用推动了各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出现了机器制造业，从而又刺激了冶炼、煤炭等工业的发展。这就要进一步了解燃烧的秘密，要对各种矿石作定量的分析，还要求了解生锈的原因，以延长机器的寿命。这都要求人们深入认识化学变化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发现了氧气。原来，燃烧并不是什么“燃素”的作用，而是可燃物体和氧化合的结果；生锈也同样是因为铁被氧化的结果。跟着又发现了氢，弄清楚了水是氢和氧的化合物，它们之间的重量成一与八之比。接着，人们逐步弄清楚了许多化合物中各种元素之间的比例。在这些实验事实的基础上，英国一个中学教员道尔顿提出：“所有可感知其大小的物体，不管是液体还是固体，都由无数极微小的质点或物质的原子所组成”。（《化学哲学新体系》）他认为，化学元素的基本单位是具有一定重量的原子；不同元素的原子有不同的重量，不同的性质，并在构成化合物时保持确定的比例。道尔顿还通过实验对一些元素的原子量作了初步测量，第一次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认识了原子。接着又有人把由不同原子结合成的微小的原子集团，叫做分子。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则系统研究了各种原子的化学性质，发现原子的原子量不同，表示原子的构造不同，性质也不同。于是，道尔顿的原子论发展成为更系统的关于物质结构的原子分子论。

这是对旧原子论的一大突破。在牛顿那里，不管什么物体都由千篇一律的微粒构成。新原子论否定了这幅平面的世界图景。原子构成分子，分子构成物体，“各个不同阶段的各个非连续的部分（以太原子、化学原子、物体、天体）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一般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质的存在形式”。（《自然辩



证法》)物质结构链条中各个关节点的不可分性,只能是相对于一定层次的。这样,原子以上的物质有了层次结构,从而为物质无限可分性的认识作了某种准备。

最后,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出现推动了人们对电磁现象的认识。随着大机器工业的发展,生产的规模愈大,蒸汽机起动慢,效率低,体积大,又不易控制,愈来愈不能适应需要。十九世纪初,伏打电池的出现为人们利用电能这种新能源开拓了前景。但是,这种电池的电量太小,成本太高。英国工人出身的科学家法拉第在自己早年的日记中就表示过,他“不满意于当时产生电量的方法,因此急于想发现电磁和感应电流的关系”。在时代的要求下,人们通过多方面的探索,终于利用电磁感应现象制成了发电机和电动机,掌握了一种崭新的变革物质的手段。

在这个基础上,人类逐渐认识了电磁现象。人们发现,光、电、磁都是连续的“场”。电磁场也有能量、动量、质量等物质属性,连续分布在带电体的周围,根本不同于机械论物质结构图景中间断的微粒。从这种连续的“场”出发,法拉第反对原子论。但是,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个“场”,尽管同物体、分子、原子等实物不同,没有机械论所要求的固定不变的形状、大小,更没有不可入性,但仍然是物质。“场”从一个全新的侧面说明了物质形态的无限多样性。到这时,机械论的物质观已经百孔千疮了。

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使自然界内部本来的联系愈来愈多地展现在人类面前。起初是机械能和热能的互相转化;以后是热能和化学能、电能的互相转化;最后,“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自然辩证法》)这就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各种不同的能即不同运动形式的互相转化,本质上也就是各种不同的物质形态的互相转化。不仅无机物质是这样,在人们用无机物合成了尿素以后,“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起来了”。(《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的前进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展现了物质世界的互相联系和统一,“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自然辩证法》)为辩证唯物论物质观的形成提供了自然科学根据。

机械论物质观的衰落,使一些资产阶级科学家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德国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歪曲利用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并把它推向了极端,提出一种“唯能论”来。他认为,既然能量可以用实验和测量来检查、证实,



那么，能就是一切；只要有能量概念就够了，“物质”则是多余的、可以省略的；原子、分子不过是纯粹思维的东西，只存在于哲学家的头脑中。他不懂得，本质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科学认识的力量，就在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在自然科学中，能是用来量度物质运动的，是可以观察、可以测量的，但这毕竟只是物质某种性质的表现，并不等于物质自身。唯能论把人对物质的认识局限在可以观察、可以测量的性质上，最后又把这些性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觉，从而开启了马赫主义的先河。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十九世纪末，电能的广泛运用，促进了人类向原子以下更深的物质层次的进军。当时在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相继建立了庞大的输电网和电照明网。电器工业、仪表工业、照明技术、真空技术等的发展，为科学实验准备了电学仪器、放电管、计数管等物质条件。为了提高照明技术，人们研究了电火花、弧光放电、真空放电等现象，发现了阴极射线——带负电的电子流。电子预示了原子里头还有一个复杂的世界。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又陆续发现了X射线和钋、镭等放射性元素。X射线的强烈穿透力，几乎马上就在医学上获得了应用。天然放射性元素所释放的巨大的能量，也立即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到一九一一年，人们终于在科学实验中打开了原子。原子也和一切其它的物质形态一样，内部有结构，也一分为二：中央是原子核，外面是电子。后来又发现，原子核也一分为二，有质子和中子的矛盾。放射性就是从原子核里头释放出一部分物质和能量来。而且，原子里头不仅有粒子，还有场。原子核和电子，靠电磁场联系在一起；质子和中子，靠介子场联系在一起。在十九世纪，实物是实物，场是场，是两回事。现在，变革了原子，实物和场这两种物质形态在原子里头统一起来了，人类对物质结构认识深入了一大步。

变革原子中的新发现，象一声惊雷，震动了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世界观统治着的自然科学界。机械论物质观土崩瓦解，科学界陷入一片慌乱。以马赫、彭加勒为代表的一批实证主义者乘虚而入，掀起一股主观唯心论的浊浪。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唯能论的错误观点，认为物质之所以成为物质，是因为具有质量、惯性、不可



入性等人们可以感知的性质；现在，这些性质都变了，消失了，那还有什么物质呢？物质“离开了思维它和感知它的精神，是不可理解的”。（《科学的价值》）世界只剩下了人们的“感觉的复合”。这种唯心论曾俘虏过不少缺少辩证唯物论武装的自然科学家。而人们在改造社会和自然中所获得的每一个新的进步与成功，都证明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逐步“理解”的，但是不可穷尽的。

二十年代以来，人们对物质结构的新认识，反过来促进了人们对物质的进一步变革。如何打破原子核，把其中蕴含的巨大的原子能释放出来为人所用，成了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一个主要课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除电子、质子、光子、中子外，还陆续发现了中微子、介子、超子以及它们的反粒子等几十种新的粒子。人们还发现，这些微观粒子本身既是实物，也是场；在运动中既表现出粒子性，也表现出波性。这就是它们的“波粒二象性”。

这些粒子，一般叫做“基本粒子”。这个名词不科学。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也表现着一个复杂而不可穷尽的世界。五十年代，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提出，这些粒子还有内部结构。他的模型促进了人们对这个新的物质结构层次的认识。以后科学的发展不断地证明：“基本”只是相对的，是相对于物质的一定结构层次和人类的一定认识水平而言的，不基本才是绝对的。没有什么绝对“基本”的粒子。因此，也有人根据它们所突出表现出来的波粒二象性，统称之为“波粒子”。

在波粒子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新的性质面前，唯心论者力图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老实证主义的老调唱完了，新实证主义又改头换面地登场了。他们说，既然人们只能通过科学仪器观察到波粒子的这种二象性，那么，只要用各种可以测量的量来加以描述就够了，人们的认识就“完备”了。他们认为，企图深入探求波和粒子之间的关系，那是没有用处和毫无意义的。他们同原性论、唯素说、唯能论者一脉相承，拒绝深入到物质的内部结构去。结果，客观实在只不过是知觉、观察、测量，只不过是人们从观察得来的波性和粒子性的“互补”。新实证主义并不“新”，“互补”的物质结构图景仍然是以马赫为代表的老实证主义者的感觉要素“复合”的翻版。

列宁早在二十世纪初，迎头痛击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这股反动思潮。列宁指出：“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



从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物质的某些具体性质的消失，并不是物质的消失。从哲学上看，物质就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这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自然科学的物质观则在于认识物质的结构和性质，例如从前的原子论，后来的电子论、场论、波粒子论，这些认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不断改变的，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哲学物质观和自然科学物质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把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把物质某种特定的结构和性质看成是物质所以成为物质的根本属性，就会走上唯心论。

人类探幽索微，总想穷根究底。从物质结构的一定层次、人类认识的一定阶段来说，是有“底”的。但是从物质结构的总体、从人类认识的长河来说，又永远没有“底”，总是深入一层又一层。到了一个层次的“底”，同时也就在新的水平上开始了向更新层次的进军。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人们对物质的认识也要不断地分，不断地一分为二。分，就是变革，就是斗争，就是革命。一切反动派都反对一分为二。孔孟之徒要“致中和”，董仲舒说“凡物必有合”，林彪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也惧怕斗争会破坏统一，大谈其“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的“中庸之道”。人类变革自然、认识自然的斗争，总是同人类变革社会、认识社会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的。自然科学中反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形而上学，总是这样那样地为反动阶级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所利用，直接间接地为这条政治路线服务。

今天，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实践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千百万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自觉性参加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实践，将会促使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不断变化。而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也就包含着人类利用新的自然力以改造世界的无限可能性，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深入批林批孔，不断地变革社会的政治斗争中，不断地变革自然，认识自然，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